社会与公益

SHE HUI YU GONG YI

聚焦社会建设·助力公益事业

2025
10月(上)
总第183期

ISSN 1674-9758
CN 11-5944/C



欢度国庆

1949—2025

多次入选 BIBF“精品期刊” | 荣获 CASS“最受欢迎期刊” | 荣获“2024 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 TOP100”



2025 年 10 月 上
总第 183 期

邮发代号：82-579

出刊日期：2025 年 10 月 15 日

社会与公益
Society & Public Welfare
SHE HUI YU GONG YI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 号（邮编 100010）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邮编 100037）

联系电话：
010-6830 0355/0356
6830 0357/0358
6830 0359/0360
6830 0361（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8398 8206/8208

网址：
www.swchina.org
www.spw.org.cn

投稿邮箱：
shegongren@163.com

Competent Unit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ganizer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China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Director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 学术委员会主任
魏礼群 WEI Liqun

Director of Editorial Board 编委会主任
陈存根 CHEN Cungen

Deputy Director of Editorial Board 编委会副主任
周惠 ZHOU Hui / 康鹏 KANG Peng / 王谦 WANG Qian
赵蓬奇 ZHAO Pengqi / 胡坚 HU Jian / 金莉 JIN Li

President 社长
崔强 CUI Qiang

Editor- in- chief / Chief Editor 总编辑 / 主编
刘正刚 LIU Zhenggang

Deputy Editor- in- chief 副总编辑
孙亚桥 SUN Yaqiao / 蒋鑫富 JIANG Xinfu

Vice President 副社长
王丽 / 魏三军

Associate Editor 副主编
田文旗 / 姜淑云 / 刘玉霞

President's Assistant 社长助理
刘斌 / 马明月

Council Vice Secretary-general 理事会副秘书长
殷鸿飞 / 贾培焱 / 尚宝荣

Editorial Office 编辑部
屈思源 / 白润红 / 史策 / 高云天 / 刘倡 / 平萍 / 黄桂华 / 李振鑫
田哞 / 彭一超 / 翟海艳 / 李雪良 / 梁晶晶 / 张力 / 田宇晗

Council Secretariat 《社会与公益》理事会秘书处
刁琼兰 / 马强 / 马贵荣 / 万沣毅 / 王红 / 王保峰 / 王德立 / 王守红 / 王国权 / 王坚松 / 王政
王哲 / 白浩扬 / 布朋印 / 冯军伟 / 田瑞建 / 卢莎 / 邓富友 / 布宏雷 / 石恒平 / 闫新勇 / 刘玉平
刘汉良 / 刘建军 / 刘长鹏 / 刘漩 / 孙明 / 朱红艳 / 任璐 / 辛福 / 吴春华 / 何书一 / 何宗尉
李永华 / 李梓英 / 李迪 / 李建华 / 李斌 / 李军 / 肖玲 / 苏芬芬 / 陈勇 / 陈承 / 谷学亮 / 杨航
杨会民 / 杨同喜 / 杨雨 / 杨高磊 / 杨扬 / 邵佳 / 张鼎 / 张燕蕊 / 张冬 / 张汉英 / 张金霞 / 林莹
金亮 / 屈玉芬 / 范娱艳 / 侯军旺 / 侯俊勇 / 赵燕成 / 赵建苹 / 赵容榴 / 徐志昌 / 高蕾 / 高云辉
郭保生 / 郭晓利 / 耿庆山 / 柴宏 / 秦一杰 / 黄玉海 / 黄洪松 / 曹耀文 / 鲁兵库 / 彭俊杰
联凡 / 惠熙玲 / 蒋红超 / 雷秋枫 / 雷彦敏 / 裴旭峰 / 臧忠燕 / 潘淑仪

Advertisement 广告
《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北京仕风文化发展中心

Designer 设计
武建和

Printing 印刷
北京启航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发行单位：《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广告发布登记：京朝字监广登字 20180004 号
定价：40.00 元

声明： 本刊严禁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AI）直接生成论文研究框架、主体内容与核心观点等，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检测（知网 AIGC 检测等）比例超过 20% 的论文作退稿处理。对已刊发论文，一经查实存在违反使用规范的情况，文责自负，本刊概不负责。

本刊转载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法律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 120 号 1 号楼太丰惠中大厦 1027-1039，邮编：100050
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 wenzhuxie@126.com

本刊数字版合作说明： 社工中国网、中国知网、龙源期刊网、博看网。本刊同时进行数字发行，作者如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授权我刊及我刊合作网站信息网络传播授权。

法律顾问： 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 刘百军律师

创刊时间：2010 年

致敬平凡岗位上的“坚守者”

礼赞锦绣山河，同庆盛世华诞。当十月的第一缕晨光洒落在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上，当神州大地沉浸于对祖国母亲的诚挚祝福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秉持着“节日我在岗”的担当精神，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坚守。

2025 年国庆节与中秋节相遇，8 天的“超长黄金周”让人们有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外出游玩。在交通枢纽、景区内外、医院病房、商超餐馆、街头巷尾，是无数忙碌的身影默默地织就了一张守护平安与便利的“保障网”，托举起千家万户的平安、团圆与祥和。

在繁忙的交通路口，交警们指挥交通，确保道路畅通；在景区如织的人流中，民警们来回巡逻，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在社区的角落里，片警们排查隐患，让居民安心过节。他们用脚步丈量责任，用汗水诠释担当，为节日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

对广大医务人员来说，节假日代表着更重的责任与更多的奉献。急诊室里，医生们争分夺秒抢救病人；病房里，护士、护工们悉心照料病患，他们凭借精湛的医术与温暖的关怀，守护着生命的通道，为民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天还没亮，环卫工人就已经开始清理街道、擦洗垃圾桶，不放过任何一个卫生死角；景区里，散落在地上的垃圾被及时捡起；夜市散场后，满地油污被一遍遍冲洗。正是他们的默默付出，让城市始终保持着整洁与美丽。

菜市场里，监管人员仔细检测蔬菜农药残留，确保“菜篮子”安全；超市里，他们认真核对商品保质期，不让过期食品上架；餐馆后厨，他们严格查看卫生状况，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他们用严格的监管，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还有更多的人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社区工作者看望独居老人，陪他们唠家常、解烦忧；供电抢修人员 24 小时待命，哪怕是深夜也要第一时间赶到故障现场；快递员和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把包裹和热饭准时送到顾客手中；公交司乘人员提前检查车辆，确保每位乘客的出行安全抵达……

这些坚守者，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朴实的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把对家人的思念暂时放在心里，把对人民群众的责任扛在肩上。

此刻，让我们向每位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这个黄金周，因为有你们的默默守护，团圆更暖，家国更安！

致敬平凡岗位上的坚守者，致敬每一位为美好生活奋斗的普通人！

社会与公益
Society & Public Welfare

目次 CONTENTS

2025 年 10 月 上
总第 183 期

基层风貌

社区治理中居民骨干的培育策略探究——以 L 镇两个社区的培育实践为例 …… 冯　敏　陈水金 / 01
从“输血”到“造血”：湖南督导经验激活西藏山南民政服务站内生力 …… 彭　月　邹　雯 / 04
党建铸魂、慈善助力、社工赋能：“双百工程”提质增效的融合化实践与时代启示
——以广州市增城区荔乡客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三位一体”模式为例 …… 陈飘贵　周婿清　宗颖施　曾瑞芬 / 06
协同治理下的外来务工人员融合服务：天河区的创新实践 …… 谢春华　徐国辉　林晓明 / 08
增能理论视角下院舍式成年残障人士的社会工作介入与反思——以广州市社会福利院为例 …… 程　玲 / 11

心理茶馆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介入”：社区心理服务的模式转型——以港湾心理茶馆实践为案例
…… 韦志中　周治琼　李华丽　余晓洁 / 12
一例青少年抑郁与社交焦虑问题的综合干预案例研究——以港湾街道心理茶馆的来访者为例 …… 迦　铎　李华丽 / 15

公益慈善

学生资助精准化水平提升的思考与研究 …… 林木操 / 17
家校社协同育人视角下社会公益资源促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探索 …… 汤　迪 / 20
基于就业竞争力提升的勤工助学育人路径研究 …… 梁　英　胡亚军　秦晓沅 / 23
以志愿服务为载体的青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研究 …… 朱心怡　方啸虎　林姝羽 / 26
基于“三全育人”理念的学生资助工作创新实践 …… 徐铭晗　古扎努尔·艾尼娃 / 29
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韩晋忠 / 32
残障学生职业教育“533”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 邵　晶 / 35
高等职业院校资助育人体系的问题检视与优化路径研究——以嘉兴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 李肖肖　许梦阳 / 38

一老一小

智慧养老模式与传统孝道文化的关系研究——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 …… 李　丹　张嘉艺 / 41
智能化时代背景下老年语言权力的社会缺位现象研究 …… 陈佳银　金琳华 / 44
儿童心理健康及特点分析 …… 马英轩 / 47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城镇低龄老年人精神需求研究 …… 李　凡 / 50
社会工作者介入儿童社区托管发挥专业能力初探 …… 张鸥影 / 53
家庭参与模式对社区老年美育教育效果的影响研究 …… 桑　彤　吴宏兵 / 56
老年人院舍适应影响因素及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 欧幼冰　杜　晶　郭子龙　叶韵婷 / 59
数智背景下老年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 申小芳 / 62
健康老龄化视域下涉老护理康养人才需求现状与对策研究 …… 常　燕　常艳梅　李阳阳　贺五四　王玉琴 / 65
基于期望理论的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策略 …… 刘　娟　王　熙　杨清超 / 68
基于心理健康视角的儿童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 …… 陈晓琴 / 71
婴幼儿托育中的家园共育模式创新研究 …… 周君丽 / 74
山区农村居民养老服务需求偏好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浙江省山区县 K 县的抽样调查 …… 林　菲 / 77

大健康背景下社区养老药学服务模式的构建与探索 …… 王　蕾 韩　蕾 芮潇潇 王锦淳 秦爱萍 / 81
协同治理视域下互助养老模式的有效运作路径研究——以杭州“时间银行”为案例分析 …… 刘　铃 / 84
数智化赋能农村助餐养老个性化服务优化的路径研究 …… 甘昭燕 / 87

案例分享

浅析党课与高职专业的密切融合——以金融专业为例 …… 汤　勇 黄　涛 徐　雪 / 90
新就业形态下外卖骑手劳动权益保障研究——基于扬州市外卖骑手的调研分析 …… 李雨洁 彭富培 周　莹 / 93
新时代党建引领下的“大后勤”助力高校育人的路径探析——以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 雷　行 李　格 / 96
红色文化基因与民宿功能的融合、活化设计策略研究——以安源煤矿民宿为例 …… 彭　娟 曹　治 / 99
城乡融合型治理的理论内涵、实践路径与未来趋势——以绍兴市上虞区盖北镇城乡融合型治理实践为例
…… 吕　彭 张明华 金耀锋 / 102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党史教育融合路径研究——以镇江市为例 …… 高雪荣 / 105
中华文化研学活动促进中老文化交流的路径探索——以鲁班工坊为例 …… 许　冬 / 108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基层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路径探索——以艺术学院第一师生党支部为例 …… 赵　婷 陈冉燃 / 111
建设具有体育特色的高校基层学生样板党支部的实践与思考
——以重庆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本科生党支部为例 …… 刘庭源 周思静 / 114
德法兼修视域下“经济法”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以大连大学经济管理专业为例 …… 吕丹丹 / 117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研究——以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静脉用药集中调配中心为例
…… 陈春茗 唐　锋 柏玉冰 任卫琼 * / 120

百家争鸣

基于循证矫正的戒毒人员心理康复实践及效果评估 …… 许亚男 / 123
隐私权保护视角下数字财产离婚分割的法律规制 …… 杨柯莹 / 126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新时代文化建设探讨 …… 张建成 / 129
在有条件的城乡学校开展甲骨文传承教育的实践路径探索 …… 杨艳涛 / 132
体育哲学之生命伦理审视 …… 王　瑜 董艳艳 李芳丽 荆益群 / 136
数字技术赋能职业教育改革：价值意蕴、问题剖析与路径探析 …… 李爱媚 / 139
医院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伦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 贾　品 / 14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青年文化自信路径探析 …… 范蓉蓉 / 145
近七年国内公共托育服务研究综述——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分析 …… 蔡联华 / 148
生态系统理论下社会工作介入孤独症青少年教育支持研究 …… 陈一丰 / 152
不良培训贷陷阱的风险识别与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 何　珂 徐　陆 莫小娇 / 155
三孩政策下广东省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 黎睿凡 辜　耀 张绮琪 古小敏 古炼辉 * / 158
基于文本分析法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首轮建设成效研究 …… 刘竹滢 / 161
法治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策略研究 …… 善托娅 / 164
第三次分配：功能、实践及对策 …… 闫何清 / 167
基于关系视角的社会工作对农村生计模式变迁的调节作用研究 …… 李振鑫 利爱娟 * 鲍旭圆 / 170
新时代军兵种特色文化育人的原则探析 …… 郑中伟 周建彩 天　羽 / 173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教学的路径研究 …… 贾秋宇 / 176
文化自信视域下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 …… 孟　煜 乔亚鲁 杨尚卿 / 179

思政论坛

影视数字资源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运用探究 …… 刘晓霞 / 182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山西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研究 …… 张艳丽 / 185
思政目标与专业目标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 …… 谭志娇 钱军旗 / 188
“三全育人”理念下医学院校大创项目投入产出效率提升路径分析 …… 廖春玲 / 191
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大学生家国情怀培养与就业指导融合模式探讨 …… 潘雯婷 张 宁* 杨孝芳 帅 乾 杨东莹 / 194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路径研究 …… 羌杨洋 李冬倩 陈 琳 / 197
新时代初中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的路径探究 …… 周 雪 / 200
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内涵与实践路径 …… 任洪皓 / 203
高校美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的方法与途径 …… 田 浩 / 206
基础医学教育阶段课程思政实施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 李 辉 李泓漾 / 209
课程思政背景下就业指导课程建设路径探索 …… 孙鑫俐 赵 芬* 孙大成 刘 娴 / 212
协同育人视域下红色文化与思政课实践教学融合研究 …… 李佳璐 / 215
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对学生心理素质的影响 …… 章舒腾 / 218
基于思政课主渠道提升高职学生法治素养的对策浅析 …… 李佳青 / 221

学海探骊

“互联网 +”视域下高职语文应用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研究 …… 杜晓飞 / 224
“五育融合”视域下“1+N”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构建研究 …… 肖聪阁 / 227
基于产教融合的开放大学“双师型”教师培养路径的探索 …… 丛冰玉 张燕杰 / 231
基于大概念的初中“道德与法治”大单元教学设计研究 …… 陈 凤 / 234
高校法治建设背景下辅导员法治素养提升路径研究 …… 闻 竹 / 237
“1+N”生活化协同育人模式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实施成效研究 …… 张鹏程 / 240
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研究 …… 李成萍 / 243
精准育人理念下公安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 雷 燕 / 247
教育强国背景下高校人才队伍建设路径 …… 秦丽媛 / 252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学生就业困境与突围策略探析 …… 罗梦婷 路俊俊 雷 顺 陈 娜 黄 巾 / 255
社交软件的即时通信功能对大学生课堂专注力的影响探究 …… 唐 榕 / 258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探析 …… 卢梦歌 / 261
大学生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及安全教育提升策略研究 …… 乔雅洁 刘佳洁 姬明明 白 茹 刘少华 / 264
“两路”精神融入交通类高职院校育人模式研究 …… 蔡平娟 / 267
高校大学生急救技能培养与普及体系的构建和实践 …… 任 冬 / 270
基于“一站式”学生社区构建“九思”对话育人模式的实践探索 …… 王 颖 / 273
以就业为导向提升高职药学类大学生专业技能探析 …… 邓 琳 晁雪明 王晓阳 / 276
表达性艺术团体辅导对改善高职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实证研究 …… 陈晓燕 张梦元 罗春红 赵鑫飞 朱 琳 / 279
新时代中职学校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 …… 史瑞盟 金筛成 / 282

艺术长廊

三春有雨 艺通于道——读胡力民书法作品有感 …… 旭 宇
写心灵境 述精神魂——记当代没骨人物画家苏国强 …… 彭一超

社区治理中居民骨干的培育策略探究
——以L镇两个社区的培育实践为例

冯　敏 陈水金

在社区治理工作中，社工往往需要整合社区居民力量共同参与具体的治理工作，居民骨干在挖掘和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工作方面有着重要的带动和引领作用。培育居民骨干，提升他们的参与意识、参与能力，促进他们持续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工作，成为推动建设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的重要抓手。

一、培育居民骨干的必要性

（一）培育居民骨干是构建社区治理体系的基础

社区治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解决或服务提供的过程。因此，推动社区治理、居民小区自治，需要回答“做什么”“谁来做”“怎么做”三个关键问题。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与实践，建构成一个小区自治工作推进的金字塔模型（见图1）。以涉及小区公共利益的管理服务作为自治的突破点和最终的工作目标，推动小区自治工作的开展，明确了要“做什么”。围绕如何落实自治工作内容，搭建起开展自治工作的主体和机制，明确了“谁来做”和“怎么做”，这是小区自治工作的载体和基础，以及长效治理的关键。

居民自治骨干在社区治理工作过程中，担当着服务提供者、活动提供者等角色，通过楼长培育，培育社区治理力量，解决“谁来做”的人力资源问题，所以，居民自治骨干的培育是金字塔的基础，是推动社区治理工作的基石之一。

（二）居民骨干是社区知民情、懂民意的重要渠道

居民自治骨干从居民中推选、培育产生，其生活在小区的场域中，与居民的联系密切，能及时接触居民、了解居民的声音，并能理解居民提出的意见和问题。因此居民骨干能作为社区管理者与居民之间的桥梁，传递信息、协调关系，也作为社区内部信息的收集者和分析者，为社区的决策提供依据。

二、居民骨干培育及参与社区治理工作的困难分析

（一）居民骨干培育的难点

1. 同质性高问题

在实际情况中，居民自治团队中的社区居民骨干绝大部分是社区党员以及退休居民，他们在分析问题及处理问题的视角等方面较为一致，导致自治团队在创新能力、问题处理方法的多元化等方面受到一定影响，不利于社区治理服务工作的有效开展。

2. 能力差异问题

社区居民骨干之间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在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新方法、新技巧等方面的能力也存在差异，当中可能有人学历比较高，有人未接受过系统教育。这种能力差异，让社工在培育社区居民骨干的过程中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3. 公共意识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居民骨干参与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工作，往往都是志愿性质的，有补贴也是志愿服务补贴。对于他们来说，是否参与、参与过程中是否尽力等没有硬性和规范性要求，如何提升社区居民骨干的公共利益意识、社区参与意识、社区参与积极性和社区参与能力是培育工作的关键，也是最大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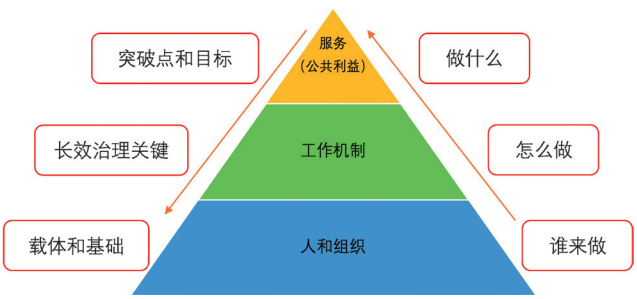


图1 社区治理的金字塔模型

（二）居民骨干社区参与的重点

1. 聚焦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社区居民骨干经常需要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渠道收集社区的问题和关切议题提交给社区工作人员或社工等。作为社区内的居民，居民骨干对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有自己的观点，社区居民也有各自的意见和需求，有时候大家的需求和意见是一致的，有时候各方的需求与意见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培养居民自治骨干在面对意见分歧时能够有效“聚焦问题”的能力，推动各方对社区公共问题和社区公共需求达成共识，是提升居民骨干社区参与能力的重点之一。

2. 有效议事

在社区治理工作实践中，社区工作人员、社工等往往需要组织社区居民开展关于社区事务、社区建设工作的居民议事会议等活动，居民骨干是社区居民议事会议的重要成员。他们的协商议事能力，对居民议事会议能否顺利开展、会议效果和目标能否达成等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提升社区事务的决策质量和执行效率至关重要。

3. 持续参与

居民骨干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参与能力有限、参与程度有限，以及参与过程中会遇到反对或质疑的声音，是阻碍他们持续参与社区治理工作的重要原因。居民骨干参与社区治理工作绝大部分是志愿服务性质的，不被理解、被质疑以及工作无法推进会让他们产生较大的挫败感，从而影响其继续参与的意愿和积极性。

4. 动员居民

动员居民参与并推动居民达成共识，是居民骨干在社区治理服务工作中的关键目标之一。线下动员是主要的动员方式，但受限于居民的理解能力差异、利益牵扯，以及生活、工作等作息时间的差异等原因，线下动员需要居民骨干利用大量个人休息时间开展，对居民骨干的参与积极性和持续性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居民的理解能力差异、居民间的摩擦等为居民骨干的动员工作带来了较大的挑战，需要居民骨干灵活变通动员的表达方式和技巧等，达到动员居民的目的。

三、居民骨干培育实践案例

（一）QC 社区“2+1+1”单体楼问题解决机制

1. 案例背景

QC 社区一栋 35 年楼龄的单体楼，二楼被用作托管机构，楼内共有 20 户居民，其中有 20% 的居民为年长者，20% 的房屋被出租，还有 20% 的房屋空置，楼栋年久失修，日常维护工作由少数积极热心的居民自发进行。

2. 工作策略及具体做法

在推进单体楼治理的过程中，社工围绕“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这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工作，进而探索并形成了“2+1+1”的问题解决机制。

“2”是指两类关键群体，回应的是“谁来做”问题，即在推动社区单体楼问题的处理过程中，以社区党员、居民群众中的积极骨干分子为核心力量，以多种方式激发他们的参与积极性，推动和支持他们组建楼栋智囊团，参与单体楼问题处理工作的组织和落实，并成为主要服务力量。

“1”是指议事机制，回应的是“做什么”问题，即通过一事一议，让各方聚焦共识，明确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1”是指行动机制，回应的是“怎么做”问题，要求议事讨论的结果要付诸行动，并明确完成的实效性，确保讨论结果得到落实。

3. 工作成效

（1）解决问题。通过“2+1+1”的机制运作，解决 5 个楼栋公共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居民的参与度显著提升，从最初的 40% 增加至 90%。

（2）培育人才。服务开展过程中形成了 16 人楼栋智囊团，他们积极参与了单体楼问题解决工作的相关服务工作，服务能力得到了提升。在他们的带领下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

（3）经验推广。周边社区纷纷参考 QC 社区在处理单体楼问题所形成的工作经验和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QY 社区居民自治队伍“陪伴同行”培育模式

1. 案例背景

QY 社区 Y 小区有 500 户家庭，租户比例高、流动人口多，受原物业公司管理不善的影响，业主意见较大。

2. 工作策略及具体做法

（1）抓准时机

社工利用小区整体旧改的关键时期，依托疫情管控期间挖掘和培养的居民义工骨干，指导小区居民通过选举方式产生居民骨干和自管小组（以下简称“小组”）并借助拆除违建、商定旧改方案、小区绿化改造和车位重新划分等契机，逐步培养了一支有小区“公心”的小组。

（2）陪伴成长

小组成立后，社工采用“陪伴同行”的方式，与小组成员一起开展具体的服务工作，并在服务过程中指导和协助小组成员处理相关工作难题。社工与小组成员一起深入社区进行走访，收集居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了解社区实际情况和居民的真实想法；围绕社区公共问题，与小组成员一起组织议事协商活动，并围绕大家讨论的结果开展具体的社区活动和社区治理行动。

（3）成长支持

社工期望小组在社工离场后能继续发挥作用，积极参与社区问题的治理工作，这就需要对小组做进一步的培育支持。社工对小组成长的培育支持，主要包括能力建设、组织建设、外部支持等方面。能力建设，主要是通过培训、交流学习等方式，帮助小组成员提升问题分析、议事协商和服务策划等方面的能力。组织建设包括组织管理制度建设方面的指导，并推动小组进行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备案工作。外部支持包括链接资源为小组开展居民服务提供支持，并指导小组积极回应社区居民的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社区服务，在服务中帮助小组提升在居民中的信任度和声望。

3. 工作成效

（1）解决了多个小区顽疾

小组在社工的助力下，解决了小区公共空间再利用创收、消防改造、垃圾站改造、电动车充电桩安装、车位划分、儿童乐园建设、违建拆除、出入闸口改造、部分楼栋电梯加装、小区议事厅建设、小区绿化树更换等多个困扰了小区居民很久的问题。

（2）培育小区治理人才，形成了小区自治体系

通过培育工作，形成了一个由 11 名社区骨干构成的小组，建立了一套包括财务管理、骨干及小组主任的换届选举、居民意见的收集、议事协商以及信息公开在内的制度框架，构建起系统的小区自治体系。

（3）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了居民对小区的认同感

小组通过结合小区的旧改计划和随后的改造工作，有效地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居民停车有序，原被绿化树遮挡严重的情况得到改善，小区物业费的收缴率，从原来的 50% 提高到 95%。

四、居民骨干培育经验总结

（一）居民骨干培育的实施策略

1. 培育对象的挖掘策略

挖掘社区内潜在的自治力量，可以从“老”“熟”“红”三个维度进行潜在成员的识别与动员。“老”指老街坊，“熟”指熟悉社区服务的资深志愿者，“红”指基层党支部书记及党员。

2. 参与意识的培育策略

培育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识，主要是培养社区居民骨干的公共利益视角。公共利益往往与社区公共问题相关，所以社区居民骨干的公共利益视角培养，可以从发现社区公共问题、处理社区公共问题这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通过开展社区漫步，居民骨干可以真切地感受社区的实际情况，在漫步中观察和发现社区存在的问题；通过多方讨论制定社区问题清单，能够将多方的看法进行碰撞汇聚共识，厘定最终的社区公共问题。二是通过社区议事协商会议等方式，居民骨干在实际的情况处理中，了解和掌握议事讨论的方法，感受对不同意见的兼顾和利益平衡的处理意识和方法的重要性，提升处理和应对社区问题或难题的能力。

3. 行动能力的培育策略

综合分析上述社区实践案例，社工在培养居民骨干和其他骨干的行动能力过程中，实施了“四个学习”的策略。

一是共情学习，通过让居民骨干在社区漫步、居民走访等工作中，感受社区的真实氛围和呼声，以及居民群众的真实情感，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并增强正向体验，提升居民骨干行动的意愿。

二是示范学习，通过组织居民骨干到先进社区、示范社区等进行交流学习，组织典范居民骨干榜样经验分享等，让居民骨干看到参与社区公共问题治理工作的可能性、可行性，提升居民骨干参与行动的意愿。

三是实践学习，通过以实践为主、经验分享为辅的学习方式，让居民骨干明白光想不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任何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以提升居民骨干行动的积极性。

四是路径学习，协助居民骨干掌握社区参与的不同层次，掌握对应的服务活动策划方式，让居民骨干明白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或维度参与或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工作，以目标导向提升居民骨干的行动能力。

（二）促进居民骨干持续参与的实施策略

1. 建机立制，让居民骨干在组织中长效参与

人都是群居的，居民骨干要持续地参与社区服务，单独一个人是很难坚持下来的，但加入组织有助于提升个人参与的持续性，从而实现长效参与。因此，社工需要帮助居民骨干找到组织，并帮助组织完善自身建设和服务能力，需要协助（下转 04 页）

从“输血”到“造血”：湖南督导经验激活西藏山南民政服务站内生力

彭　月　邹　雯

当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民政服务站支持项目督导组再次踏上西藏山南的土地，扑面而来的除了稀薄的空气和强烈的紫外线，还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如何将湖南多年摸索出的社工站建设经验，在这片雪域高原扎下根、开出花。一年过去了，变化的种子已悄然破土、抽枝展叶。

从“手忙脚乱”到“有章可循”：精细化管理筑牢根基

山南市热荣乡民政服务站的扎西平措，曾一度为纷至沓来的民政事务和群众需求而手忙脚乱。他回忆道：“以前工作像‘打乱仗’，文件归档混杂、服务记录零散，更别提系统规划了。”湖南督导团队带来的首剂“良方”，便是引入湖南社工站历经多年沉淀的精细化管理模式。

督导团队不是简单地复制粘贴，而是与山南社工共同梳理本土需求，从服务对象的分层管理、档案的电子化规范建档，到项目实施的标准化流程，每一步都变得清晰可循。隆子县社工总站站长索朗德吉深有感触：“以前我们凭热情做事，现在懂得了专业路径。比如为困难老人建档，湖南老师教我们不仅记录基本信息，更要评估其社会支持网络和潜在风险，形成动态服务方案。如今服务效率提升了，群众满意度也明显提高。”

（上接 03 页）组织建立相关的机制，以激励、维系和巩固组织成员的参与。一是建立持续参与的平台，建立行动机制，让居民骨干在持续开展的服务活动中坚持参与。二是建立相关的培育、维系和激励机制，通过培训、团建、激励、表扬等活动，让居民骨干保持对组织的黏性，借助组织平台持续、长效地参与社区治理工作和社区服务工作。

2. 拉资结源，让居民骨干在支持中长效参与

社区参与活动和社区服务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相关的物资、资源的支持。在案例中，社工协助链接社区的相关人财物、政策等资源，帮助居民骨干顺利组织开展相关的服务，一是能较好地帮助降低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工作的成本；二是让居民骨干看到社区中更多的支持网络和力量，提升他们的信心；三是帮助社区资源力量与居民骨干建立关系，有助于后续双方之间的继续合作，提升社区治理工作效果。

五、总结

参与主体的培育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工作内容，社区居民骨干、志愿者骨干、居民自治小组等群众力量是参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培育、成长需要社工相伴同行，为他们提供全面的支持，如技术、资源和情感等方面的支持，在社区服务、社区治理实践中锻炼和提升他们的参与意愿和积极性，提升他们的公共利益视角和社区治理服务能力；需要帮助他们找到组织，并协助组织完善自身建设，让居民骨干在组织和服务中实现长效参与；需要协助他们增强参与社区治理工作、社区服务的支持网络，推动社区多方的资源力量与他们建立联系和合作关系。

（作者：冯敏，广州市荔湾区恒福社会工作服务社；陈水金，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

从“无从下手”到“专业介入”：服务能力实现质的飞跃

面对复杂的个案，山南社工曾常感到“无从下手”。湖南督导带来的“嵌入式”能力建设模式，成为解锁专业服务的关键。督导团队以“做中学”为核心，通过角色扮演、案例推演、协同入户等沉浸式培训，将理论化为实践。针对困境儿童、留守老人和特殊困难群体的服务，湖南督导引入了成熟的“社会支持网络重建”“优势视角赋能”等专业方法。

扎囊县桑耶镇社工站曾接手一位因家庭变故而陷入抑郁的青少年个案。在湖南督导指导下，社工不只局限于简单慰问，而是系统评估其心理状态、家庭关系、学校支持，链接心理咨询资源，并策划了“阳光伙伴”同伴支持小组。几个月后，孩子脸上重现笑容，学业也步入正轨。社工巴桑表示：“湖南老师教会我们：真正的帮助不是替代，而是激发服务对象自身的力量去应对挑战。”

资源链接曾是山南部分社工站的短板。督导组凭借其广泛的资源网络，协助山南社工站构建起“资源整合平台”。一方面引入湖南“慈善 + 社工 + 志愿者”联动经验，另一方面指导山南社工精准识别和对接本地资源。斗玉珞巴民族乡一名独居孤寡老人因突发意外事故受伤，急需转往 2000 多公里外的四川省成都市华西医院接受治疗。因老人无直系亲属，在就医过程中面临挂号、交通、陪护等多重难题。社工迅速与本地医院对接，获取老人病情资料，并与目标医院沟通，协助老人完成远程挂号、床位预约及医保异地备案手续；协调爱心志愿者、交通部门，制定安全、高效的跨省转运方案。考虑到老人身体状况，选择“飞机 + 救护车”接力的方式，确保行程安全。资源“活水”的引入，显著提升了服务的覆盖面和实效性。

从“坐等群众”到“主动敲门”：服务理念焕然一新

湖南督导带来的最深层次变革在于服务理念的迭代：从“坐等群众上门”的行政化思维，转向“主动发现需求、精准提供服务”的专业社工思维。在湖南督导的倡导和示范下，“用脚丈量民情”成为山南社工的新常态。他们深入牧区草场、田间地头、居民家中，主动摸排需求，建立翔实的民生数据库。玉麦乡社工站根据摸排情况，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将戍边故事融入儿童关爱服务，创新设计“小小护边员”情境课堂。在扎日乡，督导组深入了解当地民众的实际需求，现场指导社工如何以需求为导向设计多元化服务。

服务设计也从“一刀切”转向“个性化”。湖南督导引入了“需求评估—方案设计—效果评价”的闭环管理理念。如针对不同年龄段留守儿童的差异化需求，指导设计了“小课堂”“兴趣工坊”等多元服务。一位受益儿童的家长表示：“以前觉得社工就是发东西的，现在才知道他们还懂孩子的心，活动都办到孩子心坎上了。”

从“埋头做事”到“管理跟上”：项目成效更上层楼

为提升山南市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在督导组的深度参与下，山南市民政系统总结前期对接调研成果，借鉴并融合了湖南省民政社工站建设的成熟经验，出台《山南市社工站建设视觉化指引》《山南市乡镇（街道）社工站项目成效评估指引》《山南市乡镇（街道）社工站项目建设评估指标》等关键性指导文件，为山南社工站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督导组以两个文件精神为核心抓手，系统梳理并规范了全市各社工站的服务流程与执行标准。评估工作聚焦项目设计、财务管理、执行管控、服务痕迹管理及核心成效等关键维度，通过严谨对标，对各站点进行全方位“体检”。此举有效驱动各站点服务模式由“经验导向”向“标准引领”转变，并在评估过程中精准识别项目设计、财务合规、进度管控等方面存在的潜在问题与风险点，及时介入指导整改。

评估工作不仅是对工作的检验，更成为赋能站点成长的重要机制。通过客观、专业地评估反馈，各民政服务站得以清晰认识自身优势与短板，切实达到了“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优、以评提质”的目标，为山南市社工站项目的长效发展与服务效能持续提升奠定了坚实的规范化管理基础。

高原新篇：湘藏携手共绘社会工作新画卷

在湖南省民政厅的支持和指导下，湖南多年积累的督导经验、运营模式、专业方法，通过精准滴灌，在山南社工站这片土地上焕发出蓬勃生机。从规范化建设到精细管理的稳步提升，从专业能力的发展需求到实务自信的逐步建立——山南社工站的蜕变清晰可见。这不仅是湖南经验的成功输出，更是全国社会工作“一家亲”的生动写照。（下转 06 页）

党建铸魂、慈善助力、社工赋能：“双百工程”提质增效的融合化实践与时代启示

——以广州市增城区荔乡客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三位一体”模式为例

陈飘贵 周嫦清 宗颖施 曾瑞芬

在国家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双百工程”作为夯实民生保障、激活基层服务效能的核心抓手，其对提质增效的探索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和谐。广州市增城区荔乡客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荔乡客社工中心”）党支部以“党旗红 荔乡情”党建品牌为引领，统筹旗下中新镇“双百工程”第二社工站、增江街“双百工程”社工服务站、派潭镇“双百工程”第二社工站、荔湖街“双百工程”社工服务站、荔城街“双百工程”第二社工服务站（以下简称“五站点”），聚焦属地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需求，创新构建“党建铸魂强根基、慈善助力聚资源、社工赋能提专业”的“三位一体”服务模式，形成“中心引领、站点落地、全域覆盖”的服务格局，为“双百工程”从“基层覆盖”向“优质服务”升级提供了融合化实践样本。

一、背景：三维协同破解基层服务深层矛盾

增城区五镇（街）地处城乡交融带，复杂的地理区位造就了多元的民生图景，困难群众呈现“分布散、需求杂、资源弱”的典型特征，对基层服务的精准性、协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社工站单独服务时，不仅面临资源不足、方法单一等表层问题，更暴露出三大深层矛盾：一是党建引领力与基层治理需求不匹配，组织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服务效能；二是慈善力量与民生服务衔接不紧密，社会资源难以精准触达群众需求；三是社工专业效能与群众多元需求适配度不足，服务供给与实际需求存在“错位”。

对此，荔乡客社工中心党支部立足“党建铸魂、慈善助力、社工赋能”三维思路，从2024年起，以“党旗红 荔乡情”品牌为纽带，推动五站点打破地域壁垒，实现党建、慈善、社工资源的深度融合，将分散的“点式服务”升级为“融合化服务”，完成从“单一供给”到“协同赋能”的转变，为破解基层治理中“服务碎片化、资源分散化、效能表层化”的共性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二、实践：“三位一体”构建融合化服务体系

（一）党建铸魂：强化引领，筑牢服务根基

中心党支部以“铸魂”为核心，将党建贯穿服务全过程，为“双百工程”提供坚实组织保障。

搭建“1+5+N”党建联动体系：“1”即中心党支部统筹全局，“5”即五站点与属地村（社区）党支部结对建强战斗堡垒，“N”即联动41个共建党支部（企业、学校、社会组织等党支部）形成服务合力。通过联合主题党日、党员联户等机制，推动党员在困难群众识别、需求对接中带头攻坚，确保服务方向与民生需求同频共振。

（上接05页）湘藏携手织就的这张更密、更暖的专业服务网络，正为民族地区基层民生服务能力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为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增添了坚实而温暖的注脚。

（作者单位：湖南省东西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推行“党员服务责任田”制度：五站点党员社工每人认领 10~15 户困难家庭，建立“每月走访、每月汇总、每季评估”机制，全年累计收集群众需求信息 120 余条，成为链接慈善资源、开展专业服务的“第一手资料”，同步联动 63 个行政村居（也称“社工点”）收集需求，形成动态更新的“需求库”，为精准帮扶提供数据支撑。

打造“红色服务先锋队”：整合五站点党员社工、退役军人党员等力量组建队伍，在应急帮扶、资源链接中发挥先锋作用。例如，增江街“双百工程”社工服务站党员带头组建“红棉老兵关爱队”，为孤寡老人建立“每月一访”机制，既解决生活难题，又通过红色故事宣讲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实现“服务 + 教育”双效能。

（二）慈善助力：聚合资源，破解供需难题

以党建为桥梁激活慈善资源，指导五站点构建“靶向捐赠 + 精准服务”模式。形成“社工摸排需求—中心匹配资源—站点落地帮扶”的闭环机制，2024—2025 年累计链接慈善资源超 500 万元，实现“需求与资源”的精准对接，例如：

派潭镇“双百工程”第二社工站“粥韵传情·志愿赋能”计划：通过 80 余场“一粥一乐”公益活动服务超 5000 人次，以日常关怀激发长者社区参与热情，构建“邻里互助圈”。

中新镇“双百工程”第二社工站“红色微改一平方米”项目：三年间为逾百名困境儿童改造学习环境，打造个性化“梦空间”，助力成长发展。

增江街“双百工程”社工站“微心愿·善暖万家”行动：征集并帮助 182 名困难群众实现“微心愿”，以“小善意”汇聚“大温暖”。

荔城街“双百工程”第二社工服务站“小橘灯”共融入计划，以“共融成长”为核心理念，构建“12345”服务体系：围绕共融生态圈目标，突破两大障碍，推动意识、关系、帮扶三层融入，从个人、家庭、学校、社区四维介入，联动社区、社工、社区组织、志愿者及慈善资源五大主体。通过制作社区资源地图、开展混龄互助小组、培育志愿服 务队举办集体生日会等活动，提升儿童社区熟悉度、社交能力与归属感，营造“儿童友好、全龄共融”的社 区生态。

荔湖街“双百工程”社工站以党建为引领，实施“五社联动 + 慈善创新”，发起“荔湖公益汇”，联动高校、艺术机构等，开设素质提升、兴趣培养、亲子互动等公益课堂，服务覆盖 3000 余人次，促进儿童成长，赋能家庭， 推动社区公益发展。

（三）社工赋能：专业介入，提升服务质效

中心发挥社工专业优势，将党建引领的组织力、慈善汇聚的资源力转化为精准服务力，实现“专业效能与需求”的深度适配。

精准评估：五站点社工运用“生态系统理论”为困难群众建立“三维档案”（家庭结构、健康状况、需求优先级），如派潭镇社工绘制“山区长者地图”，标注居住位置与安全隐患，为“一粥一乐”项目划定服务半径，确保服务“不缺位、不错位”。

专业服务：针对不同群体设计个性化方案，如荔湖街社工站社工为困境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开展“荔湖公益汇”儿童公益课堂”，通过多元化课程服务儿童 3000 人次，兼顾学业支持和心理辅导。

能力建设：中心定期组织“党建 + 专业”培训 12 场，内容涵盖党史学习教育、个案工作技巧等，提升社工“党建引领下的专业服务能力”。例如，中新镇“双百工程”第二社工站提炼“党建引领·福袋行动”经验为标准流程，通过跨站交流实现服务模式复制推广。

三、成效：融合赋能彰显“双百工程”综合价值

（一）困难群众获得感全面提升

五站点全年累计服务困难群众 9 万余人次，形成“党建引领有温度、慈善帮扶有力度、专业服务有精度”的服务生态：3675 名特殊群体收到“福袋”关怀，1560 余个“微心愿”实现，165 户家庭完成居家微改造，800 余名老人缓解孤独感，服务精准度与群众满意度均达 95% 以上。

（二）服务融合效能显著增强

通过“党建 + 慈善 + 社工”融合，五站点 2024—2025 年共链接资源折合价值超 500 万元，带动建立“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三单对接机制，形成“群众点单、支部派单、社工接单、群众评单”闭环。基层应对民生问题的响应速度提升 40%，本土慈善力量参与度增长 65%，社工专业服务覆盖率扩大至五站点所有行政村，有效破解“服务碎片化”难题。

（三）品牌示范效应持续扩大

五站点的创新实践获国家级媒体深度报道 12 篇、省级媒体聚焦报道 48 篇，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其中机构项目“党旗红 荔军情”红色宣讲项目获 2024 年度广州市红棉老兵志愿服务“兵心行动”优秀项目；派潭镇“双百工程”第二社工站项目“有爱童行——困境儿童关爱计划”获评（下转 08 页）



协同治理下的外来务工人员融合服务：天河区的创新实践

谢春华 徐国辉 林晓明

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当下，外来务工人员（来穗人员）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其融合问题备受关注。广州市天河区外来人口超 130 万人，具有流动性强、来源广泛、分布分散等特点，凝聚来穗人员需求十分迫切。他们为天河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治理参与方面仍存在不足。在此背景下，天河区来穗人员服务示范中心应运而生，以协同治理和社会融合理论为支撑，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来穗人员融合服务之路。

天河区来穗人员服务示范中心（以下简称“示范中心”）于 2021 年 11 月揭牌成立，是广州市首家区级来穗人员服务示范中心。目前，示范中心由天河区委政法委主管，广州市大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运营。在天河区委政法委、社会工作部以及所在地前进街道党工委的指导支持下，示范中心坚持党建引领，构建了“政府主导、企业履责、社会组织补充”的工作格局，以“五社联动”为工作机制，采用“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线下与

（上接 07 页）第十一届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十佳品牌项目”，2024 年“青苗计划”民政领域（初老服务老老）志愿服务培育项目获广州志愿者协会优秀项目以及多个社工站获评优秀项目，其“三位一体”体系为全国“双百工程”提质增效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范式。

四、经验启示

荔乡客社工中心的实践证明，“党建铸魂、慈善助力、社工赋能”的“三位一体”模式，是推动“双百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党建为服务提供“方向引领”，慈善为服务注入“资源活水”，社工为服务赋予“专业动能”，三者融合既能破解基层服务“碎片化、分散化、表层化”难题，又能实现“精准化识别、精细化服务、多元化参与”的目标。未来，需进一步完善“党建引领下的慈善资源对接平台”与“社工专业督导体系”，让“党旗红”更鲜明、“慈善情”更浓厚、“社工力”更专业，为“双百工程”全域提质提供更坚实的融合支撑。

（作者单位：增城区荔乡客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线上活动相结合、扎根属地街道与广泛联系 21 条街道相结合、与政府职能部门及社会力量互动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实操相结合的“五结合”工作方式，助力来穗人员在工作、生活、社会治理参与和精神文化四个方面实现属地融合。截至 2025 年 10 月，示范中心链接资源 61 万元，开展线上线下融合活动 105 场，服务来穗人员超 6.2 万人次，服务覆盖天河区 21 条街，获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和中国社会工作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平台、广东社会工作发布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以及《中国社会工作报》等市级以上媒体宣传报道 64 篇次。

汇聚资源，助力工作融合

为满足来穗人员在就业支持方面的需求，示范中心积极作为，通过“走出去”与 17 个职能部门和 51 家企事业单位共建资源，建立企业资源库，组建近千人就业服务交流群和 3 个企业联络交流群，为不同年龄、经历、学历的来穗人员提供全方位的就业服务。

一是就业渠道拓展。链接区人社、市监、科工信等职能部门资源和企业资源，持续开展“春风行动”招聘会，线下推送 900 多个空岗，并恒常开展来穗人员就业创业能力提升培训、创业扶持政策解读和供需对接等 10 场系列服务，为 3000 多名来来穗人员搭建就业桥梁。

二是法律权益保障。邀请 5 个公益专业律师驻点示范中心，免费为来穗人员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服务 24 次，开展劳动权益保护法律及相关政策普及教育。同时，开通“热线”服务，协助解决租房纠纷、劳动纠纷、子女抚养等 40 件法律问题，让来穗人员“维权有指引”，保障其合法权益。

三是生活便利服务。整合辖区餐饮企业，为来穗人员提供餐饮折扣优惠服务，建成“友好商圈”。依托“天河区新就业群体暖心之家”阵地优势，携手平台企业、社会组织、职能部门共建“暖蜂巢·爱心驿站”服务阵地，在周边商家挂设“爱心商家”标识，拓展饮水休息、取暖歇凉、充电应急、积分兑换等多种类暖“新”服务。骑手通过参与志愿服务，积累积分并在“爱心商家”兑换生活用品、清凉物品等，促进来穗人员社区融入。

精准关爱，助力生活融合

围绕来穗人员日常生活需要，示范中心积极联动社会各界爱心资源以及企业单位，开展多样化便民服务。

一是开展便民服务活动。以天河区图书馆来穗人员服务示范中心分馆和来穗人员专场“暖‘新’服务市集”为阵地，广泛开展图书阅读及通借通还、义剪、义诊、义修、政策宣传、法律咨询、就业咨询、心理咨询等多样化暖心便民服务活动，满足来穗人员多元需求。

二是开展生活关怀服务。通过示范中心党支部与辖区党组织、企业党组织共建，为来穗困境群体及来穗人员提供多样化生活关怀服务，如夏日送清凉、冬日送温暖、“微微星光·点亮万家”微心愿征集活动、节日慰问活动等。依托社区“穗好办”平台，今年以来联动党组织、党员点亮来穗人员“微心愿”，至今已链接资金近万元，为来穗人员提供生活用品等物资支持，提升其生活质量与幸福感。今年夏天，示范中心整合省内外爱心企业商家资源捐赠饮用水折合 10.4 万元，为天河区户外一线工作者开展持续 5 个月的“夏日送清凉”专题活动，累计服务 30528 人次。。

三是搭建心理服务平台。搭建“集散式”公益性心理服务平台，组建 27 人的心理专业人才志愿队，打造“安心天河”心理健康教育品牌项目。与 21 条街社工站建立个案转介及合作跟进工作机制，线上线下开展心理健康宣传及知识宣讲、心理健康评估、心理问题咨询、治疗转介等服务，开展心理游园、沙盘体验、正向教育、驻校辅导、心理主题班会等 53 场主题活动破解群体融合难题。今年，示范中心有效联动了政府职能部门与社会力量在天河区 13 个街道 22 所小学开展 24 场心理游园活动，服务儿童 9524 人次，活动受到校方高度好评。

党建引领，助力社会治理参与融合

示范中心坚持党建引领，以“1 个区级来穗人员暖心之家 +N 个服务驿站”阵地体系为服务载体，为来穗人员构筑起“累能歇脚、热能纳凉、饿能吃饭、急能办事”的服务体系。

一是健全基层组织。示范中心党支部探索来穗党员亮身份报到机制，提供党务咨询（如党组织关系咨询）、档案保管咨询、党性教育培训等服务。打造来穗人员党建工作标准化样板，为新业态企业党组织、来穗人员党员提供微党课、微生活、微活动“三微”党建服务，促进来穗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提升。

二是推动政企共建。依托来穗党员之家，以示

范中心党支部与美团平台、网约车公司等企业党支部为中心，探索“两新”组织与所属企业党组织的联建共建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事业共创，推动基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通过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发来穗人员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

三是凝聚基层力量。充分发挥来穗人员走街串巷、熟悉民情的优势，组建一支由 57 名快递员组成的“爱‘新’骑手志愿队”，充当“配送员、安全员、宣传员”角色，助力 260 份微心愿包、发放近千张儿童安全倡议单、完成 2 个社区资源地图绘制、联合开展 6 场消防科普活动，服务逾 2000 人。在冬至暖“新”主题党日活动中，组织政企事业单位多元主体召开社区议事会，邀请来穗人员代表参与，表达合理诉求，并为社区治理建言献策，拓展来穗人员参与基层治理途径。此外，围绕来穗人员应急安全需求，构建“主题宣传 + 实操培训 + 场景演练”的立体化服务体系，针对消防、交通、急救、公共卫生四大核心领域，通过“启能—培能—展能—传能”四阶志愿培训体系深化培育“穗”岁平安志愿队，持续开展“进园区、进学校、进驿站、进公园、进城中村”的“五进”行动，服务群众 5000 人次。近期，结合“两热”宣传防控专项工作重点，志愿队深入社区，通过入户敲门问安、派发灭蚊片防控物资、宣传防控知识、张贴防控宣传小贴士等多种行动，服务居民 2000 余人次，切实筑牢社区健康防线。

慈善公益，助力精神文化融合

示范中心发挥群团组织桥梁作用，联合工会、共青团、妇联和关工委等群团、社会组织，针对不同群体特点，开展系列活动促进来穗人员精神文化融合。

一是科普研学之旅。大力开展科普文化研学系列服务 8 场，链接社会慈善资源，组织来穗人员亲子家庭参观广州本地博物馆、历史文化遗迹。在专业讲解与互动体验中，让 400 多户来穗人员亲子家庭深入了解广州的历史变迁、文化底蕴，增进他们对这座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二是领略非遗瑰宝。联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高校非遗团队共同开展广府特色非遗主题系列服务，包含醒狮、英歌舞、龙舟文化等极具岭南特色的非遗主题体验活动，丰富来穗人员亲子家庭的精神文化世界，激发其学习、传承非遗的兴趣。

三是志愿精神传播。开展“来穗志愿故事征集”“真人图书馆·好人故事我来讲”“骑手先锋”推广活动，打造“圆梦天河”志愿服务平台，鼓励来穗人员分享志愿服务经历与感悟，通过故事征集、征文、亲子演讲、手抄报等形式，记录并传播来穗人员及家庭的志愿精神与奉献故事，激发来穗人员社会责任感，提升自我价值感、成就感和满足感，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

四是公益夏令营融合。今年暑假，以“托管夏令营 + 文化夏令营”为载体，为来穗儿童搭建起融入城市、成长发展的多元平台，让这个暑假充满温情与活力。在“穗月同欢·童享一夏”公益夏令营中，示范中心联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百千万工程”突击队——云述义教队、晴耕知行实践团，采取“社工 + 志愿者”服务模式为天河区来穗务工人员子女包括“小候鸟”在内的共 450 人次开展持续 15 天 135 课时的托管公益夏令营，夏令营开设红色教育、体育拓展、安全教育、心理教育及科学探索等主题课程，涵盖课程体验、学业辅导、社交技能培养及生活自理能力训练。儿童可在示范中心统一就餐、午休，确保全天候托管无缝衔接，让家长安心投入工作。在“志愿童行”文化艺术公益夏令营中，支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志愿者总队在广东省文化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五大文化场馆开展非遗手作、科学探索、艺术体验等跨度 24 天的多元化体验活动。示范中心组织 20 组“小候鸟”家庭等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参与其中，并链接广州联通企业开展趣味 AI 科普体验作为结营活动。

天河区来穗人员服务示范中心通过协同治理模式，在来穗人员的工作、生活、社会治理参与和精神文化融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未来，应继续深化协同治理机制，不断创新服务方式，为来穗人员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让他们在天河区这片热土上更好地安居乐业，共同创造美好未来。

（作者单位：广州市大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增能理论视角下院舍式成年残障人士的社会工作介入与反思
——以广州市社会福利院为例

程　玲

广州市社会福利院是隶属于广州市民政局的公益性福利机构，秉承着“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的服务宗旨，整合养育、医疗、教育、康复、社会工作、护理和科研等专业资源，为院内收养人员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服务。在院的收养人员在年满 18 岁前会由院内跨专业服务团队（社工、老师、康复师、医生、护理员等）进行综合评估，对未能顺利进入社会安置的服务对象将安排在院内进行集中供养，这些服务对象大部分伴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其中中重度智力残疾居多。

福利院作为院舍式服务机构，相较于家庭养育的环境，院舍环境较为封闭，长期的集体生活方式导致院内残障人士依赖性强、自主能力受限，社会适应能力差。在社会的刻板印象中，残障人士普遍被贴上弱势和负面的标签，增能理论尊重人的价值，认为人有能力增强自己的权利和能力，强调以优势视角重构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鼓励服务对象从接受服务者变为积极参与者，社工的角色则从一个服务提供者成为同行者。基于此，社工运用增能理论，从以下“三个加强”维度开展服务，增强残障人士的权能。

加强能力提升，挖掘服务对象优势

增能理论强调，每个人都有不可或缺的权能，社工应该多鼓励残障人士与社会环境积极互动，以促进其内在潜能的发挥。对于福利院的残障人士，社工应在有限的环境中积极创造条件，让其参与活动，并与周边环境互动。社工通过评估深入了解院内残障人士的需求、兴趣和能力，搭建互动学习平台，开展不同类型的小组活动，加强残障人士之间、残障人士与社工之间、残障人士和院内环境之间的沟通合作。

一是开展认知训练，围绕身体认知、自我照顾认知、情绪认知、环境认知等主题开展小组服务，提升残障人士的自我认知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及社会适应能力。

二是开展多元主题社团活动，通过绘画手工、运动体能训练、绘本阅读等方式，锻炼残障人士的手眼协调能力、身体感知能力，并通过小组内部的互动分享，提升沟通能力和合作意识。

三是开展手工技能学习活动，通过系统学习手工艺品制作、电子商务、运营管理等知识，培养残障人士的职业技能，为其实现社会价值、融入社会奠定基础。

加强院舍参与，推动服务对象充权

在增能视角下，社工将残障人士视为有能力、有思想、有价值的人，要给予其充分尊重，以降低其对自我无力感的评价。为了增强福利院内残障人士的参与感和存在感，社工积极搭建参与平台，促进残障人士多表达、多表现、多帮忙，推动他们积极参与院内事务。

一是参与特困人员管委会。根据特困人员的认定标准，院内大多数残障人士都被纳入特困人员范畴，为做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院内成立由特困人员占半数以上的特困人员管委会，这些特困人员代表多为智力正常的肢体残障人士，管委会每季度通过调研、座谈的方式召开会议，广泛收集特困人员代表在衣食住行、医疗、康复、教育等方面的意见建议，提升服务对象在院舍管理中的话语权。

二是文艺表演展示。在社工组织的各类联欢会上，精心挖掘和培养残障人士担任节目主持人，或者上台参与表演，鼓励其勇敢展现自己。这一过程他们往往会经历从否定自己到发现自己（下转 12 页）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介入”：社区心理服务的模式转型
——以港湾心理茶馆实践为案例

韦志中 周治琼 李华丽 余晓洁

一、社区心理服务的当代价值

当前社会转型加速，生活节奏加快，职业压力、家庭关系等问题显现，大量居民面临心理适应挑战。心理健康服务作为社会支持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直接影响民众的生活品质与主观幸福感。传统心理辅导依赖“被动接受”模式，需要个体先意识到自身问题再寻求帮助。此类模式存在明显缺陷：弱势人群缺乏对心理健康问题的科学认知，以及支付心理咨询费用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受传统观念影响，不少人仍对心理问题存在偏见，不愿公开承认和求助。

社区心理服务作为新兴模式，将专业服务下沉至基层社区，变“被动等候”为积极发现、及早介

（上接 11 页）再到认可自己的心理转变。

三是班区小助理实践。鉴于院内残障人士众多、工作人员相对紧张的情况，在院内积极发掘中轻度智力障碍的服务对象担任小助理，通过培训，协助工作人员开展工作，在实践中提升服务对象的个人能力和自我价值，同时减轻工作人员压力。例如在社工活动上配备活动小助理，协助社工活动开展，在养育班区推行家政小助理，协助环境卫生清洁等工作；在康复中心安排康复小助理，协助接送肢体残障人士进行康复训练等。

加强资源链接，促进残障人士融合

残健共融始终是残障人士服务工作坚定不移的主题，在增能视角下，加强资源链接，促进社会融合是提升院舍式残障人士社会参与度与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福利院作为集中供养机构，院内资源和环境相对封闭，社工深刻认识到资源整合的重要性，积极链接企业、高校、社区等资源，构建残健共融资源生态圈，积极整合资源，搭建院内残障人士和社会的沟通桥梁，打破院社边界。

一是搭建手工作品产销平台，将院内残障人士制作完成的精美手工作品，包括点钻画、香薰蜡烛、刺绣香包等，通过电商平台、慈善超市和义卖场合进行展示及售卖，不仅让院内残障人士实现自我价值，也让更多的社会人士看到残障人士的能力。

二是邀请爱心企业、高校学生等进院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通过游园活动、美食制作、手工创作等方式，加强社会人士和残障人士的沟通，增进彼此了解。

三是院企合作组织残障人士外出参观活动，实地感受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例如组织漫步广州活动，感受广州这座城市的魅力，增强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组织参观文化馆、博物馆，让他们进一步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这些外出活动，不仅拓宽服务对象的视野，更让他们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增强他们融入社会的信心和勇气。

对于无法进行社会安置的残障人士，福利院的围墙不应成为隔绝认知和社会的物理屏障，他们可以继续探索世界、享受生活，感知当下、憧憬未来。从事残障人士服务工作的社工，通过提升残障人士的感知力、认知力和生活技能，搭建他们与社会沟通的桥梁，让他们更好地感受这个世界，这是社工的职责所在，也是对个体生命尊严的守护。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会福利院）

入，拓宽了服务覆盖范围与可及性。广州市南沙区港湾街道“心港湾—心理茶馆”项目具有代表性，通过构建多层次、综合性的心理支持体系，使专业服务走进普通居民生活，特别关注老年人、困难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需求。这一实践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呈现出集体主义文化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功能。

二、港湾心理茶馆：社区心理服务的创新实践

（一）组织架构：多元协作的支持网络

港湾心理茶馆的稳健发展，依托于多元协作型组织架构的支撑。在港湾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的统筹规划中，项目搭建起以专业心理工作者为核心、社区工作人员为联结、志愿服务人员为补充的三级服务网络，保障服务能覆盖社区每一个层面。

具体来看，核心团队由 15 名心理学专家组成，主要负责专业督导工作与复杂个案的处置；75 名心理联络员覆盖各社区，成员涵盖教师、社会工作者、村干部及网格管理员等群体。这些联络员的职责是识别并引导有帮扶需求的居民，在居民与专业资源间搭建起沟通桥梁。这样的架构设计充分盘活社区内部资源，最终形成专业力量与半专业力量互补的服务体系。

（二）服务方式：由“被动接受”至“主动介入”

该茶馆最突出的创新之处是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介入”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心理联络员机制。联络员深入社区基层，主动识别并引导有需要的人群。他们来自社区，熟悉当地环境，能及时察觉居民的潜在心理需求，这对缺乏求助意识与能力的群体尤为重要。

推行外向扩展服务。专家走进社区、校园、企业，开展丰富的活动。如举办“心减压，为心赋能”团体活动，运用二十四节气心理疗法，协助居民在安全环境中分享体验、释放压力。

创新服务形式。提供“定时定点”“上门面对面”及“在线一对一”三种模式，确保服务支持全时段、零距离。上门服务极大帮助了行动不便的居民，并消除了青少年群体的获取障碍。

（三）实施效果：弱势群体受益的具体呈现

该模式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心理需求，成效显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针对老年群体，通过“长者倾听计划”提供专门心理疏导。针对独居、高龄老人面临的孤独、功能衰退、疾病等问题，通过上门服务、团体活动等形式，协助老年人适应晚年生活，保持积极心态。

针对困境儿童及青少年，创新开发“阳光少年行动”计划，与学校合作建立家校社协同机制，定期开展心理筛查与家长课堂。例如，针对一名因学业压力休学的青少年，咨询师通过多日电话沟通安抚与上门交流，缓解家属焦虑，指导沟通方法，最终帮助学生返校。

针对家庭关系紧张的居民，提供专业干预。如社区网格员发现居民刘某家庭因孩子多动症导致关系紧张后，咨询师通过谈心与游戏治疗等手段，打开孩子内心，为夫妻提供情绪疏导与沟通指导，改善了家庭关系。

三、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持功能：集体主义在心理服务中的呈现

（一）政策与资源整合：体制优势的全面发挥

该模式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集体主义支持功能。依托政府主导、多方参与，整合各类资源，为弱势群体构筑心理安全网。

政策层面，街道公共服务办高度重视，提供坚实政策支持与组织保障。政府主导确保服务公益属性与可持续性，使资源流向最需要的人群。与市场化服务相比，避免了心理服务成为高收入群体的“奢侈品”，真正实现普惠。

资源整合方面，采用“一中心引领、两热线联通、多站点覆盖”的框架，整合医疗卫生机构、社区服务中心、学校等，形成全域服务网络。此方式防止了重复建设与浪费，提升了服务效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二）社会支持网络建设：集体互助的现代实践

该模式注重社会支持网络建设，体现集体主义理念。不仅提供专业服务，还营造社区互助氛围，使居民在集体中获得支持。

例如，“二十四节气心理疗愈”项目聚焦困难家庭、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等七类群体，提供精准关爱服务。此类项目既针对个体心理问题，又构建群体间支持网络，使弱势群体获得归属感。

此外，团体活动形式如“石头的故事”“生命中的贵人”等，创造安全、包容的环境，让居民分享经历与压力，通过集体智慧相互支持寻找解决途径。此模式超越个人主义辅导取向，强调个体在集体中成长，体现集体主义文化价值。

（三）公平性与可及性：心理服务普惠保证

社会主义制度下心理服务强调公平性与可及

性，确保每个人获得恰当的支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地理位置便利性：位于社区卫生服务站二楼，居民前往非常方便。选址考虑居民的就近需求，避免专业机构位于市中心带来的交通不便。

经济可及性：作为政府支持的公益项目，服务完全免费，消除经济障碍。对弱势群体而言，经济因素常是重要阻碍，公益性质确保获取途径的畅通。

文化适应性：使用居民熟悉的语言与文化概念，避免过度专业化。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居民易接受的内容和形式，是服务成功的关键。“心理茶馆”名称具有中国文化特色，降低心理服务门槛。

四、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案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心理茶馆社区心理服务模式，让心理服务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介入”转型，显著提高可及性与普惠性，有利于弱势群体获得支持，减少因经济、认知、偏见等因素造成的障碍。

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特性与集体主义优势，通过资源统筹整合及社会支持网络搭建，为弱势群体筑牢心理安全屏障，这一实践既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心理健康领域的探索突破，也为基层心理服务创新提供了方向指引。

在应对特殊场景挑战及伦理问题时，需构建专业培训、监督管理及伦理支撑体系，涵盖服务流程规范与伦理决策指导，以保障服务质量与操作规范性。其中，保密准则、能力范畴及文化适配性，是实践中需重点关注的核心议题，直接关系服务的公信力与居民接纳度。

（二）推广建议与发展方向

基于经验分析，提出以下建议：其一，构建多层次、无死角的服务体系。参照“一中心主导、两热线联动、多站点辐射”的架构，打造专业力量牵头、半专业力量衔接的服务网络，确保覆盖各类有需求的群体，无论是独居老人、困境儿童，还是职场人群，均能获取适配的心理支持。

其二，强化专业培训力度与伦理监管效能。常态化开展培训活动，内容既包括心理干预技巧，也涵盖伦理风险应对知识，助力服务者提升专业素养与伦理认知水平；同时搭建高效监督体系，对非专业背景的服务人员，需明确划定能力范围及转介流程，避免因能力不足引发服务风险。

其三，重视文化适配性与本土化推进。全面考量属地文化特质与居民实际需求，杜绝生硬套用西方服务模式。例如，采用“心理茶馆”“节气疗愈”这类蕴含中国文化丰富内涵的名称及形式，弱化民众对“心理服务”的陌生感与心理顾虑，切实提升服务接纳度。

（三）未来展望

随着社会对心理健康重视程度提高，社区服务面临广阔机遇。技术革新为服务提供新路径。依托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平台，可借助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渠道推出“菜单化”服务，居民可自主选择情绪测评、线上咨询、心理课程等内容，再结合线下工作坊、入户帮扶，形成 “线上便捷触达 + 线下深度干预” 的模式，既能拓宽服务覆盖广度，也能提升服务响应效率。

政策扶持为服务发展提供更强支撑。当前心理健康已逐步纳入公共卫生关注范畴，未来各级政府或将加大资源投入与政策扶持力度，推动社区心理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从资金、场地、人才等多方面为服务落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学科体系完善为服务提供理论支撑。目前已有专业人才培育项目聚焦咨询与治疗领域的道德规范，后续或将有更多研究围绕社区心理服务的理论构建、模式优化展开，为实践提供更系统的学科指导，助力服务从“经验探索”向“科学规范” 升级。

综上所述，社区心理服务模式作为一项关键创新实践，既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发挥集体主义的支持作用，更为构建中国特色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方向。经过持续探索与优化，这一模式有望为更多民众提供便捷、高效且专业的心理帮扶，进而推动全社会心理健康水平实现整体提升，为社会和谐稳定筑牢心理基础。

（作者：韦志中，广州市一苇渡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周治琼，广州市治心心理咨询工作室；李华丽，广州市心丝带心理志愿者协会；余晓洁，惠州市心协心理健康文化有限公司）

一例青少年抑郁与社交焦虑问题的综合干预案例研究

——以港湾街道心理茶馆的来访者为例

迦　铎　李华丽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身心巨变、学业压力及同伴关系重构等多重挑战，极易出现各类心理问题。其中，抑郁与社交焦虑是青少年群体中最为普遍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二者常共病出现，相互加剧，严重影响个体的社会功能与学业发展。研究表明，不良的家庭互动模式与校园经历（如欺凌）是引发和加剧上述问题的重要风险因素。

一、案例背景与问题分析

（一）来访者基本信息

小曦，女性，15 岁，某市初中三年级学生。因情绪问题于初一下学期开始间断性就医，曾被诊断为抑郁状态，有过两次住院治疗史，但因自觉效果不佳及药物副作用自行停药两月余。来访者曾有两次自杀未遂史，目前处于休学状态。主要临床表现为情绪持续低落、兴趣减退、焦躁易怒、拒绝外出、社交功能严重受损。

（二）主诉与问题分析

来访者主诉：“感觉没有人理解自己，害怕去学校，不敢出门，经常想哭，有时觉得活着没意思。”通过对初始访谈资料的整合，将其问题归纳如下。

情绪问题：核心表现为抑郁与焦虑。情绪极不稳定，缺乏安全感，伴有明显的无价值感和绝望感。自行停药行为加剧了情绪的波动。

社交问题：核心问题为社交恐惧与功能缺失。直接诱因为长期、反复遭受校园欺凌的经历，导致其对人际交往产生极度不信任感和恐惧感，出现回避所有社交场景的行为（包括上学）。

家庭问题：亲子关系质量差。父母对其心理问题认识不足，沟通方式简单粗暴，常伴有指责与打骂，使得家庭本应提供的支持功能失效，甚至成为新的压力源。

（三）初步评估与诊断

根据 DSM–5 诊断标准，小曦表现出重度抑郁障碍和社交焦虑障碍的典型症状。

二、咨询目标与干预方案

总目标：缓解抑郁与焦虑症状，改善亲子关系，重建社交信心，最终协助其恢复正常的学习与社会生活。

基于上述评估，与来访者及其父母共同商定以下分阶段咨询目标与计划：

（一）第一阶段（第 1~2 次咨询）：建立安全与信任的咨询关系

目标：通过共情、无条件积极关注和以来访者的兴趣（二次元、游戏）为话题，建立稳固的咨询联盟，完成危机评估与干预（确保自杀风险可控），并引导其恢复规律服药。

（二）第二阶段（第 3~4 次咨询）：改善认知与家庭支持系统

目标：挑战并调整其关于自我、他人和世界的负面核心信念（如“我一无是处”“所有人都会伤害我”）；重构其对父母行为的认知，启动亲子沟通改善程序。

（三）第三阶段（第 5 次咨询及后续）：社交技能训练与暴露疗法

目标：在情绪基本稳定的基础上，针对性地进行社交技能训练，并通过渐进式的暴露练习（如先从下楼买东西开始），帮助其逐步重返社交场景。

三、咨询过程与效果详述

（一）第一阶段：信任建立与情绪稳定（第 1~2 次咨询）

第一次咨询（2024.11.17）：咨询师并未直接探

讨其负面经历，而是从其酷爱的动漫和游戏切入。小曦在谈到这些话题时，语速加快，表现出难得的积极情绪。咨询师通过这种“投其所好”的方式，迅速降低了她的心理防御。她开始愿意透露一些内心的孤独感和被误解的痛苦。此次咨询初步建立了工作联盟，并评估其当前自杀风险为中等但可控，与她达成了安全协议。

效果：信任关系初步建立，来访者表示“第一次有人愿意听我说这些”，并同意考虑恢复服药。

第二次咨询（2024.11.25）：在信任关系初步建立的基础上,咨询师开始引导她关注自身的积极资源。例如，通过提问：“在那么难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支撑你走到今天？”引导她发现自己坚韧的一面。同时，运用认知技术，改变她“父母完全不关心我”的念头，引导她回忆哪怕微小的曾被父母关怀的瞬间。

效果：小曦整体状态更放松，能列举出自己“有耐心”“画画好”等优点。消极认知开始松动，当晚在咨询师建议下同意恢复服药。

（二）第二阶段：认知重构与家庭互动改善（第3~4 次咨询）

第三次咨询（2024.12.2）：重点引导小曦发现身边的支持系统。她主动谈到一个网上的朋友每天会问候她，以及奶奶偷偷给她塞零花钱。更重要的进展是，她主动分享了为了毕业而回校参加考试的经历，虽然极度紧张但最终完成。咨询师抓住这一点，大力强化其“能够应对挑战”的自我效能感。

效果：焦虑情绪好转，成功完成考试极大地提升了她的信心。她开始客观讨论与父母的关系，承认母亲近期骂她的次数减少，但仍心存恐惧。

第四次咨询（2024.12.9）：本次咨询出现了重大转折。小曦分享：母亲在一次争吵后首次向她说了“对不起”。咨询师借此机会，与小曦和母亲进行了简短的家庭会谈，教育母亲理解女儿病症的表现非道德问题，并教导非暴力沟通的技巧。同时，引导小曦看到班上并非所有人都是欺凌者，也有同学曾表示欣赏她的画作。

效果：情绪显著放松。母亲的一句道歉成为修复亲子关系的关键节点，极大地满足了小曦被理解和尊重的渴望，她的安全感大幅提升。

（三）第三阶段：社交信心重建与行为激活（第5 次咨询）

第五次咨询（2024.12.16）：小曦状态明显改善，主动报告自己可以“自然地下楼去便利店买东西”，并能与店员进行简单的对话。再次回校考试已不再像上次那样恐慌。咨询师通过角色扮演，与她演练如何应对可能遇到的陌生同学及如何简单回应。咨询的重点从“处理问题”转向“构建能力”。

效果：情绪趋于稳定，焦虑水平显著下降。对校园欺凌的认知更为客观，认为“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不好”。内在动力和积极性增强，开始规划未来的生活。

四、讨论与创新性分析

本案例的成功源于一套综合性、系统化的干预策略，其创新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分阶段系统性干预：严格遵守“关系—认知/家庭—行为”的递进顺序，确保了干预的基础稳固、层层推进，避免了在信任不足或来访者情绪极不稳定时强行进行社交暴露可能带来的二次伤害。

兴趣导向的共情切入：突破传统咨询模式，以“二次元”和“游戏”作为建立关系的“密码”，高效地突破了青少年来访者的心理防御，体现了文化胜任力在咨询中的重要性。

家庭系统的精准干预：不仅关注个体，更将家庭视为一个需要改变的系统。抓住“母亲道歉”这一关键事件进行放大和强化，有效地扭转了家庭动力，为来访者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持续情感支持。

渐进式暴露与成功体验积累：社交功能的恢复非一蹴而就。从“下楼买东西”到“回校考试”，咨询师精心设计“行为实验”，确保其每一步都能获得成功体验，逐步积累自我效能感，重塑社交信心。

五、总结与建议

本案例通过为期两个月的五次咨询，显著改善了一名重度抑郁伴社交焦虑的青少年的情绪状态、家庭关系和社交功能。证明了对青少年复杂心理问题进行多系统、分阶段、个性化干预的有效性。

持续跟进：小曦的恢复仍需长期巩固。建议定期进行维持性咨询，预防复发，尤其需关注升学或新环境可能带来的压力。

深化家庭干预：建议为其父母提供持续的家庭教育指导，固化积极沟通模式，彻底改变不当教养方式。

学校系统合作：咨询师需与学校心理老师及班主任保持沟通，协助小曦平稳返校，并在班级内营造包容友好的氛围，杜绝欺凌事件再次发生。

培养长远优势：鼓励小曦将兴趣（如绘画）发展为特长，参与相关社团活动，从而（下转 17 页）

学生资助精准化水平提升的思考与研究

林木操

摘要：近年来，教育公平问题备受关注，帮助困难学生成为教育部门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如何把资助金精准送到真正需要的学生手中，成为各地政府和学校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采用问卷方式并结合工作实际，分析当前学生资助工作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精准化资助的必要性和意义，并提出应对之策，即从政策宣传、申请流程、资助标准、资金发放、工作透明度等方面入手，通过构建智慧资助体系、完善资助政策、优化申请流程、提高资金发放效率、加强监督与反馈机制，提升学生资助的精准化水平，让资助资源切实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促进教育公平和学生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高职院校；资助；教育公平；精准化；经济困难

学生资助工作是保障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民生工程。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资助政策宣传不到位、申请流程烦琐、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程序不完善等问题，影响了资助工作的精准性。因此，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水平，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生资助工作的重点任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高职院校的约 1000 名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问卷内容涵盖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资助需求、资助满意度等方面。调查结果显示，约 40% 的学生在校期间获得过资助。其中约有 7% 的学生表示因无法提供足够的材料未能通过家庭困难认定。在对资助政策的了解程度方面，表示了解非常清晰的学生占 15%，比较清晰的占 25%，一般的占 40%，不够清晰的占 15%，完全不了解的占 5%。在对学校资助工作的满意度调查中，10% 的被调查学生非常满意，35% 的学生表示满意，40% 的学生表示一般，10% 的学生表示不满意，5% 的学生非常不满意。在希望获得何种资助类型的调查中，约有 72% 的学生希望获得资金资助，8% 的学生希望获得物资资助，11% 的学生希望获得勤工俭学的机会，其他的还包括技能培训和心理资助等。值得注意的是，约 40% 的学生认为当前资助政策存在不公平现象，主要原因是资助对象识别不准确和申请困难认定方式不科学。在对资助工作存在的问题调查中，资助资金发放不及时、困难认定过程不公正、困难认定方式不合理、申请流程烦琐等都有大部分学生提及[1]。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当前资助工作现状，并结合问卷分析的结果和学生资助工作的现状，进而提出学生资助精准化水平提升的措施。

一、学生资助工作的现状

第一是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学生资助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高职院校中构建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勤工助学和“绿色通道”等多元化的高校资助政策体系。

第二是资助覆盖面扩大和资助标准逐步提高。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财政投入的加大，学生资助的覆盖面扩大，资助标准逐步提高。各项学生资助工作持续深化，各学段资助规模呈稳步增长态势。同时，国家还不断调整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提高贷款额度，减轻学生还款压力，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第三是资助工作效果提升。经过多年努力，学生资助工作惠及许多真正需要的学生。一方面，困难家庭孩子得以安心上学，真正实现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实现了教育公平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受助

（上接 16 页）获得持久的成就感与归属感，构建积极的自我认同。

（作者：迦铎，广州市一苇渡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华丽，广州市心丝带心理志愿者协会）

学生不仅完成了学业，很多人还积极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

二、学生资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是资助政策宣传存在“信息差”。国家出台了不少好政策，但很多家长和学生还是不清楚具体怎么申请。有些偏远地区主要靠村干部口头传达，容易遗漏重要信息。这说明资助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宣传渠道不畅通，导致政策信息无法及时有效地传达到需要的学生和家长。

第二是资助申请手续复杂。当前，学生资助的申请流程相对复杂，填表格、开证明、盖章……一套流程下来要折腾好几天，有些家长因为不会操作电脑，或者材料准备不全，最后干脆放弃申请。此外，复杂的申请流程还可能滋生腐败和寻租行为，影响资助工作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第三是困难认定标准不统一。同样的家庭情况，在不同学校可能得到不同的困难认定等级，让一些学生感觉不公平。主要原因是困难认定标准的制定和执行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导致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

第四是资助金到账时间不及时。从困难认定通过到申请资助金到账常常要等一个多月甚至更长时间，不少经济困难的学生只能省吃俭用。资金审批步骤多，流程复杂是主要原因。这可能给困难学生带来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甚至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

第五是困难认定过程不够公开透明。有一些学生反映，交完申请材料就只能等待结果，查不到申请进度，也不知道为什么没通过，缺乏透明性和必要的监督，这对资助工作的公正性和有效性造成不良影响。

三、精准化资助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是精准化资助有助于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而精准化资助则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就像精准扶贫要找准对象，教育资助也要精确到人。这样才能真正帮助需要帮助的学生。

二是精准化资助有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精准化资助不仅解决学生的经济困难，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除了给钱，更要培养能力。组织受助学生参加勤工俭学、社区服务，在解决其经济困难的同时提升实践能力。

三是精准化资助有助于促进社会良性循环。及时帮助困难学生，既能缓解其家庭压力，又能防止贫困代际传递。这些学生成长后回馈社会，形成正向循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此外，精准化资助还可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帮助贫困家庭摆脱贫困，实现学生成长成才的目标。

四、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水平的建议

第一是建立智能自助系统。建立智能资助系统可以极大地提升困难学生的精准化资助水平。通过政府部门和学校的信息数据互通以及现代大数据信息技术手段，自动比对困难学生信息（低保家庭、残疾证明等），可以省去学生申请资助时需提供困难佐证材料的麻烦。同时，可以实现资助政策的智能匹配和资金发放的自动化处理，提高资助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要把学生资助工作做扎实，需要下点细功夫。除了给学生建立个人纸质档案外，也要与时俱进，依靠现代信息化技术把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学习成绩、社会实践等信息都录入系统，建立困难学生的信息数据库。有了这个数据库，智能资助系统就能像查字典一样精准找到需要帮助的学生，分类管理起来也方便。再给学生家长开放一些简单易用的功能模块，如开通进度查询功能，像查快递一样查补助金到哪里了，资助申请到哪一步了，谁负责审批的，这样可以提高资助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再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统计哪些地方的困难学生多，特别困难学生有哪些特点等，能够提醒老师留心关注。定期还要对资助效果进行数据评估，追踪资金的使用效果及资助政策是否需优化调整。这种动态调整就像裁缝量体裁衣，让资助工作更贴心、更高效。

第二是政策要更“人性化”。资助政策以生为本是提升学生资助精准性的基础保障。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资助标准和政策体系，可以让资助资源真正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首先要制定清晰易懂的补助标准。要依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制定清晰易懂和透明的困难认定标准和范围。并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异和特点，制定差异化的资助政策，确保资助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其次是要设立多种帮扶方式。根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不同需求和特点，设立多种帮扶方式。例如，成绩好的困难学生可以发奖学金，家庭困难的可以提供餐费补贴，政府部门可以设立助学贷款，学校可以提供勤工俭学岗位等。再次要让政策更加通俗易懂。通过校园网站、微信公众号、宣传栏等多种渠道，加强对资助政策的宣传和解读。通过制作短视频、图解手册、方言宣传等方式，提高家长和学生对资助政策的认知度和满意度。学生资助宣传是做好资助育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资助宣传的辐射力，可以营造良好的资助氛围[2]。

第三是简化申请手续。简化申请流程是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水平的关键环节。通过简化申请手续和减少证明材料等方式，可以降低家长和学生的时间成本，提高申请效率和满意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步骤进行简化。第一步简化申请表格和材料要求，根据实际需要和申请流程的特点，把一些重复的信息填写和重复的证明材料进行精简，例如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证明文件

和盖章环节，降低申请门槛和难度[3]。还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申请材料的电子化提交和审核处理。第二步建立线上申请平台，方便家长随时随地进行申请和查询进度，平台可以实现申请材料的在线提交、审核审批的实时跟踪等功能，提高申请效率和透明度，如开通手机端申请、支持拍照上传证件等功能。第三步提供申请指导和咨询服务。通过在学校设立帮办窗口，专人指导填写表格等方式，提供申请指导和咨询服务。还可以组织志愿者或老师为家长和学生提供现场指导和帮助，方便他们顺利完成申请过程。

第四是资助金发放要及时。资助金及时发放到困难学生手上是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水平的重要保障。科学化精简困难认定的申请步骤和资助金申请的审批流程等环节，可以让资助资金及时发放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手中。根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以及资助政策的要求，加强预算管理，建立健全资金监管机制，确保资金的安全和合规使用。例如可以实行网上审核和审批制度，减少纸质材料的流转和审批环节，还可以建立快速审核通道和绿色通道等制度，为急需资助的学生提供优先审核和审批服务。如建立应急通道，实行特困生申请 3 个工作日内可先领取临时补助等措施。还要加强对资金发放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力度，每学期开展资金使用检查，防止拖延挪用，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五是加强监督、建立反馈机制。加强监督、建立反馈机制是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水平的重要保障，全程阳光操作，能够确保资助政策公平、透明地执行，并及时发现问题、优化流程。反馈评价机制的建立有利于评估资助育人成效，为后续精准育人工作的改进提供有效依据[4]。具体操作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一是构建多层次监督体系。学校层面成立校级监督小组，由学校纪委、审计处、学生处联合成立专项监督小组，定期核查资助评审流程、资金发放记录和资格认定材料。院系层面进行院系自查，要求各院系成立资助工作小组，辅导员、班主任、学生代表共同参与，对申请材料进行交叉审核。班级层面，要求成立班级评审小组，所有的资助申请材料都要严格把关，结果在班级公示，接受班级同学监督。最后公开透明机制，将资助名单、金额等信息通过学校官网或公示栏公开（隐去敏感信息），接受师生和社会监督。

二是畅通反馈渠道。通过线上和线下渠道，如开通匿名举报邮箱、微信小程序或 App 反馈模块等，保护学生隐私；要设立“资助意见箱”专栏，定期收集学生对资助政策的建议；要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邀请普通学生、受助学生代表参与，听取意见。对问题快速响应与处置，如一般性问题（如材料提交疑问）由院系资助工作小组 24 小时内回应，争议性问题（如资格认定不公）提交校级监督小组复核，7 个工作日内反馈结果；设立监督热线，专人处理投诉。

三是建立投诉保护机制。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严禁打击报复，确保学生敢于发声反映问题。

四是持续改进资助工作。每学期结束后都要出一份资助工作总结报告，详细阐述发现的问题、处理情况和优化措施等。还要建立案例警示制度，对查实的造假行为（比如虚报材料）公开处理结果，让大家都知道违规的后果。

五是要完善配套支持措施。定期组织负责资助工作的老师参加政策培训和廉政教育，既要让他们熟悉规则，也要增强责任心。同时引入智能分析系统，精准识别困难学生（比如及时发现有突发严重经济困难或心理问题的学生），确保每个需要帮助的学生都能得到关注。精准识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首先应当明确参与认定的各个主体的权责关系，逐步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着力形成国家宏观指导、地方政府微观实施和高校具体实施的科学工作格局[5]。

总之，要让资助帮扶更精准到位，关键要做好以下工作：首先得建立智能的资助管理平台，把政策条款逐条落到实处；其次要优化申请审批流程，让学生办事少跑腿；再次要加快补助金发放速度，确保困难学生及时获得支持；同时还要做好全程监督和意见收集，及时改进工作。学生资助不是一次性的任务，而是需要持续投入和关注的长期工作，要让每个需要帮助的学生都能准确及时地得到资助，政府、社会、学校和老师都应该参与其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 蒋敏，丁云 . 精准资助视角下高校资助宣传路径探析 [J]. 四川劳动保障，2023(11): 85−87.

[2] 陈斌 . 关怀理论视角下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4SG 工作法”的实践研究：以扬州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资助为例 [J]. 中国食品工业，2023(23): 106−109, 113.

[3] 白华 . 从二元组合到三维一体——高校贫困生认定的新视角 [J]. 社会科学家，2012(07): 117.

[4] 陈金石 . 高职院校资助育人精准化路径探索 [J]. 社会与公益，2025(02): 53−56.

[5] 高强 . 发展型资助育人视域下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综合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J]. 人生与伴侣，2025(03): 50−5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汕尾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学生资助精准化水平提升的思考与研究”（2024XJXM024）。

（作者单位：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家校社协同育人视角下社会公益资源促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探索

汤　迪

摘要：本文围绕家校社协同育人，深入探讨社会公益资源如何有效推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文章先分析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现状，指出存在资源分配不均衡、合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接着说明社会公益资源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包括补充学校教育资源、强化社区支持体系、推动家庭参与等方面。基于此，提出建立合作机制、整合与共享资源、提供专业服务与技术支持等具体途径，最后给出分阶段实施、多层次培训、多元化宣传等策略，以及政策法规、资金投入、监督评估等保障举措，以构建和谐教育环境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关键词：家校社协同育人；社会公益资源；心理健康教育

在当下社会环境中，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已经成为教育领域以及整个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随着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社会竞争程度也日益加剧，这使得孩子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诸多挑战。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着重强调家庭、学校以及社会之间的紧密协作配合，共同为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社会公益资源作为一股关键的力量，对于推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本文主要剖析如何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相关情境下，有效地运用这些公益资源，推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的保障，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一、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现状

（一）理论基础

1. 家校合作理论概述

家校合作，这一教育理念与实践模式，着重突出家庭与学校间的紧密关联以及共同肩负的责任，其根本概念是，家庭和学校作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两大关键环境，理应彼此给予支持、相互配合，一同为孩子的全面成长营造有利环境。家校合作所遵循的原则囊括平等尊重、互惠互利以及责任共担等方面，通过双方的协同努力，推动孩子在学业上取得进步、保持身心健康并提升社会适应能力。家校合作的意义十分明显，它可以提高家庭教育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同时提高学校教育的有效性与实效性，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关键渠道[1]。

2.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着重指出个体发展会受到多层环境系统的作用，其中包括微观系统，如家庭、学校；中观系统，如社区；宏观系统，如文化、政策等，这些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建起个体的成长路径。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架构下，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持。它说明要推动孩子的全面发展，就需要留意并优化他们所处的多层环境系统，实现家庭、学校以及社会之间的协同与整合[2]。

（二）实践现状

1. 国内外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成功案例分析

近些年来，在国内外出现了不少家校社协同育人方面的成功案例，例如美国的“家长教师协会”，其通过举办各类活动，强化了家长和学校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共同关注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日本的“家校连携”制度，着重强调学校与家庭之间要进行信息共享以及共同作出决策，以此形成教育合力。在国内，部分地区也积极探寻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全新模式，如构建家校社共育中心、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等，收获了不错的成果，这些成功案例所共有的要素是：清晰明确的合作目标、完善健全的合作机制、行之有效的沟通渠道以及共同的责任意识。

2.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虽说家校社协同育人在实践当中取得了一些成效，然而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其中一个突出问题便是资源分配不均。鉴于地区以及学校之间存在差异，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资源投入和分配呈现出不均衡的状况，使得一些地区和学校无法充分利用社会公益资源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合作机制不完善同样是制约家校社协同育人效果的关键因素，当前家庭、学校以及社会之间的合作多数情况下缺少明确的责任分工与

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合作效率不高、效果欠佳的问题。另外，家长的教育观念、学校的开放程度以及社会的支持力度等也会对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施效果造成影响。

二、社会公益资源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与价值

（一）社会公益资源的定义与分类

社会公益资源作为一种温暖且有影响力的力量，正渐渐成为推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不可缺少的关键支持，究竟什么是社会公益资源？简单来说，它包括资金、物资、人力、技术、知识等多种形式，是社会各界为公益事业无偿提供的各类资源的统称，这些资源像潺潺细流汇聚成海洋一样，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提供了丰富养分[3]。

（二）作用分析

社会公益资源有很多作用，其中补充学校教育资源是极为直接的一种体现，当下不少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面临资源短缺难题，如专业师资匮乏以及教育设施不足等情况。社会公益资源的介入，如同一场及时雨，给这些学校提供了宝贵的支持，资金捐赠可用来改善教育设施，购置心理健康教育所需的书籍、器材等物品；物资援助可以保障教育活动顺利开展，比如提供心理辅导室的建设材料、心理测评工具等。并且公益组织可为学校引入专业心理咨询师，借助师资培训、教学指导等途径，提高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水平。

除了对学校教育资源给予补充外，社会公益资源在强化社区支持系统方面也有着关键作用，社区是青少年生活的关键环境，其心理健康支持网络是否完善，直接关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公益组织可依托社区，设立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心理咨询、心理辅导等服务；公益组织还可借助组织心理健康讲座、亲子活动等方式，提升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意识，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氛围。这样一来，社区便构建起一个强大的心理健康支持网络，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有力保障[4]。

（三）价值体现

社会公益资源在心理健康教育中所呈现出的价值体现在多方面，其推动了教育公平的实现。通过向资源匮乏的学校提供援助，公益资源切实保障了每一个孩子均可享受到优质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使得城乡以及区域之间的教育差距得以缩小。它强化了社会凝聚力，公益活动的开展推动社会各界人士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给予更多关注，营造出了全社会共同关心和支持心理健康教育的良好氛围；它提高了全民心理健康水平，通过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以及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等途径，公益资源帮助更多人知晓了心理健康的意义，提升了全民的心理健康素养[5]。

三、家校社协同育人视角下社会公益资源促进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设计

（一）构建多元合作机制，形成协同育人合力

1. 政府引导：政策护航，资金助力，监管保障

政府身为宏观调控者，要充分发挥其政策制定、资金支持以及监管评估等作用，建议政府将相关政策进行细化，明确家校社协同育人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为各方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建议政府设立专项基金，用以支持相关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并且构建监管评估机制，对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成效进行定期评估，确保资源得以合理运用，教育效果持续提高。

2. 学校主导：课程为基，师资为要，活动为载

学校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场所，需要承担起课程设计、师资培训以及活动组织等关键责任，学校应当强化师资培训工作，以此提升教师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能力与水平，在逐步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纳入课程体系的同时，还要组织开展多种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像心理讲座、心理剧以及心理拓展等，促使学生在实践中体验、感悟并实现成长。

3. 家庭参与：家长先行，家校联动，环境优化

家庭作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首个学习场所，家长则是孩子启蒙阶段的首位教育者，在心理健康教育领域，家庭所发挥的作用极为关键，学校需构建家校沟通体系，定期和家长就孩子心理状况进行交流、共同商讨教育策略，通过家长学校等渠道，提高家长的心理知识水平与心理素养。家长也应当对家庭环境加以优化，营造出和谐、温馨、民主的家庭氛围，以此为孩子心理健康成长提供坚实的支撑。

4. 社会支持：公益助力，企业捐赠，志愿同行

社会公益组织、企业以及志愿者都是心理健康教育领域的重要力量。公益组织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相关项目，为学校提供专业的支持与服务；企业可践行社会责任，通过捐赠资金或者物资的方式来帮助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志愿者可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当中，为孩子们送去关爱并给予陪伴。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并提供支持，会给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增添新的活力。

（二）整合与共享资源，打造心理健康教育新生态

1. 建立资源共享平台：信息互通，资源共融

学校若想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以及共享，就应当构建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共享平台。该平台可以是在线网站，也可以是实体机构，其作用在于汇集各方资源，进行信息交流、资源共享以及合作，借助此平台，学校可发布心理健康教育需求信息、寻求社会支持，公益组织与企业可发布项目信息、寻求合作伙伴，志愿者可报名参与活动，贡献自身力量。平台的构建会推动资源的有效流动以及合理配置。

2. 公益项目开发与实施：精准对接，特色发展

基于资源整合这一前提，学校需要积极开发并且实施面向心理健康教育的公益项目，这些项目要紧密结合学生实际需求以及心理特点来进行，有较强针对性与实效性，比如可开发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项目、心理咨询服务项目以及心理拓展训练项目等，项目实施要遵循科学、规范且专业的原则，以此保障教育效果最大化。

3. 跨界合作：教育 + 医疗 + 科技，共筑心理健康防线

心理健康教育属于跨学科范畴，其发展依赖教育、医疗以及科技等多个领域的融合协作，学校可与教育专家、心理医生、科技工作者构建合作关系，共同研发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产品、技术以及服务。例如，借助大数据技术可对学生心理状况进行监测与分析，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开展心理拓展训练，可提升学生心理素质与应对能力。

（三）提供专业服务与技术支持，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水平

1. 专业心理咨询服务：校内校外，全面覆盖

专业心理咨询服务属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键组成部分，学校应当引入专业心理咨询师，构建校内外咨询体系，以便为学生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咨询服务，校内咨询体系可设立心理咨询室或者心理咨询热线，让学生可随时便捷地寻求帮助，校外咨询体系可与专业心理咨询机构确立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更具专业性的服务。学校也应当强化对心理咨询师的培训与管理，提升其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

2. 心理健康教育技术应用：科技赋能，创新模式

随着科技的持续发展，心理健康教育技术同样处于不断更新升级的过程中，学校可借助“互联网 +”以及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来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所实现的效果与效率，比如可开发在线心理健康教育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针对学生的心理状况展开精准分析与预测，借助虚拟现实或者增强现实技术开展心理拓展训练或者心理治疗活动等。

3. 持续评估与反馈机制：以评促建，以评促改

学校要保障心理健康教育持续发展并不断改进，需构建心理健康教育效果评估体系，该体系覆盖学生心理状况评估、教育效果评估以及师资水平评估等多方面内容。借助评估，能及时知晓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与问题，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学校还可依据评估结果，适时调整教育策略与方法，以保证教育效果最大化。同时可建立反馈机制，鼓励师生及家长提出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心理健康教育持续改进与发展。

四、实施策略与保障措施

（一）实施策略

首先是分阶段推进的方式，在初期阶段选择有代表性的学校进行试点工作，以此来探索该项目的可行性；中期阶段，逐步扩大项目的覆盖范围，复制成功的经验；长期阶段，则要建立起长效机制，以此来保证项目稳定运行。其次是开展多层次培训，针对教师、家长以及志愿者开展专业培训，以此提升他们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与服务水平。最后是进行多元化宣传，借助媒体、社区、学校等多个渠道来进行宣传，提高社会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和支持力度。

（二）保障措施

首先，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明确各方责任与义务，以此为项目提供法律层面的支持；其次，需要构建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鼓励社会捐赠与企业赞助，保证项目资金充足；最后，应当建立第三方监督评估体系，定期对项目实施效果展开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改进。

五、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路径设计以及实施策略进行分析，本文清晰界定了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在协同育人中的角色与责任，以及资源整合和共享的意义。展望未来，要深入推进家校社合作机制，拓宽公益资源渠道，创新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并且强化政策引导以及资金支持，保障心理健康教育持续健康的发展。同时期望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共同为青少年营造更为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帮助他们茁壮成长，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

参考文献

[1] 侯怀银，宋美霞 . 家校社协同育人视角下社会教育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行动路径 [J]. 中国校外教育，2024(02): 34−44.

[2] 周小均，胡忠于 .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J]. 今日教育，2024(02): 45−47.

[3] 张道芬，胡玲 .“三全育人”视域下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纵横实践路径探究 [J]. 职业教育，2025, 24(11): 47−52.

[4] 李妮，韩笑 . 交叠影响域视角下家校社医协同推进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J]. 教育文汇，2024(05): 15−17, 42.

[5] 顾胜楠 .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家校社”协同育人路径探索 [J].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 (中旬刊), 2023(12): 196−199.

（作者单位：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安乐镇小学）

基于就业竞争力提升的勤工助学育人路径研究

梁　英 胡亚军 秦晓沅

摘要：勤工助学作为高校实践育人的关键组成部分，是连接理论与实践、校园与社会的桥梁。当前勤工助学岗位存在岗位差异大与评价体系单一、岗位流动性强和工作连贯性弱、过度重视结果而缺乏个性关注等问题。本研究通过构建体系化、项目制的工作模式；培养兼具讲情怀与荣誉感的骨干力量，倡导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管理机制，探索基于就业竞争力提升的勤工助学育人路径。研究旨在有效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职业规划意识，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助力实现更高质量就业，为高校实践育人与就业工作的有机融合提供参考。

关键词：勤工助学；实践育人；就业竞争力；育人路径

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根本要求，更是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体现。实现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需要高校切实构建“十大”育人体系，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共同参与[1]。在新时代背景下，要实现高校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需要多方主体紧密围绕实践育人的目标，系统性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2]，而勤工助学正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勤工助学是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的实践活动[3]。通过参与勤工助学活动，大学生能够获得宝贵的工作实践机会，有助于提升就业能力，培养职场思维，为未来实际就业奠定坚实基础[4]。

一、高校勤工助学育人的意义

（一）勤工助学是资助育人的重要平台

勤工助学是高校资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通过工作劳动取得合法收入，改善自身学习生活条件，是“经济资助”的充分体现；同时，在工作劳动中实现个人的自立自强，是精神和心理上“发展成长”的重要标志。勤工助学可以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和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是资助育人、培养学生感恩教育和增强社会责任感的有效途径。学生通过勤工助学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强化对规则和纪律的理解，使其在经济资助的同时获得精神上的成长与价值观的塑造。

（二）勤工助学是劳动育人的核心举措

勤工助学是学校劳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具有经济奖励，在开展新时代劳动教育中相比其他形式更具吸引力。学生通过参加勤工助学，领会劳动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劳动观，练就过硬的劳动实践本领。在勤工助学过程中学生能感受广大劳动人民的艰辛和劳动过程的价值，勤工助学以劳育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三）勤工助学是实践育人的关键抓手

勤工助学是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是高校实践育人的核心举措[5]。学生在长期勤工助学活动中，可以清晰了解到自身能力架构与单位用人能力需求、知识理论体系与行业发展现状、理论教育与实践养成等方面的差异；能够切身体会学校用人单位的管理教学模式，由此洞察企业及社会的组织运行底层逻辑。勤工助学岗位使学生有机会参与到具体的工作项目中，通过实际操作和亲身经历，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四）勤工助学是就业育人的有效载体

勤工助学作为学生从入学初便可接触的实践岗位，可以系统持续地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大大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沟通表达能力、职业规划意识等，进而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参与勤工助学不仅让大学生在现实中体验职业生活，还促使他们开始思考并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路径。勤工助学过程中实际的工作接触有助于学生打破对行业企业的刻板认识，使学生可以更好地进行外部探索，更清晰地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通过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反馈，学生能够更准确地评估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从而在大学期间针对性地提升自身能力。

二、高校勤工助学实践现状

（一）工作差异较大，评价体系单一

学校不同勤工助学用人岗位的职责、工作内容和工作强度相差较大，岗位工作年限不同，所承担的任务也不尽相同，担任长期核心岗位的学生任务十分繁重，担任短期岗位的学生多为重复性体力劳动。工作岗位及内容与学生学习能力和求职竞争力结合度较差，工作人员可替代性强、工作内容无法量化、工作考核评价单一、工作奖惩机制缺失。仅以值班次数、工作时长作为发放勤工助学劳务报酬的标准，对学生的工作难度、完成情况、质量效果、工作态度、业务能力等缺乏合理量化指标。

（二）岗位流动性强，工作连贯性弱

勤工助学工作是学校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和学生正常学习的前提下有组织开展的实践活动，学生每周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值班的工作时间非常有限，学生工作时间计量单位多为小时、半日等，不同时间段的值班学生也不相同，客观现实导致学生的勤工助学工作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频繁的岗位流动使得管理者不愿花费更多时间开展系统化培训，对学生的管理要求远弱于部门全职员工。学生在突遇临时紧急的工作时，不能及时了解事件脉络和关键节点，影响工作效率，形成工作连贯性弱的循环。

（三）过度重视结果，缺乏个性关注

大学生对勤工助学最初及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收获劳动报酬，其次才是收获社会经验、朋友、老师指导等。部分学生过于重视劳动报酬，而用人单位只注重工作完成情况，更欢迎已具有一定工作能力和空闲时间的高年级学生介入核心工作内容，不关注学生实际情况，对低年级学生政治素养、道德情操、思想水平、综合素质等引导不足，忽视学生从低年级开始的成长。

三、就业竞争力提升导向的勤工助学育人价值

就业竞争力作为发展中的概念，国内最早将其概括为学生通过知识学习和综合素质开发而获得的能够实现就业理想、满足社会需求、实现自身价值的本领[6]。基于社会发展现状，结合高校毕业生质量报告及第三方毕业状况调查报告，重点关注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能力需求，从入职基本匹配、职场脱颖而出、终身学习成长三个不同工作层次出发，将就业竞争力主要分为基础事务处理、外部资源获取、终身发展思维三部分（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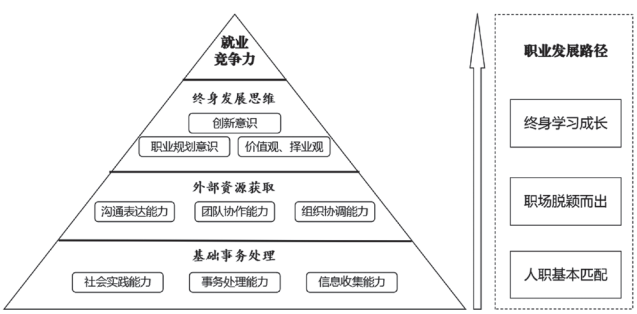


图 1 就业竞争力模型

勤工助学是就业育人的有效载体，深入探讨基于就业竞争力提升的勤工助学育人路径，有助于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助于学生高质量成长成才，有助于勤工助学用人单位提质增效。勤工助学作为连接理论与实践、校园与社会的桥梁，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将勤工助学活动与学生职业规划紧密结合，不仅能够促进学生职业技能的实践应用，还能有效培养其团队协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在提高高校职能部门工作效率的同时，为学生未来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四、就业竞争力提升导向的勤工助学育人路径

就业竞争力提升导向的勤工助学工作体系如图 2 所示。

（一）构建体系化、项目制的工作模式

通过科学合理的工作模式设置和培养路径规划，构建完整且制度化的勤工助学育人模式，在日常工作中帮助学生了解基础事务的处理模式及方式。设置“项目制”“骨干团”“工作组”和交叉分层方式的体系化培养模式，激发学生工作时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并培养其应对、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打造一批长期工作的骨干学生，在学生之间形成“传—帮—带”的积极工作氛围，以此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

1. 以独立项目为锻炼平台

结合勤工助学岗位所涉及的真实工作任务情境，模拟职场中工作方式分配任务，为学生提供“项目制”的勤工助学机会，以工作流程或任务分工为独立项目，指导学生全程参与，并赋予他们部分决策权，以此提升学生的工作参与度，培养其全局观念和创新思维。

2. 以骨干学生为育人核心

选拔勤工助学助理团中综合素质突出的学生，以高年级学生为主，组成骨干团队，担任项目领导者，承担沟通老师和协调管理学生的职责。赋予骨干学生一定的工作自主权及管理权，发挥朋辈榜样作用，促进团队“传—帮—带”氛围的传承，提升骨干学生的沟通领导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3. 以业务小组为组织架构

将具体的工作任务拆分成项目制后，每个项目由多名同学组成工作小组，通过分工合作、沟通协调共同完成。指导教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提供关键节点的指导，并在项目完成后带领学生进行总结复盘，以此培养团队成员的合作意识和事务处理能力。

（二）培养讲情怀、重荣誉的骨干力量

用人单位在设置勤工助学岗位时，应充分关注学生的未来成长和实际需求，选拔培养一批能吃苦、肯

奋斗、有情怀的学生骨干力量，联合培养部门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奖励途径，如学分认定、志愿时长、荣誉证书等，赋能学生全面成长。并以此为契机，发挥骨干力量模范作用，宣传吸引更多学生加入勤工助学队伍，大力营造勤工助学团队“家文化”，为学生提供情绪价值、归属感及荣誉感，进一步强化骨干力量的情怀与荣誉感。

1. 纳入思政考核指标

为确保大学生勤工助学的合理需求得到满足，并结合劳动育人、志愿活动的基本理念以及勤工助学的育人功效，应将勤工助学活动纳入学生的劳动教育、志愿服务等相关思政考核指标中，推进勤工助学工时与志愿服务时长、第二课堂学分的互认机制。

2. 建立专项荣誉体系

面向勤工助学学生建立勤工助学、社会实践专项奖学金，将勤工助学作为评优评先的考核指标之一，设立“勤工助学自强之星”等荣誉称号，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对于工作体系完善的勤工助学岗位，可申请注册为专项学生职能社团，并为骨干成员颁发聘书，如部长、主席等职位，以此增强学生的集体感和荣誉感，丰富其人生简历。

3. 营造团队“家文化”

定期开展工作业务培训，创新培训形式，注重工作业务培训与团队建设相结合。通过集体生日、素质拓展团建、一对一咨询等多种方式，关心支持学生，打造团队成员亦师亦友的角色定位，营造温馨和谐友善的“家文化”，打造勤工助学品牌效应，增强学生归属感和幸福感。

（三）倡导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管理机制

在勤工助学的组织、开展和管理工作中，勤工助学用人单位要将学生作为勤工助学的主人公和第一负责人，教师主要作为组织、管理、指导、服务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学生组织优势，引导学生团体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择业观，发挥勤工助学育人功能，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7]。

1. 倡导学业技能双向进步

将学习成绩与工作时长相关联，约束学生以学习为主要内容，发挥勤工助学岗位人员优势，邀请各年级各专业优秀勤工助学标兵交流经验，开阔专业视野，在确保正常学习生活的前提下，努力掌握项目管理、活动统筹等实用工作技能，实现学业与技能的双向进步。

2. 倡导学生团体以学管学

组建勤工助学相关学生组织，给予该组织充分的资金、场地支持和管理指导，将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将教育与管理相结合，使学生在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中成长。例如，设立学生资助服务中心或资助协会，鼓励学生自行运营，定期组织不同工作岗位间进行经验交流、技能分享、资源互换，以形成良好的内外循环机制。

3. 倡导单位提供资源平台

鼓励用人单位为勤工助学学生提供更多独立工作的资源和平台，给予学生一定自主性，锻炼学生综合素质。用人单位可根据单位特点为学生提供学习、就业、科研等特色资源，例如，就业相关岗位可推荐优秀学生前往院校合作单位实习就业，科研相关岗位可组织学生参加各类竞赛，切实提供学生在职业发展中所需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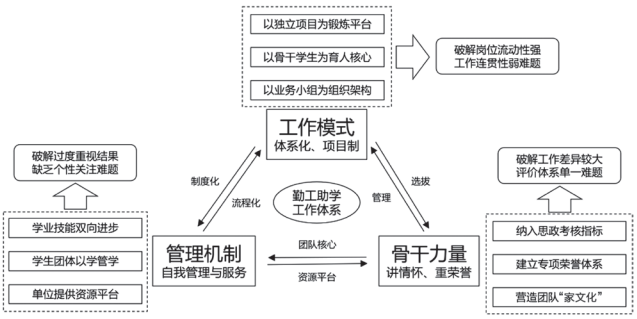


图 2 基于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勤工助学工作体系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EB/OL]. (2017-07-27) [2022-08-27]. http://www.gov.cn/xinwen/2017-02/27/content_5182502.htm.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 2024(29): 9-13.

[3] 郑晓明 . “就业能力论”[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03): 91-92.

[4] 马紫威 , 钟源 , 王轩 . 多维度构建高校资助育人体系及实践探索——以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为例 [J]. 教育教学论坛 , 2021(27): 113-116.

[5] 陈大鹏 .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勤工助学的育人价值和实践途径 [J]. 教育教学论坛 , 2023(02): 161-164.

[6] 艾华 , 高笛 , 黄韬 , 等 . 就业竞争力视域下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勤工助学育人功能的实现途径研究 [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 2019, 17(23): 137-139.

[7] 陈玉婷 . 就业创业能力导向下的大学生勤工助学——以重庆市大学生为例 [J]. 中国大学生就业 , 2022(13): 16-23.

（作者：梁英，北京交通大学就业与创业指导中心副研究员；胡亚军，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讲师；秦晓沅，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本科生）

以志愿服务为载体的青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研究

朱心怡 方啸虎 林姝羽

摘要：大学生志愿服务作为学生接触社会、积累社会经验的重要途径，要秉承奉献社会、友爱互助、促进社会进步的宗旨，大学生利用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社会提供教育辅导、环境保护、社会文化建设等志愿服务，可以在多元社会服务工作开展的进程中，获得知识、发展能力。本文以志愿服务为载体的青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路径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当前志愿服务形式、内容、主体等创新，以多元化志愿服务项目的设计，为青年大学生责任感培育创造良好的体验环境，促进青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服务意识及社会适应性的提升。

关键词：志愿服务；青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路径

青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育，可以以志愿服务为载体，鼓励和支持青年大学生将专业特长和志愿服务相结合，使得更多大学生自觉、自发地投身社会实践。通过高校、社会、家庭三方联动，共创育人环境，帮助青年大学生在熟悉运用专业技能的同时，具备胜任不同岗位工作的能力，促使青年大学生得到充分锻炼，增强其社会责任感，能有效促进大学生综合素养全面提升。

一、志愿服务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的关系

志愿服务是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外化的核心表现形式，通过多元志愿服务项目的设计，将学生个体内在的责任心，转化为具体的、可查的实践行为，包括社区“日行一善”活动，可以将抽象的社会责任感，以日常环保行动、日常社区帮扶行为及社区宣教等活动体现，能更好地将责任心外化于行[1]。与此同时，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是志愿服务的内在体现，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正是责任心的内在驱动，是对社会责任感的自然延伸，也是对学校教育的积极回应，能更好地引导大学生塑造自我，形成正确价值观。此外，通过帮助他人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在进一步强化青年大学生自身社会责任感的同时，能更好地促进学生自我成长，实现个体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以志愿服务为载体培育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

（一）促使大学生勇担社会责任

以志愿服务为载体培育青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能促使青年大学生勇担历史重任。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新一代青年面临的问题逐渐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特点，需要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攻克诸多前沿难题。而社会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能带领青年大学生深入基层服务社会，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命运，与国家理想相结合，以个人理想的实现推动国家发展，通过积极参与扶贫、环保、文化传承等社会实践活动，认识到自身在文化传承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多样性交流等方面的责任和使命，从而能帮助学生具备勇于担当的思想意识和能力。

（二）有助于培育大学生健全人格

高度责任感是青年大学生健全人格的集中体现，社会责任感的培育对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有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让青年大学生参与多元化的志愿服务项目，学生能对自身在服务社会中的职责和使命有准确的定位，强化学生的责任认知能力，此时学生的道德能自我完善，以良好的道德素养和行为规范，驱动青年大学生健全人格形成，能更愿意投身于社会实践，充分运用自身专业优势服务社会[2]。

（三）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基于志愿服务的青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青年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本身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其志愿精神、责任意识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作为志愿者的青年大学生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进程中，积极响应党和人民的号召，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社会、走进社区、走入基层，聆听基层人民的心声，并灵活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于基层人民，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基于志愿服务的青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路径

（一）构建志愿服务与责任认知的联结机制

基于志愿服务的青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可以构建志愿服务与责任认知的联结机制。首先是课程体系的融入，学校可以开设专门的课程，就社会责任内涵、志愿服务价值及实践路径等内容进行系统的讲解。与此同时，还需要将志愿服务相关内容融入通识教育，以真实案例分析、小组讨论交流等方式，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并在案例分析的同时思考自身责任，讨论、交流青年大学生在社会发展中所应承担的职责和使命[3]。此外，在将志愿服务与责任认知联结的同时，还需建设相应的实践平台，制定长期志愿服务计划，保持志愿服务的可持续性。例如与社区、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制定“环保同行”志愿服务计划，明确志愿服务目标，力求以各类环保志愿活动，推动全社会积极参与环保工作，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明确志愿服务目标的情况下，制定具体的环保志愿活动及实施计划，推广一批主题明确、效果突出的志愿服务品牌项目，比如开展“环保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向社区居民讲解生态环保知识；举办“可回收物品收集”“环保袋设计比赛”“有趣垃圾分投”等特色活动，围绕“环保”等系列主题活动设计多样志愿服务项目，能有效促进开展长期的、有计划的志愿服务工作，共同推动志愿服务活动的常态化，有助于学生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服务责任感、使命感的形成[4]。

（二）营造“服务即责任”的校园文化

青年大学生志愿服务为培育社会责任感，需要营造“服务即责任”的校园文化，作为学校教育的无形资产，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能在无形中影响学生道德素养、规范学生行为实践，帮助青年大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念。而青年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为培养青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学校可以从良好校园文化的建设着手，将“服务即责任”理念融入校训，使得全校师生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正向价值引领。与此同时，还可以将“服务即责任”融入专业课教学当中，将其贯穿于专业课教学全过程，包括课程活页材料开发、课程目标设计及专业课实训活动开展、教学评价等，要求学生以服务社会为实践目标，从而能更好地完善教育体系的建立[5]。此外，还需要结合校园特色设立学生服务社团，或是组织开展以“服务社会”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在这一情形下，青年大学生能在参与社团活动的同时自主开展公益活动，并在参与主题活动时以多元方式强化责任意识，包括主题演讲、话剧表演、辩论赛、志愿服务竞赛等，助力良好校园风气的形成，使“服务即责任”的思想意识深入学生心底，指导青年大学生行为实践活动开展。

（三）打造多元化的志愿服务项目

基于志愿服务的青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大多存在项目活动单一化问题，服务内容多集中在一些传统的社会福利、公益慈善等方面的问题。例如访问敬老院、探访老人和福利院儿童等，提供陪伴、关怀和慰问，为弱势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这些服务形式虽也是为社会发展提供助益，但往往缺乏对学生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的关注，这也导致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大打折扣。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打造多元化的志愿服务项目，着眼于社会公益、环境保护、教育支援、社区服务和特殊群体关怀等多个领域，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及专业特长着手，以学生所熟知的专业领域知识、技能提供志愿服务，能极大增强学生参与意愿。例如医护专业学生，开展多样志愿服务项目，包括春泥计划、始心计划、影子姐姐、暖流行动之类的志愿者活动，将志愿服务与专业课知识、技能相结合，创新志愿服务项目的同时，能为青年大学生志愿活动的开展注入新的内容。

以“春泥计划”为例，连续 15 年开展“春泥计划”乡村支教志愿服务项目，以线上支教和暑期线下支教相结合方式，累计组织 1000 余名志愿者，为 300 余户家庭辅导 3000 余节课，共计辅导时长达 7000 小时。与此同时，在暑期线下支教过程中，还结合当地特色开展了“稻田里的思政课”“车间里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等志愿服务主题学习教育。比如“稻田里的思政课”，组织当地学生参与播种、收割等农耕活动，亲身体验劳动艰辛，培养勤俭节约意识。与此同时，还开展了《我要做一粒好种子》讲座，与小学生互动分享农业知识，小学生分享自己的生活、农作经验，青年志愿者则结合专业知识对小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和补充，从而能更好地形成志愿活动结对机制，促进小学生和青年大学生共同发展。这一过程，通过打造多元化的服务项目活动，能更好地以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增强青年大学生服务社会、奉献自我的良好道德素养，具备服务社会的责任心[6]。

（四）构建高校、社会、家庭协同育人网络

以志愿服务为载体的青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育，需要构建多方协同育人网络，将高校、社会及家庭教育联动，以此来为青年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志愿服务环境，促使青年大学生志愿服务顺利开展。从社会保障系统的完善建设角度出发，有关政府部门应完善相应的“志愿服务发展基金”，为大学生志愿服务重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以激励机制的建设，设置相应的表彰、奖励项目，明确可获取奖励的标准，能更好地激励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提高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度。与此同时，还可以从必要生活保障着手，完善志愿服务交通和误餐补贴制度，由志愿服务组织者提供适当的交通和误餐补贴，从而能确保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更好地参与志愿

服务活动。而学校教育工作的开展，则可以为青年大学生志愿服务提供专门平台，由政府、企业及学校充分合作，秉承便捷化参与原则，为志愿者服务工作的开展搭建高效对接平台。志愿服务平台的构建，将线上服务和线下服务相连接，能更好地提高志愿服务的便捷性[7]。这一过程青年大学生可在线报名参与志愿服务项目，平台提供项目列表、详细信息及报名功能，提交信息后台快速审核，在线完成对青年大学生志愿者的招募，并为其提供线上课程资源库，课程内容涉及服务技巧、专业知识等内容，能支持志愿者学习。与此同时，通过志愿服务平台的构建，还可以促进青年大学生志愿者之间的服务心得交流、分享，以在线论坛、群组等分享服务经验和心得，并就志愿服务过程和存在问题进行讨论，能更好地提升志愿服务质量，培育青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五）构建志愿服务培训的评价激励体系

青年大学生提供志愿服务，为更好地利用专业化知识服务社会、奉献社会，培育社会责任感，需要构建志愿服务培训评价体系，加强对志愿者的专业指导和培训，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专业知识培训，能有效提升其服务能力和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将志愿者服务活动开展与学生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训练相结合，促使学生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同时能灵活应用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并加强对专业评价的重视程度，对青年大学生志愿服务专业知识、能力及专业素养水平进行评估和反馈，依据评估结果，对志愿服务实施计划进行不断完善，帮助青年大学生更好地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社会，提升青年大学生服务社会能力，增强社会适应性和岗位胜任力。

例如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康复服务，需要加强志愿服务专业指导，由医疗康复领域专家对青年大学生的康复专业知识、技能进行培训，让学生掌握康复训练的手法。能为老年人提供康复训练，帮助老年人恢复身体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并通过青年大学生提供的关爱和支持，增强他们的身心健康和自信心。而针对这一志愿服务培训的评价，根据老年人满意度、身体恢复情况等进行判定，包括老年患者的手眼协调能力、自我康复意识、健康心理等，都可以作为评价范畴，并针对青年大学生志愿者在康复训练中存在的问题提供针对性指导，能更好地帮助青年大学生专业素质水平全面发展，以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服务于社会[8]。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以志愿服务为载体的青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明确志愿服务与社会责任感培育之间的关系，并以学校、社会及家庭三方协同，拓宽青年大学生受教育场所，让学生在参与多元志愿服务项目的同时，自我责任认知能力不断提升，认识到个体责任感形成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能更好地平衡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学生个人志愿服务行为的开展，促进现代化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方汝峰，丁莹，方亚儒．志愿服务行动提升大学生社会责任的研究——以合肥经济学院“圆满假期”实践活动为例 [J]. 蚌埠学院学报，2024, 13(03): 83-88.

[2] 王一茗．志愿服务赋能职业教育的理论来源、价值意蕴与优化路径 [J]. 科教文汇，2024(11): 150-153.

[3] 朱玉琪，胡昊田．“三全育人”视阈下高校青年志愿者服务实践育人路径探索 [J]. 学周刊，2025, 1(01): 139-142.

[4] 雷楹，王明露．新媒体推动大学生志愿服务创新路径探索 [J]. 科教导刊，2024(24): 135-137.

[5] 宋林颖，郑丹萍．大思政课背景下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育人效能深化研究——以西藏大学为例 [J]. 2024(13): 91-93.

[6] 温婉华，黄露露．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的内涵解析、现实审视与路径支撑 [J].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中旬刊），2023(05): 188-192.

[7] 汪水兰，窦佳欣，王一妃．“Z 世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特征和影响因素探索 [J]. 文教资料，2023(19): 65-69.

[8] 黄丽琼．新时代高校志愿服务融入社区治理的策略分析 [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文摘版）社会科学，2024(03): 69-7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浙江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实践育人视域下志愿服务对青少年社会责任感培养的实证研究”（ZQ2025106）；2021 年浙江工业大学人文社科研究基金学工专项（思政调研）课题“大型赛会契机下高校志愿服务育人模式探索——以“青语行动”为例”（SKY-ZX-20210270）。

（作者：朱心怡，浙江工业大学教育学院；方啸虎，浙江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林姝羽，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于“三全育人”理念的学生资助工作创新实践

徐铭晗 古扎努尔·艾尼娃

摘要：学生资助工作具有物质激励、精神激励、情感激发、心理疏导等功能。教师通过采取合适的资助方式，帮助家庭困难或条件一般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保证每一位学生平等接受教育，实现受教育权全面普及。在学生资助工作中，学校应始终以学生为主体，从物质、精神以及情感三个方面，选择合适的资助方式，在体现资助工作助力学生学业、生活功能的同时，还要注重保护学生的自尊心，消除学生自卑、敏感等消极心理，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基于此，本文基于“三全育人”理念，在概念概述、重要性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究学生资助工作创新的实践策略，希望能逐步提高学生资助工作效率与水平。

关键词：“三全育人”理念；学生资助工作；创新；实践策略

为了进一步做好学生资助政策宣传并促进政策落实和提升政策效果，教育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资助政策宣传工作的通知》，明确从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宣传工作重点突出、宣传方式改进、工作机制健全、宣传队伍建设五个方面入手，推进学生资助工作进一步完善，推进学生资助工作有序、有效开展，并提高资助政策的透明度，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实现资助金供给与困难学生需求的全面对接。“三全育人”理念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核心，旨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对包括学生资助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均提出新的要求。学校与教师要做好学生资助工作，就应坚持“三全育人”教育理念，将其落实到教育教学、学生管理各环节，并全过程关注学生知识学习、道德素养、心理健康、核心素养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分析满足资助条件学生的相关信息，结合学生发展实际情况，创新学生资助工作，发挥资助工作助力学生摆脱生活困境、助力学生学习与成长的作用。

一、“三全育人”理念概述

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要求，即“三全育人”理念，要求教育教学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各项工作，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构建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的长效教育机制[1]。“三全育人”理念要求教师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原则，提高站位，以知促行，强化担当，以行践知。

二、“三全育人”理念下学生资助工作创新的重要性

在教育部与财政部的支持下，学校开展学生资助工作，统计、分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相关信息，明确学生生活、学习与成长对学校资助的需求；并在“三全育人”理念的要求下，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开展学生资助工作，能有效提升学生资助工作的针对性、思政教育的有效性以及人才培养的专业性。

（一）了解学生需求，提升资助工作针对性

基于“三全育人”理念，学校开展学生资助工作，要对学生的学习、生活、成长进行全过程关注，通过全方位观察学生、与学生沟通等多种方式，了解在校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分析、了解需要资助学生的相关信息，以此为依据，调整学生资助工作方案，实现资助金与学生需求的有效对接，提升学生资助工作的针对性[2]。

全员参与下的学生资助工作，明确包括学校辅导员、行政管理人员、任课教师在内的责任主体，引导多主体积极承担育人职责，在信息沟通、协同办公的过程中，推进学生资助、教育教学等工作有序开展；全方位育人即全面育人，强调教师应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方向明确地开展各项工作，帮助教师明确学生资助工作的主要内容；全过程育人要求教师切实关注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就业过程中的学习、生活状况，对学生资助工作的时间提出明确要求。在“三

全育人”理念的要求下，学生资助工作全员参与、全过程与全方位开展，助力教师更加全面、准确地掌握学生信息，并采取资助措施，资助、补助学生，提升学生资助工作的针对性，提高资助资金的利用率。

（二）加强德育渗透，提升思政教育有效性

“三全育人”理念始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将“三全育人”理念落实到学生资助工作中，强调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贯彻落实。学生资助工作是由学校负责开展的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的重要工作，其中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学校德育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若学校能抓住学生资助工作这一重要契机，在对学生进行物质资助的同时，给予关怀与爱护，让学生感受到来自学校、社会的温暖，则能以更加有效、新颖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改变传统的枯燥、乏味的教育方式，让思政教育深入学生心中。在“三全育人”理念的要求下，学校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学生资助工作的同时，还能渗透加强学生德育，整体提高思政教育水平。

（三）贯彻教育目标，提升人才培养专业性

“三全育人”理念指导下的学生资助工作开展，不仅能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学习与生活问题，还能助力学校逐步实现新时代人才培养目标，培养专业化、现代化的高素质人才，整体提高学校育人质量。

在“三全育人”理念的驱动下，教师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资助育人教育模式，在帮助学生解决经济困难的同时，还引导学生树立职业理想与坚定信念，并培养学生感恩、负责的正向情感，着力实现全面育人的教育目标[3]。

三、基于“三全育人”理念的学生资助工作创新实践策略

学生资助工作的有序、有效开展，对学校以及相关主体均提出明确要求。学校作为学生学习、成长的主阵地与资助工作开展的关键场景，在学生学业发展、人生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校要在“三全育人”理念的要求下，推进学生资助工作创新，提高资助效率与质量，充分体现学生资助工作的物质保障、精神激励、情感激发、心理疏导等教育功能，就要根据当前阶段学生资助工作开展情况，基于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理念，从资助队伍建设、育人平台搭建、学生成长关注三个方面入手，引导全员参与，创新资助方式，着眼于学生从入校到毕业、就业各成长环节，实现资助工作的全过程衔接，帮助学生解决成长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助力学生以最佳状态完成学业。

（一）建设高质量资助队伍，引导全员参与

基于“三全育人”理念的学生资助工作，不仅是学校的主要工作，还对社会、家庭等相关主体提出了明确要求。学校、家庭与社会等主体应共同参与、相互配合，全员助力学生资助工作有序开展，实现对学生信息的全面了解，在最大范围内给予学生关怀、支持[4]。

一方面，学校作为直接开展学生资助工作的主体，应全面调动包括辅导员、行政管理人员以及专业教师在内的多主体参与学生资助工作，并加大资助队伍建设力度，提高学生资助工作效率与水平，充分发挥资助育人的功能。学生资助工作是一项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作，作为资助主体的教师不仅要全面了解学生信息，还要掌握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专业知识，确保在给予学生物质资助、帮助学生完成学业的同时，还能疏导学生情绪，干预学生自卑等消极心理。学校要从教师队伍、学生队伍中选拔可胜任资助工作的人员，如辅导员、学生干部等，并通过定期开展培训工作，逐步提高相关人员的学生资助工作能力。例如，学校启动“一对一帮扶”资助项目，培养优秀的学生干部，在学生干部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之间建立帮扶关系，学生干部给予被资助学生以精神和情感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学生资助工作的开展，不仅对学校提出明确要求，还对社会、家庭等在内的多个主体提出要求。社会与家庭要加大对困难学生完成学业、职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为学生提供更加广阔的实践平台与勤工俭学的多种机会，让学生通过劳动，获得支持其完成学业、改善生活的资金。如企业等社会组织与学校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学生可利用周末、寒暑假等时间，到工厂、企业等兼职，赚取学费与生活费。家庭则要从情感与精神层面，给予学生关怀与支持，作为学生成长路途上的坚强后盾，激励学生学习、成长。

基于“三全育人”理念的学生资助工作开展，需要学校、社会以及家庭相关主体的全员参与，三大主体紧密配合、相互联通且有机融合，通过人员培训与引导，建设全员参与的高水平学生资助工作队伍，从物质、精神以及情感多个层面入手，开展学生资助工作，共同为学生健康成长打造一方净土。此外，还可通过建立家校社联动机制，定期召开三方座谈会，共享资助信息与成长档案，从而形成动态跟踪的育人网络。还可通过数字化平台来进行资源整合，这样能够实现精准化帮扶，让资助工作从经济援助升华为成长赋能，全面培育学生的自立自强品格。

（二）全过程关注学生成长，衔接成长阶段

学生资助工作并非某个阶段的工作，而是贯穿于学生学习、成长全过程的扶持性工作，从而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学校作为学生学习与成长的主阵地，要在学生入学、在校学习以及毕业三大成长阶段，循序渐进地开展学生资助工作，在入学阶段做好资助政策宣传、手续办理引领工作；学生在校学习阶段，对其进行精准资助，帮助学生解决经济问题；在毕业阶段进行持续跟踪，了解毕业生面临的经济困

难。资助工作实现学生成长各阶段的有效衔接，致力于帮助学生解决其在成长各阶段存在的经济问题，保证学生更好地完成学业、参加工作[6]。

首先，在入学阶段，随着录取通知书一同寄给学生的档案还包括助学宣传手册，让面临经济困难的学生和家长了解国家的助学政策，解决其在入学前存在的经济问题。在学生报到之后，学校还要加强资助宣传，举办资助宣讲会等，帮助学生了解国家相关助学政策；并帮助学生办理相应手续。其次，在学生完成学业的过程中，学校除了引导学生办理助学贷款等，还要为学生提供勤工俭学、评优奖金等资助，激励学生通过自己在学业、专业上的努力获得奖学金，实现资助与育人的双重目标。最后，在学生毕业阶段，学校通过发布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应届毕业生的未来规划以及存在的问题，如学生找工作与考研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金钱。对于存在经济困难等问题的学生，学校可为其提供就业援助、考研奖金等，有针对性地解决应届毕业生存在的经济问题。学校根据学生所处的成长阶段，明确资助工作的侧重点，实现各阶段学生资助工作的有效转换与衔接，帮助学生解决在各环节存在的经济困难等问题。此外，还应建立毕业生跟踪帮扶机制，对那些已经毕业但仍然面临经济困难的学生要给予过渡性的支持，例如就业推荐和创业指导等等，实现从校园资助到社会帮扶的无缝衔接，达到全过程育人的效果。

（三）搭建全方位育人平台，创新资助方式

学校、社会以及家庭建立长期的育人合作关系，以学生为主体，搭建全方位的育人平台，致力于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推进学生资助工作方式创新，为学生勤工俭学提供多条渠道。依托学校搭建的全方位资助育人平台，家庭在将学生信息提供给学校的同时，从精神与情感层面，支持学生完成学业与人生成长；学校与社会采取多种资助方式，从物质层面资助学生，从精神与情感层面激励学生，构建结构完善、效果显著的学生资助工作模式[5]。

例如，在教育部与财政部的支持下，学校开展助学贷款政策宣讲工作，帮助学生对接国家助学贷款项目，引导家庭经济无法支撑学业完成的学生申请、办理助学贷款，解决学费问题。学校帮助学生办理助学贷款，不仅能解决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问题，还能让学生感受到国家助学政策给予他们的关爱。学校还可在校内设立勤工俭学岗位，各班级辅导员向学生推荐勤工俭学岗位。学生可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组织下，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赚取生活费，改善生活条件。学校应全面整合校内资源，根据每届贫困学生的数量，设立助管、助教、助研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勤工俭学岗位，如图书馆整理员、研究生助教、办公室助教、食堂分餐员、超市收银员等。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与需求，从多种类型的勤工俭学岗位中进行选择，增加收入。

再如，学校还可通过评优评奖的方式，激励学生专业学习与成长，将国家与学校设立的奖学金作为激励学生的重要方式，引导学生奋发学习、全面发展。比如，国家设立的奖学金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专业排名、综合素质等均提出明确要求，学生只有符合上述条件，才能获得国家奖学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只有达到竞争国家奖学金的标准，才有机会参加奖学金评选，在通过努力获得荣誉的同时，还能缓解其生活方面的压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三全育人”理念，学校推进学生资助工作创新，应认识到资助工作所具有的心理疏导、精神激励、情感激发、物质支持等功能，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原则，体现学生资助工作在资助、育人两个方面的价值。学校应从资助队伍建设、育人平台搭建、学生成长关注三个方面入手，推动全员参与、方法创新、全程衔接，并加强学生德育，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学生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石。

参考文献

[1] 朱政嘉 . 基于“三全育人”理念的学生资助工作创新实践 [J]. 成才与就业 , 2024(S1): 144-147.

[2] 张珺 , 宋杰 , 何毅 , 等 . “三全育人”背景下高校学生资助诚信问题研究 [J]. 征信 , 2024, 42(07): 65-70.

[3] 郭甜甜 , 朱昭阳 , 王琴 , 等 .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及实现路径 [J]. 就业与保障 , 2024(06): 70-72.

[4] 叶阳 , 付娇 , 李晓敏 . 精细化管理视域下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创新发展研究 [J]. 模型世界 , 2020(12): 233-235.

[5] 赵晓天 , 江世鑫 , 张钰昆 , 等 . 民族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创新研究 [J]. 才智 , 2014(12): 197-197.

[6] 宋兆华 , 李磊 . 新时代高校大学生资助工作创新模式探析 [J]. 中文信息 , 2018(11): 174.

（作者单位：长春师范大学）

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韩晋忠

摘要：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实现制度化建设，是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本文剖析党建与志愿服务的互动逻辑，探究制度化建设的价值定位，指出了组织体系不完善、激励保障欠缺、政策衔接不顺畅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实际问题，并提出增强组织体系搭建与统筹安排、优化激励机制与保障系统、助力志愿服务融入基层治理和公共政策、推广典型做法并实现区域协同的办法。案例分析表明，制度化建设极大提高了志愿者参与度，增加了服务时长，扩大了活动覆盖范围，切实提升了群众满意度。党建引领下的志愿服务制度化既为社区治理筑牢了稳定根基，又为志愿服务的长期发展筑牢了制度根基，对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社会治理

党建工作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不单单表现在政治引领层面，还能整合社会资源、促使建立制度规则。志愿服务是社会治理的关键部分，具备灵活性佳、贴近民众生活、参与范围广的优势，然而也存在分散无序、临时运作和制度缺位等问题。促进志愿服务实现制度化发展，既为满足社会需求的实际需要，也是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举措。依靠制度化的安排，志愿服务可在组织架构、运行体系、激励保障和政策融入等方面实现全方位优化，以实现规范、专业、长效的发展目的。探讨党建带动下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的实践途径，对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强化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党建引导志愿服务的理论基础

（一）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内涵与逻辑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核心在于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通过制度安排和价值导向将分散的社会资源加以整合。党组织能够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起到统筹和协调作用，既能把握宏观方向，又能推动具体事务落实。在治理逻辑上，党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强调公共利益优先，能够通过引领作用把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聚合在一起，形成合力。志愿服务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补充领域，在这一逻辑框架下可以更好地嵌入社区治理、公共服务和社会互助中，实现自下而上的活力与自上而下的制度引导之间的有效衔接。

（二）志愿服务与党建工作的互动关系

志愿服务一般是指志愿者组织、志愿者服务社会公众生产生活和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行为。或者说，志愿服务泛指利用自己的时间、技能、资源、善心为邻居、社区、社会提供非营利、无偿、非职业化援助的行为。对志愿服务发展而言，党组织不仅充当着政治核心角色，还充当着组织与资源的供应者角色。依托党建平台，志愿服务可明确价值导向并获得组织支撑，进而规避分散与短期的弊病[1]。志愿服务活动给党建工作增添了新的形式与内容，促使党建工作进一步贴近基层民众生活，展现服务群众的实践价值。

（三）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性与价值定位

志愿服务若想达成长期稳健发展，需依靠党建引导渐渐达成制度化。制度化建设可为志愿服务搭建稳定的运行架构，注入可持续的发展活力，在规范机制引领下长久运行。从价值层面看，志愿服务制度化在价值层面而言，属于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突出体现。构建制度化体系，切实规范志愿者权利和义务，清晰界定组织运转规则，建立激励与保障兼顾的长效机制。志愿服务既能满足社会需求，更能成为增强社会凝聚力、推动公共价值实现的关键力量。

二、当前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一）组织体系不健全

目前部分志愿服务的组织体系暴露出显著缺陷，体现为缺少统一规划与上下衔接的运行架构。不少地区虽组建了志愿服务队伍，但多数处于自发松散的组织阶段，缺少清晰的职责划分和规范化管理模式，部分社区的活动维系过度依赖少数核心成员，若人员变动或资金断流，服务工作就会陷入停滞状态，无法保

证稳定与持续[2]。志愿服务机构跟党组织、社会团体、政府部门之间缺乏联动，造成资源分散、信息流通受阻，服务力量无法达成整合。这种情形下，志愿服务的覆盖广度和影响程度受到极大限制，整体运行缺乏必要的规范性与制度支持。

（二）志愿服务激励与保障机制不完善

志愿服务普遍缺乏系统的激励机制与长效的保障安排，难以让志愿者长久维持参与的积极性。大量活动采取临时招募手段，志愿者做完一次性任务后不易再持续投入，志愿者投入时间与精力后，往往难以得到应有的认可和肯定。既缺失精神层面的荣誉感，也缺少物质层面的合理补偿，培训、职业成长、心理抚慰等支持性要素长时间被冷落，导致志愿者在服务时难以提升能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缺少对应的社会保险、权益保障和风险防护手段，会让志愿者在突发状况下陷入责任界定模糊、风险难以分摊的窘境。

（三）与基层治理和公共政策的衔接不够紧密

志愿服务制度嵌入存在欠缺，造成其与基层治理整体格局的联系不够紧密，未能发挥制度化的预期作用。部分地区的志愿服务依旧独立开展，未能切实融入社区治理与公共事务管理体系，服务成果难以实现制度化吸收转化。政策设计与落实时未充分考量志愿服务的独特性，缺少有针对性的顶层制度规划与政策指引，致使志愿服务角色被弱化，难以构建制度化支撑。志愿服务和基层公共政策间存在信息交流匮乏、工作衔接欠佳等状况，导致志愿服务成果多停留在短期效果层面，未能转化成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优势。

（四）典型经验与普遍问题之间差距明显

志愿服务的发展呈现出“点上突破、面上不足”的状况[3]。一些地区以党建为引领，构建起成熟的组织模式与管理制度，摸索出可复制的成功经验。但这些经验大多仅在个别区域留存，缺少有效的推广普及机制，难以产生广泛的示范效果。更多区域还处在探索进程中，普遍面临组织力量薄弱、制度体系不完善、资源供应不足和管理方式粗放等状况。各区域间政策支持的力度、资金投入的状况以及志愿服务专业化程度存在明显差距，致使志愿服务整体发展失衡。该差异造成全国志愿服务制度化推进呈零散态势，难以构建统一标准与规范，也不易在国家层面建立协同推进的整体效能。

三、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制度化的实践路径

（一）加强组织体系建设与统筹协调

借助在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成立志愿服务党支部或设立党员示范岗的方式，搭建起以党组织为桥梁的组织架构，让各类志愿力量可以实现统一调度，促进资源整合。把群团组织、社会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的志愿队伍联合起来，构建跨组织合作体系，化解力量分散与重复投入难题。优化运行机制，将志愿服务添加到基层治理清单以及党组织年度工作计划中，构建常态化工作流程与考核方式，提升党组织引领与协调效能，让志愿服务摆脱少数个体推动的状态。凭借制度规划实现稳定运作，此举既能增强团队凝聚力与服务连贯性，又能为志愿服务的长期规范发展筑牢组织根基。

（二）完善激励机制与保障体系

完善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必须构建科学的评价与反馈系统，建立分层分类的考核标准，将志愿服务时长、服务内容和服务成效作为主要指标，并与社会信用、职称评定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形成制度化的认可渠道。通过多元化激励手段，既重视精神层面的荣誉表彰，也兼顾物质层面的合理补助，使志愿者在付出中获得切实的价值感。与此同时，健全保障体系，完善志愿者保险制度，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和风险防护，避免因突发事件造成志愿者权益受损[4]。加强培训与能力建设，依托党组织资源为志愿者提供长期培训课程和心理关怀，提升其专业素养和服务满意度。通过激励与保障的双向并重，志愿服务能够在动力和安全感的支撑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稳定可靠的志愿者队伍。

（三）推动志愿服务融入基层治理与公共服务体系

促进志愿服务融入基层治理工作，关键是构建制度化的嵌入机制，把它融入党组织引领的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体系。依托党建统筹，让志愿服务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公共事务服务站点等平台实现有效对接，促使志愿活动与基层治理凝聚合力。助力公共政策在制定与执行中明确志愿服务的功能定位，打造能给予资源配置、政策扶持和制度保障的制度环境，增强党组织的纽带功能。让志愿服务在社区矛盾化解、环境整治、公共文化构建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借助构建工作联动机制与信息共享平台，志愿服务成果实现制度化吸纳并转化为治理成效。这既能够提高志愿服务的社会价值，还能促进它和公共政策的深度结合，让它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推广典型经验并促进区域协同

搭建经验交流平台并构建跨区域协作机制，把先进地区行之有效的做法转化为制度规范，促进不同地区间志愿服务资源与管理模式的共享。凭借党组织的协调效能，推动国家与地方发布统一的标准及规范文件，缩小各地组织体系、服务水平和资源保障上的差距。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政策与财政扶持力度，保证其具备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条件。运用数字化平台工具，促进志愿服务实现信息化与智能化管理，达成跨地区信息交互与资源共享。依靠典型引领和区域合作，可彻底扭转志愿服务发展的零散局面，促使志愿服务在全国实现均衡推广，构建起制度化、标准

化、体系化的发展态势。

四、案例分析

（一）案例背景

某地在党建引领下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选择以社区综合治理为重点开展探索。该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密度大，社区治理任务复杂，志愿服务需求量长期保持高位。当地党委通过设立社区党建联席会议机制，将基层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及多支志愿服务队伍纳入同一治理平台[5]。该平台设立专门的志愿服务议题，定期研究志愿服务的组织模式与运作路径，形成了制度化的沟通和决策机制。在此基础上，当地还结合数字化治理要求，建立了智慧社区服务平台，将志愿服务纳入信息化管理体系，通过线上登记、任务分配、服务评价等功能，使志愿服务更具透明度与可操作性。

（二）实施措施

在开展实施工作期间，当地党委发挥党组织的统筹效能，促使构建起覆盖面广的组织网络。社区开设“党员志愿服务站”，由党支部主导日常调度与考核工作，保障志愿服务活动有稳定的制度支撑。为提高志愿者素养，构建分层分类的培训体系，细分为基本公共服务、专业应急支援和文化宣传教育三大类别，适应不同场景的服务要求。为鼓励志愿者持续投身志愿服务，当地党委出台积分管理办法，把志愿服务的时长与质量换算成积分，积分可用于换取社区公共资源。借助信息化技术的充分利用，平台与移动终端对接，达成志愿者线上报名及任务自动推送，大幅提升活动组织效率与参与便捷性。凭借这些办法，志愿服务逐步嵌入社区治理体系，达成了党建引领与社会力量的深度融合。

（三）效果分析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该地区志愿服务成效渐显，参与率、服务覆盖范围和群众满意度均大幅提高。尤其在党建的引领推动下，志愿服务的制度化程度显著提升，活动的规范度和持久度大幅提升。为更直观地呈现实施效果，综合社区治理考核成果与志愿服务平台统计资料，形成对比表格（见表 1）。

表 1 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效果对比

指标类别	实施前水平	实施后水平	提升幅度（%）
志愿者月均参与率（%）	42.6	68.4	60.6
服务人均时长（小时）	4.3	7.1	65.1
活动覆盖率（%）	56.8	82.5	45.2
群众满意度评分（1~10）	6.7	8.9	32.8

实施制度化建设后，志愿者每月平均参与率由 42.6% 跃升至 68.4%，参与率提升幅度高达 60.6%，表明组织机制的完善极大激发了志愿者的参与热情。人均服务时长自 4.3 小时增至 7.1 小时，提升幅度达 65.1%，显示激励机制和培训体系让服务的持续性与专业性得到提高[6]。活动覆盖率从 56.8% 提升到 82.5%，显示出志愿服务在社区治理中的覆盖范围显著拓展。群众满意度评分由 6.7 跃升至 8.9，涨幅达 32.8%，证实了党建引领的志愿服务对社区民生保障和治理效能有实质贡献。

五、结语

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实现制度化建设，是助力志愿服务从自发行为转变为规范模式、从零散形式形成体系格局的重要措施和发展方向。依托党组织的统筹协调，志愿服务有了清晰的发展方向与组织支撑；激励与保障制度的优化，使志愿者群体更具稳定性与持续性；借助与基层治理及公共政策的深度整合，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出更显著的制度性功效；借助推广典型范例和推动区域协作，志愿服务在全国达成了均衡推进与标准化发展。案例分析证明，制度化建设可大幅提高志愿服务的质量以及群众的满意度，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添砖加瓦。未来应持续强化党建的引领效能，带动志愿服务在法治化与数字化形势下不断改进，打造更坚实的制度支撑与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1] 陈恩思 . 新时代“2+X”党员教师志愿服务团队建设的实践路径 [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文摘版）社会科学 , 2025(09): 215−218.

[2] 张婷珊 , 练慧 , 王佩 . 党员志愿服务推动医院基层党建工作的实践与探索 [J]. 四川劳动保障 , 2024(04): 60−61.

[3] 王冰 , 唐洁 , 李斯婷 . “党建 + 志愿服务”模式在高校中的应用 [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文摘版）社会科学 , 2025(09): 141−144.

[4] 王佳旭 , 葛顺 . 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培育路径探索研究——以日照市高校为例 [J]. 社会科学前沿 , 2025, 14(02): 670−675.

[5] 潘英媛 , 杨晓佳 , 庄文斌 . 党建引领下的医务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探析——基于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救”在身边应急救护培训项目的实践研究 [J]. 现代医院 , 2022, 22(11): 1660−1662.

[6] 莫明聪 , 徐敏 . 新时代党建引领公立医院志愿服务的路径与实践 : 以南山志愿服务队为例 [J]. 中国卫生资源 , 2021, 24(05): 495−498, 515.

（作者单位：中共泽州县委党校）

残障学生职业教育“533”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邵　晶

摘要：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中确定了残疾人高等教育普及的目标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特殊教育普惠发展”。由此可见，党和政府皆对残疾人的教育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残障学生是社会上的一个弱势群体，其生理的特殊性让其在融入社会时出现了许多问题。对此，特殊职业学校应加强研究，以社会融合为目标，发挥学校的资源优势，创新残障学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遵循保障教育公平和因材施教的原则，构建“533”的人才培养模式。实践此模式，在机构、学校、家庭、企业、社区的多方协同合作下优化残障学生的培养，助其融入社会，顺利就业，满足发展需求。

关键词：社会融合；残障学生；职业教育；“533”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愈发关注残障学生的教育问题，残障学生的职业教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点。融合教育理论的提出，让社会融合成为一种趋势，因而在社会融合旨归下，特殊职业学校应加强对残障学生的了解，创新教育理念，研究“533”人才培养模式。分析当前残障学生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促进机构、学校、企业、家庭和社区五方协同，以协同育人理念、因材施教理念、教学做合一理念为核心建立健全教育体系。利用各种教育支持服务体系、课堂教学支持体系等促进残障学生终身发展，满足残障学生的学习和就业需求[1]。

一、当前残障学生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困境

（一）教育呈现碎片化

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过程是一个体系化的过程，具有极强的实践性。而研究发现，现有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未能充分考虑残障学生的特殊需求，导致这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适应。学校和机构方面也未曾充分探究职业教育，成功经验较少，对残障学生兴趣特点的了解不够充分，导致职业教育呈现碎片化；使用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也过于单一，无法充分挖掘开发残障学生的潜能。更重要的是，残障学生职业教育中，未曾对残障学生给予针对性、系统性的支持，未曾基于各个阶段学生的特征设计多层次、渐进式和连贯性的人才培养模式，致使残障学生的实践较少。个性化教育的缺乏，无法满足不同类型残障学生的需求，使其在职业教育过程中难以获得有效的技能提升。

（二）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够完善

职业教育的落脚点在于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人生出彩。残疾学生的残疾类别不同、残疾程度不同，造就了残疾学生的个性特征不同，能力特点不同，学习和成长发展的需求也不同[2]。这就说明，残障学生职业教育中应使用更符合学生发展需求的方式，科学合理规划教学内容。但实际上，当前职业教育专业和课程设置存在许多不足，以至于影响了残障学生的教育效果。一方面，各个特殊教育学校的专业设置同质，缺乏地域与时代特色，也未能充分考虑残障学生的特点，导致学生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比如，对听力残疾的学生开展艺术类的专业教学，对视力残疾的学生开展针灸推拿的专业教学，对孤独症在内的培智类学生开展汽车美容的专业教学。既没有突破传统专业的限制，也没有考虑当地的经济特色，更忽视了残障学生的学习需求。另一方面，课程设置过于理论化，缺乏实践环节；或者所设置的实践教学和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差距较大，且人文类课程相对缺乏，使得残障学生难以掌握实用的技能，而人文常识的缺乏也影响了残障学生的就业发展。另外，部分职业教育的课程内容陈旧，未曾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致使残障学生即使掌握了实用技能，也无法满足行业对人才的需要。

（三）职业教育的资源未曾得到有效整合

在我国，职业教育的资源分配不均，残障学生教育资源尤其匮乏[3]。一方面，有关部门对残障学生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导致教育教学设施、师资力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特殊教育学校、职业院

校、企事业单位、社区服务中心等不同主体掌握的教育资源各自独立，未曾对现有的职业教育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使得残障学生在接受职业教育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

（四）职业教育的联动机制不够健全

职业教育联动机制的不健全，也使得残障学生在职业教育过程中陷入困境。首先，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衔接不够顺畅，导致残障学生在完成义务教育后难以顺利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其次，职业教育与就业市场的联动不足，使得残障学生毕业后面临着就业难题。同时，职业教育内部各层次之间的衔接也存在问题，如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之间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等方面缺乏有效衔接，使得残障学生在教育过程中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技能体系[4]。最后，家校合作、校企合作等是常用的教育方式，有利于残障学生的发展。但目前家校企之间的合作缺乏深度，家长只是被动接受学校管理；校企合作形式更是只停留在讲座、参观、顶岗实习等初级和中级层面，缺乏实质性的产教融合项目，使残障学生的人才培养流于形式。另外，“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有助于残障学生的培养，但许多特殊教育学校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刚刚起步，教师的职业技能及专业素养有待提高。

二、残障学生职业教育“533”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一）明确残障学生职业教育的“533”人才培养理念

“533”人才培养模式中的“5”是指“能力评估—职业体验—校企合作—就业转衔—社会融合”的五渐进教育培养，要求教师对所有残障学生的兴趣爱好、个性需求、操作性技能、沟通技能等进行诊断、评估、观察和记录，再设计个别化的职业教育计划。第一个“3”是指小学、初中、中职的三个阶段；第二个“3”则是指家校社三个主体，在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下，以就业和职业需求为导向，实践基地为载体，在教学、实习、就业融合的协同育人机制下，指导学生进行理论学习、康复训练、顶岗实习[5]。鉴于此，对于残障学生，需要创建良好的教育环境，基于环境教育理念的实施消除社会对残障学生的偏见和歧视，在社会融合归旨下促进残障学生在教育、就业和社会生活的融合。

因材施教、着眼发展的理念强调特殊职业教育学校的教师以残障学生的个性差异、发展特征等为依据，对残障学生进行个性化评估后，制定个性化的教育方案和职业规划，实现对残障学生的定制化培养。同时关注学生的终身发展，帮助学生树立自我学习的意识，为残障学生提供精准和有效的教育服务，使其在适合自己的领域中挖掘潜能，实现自我价值，得到可持续发展。多主体协同、资源整合理念下，需要政府、学校、企业、家庭、社区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提供并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给予政策支持，确保残障学生职业教育的发展得到法律和资金的双重保障。还要打破各方界限，为残障学生提供全面的教育和就业支持，给予残障学生更加丰富多样的学习和实训机会。最大化利用教育资源，在资源的共享中促使残障学生在融合教育下健康成长[6]。

（二）基于社会融合构建促进残障学生终身发展的课堂教学支持体系

社会融合目标下，特殊教育学校应该打破职业教育的壁垒，加强校企合作，依托“工作室”“融合 + 职业实训”等建设实践基地。在以就业为导向、实践课程为核心、实践基地为载体，构建教学、实习、就业融合的协同育人机制，涵盖小学、初中和中职三个阶段后，循序渐进地设置各具特色、系统完整的教育课程，并引进本地业界的优质资源。以“教学做合一”“融合教育理论”为指导，结合集体化和个别化教学，在“集体 + 个体”“必修 + 选修”“基础 + 定制”“特色 + 拓展”等课程的横向设计下，开展康复训练教学、情境拓展教学、生活职业技能教学，构建三阶段式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并完善三阶段式职业教育课程的衔接机制。促使残障学生主动根据个性化的职业发展方案参与校内学习和校外的实习实训，以“融合 + 职业实训”的实践教学体系为基础，校内通过非遗大师工作室完成生产实训和技能比赛，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校外凭借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完成生产实训、项目实训和创业实训，借此解决就业难的问题，提升就业率，达到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无缝衔接的目的[7]。

（三）构建机构、学校、企业、家庭、社区五方协同教育支持服务体系

1. 机构方面

教研机构联合学校、企业、家庭和社区为多元主体，融合行政部门以及学校、企业、家庭和社区等各方面的资源，以残障学生的顺利就业为目标，以特殊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为立足点，以教育计划的设计者、参与者和监督者身份构建沟通和协作的桥梁。以残障学生的职业发展为导向，加强对学校的监督，完善职业教育三阶段式课程计划和个别化就业转衔计划。提升校内外的衔接度，确保协同教育的制定和实施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残障学生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2. 学校方面

学校理应对所有残障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知识技能掌握情况、康复训练状况等进行诊断评估，设计真实存在的相关职业体验课程。基于 OBE 的教育理念合理安排和科学规划残障学生的职业教育与就业转衔，实践五渐进残障学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与酒店、餐饮机构、奶茶店、汽车美容服务、中医按摩店等进行结对合作后指导学生在真实场景中进行职业操作，推动学生见习实习[8]。开放办学，创造融合环境，以实践为残障学生的重要学习方式，创新教学做一体的

教学模式，开展多种形式的融合职业教育。还要以学生的终身发展为导向，职业体验和实践课程为核心，构建“能力评估—职业体验—校企合作—就业转衔—社会融合”的五渐进职业教育育人模式，强调个性化教育，整合所有的实践经验，个性化定制残障学生的职业教育计划。

联合校内外资源，提出个性化、生本化的育人策略，突出育人策略的本土特色，实行校企合作教学，促进学校和企业之间的互惠互利。同时分析校内残障学生的残障类型，包括听力障碍、视力障碍、智力障碍等，加强对各种新兴技术的应用，构建“微课+”的特色教学课程，基于融合教育和特色课程的融合，实现残障学生职业教育的信息化。另外，特殊职业学校可聘请高校教师、残联康复专家进校，由专业的教研员、高校教师、一线名师、残联康复专家以及企业员工为主体，构建专业的师资队伍，创建教育、康复、科研以及就业联动平台。优化课程开发，提供个别化的支持性就业，加强社会资源的融合，实现教科研的以赛促教，从而优化残障学生的职业教育，提升教育质量[9]。

3. 企业方面

校企合作是保障残障学生实习实训的基础，所以企业应该加强和特殊职业学校之间的合作，既要派遣专家进入职业教育学校，加强对特殊学生的指导，使其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职业探索；也要建立实践基地，在校内基地引入适合企业的岗位工种，并派遣专业的工匠大师等入校，以特聘教师的身份组织学生参与实践研究。更要以 OBE 教育理念为基础，在校园内融入非遗，制定师徒制的职业教育支持模式，指导残障学生基于此模式进行非遗的研究，实现产教研融合教学。如此校企双方达成教育共识，优化对特殊学生的培养，增强学生适应职场工作的能力，提升学生的就业信心，从而提高残障学生的就业率。

4. 家庭方面

残障学生的家长应该发挥家庭教育的优势，给予学校支持，在家校联动中制定个别化的家庭服务计划，参与残障学生职业教育的家校实习全过程。以全域课程为支撑，打造残障学生高效融合的教育生态系统，确保职业教育延伸到家庭，推动高效能的家校链接，逐步完善职业教育的支持方案。

5. 社区方面

社区需要创建和谐共融的特殊学生友好社区环境，拓展特殊学生生活场景，为学生提供农贸市场、超市、快餐店、休闲场所、社区医院、交通道路等实践场所[10]。让特殊学生在“引进来，走出去”等方式的指引下，走出校园、融入社区、积极实践。

三、结语

总之，以社会融合为目标和导向，特殊职业学校应创新人才培养理念，构建“533”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和完善课堂教学支持体系、五方协同教育支持服务体系，推动残障学生职业教育深入改革和发展，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

参考文献

[1] 周燕，曹蕾 . 产教融合视阈下职业教育适应性人才培养现状及对策 [J]. 职业教育，2024, 23(06): 20−25.

[2] 王胜，汪彬 . 新《职业教育法》实施背景下职业本科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培养路径探究 [J]. 机械职业教育，2024(03): 30−36.

[3] 郭达，尹晨曦 . 人工智能的“技能—任务—职业”三重替代效应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根本转型 [J]. 教育与职业，2024(06): 54−61.

[4] 槐福乐，杨贺凯 . 一般系统论视域下职业教育贯通人才培养：要素特征、问题检视与实践路径 [J]. 职业技术教育，2024, 45(29): 12−16.

[5] 姜文魁 .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职业教育新商科人才培养研究 [J]. 教育与职业，2024(07): 109−112.

[6] 于扬，牛彦飞 .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内涵意蕴与推进路径 [J]. 教育与职业，2024(03): 42−48.

[7] 车先礼 . 医学院校残障大学生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J]. 现代特殊教育，2021(18): 10−13.

[8] 黄惠娟 . 社会融入背景下高校残障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研究 [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02): 70−72.

[9] 尹士林 . 残障学生就业转衔服务内容研究 [J]. 现代商贸工业，2022, 43(16): 107−109.

[10] 邓珊珊 . 湘西州残障学生体质健康现状、困境与促进策略 [J]. 四川体育科学，2023, 42(01): 70−7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南宁市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五渐进 三阶段 五协同：基于社会融合的残障学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Z−E−2024002）；南宁市中等职业教育 2024 年度 B 类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社会融合的残障学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路径的实践研究——以南宁市为例”（2024B42）。

（作者单位：南宁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高等职业院校资助育人体系的问题检视与优化路径研究
——以嘉兴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李肖肖 许梦阳

摘要：本文系统剖析了当前高等职业院校资助育人体系存在的机制性缺陷、流程性短板和理念性偏差，并结合嘉兴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嘉职院”）的创新实践，针对资助育人体系中存在资助机构专业化不足、对象认定机制粗放、心理帮扶缺位等共性问题，嘉职院通过理念转型、机制创新、文化培育三个维度构建“四级联动”管理网络、实施“动态双化”认定机制和推行全周期育人模式，推动物质帮扶与精神培育深度融合，构建精准化、动态化、人性化的资助育人新生态，破解资助与育人“两张皮”的困境。

关键词：发展型资助；精准认定；心理帮扶；感恩教育；动态追踪

学生资助是关系到教育公平和民生福祉的重要工程。目前，高等职业院校资助已建立以“奖、助、贷、勤、免、补”途径为主体，形成了国家资助、学校奖助、社会捐助、学生自助“四位一体”的发展型资助育人体系[1]。为进一步了解并把握高等职业院校资助育人体系运行状况和了解受资助学生的基本情况和思想意识现状，本研究采用网络问卷调查的形式，面向嘉职院的400名资助对象进行了现状调查和研究，并通过访谈资助工作人员等形式了解受助学生情况和资助育人体系运行情况。

调查显示，受资助学生多来自农村，经济基础薄弱，面临经济、学业、人际等多重压力，部分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存在心理障碍。学生对资助政策了解不主动、不全面，84.47%的学生表示对资助政策一般了解或不了解，多数通过被动方式知晓政策，且多数学生对资助评定程序不清楚，反映出资助评定工作存在不规范、不严谨问题。

在教育资助成效方面，87.8%的学生表示接受资助后心理压力缓解，68.9%的学生表现良好，能发挥带头作用，95.1%的学生能合理运用受助金额，40.8%的学生通过勤工俭学减轻家庭压力。然而，部分学生存在感恩、诚信和自强意识淡薄问题，如认为被资助理所当然、存在不诚信行为、资助资金使用不合理、缺乏学习生活主动性等。

一、资助育人体系的现实困境解析

（一）组织架构与资源配置的失序化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资助工作机构建设的通知》（教人〔2006〕6号）明确要求，各高校必须成立专门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并配备相应的专职工作人员[2]。但部分高职院校未设置独立资助部门，多采用“学工处兼管”模式，部分高职院校的资助工作甚至完全依附于学生工作处的其他职能，如招生、就业等，导致资助工作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严重不足[3]。有些高职院校的资助工作由学工处的一名辅导员兼任，该辅导员同时负责学生宿舍管理、奖学金评定等多项工作，难以集中精力专注于资助育人体系的优化与创新。专职人员配比远低于1∶2500标准，这种结构性缺失导致工作重心偏移，物质发放占据80%以上精力，心理帮扶、社会实践等育人模块被严重挤压，形成“重发放轻培育”的恶性循环。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也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被大量投入物质帮扶环节，如助学金的发放、学费减免等环节，而对于心理帮扶、能力发展、感恩教育等育人环节，缺乏足够的支持和投入。资源配置的失衡，不仅影响了资助育人体系的整体效能，也限制了受助学生的全面成长。

（二）对象认定机制的形式化

现行认定体系过度依赖使用通用的界定标准来量化指标。虽然量化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认定的效率和客观性，但这种单一的标准未能充分考虑地域经济差异，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4]。某些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家庭收入可能略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但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其实际经济负担可能远大于来自经济发

达地区的学生。另外，一些特殊困难情况，如家庭成员突发重病、自然灾害等，往往无法通过量化指标进行准确评估。

民主评议环节存在“人情票”“轮流获助”现象，导致资助对象库出现数据冗余且不准确，严重背离精准资助原则[5]。原本民主评议环节是通过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监督，用来提高资助认定的公正性和准确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人情关系、利益驱动等因素的影响，民主评议往往难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有些学生可通过拉票、请托等方式获得较高的评议分数，而真正需要资助的学生可能因为自卑和不善交际与表达不能获得该有的支持。

（三）育人效能的虚化

传统资助模式将“经济解困”等同于“育人成效”，忽视学生心理资本培育。调查显示，68.42% 的受助学生对目前的生活感觉不是很满意，他们大多因为经济原因存在自卑心理，并且缺乏职业发展规划[6]。经济解困虽然是资助工作的核心目标，但并非其全部任务。资助工作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经济支持，帮助学生克服经济困难，实现全面成长和发展。然而，传统资助模式往往过于注重经济解困，而忽视了对学生心理资本、能力发展、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培育[7]。这种片面的资助观念，不仅难以真正满足学生的成长需求，也限制了资助育人体系的整体效能。

部分院校虽开设感恩教育类课程，但大多数都流于形式，未能建立“资助—成长—反哺”的闭环机制，受助学生毕业后参与公益活动的比例不足，育人效果转化率不高。感恩教育作为育人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资助工作者通过教育引导学生珍惜资助机会，勤奋学习，回馈社会。然而，现实中部分院校的感恩教育往往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和有效的实施方式与途径。部分院校仅通过开设几场讲座、组织几次活动来开展感恩教育，而未能将感恩教育与学生的学习、生活、实践等紧密结合，难以形成“助人自助、自助助人”的良性循环。

二、资助育人体系的重构路径探索

（一）组织架构优化：构建“四级联动”管理网络

专业的资助队伍建设是推动资助工作良性循环的必要前提，是高等职业院校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的重要保障。嘉职院创新实施“党委领导—学工部统筹—院系专责—班级落地”四级管理体系，配备专职资助人员 9 名，建立班主任兼职资助队伍。通过设立辅导员、班主任工作室项目，激励二级学院开发特色育人项目，形成“校级统筹 + 院系创新 + 班级执行”的良性互动，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政策执行精准度。

在构建“四级联动”管理网络的过程中，嘉职院注重发挥各级管理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委作为领导核心，负责总体规划和政策制定；学工部作为统筹部门，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和协调，要做好年度资助计划，确定资助目标和重点、预算规划和资金筹措、制定资助计划实施方案等；院系作为专责单位，负责根据专业特点和学院特色，开发具有针对性的育人项目；班级作为落地单元，要善于主动发现各个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和问题，并将发掘到的问题及时反馈至上级资助管理人员，做到协调配合，将各项资助政策和育人措施落实到每一位学生。

（二）认定机制革新：实施“动态双化”认定

精准识别是资助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资助认定工作中规避“伪贫困”学生的重要手段。嘉职院通过充分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特殊经济困难和学生发展潜能三个方面的因素，构建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 特殊经济困难 + 学生发展潜能”三维评估模型，开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画像系统，通过消费记录、地方低保线等多源数据交叉验证，提高认定准确率，使得认定工作更加全面、准确。三维评估模型在评估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时，即使他们的家庭收入略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也可以根据其特殊经济困难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给予适当的资助。同时，对于学生发展潜能的评估，可以及时掌握受助学生的实际想法及精神需求，进一步激励受助学生努力学习、提升自身能力，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三）育人效能提升：打造“全周期”育人链

嘉职院通过“阳光心理工作坊”等项目，构建“心理测评—团体辅导—个案干预—成长追踪”四阶干预机制，建立受助学生心理档案库。通过前置性心理测评及时发现受助学生的心理问题并进行干预，并依托团体辅导帮助受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和人际交往能力，针对个案干预，为受助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建立动态成长档案，持续关注受助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并进行动态调整。心理帮扶体系的建立，为受助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心理健康服务，从而提高受助学生心理韧性。

嘉职院构建“三位一体”感恩教育模式，通过立体化育人场景实现价值引领与实践育人的深度融合。该模式以“励志讲堂”激发受助学生的感恩意识和奋斗精神的内驱力，通过“公益实践”感受社会的关爱和温暖，用“榜样引领”形成朋辈示范效应，形成多维联动的感恩教育生态。配套推行“受助学生成长档案”制度，动态记录学生诚实守信、社会服务和技能提升等成长轨迹，构建“资助赋能—实践成长—责任反哺”的闭环式培养模式，通过场景浸润、实践感知与榜样示范的协同作用，将资助政策的价值引导功能转化为受助学生的内生行动自觉，实现感恩教育从认知觉醒到行为自觉的有效跃迁。

嘉职院通过整合“企业奖学金”激励与“勤工助学 + 专业实训”实践平台，构建受助学生能力发展支持体系，提升受助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形

成“助学—赋能—自立”的闭环培养链。学校积极与本地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建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立学徒制班，为受助学生提供系统的职业素养培训和指导，同时设置“企业奖学金”和“勤工助学+专业实训”双轨岗位，让学生在获取经济支持的同时实现技能进阶。部分优秀学生更被合作企业提前锁定岗位，真正实现从受助到自强的跨越式发展。

三、发展型资助模式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启示

（一）理念转型：从“保障性资助”到“发展型资助”

新时代资助工作应超越单纯经济帮扶，构建“经济支持+心理赋能+能力发展+精神培育”的四维发展型资助育人体系。这就要求资助工作需要全面性和系统性，不仅要关注受助学生的经济需求，更需要关注受助学生的心理需求、能力需求和精神需求。通过经济支持，确保受助学生获得稳定的生活保障与公平的学习条件，解决生存性需求，为个体发展提供基础支撑。运用心理赋能，通过团体辅导、认知行为训练等专业干预，帮助学生在逆境中建立心理弹性，形成对生命价值的积极认知，帮助受助学生建立健康的心理状态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利用能力发展，整合企业导师制、学徒制等实践学习模式，提升受助学生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二）机制创新：从“粗放管理”到“精准治理”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实现“精准识别—动态调整—成效追踪”的全流程管理。精准识别是进行发展型资助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要利用好全国学生资助管理系统和浙江省学生资助“一窗受理”平台大数据，精准排摸中央下发的重点关注对象学生，并及时将其纳入资助库中，确保一个不少。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年度常规认定和学期动态调整将资助认定工作精细化、人本化。定期对资助对象学生进行资格复查，并随机抽选一定比例的资助对象，通过家访、个别访谈、大数据、信函索证、量化评估等方式进行核实。如发现弄虚作假、夸大或谎报瞒报家庭经济困难等现象，一经核实，取消资助资格，保证资助对象库的实时更新。运用智慧校园建设和信息化管理，建立“数字化”追踪机制，聚焦受助学生经济困难的改善情况，学业进展及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关注专业技能与学业水平的提升，深入考查学生人格塑造、心理健康以及诚信感恩、自立自强、积极奉献等精神品质的培养，为精准资助提供有力支撑。

（三）文化培育：从“单向给予”到“双向互动”

构建“受助—自助—助人”全周期育人链，通过心理帮扶、感恩教育和能力发展等载体形式，强化经济困难学生群体的心理韧性，帮助受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心理品质，使其积极接纳自我；培养学生的自立自强和知恩图报意识，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促进感恩教育由认知内化到行为外化的自然转化；使学生在接受经济援助的过程中同步提升职业技能水平，提升受助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让原本单方面的“输血”，变成双向互动的“造血”机制，形成“解困—育人—成长—反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四、结语

高等职业院校资助育人体系的优化，是践行教育公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举措。研究表明，唯有通过理念转型、机制创新和文化培育三重路径协同作用，方能在物质帮扶与精神培育之间架设桥梁，实现“解困—育人—成长—反哺”的发展型资助目标。同时，高等职业院校资助育人体系的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只有通过多元主体的联动协作，才能在经济支持、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间形成良性循环，共同推动高等职业院校资助育人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伍晓敏 . 高职院校双线资助育人工作路径研究 [J]. 传播力研究 , 2020, 4(07): 153-155.

[2]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资助工作机构建设的通知 [J].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 2006(12): 33.

[3] 周波 , 徐榕 . “十四五”时期高校学生资助工作队伍建设的探讨——以广西医科大学为例 [J]. 经济师 , 2023(05): 168-170.

[4] 李芃霏 , 李培 , 尧瑶 , 等 .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智慧化精准认定模式研究 [J]. 大学 , 2024(22): 98-101.

[5] 周璐莹 .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认定工作规范化路径探析 [J]. 科教导刊 , 2024(02): 40-42.

[6] 邹嫦仙 , 刘钱凤 . 基于资助育人视角下高校学生心理资本培育 [J]. 公关世界 , 2025(02): 48-50.

[7] 闫晓萌 , 邸嘉禹 . 心理资本视域下高校发展型资助育人体系的建构 [J]. 林区教学 , 2024(06): 42-4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浙江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大思政’背景下高职院校发展型资助育人实施路径探究”（Y202352184）；2022 年浙江省学生资助调研课题“高等职业院校资助育人体系状况的调研——以嘉兴职业技术学院为例”（2022109）。

（作者单位：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养老模式与传统孝道文化的关系研究
——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

李　丹　张嘉艺

摘要：本文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出发，探讨现代科技发展下的智慧养老新模式对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对策。通过分析我国当前老龄化社会发展现状，明确传统养老模式与孝道文化面临的现实挑战，并系统阐释智慧养老新模式的核心特点。将传统孝道与新型智慧养老模式进行对比，剖析老龄人群中的情感联结被削弱、代际数字鸿沟、伦理困境等相关问题，采取守正创新、面向未来的态度，在贯彻落实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寻求新型养老与传统养老相辅相成之路，促进智慧养老模式和中华优秀传统孝道文化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智慧养老；养老模式转型；孝道文化

一、老龄化社会中的养老模式转型与文化传承

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 2024 年末，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已突破 3 亿人，占总人口的 22.0%，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达 2.2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 15.6%，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这一人口结构变革发生在我国经济尚处于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对传统养老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智慧养老”概念应运而生，它通过技术手段将老人、社区、医护人员、医疗机构和政府服务机构组成有机整体，为老年人提供便捷、高效、智能化的养老服务 [1]。

孝道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其核心内涵包括“养亲敬亲”，即物质供养与精神敬养的统一。传统孝道不仅要求子女从物质上保障父母的衣食住行，更强调发自内心的敬爱之情，如孔子所言：“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种以家庭为本位、强调责任的伦理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解决养老问题的道德和行为准则。

然而，社会转型带来的家庭结构变化、人口流动加速以及价值观念多元化，正在深刻改变传统的养老模式。一方面，“421”家庭结构（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日益普遍，使得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面临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的改变，使得传统孝道观念受到冲击，出现了“重幼轻老”的失衡现象。在此背景下，智慧养老的兴起为应对老龄化现状提供了解决方案，也对传统孝道文化提出了创新与适应的要求。

二、智慧养老模式的内涵与发展现状

智慧养老以新技术为支撑，创新养老方式，相比于传统养老模式而言，其主要具备物联化、互联化和智能化的特点。它是通过智能终端设备获取到老人日常生活中的信息，并且运用云计算技术分析和处理后提供的养老服务，是一种具有针对性的服务模式。智慧养老系统主要由三大板块组成：第一为数据采集板块，即通过穿戴设备、家中物联化传感器等终端，将收集到的老人数据上传至云端；第二为数据处理板块，即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对云端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第三为线下照料服务网络板块，通过前两个板块的技术支撑与数据反馈，保障老年人享受到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通过三大板块的协同联动，将智慧养老系统打造成“系统 + 服务 + 老年人 + 终端”的生态体系，进而形成无围墙的“数字化养老院”。

当前我国的智慧养老主要呈现三种实践模式：居家智慧养老、社区智慧养老和机构智慧养老 [2]。居家智慧养老通过智能家居改造和远程监测技术，使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享受专业化服务；社区智慧养老以社区为中心，通过线上线下连接各服务机构和居家养老个人，是当前的主流模式；机构智慧养老则是在养老院等集中居住场所应用智能管理系统，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这三种模式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覆盖不同需求层次的智慧养老网络（见表 1）。

可以说，目前智慧养老技术应用贯穿于养老服务全过程：在健康管理中，利用智能手环、床垫传感器等手段实现 24 小时动态监控老年人心率、血压、睡眠等情况，并能及时发现问题；在安全保障上，利用跌倒检测、紧急呼救、电子围栏等功能，最大限度降低独居老人事故发生率；在生活服务上，运用智能语音助手、一键预约等功能便于老人享受更加便捷的送餐、保洁、维修等服务；在社交互动上，借助视频聊天、线上社区功能缓解老人孤独感，弥补现有传统家庭养老缺乏的社交环节。很多养老机构针对失能或患病老人的需求，在现有智能养老体系中增加了适配功能，并推出智能医疗器械等科技养老服务产品。

表 1 智慧养老与传统养老模式比较

比较维度	传统养老模式	智慧养老模式
服务主体	以家庭成员为主，社区和机构为辅	多元主体协同（家庭、社区、机构、技术平台）
技术应用	基本无技术介入或简单辅助	广泛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服务方式	以人工服务、面对面照料为主	线上线下结合，智能化、远程化服务
信息传递	信息滞后，沟通效率低	实时监测，数据驱动决策
覆盖范围	受时空限制大	突破时空限制，服务可及性高
成本效益	人力成本高，规模效应有限	初期投入大，但长期具有规模效应

三、传统孝道文化的核心内涵与当代价值

孝道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伦理基石，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其历史可追溯至周代。在周初，“孝”主要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尊祖敬宗”，即通过祭祀表达对祖先的追念；二是“传宗接代”，确保家族血脉的延续。这种原始的孝道观念随着儒家思想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系统化，至孔子时代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伦理体系。儒家所倡导的孝道核心是“善事父母”，具体表现为“能养”（满足父母物质需求）、“诚敬”（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悦亲”（使父母精神愉悦）三个层面。从只讲求物质供养，到同时重视精神敬养的演变，构成了中国传统孝道的精髓。

从思想内涵分析，传统孝道是一套多维度、多层次的伦理规范体系。根据《孝经》《论语》等经典文献的记载，完整的孝道实践包括“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三个环节，涵盖了父母生前死后的全部责任。具体到养老层面，传统孝道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敬亲”，即对父母保持敬爱之心，这是孝道的灵魂所在，如孔子强调“色难”，要求子女侍奉父母时保持愉悦的神情；二是“奉养”，保障父母的物质生活，这是孝道的基础，《礼记》明确提出“生则养”的基本要求；三是“侍疾”，在父母患病时精心照料，《论语》中记载“病则致其忧”的孝子行为准则；四是“善终”，妥善处理父母后事并定期祭祀，实现“慎终追远”的道德传承。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从生前到身后的完整孝道实践体系。

传统孝道的社会功能不仅限于家庭伦理范畴，还具有重要的社会稳定和文化传承意义。在中国传统社会，孝道既是“修身齐家”的道德基础，也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3]。中国古代的许多朝代都将孝道列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通过褒奖孝子、制定养老制度等措施弘扬孝道，在周代有“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的等级分明的养老制度，在汉代采取“举孝廉”为主的选官制度，将孝道提升为官员选拔的重要标准，“举孝廉”甚至一度成为入仕的主要方式，当时流行的句子“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正是由于“孝”被扩大化以后，所有的人都要守孝道，才实现了“移孝作忠”的政治伦理机制。不仅如此，孝文化强调了代际间的责任和延续家族的传统，这有助于维持稳定的人口再生产功能及劳动形态，最终保障社会的延续。

现如今，传统孝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转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家庭结构核心化、人口流动加速、价值观念多元化等现象引发社会变迁，使得传统孝道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流导致大量“空巢老人”出现，传统家庭养老功能严重弱化[4]。这些变化使得单纯依靠传统的养老模式已难以应对当代社会的养老挑战。

从当代价值来看，孝道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需求层面看，当前社会普遍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较以往有显著改善，但对老人而言，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们更渴望获得情感关注，因此相较于单纯的物质供给，源自内心的情感关爱与精神慰藉，更能契合其晚年生活的核心需求。二是孝道文化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大爱思想是社会化的养老院发展服务的思想基础，有利于创建代际和睦的社会环境。三是孝道文化里面的责任意识与感恩思想，是培育青少年的道德品行和健全人格所不能缺少的教育资源。四是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完善，在社会保障制度还不是很健全的前提下，孝道文化仍然在支撑着我国的家庭养老行为，在社会保障没有实现全覆盖的背景下，孝道文化在我国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孝道文化是家庭养老的重要基础。

四、智慧养老对传统孝道文化的冲击与挑战

（一）传统孝道文化的情感联结被削弱

当养老过程过度依赖智能设备和数字平台时，人际互动可能被简化为数据交换和远程监控，导致孝道实践中的情感联结被削弱。传统孝道文化特别强调“敬亲”和“色难”，即子女侍奉父母时应有的恭敬态度和愉悦神情，而智慧养老中的远程监护、自动化服务等技术应用，虽然提高了照护效率，却可能在不经意

间过滤掉了这些细微但至关重要的情感交流。一些调查研究发现，部分子女在为父母安装智能监护设备后，探望频率和情感交流反而减少，形成了“技术依赖型孝道”，即通过技术手段替代亲身关怀的现象。这种倾向如不加以引导，可能导致孝道实践的形式化和空心化，背离了“孝之为孝，在于心而不在于迹”的文化精髓。

（二）代际数字鸿沟成为一大挑战

很多老年人本身缺乏数字素养，且因年龄较大不会使用智能设备，即便购买了相关产品，也需要借助子女或年轻人的“二次”协助才能正常使用。这样的做法反而强化了老年人的“技术弱势”，并逐渐减弱其使用智能设备的主体性，降低自我价值感。而传统的孝道讲究敬亲，“敬”的本质是尊重父母等长辈的人格尊严和主体性，在技术鸿沟的影响下，会让老年人更加觉得被绑架在“智慧养老”系统中，在被他人指导甚至支配中，无法自主做决定。更重要的是，如果技术更迭的速度大于老年人学习技术的速度，长此以往便会导致老年人感觉自己被排斥在外，产生“被边缘化”“没用了”等情绪，因而强化了老年人被动性的年龄刻板印象，而这一点又违背了传统孝道文化的美好愿景——老有所尊。

（三）伦理责任的重新界定

智慧养老引发的伦理责任重新界定，也对传统孝道文化构成了深刻挑战。传统孝道将赡养父母视为子女不可推卸的道德和法律责任，如孟子所言：“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这一责任观在传统社会中深入人心；而在智慧养老模式下，部分养老责任转移给了技术系统和服务机构，这种责任转移可能模糊子女的孝道意识，导致责任分散或推诿现象。更值得警惕的是，当技术解决方案变得便捷且“可购买”时，孝道可能被商品化、外包化，经济能力而非道德自觉成为履行孝道的主要参考因素，这与孝道文化强调的“诚于中而形于外”的道德自律精神存在价值冲突。

五、智慧养老应对之策

（一）智慧养老设计要更加注重“情感化设计”

物质供养层面，智慧养老极大提升了孝道实践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传统孝道文化将“能养”作为基本要求，但更强调“敬亲”和“悦亲”，认为精神关怀比物质供养更具道德价值。因此，智慧养老产品要更加注重“情感化设计”，如设计模拟拥抱的智能枕头、记录家庭记忆的数字相册等，将技术应用与情感需求有机结合，加强子女与老人的情感连接，减少因过度依赖智慧养老技术、缺乏情感互动而导致的老人孤独感。

（二）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要加强研究与开发

针对代际数字鸿沟问题，平台服务开发设计人员需要深入调查了解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和生活习惯，为服务设计提供依据，让智慧养老各项服务更具有针对性[5]。如针对老年人的技术适应能力，设计人员可以开发更为友好的应用程序，使用大字体，简化功能操作，使用语音助手等，帮助老年人及时解决问题。相关机构可以定期开展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数字技能培训课程。通过简单易懂的教学方式、示范与互动相结合，逐步提高老年人的数字素养，减少其对智慧养老服务的排斥心理。

（三）智慧养老服务中需更多挖掘传统孝道的丰富内涵

对于传统道德和现代科技发展之间的冲突，智慧养老要推动传统孝道文化的传承与当代实际需求相融合，在转化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找契合，在追求传承中体现时代性。例如，通过“线上 + 线下”结合的形式开展系列文化活动，通过此类活动搭建亲子见面会、家庭会议等互动平台，让年轻人与老人更多地联系在一起，真正在日常生活中发扬传统孝道观念，弘扬和传承几千年来深入千家万户、世代相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实做到与时俱进地为老年人办实事、办好事。

六、结语

智慧养老为传统孝道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在数字化日益普遍的今天，这种新形态虽然改变了传统孝道的表现形式，但依然保留了其“养亲敬亲”的核心价值。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建立与智慧养老相适应的新型孝道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既肯定技术应用的合理性，又强调情感交流的不可替代性；既接受养老责任的社会化分工，又保证子女亲情的主体地位；既拥抱技术带来的便利，又警惕技术可能引发的弊端。只有这样，智慧养老才能真正成为传承和发展孝道文化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1] 张泽鸿 . 智慧赋能养老服务的驱动要素、转型逻辑、实践困境与对策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44(03): 64−74.

[2] 蔡政儒 , 杨晓波 . 智慧养老的现状及其未来应用模式研究 [J]. 科技资讯 , 2023, 21(03): 241−244.

[3] 徐莹莹 . 中华传统孝道文化的现代价值与创新 [J]. 嘉应文学 , 2025(05): 126−128.

[4] 张砚 . 创新社会养老服务管理促进新疆和谐稳定——昌吉地区社会养老服务调研 [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上旬), 2014, 30(08): 136−137.

[5] 孙承新 , 赵德雷 . 智慧养老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养老方式的融合与创新 [J]. 国际公关 , 2025(02): 41−43.

（作者单位：山东城市服务职业学院）

智能化时代背景下老年语言权力的社会缺位现象研究

陈佳银 金琳华

摘要：本文研究智能化背景下老年语言权力的社会缺位现象，并深入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在研究过程中，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来收集相关数据，并借助 SPSS 软件对所获取的数据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致使老年人语言权力出现缺位的原因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交际用语不同导致信息交流滞涩；其二，老年人自身提升语言能力的意愿较低；其三，社会层面提供的语言服务尚不完善。最后针对这些原因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对策，这对于改善老年人语言权力缺位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智能化时代；老年语言权力；社会缺位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群体在社会中的比例逐年上升；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与公共服务的融合，推动社会不断走向智能化。然而，信息化时代科技产品设计与老年用户能力不匹配导致的技术门槛、语言障碍等问题，使老年用户未能充分享受这些科技带来的便利[1]。

近几年，老年语言学研究逐渐引起业内学者的关注和重视，研究内容多集中于老年人语言能力、语言服务、语言福利等方面，研究方法包含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也有新兴的临床技术应用，涉及多个学科交叉领域[2]。语用话语研究作为老年语言学的重点维度之一，兼具理论与应用价值[3]。

（二）研究意义

老年语言应用研究揭示老年语言使用特点和规律，探讨语言与老年人认知、心理、生理及社会文化的关联，为老年人提供更优质的语言服务和支持，对增强社会包容性及促进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老年人语言生活的研究也促进相关领域的交叉融合、促进相关学科理论发展[4]，对构建老年语言福利体系，保障老年人的语言福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老龄人口科技语言服务的重要性，分析老年群体使用智能设备时遇到的语言障碍，有助于提升科技产品的适老化水平，满足老龄用户的实际需求[5]。

（三）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老年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现仍处于起步阶段。2019 年，顾曰国、黄鹤立等学者正式提出老年语言学的概念，推动了老年语言学的研究。国内研究较少涉及语用话语层面，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的语言能力、语言服务需求、语言技术应用等方面。在老年维权话语研究方面，黄萍提出了老年维权话语的内涵和研究意义，从语言学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视角规划了老年维权话语的研究议题，并提出了质性研究和整合性多模态研究路径[6]。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老年语言服务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实证研究不足、需求调查缺失、研究与实践脱节等问题。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关注在智能化背景下老年语言权力的社会缺位现象，并提出可行性的对策。具体研究问题为：1. 老年群体语言缺位现象为何出现；2. 老年群体在日常语言方面普遍存在的困扰；3. 针对老年语言权力缺位现象的可行性对策。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来收集语料信息，并借助 SPSS 数据分析法对所获取的数据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

语料收集时间为 2024 年 7 月至 10 月，通过走访农村老年人居住区、城市敬老院的 60 岁以上老人，共计发放 300 份纸质问卷，范围涵盖城市与农村、不同年龄段、不同教育程度的老人，回收有效问卷 294 份。问卷在问题设计上，收集了老年群体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普通话使用情况、上网情况等信息，对老年群体有了初步的了解，访谈问题聚焦老年人出行沟通情况，并了解老年人提高自身语言能力的意愿。问卷问题设置简洁，篇幅较短，字体较大，适合老年人参与调查。

三、研究分析

（一）基本情况

问卷研究对象的年龄集中在70~79岁（38.44%），其次是60~69岁（35.37%），最少的是80岁以上（26.19%）。女性占比略高于男性，分别为58.16%和41.84%。受访者的教育背景较为多样，其中高中（含中专）教育完成者最多，占23.13%，其次是初中教育完成者（27.21%）；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定比例的受访者仅有小学或更低的教育水平，甚至有少数人未曾接受过正规教育。

（二）语言认知情况

以问卷中Wi-Fi、刷脸、扫码、扫描、蓝牙五个词为例，通过频数分析得出，在294位受访者中，“刷脸”与“扫码”是被广泛认知的技术术语，特别是“刷脸”与其他技术结合的认知率最高，尤其是“刷脸、二维码”的组合最为常见（11.90%）。相比之下，与Wi-Fi相关的选项虽然出现频率较高，但大多以较低的比例分散在多个组合之中。受访者对“蓝牙”技术的认知相对较少，通常与其他技术共同提及。值得注意的是，有7.48%的受访者表示对列出的所有技术都不熟悉。整体来看，人脸识别和二维码技术在这批受访者中有较高的普及率。

（三）语言基本情况

频数分析结果显示，在294位受访者中，有52.38%的人表示他们平时不会使用手机上网，仅有47.62%的人表示他们会使用手机上网。这表明受访者中超过一半的人不经常或根本不使用手机进行网络活动，显示出在这一群体中存在着明显的数字鸿沟。

普通话使用能力方面，有57.48%的人在日常交流中主要使用方言，42.52%的人则主要使用普通话。这反映出在该地区或社群中，虽然地方方言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普通话作为一种通用语言也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在受访者中，能够流利讲普通话或是能够讲大部分普通话的人合计超过了半数（53.74%），另有22.79%的人只会讲一小部分普通话，剩余23.47%的人则完全不会讲普通话。在普通话听力理解方面，能够完全听懂或是听懂大部分普通话的受访者都占21.77%，有28.23%的人表示只能听懂一小部分普通话，而19.05%的人则完全听不懂普通话。综合来看，尽管有一部分受访者在说普通话方面存在困难，但在听懂普通话的能力上，大多数人至少能够理解部分内容，显示出较好的语言适应性和交流潜力。

在294位受访者中，有36.73%的人表示会因为听不懂年轻人说话而感到难以融入，显示出代际沟通中可能存在的挑战。

（四）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

1. 信度分析

表1数据表明，在一个包含10个项目的量表中，通过对294个样本进行分析后，得到了Cronbach's α系数为0.896的结果。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通常认为Cronbach's α值大于0.7即表示量表的可靠性较好，而这里的0.896更是指向了一个非常好的内部一致性水平。这意味着量表中的各个项目在测量同一概念时表现出了良好的一致性。

表1 Cronbach's α 信度分析

项数	样本量	Cronbach's α 系数
10	294	0.896

2. 效度分析

KMO（Kaiser-Meyer-Olkin）测度值为0.873，表明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同时，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5127.105，自由度（df）为153，p值小于0.001，说明数据显著偏离了球形分布假设，进一步支持了因子分析的适用性。

四、造成老年语言权力在社会中缺位的原因

通过调查，造成老年语言权力在社会中缺位的原因大致可归为三个方面：一是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交际用语障碍，二是老年人对于提高自身语言能力的意愿较低，三是社会层面语言服务不完善。

（一）交际用语之间的障碍

调查显示，很多老年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部分老年人从未接受过教育。与现今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相比，基础教育的缺失首先会使他们在语言上就与年轻人产生隔阂，从而使老年人群体难以理解一些流行语。

调查显示，在294名受访者中共有169人在日常生活中用方言进行日常交流，占总人数的57.48%，由此可见，很多老年人日常更习惯于使用方言，这是他们的语言使用舒适区。

根据语言基本情况的频数分析结果，在相同的受访者群体中，普通话使用能力与听力理解存在较大差异，有相当一部分老人只会小部分普通话，甚至完全不会普通话。如果将范围局限在农村，不会讲和不理解普通话的比例将会呈现出一个惊人的数值。在当今社会，年轻人不会讲方言已是普遍现象，与之相对的，不会讲、不理解普通话的老人同样存在。虽然成长生活在同一个区域，但交际语言的不同却能将双方隔开，导致一方发出的信号难以被另一方接收。

而不会使用普通话的老年人显然在这个社会里更寸步难行。由于语言障碍，他们难以理解社会中出现的新名词、新事物。Wi-Fi及“刷脸”“扫码”“扫描”“蓝牙”等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汇，但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词汇仍具有一定挑战性。虽然智能化时代的到来让老年群体接触到一些网络用语，但仍有一部分受访者对列出的所有技术术语都不熟悉。

（二）老年人对于提高自身语言能力的意愿较低

除了交际语言上的障碍之外，老年人提高自身语言能力的意愿较低，也是导致语言权力缺位的一个重要因素。调查走访发现，老年人提升自己语言能力的意愿与年龄、受教育程度及居住地紧密相关。居住在农村地区、年龄在 80 岁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是受访群体中意愿最低的群体。

在访谈中，很多农村的老年人谈及是否想要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时表现出很无奈的神色，他们认为“几乎不和外界联系了，记性也不好，学普通话没什么必要”“村子里都是认识的人，用方言也能交流，没能力学普通话，也没必要学”。

数据显示，大部分老年人的交流舒适区是使用方言。对于他们而言，方言是长期使用的语言，并在日常活跃的生活社区中依然适用，因此他们认为学习普通话并非必要。并且随着步入老年期和年龄的增长，不可避免的身体机能下降会导致老年群体意志衰退、情绪消沉[7]，产生对新事物力不从心的消极心理，从而不愿意也不敢去尝试提升自身的语言能力。

由于受教育水平、时代经历、新事物接受程度等因素，老年人本就与如今的智能化社会存在一定的脱钩风险。而当老年人不愿意提升自身的语言能力时，他们很有可能与当前社会脱节，从而导致其语言权力无法复位。

（三）社会层面语言服务不完善

在对老年人进行调查后，我们也设计了针对年轻群体的问卷，共收集 204 份问卷，问卷结果显示，22.06% 的年轻人认为与老年人交流十分困难，在现代技术（如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等）对老年人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的影响方面，35.78% 的受访者认为现代技术对老年人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产生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智能化设备和网络用语的产生增加了沟通上的困难。在老年人在智能化时代是否也需要语言权力的问题上，约 40.69% 的受访者认为老年人不需要在智能化时代拥有语言权力；在年轻人是否有责任帮助老年人更好地适应现代语言和技术环境的问题上，29.41% 的人选择“是”，43.14% 的人选择“否”，27.45% 的人选择“不确定”。可见，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认为没有义务帮助老年人适应现代环境。因此，社会层面语言交流与服务的不完善，进一步导致了老年群体在语言方面与社会的脱节。

五、针对老年语言权力缺位现象的可行性对策

对于社会个体，加强老年人与其他年龄段人群的交流互动，促进跨代沟通，减少交流障碍。老年人语言表达力和听力的下降不可避免，其他年龄段人群应将心比心，在与老年群体沟通中应更加耐心细致，同时可以使用辅助工具或技术提升沟通质量。根据调查显示，近九成老年人遇到语言沟通障碍时，倾向于向固定的 1~2 个家庭成员或朋友寻求帮助[8]，老年个体社会网络中所关联的人群是老年人最信赖的求助对象。

对于科技企业，应当正视老年群体服务需求，贴合老年人实际处境，推出符合老年人生理特征的产品，努力缩减媒介使用与信息交流中存在的数字鸿沟，如开发适应不同方言的语音检索识别技术、绘制简明清晰易理解的文字图标、配备不同方言版本的语音助手等。在推出适老化产品后，也应定期进行产品调研，不断优化产品。

对于政府、社区等，可以通过老年人易接受的方式，如短视频，为他们开展相关培训和科普教育，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和利用现代智能化技术，提升其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建立完善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推动社会向老年友好型社会转变，提升他们的参与感和生活质量。医院、银行等公共服务场所，也应当实时配备足够的、熟悉当地方言的工作人员陪同老年人办理业务，完善陪诊制度。对于老年群体，也要积极与之交流，在日常生活中鼓励他们学习普通话，积极融入智能化时代。

六、总结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积极应对老龄化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本研究旨在探究智能化时代下老年人在日常交际与机构交际中的语言权力缺位问题。老年人提高语言能力的意愿较低、社会层面语言服务不完善等原因加剧了老年语言权力的缺失。因此，代与代之间应当加强沟通；科技企业应推出适老化产品；政府、社区应建立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推动社会向老年友好型社会转变，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郑慧敏 . 面向老年用户的智能产品语音交互体验设计研究 [D]. 成都 : 西南交通大学 , 2020.

[2] 魏婷婷 . 国内老年语言学研究综述 [J]. 汉字文化 , 2023(02): 17−19.

[3] 黄立鹤 , 杨晶晶 . 老年人语用话语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 2020, 43(06): 18−25.

[4] 张瑞涵 . 锦州老年人语言生活调查研究 [D]. 长春 : 吉林大学 , 2024.

[5] 陈祥雨 , 骆韵如 . 后信息化时代老龄人口科技语言服务问题与对策 [J]. 黑龙江科学 , 2022, 13(19): 30−32.

[6] 黄萍 , 焦健 . 老年维权话语研究的内涵、议题和路径 [J].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2, 45(06): 57−65.

[7] 王兰 . 老龄化社会下老年心理变化的应对 [J]. 肝博士 , 2022(03): 32−33.

（下转 47 页）

儿童心理健康及特点分析

马英轩

摘要：童年是每个人生命历程中最美好的时期，该时期的家庭氛围、教育形式、社会交往对人的心理发展影响是长远的。美好的童年可以治愈人的一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一辈子治愈。儿童心理包括情绪、行为、学业畏难、心理健康问题等，儿童心理健康情况不仅影响一个人童年，还对其今后成长、生活、工作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理解童年心理问题，采取科学的应对策略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文章进一步探究儿童心理健康现状及特点，提出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提升策略。

关键词：儿童；心理健康；心理特点

儿童阶段对周围事物有了新的观察力和思考，他们会从他人的态度、从自己的角色中认清自己，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兴趣爱好、独特个性和能力，进而意识到与他人的差异，找到自己，认可自己。如果在儿童阶段家人、老师没有关注到他们的心理需求，孩子很可能会存在心理缺陷，进而对其身心健康、情绪状态产生较大影响。这种不良的社会心理主要体现在身体、情感、心理，不仅影响儿童行为与情绪，还会对今后人格发展、社会交际、生活产生影响。因此，为儿童提供欢乐、美好的童年具有重要意义。

一、儿童心理健康特点

童年的记忆应该是美好的、纯真的，但在一些情况下给儿童留下心理创伤，这种创伤将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关注儿童心理健康，就必须了解儿童阶段的心理特点，其心理健康特点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认知方面特点。儿童阶段的孩子多存在认知构建时期，有一定的认知，但是又不能完全正确认知。在行为上多表现为注意缺乏多动障碍，日常生活或者学习中，他们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身体爱动，很容易冲动等。第二，情绪方面特点。部分儿童会表现出学习兴趣低，时常情绪低落，甚至无心玩耍，严重的时候表现为暴躁、焦虑、抑郁等。这些负面情绪或者不健康的心理状况，会造成儿童身体不良反应或者行为不当。当身体出现问题，可能严重影响儿童的健康。但是，很多时候人们很容易忽视这些心理问题，认为是孩子生病[1]。第三，行为方面特点。这个阶段的孩子可能因为学业压力过重，以及老师或者家长的高期待，使其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心理问题激增，加之信息时代环境的剧烈影响，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很容易导致儿童心理缺失。针对这些儿童心理健康存在的特点，下文将进一步开展详细论述，阐明心理健康问题对儿童成长发育的重要影响。第四，社会性发展特点。社会性发展是指儿童在与他人交往中，逐渐掌握社会规范、处理人际关系、形成社会角色并适应社会生活的心理过程。这是儿童从“自然人”走向“社会人”的关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依恋关系的改变。 婴幼儿时期与主要抚养者（通常是父母）建立安全型依恋是未来人际关系的蓝图。安全的依恋让孩子感到被爱和有价值，为其探索世界提供安全基地。随着年龄增长，依恋对象逐渐从父母扩展到同伴和老师。其次是同伴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学龄前儿童开始出现“友谊”的概念，但此时的友谊短暂且建立在具体活动（“我们一起玩滑梯就是好朋友”）上。进入小学后，同伴关系成为情感支持和自我价值感的重要来源，他们开始形成小团体，并非常看重同伴的接纳和评价。总结而言，儿童的心理健康是一个立体、动态的图景。认知、情绪、行为如同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而社会性、个性和心理动力则是隐藏在水下、支撑其发展的庞大基础。

（上接 46 页）

[8] 王玲 . 城市老年人语言服务问题调查研究 [J]. 语言战略研究 , 2024, 9(04): 12−2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智能化时代下的老年语言权利与应用”（2024R406A056）。

（作者系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二、心理健康水平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目前，关爱儿童心理健康的话题得到了全球各地的广泛关注。一直以来，童年心理健康问题在全球各地也广泛存在，影响着儿童心智发育。儿童是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儿童时期心理是否健康、健全，将直接影响成长发育，也将关系到未来社会发展。因此，儿童心理健康是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而如何提升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也是心理学家及学者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儿童心理健康对其认知影响

经常受到忽视的儿童长大后，部分会表现出对未来没有憧憬，没有目标、没有理想等，很难树立自信心，也很难拥有坚强的意志力。据调查，36% 的留守儿童伴有发育障碍。另一项调查也显示，童年早期被忽略的 5~12 岁儿童，智商较未受到忽略的正常环境下成长的儿童低 15 左右，一部分儿童存在语言发育障碍 [2]。心理创伤儿童认知障碍可能与营养、毒素暴露有一定关系，亦与缺少父母陪伴照顾有关联。由于没有亲近人的照护，使得儿童在该时期缺少语言训练，培养认知的机会较少。此外，心理创伤儿童在执行力方面也有一定缺陷，因为童年早期被忽略以及早产、孤儿等更容易发生执行缺陷。根据执行量表评价，包含易分心、记忆力减退等，结果发现，心理存在问题的儿童执行力评分较低。而且有实践证明，不良照护对儿童注意系统也有影响，导致儿童反应能力、注意力等障碍。尤其是留守或被忽视的儿童，执行力得分更低。儿童阶段，经常更换照护者会影响执行力发展。

（二）儿童心理健康对其社会性发展与情绪影响

儿童阶段因为人志不健全，行为管理能力比较差，很多时候都是依赖父母，所以，依赖性是儿童早期情感建立的重要媒介，幼儿阶段与父母创建安全性依赖对日后交往、应激处理有重要影响。父母在日常照护中给予充足的关心爱护可以给予儿童稳定且安全的感受，有利于其建立良好的社会沟通，父母引导其在交流中学会情绪管理，耐心的陪伴给予儿童安全感。反之，父母忽视儿童需求就会带给儿童不安全依赖，长此以往出现焦虑、担心、不愿主动与外部事物接触，影响认知和社会交往技能进步。童年早期被忽略的孩子缺少安全感，属于不完全性依赖，对外部事物或环境缺乏信任和主动性，表现出胆怯、情绪波动大、难以与同伴玩耍。经常被忽略的儿童较无心理创伤的儿童更难以安抚、要求更多 [3]。情绪发育中，情感表达、学习分辨也是重要环节，伴有心理创伤的儿童往往难以共鸣情感、识别情感、感受情感间的差异，如伤心、难过，也不会更好地表达感受。另外，童年早期心理创伤还会影响人格发育，且与成年后人格发育有关联性。童年时期的情绪障碍严重时可能发展成焦虑症、抽动障碍、秽语综合征、精神发育迟缓等。其一，焦虑症。儿童长期在紧张压抑的环境下更容易出现恐惧、焦虑症状，甚至强烈地担忧、恐惧，最后成为焦虑症。其二，抽动障碍。心理创伤的儿童会伴有突然的、短暂的活动，如耸肩、歪嘴等抽动症状。其三，秽语综合征。该症状表现为儿童无法自主控制语言，长期且无意义地发声，如无目的地重复短语、秽语等。其四，精神发育迟缓。心理创伤儿童智力发育也会受到抑制，典型症状为社会适应力降低，智力发育迟缓。其五，缺陷多动障碍。情绪障碍对儿童神经功能的影响是直接的，诱发缺陷多动障碍（ADHD），典型症状为注意力分散或注意力时间短，肢体活动多。

（三）儿童心理健康对其脑部的影响

儿童时期是大脑神经系统发育的关键阶段，幼儿在 3 岁时期大脑发育极为迅速，受生物学机制驱动、外部因素影响，神经元不断变化发育。在快速发育过程中经过细胞凋亡机制淘汰没有用的神经联结，让大脑达到适应环境的状态。童年早期良好的环境会帮助脑发育，反之则会影响脑发育进程，例如，经常被吼的儿童会出现神经通路的异常反应，情感忽略让儿童缺少环境刺激，被忽略的儿童引起神经生物学的相关变化，抑制脑组织发育进程 [4]。应激条件下，HPA、HPG 活动性增长，处于高激活状态，才能激发机体功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反之，长期的应激刺激会造成 HPA 失调、神经内分泌失调，对脑组织产生损伤。调查显示，童年早期心理被忽视的儿童成年后，较正常成年人，左侧海马体体积变小。有学者研究发现，心理创伤的儿童前额叶中下部与腹部灰质体积扩大，该区域影响情绪、社会化发育。

（四）儿童心理健康对其学习能力影响

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学习行为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包含认知、情感、动机等多个维度。从学校关系来说，儿童踏入校园每天面对的就是老师和同学，如果被同学欺负，儿童可能会出现恐惧、痛苦，这种不良情绪表现让他们对于校园有关的一切，包括学习，均会产生抗拒。大脑在这种创伤应激中，将学校与危险信号画等号，每天在危险的环境下自然无暇顾及学习。心理创伤对儿童记忆力、学习动机会产生消极影响。有过心理创伤的儿童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分心等症状，造成学习效果降低。同时记忆力也会受到影响，无法吸收和记住知识内容。而且心理创伤还会影响儿童学习动机，使其丧失学习兴趣。

（五）童年心理健康对其精神系统的影响

以上对童年早期心理问题的调查显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儿童多伴有不同程度的神经发育障碍，包含反应性依恋障碍、ADHD 等。尤其是童年早期不被精细照护、不断变化照护人的儿童普遍存在去抑制性社会参与障碍 [5]。其主要表现为儿童自主交往中表现的行为，如公共场合通常不会依赖熟悉的照护者，容易被陌生人带走等。心理创伤中，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指的是有过创伤经历后情绪、认知发生异常，虽然表现不同但均与创伤有直接关系，被称为再体验的负性变化症状。婴幼儿阶段，多数婴幼儿没有 PTSD

症状，更多的是胆怯、害怕、无助等情绪以及睡眠障碍、饮食困难等症状，伴随年龄变化，症状越来越显著。学龄前儿童还会出现注意力无法集中、害怕上学、担心自己安全等表现；青少年表现为情感缺失、对任何事物没有太多兴趣、情绪起伏大、自责、逃学等。

三、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提升策略

童年经历是怎样塑造人的性格的？这一直是心理学家思考的重要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童年心理健康水平对人的成长有深远影响，会影响人的思考、行为方式、性格，甚至患精神类疾病。如何对儿童进行正确、积极、正面的心理健康干预，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倾听交流

为儿童提供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倾诉心情与感受，不管儿童何时何地表达都要给予倾听。时常给予肯定、表扬，对其想法表达认可，避免指责。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注意倾听孩子的心声，能帮助孩子建立安全依恋的关系，促进孩子情绪表达。当孩子感受到自己是被父母关注和关爱的，他们会形成“安全基地”，将父母视为自己内心的“安全基地”，更加愿意表达内心感受。通过倾听能培养孩子的情绪认知，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父母或者老师及其他监护人在倾听的过程中，帮助孩子标记情绪，让孩子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情绪。例如，“你看起来很生气，是因为同学拿了你的玩具吗？”这样有利于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积累情绪词汇，也能提升情绪调节能力。

（二）创建相互信任的关系

对于儿童来说，关系稳定、亲密的照护者是他们的安全港湾，照护者要给予更多的陪伴和关心，使其感到家庭的关心和爱护，尊重儿童的想法并尽可能满足需求是建立信任的基础，才能使其感到安全。在家庭生活中，父母与孩子应该是“平等对话”的关系。有心理学家指出，“儿童通过与主要照护者的互动形成内部工作模型，影响其未来的人际关系模式。”父母应该给予孩子高质量的陪伴，让孩子能完全信任、相信家长，给予孩子充分的尊重，增强孩子在家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坚决杜绝一边看手机一边应付孩子，低质量、低效率的陪伴会导致孩子产生被忽视的情绪，从而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

（三）心理专家干预

寻求心理专家的帮助对心理创伤儿童进行干预，如心理疏导、认知干预等可以减轻创伤。心理专家在儿童心理创伤干预中具有重要意义，检查过程中询问儿童是否有虐待、忽略等心理创伤事件，检查身体有无损伤、观察情绪状态等。一旦发现儿童经历创伤事件和应激表现则立即提供心理治疗，如眼动脱敏再加工治疗、家庭疗法等。针对 PTSD 儿童推荐认知疗法、眼动脱敏再加工疗法。专家认为，绘画是一种有效治疗心理干预的疗法。实践证实，绘画可以带给人安全感、希望感、目标感。绘画能够让儿童更好地表达需求，抒发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达到宣泄心中不良情绪的目的，避免造成儿童心理创伤。而且绘画还是自我疗伤的办法，能够促进情感表达，建立心理支持，重建掌控感。一直以来，绘画都是人们表达情感的方式之一，最早人们在岩壁上作画表达情感。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一些心理学家将绘画作为心理创伤治疗的有效策略，20 世纪 40 年代后，绘画成为一种艺术治疗方式，主要用于人们情绪处理，改善焦虑、抑郁情绪。现代绘画干预中，首先要创建安全的、非评判性的环境。然后，引导儿童放松、冥想，有利于放松身体更好地构思[6]。提供适合的绘画表达工具，如自由画、主题画等。其中，自由画鼓励儿童自主表达，心理学家在一旁观看绘画内容和儿童绘画表现。最后，与儿童讨论作品中的颜色搭配、图形以及代表的内涵，帮助儿童更好地认清内心。整合形成新的认知，同时反思对情感与创伤的影响，制定后续行动计划。

四、结语

综合分析，童年的经历对成年阶段孩子的影响是隐秘而深远的。如果儿童时期心理健康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关注，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有的会感到焦虑、不安全，有的情绪失调，甚至部分表现出行为问题、社交困难、学业问题等。心理干预、家庭支持、艺术治疗等不同策略可以显著提升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同时，也要提高公众意识、加强家庭支持，在需要时采取学校干预等预防措施，全面关注儿童心理健康成长，为儿童创造健康、安全、和谐的成长环境，为美好的将来埋下希望的种子。

参考文献

[1] 汤艳梅，周红．我国流动儿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困境及其优化对策 [J]. 生活教育，2023(33): 18-21.

[2] 刘志军．隔代教养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性的影响 [J]. 人民论坛，2025(02): 79-83.

[3] 王乌兰．心理社会治疗模式下目睹家暴儿童社交退缩问题的个案工作介入研究 [D]. 包头：内蒙古科技大学，2023.

[4] 周贤宏．不同归因方式在大学生儿童期心理虐待经历和社会排斥间的多重中介作用 [D]. 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23.

[5] 褚方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前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的影响研究——家庭功能的中介作用 [D]. 广州：广州大学，2023.

[6] 邓欣雨．心理社会治理模式下自闭症儿童家属照顾倦怠的社区介入研究 [D]. 广州：广州大学，2024.

（作者单位：韩国东新大学）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城镇低龄老年人精神需求研究

李　凡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加速阶段，60~69 岁城镇低龄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潜能与精神需求日益成为养老服务体系构建中的核心议题。本研究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框架，通过对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乌达区 500 名低龄老年人的实证调查，系统分析其情感支持、社交互动、文化娱乐及自我实现等精神需求的表现形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低龄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且受教育程度、职业背景及家庭结构的影响显著。据此，本研究从政策创新、社区赋能与家庭支持三个维度提出整合性干预策略，为推动低龄老年群体高质量社会参与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老龄化；低龄老年人；精神需求

一、研究背景与现实意义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 21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构性挑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末，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1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22.0%，其中 60~69 周岁低龄老年人占比超过 55%，形成规模庞大的“活力老年群体”。这一群体多数具备良好的身体机能与社会参与意愿，其精神需求的满足程度直接关系到老龄化社会的治理质量。积极老龄化理论由世界卫生组织于 2002 年提出，强调通过健康维护、社会参与和安全保障三大支柱建设，提升老年人的生命质量。该理论突破了传统养老理念中“消极赡养”的局限，将老年人视为社会发展的积极资源。在我国，随着《“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推进，积极老龄化已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但现有实践更多聚焦于物质保障与身体健康，对低龄老年人精神需求的系统性关注仍显不足。

二、理论框架与文献综述

积极老龄化理论的核心内涵包括：一是健康老龄化，不仅指无病状态，更强调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能力的维持；二是生产性老龄化，通过就业、志愿服务等形式延续社会价值；三是参与式老龄化，保障老年人在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参与权。

国内学者指出，我国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已从传统的“情感慰藉”向“自我实现”升级，但社会支持体系尚未形成有效回应[1]。现有研究存在三方面局限：一是多聚焦于高龄老人或农村老人，对城镇低龄老年群体的特殊性关注不足；二是量化研究缺乏对需求结构的深层分析；三是对策建议多停留在宏观层面，缺乏可操作的微观路径[2]。日本学者提出的“互助养老共同体”模式表明，构建基于社区的支持网络是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有效途径，但该模式在我国城镇社区的适应性仍需验证[3]。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与样本选取

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于 2024 年 6 月—9 月在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乌达区选取调查对象。首先根据街道老龄化程度分层，然后在每层中随机抽取 2 个社区，最终选取 500 名 60~69 岁城镇低龄老年人（有效回收率 92.6%）。样本结构如下：男性占 48.2%，女性占 51.8%；60~65 岁占 67.3%，66~69 岁占 32.7%；教育程度中初中及以下占 39.1%，高中 / 中专占 34.5%，大专及以上占 26.4%。

（二）研究工具与数据收集

问卷调查：自编《城镇低龄老年人精神需求调查问卷》，包含四个维度 28 个题项：情感支持需求（如“希望子女每周至少电话联系 1 次”），社交互动需求（如“愿意参加社区兴趣小组”）、文化娱乐需求（如“对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感兴趣”）、自我实现需求（如“希望通过工作 / 志愿活动发挥专长”），问卷经专家咨询修订，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信度良好。

选取 20% 的样本（100 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问题包括：“退休后您最希望获得哪些方面的精神支持？”“参与社会活动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访谈平均时长 45 分钟，全程录音后转录为文本。

（三）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 SPSS 26.0 进行描述性统计与交叉分析，运用

NVivo 12 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聚类，提炼核心需求主题与行为模式。

四、研究结果

（一）精神需求的多维结构与特征

情感支持需求：从家庭依赖到社会网络的拓展。调查显示，89.3% 的低龄老年人认为“家人情感陪伴”是首要精神需求，但需求形式已从传统的“同住照料”转变为“高质量沟通”[4]。退休教师李女士（63 岁）提到：“女儿每周视频时会主动分享她的工作烦恼，这种平等的交流让我觉得自己还是家庭的‘智囊团’。”值得注意的是，空巢老人（占样本 21.7%）对社区情感支持的需求显著高于非空巢群体，43.2% 的空巢老人参与了社区“邻里互助小组”，通过集体活动缓解孤独感。

社交互动需求：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创造。低龄老年人的社交需求呈现“三重圈层”结构：核心圈（家人）、紧密圈（老同事 / 老同学）、扩展圈（社区新友）。数据显示，65.8% 的受访者定期参与社区活动，但活动类型存在显著年龄差异：60~65 岁群体更倾向于技能型活动（如智能手机培训，参与率 38.4%），66~69 岁群体更偏爱休闲型活动（如广场舞，参与率 52.7%）。退休工程师王师傅（67 岁）自发组织了“社区技术顾问团”，为居民解决家电维修问题，其社交圈从原单位同事扩展到社区各年龄段群体。

文化娱乐需求：从单一消遣到终身学习。低龄老年人的文化需求呈现明显的“教育分层”特征：大专以上学历群体中，71.2% 的老年人参与了老年大学课程（书画、钢琴等占比最高），38.5% 的老年人通过短视频平台学习新技能；初中以下学历群体则更多依赖电视（使用率 89.1%）和棋牌活动（参与率 62.3%）。值得关注的是“数字鸿沟”导致 23.6% 的老年人无法获取线上文化资源，65 岁以上群体中这一比例升至 37.8%[5]。

自我实现需求：从职业延续到社会价值重构。37.9% 的低龄老年人有明确的再就业意愿，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如教师、医生）的意愿最强（58.3%）。退休护士长陈女士（62 岁）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担任健康顾问，她表示：“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感觉自己还是‘被需要’的。”此外，29.5% 的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服务领域集中于教育帮扶（41.2%）和社区治理（35.7%），且高学历群体更倾向于知识性服务，低学历群体多参与体力型服务。

（二）社会参与的制约因素分析

制度性壁垒：就业与服务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就业市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禁止年龄歧视，但调查显示，仅有 12.7% 的低龄老年人通过正规渠道就业，多数依靠熟人介绍；企业招聘中“年龄不超过 60 岁”的隐性门槛仍普遍存在。社区服务：现有社区活动中，行政主导的节庆活动占比达 61.4%，而老年人自主策划的活动仅占 13.2%，某社区居委会主任坦言：“我们设计活动时更考虑安全性，难免忽略老年人的真实兴趣。”

个体性障碍：能力衰退与角色认同危机。认知技能：34.5% 的老年人因“担心学不会”而拒绝参与新活动，65 岁以上群体对智能设备的使用焦虑尤为突出；角色转换：退休前担任管理职务的老年人中，47.8% 的老年人经历过“权力失落感”，某退休处长在访谈中提到：“从会议室到广场舞队伍，这种落差需要很长时间适应。”

环境性限制：空间设施与社会认知的双重约束。物理空间：仅有 28.6% 的社区设有专门的老年人活动中心，且多数面积不足 50 平方米；社会刻板印象：21.3% 的老年人表示“子女认为参与社会活动是‘瞎折腾’”，这种家庭认知阻碍了其参与意愿。

五、对策建议

（一）政府层面：构建政策支持与资源整合体系

1. 创新低龄老年人就业促进机制

建议人社部门牵头实施“银龄人才开发计划”，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全国统一的老年人才信息库，按专业分类（如教育、医疗、工程）设置线上招聘专区，参考上海“退休专家工作站”模式，为企业雇佣老年人提供社保补贴；制定《低龄老年人就业权益保障细则》，明确工作时间（建议每周不超过 24 小时）、劳动保护等标准，禁止年龄歧视条款入法；开展“职业转型培训”，针对退休群体特点设计课程，如教师转型为家庭教育顾问、医护人员转型为健康管理师等，2024 年杭州试点该项目后，参与者再就业率提升至 41.5%。

2. 完善社区精神养老服务供给

实施“社区老年精神关爱工程”，按照每万名老年人不少于 200 平方米的标准建设综合性活动中心，设置书画创作室、智能学习区、心理咨询室等功能分区；推广“时间银行”互助模式，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可累计时间积分，未来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兑换等值服务，南京某社区通过该模式已形成 1200 人的互助网络；政府购买专业社工服务，每个社区配备 1~2 名老年社会工作者，负责需求评估、活动策划与心理干预。

3. 推动老年教育数字化转型

教育部牵头建设“国家老年开放大学”，开发涵盖智能技术、艺术修养等领域的慕课平台，对 65 岁以上学习者提供免费流量支持；在社区设立“数字助老驿站”，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开展“一对一”智能设备教学，该模式在北京海淀区试点后，老年人手机支付使用率从 32% 提升至 67%；鼓励主流媒体开设老年频道，制作符合低龄老年人认知特点的科普节目，如将区块链知识转化为“虚拟养老金管理”案例教学。

（二）社区层面：培育自组织能力与支持网络

1. 构建“需求驱动”的活动组织体系

建立“老年人需求委员会”，由不同职业、年龄的老年人代表组成，每季度收集并排序需求，某社区据此将传统的“重阳节文艺汇演”改造为“银发技能博览会”，参与率从 35% 提升至 78%；培育多元化自组织，如“退休法官调解室”“老教师课业辅导组”等，社区提供场地与小额经费支持，如上海某社区的“老建筑师规划小组”已成功参与 3 个老旧小区改造；开展“代际融合”活动，组织小学生与低龄老年人共同完成“我的爷爷奶奶职业故事”项目，既增进代际理解，又满足老年人的价值表达需求。

2. 打造智慧化服务平台

开发社区老年服务 App，集成活动预约、健康监测、紧急呼叫等功能，设置大字体模式与语音导航，杭州拱墅区“智汇夕阳”App 注册用户已达 3.2 万人；建立“老年人数字档案”，记录其兴趣爱好、健康状况及服务需求，实现精准化服务推送，如为喜欢书法的老年人自动推送展览信息；利用社区闲置空间建设“共享客厅”，配备智能电视、无障碍设施，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自助式活动场所。

（三）家庭层面：重构代际支持与情感联结模式

1. 退休角色转换的家庭干预方案

针对退休初期的角色认同危机，可采用“角色过渡工作坊”模式。

职业角色解构：子女与老人共同整理职业生涯中的关键事件，制作“职业成就时间轴”，退休法官张叔叔在女儿帮助下梳理出 300 余件经手案例，后改编成普法故事集在社区宣讲。

新角色探索：通过“兴趣卡牌测试”发现潜在方向，退休公务员李叔叔在测试中显示“社会服务”倾向，子女协助其报名社区矛盾调解队，现每月调解纠纷 10 余起。

身份重构仪式：举办“退休新起点”家庭聚会，邀请老同事、亲友共同见证角色转变，某中学退休校长的“从教 40 年纪念会”上，子女播放学生祝福视频，老人深受感动，随后发起“退休教师助学基金”。

2. 代际知识传递的双向赋能机制

建立“家庭学习共同体”，老年人传授生活智慧，子女教授现代技能。

传统知识数字化：子女帮助老人录制“老手艺教学视频”，退休厨师王师傅的“家常菜制作”系列视频在短视频平台获 10 万以上播放量，带动 200 余名老人参与线上厨艺交流。

现代技能生活化：子女将办公软件转化为生活应用教学，如用 Excel 制作家庭收支表、用 PPT 制作旅行相册，某退休工人通过学习视频剪辑，为广场舞团队制作表演视频，团队因此受邀参加市级比赛。

代际项目合作：共同完成社区公益项目，退休设计师与从事建筑行业的儿子合作设计社区适老化休憩亭，该设计获区“最美社区空间”奖，既满足老人的专业价值实现，又增进亲子关系。

3. 家庭情感支持的量化管理工具

引入“情感账户”概念，子女与老人共同记录支持行为。

互动频次管理：制定“3×3 沟通计划”——每周 3 次电话、3 次微信语音，每次不少于 15 分钟，某企业高管通过设置手机日历提醒，将与父母的有效沟通时长从每周 20 分钟提升至 90 分钟。

需求响应记录：使用家庭 App 记录老人的精神需求及满足情况，如“父亲希望参与桥牌比赛”的需求被记录后，子女两周内协助联系到社区桥牌队。

正向反馈机制：设置“家庭点赞墙”，子女对老人的社会参与行为及时给予具体认可——“妈今天给社区老人讲课的样子特别有感染力”，这种反馈使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提升 37%。

六、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城镇低龄老年人精神需求的系统考察，揭示了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这一群体需求的复杂性与动态性。研究表明，60~69 岁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已从单一的情感慰藉向多元社会参与升级，其满足程度不仅取决于个体特征，更受政策环境、社区支持和家庭互动的深刻影响。未来研究可在三方面深化：一是追踪低龄老年人向高龄阶段过渡时的需求演变规律；二是比较不同区域（如东西部城市、城乡）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差异；三是开展干预措施的效果评估，为政策优化提供实证依据。随着积极老龄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唯有将低龄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纳入社会治理的核心议程，才能真正实现“老有颐养、老有优为”的发展目标，为应对深度老龄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 田昱翌 .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乡村社区精神养老服务可及性保障研究 [J]. 老龄科学研究 , 2024, 12(02): 47−60.

[2] 张威 , 刘学文 . 基于老龄友好型城市建设理念的健康街道设计优化策略 [J]. 工业设计 , 2024(01): 68−71.

[3] 曹有顺 , 胡澎 . 日本新型互助养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J]. 日本问题研究 , 2023, 37(01): 71−80.

[4] 王媛媛 .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城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优化路径研究 [J]. 社会福利（理论版）, 2022(08): 33−38.

[5] 方建移 . 积极老龄化离我们有多远——基于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思考与探索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 2022(01): 126−13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下转 53 页）

社会工作者介入儿童社区托管发挥专业能力初探

张鸥影

摘要：随着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儿童教育问题愈发受到各界高度关注，尤其在“双减”的政策背景下，如何构建更加全面的教育体系、缓解家庭日益增大的教育压力，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本文将以襄阳市某小学的暑期托管服务为例，结合该项目在课程设计、活动安排、家校沟通等方面的实践经历，探讨社会工作者在暑期托管项目中发挥的作用和在其中扮演的多元角色，以及社会工作介入家庭照顾在家庭、社会、儿童多层面的功能和影响。

关键词：社会工作者；儿童照顾；暑期托管

一、儿童社区托管对社工介入的需求

近年来，家庭对暑期托管服务的需求持续攀升，但受家庭经济条件、社会环境以及地理位置等因素制约，占据主要市场的营利托管机构难以契合大部分家庭的实际需求，且托管行业发展良莠不齐，家长在选择合适的托管机构时面临诸多困难。社区暑期托管作为新兴的托管方式，以社区为依托，以社会工作者为核心力量，整合政府、社区和家庭三方的资源，发挥各方优势，能有效满足家庭对托管服务的需要和儿童的多样化成长诉求。但部分家长对社区暑期托管服务这一新型服务的定位缺乏了解，可能导致家庭需求与服务内容不匹配，因此在服务开始前，社工需与家长充分沟通，帮助其树立正确认知。

二、文献综述

国内社区托管服务以“四点半学校”和“七彩夏日”为雏形，不断地对公益性托管服务进行探索，社会工作者也在此过程中凭借专业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周纯意、任晓秋等在探讨“四点半学校”问题时提到，一方面引入个案、小组、社区等社会工作方法来开展活动，改变以往开展作业辅导这种单一形式的托管服务，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支持社区开展特色服务；另一方面则引入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来进入社区实习，解决“四点半课堂”僵化、人员缺乏的困境[1]。李娟提出在社会工作介入儿童社区照顾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应当扮演资源链接者、儿童教育者和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但面临自我角色弱化严重、资源提供有限以及政府压力等困境，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处于严重的角色困境[2]。

在社区托管长期进展缓慢的情况下，2021 年教育部正式印发文件，提出以鼓励探索暑期托管服务新形式，推动社区托管服务进入全面探索时期。社区托管多样化服务内容不仅是对家庭照顾的补充和学校教育体系的延伸，而且侧重于满足儿童的成长性需求，如培养兴趣爱好、拓展社会技能以及构建同辈群体关系等社会教育方面。佘双好认为，社会教育区别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作用，重点在于促进个体社会性的发展， 培养个体亲社会性行为和思想情感、观念等，培养个体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王晓宛也在托管服务的具体实践过程中，通过与社工、社区居委会、儿童及家长的接触发现社会工作在参与社区照顾时发挥了显著作用，比如，改善家庭亲子关系、营造社区精神文化以及提升社区功能[3]。本文基于个人在社区托管服务中的经验，围绕社区暑期托管服务的现状与发展，立足于社区、政府、家庭多元主体，从社会工作视角出发探讨社会工作在社区托管中的角色定位与作用，探索社工参与式的社区儿童托管模式，助力完善社工介入儿童暑期托管服务体系。

（上接 52 页）内蒙古自治区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青 - 银’共融——代际互助赋能精神养老公益新模式”（S202510127045X）。

（作者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三、襄阳市 X 小学儿童暑期托管服务的具体成效及问题

（一）服务背景

为了切实解决“看护难”“管理难”问题，减轻家长压力，促进学生全面成长，2021 年 7 月 7 日，教育部印发《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引导支持各地社区及企事业单位积极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多地社区、学校纷纷响应，开办暑期托管服务，社工也在参与儿童暑期托管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深入研究社区托管作为家庭照顾的补充照顾方式的优势与不足。

X 小学位于襄阳市樊城区乡镇地带，学校规模较小，学生多为当地乡镇的学龄期儿童，家长由于工作等原因无暇陪伴孩子，对子女的照顾功能有所减弱，家庭对替代性照顾的需求上升。目前，该小学与当地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为开展暑期托管服务提供了便利条件。托管服务项目遵循政府的总体要求，旨在解决家庭儿童暑期无人照料的难题，为孩子营造安全、有益的学习和娱乐环境。从社会工作视角出发，专业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技能和方法，通过课业辅导、兴趣培养和主题教育等形式，围绕朋辈关系建设、潜能发展等内容开展专业服务，促进儿童健康全面发展。

（二）服务内容

托管项目面向校内 8 至 12 岁的少年儿童，共计 42 人，项目实施周期为 2023 年 7 月 6 日到 7 月 20 日，共计 15 天。服务内容涵盖学业辅导、美术绘画、手工制作、安全教育等多种主题，融合了素质教育、生活技能拓展和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密切关注儿童学习水平，及时检验活动效果，观察儿童对活动的参与积极性并收集相关意见反馈。

（三）社工介入的优势与成效

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的沟通场所，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家庭保护和教育功能的有效发挥。社工介入在家庭层面主要解决了儿童照顾和教育问题，为家长提供了心理支持，缓解其对孩子照料不周的焦虑情绪 [4]；并通过开展亲子互动活动和心理疏导，帮助亲子双方增进理解，改善亲子关系。例如，针对在 X 小学托管期间出现反常情绪的学生，社会工作者及时沟通了解原因，并与家长取得联系，帮助父母了解孩子的困境并协助解决问题。由于参与暑期托管的儿童以留守儿童为主，平时与父母相处机会少，自身的心理需求难以表达，导致亲子间存在隔阂。而社会工作者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搭建起沟通桥梁，营造安全的沟通环境，准确传递双方需求，有效调节家庭关系。

对于儿童个体而言，托管服务在保障人身安全的基础上，提供的教育支持有利于帮助儿童提升学习成绩、促进健康成长，兼顾学业发展和综合素质提升。多样化的服务项目可以拓展儿童技能，促进全方面发展。在 X 小学的服务过程中，课业辅导成效显著，学生不仅完成了学校布置的暑期作业，还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对未完全掌握的学科知识进行了总体的巩固与复习；此外，鉴于儿童尚处在生理、心理不成熟的阶段，培养孩子的道德素质以及处理危机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至关重要。社工每日安排了两到三场主题教育课程，涵盖环保、历史、安全教育等多个主题，学生们对各项课程反响热烈。环保主题通过展现垃圾产生的过程以及垃圾对环境的危害来教育学生爱护环境，形成环保意识；红色主题通过观看红色影片，讲述革命故事，激发学生们的家国情怀；安全教育主题则是结合日常生活场景，如防溺水和电器起火等，增强儿童的自我防范意识；同时，注重培养儿童间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关系，与同辈群体的互动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途径，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文化传递和价值认同，构建和谐友善的同辈群体氛围，促进个体成长。

从社区的角度出发，社工链接社区、政府、志愿者等多元主体，整合社区资源，为儿童提供更全面、丰富的托管服务。各方联动合作，形成合力，推动项目的长期稳定发展 [5]。托管项目属于社区治理的一种路径，两者相互关联、互相促进，社区治理为托管服务提供管理框架和资源支持，托管服务则有助于增强社区的服务功能，推动和谐社区的建设。

（四）社工介入社区托管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1. 托管服务项目可链接资源薄弱

托管地点位于乡镇社区，与城市中心地区相比，可调动社会资源少，社区内基础服务建设不足。当地居民对托管服务的了解有限，参与度低，人力资源匮乏；社区内志愿服务、文化长廊等服务内容缺失，设施资源紧张。服务开展过程中更多地依赖社工自身的资源，与社区的联动不足，虽采用社区托管模式，但服务地点在学校内部，与社区的直接沟通较少，未实现多方合作的预期效果。

项目推进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经费短缺，高校志愿服务资源有限，受到资金限制，部分活动缺乏道具导致活动形式简化，影响最终效果；活动的开展主要在教室内以及校内操场，活动场所单一，欠缺趣味性，未达到预期目标。

2. 可参考的社区托管经验少

由于社工介入儿童暑期照顾的发展历程相对较短，相关服务体系不成熟，可供参考的服务经验有限。尽管 X 小学前期已经开展过两次社工介入式托管服务并取得高度评价，但当地社区对社会工作者的主要功能仍认识不足，支持力度不够，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难度较大。在服务开展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多次尝试不同类型的服务，但由于缺乏以往的活动开展经历以及不了解儿童的需求，活动开展效果欠佳，专业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3. 服务效果有限

社会工作者受专业学科知识受限，且缺乏教育经验和相关理论知识，在辅导过程中常出现无法准确讲解学科题目的情况；同时，儿童本身对完成学校作业的积极性不高，注意力不集中，需要社工的严格监督才能完成学习目标，学习效率较低。

提升综合素质作为本次服务的主要目标，完成效果未达预期。服务过程中素质教育课程理论部分较为枯燥，儿童兴趣不高；且每个儿童课程的偏好不同，难以满足所有儿童的需求，导致部分孩子参与课堂活动不积极。并且由于特色课程安排紧凑，平均每个主题只有一到两节课时，学生对课程内容只停留在简单记忆的层面，并未深入了解，难以启发实际行动的改变。此外由于信任建立需要的周期长，持续半个月的服务使服务效果大打折扣。

4. 多方服务需求不同，难以统一

家庭与孩子对暑期托管的需求存在差异，家长们将社会工作者定位为辅导老师，认为暑期托管是学校教育的拓展形式，主要任务是帮助儿童学习，期望社会工作者以提升孩子的学习能力为重点，减少娱乐性活动的开展；而儿童则将暑期托管视为完成作业和参加团体活动、放松身心的娱乐场所。社工的核心目的并非延续学校教育，但是考虑到家庭作为项目的主要反馈方，为满足家长需求社工不得不提高课业辅导和学科教学内容的占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参与暑期托管的积极性。

四、社工介入社区托管服务的对策

（一）明确社工定位

活动开始前与家长、社区沟通，明确社区暑期托管提供的服务定位是社会教育而非学校教育，社会工作者应当扮演帮助儿童发掘自身潜力的使能者角色而非单纯的学科辅导老师。在托管服务的开展中明确自身主要任务，协调课业辅导、特色课程等硬性要求课程与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努力实现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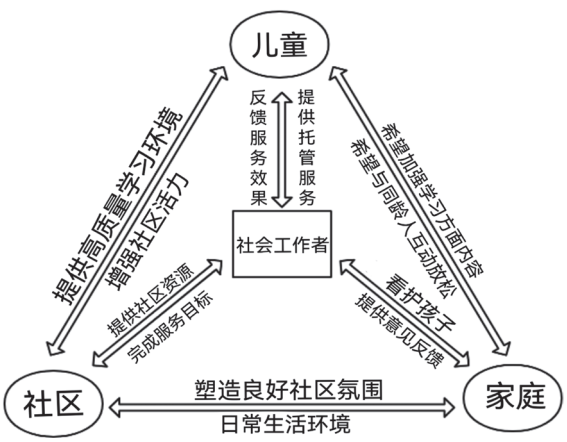


图 1 社工介入暑期社区托管的多主体需求图

（二）满足服务主体需求

儿童作为服务的主体，应充分尊重儿童的需求，以儿童发展为根本出发点，提供符合其需要的课程内容。在服务开展前做好需求评估工作，探索受儿童欢迎的课程形式，及时更新课程内容，精准对接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同时要兼顾社区、家庭等方面的需求，提供多方满意的高质量社工服务（见图 1）。

（三）整合多方资源，链接社区资源

在开展服务过程中积极链接政府、社区等服务资源，推动多方联动，营造友好和谐社区氛围的建设。一方面要与社区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了解社区内及其周边可利用的设施资源，并在服务开展前获得场地及资金方面的支持[6]；另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社区居民了解暑期托管的具体服务内容，宣传社区暑期托管的优势，吸引有闲暇时间的居民在暑假期间担任志愿者，充分调动社区内的人力资源。同时，随着社区托管需求增长，政府对社区托管的重视程度提升，社会工作者应密切关注政策变化，及时调整服务策略。

五、总结

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社区暑期儿童托管的推动势在必行，针对社区托管服务与托管机构、学校教育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对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需求逐渐凸显。本案例以推行专业化社会工作服务为目的进行实践，不仅帮助学生完成了校内作业，还通过特色课程促进儿童全面成长，丰富其知识技能。但同时也暴露了资源不足、服务不稳定、与社区联动不够紧密的局限性。社工将专业知识应用于儿童暑期托管服务，有助于发掘该领域的社会工作缺口与发展潜力。本次实践经验可为后续相关类型的儿童服务提供参考借鉴，推动专业化社工队伍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 周纯义，任晓秋，王娜．“四点半课堂”的现状、困境及出路 [J]. 现代教育科学，2011(08): 68−70.

[2] 李娟．社会工作者在儿童社区照顾中的身份定位思考 [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8.

[3] 王晓宛．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托管的实践研究 [D].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8.

[4] 陆士桢．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5] 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 [M]. 3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6] 顾丹霞．关于社区儿童托管模式构建的探索 [J].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04): 20−21.

（作者单位：湖北文理学院）

家庭参与模式对社区老年美育教育效果的影响研究

桑　彤 吴宏兵

摘要：在老龄化日趋加深的社会背景下，社区美育教育日益成为提升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重要路径。然而，当前研究中对家庭系统在老年美育过程中的作用重视不足，家庭参与模式尚未形成系统理论支持。本文聚焦社区老年美育教育与家庭互动机制，系统梳理家庭参与在深度与方式两个维度的具体表现，探讨其对老年人学习持续性、审美创新、代际融合等方面的复合影响。深度参与可显著提升老年人学习动力，指导式参与有助于审美风格的个性生成，而陪伴式参与则在文化传承中发挥桥梁作用。文章进一步提出优化家庭支持机制的策略，旨在构建“社区—家庭”协同的老年美育生态体系，为完善中国特色的积极老龄化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社区老年美育教育；家庭参与模式；教育效果；审美能力发展；代际融合

社区作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核心场域，承载着为老年人提供教育、社交和文化服务的关键职能。国家敏锐洞察到这一需求，近年来接连出台与老龄化相关的系列政策。《“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着重强调要强化社区服务，保障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多元化的老年教育支持。《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也明确提出，要推动老年人参与社会文化活动，进而提升其生活质量。在此背景下，将美育融入社区老年教育，构建适宜老年人的美育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立足于社区美育实践场景，聚焦家庭参与对老年人美育接受方式与教育成效的深层调节作用，探讨其内在机制与优化路径。

一、社区老年美育教育与家庭参与模式概述

（一）社区老年美育教育

社区老年美育教育是专门针对社区里老年人开展的审美教育活动，意在帮助他们提高审美能力、享受更丰富的精神生活。

其教育目标大致包含三项：帮助老年人提高感悟美的能力，使其更敏锐地感受到生活与艺术的美，提升对色彩、形状及节奏方面的感知；引导他们表达自身审美感受，采用艺术创作、文学表达等方法提升自身对美的认知与理解；增进老年人对本地文化与传统艺术的了解，强化对所属文化的认同感及自豪感。

教育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在视觉艺术方面，有绘画、书法、摄影等课程，传授色彩搭配、构图方法，提升老年人的视觉审美能力；在文学艺术方面，有诗词欣赏、散文创作等活动，帮助他们提高对文字之美的感受和表达能力；在表演艺术方面，有唱歌、跳舞、演戏等节目，让老年人有机会在舞台上展示自己，同时也锻炼身体和情感表达能力[1]。

教育实施呈现出多样形式。课堂教学是其中最为常见的方式，由专业老师传授知识技能，确保学习的专业性与系统性；工作坊主要是动手实操，组织老年人开展特定主题创作，促进相互沟通及创意激发；社区展览及演出是老年群体的展示平台，让他们更有成就感与自信心，并推动社区文化传播与交流。

（二）家庭参与模式

家庭参与模式在老年美育教育领域，指家庭系统介入老年人社区美育学习进程的方式与途径集合。这一模式的构成要素多元，对老年美育教育成效影响深远。

从参与程度维度审视，可分为深度参与、中度参与和浅度参与。深度参与表现为家庭成员从课程选择、学习规划到日常练习监督，全方位参与老年人美育学习；中度参与则是在关键环节给予支持，如参与重要活动决策、协助解决学习难题；浅度参与体现为一般性关注，如偶尔询问学习进展。

按参与方式区分，存在陪伴式参与、指导式参与和资源供给式参与。陪伴式参与中，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参与美育活动，共享学习体验，营造亲密学习氛围。指导式参与要求家庭成员凭借自身知识技能，为老年人提供专业指导与建议，助力其学习技能提升。资源供给式参与通过提供学习资料、工具及资金等，保障学习顺利进行。

二、家庭参与模式对社区老年美育教育效果的影响

（一）对老年人学习持续性与专注度的影响

家庭参与模式对老年人在社区美育教育中学习的持续性与专注度影响显著。资源供给式参与若能精准匹配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可为其学习进程提供坚实保障。例如，为参与书法学习的老年人购置齐全且优质的笔墨纸砚、各类经典碑帖，能让老年人感受到家庭对其学习的重视，进而视学习为郑重之事，从内心深处激发坚持学习的决心。家庭提供的安静、舒适且配备学习设施的专属空间，减少外界干扰，让老年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更易集中精力，全身心投入学习，提升专注度[2]。

在深度参与模式中，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设定学习目标和计划，且定期对进展进行回顾，这让老年人学习不再盲目无序，而是展现出清晰指向与恰当的节奏。比如在摄影学习中，家庭成员可与老年人共同规划每月拍摄主题、新技巧学习时间等。有了这样的安排，再加上家人的陪伴和鼓励，老年人遇到困难或觉得无聊时也更容易坚持下去，学习就能持续进行，不容易半途而废。

（二）对老年人审美创新与个性化发展的影响

家庭参与模式能帮助老年人更有创意地发展自己的审美兴趣，例如在指导式参与模式中，如果家人有不同领域的知识或对艺术有特别的看法，就能引导老年人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若家庭成员具备现代设计相关知识，在老年人学绘画时，可鼓励其尝试融合不同艺术风格与创作材料，画出不一样的作品，让创作更有新意、表达更有个性。

陪伴式参与模式营造的开放交流氛围，有利于老年人个性化审美发展。在共同参与陶艺制作等活动时，家庭成员尊重老年人的创意与想法，不做过多干涉，让老年人能够自由发挥。家庭成员的鼓励使老年人更有勇气展现独特的审美视角，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审美风格，实现个性化发展。

（三）对老年人文化传承与代际审美融合的影响

家庭参与模式在社区老年美育教育中，对文化传承与代际审美融合意义重大。当家庭以多种模式参与老年人的美育学习，如一起学习传统剪纸艺术，老年人作为文化传承的主体，向年轻一代传授技艺与文化内涵，强化自身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传承使命感。家庭环境为文化传承提供情感纽带，使文化传承不再是生硬的知识传递，而是充满温情与归属感的家族文化延续[3]。

家庭参与还能推动代际审美融合。例如，家庭成员共同欣赏音乐时，老年人可能偏好戏曲，年轻人则更喜欢流行歌曲。通过这样的交流，大家可以了解彼此审美偏好背后的文化底蕴与情感依托，这种互相理解，让不同代的人在审美上互相借鉴长处，丰富各自的审美体系，实现代际审美融合，为社区老年美育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三、优化家庭参与模式提升社区老年美育教育效果的策略

（一）提升家庭对老年美育教育的价值认知

社区和有关机构应该多方面开展宣传，让家庭成员更清楚地认识到老年美育教育的重要性。鉴于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获取信息的方式可能不同，宣传时要结合传统和现代方法。

在社区公告栏张贴色彩夺目、图文并茂的宣传海报，海报内容应着重展示老年美育教育对老年人精神健康及认知能力增进产生的积极效果，也需配上简要明晰的文字阐释，如学习绘画可以刺激老年人的大脑神经活动，增强记忆力与思维能力。公告栏还可以设置专门区域，定期更新一些关于老年美育的文章和故事，让居民更了解，也更愿意参与进来。

社交媒体平台同样不可忽视，制作生动有趣的短视频，采用动画、情景短剧等形式来展示老年人参加美育活动后的变化，譬如老年人在加入社区合唱团以后愈发开朗自信。视频里还可融入简单的专业讲解，向家庭成员阐释这些变化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机制，同时利用社交媒体的大范围传播吸引更多家庭成员关注。

举办贴合老年人特点的知识竞赛。题目设置注重趣味性与实用性，除了涉及老年美育教育的意义、内容，还可结合老年人常见的生活场景，如“书法练习对老年人手部灵活性有哪些帮助”。竞赛形式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下在社区活动中心设置竞赛场地，方便老年人及家庭成员现场参与，营造热闹的竞赛氛围；线上通过专门的小程序或平台，让无法到场的成员也能参与，扩大参与面[4]。

开展科普讲座时，邀请医学、心理学、老年教育等多领域专家。专家讲解不仅要阐述老年美育教育在促进老年人社会融入、丰富晚年生活方面的作用，还需结合老年人身体机能变化、心理需求特点等进行深入分析。例如，从心理学角度说明参与艺术创作能满足老年人自我实现的需求，提升生活满意度，全面引导家庭认识到老年美育教育对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重要意义[5]。

（二）丰富家庭参与老年美育教育的形式

为充分激发家庭参与老年美育教育的热情，需从多维度拓展丰富多样且贴合老年人特点的参与形式。

设立家庭美育日，每个月固定一天，组织家庭成员和老年人一起参加有趣的美育活动。活动安排要照顾到老年人的身体情况和兴趣。举办家庭诗歌朗读会，选一些感情真挚、经典好懂的诗歌，并提前准备大字版资料和诗歌的背景介绍，方便老年人阅读和理解。活动现场要设置舒适的座位，让老年人轻松参与。家

庭手工展示活动可选择轻巧、简单的手工项目，如制作纸花、编织小物件等，并安排专人现场指导，协助老年人顺利完成作品，让家庭成员跟老年人在温馨协作中共同享受美育的乐趣。

推出贴合家庭需求的美育在线课程包，顺应不同家庭的学习节奏。课程涉及绘画、音乐、文学鉴赏等诸多范畴，考虑到部分老年人存在视力、听力障碍，视频会配备大字幕，并提供清晰、大声量的讲解。绘画课程从简易线条的绘制开始，逐步引导老年人掌握颜色搭配与构图的要领；音乐课程将挑选为老年人所熟知的经典歌曲与传统戏曲，教导其基础音乐知识及演唱技巧；文学鉴赏课程则会对一些通俗易懂的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提高老年人的文学鉴赏水平。家庭成员和老年人可以在空闲时间共同学习这些课程，增进代际间的互动沟通。

打造家庭美育创意库，鼓励家庭成员把独特创意分享给老年人，合作完成艺术作品。鉴于老年人丰富的人生经历，可以引导他们用家庭故事、生活回忆作为创作素材。比如，制作家庭摄影集，老年人来讲述家庭故事，年轻人拍摄有纪念意义的场景或老物件，再整理成相册；又比如，制作家庭故事绘本，老年人用简单的语言记录过往经历，年轻人则以创意画上插图呈现，把故事变得生动有趣。这种创作方式不但让老年人有参与感、受到尊重，还极大程度挖掘各成员的长处，有效带动家庭参与的积极性及创新活力。

（三）增强家庭参与老年美育教育的能力

为提升家庭参与老年美育教育的能力，需提供针对老年人特点的培训与指导。

开设家庭美育指导课程，深度剖析老年人学习特点。鉴于老年人记忆力随年龄增长出现衰退，课程着重教导家庭成员依据这一特性制定学习计划。例如，将复杂的学习内容拆解为小模块，每次学习控制在较短时间内，避免老年人因长时间学习产生疲劳。同时，运用间隔复习法，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规律，在学习后的关键时间节点安排复习，强化记忆效果。像在学习书法时，可先集中练习基础笔画，隔天后复习巩固，再循序渐进学习结构与章法。

举办学习技巧分享会，邀请有经验的家庭成员分享实用方法。考虑到老年人形象思维相对活跃，鼓励分享通过形象记忆法帮助老年人理解艺术理论知识的经验。比如，讲解色彩理论时，将不同颜色与生活中常见的事物相联系，红色如同夕阳，给人温暖热烈之感，帮助老年人轻松记住色彩的情感属性。分享如何运用类比法，将抽象的艺术概念转化为熟悉的生活场景，助力老年人理解。

开展家庭沟通技巧培训，引导家庭成员营造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教导家庭成员运用积极倾听技巧，在老年人分享学习心得时，停下手中事务，专注眼神交流，给予充分表达时间。有效反馈方面，强调以鼓励为主，不仅肯定成果，更要具体指出努力之处，如“您这次绘画的色彩搭配比上次更和谐，看得出您下了不少工夫”。同时，耐心解答老年人的疑问，共同探讨学习中的问题，让老年人感受到家庭的支持与尊重。

四、结语

家庭作为老年人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的支持系统，在社区美育教育中不仅是资源提供者，更是情感连接与文化激活的关键介体。本文系统分析了多层次家庭参与模式对老年人学习动力、审美风格、文化归属的影响机制，并提出优化路径，从认知唤醒、形式创新到能力赋能，构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干预框架。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深入探索家庭参与的代际动态、性别差异及其与社区治理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推动社区美育教育从“场所治理”向“关系治理”转型，为应对新时代老龄社会中的精神照护难题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 任怡 . 云端的诗意人生——由线上教育引发的新时代老年美育思考 [J]. 上海艺术评论 , 2023(02): 64-65.

[2] 吴曼思 . 职业美育与老年艺术教育的融合发展策略探究——以莆田地区为例 [J].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 2021(01): 25-28.

[3] 余燕 . 社区美育的教学特点与模式探究——以杭州市下城区老年学堂为例 [J]. 大众文艺 , 2021(09): 17-18.

[4] 杨舒雅 . 大美育观下老年音乐教学的实践反思与改进策略研究——以太原老年开放大学为例 [J]. 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 2023, 25(03): 48-54.

[5] 吴厚兴 . 美育融入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的策略研究——基于服务辽宁全面振兴背景 [J]. 辽宁开放大学学报 , 2024(01): 1-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江苏开放大学“十四五”2024 年科研规划课题“新时代社区老年美育教育路径研究”（2024LY002）；2024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社会教育（社科普及）专项课题“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社区教育创新模式研究”（24SJA-99）；2024 年度江苏省终身教育研究科研项目“县域开放大学助力社区老年教育推进策略研究——以东台开放大学为例”（24SZJ014）。

（作者单位：东台开放大学）

老年人院舍适应影响因素及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欧幼冰 杜　晶 郭子龙 叶韵婷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影响老年人适应养老机构的关键因素及社会工作介入策略。通过对广州市A老人院196名新入住老年人的问卷调查，采用养老机构适应量表（C-NHAS）进行前后测评估，分析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多维度因素与院舍适应的关系。结果表明：婚姻状况、护理等级、入住意愿、入住时间、院内相熟亲友、亲友联系频率及疾病史对老年人院舍适应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研究者提出分阶段介入策略：入住前期注重院舍信息咨询与入住准备；过渡期强化家庭支持与社交网络构建；适应期关注危机干预与持续评估。实践显示，该介入模式有效缩短了适应时间，显著改善了老年人情绪状态、生活适应性，完善了社会支持网络。

关键词：院舍适应；适应时间；影响因素；社会工作；社交支持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入住养老机构。然而，老年人从家庭环境过渡到机构环境往往面临诸多适应方面的挑战，导致适应时间延长甚至退院。因此，社会工作介入协助老年人适应院舍生活，对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背景与现状

从家庭环境转变到养老机构环境这一过程中，如果老年人不能很好地处理适应不良的问题，将对其日后在养老机构中的生活造成障碍，进一步影响其晚年生活、身心健康以及与健康相关的生命质量[1]。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面临着居住环境变化、生活习惯改变、心理状态调适等状况，需要应对生理、心理和社会交往等一系列适应问题[2]。本研究统计了2024年A老人院450名入住老人的平均院舍适应时间为35天，其中11位老人因无法适应院舍生活而选择退院，退院率为4.59%。这些数据表明，缩短老年人院舍适应时间对提升老年人机构养老生活具有重要影响。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预处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使用经过信效度检验的养老机构适应量表（C-NHAS）[3]对2024年3月至5月入住A老人院的196名老年人进行调查。问卷包含情绪困扰、关系发展、新居接受度、适应困难和抑郁情绪五个维度，共23个条目。计算量表标准化得分，将其作为衡量样本院舍适应状况的定量依据，同时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

此外，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经济来源、入住意愿、入住时间、院内相熟亲友、亲属联系频率以及疾病史作为自变量，先后采用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等方法，验证以上自变量与院舍适应状况的关系。

参与调查的196名老年人中，57.9%的老年人为80岁以上，属于照顾需求最大的“老老”群体。其中，女性老年人共计123人，占比63.1%。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有89人，占比45.6%。婚姻状况方面，已婚和丧偶的群体数量近似，分别为90人和81人，占比依次为46.2%和41.5%，剩余12.3%的群体为未婚和离异。总体样本中，181名老年人为自我供养，占比为92.8%，依靠他人（家庭和政府）供养的仅有12人。而反映身体状况的护理等级方面，119名老年人为照顾程度最高的一级护理，占比为61%，仅有3人为三级护理。同为生理特征的因素，在疾病史方面，86.6%的老年人患有不同类型的疾病，其中105人伴有长期疼痛。在社交关系中，139名老年人在入住前并无院内相熟的朋友或亲人，占比71.3%。大部分老年人入住后，仍然保持与亲友的固定联系，其中107人每周联系一次或以上，占比54.9%，但也有2人超过一年才与亲友联系。

三、影响老年人院舍适应的要因分析

（一）单因素分析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学历、经济来源对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适应性的大部分测量维度无显著影响（$p>0.05$）；但婚姻状况、护理等级、入住意愿、入住时间、相熟亲友、亲友联系以及疾病史等变量，则表现出显著差异（$p \leq 0.05$），提示这些变

量与院舍适应性相关。也就是说，婚姻、护理等级、入住意愿、入住时间、相熟亲友、亲友联系频率以及疾病史等对老年人院舍适应具有显著影响（见表 1）。

（二）回归分析

通过对本研究样本的前测和后测五个维度及总得分分别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六组配对数据均呈现显著相关。同时，配对差值各部分的均值均有明显差异，其中情绪困扰部分为 2.662，关系发展部分为 3.590，接受新居部分为 2.887，适应困难部分为 2.708，抑郁情绪部分为 3.133，总得分为 13.026（见表 2）。

四、社工介入服务后的成效分析

通过持续的评估、个性化的服务和综合性的关怀，社工服务介入新入住老年人院舍适应中取得显著成效。数据分析显示，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生活适应性和社交关系均得到显著改善。

（一）情绪状况得到改善

表 2 数据显示，情绪困扰部分和抑郁情绪部分的 t 样本检验均值分别为 2.662 和 3.133，有效说明在院舍适应的服务介入过程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结合表 3 的前测得分均值，计算可得两部分改善情况分别为 18.72% 和 17.40%。通过持续的健康评估和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老年人的情绪状态更加稳定，焦虑、抑郁症状明显减轻（见表 3）。

（二）生活适应性增强

在养老机构中，老年人需要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根据表 2 和表 4 数据分析，接受新居部分和适应困难部分的 t 样本检验均值分别为 2.887 和 2.708，样本整体较前测改善程度为 19.35% 和 20.62%。说明通过社工对新入住老年人全方位地介入支持，老年人能够更快地融入养老机构的日常生活，积极参与各种活动（见表 4）。

（三）社会支持网络增强

院舍适应服务的介入不仅关注老年人的个人需求，还注重社交关系的维持和重建。根据表 2 和 5 数据得知，关系发展部分的 t 样本检验均值为 3.590，改善程度为 18.78%。有效说明通过加强与家庭成员的沟通和协作，使得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关心和支持得以延续，家庭探访频率增加。同时，通过社工开展同辈群体的活动，老年人认识了院友和工作人员，社交网络也得到了扩大，他们与同龄人和工作人员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这种积极的变化增强了老年人对机构的归属感（见表 5）。

（四）降低退院率

社工实施了院舍适应服务计划后，2024 年 10 月至 12 月新收老人的院舍适应时间从服务前的 35 天缩短至 31 天，退院率从 4.59% 降至 1.90%。

五、社会工作介入缩短老年人院舍适应时间的策略

根据调查研究结果，在协助新入院老年人适应机构生活的工作中，可根据其所处的入院前期、过渡期、适应期三个阶段，有针对性地开展社工服务。

在入住前期，社工应重视与老年人和家属的沟通工作，通过

表 1 老年人院舍适应影响因素前后测数据变量及赋值

分析方法	自变量	因变量前测						因变量后测					
		A 情绪困扰得分	B 关系发展得分	C 接受新居得分	D 适应困难得分	E 抑郁情绪得分	总得分	A.1 情绪困扰得分	B.1 关系发展得分	C.1 接受新居得分	D.1 适应困难得分	E.1 抑郁情绪得分	1 总得分
独立样本 t 检验	性别	0.139	0.92	0.91	0.869	0.175	0.518	0.251	0.865	0.366	0.905	0.469	0.426
单因素 ANOVA 检测	年龄	0.457	0.697	0.709	0.231	0.293	0.349	0.032	0.69	0.509	0.04	0.275	0.073
单因素 ANOVA 检测	学历	0.404	0.029	0.454	0.396	0.189	0.119	0.77	0.098	0.339	0.782	0.523	0.253
单因素 ANOVA 检测	婚姻状况	0.024	0.023	0.236	0.003	0.007	0.002	0.083	0.073	0.471	0.005	0.059	0.009
单因素 ANOVA 检测	经济来源	0.566	0.063	0.033	0.998	0.694	0.333	0.785	0.191	0.007	0.863	0.729	0.399
单因素 ANOVA 检测	护理等级	0.211	<.001	0.095	0.081	<.001	0.003	0.704	0.219	0.806	0.792	0.08	0.371
独立样本 t 检验	入住意愿	0.181	0.354	0.009	0.017	0.026	0.025	0.276	0.118	<.001	0.059	0.057	0.011
单因素 ANOVA 检测	入住时间	<.001	0.002	0.001	<.001	<.001	<.001	0.039	0.082	0.865	0.072	0.947	0.759
单因素 ANOVA 检测	在老年人院内是否有其他亲属或既往认识的朋友	0.592	0.438	0.132	0.371	0.241	0.429	0.283	0.229	0.004	0.132	0.275	0.161
单因素 ANOVA 检测	与家人或朋友多久联系一次	0.401	0.06	0.574	0.174	0.145	0.181	0.281	0.024	0.849	0.356	0.261	0.162
单因素 ANOVA 检测	是否有慢性病	0.066	<.001	0.002	0.002	<.001	<.001	0.203	0.125	0.059	0.017	0.425	0.037

表 2 老年人院舍适应成效的 t 样本检验

		成对样本检验								
		配对差值					t	自由度	显著性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差值 95% 置信区间 下限	差值 95% 置信区间 上限			单侧 P	双侧 P
配对 1	A.1 情绪困扰得分 – A 情绪困扰得分	2.662	2.182	0.156	2.353	2.970	17.033	194	0.001	0.001
配对 2	B.1 关系发展得分 – B 关系发展得分	3.590	3.135	0.225	3.147	4.033	15.988	194	0.001	0.001
配对 3	C.1 接受新居得分 – C 接受新居得分	2.887	2.189	0.157	2.578	3.196	18.419	194	0.001	0.001
配对 4	D.1 适应困难得分 – D 适应困难得分	2.708	2.147	0.154	2.404	3.011	17.610	194	0.001	0.001
配对 5	E.1 抑郁情绪得分 – E 抑郁情绪得分	3.133	2.679	0.192	2.755	3.512	16.331	194	0.001	0.001
配对 6	1 总得分 – 总得分	13.026	8.855	0.634	11.775	14.276	20.541	194	0.001	0.001

表 3 心理健康相关维度的 t 样本检验

		成对样本统计			
		均值	N	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配对 1	A.1 情绪困扰得分	16.88	195	3.544	0.254
	A 情绪困扰得分	14.22	195	3.618	0.259
配对 5	E.1 抑郁情绪得分	21.14	195	3.890	0.279
	E 抑郁情绪得分	18.01	195	3.896	0.279

表 4 生活适应相关维度的 t 样本检验

		成对样本统计			
		均值	N	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配对 3	C.1 接受新居得分	17.81	195	2.625	0.188
	C 接受新居得分	14.92	195	2.740	0.196
配对 4	D.1 适应困难得分	15.84	195	3.031	0.217
	D 适应困难得分	13.13	195	3.219	0.231

表 5 社交关系相关维度的 t 样本检验

		成对样本统计			
		均值	N	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配对 2	B.1 关系发展得分	22.71	195	4.082	0.292
	B 关系发展得分	19.12	195	4.201	0.301

开展入住咨询、宣传与评估服务，协助老年人及其家属做好入住计划与准备。

过渡期，重视从老年人的支持系统做服务介入协助老年人更好地适应院舍[4]。首先，社工要帮助老年人巩固家庭支持网络，创造机会和平台让老年人与家属保持联系，在过渡期提高探访的频率，让老年人原有的家庭支持系统及社会参与条件可以得以延续，家人的关心和支持对老年人适应机构具有推动作用。其次，社工可以通过个案辅导、小组或活动等技术，为老年人提供家庭问题和家庭关系处理的辅导；根据老年人个人兴趣，引导其参加兴趣小组、学习小组、社交小组等，以强化其社交网络；整合义工及慈善企事业单位的资源，为老年人开展与院舍适应相关的社区活动，加强其与外界的联系。再次，社工可以搭建平台促进工作人员和老年人建立积极、信任的工作关系。

在老年人进入适应稳定期后，密切关注一些重大的意外创伤或事故对老年人的影响，必要时采取危机介入的服务[5]。当适应稳定期的老年人遭遇重大创伤性事件或意外时，社工要及时发现并开展辅导服务；当老年人因创伤性事件或意外陷入抑郁、混乱等情绪状态，甚至出现自伤、伤人或自杀倾向时，社工需要马上进行危机干预。

在院舍适应服务的过程中，社工需对老年人的适应情况进行动态评估，及时调整服务方向和重点。

参考文献

[1] 曾惠文，王亚亚，金晓燕，等．养老机构老年人社会适应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J]. 中国护理管理，2014, 14(05): 488−491.

[2] 梅陈玉婵，林一星，齐铱，等．老年社会工作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3] 王玉鑫．人本治疗模式介入半失能老年人适应机构养老的实务探究 [D]. 郑州：郑州大学，2016.

[4] 杨良琴，鞠梅，刘晓楚．老年人机构养老适应评估工具的研究进展 [J]. 护理学报，2019, 26(20): 20−23.

[5] 周献德，沈新坤．老年人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法操作技巧 [J]. 社会工作下半月（理论），2009(09): 28−30.

（作者：欧幼冰，广州市老人院高级社工师；杜晶，广州市老人院中级社工师；郭子龙，广州市老人院中级社工师；叶韵婷，广州市老人院中级社工师）

数智背景下老年教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申小芳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态势加剧及数字技术飞速演进的背景下，我国的老年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与现实挑战。本研究结合数智技术在老年教育中的应用状况，梳理了数智技术为老年教育带来的机遇，同时，研究发现数智化进程中的老年教育还面临数字鸿沟难解决、适老化设备落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以及师资队伍建设不足等挑战，需要从加强数字素养教育缩小数字鸿沟、完善适老化产品设计、提高支持力度促进教育资源区域均衡、加强人才培养提升师资队伍数智化水平等方面发力应对挑战，以期为推动数智时代背景下老年教育的稳健发展提供价值参考。

关键词：数智技术；老年教育；数字鸿沟

一、问题提出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社会的重要趋势，我国现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伴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该群体在养老、健康及精神文化等方面的需求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发展老年教育不仅可以充分满足老年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还能助推老年群体再度实现其人生价值，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进步，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措施[1]。现代社会，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重塑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同时也为老年教育开辟了全新的发展路径。众多老年大学、教育机构不断推出的线上课程及各类在线教育平台的兴起，为老年群体开创了更为便捷、更加灵活的学习路径，老年人无需走出家门也能参与学习活动。智能辅助教学工具的应用使老年教育教学方式焕然一新，老年教育引入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催生出智能语音助手、虚拟教师等工具，既能为老年群体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辅导又能给予实时反馈。同时，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的引入，为老年群体营造了沉浸式的学习体验，让抽象的概念变得更加直观易懂[2]。这些工具不仅提升了学习效率，还增添了老年教育学习的趣味性。

尽管数智技术在老年教育领域受到重视，但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不同地区的老年教育办学机构及学员对数智技术的理解和应用也存在显著差异。笔者通过对 GZ 省的省、市、县级 5 所老年大学进行调研后发现：省级老年大学办学主体及学员更加重视数智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市级其次，而县级老年大学则仍然主要采用线下人工操作及教学的模式。在数字时代，数字素养正逐渐成为衡量人口质量的关键指标[3]。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25 年 1 月发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中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推动教育改革方面的重要作用[4]。数智时代的老年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且严峻的挑战。办学机构如何有效借助数智技术推动老年教育的创新与发展，已成为当前老年教育领域亟待深入研究和妥善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数智背景下老年教育发展的机遇

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更新，数智技术的应用范围愈发广泛。借助数智技术，老年教育学习资源、教学手段、教育服务等方面迎来了重大转变，为老年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一）学习资源更丰富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进步，打破了传统教育资源的时空界限，传输技术、无线智能终端技术、即时通信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有力推动了优质教育资源在更广阔范围内的流通与共享。借助互联网平台，老年学习者可以轻松、便捷地获取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各类优质、丰富的学习资源。这种资源的丰富性和可获取性，极大拓宽了老年群体的学习视野，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学习选择。

（二）教学模式更多样

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多样化，是数智化带来的另一重机遇。依托互联网平台，在线直播教学、录播课程学习、碎片化学习等方式，使老年教育变得更加灵活且个性化。在线直播教学具有师生即时互动的功能，授课教师可以及时解决学习者的疑问，增强学习效果；

录播课程具有无限循环播放的特点，方便老年学习者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学习效果进行反复学习，有利于学习者熟练掌握所学知识；碎片化学习借助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让老年人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提高时间利用效率。创新的教学模式不仅提升了老年学习者的学习效率，还培养了其数字素养。

（三）教育服务个性化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更加追求个性化产品及服务。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及大数据分析系统，数智教育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能够深度挖掘老年学习者的学习历程与兴趣偏好，进而精准地为他们量身定制学习指导与课程推荐，实现教育服务的智能化与适老化，这种个性化的定制学习方式极大地提高了老年人的学习动力和自信心。同时，这些系统还能实时监测学员的学习效果，为教师提供数据支持，便于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四）参与机会常态化

大多数老年人离开工作岗位后，社交活动随之变少，这给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数智技术的发展为老年学习者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交和参与社会活动的平台。例如，通过建立在线学习社区，老年学习者能够在社区中交流学习心得、分享学习资源，互相帮助和鼓励；通过参加线上的文化活动、知识竞赛等，老年人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增强他们的自我认同感与社会价值感。这些社交和参与机会的拓展，对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数智背景下老年教育面临的挑战

数智技术不但为老年学习者提供更加科学的学习方式、更加便利的学习途径，而且为老年教育办学机构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管理方式。然而，现实中老年教育中数智技术的应用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数字鸿沟解决困难

数智技术的发展为老年教育带来了诸多便利，但老年学习者想熟练掌握和应用数字技术仍面临较大困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数字鸿沟和老年群体数字素养问题。部分老年人对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数字设备的操作不够熟悉，无法利用互联网获取老年教育资源及参与在线学习，有些老年人认为数智技术是年轻人的“专属事物”，在心理层面拒绝接受。这种数字鸿沟在城乡之间的老年群体中尤为突出，在城市内部，不同教育背景和经济条件的老年人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

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部分老年人无法享受数智时代为老年教育带来的便利和机遇，阻碍了老年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因此，如何提高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缩小数字鸿沟，成为数智时代老年教育面临的首要挑战。

（二）适老化设备开发落后

适老化设计与用户体验问题是数智背景下老年教育发展面临的另一挑战。当前市面上的众多数智类教育产品和教育平台在设计时容易忽略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如老年群体存在视力、听力下降及操作灵活性低等问题，而按照常规标准开发的数智化设备或教学平台，常存在界面设计过于复杂、字体过小、操作流程烦琐等问题，这些问题易导致老年群体使用困难、体验不佳，进而产生抵触情绪。

因此，设计真正符合老年群体认知特点和使用习惯的数智教育产品、优化用户体验，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老年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存在不均衡现象。经济发达地区的老年教育机构有更多的资金、人才支持，能够更好地利用数智技术，获取、整合甚至自行开发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反之，经济落后地区的老年教育机构，由于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限制，在数智技术的应用和教育资源的建设方面相对滞后。

（四）师资队伍建设不足

师资队伍的水平直接影响老年教育的发展。数智时代老年教育的师资队伍要求更高，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传统的教学能力，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和新技术应用能力。老年教育领域的普通教师可能不擅长利用数字工具进行教学，而技术人员又未必了解老年人学习的特点和规律。当前的老年教育师资队伍中部分教师存在数智技术水平较低的问题，无法熟练运用智能设备或数字化教学工具开展教学活动。同时，部分教师在老年教育教学设计、课程开发等方面，难以充分融入数智技术元素，无法创建更贴合老年人认知的学习情境。

因此，师资队伍能力不足，将严重制约数智背景下老年教育的质量和发展水平。

四、应对措施

数智时代的老年教育发展有更多的机遇，但也面临诸多挑战。结合前文所述的现实状况，必须明确目标，多方发力，精准施策。

（一）加强数字素养教育，缩小数字鸿沟

数字化老年教育的应用须建立在师生具备一定数字素养的基础之上，加强数字素养也是缩小数字鸿沟的关键所在。首先，需根据老年学习者的特点和需求，开设专门的数字素养培训课程，课程内容从数字设备的基本操作、在线平台的使用逐步拓展到互联网基础知识、人工智能操作等。其次，可组织社区数字技能互助小组，采用线下集中培训、线上远程教学等方式为老年群体提供帮助，协助他们逐步掌握数字技术，提升数字素养，最终缩小数字鸿沟。

（二）完善适老化产品设计，助力老年教育发展

一方面要完善数智教育平台适老化设计，提高其

可访问性和易用性。相关企业在开发老年教育平台时，需充分考虑老年学习者的使用习惯，设计简洁明了、操作方便的界面和功能，并提供详细的操作指南和视频教程以方便老年人使用。同时，在平台开发过程中可邀请老年人参与测试和反馈，确保平台真正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另一方面，加强数字教育资源适老化建设。老年教育机构在开发老年数字教育资源时，需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身心特点与学习需求，设计内容难度适中、形式丰富多样、易于获取与使用的课程，视频资源需使用较大号字体、颜色对比鲜明，音频资源需音量适宜、发音清晰，课程时长也不宜过长，以此来提升他们的学习体验和效果。

（三）提高支持力度，促进教育资源区域均衡

首先，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农村老年教育的支持力度。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改善欠发达地区和农村老年教育机构的基础设施条件，配备必要的数字设备和网络设施，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即使在某些市级开放大学，智能化设备投入也仅局限于电脑硬件，缺少更先进的智能化产品，其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投入不足。同时，通过政策引导，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力量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老年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其数智化教学水平。其次，建立老年教育资源共享机制。由政府牵头搭建统一的老年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整合各类教育资源，通过该平台，实现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机构之间的流动和共享，让更多老年学习者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数智化老年教育资源，为低收入老年群体提供一定的免费课程或优惠学习服务。

（四）加强人才培养，提升师资队伍数智化水平

一方面，加强现有师资培训。增强现有师资队伍建设和培训是提升智能化老年教育质量的关键举措。可以通过组织定期的数智技术培训，邀请行业专家进行授课和指导，传授最新的知识和技能。通过理论学习、实践操作和案例分析等方式，提高教师的数智化教学能力。另一方面，加大专业人才引进力度。人才指在某个行业或领域中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或出色技能的个体，是人群中的精华[5]。数智背景下老年教育教学的实施离不开专业的教师人才，在积极培养本校数智人才的基础上，老年教育机构还可以积极引进兼具数智技术背景与教育教学经验的专业人才，充实师资队伍，为老年教育的数智化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五）增强安全意识，注意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

目前，我国已出台了 30 多部法律法规用于规范互联网发展，但随着数智化产品的飞速发展，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首先，需要加大信息安全宣传教育。老年教育机构、在线教育平台及居民社区共同联动，通过组织信息安全讲座或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为老年人普及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知识，增强老年群体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措施。其次，相关部门出台法律法规，明确老年教育数字化平台的信息收集、存储、使用、传输等各个环节的安全责任和操作规范，为信息安全提供法律规制基础；同时，老年教育办学机构、在线教育平台等需不断强化对平台及应用的安全防护措施，积极采用加密技术等手段，全方位保障老年人的个人信息安全。

五、结论

数智时代为老年教育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通过充分利用数智技术，可以丰富教育资源、创新教学模式、提供个性化教育服务、拓展老年人社交学习参与机会，满足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提升老年群体的学习能力和参与能力，推动老年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政府、社会、教育机构和老年学习者等各方共同努力，通过加强数字素养教育、完善适老化产品设计、促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提升师资队伍数智化教学能力，强化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等缩小数字鸿沟。只有这样，才能让数智技术更好地服务于老年教育，让更多老年人在数智时代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学习体验。

参考文献

[1] 刘雪倩 . 老年教育数字化发展的现实困境及转型出路 [J]. 中国成人教育 , 2023(07): 16−21.

[2] 陈超贤 . 国外老年教育数字化发展模式与政策演变对我国的鉴示 [J]. 未来与发展 , 2024, 48(10): 67−71.

[3] 刘逸楠 . 人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老年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三重逻辑 [J]. 成人教育 , 2025, 45(02): 35−43.

[4] 新华网 .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 ）[EB/OL]. (2025−01−19)[2025−09−15]. 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50119/f33c2caa323249ca8fd2038515ee9620/c.html.

[5] 孙瑁 , 白明东 . 领导科学词典 [M]. 长春 :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8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老年教育权利的法治保障研究”（2023B062）。

（作者单位：贵州开放大学）

健康老龄化视域下涉老护理康养人才需求现状与对策研究

常　燕 常艳梅 李阳阳 贺五四 王玉琴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涉老护理康养服务需求在持续增长的同时，护理康养人才的供需矛盾却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护理康养人才为核心，系统分析当前行业的现状与问题。基于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等方式，发现当前行业主要存在岗位设置结构失衡、高技能人才短缺、职业吸引力不足、服务能力匹配度低等现状，并从五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包括优化岗位配置、强化高技能人才培养、提升职业吸引力、完善服务体系和加强政策支持等，从而为提升护理康养行业的人才供给质量和服务能力提出新的发展措施，为健康老龄化战略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健康老龄化；护理康养人才；医养分离；人才结构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健康老龄化已经成为了全球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 31031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22.0%。这一趋势对我国的医疗、养老服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也对护理康养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指导下，护理康养服务成为了保障老年人身体健康的主要环节 [1]。然而，我国的护理康养服务模式长期受到传统“医养分离”格局的制约，既存在护理资源分布不均的现实问题，也面临服务模式单一、从业人员流失率高等发展瓶颈。在此基础上，护理康养人才一直以来都是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的关键资源，其培养质量与服务能力直接影响老年人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幸福感 [2]。因此，系统性地研究涉老护理康养人才的现状，针对性提出优化对策，将是缓解老龄化压力的重要路径，满足推动健康老龄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现实需求。因此，本研究将从健康老龄化视域出发，基于实地调研与数据分析，揭示出我国涉老护理康养人才的供需现状，进而为完善区域性、差异化的人才供给机制提供合理的参考。

一、健康老龄化视域下的护理康养理论

健康老龄化的理念最早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其目标是基于提升老年人的功能能力与健康水平，使其在生命后期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 [3]。2015 年，健康老龄化理论经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发布的《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确定，也就是“发展和维护老年健康生活所需要的功能和功能发挥的过程”，即健康老龄化就是老年人的功能和功能发挥 [4]。这一理念注重从动态视角考察老年人的功能轨迹，并倡导经过促进内在能力和优化环境支持，改善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这一理论为老龄化社会的护理康养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我国，健康老龄化理论与医养结合战略一直以来都是紧密结合的，这一结合重点突出了老年人群体健康需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十四五”规划以来，我国多次提出要加快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推动护理服务、康复服务与精神慰藉等服务的融合发展。2021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老年健康服务工作的通知》，主要内容就是要增强老年健康服务意识、做好老年健康服务以及强化老年健康服务的组织保障，全面提升老年健康服务水平 [5]。而这一通知的实质目标与健康老龄化理念高度契合，也由此为护理康养人才的专业化、层级化培养指明了方向。加之近年来的“积极老龄化”“社区嵌入式服务”等理念也正处于被逐步纳入到健康老龄化框架之中的过程中，这就使得健康老龄化视域下的护理康养理论体系更加系统化、操作化。

而从国际经验来看，护理康养服务的发展不能只是单一地依赖于某个部门，医疗、卫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多领域的共同参与才能形成政策上的协同以及组织上的合作。以日本为例，其设立的介护福祉士资格证就是将养老护理职业路径进行规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该资格证是介护职业中日本承认的唯一国家资格，而且已经相对形成了较为系统化的“教育—实训—职业晋升”机制，基于该机制，日本护理行业

在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从业吸引力[6]。而从当前的社会发展来看，护理康养人才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照护人员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在健康老龄化战略中起到的关键支撑作用使其成为了一种复合型的服务主体[7]。这一群体是在承担日常照护任务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具有慢病管理、功能康复、心理疏导、文化引导等多元能力的专业人才。因此，如何以更加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水平，在21世纪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突破口。

二、涉老护理现状分析

（一）研究对象

研究以东部、中部和西部9个省份的养老机构及服务对象为调研范围，研究时间为2024年6月至12月。调研对象来自27个县（区），每个县随机抽取3个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最终覆盖了112家养老机构。这些机构中，公办机构占38.4%，民办机构占48.2%，公建民营机构占13.4%。机构规模涵盖从15至30张床位的小型机构到200张以上床位的大型机构，其中中大型机构分别占33.6%和45.5%。被调研机构中，约63.39%的机构具备一定的康复功能，设有康复部门，剩余机构仅提供基础护理服务。同时研究抽取2000名老年人，其中涵盖住养老人1060人，从调研的养老机构中按每家机构9至10人的比例随机抽取。女性占56.7%、男性占43.3%，其中75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占62.3%。居家老年人样本为940人，来自各县区的社区调查点，女性占54.12%、男性占45.88%，75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比例为45.7%。

（二）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自制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作为调查工具，具体设计如下。

1. 问卷设计

问卷分为机构问卷和老年人需求问卷，其中机构问卷用于评估养老机构的护理服务供给能力。问卷包含人员配置维度（6条目）、设施设备配置维度（6条目）和服务内容维度（6条目）3个维度，共18个条目。老年人需求问卷用于调查老年人对护理服务的需求。问卷包含日常活动能力需求（5条目）、慢病管理需求（5条目）和心理支持需求（5条目）3个维度，共15个条目。

机构问卷共发放112份，覆盖9个省份的养老机构，最终有效回收112份（回收率100%）。老年人问卷共发放2000份，实际回收1912份（有效回收率95.6%）。

2. 访谈设计

邀请30名机构负责人及20名护理人员参与访谈。访谈主题为探讨护理人员配置问题、设施设备利用率及老年人需求满足情况。每次访谈持续45分钟至1小时，录音记录并转化为文字分析材料。

（三）调查结果分析

1. 机构问卷结果

机构问卷的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各机构护理员数量充足，但高级技能岗位数量严重短缺，平均每家机构配置仅在2人左右，如表1所示。

表1 机构护理岗位配置与人员结构分布（n=112）

岗位类别	总人数（人）	平均每家机构人数（人）	学历分布（%）	
			本科及以上	大专
护理员	748	7	23	52
康复治疗师	250	2	35	43
康复医生	185	2	41	36
心理咨询师	102	1	89	11

2. 老年人需求问卷结果

老年人需求问卷调查显示，卧床护理需求覆盖率最高（92.4%），但供给覆盖率仅为71.3%，差距达21.1个百分点，反映出护理员技能需要提升。高血压护理和糖尿病护理供需差距均超过25个百分点，表明康复治疗师岗位急需补充。个性化心理疏导供需差距最大（43.1个百分点），心理咨询师的严重短缺是主要问题，如表2所示。

表2 老年人护理服务需求与供给情况（n=1912）

需求类型	具体需求	需求覆盖率（%）	供给覆盖率（%）	差距（百分点）	主要问题
日常活动能力需求	卧床护理	92.4	71.3	21.1	护理员技能不足，无法满足高龄老人的复杂护理需求
	自理能力辅助	84.1	63.8	20.3	个性化护理支持覆盖率低
	生活整理服务	78.6	64.5	14.1	服务标准化水平不足，部分机构服务未覆盖
慢病管理需求	高血压护理	85.3	59.6	25.7	康复治疗师不足，慢病管理服务供给能力不足
	糖尿病护理	76.8	51.4	25.4	血糖监测及饮食调控支持不到位
	心血管疾病护理	68.7	48.2	20.5	心血管护理服务覆盖率低
心理支持需求	个性化心理疏导	66.7	23.6	43.1	心理咨询师岗位设置不足，覆盖率极低
	集体心理活动	54.2	21.9	32.3	活动组织频率低，覆盖人群有限
	情绪管理支持	58.4	25.3	33.1	针对性情绪管理服务严重缺失

3. 访谈结果

基于对机构负责人和护理人员的访谈，可以了解到护理康养人才配置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如表3所示。

表 3 护理康养人才问题总结

序号	问题类别	反馈内容
1	护理员职业吸引力不足	薪资水平低、工作强度大、职业发展空间有限，导致流失率高、招聘困难
2	康复治疗师岗位短缺	康复治疗师岗位设置不足，直接影响慢病管理和康复护理服务的质量
3	心理咨询师覆盖率低	心理支持服务尚未形成体系，心理咨询师数量严重不足，服务覆盖率低于 20%

三、对策：优化涉老护理康养人才供给机制

针对护理康养岗位配置中基础护理员数量充足但高技能岗位严重短缺的问题，需要从动态优化岗位配置入手，利用科学化的手段提升岗位资源分配效率。

第一，建立供需评估机制，基于各地区的老年人口数量、健康状况和服务需求，定期开展护理康养岗位需求评估，评估内容涵盖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慢病管理需求、心理支持需求等多个维度。建立护理康养服务需求的数据库，经大数据分析精准预测未来岗位需求规模与类型。随后推动岗位的动态调整，根据供需评估结果，制定岗位动态调整机制。举例来说，每年按照老年人健康需求的变化情况调整高技能岗位的比例，并设置岗位扩展计划。在高需求区域（如城市社区或医疗资源稀缺的农村地区），优先增加康复治疗师和心理咨询师岗位供给。最后实施岗位灵活分配政策，针对高技能人才稀缺的问题，鼓励实施区域内岗位共享。可以通过区域服务中心协调心理咨询师或康复治疗师资源，采用“多点执业”的模式，让人才资源覆盖更多机构，提高关键性资源的利用效率。

第二，针对当前涉老护理康养服务真正能够长期胜任岗位且能够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健康需求的人才比例偏低的问题，可以建立一种具有针对性和以实践为导向的“院校—机构”联动培养机制，经过资源共享、岗位提前介入与真实场景训练等机制，让人才在初次进入岗位后就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上手”。其具体操作包括：由高职院校或本科护理专业与区域内养老机构签署“联合培养协议”，按机构的真实用人需求，设计课程并安排教学实践。机构参与到制定技能模块的标准中，院校根据这些标准设置各学期的实践课程，要保证课程内容必须包括老年慢病照护、认知障碍管理、康复辅具使用、基础心理疏导等基础工作任务。同时，实训基地直接设在养老机构内部，由机构内有经验的带教人员与学校教师共同指导学生进行实践操作。在此基础上，在学生临近毕业时，需进行岗位实习，由机构提前设计出完整的工作流程，工作任务包括早晚班轮岗、单人服务评估及多类型的案例，这一部分的内容一方面是训练，另一方面也属于对相关人才的提前筛选。表现优秀者可优先录用，并给予岗位适应期补贴、技术晋升通道等，帮助其直接从学生角色平滑过渡到适岗员工。

第三，应建立一个护理康养岗位胜任标准体系，让各机构所需要的人才能力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使人才使用模式和培养路径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可由地方卫生健康部门牵头，联合养老机构、高职院校和行业协会，共同制定出面向不同层级岗位的能力框架说明，在其中明确每一类岗位所需具备的专业知识、操作技能、服务风格与应急处理能力。举例来说，基础护理员需要掌握的是卧床照护、生命体征监测与简单辅助康复等能力；康复治疗师则须具备更深层次的评估能力、个体化训练计划制定能力等。同时建议将岗位胜任标准与机构人员备案、技能等级认定、政府购买服务等政策关联起来。养老机构在招聘时需依据标准设置岗位条件，并向外部发布，同时接受第三方能力测评机构对从业人员进行专业能力评估，考核合格的人员可获得标准化能力证书，用于后续的职称晋升、薪酬调整和培训安排。这样将有利于相关人才的公平流动，也能进一步引导机构提升其管理规范化水平。

四、结语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涉老护理康养服务的需求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护理康养人才供需矛盾愈发凸显。本研究以护理康养人才为核心，系统分析了当前行业现状，揭示了岗位设置失衡、高技能人才短缺、职业吸引力不足及服务能力匹配度低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护理康养服务质量提升的同时，也制约了健康老龄化目标的实现。针对行业现状，本文从岗位配置优化、构建“院校—机构”联动培养机制以及明确岗位胜任标准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对策，力求从宏观到微观层面提供解决方案。这些对策注重问题导向，聚焦实际操作性，为缓解供需矛盾和推动护理康养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明确路径。

参考文献

[1] 代沁泉，熊回香，沈舒悦，等 . 面向“健康中国 2030”的数字移民健康管护服务模型构建 [J]. 图书馆论坛，2024, 44(03): 106−115.

[2] 谭燕泉，王晓丽，糜迅，等 . 双育教育模式下“供需对接、五方合作”高等职业教育涉老护理康养人才培养初探 [J]. 齐鲁护理杂志，2024, 30(17): 154−157.

[3] 李运华，冯玉莹 . 健康老龄化视域下“医养结合嵌入式”养老服务的质量评价研究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41(04): 95−105.

[4] 杜鹏，董亭月 . 促进健康老龄化：理念变革与政策创新——对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的解读 [J]. 老龄科学研究，2015, 3(12): 3−10.

[5] 李芮 .《关于全面加强老年健康服务工作的通知》印发 [J]. 中医药管理杂志，2022, 30(02): 128.

[6] 张良文，李思成，方亚 . 长期护理保险对中老年人未满足长期照护需求的作用及影响因素研究 [J]. 中国卫生统计，2024, 41(05): 697−700.

（下转 68 页）

基于期望理论的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策略

刘　娟　王　熙　杨清超

摘要：当今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数字化已深深融入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这是不可逆转的现实趋势。但老年人群体在应对数字化进程的转变浪潮时面临诸多挑战，急需有效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本研究把期望理论当作理论基础，深入探究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因素，并根据理论分析结果提出多维度策略与建议，通过强化政策引导作用、构建并完善系统的培训体系、优化适合老年人学习的数字环境以及增强社会支持网络等综合举措，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融入数字化社会。

关键词：期望理论；老年人；数字素养和技能；提升策略；数字化转型

在如今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浪潮里，数字化正逐渐变成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老年人群体生理机能衰退、心理适应能力有限、社会参与度降低等因素，普遍面临数字化适应难题[1]。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与技能，这对他们融入数字化生活来说非常关键，也是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减轻社会老龄化压力的重要手段。此进程不仅关乎老年群体的幸福生活，还直接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及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2]。

本文基于期望理论，深入剖析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所面临的现实难题与关键问题，并依据该理论框架提出相应对策。经由政策引导、培训优化、环境重塑以及社会协同等多方面举措，力求给老年人营造友好的数字生态环境，使他们在数字时代既保留自主性，又增强社会连接性，最终达成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提升。

一、期望理论概述

维克多·弗鲁姆于 1964 年提出了期望理论。该理论表明，个人做决策时，会同时顾及对行为结果的期望与结果对自己的重要性，即人的行为依仗行为结果预期以及结果价值评估这两种因素的驱动，期望、工具性以及效价是其中的核心要素。在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这一情境中，期望理论起到关键的启示作用。期望理论能很好地阐释老年人学习数字技能的内在动机与行为逻辑。

（一）期望理论的基本内容

期望理论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核心要素：期望（Expectancy）、工具性（Instrumentality）和效价（Valence）[3]。期望是指个体对于某一行为能否实现预期结果所持有的主观概率判断。就老年群体来说，这展现出来的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学习能否最终掌握数字技能有怎样的信心。工具性就是个体对某一结果引发特定后果的信念。在老年人学习数字技能方面，他们觉得掌握这些技能带来实际好处，比如提升生活质量、拓展社交圈。效价是指个体对某一结果所具有的价值或吸引力所作出的主观评判。在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这一情况之下，其体现老年人对数字技能可带来的好处的重视程度。

（二）期望理论在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中的应用

根据期望理论，老年人学习数字技能的动机与行

（上接 67 页）

[7] 孔静，何友立，刘隔，等 .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高职男护生老年护理就业意愿及影响因素 [J]. 吉林医学，2024, 45(09): 2249-225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榆林职业技术学院校级教改项目“健康老龄化视域下涉老护理康养人才需求现状与对策研究”（J202432）；2024 年榆林市科技计划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现代农业体系中小农户康养模式构建路径探索”（2024-CXY-150）。

（作者：常燕、常艳梅、李阳阳、贺五四，榆林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王玉琴，榆林市中医医院）

为是由期望、工具性和效价这三个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努力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实践里，要重点关注这几个关键部分：

其一，提升期望值。就是提升老年人对自己掌握数字技能的信心，使其相信自己的努力学习能转化为实际的数字技能成果。

其二，需明确其工具属性。要让老年人清楚认识到，掌握数字技能带来哪些实在的好处，从而解决当前由数字鸿沟带来的生活难题，如更方便获取信息、与家人朋友更顺畅地交流等，让他们切实理解学习数字技能的意义与价值。

其三，提高数字技能的效价。增强老年人对数字技能带来的好处的重视程度，使他们真切明白数字技能对提升晚年生活质量与幸福感的重要性，进而让他们感受到内在的学习动力。

二、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现状与问题

（一）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现状

现今，老年人在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上已有了一定进展，不过总体水平还是不高，数字技能普遍较为匮乏[4]。不少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电脑这类数字设备时不够熟练，连基本操作都难以掌握，面对复杂功能时也常手忙脚乱。老年人在信息获取方面常感到力不从心，面对海量网络信息时，他们既不知道怎样筛选，又很难辨别真伪，难以获取精准、实用且可靠的资讯，常被大量无用信息所淹没。在网络安全方面，老年人网络安全意识薄弱，易被网络诈骗话术误导，把网络诈骗话术当成正常信息，使个人信息与隐私均面临严重威胁。

（二）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问题分析

老年人在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上困难颇多，原因多种多样[5]。从生理方面来讲，随着年龄变大，老年人视力、听力等势必衰退，他们看不清屏幕上的小字，耳背让他们听语音信息也难，这些都严重影响他们对数字设备的使用和信息的有效获取。从心理方面来讲，老年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度普遍比年轻人低，遇到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时，他们常会有点害怕，还没去学就退缩了，缺乏必要的自信心和持久的学习动力。从社会环境这一方面来讲，当下社会对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提高的重视程度不够高，缺乏系统且完备的培训体系，专门给老年人开展数字技能培训的课程较为罕见，同时存在教学方式单一、师资不足等问题。与此同时，社会支持机制尚不完善，家庭、社区、社会机构之间缺乏协同合作，很难形成全方位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的合力[6]。

三、基于期望理论的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策略

面对上述问题，按照期望理论，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以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与技能。

（一）增强期望：提升老年人学习数字技能后成功掌握的信心

1. 简化操作流程，降低学习难度

老年人视力、听力等有所减退，所以需要简化数字设备的操作流程，把学习门槛降下来，提高操作性和易用性。比如，开发适合老年人的智能手机、电脑，使用大字体、大图标，增加语音提示类设计，让其操作起来更方便、使用起来更顺手。

2. 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

按照老年人的学习特点与需求来给予个性化扶持。比如，配备一对一辅导人员，直面老年人学习数字技能时的困惑，予以个性化答疑解难。按照学习的进度以及水准，对教学内容和难度作出灵活调整，保证老年人能对数字技能逐渐掌握。

3. 搭建学习成果展示平台

为老年人打造展示学习成果的空间，让他们体会到学习的成就感与价值。譬如，举办老年人数字技能大赛、成果展等活动，以展示其进步。借助社交媒体、社区公告渠道，来宣传学习成果和优秀案例，促使更多老年人加入进来。

（二）明确工具性：使老年人清楚掌握数字技能的实际好处

1.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老年人的认知水平

通过宣传教育手段，让老年人认识到数字技能所带来的好处。借助媒体宣传、社区公告，广泛传播数字素养与技能知识，帮助老年人融入数字化社会，让他们在数字便利里得到实惠。

2. 提供实际案例，增强老年人的感知能力

以实际案例为切入点，使老年人真切体验到数字技能所带来的益处。例如，可组织参观数字科技展、体验数字生活场景这类活动，使他们沉浸地感受数字技术的魅力。邀请数字技能娴熟的老年人分享经验，借助身边人故事来拉近他们与数字技能的距离，把学习信心提振起来。

3. 开展实践活动，提升老年人的应用能力

借助实践活动来加强老年人数字技能的运用。要鼓励他们利用数字技能来解决生活难题，如在线购物、在线问诊，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

（三）提高效价：加深老年人对数字技能益处的认知与重视

1. 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构建起完备的激励体系，促使老年人踊跃参与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活动。例如，设立奖励机制，对表现优异的老年群体给予相应奖励。把数字素养和技能提升归入老年福利政策范畴，给予交通补贴、学习资料，营造出良好的学习氛围，从而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

2. 加强社会支持和服务

强化社会的支撑，给老年人打造出色数字学习环

境。比如，在社区、老年大学开设培训班，以创造便利的学习机会。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到老年数字教育之中，给予该方面的技术支持与服务。

四、具体实施措施

（一）加强政策引导与投入

制定相关政策。政府需出台政策，把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战略地位和具体目标明确下来，把它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蓝图，用政策来为老年人数字素养的提升保驾护航，同时厘清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的职责与义务。

加大财政投入。政府应设立专项基金或项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税收减免、发放补贴等多元方式，为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提供充足经费，鼓励各方力量参与其中。

（二）完善数字技能培训体系

建立培训体系。构建一个包含课程设计、教材编纂及师资培育在内的全面培训体系。按照老年人的身心状况与实际需求，精心设计实用的培训课程。编写浅显易懂且图文并茂的教材。汇聚一批热心且专业的教师，为老年人提供优质教学服务。

创新培训方式。突破传统教学模式，运用线上线下融合、代际互动等新方式，使老年人在沉浸式数字体验中消解畏惧心理，勇敢地去探索数字世界。凭借青年的活力与耐心，简化数字技能的底层逻辑与操作流程，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激发老年人的学习热情。

（三）优化学习环境

建设适老化数字学习设施。在社区、老年大学，给老年人配备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智能手机、电脑等设备，提供高速网络接入条件，为老年人创建便捷且舒适的活动空间。

打造数字学习社区。构建交流平台与社群，举办竞赛、展览，让老年人在互动中激发学习热情，分享学习所得，进而共同进步。

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为老年人安排专门的一对一辅导人员，以即时解答其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依据学习进度以及个人水平，灵活地对教学内容与难度加以调整，使每个老年人都能跟上学习节奏。

（四）强化社会支持与服务

鼓励企业参与。激励科技企业研发适老化数字产品，借助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给老年人开展技能培训，让技术进步去反哺老年人群体。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支持社会组织发起培训项目，与社区、学校携手拓展学习资源，为老年人创造更多学习机会。

倡导家庭支持。倡导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学习数字技能，以营造一个浓厚的家庭学习环境。为老年人配备必要的数字设备，提供网络接入服务，让家庭成为老年人数字学习的温暖后盾。

（五）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定期组织网络安全讲座与反诈骗宣传活动，深入解析最新诈骗案例，并借助媒体宣传及社区公告，全面推广网络安全知识，以增强老年人对网络安全重要性的认知。

提高网络安全技能。让老年人学会如何识别诈骗信息、使用反诈软件，为老年人筑牢数字安全防线、守护财产隐私安全。

五、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总的来讲，本文按照期望理论，深入分析了老年人数字素养和技能提升的现状、问题，还给出了有针对性的策略。期望理论的应用为阐释老年人学习数字技能的动因构建了一个明确的框架。凭借政策扶持、培训体系予以优化、学习环境被改善、社会服务以及网络安全教育得到强化等举措，能切实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与技能，让他们更顺畅地适应数字化社会，让生活质量与社会参与度得以提高。 这不仅关系老年人福祉，还是应对社会老龄化、推动社会均衡发展的关键途径。老年人数字素养得到提升后，他们能跨越数字鸿沟，获得数字时代红利，社会角色也得以重塑。老年人若能熟练运用数字设备与技术，就能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打破社交隔离，减少心理孤独感，精神世界得以丰富，生活幸福感明显提高。宏观上，让老年人融入数字浪潮，能充分挖掘银发群体的潜力，成为推动社会前行的正能量，给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二）展望

信息技术发展得很快，提高老年人数字素养和技能是个长期且挑战很大的课题。未来的研究可着重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精准把握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不同老年人对数字技能的需求都不一样，只有深入了解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才能够制定出精准且有效的策略。二是创新培训模式。 借助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打造沉浸式且有趣味的学习环境，如模拟数字生活场景让老年人进行实践操作，或者开发智能学习软件实时调整教学内容，以此提高学习效果与动力。三是增进各学科间的合作与交流。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多种学科资源整合起来，让各学科的优势都能被充分发挥，一起攻克难题，从而为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提升，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同时，要强化国际合作，参考国外先进经验，再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创新，推动老年人在数字时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参考文献

[1] 程慧平，蒋星．老年人数字素养培育国外经验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J]. 图书馆理论与（下转 71 页）

基于心理健康视角的儿童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

陈晓琴

摘要：21 世纪是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是空前的。作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群体，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心理健康问题并非只是单纯的个人健康问题，还紧密关联着个人的思想观念及全面发展。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绕不开心理健康问题，只有将心理健康问题同步解决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做好。本文从心理健康这一独特且关键的视角切入，以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实践为例，同时融合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丰富研究成果，就如何做好儿童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心理健康视角的、富有创新性的儿童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策略。期待这些工作策略，能够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策略

一、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儿童青少年承受着来自学习的压力，来自家庭的压力以及社交方面的压力，导致心理健康问题愈发突出。在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门诊中，接诊了不少厌学的孩子，厌学情绪普遍存在。患有孤独症、抑郁症等特殊病症的儿童青少年群体，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因此，为儿童青少年创造健康良好的成长环境，做好心理健康工作，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是当下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我们必须认识到，心理健康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各年龄层人群都需要关注心理健康，而且关注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很多疾病的根源是由心理健康问题导致的，尤其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如果没有妥善处理这一时期的心理健康问题，那么日后潜在的不良后果将会长期存在，甚至会日益凸显。所以守护国民心理健康，必须从儿童青少年时期着手布局，这有助于推动国民心理健康水平全面提升。

同时，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塑造儿童青少年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比较古板，都是强制灌输的方式，让人难以接受，思想教育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当前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手段。这种举措不仅可以帮助儿童青少年缓解心理压力、提升心理素质，还能为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提供内在动力。

对于两者的融合做法，很多学者也颇有研究。例如，万永春和孟亚指出，儿童青少年全面发展的基础

（上接 70 页）

实践 , 2023(06): 34-43.

[2] 吉万年 , 陆彩兰 . 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J]. 教育与职业 , 2024(17): 75-82.

[3] BUENGER V.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 Essential Theories of Motivation and Leadership[J]. personnel psychology, 2010, 59(03): 757-759.

[4] 宋月萍 , 彭可余 . 面向老龄化的数字社会治理 : 现实、演变与未来进路 [J]. 江西社会科学 , 2024, 44(05): 118-128.

[5] 杨晓莉 , 巨高乐 . 老年人数字排斥的影响因素与理论解释 [J]. 应用心理学 , 2024, 30(05): 387-399.

[6] 杨宝强 , 钟曼丽 . 赋权增能 : 农村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的长效机制 [J]. 湖南社会科学 , 2024(01): 128-13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江苏老年人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2023SJYB0907）。

（作者单位：无锡学院）

是心理健康教育，而思想政治工作则是其价值观塑造的核心途径[1]。两者的有机结合能够助力思想政治工作。本文以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例，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探讨基于心理健康视角的儿童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创新路径。

二、心理健康教育对儿童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一）两者的内在联系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为了推动人的全面成长，但是在学科特性和聚焦点上，两者还是各有侧重的。心理健康教育着重于个人的心理适应能力和情绪调控技巧的培养，而思想政治工作则致力于价值体系的建立和理想信念的巩固，目的在于培养人良好的思想品德。健康的心理是优良思想品德的重要基础，没有健康的心理就没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这样两者才能相互促进和互相补充。所以，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共同服务于人的成长与发展[2]。在日常工作开展过程中，可以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二）现实的实际需求

随着社会压力的与日俱增，不少儿童青少年面临的心理压力也日渐增强。心理健康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学业压力过大。随着教育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儿童青少年的学业压力巨大，作业多，考试多，培训班和兴趣班多，学习时间越来越多，休息时间被严重挤压，根本没有时间放松身心，学生所背负的心理压力不断增强。二是亲子关系紧张。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家庭环境，亲子关系紧张、单亲甚至存在暴力问题的家庭，都会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一定负面的影响，如果亲子关系处理不好，那么可能会造成孩子心理健康问题。三是人际交往问题。如果孩子无法和同龄人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没有找到玩得好的同伴，总是在交往中感到紧张、孤单、害怕，甚至遭遇校园霸凌，长期被同学欺负，孩子的心理健康也会受到影响。四是网络成瘾。如今网络在生活中是无孔不入，越来越多的孩子沉迷于游戏，孩子网络成瘾成为很多家庭所面临的问题。孩子长期沉溺于网络，每天通宵打游戏，无法自拔，不愿意学习和社交，学习能力越来越差，动力越来越少，甚至还有抑郁、焦虑、冲动等情绪问题。

（三）两者结合的优势

在提高人的思想觉悟与道德品质方面，思想政治工作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心理健康教育主要是关注人的情绪健康与心理状态。在日常工作中，将这两者有机结合，不仅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还能促进人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帮助人们形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与情感取向，从而推动其综合素养的进一步提升。对于儿童青少年而言，这样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心理健康的调适和身心健康也有重要意义。最终，两者的结合可以帮助儿童青少年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勇敢面对挑战，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健康成长[3]。

三、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的实施路径——以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为例

近年来，随着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将心理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通过多形式科普宣教、多类型互动活动、多方位延伸服务，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探索更有效的路径。

（一）强化科普宣教，提升心理健康意识，照亮成长之路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共同参与。通过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实践，我们深刻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结合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4]。心理健康教育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意识，还能通过心理知识的普及和情感引导，让思想政治工作更吸引人，更易于被接受。因此，应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度和认知度，同时通过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为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结合提供有力保障[5]。

在科普宣教过程中，医院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科普宣教活动。通过举办讲座、制作宣传资料、开展心理健康知识竞赛等形式，向广大学生和家长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升他们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6]。医院还利用新媒体平台，如微信公众号、官网、视频号等，定期发布心理健康方面的科普文章和视频，扩大宣传覆盖面，提高科普效果。特别是在“医心护航·心理健康教育进校园”公益服务活动中，医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将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机结合，以新闻客户端为平台开展线上直播，同时医院专家走进校园，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帮助儿童青少年和家长共同解决学业和生活上的压力，以及面临的一些心理和情绪问题。专家提倡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联动，共同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医院专家不单讲解心理健康知识，还会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将思想政治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方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也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载体和路径。

（二）开展志愿活动，增强心理健康体验，织密“关爱网”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结合，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引导，更需要通过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心理体验和价值认同。医院作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的重要机构，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将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深度融合[7]。例如，

“莘莘向学”项目通过分析厌学学生的心理原因，提供心理支持，教授学习策略和技巧，营造积极的学习环境，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重新发现乐趣，提升自我效能感。在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心理治疗室，因“厌学”问题前来咨询的儿童青少年占比最高，特别是在开学前及开学后一月内，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2018 年，医院开展“莘莘向学”项目，该项目专门为对学习缺乏兴趣或感到厌烦的学生群体而设，通过分析原因、提供心理支持、教授学习策略和技巧、营造积极的学习环境四个方面，帮助学生重新发现学习的乐趣，提升学习动力，缓解情绪压力，增强自我效能感。“莘莘向学”活动形式灵活多样，开展至今，先后与 24 所温州各大中小学合作，进行心理普查 1 万多人次、志愿服务近 2 万人次，对高危学生进行重点关注，并提供专业心理咨询和支持。这一过程中，医院不仅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还通过志愿者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和人生目标，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实践中。

此外，“日月同辉、星星相随”志愿服务队通过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和心理支持，不仅改善了患儿的病症，还通过志愿者的行为示范，传递了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价值观。这种志愿服务形式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心理健康体验，也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案例[8]。通过志愿活动，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感受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政治工作的熏陶。同时，医院还开展了“多彩情绪花”儿童心理健康促进活动。青年志愿者在校园里开展的这场折纸体验活动，实则为情绪手工课，引导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情绪，有开心、愉悦等积极的情绪，也有伤心、难过、生气等消极的情绪。通过勇于表达情绪，促进思考如何才能拥有更多积极的情绪。只有家庭、学校、相关部门等形成合力，全社会共同行动，才能更好地为儿童青少年营造尊重、理解、包容的成长环境。

（三）延伸服务触角，构建全方位服务体系，共育美好未来

医院积极借助“互联网 +”技术，拓宽心理健康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搭建更加完善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这个体系的建立，不仅让心理健康服务更加便捷，也提供了新的思想政治工作平台与工具。比如，医院建立“瓯越心港湾”心理咨询平台，提供心理测评、团辅预约等服务，还定期发布心理健康科普文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

为了让儿童青少年更方便地获得心理健康服务，医院打造线上诊疗平台，比如“互联网云医院”和“专属医生”等平台。他们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不影响学业的前提下，在这些平台上享受到线上问诊、医保结算、药品快递到家等服务。在心理援助热线 96525“一号达”平台上，医院通过整合教育、团委、妇联等部门的资源，实现了资源的多方联动。只要拨打热线，就可以享受 24 小时的专业心理服务，面对打电话者有自杀风险的高危来电，医院联动警方，实现一键报警，医警联动，挽救鲜活生命。这些线上平台不仅帮助儿童青少年更好地了解自身心理状态，也为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在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中融入思想教育内容，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他们正确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惑。这种方式不仅提升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也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四、结语

本文从心理健康的视角出发，结合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工作实践，探讨了儿童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路径。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医院通过加强科普宣教、开展志愿活动、延伸服务触角等方式，让两者相融相促，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两者融合的做法不仅守护学生的心理健康，解决当前的心理健康问题，也让思想政治工作更有效，更具人性化，更便于接受，还能更好地帮助人们解决心理健康问题，为人的全面发展夯实基础。希望通过这样的探讨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取得更多突破，创新工作模式，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1] 万永春，孟亚．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 20 年：研究热点、知识图谱与发展趋势 [J]. 心理研究，2024, 17(01): 87−96.

[2] 肖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实施路径探析 [J]. 社会与公益，2024(10): 236−238.

[3] 周静．“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院校心理健康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度融合研究 [J]. 大学，2024(35): 19−22.

[4] 李敏．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融合的育人路径探析 [J]. 现代职业教育，2024(07): 169−172.

[5] 贺雯．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工作在高校育人工作中的协同促进作用探究 [J]. 现代农村科技，2024(01): 131−132.

[6] 洪君．新媒体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应用探究 [J]. 教育信息化论坛，2021(06): 90−91.

[7] 李俊玲．思想政治工作与心理健康教育协同策略探析 [J]. 世纪桥，2024(16): 57−59.

[8] 李婉青，强蓓．“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点与规律研究 [J]. 陕西教育（高教），2024(12): 21−23.

（作者单位：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婴幼儿托育中的家园共育模式创新研究

周君丽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家庭结构的变迁，婴幼儿托育的需求不断上升，家园共育模式成为托育领域的核心重点。本研究借助混合研究方法，剖析家园共育模式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摸索其创新渠道与政策主张。研究表明，家园合作共育模式可切实推动婴幼儿情绪管理和社交技能成长，但家长参与度低、文化差异明显及教师专业能力不足造成主要障碍，因此，提出借助数字化平台、提高家长参与积极性、强化教师专业能力等创新手段，并建议政府推行政策促进家园共育模式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稳固了家园共育理论的框架，为托育机构和家庭提供实践上的指引，具备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家园共育模式；婴幼儿托育；家长参与；教师专业发展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婴幼儿托育的发展现状

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家庭结构的改变，婴幼儿托育的需求日益攀升，近年来国家政策针对婴幼儿托育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尤其是《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的出台，带动了托育行业的迅猛发展。从《中国婴幼儿托育服务市场发展报告（2022）》可知，在过去五年间，全国婴幼儿托育机构的数量增长了接近 30%，托育服务的普及比例及质量显著提高。

托育机构在满足婴幼儿基本照护需求的同时，如何带动其全方位成长，仍然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家园共育作为托育机构与家庭合作的主要模式，渐渐成为托育领域的核心话题，家园合作不仅可以助力婴幼儿在情感、社交以及认知等领域实现全面发展，还会增加家长跟托育机构相互间的信任与协作，然而目前的家园共育模式在实际运作中依旧面临较多挑战，如家长参与的程度偏低、交流有隔阂、存在文化差异等情形，迫切需要借助创新模式来解决。

（二）家园共育的理论基础

家园共育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依托于生态系统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和家校合作理论。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王娟指出，家庭与托育机构作为婴幼儿发展的核心微观系统，其互动质量直接影响婴幼儿的社会适应能力[1]；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方面，李敏强调家园共育为婴幼儿提供了“最近发展区”的互动场景，促进其认知与情感的协同发展[2]；家校合作理论本土化研究中，张丽提出“三维协同模型”，即家庭、托育机构、社区在婴幼儿发展中的功能互补机制[3]。

在中国学者开展的研究里，家园共育的理论基础结合本土实践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陈兰基于“活教育”理论，提出家园共育应聚焦婴幼儿生活经验，通过生活化活动实现教育目标。赵娜从文化适配视角出发，构建了“文化敏感性家园共育框架”，强调尊重家庭文化差异的重要性[4]。

这些理论为家园共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说明家园共育不仅可以推动婴幼儿的全面成长，还可增进家庭和托育机构之间的协作与信赖，然而现有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理论探讨上，缺少对家园共育模式创新的系统性探究，尤其是在数字化平台应用、引导家长提高参与度等方面的研究仍相对不足。

（三）研究意义

本研究具有填补家园共育模式创新研究空白的意义，还为托育机构与家庭提供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家园共育策略。在理论层面上，本研究通过把生态系统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以及家校合作理论结合起来，归纳出家园共育模式创新的理论框架，充实了家园共育的理论研讨；在实践层面上，借助实证的途径分析，给出具体的家园共育创新途径，像数字化平台的运用、家长参与程度提高策略等，为托育机构与家庭提供实践方面的指导。

本研究重视家园共育中文化差异与教师角色的转变，提出贴合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园共育策略，探究教师在家园共育过程中的专业发展需求，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增进家园共育的实际成效，还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思路指引，支持婴幼儿托育行业实现可持续性的

快速发展。

二、家园共育的研究现状

（一）家园共育的国内研究现状

家园共育作为托育机构同家庭合作期间的主要模式，近几年来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

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家园共育的理论探究与实践模式方面。例如，刘芳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家园共育数字化平台将家长参与度提升 27%，显著改善婴幼儿情绪管理能力[5]。然而，张伟指出，当前家园共育仍存在“形式化合作”问题，约 63% 的托育机构未建立有效的家长需求评估机制[6]。

（二）家园共育模式的主要类型

现有的家园共育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传统面对面沟通：依靠家长会、家园联系手册等方式实施沟通，具有直接、及时的优点，缺点为容易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2. 数字化平台：依靠手机应用、在线平台等开展交流，优势是便捷、高效，缺点是需要技术的后盾支持。

3. 家长参与活动：以组织家长工作坊、亲子活动等方式，促进家长的加入，优点是互动性好，缺点是需要准备较多的资源。

（三）家园共育中的挑战与问题

现今家园共育当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如下几方面。

1. 家长参与度低：家长参与度不足且质量不高，多数双职工家长受工作繁忙、时间碎片化影响，难以常态化参与线下家长会、亲子活动等共育项目；部分家长存在“教育责任转嫁”认知，将婴幼儿照护教育责任完全托付给托育机构，对线上育儿指导、经验分享等活动响应消极，参与多停留在“签到打卡”的表层。

2. 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引发沟通与认同障碍，托育机构服务对象涵盖不同地域、民族、职业背景家庭，部分家长的传统育儿理念与机构现代教育模式存在分歧，而机构多采用标准化共育方案，未充分考量不同家庭的文化习俗、教育需求，导致家长对共育活动认同感低，易产生沟通误解。

3. 教师专业能力不足：教师专业能力不足，多数教师未接受系统的家园共育培训，在跨文化沟通、个性化活动设计上能力欠缺，且部分教师数字化平台操作不熟练，难以发挥平台的互动与资源共享价值，制约共育效能。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整合式研究方法，为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采用定量研究分析家园共育模式对婴幼儿发展的影响，定性研究用来深度分析家长和教师的体验与反馈。

（二）研究对象

研究把托育机构中的婴幼儿、家长和教师定为对象，样本选取标准如下：

婴幼儿：年龄为 0 到 3 岁的阶段，而且在托育机构接受全日制托管。

家长：婴幼儿的主要照护者，涵盖其父母以及其他监护人。

教师：在托育机构内承担婴幼儿照护与教育工作的专业人员。

样本数量：婴幼儿 100 名、家长 100 名、教师 50 名，样本挑选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式，保障覆盖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托育机构。

（三）数据收集方法

1. 定量数据：定量研究工具参考了国内最新研究成果。例如，问卷设计借鉴了李明（2020）编制的《家园共育质量评估量表》，该量表经大样本验证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s α =0.89）[7]。

2. 定性数据：借助深度访谈与观察法收集，访谈对象包括家长与教师这两个群体，访谈提纲包含家园共育的体验、挑战以及改进的相关建议，观察法的主要用途是记录托育机构中家园共育的实际操作情形。

（四）数据分析方法

1. 定量数据分析：采用 SPSS 软件开展针对性统计分析，主要的分析手段有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依托回归分析，剖析家园共育模式对婴幼儿发展的影响。

2. 定性数据分析：运用主题分析法，对访谈和观察筛选的数据进行编码和归类，归纳家园共育中的关键主题和问题。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定量数据分析结果

采用 SPSS 软件对问卷调查数据加以分析，结果显示：①家长的参与度与婴幼儿情绪管理的能力显著正相关（$r=0.45$, $p<0.01$），说明家长参与度越高，婴幼儿情绪管理能力变得更强；②家园共育模式显著影响婴幼儿的社交技能（$\beta=0.32$, $p<0.05$），说明家园共育模式可以增强婴幼儿的社交技能；③数字化平台的使用与家长满意度显著正相关（$r=0.51$, $p<0.01$），表明数字化平台在提升家长对家园共育满意度方面有成效。

（二）定性数据分析结果

采用主题分析的模式对访谈和观察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出以下关键主题：

1. 家长参与度低的具体体现：访谈中不少家长称因工作压力大、时间不充裕，难以按约定周期参与托育机构组织的家园共育活动，部分家长还述说，现有的家园共育活动形式比较单一，缺乏聚合力，造成参与积极性偏低。

2. 文化差异的实际影响：部分家长提到，托育机

构在制订家园共育的活动规划时，未能全面思考不同家庭文化背景的多元性，造成沟通过程出现误解与不适情形，如有些活动的形式及内容与家庭传统观念相悖，造成家长参与此活动的积极性变差。

3. 教师专业能力不足的具体方面：教师们普遍反馈，在实施家园共育工作中缺少系统的培训及支持，尤其在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如何沟通对接、怎样规划有特色的家园共育活动等方面感到力不从心，部分教师还反映，现有的家园共育模式缺少灵活性，很难满足多元化的家庭需求。

（三）综合分析

结合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综合分析得出：家园共育模式在促进婴幼儿情绪管理以及社交技能方面效果明显，但家长参与度以及文化差异是降低家园共育效果的主要因素；数字化平台的应用在提升家长参与度和满意度方面效果显著，但在实际操作的实施阶段仍需解决教师专业能力发展不足的问题。

五、讨论与建议

（一）家园共育模式的创新路径

1. 应用数字化平台：开发匹配托育机构要求的数字化家园共育平台，推动家长跟托育机构之间的实时沟通及信息互通，平台应实现个性化推送功能，按照婴幼儿各成长阶段和家庭需求，给予量身定制的教育资源与活动建议。王芳（2023）提出了“智能共育系统”模型，该模型通过 AI 分析婴幼儿发展数据，为家庭提供个性化育儿方案[8]。

2. 提升家长参与度：以灵活的家园共育活动规划与个性化的交流策略，提高家长的参与程度，例如，实施“家长导师”制度，邀约有经验的家长交流育儿经验，增进家长相互间的互动帮扶。

3. 增强文化适应性：把文化敏感性培训添加到家园共育模式中，让教师学会接纳且尊重不同家庭的文化背景，可实施跨文化活动，促进家庭与托育机构文化维度的融合。

（二）家园共育中的教师角色与专业发展

转换教师角色，使教师在幼儿园与家庭共同实施的教育方案中扮演引导者和协调者的角色，指导家长更合理地参与婴幼儿的教育，教师应具备跨越文化隔阂进行沟通的能力，可以有效克服文化差异形成的阻碍；从专业成长方向来看，应向教师提供与家园共育相关的专业培训，增强其在家园共育中的专业本领，培训内容应涉及家庭教育指导、跨文化沟通技巧、数字化工具应用等层面。

（三）家园共育中的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

政府宜制定相关政策，支持家园共育模式创新开展，尤其要在数字化平台搭建以及教师培训方面给予资金投入，可设立专项基金，倡导托育机构开展新颖多样的家园共育项目；托育机构应建立一套家园共育的长效机制，保障家园共育模式持续发展的连贯性；可制定出家园共育评估规范，按既定时间对家园共育效果开展评估与优化。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家园共育模式的宣传推广，提升家长和社会对这一模式的理解与参与主动性，可利用举办讲座、工作坊等形式，向家长推广家园共育的理念和方法，增强他们参与的意识和技能，托育机构应主动跟社区、学校等外部资源携手合作，建立多方协作的共育网络，进一步扩充家园共育的内容及形式，依靠政府、机构、家庭与社会的协同努力，营造出一个更和谐、高效的共同培育环境，助力儿童全面健康成长。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的样本规模不大，并且研究时长受限，不宜推进长期跟踪研究，后续研究可进一步考察家园共育对婴幼儿长久发展的成效，并开展跨文化对比研究，此外可对家园共育模式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适用性展开探索，为更多的家庭提供支持。

六、结论

本研究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系统探究婴幼儿托育家园共育模式的实践价值、现存问题及优化路径，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家园共育模式对婴幼儿早期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定量数据显示，家长参与度与婴幼儿情绪管理能力呈显著正相关（$r=0.45$, $p<0.01$），家园共育模式对婴幼儿社交技能发展具有显著预测效应（$\beta=0.32$, $p<0.05$），数字化平台的应用可有效提升家长满意度（$r=0.51$, $p<0.01$），印证了技术赋能共育的实践价值。

其二，当前共育实践面临多重协同梗阻，家长参与不足、文化差异冲突、教师专业能力欠缺三者相互影响，形成“参与意愿低—文化适配差—专业支撑弱”的负向循环，成为共育效能释放的核心瓶颈。

其三，创新家园共育模式需构建多维协同体系。实践层面，应开发兼具个性化与互动性的数字化平台，设计灵活多元的共育活动以提升家长参与深度，通过专项培训强化教师跨文化沟通、活动设计及数字化应用能力；制度层面，需政府出台政策支持，设立专项基金助力模式创新，推动托育机构、家庭、社区形成协同共育网络。

本研究充实了家园共育理论框架，为实践提供了可操作指引，但存在样本规模有限、研究周期较短的局限。未来可扩大样本覆盖范围，开展长期追踪研究，深入探索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共育模式的适配性，构建长效发展机制，助力婴幼儿托育行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娟 . 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家园共育的路径优化 [J]. 早期教育 2020(05): 12-15.

（下转 77 页）

山区农村居民养老服务需求偏好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浙江省山区县K县的抽样调查

林　菲

摘要：山区农村养老面临服务需求和供给的失衡问题，把握山区农村居民养老服务需求偏好及影响因素，有助于精准对接养老服务的供需。课题组基于对浙江省山区县K县229位40岁以上农村居民的调研和访谈资料，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其养老偏好情况，并运用卡方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养老偏好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山区农村居民偏好医疗保健类和日常照料类养老服务，偏好家庭养老，同时养老方式偏好渐趋社会化和多元化，年龄和子女数量是两个比较关键的独立影响因素。

关键词：山区农村；农村养老；养老服务需求偏好

一、问题的提出

养老服务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影响老年群体生活质量和获得感的重要因素。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农村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23.81%，比城镇老年人占比高7.99%。在农村区域老龄化日趋严重、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攻克的课题。民政部联合农业农村部等21个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首次在全国层面对农村养老服务作出系统性部署；《浙江省老龄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大对农村，特别是山区、海岛等地区基本养老服务的财政投入和服务供给，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是在农村特定条件的约束下，不同供给主体将多样化的养老产品或项目，以不同的方式配送到不同需求老年群体的过程[1]。山区农村人口密度低，分布呈现分散化特点，在农村“空心化”和家庭结构核心化的背景下，养老保障相对于城市地区更为薄弱。目前部分山区农村投入的养老服务资源未达到应有效果，存在供求失衡矛盾突出问题。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有效性明显不足[2]，例如存在一定的无效供给，床位紧张和床位空置同时并存[3]。解决农村养老服务问题，关键是精准对接养老服务的供需[4]。而养老习惯与偏好因素是破解养老服务需求意愿与行为悖离困局的潜在障碍[5]。本课题研究的问题包括：目前山区农村居民有哪些养老服务需求偏好？需求偏好背后的现实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根据山区农村居

（上接76页）

[2] 李敏 . 社会建构主义视域下家园共育的互动机制研究 [J]. 学前教育研究 , 2021(03): 45−52.

[3] 张丽 . 家校合作理论的本土化创新与实践 [J]. 中国教育学刊 , 2022(07): 68−73.

[4] 赵娜 . 文化适配视角下的家园共育策略研究 [J]. 幼儿教育 , 2023(02): 18−22.

[5] 刘芳 . 数字化平台对家园共育效果的影响研究 [J]. 教育信息化 ,2021(06):56−61.

[6] 张伟 . 家园共育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J]. 早期教育研究 ,2022(04): 23− 27.

[7] 李明 . 家园共育质量评估工具的开发与验证 [J]. 学前教育研究 , 2020(11): 67−74.

[8] 王芳 . 智能技术支持下的家园共育模式创新 [J]. 中国电化教育 , 2023(08): 92−9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年度北海职业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类课题“‘双高’建设背景下儿科医学与婴幼儿托育专业交汇融合教学策略”(2023YJY17)。

（作者单位：北海职业学院）

民养老服务需求偏好和影响因素来优化当前山区农村养老服务的供给，进而推动山区农村养老服务需求与养老服务供给的耦合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K 县是浙江省西部山区县，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常住人口为 258810 人，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74041 人，占比 28.61%，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均为 18.7%）9.91 个百分点。其中 K 县农村常住人口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37.91%，远高于城镇常住人口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 19.53% 的占比，部分偏僻农村常住人口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50%（最高为 56.57%）。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K 县常年居住在农村的居民调查，于 2024 年 3 月至 5 月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完成。定量数据采用入户一对一当面访谈的方式开展问卷调查，问卷根据居民的回答由课题组成员代填，问卷调查采取随机抽样方法，总计填写问卷 240 份，有效问卷 22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42%。调查样本总体情况详见表 1。

表 1 调查样本的描述性统计（n=229）

变量	类别	人数	比例 (%)
性别	男	103	45.0
	女	126	55.0
年龄	40~49	39	17.0
	50~59	47	20.5
	60~69	46	20.1
	70~79	64	27.9
	80 岁及以上	33	14.4
文化程度	没上过学	76	33.2
	小学	69	30.1
	初中	46	20.1
	高中（含中专）	16	7.0
	大专及以上	22	9.6
健康情况自评	很好	41	17.9
	比较好	110	48.0
	一般	59	25.8
	不好	19	8.3
婚姻情况	已婚	173	75.5
	未婚 / 离异 / 丧偶	56	24.5
子女数量	1	58	25.3
	2	82	35.8
	≥ 3	89	38.9
职业	务农	179	78.2
	非务农	50	21.8
经济条件自评	非常高	2	0.9
	偏上	56	24.5
	中等	139	60.7
	偏下	30	13.1
	贫困	2	0.9
养老保险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 其他	84	36.7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45	63.3

（二）变量选择

1. 因变量

本研究选取分类变量问题“您希望自己的养老方式是？”作为因变量，根据养老主体，问题选项包括自我养老（独立养老）、社会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和家庭养老（子女养老）。

2. 自变量

本研究将自变量分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保障特征三个维度，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健康情况自评；家庭特征包括婚姻情况、子女数量；社会保障特征包括职业、经济条件自评、养老保险参保情况。

三、研究结果

（一）山区农村居民养老服务需求偏好的描述性分析

1. 养老方式偏好

数据结果显示，山区农村居民的养老方式偏好呈现多样化特点，选择比例最高的是家庭养老，占比 54.6%；其次是自我养老，占比 34.9%；排在最后的是社会养老，占比 10.5%。

2. 养老服务具体内容偏好

数据结果显示，87.8% 的居民偏好医疗保健类服务，76.9% 的居民偏好日常照料类服务，35.8% 的居民偏好文化娱乐类服务，34.1% 的居民偏好精神慰藉类服务，2.2% 的居民表示不需要养老服务。

在医疗保健类服务偏好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定期体检（84.7%）、陪同看病（59.4%）和上门诊断（44.1%），其次是日常康复陪伴（34.1%）和急救服务（31.9%）；在日常照料类服务偏好中，排在前三位的是提供餐饮（66.4%）、提供生活必需品（54.6%）和卫生清洁（54.1%），其次是协助体力活（42.8%）和日夜间照料（22.3%）；在文化娱乐类服务偏好中，排在前三位的是老年文体活动（88.2%）、健身设施（33.6%）和社区阅览室（24.9%）；在精神慰藉类服务偏好中，排在前三位的是看望关爱（81.2%）、聊天解闷（60.3%）和老年人服务热线（25.8%），15.3% 的居民需要心理咨询（情绪疏导）。

（二）山区农村居民养老服务需求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

1. 养老服务需求偏好的单因素分析

对山区居民养老方式偏好进行交叉列联表分析，单因素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居民的年龄、文化程度、婚姻情况、子女数量、职业等因素对居民养老方式偏好产生显著影响（$p<0.05$）。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山区农村居民养老服务需求偏好的单因素分析 [n（%）]

变量	类别	养老方式偏好			χ^2	P
		自我养老	社会养老	家庭养老		
性别	男	44（42.7）	10（9.7）	49（47.6）	5.039	0.080
	女	36（28.6）	14（11.1）	76（60.3）		
年龄	40~49	25（64.1）	9（23.1）	5（12.8）	78.433	0.000
	50~59	29（61.7）	2（4.3）	16（34.0）		
	60~69	11（23.9）	5（10.9）	30（65.2）		
	70~79	14（21.9）	8（12.5）	42（65.6）		
	80 岁及以上	1（3.0）	0（0.0）	32（97.0）		
文化程度	没上过学	13（17.1）	3（3.9）	60（78.9）	48.628	0.000
	小学	20（29.0）	10（14.5）	39（56.5）		
	初中	24（52.2）	3（6.5）	19（41.3）		
	高中（含中专）	10（62.5）	2（12.5）	4（25.0）		
	大专及以上	13（59.1）	6（27.3）	3（13.6）		
健康情况自评	很好	14（34.1）	6（14.6）	21（51.2）	4.535	0.605
	比较好	42（38.2）	11（10.0）	57（51.8）		
	一般	18（30.5）	7（11.9）	34（57.6）		
	不好	6（31.6）	0（0.0）	13（68.4）		
婚姻情况	已婚	69（39.9）	22（12.7）	82（47.4）	15.031	0.001
	未婚 / 离异 / 丧偶	11（19.6）	2（3.6）	43（76.8）		
子女数量	1	20（34.5）	11（19.0）	27（46.6）	22.389	0.000
	2	38（46.3）	10（12.2）	34（41.5）		
	≥ 3	22（24.7）	3（3.4）	64（71.9）		
职业	务农	53（29.6）	18（10.1）	108（60.3）	11.762	0.003
	非务农	27（54.0）	6（12.0）	17（34.0）		
经济条件自评	非常高	2（100.0）	0（0.0）	0（0.0）	13.721	0.052
	偏上	12（21.4）	10（17.9）	34（60.7）		
	中等	53（38.1）	11（7.9）	75（54.0）		
	偏下	11（36.7）	3（10.0）	16（53.3）		
	贫困	2（100.0）	0（0.0）	0（0.0）		
养老保险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 其他	33（39.3）	12（14.3）	39（46.4）	4.169	0.124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47（32.4）	12（8.3）	86（59.3）		

2. 养老服务需求偏好的多因素分析

为深入了解各因素的影响作用，在单因素卡方检验的基础上，采取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以卡方检验中显著的变量为自变量，对三类养老方式偏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子女数量对山区农村居民养老方式偏好产生显著影响。具体结果见表 3。

3. 养老服务需求偏好的主观解释

在山区农村居民的认知中，家庭养老主要是指需要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或在必要时提供人力照顾，不要求天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调研走访中发现大部分村民认为子女是养老责任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常年独居或者和老伴一起居住，仅生病住院时才会麻烦在外工作的子女，更多的时候是依靠子女的家庭转移支付支持自己的养老生活。

在山区农村居民的认知中，自我养老主要是指不需要子女支持，依靠自己独立养老的模式。在访谈中了解到，村民选择自我养老有现实考量，也有部分无奈，认为自己是家庭负担，为了不拖累子女，他们尽量规划自己养老。另一方面，他们即使步入老年，仍在发挥代际支持作用，例如接济在城里工作的子女，减轻子女压力，尽全家之力托举子女在城市“落地生根”。

在山区农村居民的认知中，社会养老主要是指依靠政府或社会提供的养老服务，并需要花费一定的金钱购买服务。年龄相对较小的村民对社会养老的了解较多，对社会养老的接受度也更高。在社会养老选择中，村民更偏好居住在自己所在的村里，由相应的服务主体提供需要的养老服务。在访谈中，他们同时表示对社会养老的经济承受能力有一定的担忧。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家庭养老依旧是农村养老服务的关注重点，绝大部分的居民偏好家庭养老，次之自我养老，选择最少的是社会养老，养老方式偏好渐趋社会化和多元化。在养老服务具体内容上，偏好医疗保健类和日常照料类服务，对文化娱乐类和精神慰藉类的服务偏好较少。在医疗保健类服务需求层面，偏好定期体检、陪同看病和上门诊断；在日常照料类服务需求层面，偏好提供餐饮、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卫生清洁；在文化娱乐类需求层面，对老年文体活动的偏好最多。在精神慰藉类需求层面，偏好看望关爱和聊天解闷。

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是 K 县农村养老服务需求偏好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年龄、子女数量是养老方式偏好的两个比较关键的独立影响因素。年龄较大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年龄较小的倾向于选择自我养老。子女数量 3 个以下的更倾向于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子女数量 3 个及以上的更倾向于家庭养老。性别、健康情况自评、经济条件自评和养老保险参保情况对养老方式偏好没有显著影响，这和其他研究者的结论不一致，主要原因可能是本课题的样本选择基本是具有自理能力的群体，且目前在村生活的经济条件差距不大，居民基本配备养老保险，所以出现结果虽有差异但不显著的现象。单因素卡方检验结果和多因素回归结果出现不一致，主要原因是第三变量的干扰，但这不影响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故没有继续分析

表 3 山区农村居民养老方式偏好的多因素分析

养老方式偏好		B	SE	Waldx² 值	P	OR（95%CI）
社会养老	截距	−4.145	3.071	1.822	0.177	0.016（0.000~6.510）
	性别	0.910	0.522	3.037	0.081	2.485（0.893~6.915）
	年龄	0.826	0.351	5.554	0.018*	2.285（1.149~4.542）
	文化程度	0.395	0.290	1.864	0.172	1.485（0.842~2.619）
	婚姻情况	0.936	0.880	1.131	0.288	2.550（0.454~14.314）
	子女数量	−0.982	0.395	6.188	0.013*	0.374（0.173~0.812）
	职业	−0.173	0.572	0.092	0.762	0.841（0.274~2.579）
	经济条件自评情况	−0.445	0.401	1.233	0.267	0.641（0.292~1.406）
家庭养老	截距	−2.632	1.963	1.798	0.180	0.072（0.002~3 .370）
	性别	0.541	0.370	2.138	0.144	1.718（0.832~3.551）
	年龄	1.150	0.240	22.923	0.000***	3.158（1.972~5.056）
	文化程度	−0.019	0.208	0.008	0.927	0.981（0.653~1.474）
	婚姻情况	−0.019	0.464	0.002	0.967	0.981（0.395~2.437）
	子女数量	−0.558	0.268	4.317	0.038*	0.572（0.338~0.969）
	职业	−0.155	0.425	0.134	0.715	0.856（0.372~1.968）
	经济条件自评情况	0.112	0.275	0.165	0.684	1.118（0.653~1.915）

注：因变量参考类别为自我养老；*p<0.05，**p<0.01，***p<0.001。

其混杂或者中介变量的影响。

（二）启示

在宏观上，根据山区居民的养老方式偏好，坚持“需求引导供给”理念，避免出现养老服务泛化、养老服务悬浮问题。一是当前山区农村养老服务仍要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机构为补充。做好山区农村家庭养老的支持体系建设，提高家庭养老的保障能力。例如 K 县 XY 村推动艺术、旅游融合发展，为居民提供在村里工作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家庭养老提供了经济支持。二是构建“老人—家庭—村集体—政府—社会”多方参与的养老服务主体体系，缓解山区农村养老的主体困境。山区居民的养老责任主体观念正在发生变化，由子女承担照顾老年人的主流观念，逐步转变为老人自己、子女、社会、政府共同承担的观念。但当前山区农村受到地域、资金、人才等限制，仅依靠家庭、社区或者政府的单一力量，难以满足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K 县推进公办养老机构改制工作，推广“公建民营”做法，促进养老服务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三是逐步推进社会养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对于偏好独立养老和社会机构养老群体，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将会不断提升。依托所在农村社区或养老服务机构，提前谋划新一代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既满足他们的养老服务需求，又满足其居住偏好。

在微观上，根据山区居民的养老服务具体内容偏好，促进基本养老服务的供需适配。实现从“能够为居民提供什么养老服务”到“居民需要或者偏好什么养老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进而制定更科学的政策，提供更契合的服务，解决供需不匹配、相脱节问题。一是制定山区农村基本养老服务个性化清单，增加助餐服务、陪同看病、上门诊断等日常照料类和医疗保健类的服务项目供给，并发挥村社和社会组织力量，建立探访关爱机制，有效缓解家庭养老功能弱化问题。二是依托山区农村存量资源，探索嵌入式养老服务。例如 K 县 DK 村，依托村党群服务中心，推进村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并集聚村民、党员和乡贤力量，建立孝亲基金，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老年文体活动等。K 县 JX 村旅游资源丰富，村里将闲置房屋免费给经营主体开农家乐，农家乐在经营游客用餐业务的同时，承接村里的老年助餐服务，老年人按照年龄梯队每月缴纳 200~300 元用餐费，享受助餐服务。K 县 CT 村与养老院建立合作关系，由养老院为周边村庄的老年人提供送餐服务，既解决村庄单独运营老年食堂的人力和资金成本问题，也能够精准匹配村里的刚需老年群体。三是积极推进养老医养结合，满足农村居民对医疗保障类养老服务的偏好。例如 K 县农村充分利用乡镇卫生院的医疗资源，为各村的老年人提供送医上门服务及其他专业化医疗服务。

参考文献

[1] 席恒 . 养老服务的逻辑、实现方式与治理路径 [J]. 社会保障评论 , 2020, 4(01): 108−117.

[2] 聂建亮 . 资源结构、供给形态与需求匹配 : 农村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路径 [J]. 社会保障评论 , 2023, 7(05): 100−115.

[3] 杜鹏 , 王飞 . 中国式养老 : 内涵、特征与发展 [J]. 社会建设 , 2024, 11(01): 3−23.

[4] 刘小春 , 张果 , 谭小龙 , 等 . 农村居民养老服务供需形成机理——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 2020, 19(03): 379−388.

[5] 张迪 . 冲击与调适 : 农村地区何以解决养老难题——基于浙江省景宁县的田野考察 [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44(02): 16−2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衢州市党校系统社会科学联合会规划课题“山区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模式偏好及影响因素研究”（23QZDXSK36）。

（作者单位：中共开化县委党校）

大健康背景下社区养老药学服务模式的构建与探索

王　蕾 韩　蕾 芮潇潇 王锦淳 秦爱萍

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智慧养老成为应对养老挑战的重要手段。社区养老作为养老服务体系的关键环节，其药学服务质量直接影响老年人的健康与生活质量。对此，本文主要探讨智慧养老背景下社区养老药学服务模式的构建与探索，分析当前社区养老药学服务存在的问题，结合智慧养老技术，提出构建创新的社区养老药学服务模式，以此来确保提升社区养老药学服务水平，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药学服务。

关键词：智慧养老背景；社区养老；药学服务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我国作为人口大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2023》中的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中，约 75% 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疾病，常见的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 [1]。多种慢性疾病往往需要联合用药，这使得老年人对药物治疗的需求更为复杂且频繁，药学服务在保障老年人合理用药、提升药物治疗效果及减少药物不良反应方面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社区养老模式将居家养老与社区服务有机结合，符合我国老年人“恋家”的传统观念，能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接受养老服务，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健康背景下，医疗、卫生、保健、生命科学等快速发展，同时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也迎来了迅猛发展，为社区养老药学服务的变革带来了新契机，但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如何借助智慧养老技术，构建契合时代需求的社区养老药学服务新模式，成为亟待深入研究并解决的问题。

一、社区养老药学服务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药学专业人员短缺

目前，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药学专业人员数量相对较少。《2023 年中国社区卫生服务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报告》指出，平均每万名居民拥有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药学专业人员不足 2 人，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2]。还存在部分药学人员专业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许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缺乏具备临床药学背景的专业人员。以北京某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调查为例，仅有不到 30%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备了临床药师，这使得诸如药物治疗监测、药物不良反应监测与报告等高质量的药学服务难以广泛开展。临床药师能够依据患者病情和个体差异，对药物治疗方案进行精准评估与调整，他们的缺失严重制约了社区养老药学服务质量的提升。

（二）药学服务内容单一

在以往的社会养老药学服务过程中，主要目的在于探究药品的调配、发放以及简单的用药咨询等层面。对全国多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调查结果发现，大约超过 70% 的社区药学服务仅仅停留在这一个层面上。在对老年人进行用药治疗中，缺乏个性化的评估，用药指导也不够全面 [3]。比如老年糖尿病患者需要同时使用降压药、降糖药等多种药物，但是不同药物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作用，社区药师没有办法为此类患者提供针对性的优化建议，在这种单一性的服务理念下，就没有办法达到保障老年人合理用药、提升他们健康水平的效果。

（三）用药信息沟通不畅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上级医疗机构之间、社区药师与老年人及其家属之间信息沟通存在障碍。老年人在上级医疗机构就诊后的用药信息，由于信息系统未完全打通，约有 60% 不能及时、准确地传递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这导致社区药师无法全面了解老年人的用药情况，难以提供有效的药学服务。同时，社区药师与老年人及其家属之间缺乏便捷、高效的沟通渠道。以某社区调查为例，仅有不到 40% 的老年人及其家属能够方便地与社区药师进行沟通，获取用药相关信息。电话沟通受时间限制，且难以传输复杂的用药资料；面对面沟通又存在老年人行动不便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药学服务的效果。

（四）智慧养老应用不足

虽然智慧养老在我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在

社区养老药学服务领域，智慧养老技术的应用还相对滞后。部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信息化建设不完善，缺乏智能化的药学服务平台。据相关调查，全国仅有约35% 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信息化系统，能够实现药品信息管理、用药提醒、远程药学咨询等功能的更是不足 20%。这使得社区养老药学服务难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服务升级，无法满足老年人对便捷、高效药学服务的需求，制约了社区养老药学服务的发展。

二、智慧养老背景下社区养老药学服务模式的构建

（一）需构建智能化的药学服务平台

1. 健全药品数据

要对各种类型药品的适应症、信息、不良反应等内容进行分析，并且要构建更加全面的药品信息库。例如可以参考美国的药品信息库模式，采用智能化药学服务平台，让药师、患者和家属都能够详细地查阅到具体的药品信息，确保用药合理性得到保障。平台还可以开设智能搜索功能，能够快速地选出药品信息，以此为患者提供科学化的用药建议。

2. 智能设置用药提醒功能

利用智能化平台的提醒功能，根据老年人的用药方案，设置定时提醒功能，通过短信、App 推送等方式，提醒老年人按时服药，提高老年人的用药依从性。以某社区试点为例，使用用药提醒功能后，老年人的用药依从性从之前的 60% 提升至 80%[4]。App 还可设置用药记录模块，老年人或家属可记录每次服药情况，方便社区药师跟踪管理。

3. 远程药学咨询服务便民

借助视频通话、在线问诊等技术手段，社区药师可以为老年人提供远程药学咨询服务。老年人在家中即可与社区药师进行实时沟通，咨询用药相关问题，社区药师及时给予解答和指导。例如，上海市某社区通过远程药学咨询服务，每周为超过 50 名老年人提供用药咨询，解决了老年人行动不便带来的咨询难题，广受好评。平台还可设置常见问题知识库，老年人在咨询前可自行搜索查阅，提高咨询效率。

（二）组建多学科药学服务团队

1. 团队成员构成

由临床药师、医师、护士、康复治疗师、营养师等组成多学科药学服务团队。临床药师作为团队核心，负责药物治疗方案的审核、调整和用药指导；医师提供疾病诊断和治疗建议；护士协助开展药物治疗监测和护理工作；康复治疗师和营养师为老年人提供康复训练和营养支持方面的指导。例如，在广州某社区，多学科团队为一位患有糖尿病、高血压且伴有肢体康复需求的老年人制定综合治疗方案，临床药师调整用药，医师优化疾病治疗方案，康复治疗师指导康复训练，营养师提供饮食建议，取得了良好效果。

2. 团队协作模式

需要合理应用智能化药学服务平台来实现多学科、多团队的协同，对于存在多种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团队成员就需要共同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措施，包含康复训练、药物治疗、营养支持等多个层面，这样才能够保证老年人得到更加全面并且系统化的医疗服务。平台还需要引导成员能够随时参与到交流当中，保证团队服务水平的提升，也能够有效提升团队的协作能力。

（三）加强与上级医疗机构的信息共享与协作

1. 构建信息互通共享机制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需要和上级医疗机构实行信息互通，要构建一种具有双向转诊的信息共享机制。老年人在上级医疗机构就诊之后，需要将检查检验结果、用药信息等内容及时传输到社区机构，这样社区的药师就可以根据实际信息来为老年人提供更加系统化的服务。例如，在杭州市，部分社区就和上级医院构建了信息共享的平台，使社区药师能够及时了解到老年人在就诊之后的用药信息，以此为药学服务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2. 远程会诊应对疑难病例

对于存在的一些疑难病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也可以通过在线平台，采用远程会诊系统，邀请上级医疗机构共同参与到对老年人治疗方案的制定中，这样也能够确保治疗效果得到显著的提升。例如在四川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远程会诊方式，为一位患有罕见病的老年人及时调整了治疗方法，以此有效改善了患者的病情，并且还采用了高清视频会议的方式，确保多方实时交流治疗效果得到保障，实现对患者病历资料信息共享的效果。

（四）开展个性化药学服务

1. 精准评估制定个性化用药方案

社区药师通过智能化药学服务平台收集老年人的健康信息、用药史、药物过敏史等，对老年人的用药情况进行全面评估。需要结合老年人的个体差异，比如年龄、身体状况、肝肾功能等来为老年人制定个性化的用药方案。例如，对于一位肾功能不全的老年高血压患者，社区药师根据其肾功能指标，调整降压药剂量和种类，避免因药物蓄积中毒，提高治疗安全性。

2. 智能化设备实时监测药疗成效

利用智能化设备，比如可穿戴式健康监测设备，对老年人的生命体征、药物治疗效果等进行实时监测。社区药师根据监测数据及时调整药物治疗方案，确保药物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比如某社区使用可穿戴设备监测老年糖尿病患者血糖，社区药师根据实时血糖数据，及时调整降糖药剂量，使患者血糖控制达标率从之前的 65% 提升至 85%。可穿戴设备还可监测心率、血压等指标，为全面评估药物治疗效果提供数据支持。

三、智慧养老背景下社区养老药学服务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一）试点社区选择

选择具有一定信息化基础和社区养老服务经验的社区作为试点，开展智慧养老背景下社区养老药学服务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例如，选择北京海淀区某社区、上海浦东新区某社区、广州天河区某社区等作为试点。这些社区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已有一定基础，且社区养老服务开展较为成熟，拥有完善的社区养老设施和专业的服务团队。在试点社区内，完善智能化药学服务平台建设，组建多学科药学服务团队，加强与上级医疗机构的合作。

（二）宣传推广与培训

1. 广泛宣传药学服务

需要及时提升老年人群对于药学服务的接受程度以及认知程度，可以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开展健康宣传讲座等多种方式，引导老年人了解科学使用智能化药学服务平台获取药学服务的方法。比如北京海淀区的某社区，每个月举办一次健康讲座，邀请专业人士以及社区药师来为老年人讲解使用药物的具体方法以及药物使用过程中存在的禁忌，发放宣传资料 500 余份，覆盖社区老年人 80% 以上[5]。同时，还合理应用了微信公众号、社区广播等方式进行大力宣传，确保药学服务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2. 精准培训服务人员

需要开展相关的培训工作，能够对医师、药师、护士进行专业化的培训，使其能够更加准确地掌握多学科团队协作模式，以此来有效提升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以及实际业务水平。例如在上海的浦东新区，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参与相关培训，培训时间为一周，邀请医学领域的专家为社区工作人员授课，内容包含了多学科协作等，在培训工作顺利完成之后，对工作人员的相关技能进行考核，确保社区服务质量得到显著的提升。

（三）实践效果评估

1. 设立评估指标

需要制定出评估指标，指标内容需要包含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用药依从性、老年人对于药学服务满意程度等，需要在智慧养老的背景下对相关指标进行量化评估。例如，用药依从性需要根据患者的按时服药记录来进行统计，而药物不良反应则需要通过社区的不良反应监测系统进行科学化的统计。还需要针对老年人对药学服务的满意度开展问卷调查，从多个维度进行打分评估。

2. 定期收集数据

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定期的收集，采用问卷调查、智能化药学服务平台、电话回访等多种方式开展，要定期收集老年人的反馈意见，包含健康情况、用药信息等，并且要对这些数据进行综合化的分析和评估。例如，需要每个月通过平台对老年人的用药数据进行收集，并且需要了解老年人对实际服务的满意程度，了解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还需要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科学化的整理，需要使用数据分析软件进行科学分析，找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合理解决。

根据实际评估结果对服务模式进行调整，要根据具体的评估结果，及时发现在社区养老服务开展中存在的不足之处，需要对服务模式及时优化和调整，确保社区养老药学服务质量的显著提升。例如，如果发现老年人不熟悉远程药学咨询操作，就需要加强对他们的相关指导和培训工作，确保服务效果得到显著的提升。

四、结论

智慧养老背景下，构建创新的社区养老药学服务模式对于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质量、保障老年人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打造智能化药学服务平台、组建多学科药学服务团队、加强与上级医疗机构的信息共享与协作以及开展个性化药学服务等措施，可以有效解决当前社区养老药学服务存在的问题，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药学服务。在探索与实践过程中，也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和实际情况，持续优化社区养老药学服务模式，推动我国社区养老事业的健康发展。通过多方共同努力，让智慧养老背景下的社区养老药学服务模式在我国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为广大老年人的健康福祉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 关小丽 . 智慧职教云在高职护理专业药理学课程的应用探究 [J]. 每周文摘・养老周刊 , 2024(04): 257−259.

[2] 王天琳 , 宗航帆 , 曹丰 , 等 . 老年慢病患者用药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 2023, 31(07): 489−493.

[3] 庞博 , 刘瑜 , 张天翼 . 保定市智慧社区养老运营模式探析 [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文摘版) 社会科学 , 2024(05): 9−12.

[4] 张炎 , 许祎诺 , 段晓红 . 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水平满意度调查与提升策略研究 [J]. 科技资讯 , 2024, 22(02): 253−256.

[5] 孟姝 . 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探究 [J]. 科技资讯 , 2023, 21(03): 249−25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基金资助项目（苏教师涵〔2024〕2 号）；2023 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健康养老趋势下应用型养老服务人才产教融合培养研究”（2023SJYB0811）；2022 年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教学团队基金资助项目（苏教师函〔2022〕51 号）；2022 年度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院级科研课题“健康中国背景下社区用药指导案例库的建设与实践”（JKC2022015）。

（作者单位：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协同治理视域下互助养老模式的有效运作路径研究
——以杭州“时间银行”为案例分析

刘　铃

摘要：人口老龄化是重大的民生议题，我国养老事业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何鼓励和促进日益庞大的老年人群体继续发挥作用是养老事业发展的突破口。“时间银行”作为一种创新性的互助养老模式，为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本文以协同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杭州市“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实践案例，利用“协同环境—协同关系—协同过程—协同效果”的分析框架，深入研究其有效运作路径。实践表明，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发展需要在政策、体制机制、基础条件等内外部协同环境下，铸牢协同理念，统筹多方资源，形成协作合力，构建协同运作机制，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长期稳定运作提供坚实基础。

关键词：协同治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31031万人，占22.0%，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2023万人，占15.6%。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如何鼓励和促进日益庞大的老年人群体继续发挥作用是养老事业发展的突破口。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承德滨河社区考察时，对创建“时间银行”举措表示肯定，称这是将“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相结合的新路径。

“时间银行”起源于20世纪后期，由美国学者埃德加·卡恩提出，其核心思想是通过时间的等价交换实现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时间银行”进入中国后作为公益服务时间的存储与支取机制，构建“提供养老服务—量化为时间存储—支取养老服务”的爱心循环[1]。其核心是通过志愿服务时间存储与兑换，鼓励社区互助，尤其关注养老与代际支持。1998年，上海晋阳社区居委会推出了时间储存式为老服务，标志着“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在国内的初步探索。此后，在各地的实践中出现了各种挑战，受到政策支持不足、公众认识有限、资源分配不均、技术支持缺乏等因素制约，强调政府单一供给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提出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时间银行”，通过平台整合链接多元主体，形成互助共同体[2]。

本文在此研究基础上，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分析该理论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契合性，依托具体案例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框架，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起源于西方，旨在解决复杂社会问题和应对政府资金短缺的挑战。该理论强调政府与非政府主体在公共治理中的合作，共同为实现社会目标而努力。国内学者对于协同治理理论的关注亦有深入探讨，认为协同治理理论解释了社会系统协同发展过程，提供了处理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关系的合理方案，强调个人、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总和，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制度，也包括各种促成协商与和解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二）契合性分析

聚焦到时间银行互助养老领域，协同治理理论为其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一方面，“时间银行”需要构建多元主体协作体系。协同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与非政府主体在公共治理中的合作[3]。协同治理的主体包括公共权力部门、政治团体、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公民。因此，“时间银行”的有效运作必须通过政府的领导力来整合多方主体的力量，增强协同合作。另一方面，“时间银行”有效运作需要形成协同机制。协同治理理论突出了不同主体围绕共同目标的合作重要性，并强调建立和完善协同机制的必要性。为确保“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有效运作，关键在于构建一个协同的制度框架，并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以形成一个稳定而持续的运作机制。

（三）分析框架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概念性研究，学者进一步构建理论分析框架。Donahue 在界定协同治理时，着重阐述形式、持续期限、核心议题、多元主体介入、结构稳固性及决策自主权等核心要素，并在具体案例分析中，聚焦于主体参与度、共同目标设定、治理资源整合以及治理模式采用等方面。Ansell 所提出的模型，则着重描绘了公共机构与非国家利益相关者之间在集体决策过程中的互动，该模型包含起始情境、制度架构、催化型领导力以及协同流程这四个关键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魏娜借鉴了 Ansell 的理论模型，并以医疗救助作为实例，构建了一个涵盖利益主体整合、共同利益催生、领导力共享机制以及协同效果评估等多维度的分析架构。她深入剖析了协同的驱动力、协同成果的实现、协同的具体模式以及协同过程的困境，为协同治理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的深化提供了有益探索 [4-5]。

总体而言，上述理论分析框架都对协同治理的“结构—过程”进行了规范性的分析，涉及协同治理理论的众多要素，涵盖起始条件、协同形式、协同方式、协同效果等，是典型的解释性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采纳并拓展了学者广泛使用的协同治理“结构—过程”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协同环境和协同效果的分析，以适应政策背景和分析的需要。沿着“协同环境—协同关系—协同过程—协同效果”展开，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进行治理全过程分析。“协同环境”指政策、体制机制等外部因素以及参与主体间协同的氛围、基础条件等内部因素；“协同关系”指多元主体的相互作用；“协同过程”指多元主体基于协同关系展开合作的过程，包含理念协同、资源协同、工具协同；“协同效果”指在微观层面满足了公众多元化的需求，在中观层面是形成了可持续运转的协同结构，宏观层面是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有序框架（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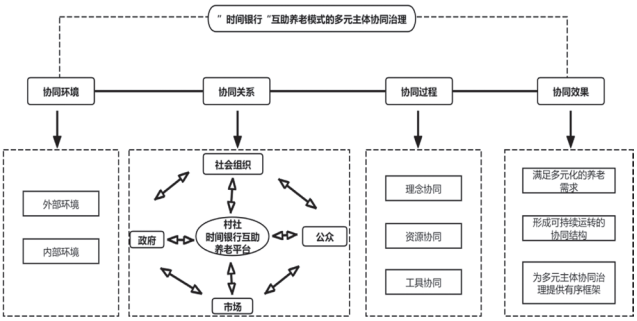


图 1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

二、“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协同治理分析

（一）协同环境

1. 外部环境

自 2018 年起，国家出台多项政策鼓励发展，如民政部的居家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及国家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明确倡导并鼓励发展“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及志愿服务，为这一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提供了政策导向和支持。各地依托《志愿服务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等国家顶层设计，陆续出台配套细则，把“时间银行”嵌入养老互助体系。在“时间银行”政策部署上，浙江省走在了前列，在 2011 年就率先提出了构建“时间银行”制度的设想，在随后五年规划中进一步细化了“时间银行”的发展蓝图和具体措施。杭州市民政局积极响应，制定关于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工作方案，建立健全了“时间银行”的运行管理机制，探索“时间银行”在村社的发展。

2. 内部环境

目前杭州市“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大多是以各村社为单位组织的，虽然各村社开展“时间银行”的基础条件都不尽相同，但普遍建立了老年食堂、老年协会、银龄之家和老年大学等设施，配备了适老化的设备，为老年人提供了基本的用餐和活动服务，为“时间银行”的运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二）协同关系

协同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间构建协同关系从而达到整体效能大于各部分之和的效果。政府在“时间银行”的建立和运作中扮演着政策制定者和资源提供者的角色，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平台的开展提供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等作为基本保障，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的提供，从单一的服务提供者转化为多元的活动组织者。通过政策激励和资金补助，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养老服务。村社则积极响应政府的指导，将资源有效转化为具体的治理成果，充分利用村内外资源，建立“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平台。组织低龄老人和志愿者为高龄老人提供服务，同时作为协调者，来促进各方公众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平台的互动。社会组织利用政府购买的服务为村社提供专业的运营支持，提供专业化服务，满足公众需求。市场主体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平台提供产品、资金和服务，以满足公众需求，并通过公众的反馈进行服务创新和改进。公众在村社的鼓励下，也逐渐参与到“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的过程中，并且将真实需求反馈给各方，形成良好互动。

（三）协同过程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成立、运作离不开主体间协同互动，通过理念、资源、工具协同共同推进“时间银行”的有效运作。

1. 理念协同

追求一致性目标是协同治理的首要任务。面对老龄化挑战、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现象，同时伴随着志愿服务兴起，政府从宏观养老政策出发，既关注养老

服务的提供，又重视老年人个人价值的提升。通过政策引导和宣传鼓励，促进多方主体参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村社希望通过提供更好的服务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积极促进公众参与养老服务供给。社会组织和市场通过参与“时间银行”养老服务，增强了社会责任感，提升了知名度，还积累了实践经验。参与主体虽有多样的动机，但共同期望的是促进“时间银行”的发展，推动养老服务的多样化。

2. 资源协同

资源协同涵盖正式财政资金与非正式市场资源的有效整合。正式资源包括杭州市设立“时间银行”专项基金，由市慈善总会管理，用于服务时间发放、保险购买、志愿者激励及风险防控等，以财政资金、慈善捐赠等方式，落实保障“时间银行”运营管理资金；各村社也积极整合资源，利用好闲置场地，召集人员共同参与到“时间银行”的服务中。非正式资源指社会组织引入慈善资源，助力打造“社区整合式康养服务圈”。如桐庐县独山社区通过整合联建单位、志愿者队伍和慈善组织的力量，建立“幸福里”，采用积分制鼓励居民参与公益，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3. 工具协同

杭州市搭建了“时间银行”信息管理平台，通过“浙里办·志愿浙江”应用程序，为志愿者提供了一个互助平台，通过线上将累积的善时币兑换陪伴等为老服务，线下可以在“公益超市”中兑换各类商品及所需服务，极大提升平台的吸引力和服务的持续吸引力，增强服务的多元化与便捷性。例如浙江农商银行与政府联合打造的个性化服务场景“5060 俱乐部”，定制的“时间银行存折”记录志愿服务时长和积分兑换功能，老年人可以通过“5060”小程序发布服务需求，在志愿者响应后提供服务，也可以通过小程序接收其他老年人的服务需求，通过为他人提供服务累计时间和积分，增强服务和被服务的便捷性和实效性。

（四）协同效果

协同过程是将多元主体的合作从无序引向有序的关键阶段，治理系统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展现出不同的协同效果。

1. 微观层面上满足了公众多元化的需求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融合了“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的理念，低龄老人可以通过为老志愿培训营，学习新技能、结交朋友，在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实现自我价值，满足低龄老人“老有所为”的追求。在开展过程中持续收集和响应高龄老人的需求，服务内容涵盖助餐、陪伴、打扫等，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满足高龄老人“老有所养”的需求。

2. 中观层面形成了可持续运转的协同结构

杭州市推广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在内外环境的支持下，通过多元主体的互动协同，实现了理念、资源、工具的协同。这种协同不仅促进了社会组织、市场和公众的共同参与，而且构建了一个可持续运转的协同结构，保障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长期有效运作。

3. 宏观层面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有序框架

通过协同关系和协同过程推动形成可持续运转的协同结构，使“时间银行”的创立、开展和运行都有序进行。多元主体在协同治理的框架下通过理念协同，凝心聚力，共同推动治理合力，弥补了单一的政府主导、社会组织推动和村民自发组织存在的不足，也强调了多元主体作为治理主体的参与。

三、结语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作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创新，其发展涉及理念引导、资源整合、机制保障等多维层面。杭州市“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实践表明，推动该模式行稳致远，离不开铸牢协同理念，坚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以群众根本需求为出发点，优化公共服务水平和创新能力并有效落实服务；统筹多方资源，形成协作合力，为“时间银行”发展提供坚实的资源支持；构建协同机制，构建并优化激励机制、监督体系及评估机制等协同运作机制，有助于提高服务质量和提升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构建“环境引导—需求导向—资源统筹—机制协同”的发展体系，形成可持续、高质量的养老服务生态，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长期稳定运作提供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妮娜 . 论中国时间银行的特色及发展逻辑 [J]. 城市问题 , 2020(07): 47−55.

[2] 陈功 , 吴振东 .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时间银行”演变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 [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02): 117−126.

[3] 田培杰 . 协同治理概念考辨 [J].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01): 124−140.

[4] 魏娜 , 郭彬彬 , 张乾瑾 . 协同治理视角下基金会开展儿童医疗救助研究——基于 Z 基金会 J 项目的案例分析 [J]. 中国行政管理 , 2017(03): 38−43.

[5] 梁紫环 , 林辉煌 . 撂荒地治理 : 一种协同理论的解释——以广东 Z 村为例 [J]. 农业经济问题 , 2024(03): 1−1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浙江省党校系统社会科学联合会规划课题“协同治理视域下杭州‘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实践路径研究”（ND24044）。

（作者单位：中共桐庐县委党校）

数智化赋能农村助餐养老个性化服务优化的路径研究

甘昭燕

摘要：随着我国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农村地区老龄人群特别是留守老年人的吃饭问题日渐凸显。农村助餐服务正是基于这一问题提出的改善举措，然而，当前农村助餐养老服务供需矛盾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空间适配失序、营养供给失衡与需求响应脱节等矛盾。部分农村地区助餐养老个性化服务提升的实践探索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供需信息联结不足、“最后一公里”配送失效等现实瓶颈。对此，提出三方面优化建议：在价值引领上，建立技术伦理审查机制，通过文化适配性评估与适老化改造，防范技术赋权异化为技术负担；在技术完善上，构建“无人机＋冷链电动车”混合物流系统，破解山地村落、离助餐点位置偏远的配送难题；在制度保障上，通过建立“银龄数字官”培育机制与区块链积分通兑制度，推动农村本土化数字能力提升与志愿服务可持续运转。

关键词：数智化；农村养老；助餐服务；个性化服务；路径优化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与智能化的融合发展，我国社会已逐渐进入数智化阶段。当前，各国都在纷纷布局数智赋能领域，我国的养老服务领域也不例外。在人口老龄化的浪潮中，由于基础设施和家庭结构的变化，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村地区老年人的饮食问题尤为突出。2022 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要建立老年人助餐服务网络，建造一批标准化社区老年食堂（助餐服务点），重点补齐农村、远郊等助餐服务短板，丰富和创新助餐服务提供机制[1]。2024 年 9 月，《国务院关于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和改进失能老年人照护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积极探索“互联网＋养老”，开展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智慧＋居家养老”等建设，完善数字化适老应用场景和服务内容，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安全、舒适、便利的数字化智慧化生活环境[2]。“数智赋能养老”即“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为老年人提供精准化、个性化、智能化与高效化的养老服务”[3]，让更多老年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可以实现“老有颐养”的朴素愿望。因此，加强数智化赋能农村地区助餐养老个性化服务优化的路径研究，能够为提升农村地区养老服务水平的实践探索提供有益参照。

一、问题提出：农村区域助餐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全国农村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为 17.72%，比城镇高出 6.61 个百分点[4]。农村老人的收入主要依赖务农和子女赡养，加之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导致老人日常饮食照料严重缺失。有学者基于对全国 2328 个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发现“农村老年人在饮食方面普遍存在单调和凑合的问题，致使其饮食质量和营养摄入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不利于他们的身体健康”[5]。2023 年，民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2023—2025 年）》后，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有效的助餐养老模式，但受城乡二元结构制约，农村助餐服务仍面临多重困境：一是空间供需错配：助餐点多集中于行政村中心，偏远自然村老人因距离远（1~5 公里）且缺乏配送体系而难以享受服务；二是营养供给失衡：受限于财政投入，助餐点菜品单一，难以满足慢性病老人的特殊饮食需求；三是需求响应脱节：标准化供给与老人差异化需求脱节，未能充分考虑民族饮食偏好、年龄差异等因素，导致资源利用率低、服务质量不佳。这些供需矛盾不仅制约农村老人生活质量的提升，更阻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程。

二、实践分析：数智化赋能广西贵港市农村区域助餐养老服务提升的实践探索

为积极适应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更好满足老年人就餐需求，广西贵港市积极探索老年助餐服务模式，促进养老服务的发展。贵港市助餐养老食堂建设始于 2023 年初，截至 2024 年 11 月底，全市已建成智慧爱心食堂（老人食堂）46 家。在智慧爱心食堂（老人食堂）建设过程中，各街道 / 村

镇都在积极探索数智化赋能的路径，有些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如港南区八塘街道高岭村的智慧爱心食堂模式就在2024年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大会上做过经验分享，且其运行模式已被复制推广至广西柳州、钦州、百色、河池等市的农村地区。

（一）数智化助餐服务平台建设

与普通助餐食堂不同，贵港市的智慧爱心食堂形成了“区（县）主导、镇主抓、村主推、企业主力”的政企统筹共建模式，且创新性引入“智能餐厨+即烹生鲜食品+数字化服务平台”的AI智能化助餐服务模式，更大程度地保障了食品质量与老年人的个性化用餐需求。与此同时，通过数智化服务平台，爱心食堂能够将社会慈善力量、政府政策补贴、老人社保系统、食品供应商、受助群体等角色有效链接，使得每位老年人都能享受到适合自己的助餐补助；在就餐过程中，平台可实现助餐服务数据的可视化、可追溯，不仅就餐老人可以查阅，经过授权的老人子女亦可查看，这既方便村民们的监督，也在安全管理方面有了更好的保障，为农村地区助餐养老服务提供了低成本、可持续、可借鉴的新发展路径。

（二）数智化爱心食堂个性化助餐服务供给

面对农村老年人在饮食上更多的健康需求，“智能餐厨”可智能识别显示每道菜品的营养成分数据，也能实时捕捉食材表面温度变化以调整烹饪参数，确保不同食材在同一锅内达到最佳烹饪效果，还能根据用户的烹饪经历和喜好，个性化调整烹饪结果，确保每一餐都符合老人们的口味和健康需求。“智慧餐厨”还可根据输入的老人健康数据，自动生成健康食谱与个性化膳食指导，让老人们可以享受到更健康、更营养的食物。同时，老人子女等也可通过手机App程序，远程查看和定制老人饮食。

（三）“数智化爱心食堂+”可持续运营模式

对于农村的爱心食堂持续运营而言，食材供应很重要。传统的食材供应链长期受困于供需错配——农民不知道种什么，企业不知道产多少，老人不知道吃什么。这一问题导致资源浪费与效率低下。高岭村依托爱心食堂的数字化平台，整合村中老人的健康数据、饮食偏好，分析其消费行为，实现需求预测精准化与动态化——从“经验主义”到“数据驱动”，既指导上游供应商按需调整生产，又结合老人们对便捷烹饪的需求，与餐饮供应企业紧密合作，将本村种植生产的农产品加工成“速冻鲜食产品”，构建“吃企业菜品、供企业原材、销生鲜好货”的闭环产业经营体系，有效促进了村集体经济的增收，实现了多方共赢的局面，为食材供应链开拓新的价值空间。此外，高岭村还积极探索“教育融合+志愿服务+爱心食堂”的服务新模式，以“村干部带头示范+公益性岗位日常服务+志愿者配合”方式，共同维护爱心食堂的健康运营。

（四）数智化赋能助餐养老服务提升的实践瓶颈

在农村助餐养老个性化服务提升的进程中，虽然数智技术可以构建需求精准响应、服务公平可及、监管敏捷智慧的养老服务体系，但是在养老服务供需匹配、服务供给以及协同监管等层面依然面临着多方面的现实瓶颈，这些瓶颈不仅制约了技术效能的释放，还可能影响农村地区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一是助餐养老服务供需信息联结不够。从贵港市上述实践探索中可见，数智化助餐养老服务平台建设初有成效，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平台建设成本高、兼容性差、场景适配缺失、数据隐私与安全、服务质量和监管缺失等问题。二是助餐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配送未能很好实现。当前的数智化助餐养老服务平台，更多是为有行动能力到爱心食堂就餐的老人提供助餐服务，而对于那些行动不便、地理位置距离爱心食堂较远而难以到食堂就餐的老人而言，很难享受到这个助餐服务，助餐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尚未能较好实现，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空间公平性的缺失。

三、路径优化：数智化赋能农村地区助餐养老个性化服务优化的建议

（一）价值引领：警惕“技术赋能”异化为“技术剥夺”的风险

数智化赋能农村助餐养老服务需坚持“科技向善”原则，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首先要建立技术伦理审查机制，从文化适配性、技术可及性和伦理风险三个维度把关，确保智能设备符合农村老人的认知习惯。如地方政府可制定《技术准入清单》，规范健康数据采集等敏感操作。其次，需重构技术评价体系，将“文化包容性”“情感价值留存”等质性指标纳入效能评估框架，替代单一的效率导向量化标准。这一过程需以马克思主义技术观为指导，强调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延伸”的定位，而非凌驾于人之上的异己力量，如将“老人满意度”“文化适配度”纳入爱心食堂技术效能考核指标，取代单一的“设备覆盖率”等量化指标。最后，需警惕“技术赋权”异化为“技术剥夺”的风险。通过建立技术退出机制，保留传统服务通道作为备份选项，确保农村老年群体在技术失效或适应困难时仍能获得基础服务支持。如在智能点餐系统设置“一键呼助”按钮，老人3次操作失败后自动转接人工服务，避免数字排斥。

（二）技术完善：在地化智慧助餐物流系统构建

农村助餐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数智化配送升级需遵循“技术适配性”与“系统性整合”双重原则，其核心在于构建与农村地理环境、社会组织形态相匹配的技术解决方案。针对农村地区地形复杂、居住分散的特点，需设计多模态物流配送体系。在山地丘陵区域，可采用无人机集群配送技术，通过地形自适应算法优化飞行路径，结合实时气象数据动态调整配送

路径与时间。飞行器需搭载轻量化冷链装置，确保餐品在运输过程中维持适宜温度。在平原村落，则依托物联网技术改造传统配送工具，为三轮车、电动自行车加装智能温控箱与定位装置，开发基于实时路况的路径规划系统。技术方案需重点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通过众包模式采集村民熟知的田间近道信息，构建非标准化道路数据库，使导航系统突破对建制道路的路径依赖。此外，需在技术系统中嵌入容错机制，当设备因信号中断或电力不足无法运行时，自动切换至人工接力配送模式，保障服务连续性。

（三）制度保障：可持续运行的机制创新

1. 助餐数据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

数智化助餐养老服务产生的数据资源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通过构建跨领域、跨地域数据共享平台，可将老年人的饮食偏好、就餐频次等数据（涵盖城市的数据）转化为农业生产指导信息，推动订单农业反向定制。具体而言，需建立“需求—生产”闭环联动模型：基于机器学习技术分析区域老年群体的营养需求与口味偏好，生成特色农产品种植建议，引导种养合作社调整生产结构。同时，打通助餐系统与农村电商平台的数据接口，使本地农产品可直供助餐食堂，形成“田间到餐桌”的短链供应体系。当然，这一过程需注重数据安全治理，建立分级授权访问机制，在保障隐私前提下实现数据要素的跨域流动。

2. 村级“银龄数字官”培育机制

破解农村数字人才短缺困局，需构建本土化数字能力培育体系。首先，建立“三级进阶”培养机制：通过文化转译型教材开发（如方言操作指南），完成基础数字素养普及；依托情景模拟教学法提升设备维护、故障排查等应用技能；最终通过参与式治理赋权，使受训者介入技术决策过程。其次，完善激励机制设计，将数字服务行为与乡村信用体系挂钩，通过积分兑换、荣誉授予等方式激发参与动力。该计划需注重代际协作，鼓励青年技术骨干与低龄老人组成帮扶小组，形成知识传递链。

3.“时间银行”的区块链改造：跨村志愿服务积分通兑

传统志愿服务积分制存在跨区域流通难、信用背书弱等局限。借助区块链技术构建去中心化“时间银行”，可实现三个突破：一是通过智能合约自动记录服务行为，生成不可篡改的数字化凭证，增强积分公信力；二是建立跨村积分通兑机制，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实现不同行政单元间的价值转换；三是开发积分衍生功能，允许兑换农业生产支持（如农机租赁优惠）、文化服务（如传统技艺培训）等多元化权益。需特别设计代际反哺系数，通过差异化积分兑换比率（如青年志愿服务 1 小时 =1.5 积分，低龄老人服务 1 小时 =1 积分），平衡代际贡献差异。同时建立风险对冲机制，从集体收益中提取专项基金保障积分价值稳定，防范因人员流动导致的信用体系崩塌风险。

四、结束语

数智化赋能农村地区助餐养老个性化服务优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实现技术应用、价值伦理与制度创新的三维协同。通过构建人本导向的技术伦理框架，开发在地化适配的智慧物流系统，创新可持续运行的制度保障机制，方能在提升服务效能的同时，守护农村养老的文化内核。这一实践路径不仅为破解技术异化风险提供理论参照，更为数字时代农村助餐养老服务体系建构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空间。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 .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 [EB/OL]. (2022-02-21)[2025-9-23].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2/21/content_5674844.htm.

[2] 陆治原 . 国务院关于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和改进失能老年人照护工作情况的报告 [EB/OL]. (2024-09-10)[2025-9-23].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409/t20240911_439362.html.

[3] 陈馨，卢义桦 . 数智化赋能城市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机理、现实瓶颈与机制创新 [J]. 南京社会科学 , 2025(02): 65—74.

[4]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21.

[5] 王国峰 , 张丽红 . 我国农村养老的发展现状、现实挑战与政策建议——基于全国 2328 个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 [J]. 安徽乡村振兴研究 , 2024(06): 79-9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数智化赋能贵港市农村区域助餐养老个性化服务优化的路径研究”（2025KY2059）；2025 年度贵港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数智化赋能贵港市农村区域个性化养老服务水平提升的路径研究”（2025GGSK29）。

（作者单位：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浅析党课与高职专业的密切融合
——以金融专业为例

汤 勇 黄 涛 徐 雪

摘要：本文探讨了高职院校尤其是经管类高职院校如何将党课内容与学生专业深度融合、提升党课教育效果、增强学生专业学习动力，从而有效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高职党课与高职专业融合是以从专业技术层面培养党的事业接班人为出发点，结合党在该专业领域的卓越人物的事迹，突出党课的革命性和思想教育性，激发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的热情；兼顾高职学生的特点，将实践环节引入党课。这种将故事性、知识性、革命性、现实性融为一体的党课教育受到学生欢迎。这样的党课内容和讲解结构是高职党课教育对培养兼具专业技能与坚定政治信仰的“又红又专”人才的有益探索，显著提升了党课的生动性、吸引力和实效性，深化了学生对党的历史使命、革命精神的理解与认同。

关键词：高职党课；党课讲解结构；党课与专业结合；党课实践

党课能提高入党积极分子对党的认识[1]，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提高政治思辨能力和思想素质，是培养、发现、考察、吸收优秀青年加入党组织的具体做法。好的党课能够增进学生对党的信仰，认识到党的神圣使命，自觉自愿地听党话、跟党走、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结合学生的专业，讲述党在该专业领域卓越人物的典型事迹，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形成该专业领域内一定的领导能力，成为工作、生活、革命事业的带头人；结合高职学生的认知特点，研究和设计党课的内容和结构，既有专业知识和历史故事，又有参观和实践环节，使得党课言之有物、润物无声，吸引学生积极参与。这种结合对高职学生有着特殊的心灵推动作用，学生看得见、学得来、做得到。本文介绍的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经管类专业学生的党课，我们经过多年实践打磨，不仅将党课讲的生动有趣，而且还增强了学生对专业课程的学习动力。我们认为这是在新时代培养红色接班人党课学习的有益探索。

一、从专业技术层面培养党性过硬的事业接班人

我们认为高职院校要从专业技术层面培养党性过硬的事业接班人。在高职金融专业中，学生通过党课，深入了解党的金融事业发展历史，从专业层面掌握我党早期的金融工作情况，特别是早期的钱币印刷工艺、钱币的纸张以及与国民党在金融领域的斗争等技术性较强的知识。通过这些案例学习，了解党的智慧和早期金融工作运行方法，为当前国际金融环境下应对外部挑战提供有益的经验参考和策略借鉴。

（一）选定专业相关的中国革命史中经典案例和卓越人物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党的金融事业的成长，从无到有必然是一个艰辛的发展过程。纵观党的发展历程，确定以介绍革命先辈毛泽民同志的革命生涯[2]作为党课与高职经管类专业的融合点。毛泽民同志所从事的革命工作既有艰辛的战斗历程，又有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工作，是早期金融领域的革命家，对学生具有模范示范作用。

（二）确定党课的内容与讲解结构

党课应具有详细的内容，还要准确把握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及时代特色，党课的内容和讲解结构要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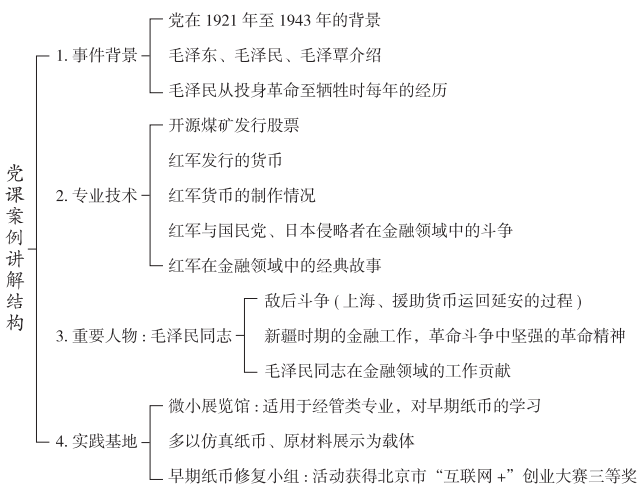


图 1 党课案例讲解结构

够积极吸引、正确引导青年学生。图 1 是我们一学期的党课案例讲解结构，其中规划了讲解的内容与结构，包括党史中与之对应的事件背景、专业技术、重要人物、实践操作这四个环节内容，四者紧密联系，确保内容既有历史深度又有专业特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党课讲解结构剖析

党课讲解结构设计内容需要精心选择，要具有典型示范性，并能与金融专业有着内在联系，体现党课的专业性、时效性、严肃性。

（一）事件背景

讲述与专业技术对应的时代背景，如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的每一年的革命历史，重点强调与案例中专业密切相关的革命运动场景。这样讲解能让学生知道做金融工作的具体意义。在本案例中主要围绕党在 1921 年至 1943 年之间毛泽民同志相关的革命斗争背景。

（二）专业技术

主要围绕高职金融专业相关的技术，比如，在那个革命年代印制的股票、货币都比较简朴的情况下 [3]，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具体设备、是如何秘密开展这些工作的；在钱币印制技术上，采用的是哪些防伪技术，在当时是否能起到作用以及当时党的金融制度等。

（三）重要人物

学习重要的、关键的核心事件中的核心人物及其伟大的革命情怀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在本案例中讲述的重要人物是毛泽民同志，他曲折的革命历程、在金融工作中的智慧以及他是如何保证党的各项经费的筹集、如何发挥金融工具重要作用等 [4]。

（四）实践操作

增加实践操作环节，使党课从到革命圣地参观、学习，延伸到可动手、可视化的实践操作环节。很明显，这个环节是需要党课教师在这方面要进行相当的研究，才能做好，这也正是本文所谈到的党课与专业密切结合的关键所在。

三、党课讲解对专业知识的要求

我们认为好的党课对教师的要求是很高的，要将革命性、斗争性、专业性、知识性有机结合 [5]。必须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当时党所面临的问题，用革命的现实主义精神正视今天的问题，用金融专业知识梳理我们党的金融发展史。这个环节要求讲解党课的老师必须掌握两个方面的知识：一是中国共产党 1921 年成立以来早期发生的主要事件；二是在党的领导下，早期革命中发行的股券、货币，以及相关的金融政策。这就要求老师不仅要看书、查资料，更为重要的是老师还要去各类博物馆、古玩市场、钱币交易市场，查看和学习当时在党的领导下发行的股票和钱币实物，这个环节可能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去学习研究，通过精心分析把二者结合在一起。

（一）党课中专业知识储备

党课中专业知识包括对在党的领导下早期印制、发行证券，以及硬币的制作工艺、票面币种、规格、防伪技术等的具体学习 [6]，虽然那时的设备、制作工艺并不复杂，但要弄清楚，也必将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翻阅那个时代的资料，还要深入了解当时的革命背景，才能完整理解这样制作的原因。同时涉及不同地区红色革命根据地原材料来源、根据地经济情况、根据地与敌人斗争情况等。

（二）党在早期的金融事业理论特点

党在早期的金融事业的理论特点之一就是党始终站在人民利益的一边。从安源煤矿发行的股票到红军时期发行的票证、货币，始终是把人民群众作为主体，一切为人民服务，即使是在今天，这一点也不会改变。党的金融工作初期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但始终秉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忘初心”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改革

因地制宜地改革金融制度，是发展经济的基础，如毛泽民同志在新疆工作期间进行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统一货币，改两为元；建立财政机构，组建财税干部队伍；建立统一收支与预决算制度；培养税源、堵塞偷税漏税等，这些为当时新疆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使新疆的经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 [7]。

（四）与敌人在金融领域的斗争

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存在与敌人的金融斗争。党在早期的革命根据地采取了限制使用、限制流通、防止通货膨胀、货币防伪等措施，在如何突破经济封锁、国际援助资金运送等方面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党经过艰辛的努力稳定了革命根据地的需求，保卫了革命的胜利果实 [8]。

（五）党课中经典案例的整理

要从党的发展历史中选择金融领域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的典型事例，我们选择了毛泽民同志的革命工作中的一部分。在党课中将这部分内容制作了 5 个 PPT 文件，按时间分为走向革命初期、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任职时期、红军长征时期、延安苏维埃时期、新疆时期，讲解了毛泽民同志在这五个阶段所开展的金融领域的工作，具体事件有：（1）安源煤矿发行股票；（2）苏维埃时期开采矿石；（3）红军长征途中的金融工作；（4）延安时期的金融工作；（5）红军与国民党在金融领域中的斗争；（6）毛泽民同志在新疆的金融工作；故事性和情节性深深感染了学生，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革命事迹和金融知识的双重教育。

四、党课的实践环节

高职学生对具体可见的事物充满热情，参观和实

践始终受到他们的欢迎。参观和实践是理论学习的一种可操作性的延伸，是建立在正确的革命思想基础上应用专业知识的深入洗礼。这个环节既是理论学习的总结，也是理论学习的应用，是党课中融入专业知识的具体表现。既有参观客观存在的红色革命现场遗存，还有应用专业知识自己动手的实践。具体做法是现场学习、建立微小展览馆、开展早期旧纸币修复工坊、到钱币博物馆参观学习等，使党课看得见、做得到、学得来。参观、展览、工坊、创业项目等丰富多彩的设计提升了党课吸引力、学生政治认同感和专业学习动力。

（一）现场学习

党课的现场学习，一般是参观革命博物馆、革命纪念地、革命家故居、革命战场旧址，如遵义会议纪念馆、莫斯科革命旧址、德国莱比锡马克思故居等。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强调与专业知识的结合，如我们组织学生到延安博物馆参观时会让学生多看一下当时用于印钱的马兰纸等属于金融范畴特色的实物。

（二）建立微小展览馆

对红军时期纸币的学习，多以仿真纸币、仿真铜币、仿真银币、残缺真币、旧图片、原始素材为对象，按照发展过程的时间顺序陈列，并配以文字描述说明。在做微小校园展览馆的过程中，我们还融入其他时期的货币，如边区票、一版币、二版币、三版币、四版币、五版币，这些多以部分便宜的币种为购买对象，其中三版纸币、四版纸币、五版纸币是容易获得真实实物的，这些多以真实实物来构成小型展览馆的展品。同时以钱币出现的历史背景、制作特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等作为学习的内容[9]。

（三）早期旧纸币修复工坊

教师要指导学生发现可做、可研究、可创新的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把相关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如学习研究钱币纸张、防伪暗记、油墨、刻板、印制技术、修复技术。我们在开展这方面活动中，引导学生参加了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业大赛，并获得北京市赛区三等奖，师生共同建立红色钱币数据资源平台，通过这些活动，同学们对钱币的纸张、规格、年代、历史意义、经济价值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四）到钱币博物馆参观学习

去北京钱币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北京马甸邮币卡市场、上海卢工邮币卡市场、北京古玩城、华夏古玩城均能看到中国革命早期的证券、钱币，这些对于金融专业学生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在这些地方不只是参观性质地观看，还要结合专业、结合当时的革命背景去研习，吸取其中有用的成分帮助学生成长。

（五）建立红军时期钱币网上展览馆

由于红军时期的纸币、铜币、银币保存下来的非常少，因此市场价格也比较高，要收集实物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通过网络整理实物钱币图片，系统化分类，使学生易于学习，为学生创设好的学习环境，也丰富了实践环节。

五、结论

党课与高职专业相结合，经过精心设计能达到良好的效果，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与高职院校党务工作者交流。

首先，在党课教育中要在专业领域中找到合适的结合点，发掘专业与党课的联系，找到专业领域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让党课有深度、能感知、可实践，产生出更大的激励、引导作用。

其次，党课中涉及的专业知识要具有典型代表性，能激发学生对专业课程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体现党课对人的主观世界的统领作用。

最后，党课要有现实意义，能对当前和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起到借鉴作用。勇于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弘扬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这正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 于莉莉 . 新时代少数民族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工作探析 [J]. 辽宁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03): 99-100.

[2] 曹海滨 . 毛泽民 [Z/OL]. 北京 : 中国中央电视台 , 2008[2025-07-28]. https://jishi.cctv.com/2012/12/15/VIDA1355574476597743.shtml.

[3] 徐安民 , 徐一僖 . 江西红色货币 [M].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2023.

[4] 王文红 , 孟岩 . 坚持以人为本提升革命人物类临展水平——结合“红色财政金融先驱毛泽民烈士生平业绩展”探讨 [J]. 博物院 , 2023(06): 31-36.

[5] 陈竹君 . 发挥基层党校优势加强干部党性教育——以北京市朝阳区委党校的实践为例 [J]. 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 , 2017(04): 101-103.

[6] 李成才 . 货币 [Z/OL]. 北京 : 中国中央电视台 , 2012[2025-07-28]. http://docuchina.cntv.cn/huobi/videopage/.

[7] 鲁细珍 . 毛泽民在新疆进行的币制改革 [J].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37(06): 65-69.

[8] 王云清 .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斗争探析 [J]. 学理论 , 2013(15): 157-158.

[9] 汤勇 . 浅析退市后四版纸币的文化特色 [J]. 中国市场 , 2023(22): 58-62.

（作者：汤勇、黄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教师；徐雪，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辅导员）

新就业形态下外卖骑手劳动权益保障研究
——基于扬州市外卖骑手的调研分析

李雨洁 彭富培 周 莹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平台用工为核心的新就业形态重塑了劳动力市场格局，外卖骑手作为典型群体，面临劳动关系模糊化、职业培训缺失、社会保障不足等权益保障问题。本研究基于对扬州市343名外卖骑手的问卷调查，结合算法管理理论与劳动关系理论框架，深入剖析骑手群体面临的现存困境，针对劳动保护力度较弱、职业技能培训不足、社会保障与福利缺位三个现实问题，从制度体系完善、平台治理优化、社会保障覆盖三个维度提出建议，系统破解权益保障难题，为平衡平台经济发展效率与劳动者权益保护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新就业形态；外卖骑手；劳动权益；劳动关系认定；算法管理

一、引言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零工经济的快速崛起，以平台用工为核心的新就业形态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特征。外卖行业作为典型代表，其规模持续扩张：截至2025年，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年活跃骑手总量已超过1300万人，骑手群体呈现出年轻化、流动性强、劳动强度高等特征。然而，算法管理下的超时劳动、收入波动、社保缺失等矛盾，与劳动关系认定模糊性交织，成为制约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普遍问题。与此同时，国家政策层面加速改革，2023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首次引入“宽放时间”概念，明晰最低工资保障和法定节假日报酬规则；202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发布新业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强调用工事实优先原则，打击平台通过“个体户注册”规避劳动关系的现象。

国内外研究显示，零工经济劳动权益问题已成全球焦点。欧盟在2021年为保障自由职业者的权益起草了新的法规，争取工时、赔偿等最低保障，加州以“ABC测试”界定劳动者身份，而国内则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算法透明化等方面探索本土化路径。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政策比较或单一维度的权益分析，针对具体城市样本的深度调研与政策适配性研究仍显不足，难以支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精准施策。本研究聚焦扬州市外卖骑手，通过分层抽样调查与数据分析，探讨劳动关系从属性理论在平台用工中的适用性，揭示权益保障困境的根源，并提出法律、平台、社保协同改革路径，旨在为构建包容性劳动生态提供实证支持。

二、新就业形态下外卖骑手劳动特征

“新就业形态”一词的官方应用首次出现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是指新经济模式下在雇佣、劳动管理、劳动报酬获取方式和劳动关系认定等方面与传统标准相异的一种就业形态[1]。外卖骑手作为新就业形态下的典型代表，既具有新就业形态的基本特征，如就业方式灵活化、组织方式扁平化、用工范围扩大化等[2]，其自身也拥有一些特质化表征。

（一）劳动关系模糊化

在传统固化式的就业形态下，经济从属性、人格从属性、组织从属性三层次共同构成的劳动从属性成为劳动关系认定的关键。但新就业形态下，无固定工作场所与工作时间所导致的弱化式从属关系，致使劳动关系认定难度叠加。一方面，依托网络平台，雨后春笋般发展的餐饮、购置及服务类企业将众多配送服务分包，“无雇主化”的特征尤为突出；另一方面，以体力和时间作为主要交换要素，承担配送职责的自由职业者的工作特点并不包含生产规模化。承担配送责任的自由职业者主要交换的是体力和时间，并不存在大规模生产。通常情况下个人就能提供独立配送服务，使得自由职业者更依靠个人而非雇主[2]。上述现象折射出外卖骑手职业身份界定的关键争议：其法律地位究竟属于建立劳动关系的合同制劳动者，还是依

托平台自主经营、由民事法律规范权利义务的市场主体，抑或是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构成要件但受平台企业劳动管理的特殊用工形态，即“不完全劳动关系”情形。

（二）工作内容非标准化

在平台用工模式下，外卖平台与从业者之间并非传统雇佣关系，其劳动过程呈现显著的非标准化特征：平台不设定固定工作时间、地点及任务量，从业者可自主决定是否接单、工作时长及服务区域。这种去固定化的用工模式赋予骑手高度的自主性，劳动报酬也因接单量、服务时段等市场化因素呈现显著差异，与传统雇佣关系中标准化的劳动要素配置形成本质区别。

（三）时间风险负荷化

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客户评价系统是外卖配送行业这类服务业的惯例[3]。该系统会通过客户评价直接影响甚至决定骑手收入，其传导路径在于，如果消费者对外卖骑手作出差评或者投诉至平台，站点会对外卖骑手作出一定金额的罚款。而在该系统中，消费者对外卖骑手服务不满意基本涉及两个方面，即配送时间和服务态度，其中服务态度受行业规范和“微笑服务”等要求，大多数情况下不会直接导致差评。因此，与差评直接挂钩的大多是时间因素。在限时计件型薪资结构下，外卖骑手为了尽可能提高收入，会尽可能多接单，而单量超负荷则易致时间短缺[3]，进一步导致安全风险的显著加剧。而在“准时送达”的考核压力下，骑手往往被迫采取违规抢道、超速行驶等危险方式压缩配送时间，配送过程中的交通安全与职业伤害风险陡然增加。

三、新就业形态下外卖骑手劳动权益保障困境分析

（一）外卖骑手的劳动保护力度较弱

外卖骑手就职期间，平台借助新型数字技术实施数字监控和劳动控制，忽视交通状况、天气环境和配送距离等客观条件，设置不合理的配送时间、配送线路。通过制定极具竞争性的定价体系和奖惩制度，迫使骑手承受更高的劳动强度，危害职业健康，劳动安全和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在完全劳动关系情形下，外卖骑手可以依靠劳动合同来保障劳动权益；然而，在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或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形下，骑手得到平台的劳动权益保障的力度也较弱，在发生劳动纠纷时，难以依据合同解决。

（二）外卖骑手的职业技能培训不足

平台企业通常只关注已建立完全劳动关系的骑手的职业培训问题，但对于另外两种情形，大多忽视其职业技能提升问题。即便是存在职业培训，在具体内容方面也存在着一定问题：一方面，平台的培训可能只涵盖基础的操作技能，缺乏专业培训；另一方面，培训内容的实用性不强，缺乏实际操作指导，无法真正帮助骑手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三）外卖骑手社会保障与福利缺位

当前的社会保障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外卖骑手职业风险难以有效化解，派单过程中所受的人身伤害难以获赔；外卖骑手参加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的比例偏低，工伤认定等问题多需要地方社会保障部门介入协助解决；商业保险因其保障范围的有限、缴费的高昂及理赔程序的复杂，难以发挥实际作用；骑手与平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认定上的问题，法律地位模糊，导致其最低工资保障、带薪休假、健康体检等应有福利无从保障。

四、新就业形态下外卖骑手劳动权益保障措施建议

（一）标准规范化：优化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完善劳动基准法规范

1. 优化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在劳动关系认定上，根据不同用工模式的特点，综合考量三类从属性所包含的要素，改良确认劳动关系的从属性标准，并形成有关从属性的有无和强弱的定性和定量判断[4]，来认定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形成的劳动关系。首先，考虑外卖配送行业“去雇主化”、从属性相对弱化的特征，进行内部的要素审查。其次，依照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的次序予以全面审查。最后，针对具体个案具体分析，量化考核每一类从属性，给予定性判断与定量判断，作出判定。

在认定标准的改良上，分为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与组织从属性。就人格从属性而言，将平台通过算法等数字技术对骑手发出指令、进行指示、监督考核评价骑手的配送行为，骑手服从安排、提供配送服务、接受奖惩、获得报酬的过程视为劳动管理手段，以此认定平台与骑手间的用工模式具备一定的人格从属性；对于经济从属性的判断，则应考虑到平台用工模式下，骑手的收入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平台派单数量，平台通过算法机制，迫使骑手为获得更高薪酬而不断增加工作时间、提高工作强度，在经济上对平台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认定具备经济从属性；在组织从属性的判断上，平台运用算法技术指示骑手完成配送任务，虽未直接作出干预，但其决定算法程序的运行机制[5]，实质上支配骑手的劳动过程，而骑手事实上也被纳入到平台业务的组织体系中，可以据此认定组织从属性成立。

2. 完善劳动基准法规范

劳动基准法的规制逻辑起点应从传统的劳动过程控制转向成果控制，遵循任务化用工特点，实施任务计量型劳动基准[6]，落脚于更为宏大的劳动人权保障。

（1）构建任务计量型劳动基准的制度架构

其一，以对承揽任务单价和总量的规制实现对劳动条件的保障。平台用工模式下，从业者完成单个任务的劳动对价是其任务计价经过平台抽成及奖惩计算以后的结果，即骑手劳动报酬为“任务总量 × 任务单

价 × 行业系数”[6]。由公式可知，任务总量与任务单价总是此消彼长，通过对每单配送价格的调整可以间接影响骑手的任务总量，帮助其维持合理的工作时长，保障其劳动权益。再者，公式的计算结果除以工作时长即为从业者的单位时间收入，而合理任务单价的确立可有效确保其薪酬不低于法定最低收入。因此，应当在综合考虑行业成本、市场行情等因素的基础上，通过集体协商或政府指导，确定任务最低报酬标准，并建立与地区生活成本联动的动态调整机制。

（2）推动劳动二分法向三分法转型

传统“民法—劳动法”基于“雇员—自营职业者”的二分法体系以人格从属性为核心判断标准，将劳动者划分为受雇主全面控制的雇员与完全独立的自营职业者。而平台用工的兴起催生出介于两者之间的“新类型雇佣”[7]：从业者可自主决定工作时间与任务选择，其收入高度依赖平台算法系统和定价规则，具有显著的经济依赖性，但此种“不完全劳动关系”却难以为传统二分法所覆盖。因此，有必要推动法律框架向“民法—类雇员法—劳动法”的三分法转型。通过构筑“类雇员”概念，将利用平台实现就业且存在一定平台经济从属性的自由从业者囊括其中，从而使“新就业形态专章”的存在具有合理化依据，进而将强制性劳动条件融入其承揽合同的任务计量，明确其应享有的权益与平台应承担的义务，完善劳动法律制度，以更好地保障不同类型劳动者的权益。

（二）监管智能化：增强政府数字监管能力，扩大平台治理覆盖面

其一，建立算法备案与审查机制，加强政府对平台的监管，要求对配送时间、工资结算、派单机制等与骑手权益密切相关的算法程序的运算过程予以解释[8]，充分保障骑手的知情权，以打破平台借助“算法黑箱”而形成的信息垄断，通过政府主体对平台算法的备案与审查，防范算法技术的滥用，倒逼平台算法向善。

其二，积极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提升政府对平台的治理能力。在平台经济的背景下，外卖骑手追求更高薪酬被即时优化的算法操控，诸多权益被相悖于按劳分配的算法规则所剥夺。针对这些问题，可以构建新就业形态就业信息数据平台，满足治理中的数据信息需求，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外卖骑手的权益保障依赖于数据支持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因此，在政府部门的推动下建立数据采集与共享机制，对不同区域、不同平台、不同类型、不同部门的数据进行分类整合，打造跨地域联动、多部门协作的数据共享平台，能够为政府主体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依据，提升政府对数据的管理和监管能力[9]。

（三）保障全面化：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提高劳动者生活保障

首先，应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相关政策，破除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壁垒。对于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标准的劳动者，鼓励其选择参加契合自身需求的社会保险；同时探索为新就业形态提供便利的社会保险经办服务模式，在充分考虑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特点、实际收入水平、就业方式、工作性质等因素的基础上[10]，提升其在费用缴纳、权益明细等方面的便捷性，切实做好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平、不被歧视地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待遇。其次，强化对骑手的职业伤害保障，通过政府主导、信息化引领和社会力量参与相协同的方式，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最后，针对不具备劳动关系的外卖骑手，政府应依法制定或实施相关政策，确保他们在社会保险、用工安全等关键领域的权益得到妥善保障。

五、结论与展望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新就业形态的典型代表，外卖骑手群体在促进社会就业稳定、驱动服务产业升级与激发消费活力等方面展现出极大的公共价值，但其劳动关系认定的模糊性与权益保障的制度性缺位，已成为制约新业态健康发展的因素。破解这一难题需在技术进步与人文关怀的动态平衡框架下，系统性推动法律制度、社会保障与平台责任的协同革新。

未来研究需进一步追踪政策实效，聚焦算法透明化对劳动赋权的影响、跨区域政策试点的推广路径，以及权益保障成本与平台盈利模式的兼容性，量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共赢空间。新就业形态的成熟离不开劳动者权益保护体系的完善，唯有在制度创新中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价值并重，方能释放数字经济潜力，构建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劳动生态。

参考文献

[1] 张剑飞 .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研究分析 [J].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 2023(09): 30−33.

[2] 余少祥 . 新就业形态的特征、挑战与对策建议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 2023(16): 6−15.

[3] 涂永前 , 谢文曦 , 熊赟 . 平台经济下劳动者职业安全探究——基于对北京 X 站点外卖骑手的劳动社会学调查 [J]. 温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34(02): 26−38.

[4] 娄宇 . 新就业形态法律关系认定规则 [J]. 中国法学 , 2024(05): 285−304.

[5] 罗寰昕 . 算法控制视域下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的困境与出路 [J]. 交大法学 , 2023(02): 74−88.

[6] 王天玉 . 平台用工的“劳动三分法”治理模式 [J]. 中国法学 , 2023(02): 266−284.

[7] 田思路 . “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合同性质与从业者的相对性保护——以法律适用的“二分法”及“三分法”为分析视角 [J]. 环球法律评论 , (下转 96 页)

新时代党建引领下的“大后勤”助力高校育人的路径探析
——以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雷　行　李　格

摘要：本文以新时代党建引领下的“大后勤”助力高校育人为研究对象，以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深入探讨了新时代党建工作在后勤服务中的引领作用，分析了后勤服务通过优质高效的服务助力学校实现育人目标的具体路径。通过研究相关理论与实践，梳理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策略，为构建更完善的高校后勤服务育人体系、强化党建引领与育人工作的协同性、促进高校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党建引领；后勤服务；服务育人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而学校作为教育的重要场所，其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对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至关重要。学校后勤服务保障工作作为学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和保障，是确保学校安全与稳定的重要环节[1]。

一直以来，高校后勤保障人员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始终坚持“为教学服务，为科研服务，为师生员工服务”和“服务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的工作宗旨，也充分彰显了当前高校后勤保障服务工作中“服务”与“育人”的两种属性[2]。由此可见，后勤部门不仅是为师生提供优质的后勤服务，以优质服务感染学生，还能在服务过程中抓住与学生接触的机会，通过“言传”方式，担当起群体教育的后勤角色。此外，高校的后勤保障工作人员还可以通过自己耐心细致的工作，以“身教”的方式，通过为学生打造优美环境、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服务育人的功能，形成群体教育的场效应。在新时代背景下，坚持党建引领，是高校后勤以服务助力育人，不断夯实学生成长成才基础的组织保障，突出党建引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党建引领后勤服务的重要意义

（一）确保后勤服务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高校后勤服务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始终牢牢把握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的基本宗旨，并把全校师生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对美好校园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的重要目标。党的领导为实现这一目标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重要保障，从政治、思想上为后勤服务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从组织、作风上确保后勤服务始终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服务于教育、科研以及人才培养的大局，为学校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积极贡献；从纪律、制度上规范了后勤人员的职业行为和后勤工作的服务准则，要求后勤人员严守纪律，杜绝腐败和不正之风，确保资

（上接 95 页）2024, 46(05): 123−138.

[8] 项定宜，李盈盈，陈梦汐，等．算法控制下平台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以外卖骑手为例 [J]. 经济师，2024(06): 258−261.

[9] 李光红，高海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规制体系的构建研究——基于山东省的分析研究 [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32(06): 124−134.

[10] 胡放之．网约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研究——基于湖北外卖骑手的调查 [J]. 湖北社会科学，2019(10): 56−6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扬州大学 2024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新就业形态下扬州市外卖骑手劳动权益保障研究”（202411117075Z）。

（作者系扬州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本科生）

源的合理分配和公平使用。

（二）确保后勤服务始终保持高水平的行动自觉

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党组织的引领带动下，后勤服务的规范化、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背景下，后勤服务紧贴师生的实际需求，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水平。物业办及时处理师生反馈的急难问题，为师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工作环境；饮食管理科根据师生反馈，及时调整食堂菜单，增加更多受欢迎的菜品；公寓办根据社会发展以及学生需求，不定期改善宿舍条件，提供更舒适的居住环境。

（三）确保后勤服务始终具备强有力的创新能力

党建工作能够引导后勤人员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积极探索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后勤服务模式和方法，为新时代高校后勤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智能化畅行的今天，党建工作促使后勤人员积极引入物联网技术，实现对校园设施设备的远程监控和智能管理，大大提高了维护效率和精准度。在后勤日常服务和管理中，也可以借鉴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模式，对校园物资进行分类、编码和信息化管理，实现了物资的高效调配和使用。同时，通过党的组织建设，支部党员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为后勤服务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特别是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各部门能够迅速联动，形成合力，高效解决问题。

二、当前党建引领后勤服务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党员思想认识不够深入

部分人员对党建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存在重业务轻党建的倾向，认为党建工作与后勤服务的实际操作关联不大，在工作中未能充分将党建理念融入服务实践中，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明显。日常工作中，仅关注解决当前问题以及单一技术层面的问题，而忽视了通过服务让师生感受到党组织的温度。

（二）党建与业务融合不够紧密

党建工作与后勤服务业务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两张皮”现象，未能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影响了党建引领作用的发挥和后勤服务质量的提升。在制定后勤服务工作计划时，没有充分考虑党组织的目标和要求，导致党建活动与日常服务工作脱节，无法形成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三）党组织活动形式不够丰富

党组织开展的活动内容和形式较为传统、缺乏创新性，与后勤服务工作结合不紧密，对党员和群众的吸引力不足，往往局限于会议传达、文件学习等方式，缺乏生动活泼、富有实效的活动形式。这使得党建活动难以真正激发后勤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充分

部分党员在后勤服务工作中未能充分发挥带头作用，缺乏主动性和创新性。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没有挺身而出，为群众树立榜样。另一方面，后勤服务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服务意识参差不齐，部分人员缺乏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影响了后勤服务的整体水平。

三、党建引领后勤服务助力育人的实践路径

（一）强化政治引领，打造素质过硬队伍

后勤党支部要紧抓思想理论武装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强化政治引领，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教育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积极组织后勤人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加深对党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而更深层次理解党建引领后勤服务的内涵和意义，引导后勤人员树立正确的工作理念，培养务实的工作作风，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切实推动后勤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同时，要持之以恒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教育和管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靠的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保障。党支部在“厚爱”的同时，也要坚持从严管理党员队伍。强化党纪法规学习，全面落实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党员把党的纪律规矩“印”在脑中、“刻”在心里，锻造严于律己、作风过硬、素质优良的后勤党员队伍。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陕能院”）后勤党支部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武装全体党员，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续推进理论学习，强化党员理论武装。切实发挥堡垒作用，凝聚支部内外力量。坚持常规工作抓创新，整体推进抓特色，突出重点抓亮点，全面推进党建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断创新，让大会精神在全体职工思想上扎根，行动上落地。

（二）突出党建引领，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

党建工作是推动业务发展的强大动力，业务工作的开展为党建工作提供了实践载体和检验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处理好党建和业务的关系，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3]。部门要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在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步，使党建结合中心工作更加有为，围绕中心工作更加有力，确保“一支部一品牌”建设稳步推进。个人需明确岗位职责，厘清工作思路，自觉将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服务工作的各个环节，如物资采购、设备维护、餐饮服务、住宿保障等，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监督保障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要以支部党建带动工会建设，强化岗位职责，促进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发展，推动处室各

项工作走在前、作表率，为学校发展贡献力量。还要积极探索支部共建机制，加大学习力度，与校内优秀党支部进行对接，开展学习与支部共建，加强监督管理，丰富服务载体，提升服务质量，增强师生归属感和获得感。

（三）创新党内活动形式，赋能后勤服务管理

2019 年，党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主动适应信息时代新形势和党员队伍新变化，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创新党组织活动内容方式，推进‘智慧党建’使党内政治生活始终充满活力。”[4] 因此，要紧紧抓住“大数据”“互联网 +”等时代契机，构建智慧党建新模式，促进党建与后勤工作深度融合，用智慧党建成果赋能新时期后勤服务管理。我们既要结合后勤服务工作特点，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党组织活动，如设立党员先锋岗、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组织业务技能竞赛等，增强党组织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又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拓宽党组织活动的渠道和空间，如建立党建工作微信群、开展线上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微党课”等形式，提高党组织活动的参与度和覆盖面。

陕能院后勤党支部始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人为本提升服务水平。不断引导支部党员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亮出党员身份、立起先进标尺、树起先锋形象，作“后勤育人”表率[5]。激励党员在具体岗位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后勤保障处全体职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围绕学校“双高建设”，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四）加大业务培训力度，提升后勤服务水平

在重视理论学习的同时，后勤部门还要将开展业务培训变成一种常态化的工作机制。不断提升业务能力，培养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服务优良的后勤服务队伍，构筑以塑造过硬素质与动手能力为核心的后勤服务模式，为满足新时代师生不断提升的服务需求以及适应新时代后勤服务技术的发展。通过实际操作和案例分析的培训方式，让后勤人员更好地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在培训过程中，不同岗位的人员也可以通过分享经验、互相学习，促进后勤不同岗位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协同工作的良好氛围。

同时，结合后勤服务实际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科学评价参训人员的学习成果，确保学有所获、学以致用、用有所效。并将考核结果与绩效考核、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挂钩，形成正向激励的良好氛围，不断激发后勤服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不断完善监督机制，确保后勤服务质量

建立健全后勤服务工作的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厘清监督主体和职责，将日常监督和定期考核相结合，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为后勤服务工作高质量、高效率开展筑牢制度之基。

要设立多种形式的反馈途径，畅通师生意见反馈渠道，比如开通投诉热线、设立意见箱、在学校网站和移动应用上开设反馈专区，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和建议，通过不断改进和优化后勤服务工作形成闭环管理，提高师生满意度。同时，要及时对师生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和分析。对于当前可解决的问题，第一时间解决；对于因技术、资金等原因需随后解决的问题，相关部门要有明确的整改措施和时间表，并及时向师生公布整改情况，让师生看到后勤服务工作的实际改进。

陕能院后勤保障处为提高学校食堂餐饮服务水平，保障食品卫生安全，维护师生合法权益，规范餐饮服务制度和流程，主动接受全校师生监督，制定了《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食堂餐饮服务投诉管理制度》，并坚持把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食品价格与安全源头防范化解风险、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宝，创新建立了“一步两类四渠道”的工作方法，及时解决师生投诉问题，有效预防化解纠纷，维护学校安全稳定。在工作方法的指导下，累计处理师生投诉 36 件，投诉处理满意率 100%，为维护学校安全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结论

党建引领后勤、服务助力育人是新时代学校后勤发展的新要求和新思路。作为高校后勤保障部门，应不断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强化自身“服务”和“育人”的功能，通过加强思想教育、促进党建与业务融合、创新党组织活动形式、加强队伍建设和完善监督机制等措施，充分发挥党建工作在后勤服务中的引领作用，提高后勤服务质量和水平，为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提供坚实的保障。同时，也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探索创新，形成具有特色的党建引领后勤服务工作模式，更好地为学生提供优质服务，并对他们进行有效浸润教育，从而促进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的提升，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积极贡献。同时，我们还应持续关注党建引领后勤服务工作的开展动态，不断总结经验，改进不足，推动学校后勤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学校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 郑志豪 . 弘扬“三牛”精神书写服务育人新答卷 [J]. 新校园 , 2022(10): 10−11.

[2] 张彩峰 . 立德树人在高校后勤保障工作中的践行路径分析 [J]. 高校后勤研究 , 2023(12): 13−15, 18.

[3] 中铁十四局党委 . 党建引领 点燃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引擎 [EB/OL]. (2024−11−19)[2025−06−26]. http://www.qstheory.cn/2024−11/19/c_1130220860.htm.

[4] 新华社 .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 （下转 99 页）

红色文化基因与民宿功能的融合、活化设计策略研究
——以安源煤矿民宿为例

彭 娟 曹 治

摘要：本文以安源煤矿为主题的民宿为例分析红色文化基因与民宿功能的融合设计。红色文化遗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形成的，承载红色精神的物质遗存与精神符号，其具有历史性、地域性和可转译性三重特征。安源煤矿是红色工运始发地，它的文化和遗产特征是工业时代与革命精神的有机结合。在此以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通过红色文化遗产再生给民宿提供一种新的空间设计理念，以建立起历史记忆和当代旅程之间的密切感情，推动文化价值的发展。
关键词：安源煤矿；红色文化基因；民宿功能融合；设计策略

一、引言

工业文明与革命精神交织的红色文化基因，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密码。安源煤矿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其矿道深处的革命呐喊与工业机器的轰鸣共同铸就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图谱，既镌刻着 1922 年罢工谈判的历史坐标，又凝结着“义无反顾、团结奋斗”的工运精神。在文旅融合背景下，传统工业遗产保护模式亟待创新。红色文化民宿作为一种跨界媒介，通过空间载体的功能构建实现基因解码与价值再生。安源煤矿民宿的实践，是对闲置空间的“基因编辑”，既保留历史场域的原真性特色，又植入现代功能模块。本研究以安源煤矿民宿为样本，探索红色文化基因的活化路径 [1]。

二、红色文化基因概述

红色文化基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与建设历程中形成的独特精神标识与文化符号，它以物质遗存为载体，以革命精神为核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价值认同。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的精神凝结，红色文化基因具有历史性、地域性与可转译性三重特征：第一，历史性体现为与特定历史事件的深度关联，如安源煤矿作为红色工运发源地所蕴含的矿工抗争记忆；第二，地域性表现为物质载体与地方文脉的紧密联系，如矿井巷道、井架结构等工业符号的空间表征；第三，可转译性指其精神内核可通过建筑空间、文化体验等现代设计语言实现创造性转化 [2]。

安源煤矿就是这一精神标识的典型代表，其价值内涵体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在物质层面上，煤矿井下的采掘巷道、岁月层积的工业设备遗存和饱经沧桑的工人俱乐部建筑群等都构成了安源煤矿的物质性历史遗存，记录了 20 世纪初矿工群体的生产生活场景，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领导工农结合社会行动的革命图景。在精神层面上，该矿区形成了独特的记忆共同体和文化符号体系。煤矿工人在长达 20 多年的生产斗争和革命行动中，造就了顽强不屈、艰苦拼搏的工农斗争精神，他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与红色工运精神相互交融，凝聚成深厚的文化精髓。这种精神力量超越了物质载体本身，成为激励后人的宝贵财富 [3]。

三、红色文化民宿的现状与挑战

当前，红色旅游民宿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活力层

（上接 98 页）政治建设的意见 [EB/OL]. (2019-01-31)[2025-06-26]. https://www.12371.cn/2019/02/27/ARTI1551263472427508.shtml.

[5] 赵昕 . 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提升途径探究 [J]. 皖西学院学报 , 2021, 37(03): 43-46.

（作者：雷行，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李格，中共咸阳市委党校）

面都存在很大的缺失。民宿总是试图呈现出一种表层的文化融合方式——象征性的元素直接附着在建筑物外墙上。这仅是停留在视觉上的模仿与复制品，并未从红色精神体系中的斗争哲理、集体记忆和信念等层面进行内在的解读。由此，便无法进行更深层面的解读，同时，也破坏了空间的场所精神。与此同时，过多的数字化技术会导致形成一个空洞的展示厅一般的空间，无法赋予其人文特色和人文气质，也使得对红色文化的解读流于表层形式。

这些问题的矛盾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红色文化保护与商业化创新之间平衡的难题；二是红色文化符号的表层化与同质化问题；三是技术赋能与历史在场感之间的张力难以调和。这些问题亟待通过系统性策略加以解决[4]。

四、民宿与红色文化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红色文化遗产在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中面临记忆断裂与价值稀释的危机，民宿作为“微缩的文化容器”，通过空间叙事与体验设计，能够实现红色文化基因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传承的范式转换。安源煤矿的工运精神、集体记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亟须通过具身化、场景化的空间载体实现代际传递。同时，国家政策大力支持文旅融合，《“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推进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民宿作为文旅融合的创新节点，可承载红色教育、文化体验、社区参与等复合功能，响应“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战略导向。此外，市场需求也在迭代升级，后疫情时代游客从观光消费转向深度文化体验，《2023中国红色旅游消费报告》显示，73% 的 Z 世代游客偏好“沉浸式红色文化体验项目”，安源煤矿民宿通过红色基因活化，可填补市场对“工业 + 红色”复合体验产品的需求空白[5]。

安源煤矿有特殊的历史遗产，这也是进行民宿设计创造的设施基础与思想保障。目前遗留下来的 13 处文物保护地点、两公里以上隧道、大批工业设备遗迹构成了红色文化的历史基因，也提供了大量的红色文创空间。作为中国工人运动发源地，历史上发生过罢工谈判、工人夜校兴办、工会组织建设等标志性事件，这些事件都具备深度的叙事潜力，为红色文化民宿提供了宝贵的故事素材[6]。

五、红色文化基因在安源煤矿民宿空间中的活化策略

（一）空间场域的功能置换

安源煤矿民宿采取“新旧融合”的设计理念，对闲置空间进行功能的置换，将它改造为民宿接待大厅、特色餐厅、主题客房等，在保留原有结构的过程中赋予其全新的功能和生命力。在设计过程中，保留红色的砖墙、铸铁横梁等标志性工业元素，并采用现代装配式钢结构进行加固。

接待大厅设计了煤矿元素的前台、工业风吊灯、铁轨元素的椅子、巷道投影墙等，营造出浓厚的工业氛围，让游客一进入民宿就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沉淀。餐厅以矿工食堂为灵感来源，采用工业风吊灯和工业设备作为装饰，搭配矿工特色餐具并提供当地特色美食，让游客感受矿工的日常生活。除此以外，还构建了各种主题场景，例如矿工生活展区、工运历史长廊、矿洞体验空间等，进一步丰富了空间的文化内涵。

此外，民宿客房的设计注重主题化与多样性，设计了多种类型的客房，包括单人客房、双人客房及双层 LOFT 结构的大床与双床客房。所有的客房风格都以红色文化、煤炭工人精神为基调，从煤业的历史中汲取设计灵感，运用现代设计手法展现。例如，客房立柱是用仿照煤炭开采环境的环保材料，不仅契合安源煤矿工业遗产的格调，也表现出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态度；床头背后的墙体采用不光滑的矿石背景，两边用深黑色的煤炭材质搭配上古朴的肌理质感和其中点缀的一些现代的红色主题画作，将革命精神用当今时代的艺术手法呈现出来，传达了红色文化的核心含义；床头的桌子上挂的吊灯由矿井保护网编织而成，犹如矿工们使用的探照灯照亮前行的道路，尊重工业史实的同时也增添了现代化科技感；地板采用深灰色“工”型拼接瓷砖，营造了一种静谧的氛围，在空间上与钨丝灯晕染的暖光灯产生了强烈对比。这种材质与光感的碰撞，重现了那段质朴而坚韧的革命岁月[7]。

（二）工业遗产符号的转译与当代诠释

安源煤矿民宿通过工业遗产符号转译体系架构实现历史与当代的对话，这是一个在多表达策略范畴下的实现过程。煤炭机器功能化为功能性灯具基座，完成了工业符码功能化的工作；工人运动标语将文本图像矢量化分解组合，形成室内空间装饰的图像符码，完成了对信息符码的图像译码；质感化的墙面触感，唤起人们的怀旧体验，产生了对过往时空的沉浸感体验。

在具体设计实践中，通过现代设计语言，对诸如矿洞巷道、设备遗存等工业标识进行多角度再设计。例如将矿工帽、矿灯等工业设施物品碎片化后再融合形成新的室内装修模块。针对具有工业特征的形体符号，通过对形状的抽象化处理转化为建筑的排列关系，而对于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工业符号、遗迹等，通过用主题性的文化壁画、雕塑及互动式展项系统立体呈现出来。这样的设计既保留了工业遗存的历史价值，又通过直观的、艺术化的方式加深红色文化的情感叙事深度。游客在游览过程中通过触摸雕塑、观看历史影片等不断加深对工业史实的认知并最终达到认同红色文化的高度。

（三）数字技术赋能基因表达

借助虚拟现实（VR）技术制作安源煤矿工人运动场景的三维模型，重现了罢工谈判、工人夜校等重大历史场景，真实再现重大历史细节，使游客得以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工人运动的壮阔历史。同时借助增强现实（AR）技术，将鲜活生动的影像、历史信息融入实景空间中，让原本静态的空间转化为可感知、可对话的沉浸式场域，如民宿长廊的墙面可以通过触摸设备显示动态数字化历史标语，实现物理空间与数字信息的深度结合。

关于参与式体验，民宿设计了一种借助运动感应技术而形成的红色文化活动体验内容，例如，“矿工日记”角色扮演类的剧本体验活动，游客通过模仿矿工下井采矿的日常，在切身体验矿工生产工作的同时学习相关历史知识来理解革命精神。数字化系统通过感知设备实时采集游客行为数据，动态地更改展示内容和交互规则以适应情况的改变，并制作个性化的讲述线路，为游客进一步提供独特且深入的参观体验。

此外，民宿还引入智能化服务设备，例如在饮食、饮水方面都采用了机器人技术，这样做可以减少人力成本，还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民宿还建设了智能导向系统，给游客提供优质服务，例如语言介绍、线路设计、信息搜索等，让游客通过移动终端和掌上设备轻松掌握安源煤矿革命基地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民宿内的设施介绍。通过高度信息化，为游客营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红色文化氛围。

（四）文旅融合的产业生态圈构建

通过“政产学研用”联动，使民宿由单一的住宿服务转变为集红色教育、文旅体验和社区活动于一体的综合基地。政府可出台红色文化和旅游业发展专项资金来落实财政支持政策，从整体提升地方红旅品牌建设；高校及机构可通过对红色文化的开发与研究，提供民宿的设计理念、活动设计及民宿的服务水平等方案，通过产学研推动实现知识产权转化，如文创产品或深度互动产品；企业作为市场化运营主体，改善经营策略与服务水平，推出以红色旅游为主题的产品供旅客体验，加强自身差异性；社区居民通过共建共治机制，参与民宿的运营与文化创造，如担任文化讲解员、制作手工艺品，为民宿注入地方特色与人文气息，增强文化认同与游客体验。这种多方参与、互利共赢的运作模式，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在整体上为民宿的发展提供支撑。

（五）红色活动策划与红色故事体验

在民宿中构建一系列的主题性活动，例如开发红色研学、工运历史剧本杀、矿工职业体验营及红色文化工作坊等特色项目，其中矿工职业体验营通过 VR 还原井下作业场景，游客可以模拟井下装备穿戴、矿石分拣实操，从装备穿戴到矿石分拣的全流程模拟带来身临其境的震撼体验，强化游客的沉浸式认知体验；红色文化工作坊通过木刻版画、煤雕等手作体验，让革命精神在创意实践中得到传承。在故事挖掘维度，建立口述史采集、档案数字化、故事剧本开发等工作流程，提炼矿工抗争、工人夜校教育及技术革新三大叙事主线。每个活动环节设置故事碎片收集机制，游客完成体验后可拼合出完整的工运叙事拼图，既增强参与感又形成可带走的记忆载体。

除此之外，民宿还通过打造系列化的宣传活动，包含民宿的日常小项目、节假日专题项目，注重红色教育的长期开展，经常性地组织红歌朗诵会、红色电影赏析、在油灯下讲述红色故事等活动。在重大的时间节点，民宿联合周边的旅游景点和博物馆开展一系列主题性的红色创意市场活动、工会主题展览等活动，以更加具象化的形式重现历史，增强游客的参与感。这既保留了红色文化应有的厚重感和严肃性，也能以当下更有效直接的宣传方式增强观众的互动性和黏性。

六、结论

盘活红色文化基因、推动民宿功能升级，为安源煤矿民宿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路径。通过空间的重构、符号的转译、现代技术的赋能及跨业联动等手段，红色文化基因实现了由历史记忆到当代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安源煤矿民宿不仅是对历史遗存的保护，而且是对文化形式的重塑。未来还将借助科学技术、文旅发展等方式继续活化红色文化遗产，建立起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连接，为文化延续与传承提供新引擎。

参考文献

[1] 梁思敏 . 乡村振兴背景下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困境和路径探究 [J]. 山西农经 , 2025(05): 128−130.

[2] 郭熙 , 徐海峰 . “元宇宙”视野下南通红色文化展示馆交互设计 [J]. 辽宁丝绸 , 2025(01): 158−159.

[3] 刘乐 , 王婧 . 红色文化背景下的城市公园景观设计 [J]. 现代园艺 , 2024, 47(23): 91−93.

[4] 张宇 . 推动红色研学打造韶山品牌 [N]. 中国旅游报 , 2025−03−12(003).

[5] 刘晓慧 , 吴献忠 . 安源煤矿 : 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 [N]. 中国矿业报 , 2021−07−20(001).

[6] 胡萍 , 陈化先 . 变废弃矿山为金山银山 [N]. 江西日报 , 2021−11−10(001).

[7] 赵翔 , 常靓 . 百年名企安源煤矿在平稳中完成改制 [N]. 工人日报 , 2009−12−10(00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红色文化基因’视角下江西乡村公共空间建构的艺术介入策略研究”（YC2024−S645）。

（作者单位：南昌航空大学）

城乡融合型治理的理论内涵、实践路径与未来趋势
——以绍兴市上虞区盖北镇城乡融合型治理实践为例

吕　彭　张明华　金耀锋

摘要：城乡融合治理由人们对更好生活的向往驱动，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基本趋势。城乡融合型治理以打造舒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目标，旨在探索创新特殊地区的城乡融合、地区融合、群体融合、服务融合等多元融合，推进城乡融合型治理包括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方式、治理结果五个维度融合。绍兴市上虞区盖北镇初步探索出“做强党建统领、做实政府责任、做优协同共治、做好民生实事、做精数字赋能”的城乡融合型治理新模式，可为其他地区开展实践探索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城乡融合型治理；秩序分割；治理融合

一、城乡融合型治理的概念渊源

有学者已敏锐地观察到融合型治理在基层治理领域的实践创新，并提出了类似解释概念，如“过渡型社区”“城乡融合型城镇化”“包容性治理”“融合党建”“城乡融合型社区”“城郊融合型村庄”“融合型治理”等理论框架和解释性概念，从不同维度描述和解释兼具城乡分割、地区分割、群体分割、服务分割等特征的特殊区域的治理融合需求，突出反映了作为城市治理和乡村治理融合前沿地带的成效村的治理样态。依据基层善治目标，我们认为，城乡融合型治理以打造舒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基本目标，旨在探索创新特殊地区的城乡融合、地区融合、群体融合、服务融合等多维度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综合模式，为全体居民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让全体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治理成果。

综上，城乡融合型治理可界定如下：聚焦全体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治理成果的目标，以兼具社会阶层结构、利益结构、文化结构、民族结构、宗教结构等多元差异性的特殊地区为基本治理单元，从城乡、地区、群体、服务、秩序等维度推动城乡融合治理的理念、方式、策略、过程等全方位变革。

二、城乡融合型治理的基本内涵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治理变革的基本趋势和美好图景。从理论渊源看，融合型基层社会治理吸取了过渡型社区、城乡融合型城镇化、包容性治理、融合党建、城乡融合型社区、城郊融合型村庄、融合型治理等概念中有价值的理论元素，同时结合上虞区盖北镇推进新老居民融合治理的实践创新，推进城乡融合型治理至少应当包括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方式、治理结果等五个维度融合[1]，进而实现城乡治理一体化。

（一）治理目标融合：共同体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以及党的二十大均强调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突出了对共同体理念的价值偏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部分，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融合型基层治理对解决利益失衡、功能失调、机制失准、秩序失范等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共同困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示范价值。

（二）治理主体融合：“一核多元”

城乡融合型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具体形态。就治理主体而言，体现基层治理的如下基本特征：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通过协商、对话、合作等方式共同参与社区事务治理，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实现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在我国基层治理实践场域中，党组织和政府的功能和价值被重新发现，逐步从实践经验中提炼出“一核多元”治理结构的理论表述，要求基层党组织发挥全面领导的多元治理功能，其他组织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发挥不同作用。

（三）治理过程融合：平等参与

治理强调不同主体平等参与议题设置、决策制定、

服务供给、结果反馈等基层社会治理的全部过程。具体到城乡差异性情境，更加强调基层政府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分散的人民群众等多元治理主体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采取参与、协商与合作等方式，并通过目标设定、政策执行、力量整合、服务供给、结果评价与反馈等全过程参与，将分散在政府、市场、社会等各领域以及政府内部各“条条”“块块”的资源力量整合起来，凝聚成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三、盖北镇推动城乡融合型治理的实践探索

上虞区地处浙江省绍兴市东部，属于省级区域交通枢纽，绍兴商贸中心，被称为“浙东新商都”，紧邻国家级的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以加工制造为主的产业结构吸纳大量新居民居住。针对呈现出城乡分割、地区分割、群体分割、服务分割造成的秩序分割，盖北镇初步探索出“做强党建统领、做实政府责任、做优协同共治、做好民生实事、做精数字赋能”的城乡融合型治理新模式。

（一）做强党建统领，推动党建网与治理网深度融合

着力健全党建统领“四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基层党组织对新居民治理的全面领导作用。一是深化制度统领。推动社区党建“契约化”共建制度化提升，整合分散在基层政府、企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中的资源力量，凝聚起基层党建统领新居民治理的强大制度合力。二是深化组织统领。推进实施“支部建在楼栋上”“支部建在网格上”等实践做法，结合“一村一幢楼”计划，及时在符合条件的楼栋成立楼栋党支部。目前，已经成立楼栋党支部 4 个，实现“网格党支部”全覆盖。三是深化服务统领。以融合型党建为抓手，全面实施“党建 + 垃圾分类”“党建 + 合作社”“党建 + 出租屋旅馆式管理”等行动计划，实现党建工作与城乡融合治理具体业务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同问责“五个同步”[2]。

（二）做实政府责任，推动新居民共享发展和治理成果

政府是人类社会处理公共事务最重要的组织形式。盖北镇充分发挥基层党委和政府的“元治理”职能，推动新老居民从“分割型治理”向“融合型治理”转型。一是履行服务职能。针对企业招工与新居民就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建立“老乡带老乡”机制，根据需要组织企业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省份，通过特定渠道向特定人群“点对点”发布需求信息。二是履行管理责任。针对出租屋消防安全隐患突出的问题，每季度组织一次“出租屋整治专项行动”，对不符合消防要求的出租屋一律停止使用，限期整改。三是履行兜底责任。针对“条块分割”管理体制造成的“制度缝隙”和职责交叉等问题，积极履行属地政府责任，让新老居民舒心安心放心地在盖北生活与工作。盖北镇所有公办中小学全部向全体居民开放，所需经费由盖北镇自行筹资解决[3]。

（三）做优协同共治，推动建设城乡融合型治理共同体

盖北镇多措并举，致力于构建利益联结、有序参与、情感相依、价值共享的城乡融合型基层治理共同体。一是积极搭建基层协商治理平台。构建镇、村（社区）两级联动协商平台体系，设立“请你来协商·民政议事堂”作为基层治理载体，聚焦环境治理、文体生活、公共安全、邻里纠纷等特定主题，每月组织新老居民代表到“民生议事堂”交流协商，解决问题，增进感情[4]。二是全力打造“以新管新”品牌。着力打造“一家亲”“百家姓”等特色调解品牌，创新推行“以新调新、以外调外”工作机制，紧密对接人民法院“诉源治理”工作体系，通过建立健全诉讼与调解“无缝对接”机制，逐步实现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进一步形成“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体系化解决思路，加快构建分层过滤机制。三是有效推动社会服务融合。组建“老乡红袖章”等志愿者服务队，建立需求响应式服务机制，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增进新老居民的感情，进一步提升归属感，逐步消弭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距离感。

（四）做好民生实事，着力创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盖北镇坚持把为全体居民创造舒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作为推进城乡融合型治理的基本内容。一是实施“一村一幢楼”计划。构建“资金镇补、土地村出”的协同联动建设机制，通过新建租赁住房、旧房厂房适用化改造、“飞地”自建、异地联建等多样化实施手段，全面推进“一村一幢楼”计划，着力为新居民提供优质居住环境。二是深化出租屋“旅馆式·四色管理”模式。完善出租房网格化管理体系，建立基于建筑安全、消防设施、人员密度等多维度的动态分级指标体系，组织新居民协管员、网格员开展日常巡查，对存在电气线路过载、逃生通道堵塞等安全隐患的出租屋实施实时预警，实现出租屋安全管理的系统化提升。打造集“居住出租房、场所行业物品、矛盾纠纷隐患、管理服务对象”于一体的治安“四色”管理平台。三是深化推广“德润盖北”行动。借助“野藤葡萄文化节”“村落文化节”“盖山论坛”等传播平台，推动政策、科学、道德、法律等群众日常生活需要的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5]。

（五）做精数字赋能，拓展融合型治理的智慧化应用

数字赋能是指数级放大基层社会治理优势的重要方式。一是打造数字化指挥中心。积极推进应急指挥中心全域化数据采集，系统集成气象水文实时监测、公共

卫生预警等系统，实现与 11 个行政村（社区）的跨层级数据互联互通。形成对全镇各类隐患“一张图”可视化监测，在疫情防控、抗击台风、治安联防等应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建设“智慧盖北”治理平台。依托“基层治理四平台”和全科网格，以“IP 地图”的形式监控人流量变化，在网格地图上动态展示全量客流、过境人流、流动人口已登记人数、未登记人数、流动人口登记率等监测指标，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由“经验支撑型”向“数据支撑型”转变。三是试点建设“智慧小区”。借助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工作，加强数据分析和应用，实现对人、车、房、企、物等重要治理目标的全量化有效监测，着力构建“平安小区”建设长效工作机制，有效减少违法犯罪事件和安全事故[6]。

四、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型治理的几点启示

盖北镇针对治理对象多重分割、公共服务供给滞后、实际参与渠道不畅、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等复杂治理情境，创造性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基本理念，初步探索构建出“做强党建统领、做实政府责任、做优多元协同共治、做好民生实事、做精数字赋能”的城乡融合型治理新模式，由此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一）坚持党建统领

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覆盖基层治理的各领域全过程。在基层融合型治理场域中，要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把党建统领贯穿到理念创新、政策创新、方法创新、载体创新等融合型基层社会治理的全领域当中，贯穿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等全部流程之中，确保融合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活动和创新过程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盖北镇的实践表明，党建统领可以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调动分散在政府、市场、社会之中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资源力量，从主体融合、过程融合、方式融合、结果融合等维度全面发力，进而形成推动城乡融合型治理的强大合力。盖北镇城乡融合型治理实践还表明，党建统领可以从政治统领、组织统领、制度统领、政策统领、项目统领、服务统领等方面得以实现[7]。

（二）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既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也是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落实。只有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才能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摆在乡镇治理的重中之重，做到为了群众、过程依靠群众、成效由群众评判。坚持以建设利益联结、有序参与、情感相依、价值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为根本目标，不搞“花架子”“虚把式”，通过“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等渠道，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坚决杜绝可能出现的“形式主义”“政绩工程”。在具体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努力做到以知促行，知行合一，不断满足全体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坚持方法创新

绍兴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方法论体系，也配套发展出“三事分议”、村社法律顾问“六个一制度”、村规民约、数字化场景应用等有效管用的制度载体。在推动融合型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广泛学习借鉴各地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典型做法。同时，要加大公共政策专业知识的学习运用力度，借鉴深化创新直接供给、政府管制、合同承包、政府购买服务、拨款、凭单制、贷款与贷款担保等政策工具的适用情境和具体形式，不断丰富兼具规律性和中国特色的政策“工具箱”，为发展本土化的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作出盖北贡献[8]。

（四）坚持关键项目牵引

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推进城乡融合型治理，既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谋划推进“整体智治”，又要抓住“牛鼻子”，以关键和重点部位的优化升级带动整体提升。要突出民生实事和关键小事。教育、就业、住房、托幼、医疗、养老等民生实事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推动城乡融合型治理的关键和重点，为此要以民生实事为切入点，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持续推进平安盖北、富裕盖北、幸福盖北。创造性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城乡融合型治理，可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要深化“德润盖北”行动。深厚的文化底蕴是绍兴和上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充分借助新时代文明实践、“德润越地”等实践载体，引导盖北镇新老居民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良好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1] 张晨 . 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型社区”: 空间生成、结构属性与演进前景 [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06): 74−79, 196.

[2] 李红玉 . 城乡融合型城镇化——中国新型城镇战略模式研究 [J]. 学习与探索 , 2013(09): 98−102.

[3] 徐倩 . 包容性治理 : 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J]. 江苏社会科学 , 2015(04): 17−25.

[4] 许正中 .“融合党建”是党领导创新型社会的新模式 [J]. 人民论坛 , 2017(30): 125.

[5] 林莉 , 金太军 . 城乡融合型社区的共治需求与实现逻辑——基于空间结构的视角分析 [J]. 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5): 72−78.

[6] 田鹏 .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郊融合型村庄转型的实践逻辑——基于城乡社区衔接理论 （下转 105 页）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党史教育融合路径研究
——以镇江市为例

高雪荣

摘要：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历史痕迹和精神瑰宝，具有浓厚的感染力。镇江市红色文化资源是当地高校开展党史教育的重要依托，二者在融合过程中存在机制不健全、方式单一、效果不佳、氛围不浓厚等困境，需进一步探索镇江红色文化资源赋能高校党史教育的路径，促进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

关键词：镇江；红色文化资源；党史教育

镇江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军事意义，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现留存的遗址、遗迹、遗存布局集中、门类齐全、特色突出，这些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厚重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地域文化，在开展党史教育中具有独特资源优势，是高校开展党史教育鲜活的素材。

一、镇江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党史教育的价值

镇江是一座具有英雄气概的城市，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它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出独有的红色文化资源，彰显着深厚的民族担当和精神力量，是高校党史教育生动的教科书。

（一）丰富党史素材，发挥红色文化资源资政育人作用

“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1]镇江红色文化资源对当地高校而言是不可多得的党史教育资源，是高校党史教育宝贵的实践空间。高校在开展党史教育过程中带领大学生实地参观这些红色文化遗址，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追溯和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镇江奋斗的历史，增强大学生对相关革命历史事件的了解，增进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传承红色基因，不断提升党史教育质量、强化党史教育实效。

镇江红色文化资源与城市气质和历史底蕴交相辉映，在时间长河里凝结了无数精神财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公众，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塑造作用。高校党史教育也应以文化浸染为重点开展情景模拟、情景教学、体验式教学、榜样教学等方式，增强党史教育的感染力和亲和力，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厚植家国情怀，构建红色文化资源党史教育基地

镇江的红色文化资源空间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该市北部、西南部和东部等地区，有关方面据此绘制了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地图册，设计制定了三条红色党史教育研学路线，名为“重走总书记视察路”，其中西线为“中共镇江地方史馆—镇江市烈士陵园—韦岗伏击战纪念馆—新四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茅山新四军纪念馆—赵亚夫事迹展示馆”[2]。路线空间设计合理，时间叙事连贯完整，反映了当时新四军在镇江广泛开展抗日战争，历经韦岗战斗、新丰战斗、句容城战斗、东湾战斗、上下会战斗等大小数百次战斗，展

（上接104页）视角的分析[J]. 长白学刊，2019(04): 122−129.

[7] 卢福营. 融合型治理：城中村治理创新的目标与依据[J]. 中国治理评论，2020(02): 39−53.

[8] 张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N]. 人民日报，2025−03−19(13).

（作者单位：吕彭，绍兴市医保局上虞分局；张明华、金耀锋，上虞区盖北镇人民政府）

现了新四军听党指挥、报国为民的钢铁意志。

由此可以看出，镇江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深厚的精神内涵，能够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锤炼意志，成为堪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时代青年。

（三）用好红色资源，创新内容形式提升党史教育实效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重要历史时期，镇江积淀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是波澜壮阔党史的生动写照。其中丹徒区档案馆馆藏档案涵盖革命历史档案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档案；新四军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现馆藏革命文物、书画、文史资料等共计 263 件（套）[3]，有多个展馆通过实物、文档、图片、照片、油画等资料系统介绍新四军在宝堰创建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历程，再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苏南军民的战斗风貌；上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藏有珍贵文献资料和实物 400 余件，再现了总前委运筹帷幄，决胜上海的光辉历程；丹阳革命陈列馆展览了 640 余件照片、图表、文物，反映了丹阳党组织的奋斗历史……

针对这部分文化资源，高校在开展党史教育时既可以组织实地教学，也可以征得有关方面同意，通过技术手段将系列图片、文献资料、档案、影像等汇总上传，建立红色文化资源库，进行专题教学，深度挖掘镇江红色文化资源，将镇江红色文化资源有针对性地引入党史教育，创新党史教育形式，通过课堂讲授、影音展示、情景剧排演、现场参观、讨论互动、案例分析等多种策略，增强党史教育的特色与实效。

（四）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镇江这片热土孕育出了无数英雄儿女，他们为了保家卫国，用血肉之躯奏响了“共产主义之歌”。人物资源是镇江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粟裕、陈毅、管文蔚、巫恒通、郭纲琳、郑竹波、梅嘉生、李培根、王培英等在镇江留下了许多英勇事迹。他们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和精神财富为后人留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展示着革命斗争的感人事迹，传承着催人奋进的红色情怀，是镇江红色文化资源中宝贵的人物资源。

在高校党史教育开展过程中，对人物经历、主要贡献、突出精神的深度研究与学习，讲好镇江红色故事，剖析蕴含其中的伟大革命精神，用镇江红色历史启迪人，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内容，是对革命薪火的传承与发扬，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染力。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与精神力量，正是帮助大学生在红色历史的氛围中接受党史教育、树立正确党史观、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武器。

二、镇江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党史教育的现状

镇江市红色文化资源有着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融入高校党史教育的过程中需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双重角度开展。

（一）缺乏红色文化资源挖掘与利用的科学机制

目前高校党史教育并无统一教材体系，开展成效不佳。一是仅停留在理论传授、口号宣传、新闻传媒层面。二是党史教育覆盖面较小，仅有部分大学生参加，无法面向全校开展。由此可以看出，高校运用镇江红色文化资源开展党史教育的机制不够健全，形式散乱，未能形成有效协同来发挥镇江红色文化资源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此外，高校党史教育的开展并无书面要求和考核标准，也没有开设专业课程，所以在开展过程中难以衡量工作成效，缺乏统筹型教学规划和融入机制，未能实施红色资源的定向开发与应用。只是将部分经典人物的故事、经历、事迹作为案例开展党史教育，或者是截取网络上部分党史资源展示，盲目强调红色文化资源的政治价值和激励作用，导致高校党史教育成效不尽如人意。

（二）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史教育内容陈旧老套

由于镇江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史教育并无具体教材，也无相应课程设置，在开展过程中往往借助学校思政课程展开，但这些课程虽然有部分内容与党史内容重合，但其中蕴含的党史要素不多，与镇江红色文化资源关联度不大，难以在课程中有机融入红色文化资源。另外，思政课程的主要教学目标与党史教育并不完全相同，借助其开展党史教育难以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不出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作用。

高校有意在开展过程中积极引入镇江红色文化资源，但过程中既没有合理运用镇江红色文化资源也没有考虑到学生的主体性需求，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关联度不大，学生只是被动接受这些理论知识，致使高校党史教育浮于表面、缺乏实效。

（三）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史教育形式方法单一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高校开展党史教育是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发扬红色传统的重要依托。党史学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学习教育方式的多样性、创新性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

在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党史教育过程中，教育方式手段单一，将党史教育的任务安排给辅导员、班主任以及思政教师，要求定时开展党史教育主题班会、红色文化主题教育，但是其主要形式仍是学生被动式灌输党史教育内容，对学生的需求把握不准，导致学习教育难以精准实施，大学生对党史的认识往往留在表面，对党史理论的认同度较低，学习兴趣不高 [4]。

（四）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史教育氛围不浓厚

当下高校开展党史教育主要依赖课堂教学，但在开展过程中没有量化标准，也没有完善的体系和机制，无法对教育工作开展成效进行评估。部分高校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史教育也不够重视，甚至认为党史教育是高校思政教师的工作任务，等同于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课程，与其他系部、职能单位无关。

此外，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党史教育中，帮助大学生感受红色文化氛围，单纯依靠理论教学是不够的，还需要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然而当下大部分高校对于将红色文化资源建设融入校园氛围营造重视度不高，许多高校并不重视校园文化环境的营造，没有在大学生生活学习的空间中增加红色党史资源和素材，校园文化党史内容的缺失使得大学生在参与高校开展的各类主题党史实践活动时难以进入状态。

三、镇江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党史教育的路径

针对目前困境，开展高校党史教育必须重新梳理红色文化资源，完善教育机制，深化党史教育形式，打造新型传播平台，营造浓郁红色校园文化氛围，发挥红色文化资源启智润心、教化育人作用。

（一）有效整合资源，完善党史教育机制

空间上，对镇江红色文化资源的利用可以依据区域和地理位置分类，科学规划教育线路和主题，优化实践教学的路线设计和地点分配，确保点位之间既有独立性又有连贯性，推出精品线路，开展体验式教学，打造流动的党史课堂，建设党史教育基地，并以此提升大学生的参与度与获得感，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对大学生的价值引领和信仰塑造。

时间上，可以从各个历史阶段对镇江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分类梳理，以时间为逻辑建设党史教育资源库，体现党史奋斗历程，同时也符合知识学习规律，循序渐进，将“党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体悟红色精神，引发大学生情感共鸣。

（二）开展社会实践，深化党史教育形式

首先，在高校党史教育课堂中善用红色文化资源库，提升教育互动性，针对不同年级的大学生设计针对性的教学内容和形式。通过课堂的知识讲授和实物教学，开展小组讨论、主题汇报等形式，促使学生感知鲜活的党史知识，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其次，将党史课堂搬到红色革命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等，依托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实践模式。设计“行走的党史课”，开展实地教学，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高校党史教育体系。

最后，充分挖掘线上线下红色资源，开展多元化的党史教育。例如组建“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理论普及宣讲团，强化红色文化宣传教育，开发线上学习平台，开展红色故事演绎、烽火家书、红色主题演讲比赛、红色文化学习讲座等，增加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史教育的广度与深度。

（三）创新宣传方式，打造新型传播平台

一是借助网络广泛宣传镇江红色文化资源与党史学习的内容。如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开设微信公众号“南财红山思政网”，设置包含英烈人物、党史故事、榜样力量等主题的栏目，传唱一代代华夏脊梁的事迹，共同回眸百年党史峥嵘岁月，推动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二是借助新媒体推动党史教育智慧化与个性化。根据红色资源的分布特点和教育需求，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广泛宣传镇江红色文化资源和党史教育成果，提高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

三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例如 AR、VR 等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镇江红色文化资源全景教育平台，利用声、光、电等技术手段重构党史实景模拟体验馆，打破时空限制，让学生走进历史，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场景、亲身体验党史故事[5]。

（四）依托校园环境，营造红色文化氛围

校园环境是大学生生活、学习的场所，可以结合学校自身特色，将镇江红色文化资源与校园人文自然景观联系起来，如命名校园道路和景观建筑，在校园建筑、景观旁设立镇江英雄人物雕塑，设置镇江红色文化资源长廊，打造润物细无声的红色环境，让大学生在生活环境中潜移默化地感受红色文化熏陶，让镇江红色文化深入人心。高校可以通过举办主题活动，如“铁军精神”代代相传的征文比赛等，在全校形成一股追忆红色基因的热潮。高校还可以通过社团组织活动，展现镇江红色文化资源的吸引力与说服力，例如放映反映镇江儿女英勇奋斗的影片、重排红色话剧、讲述红色故事，让大学生重温经典，感受先辈的革命情怀。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用好红色资源 , 传承好红色基因 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J]. 求是 , 2021(10).

[2] 许辉 . 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践路径——以镇江市为例 [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18(10): 72-74.

[3] 中共镇江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 镇江市党史学习教育地图册 [EB/OL]. (2021-04-14) [2024-09-30]. https://a.c1ns.cn/let4W.

[4] 郝桂荣 , 杨昊霖 .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析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 2024(12): 35-37.

[5] 赵蓓茁 , 孟晓东 .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 2024(02): 69-7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市社科应用研究一般课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党史教育融合路径研究——以镇江市为例”(2024YBL104)；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思政专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的‘三全’育人研究”（2023SJSZ1309）。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中华文化研学活动促进中老文化交流的路径探索
——以鲁班工坊为例

许　冬

摘要：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鲁班工坊是我国对外交流的新名片，本文以柳州城市职业学院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中老鲁班工坊”实践基地为例，通过系统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学实践活动，重点研究如何强化中国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意识、培养老挝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增进中老学生间的沟通交流，创新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方式。本研究致力于为中老学生文化交流探索新模式，同时为增强中国学生文化自信、深化老挝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开辟有效渠道。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老学生文化交流；鲁班工坊

党的二十大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要“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鲁班工坊作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品牌，以“大国工匠”鲁班精神为内核，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合作，搭建起中外职业教育合作的新平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外学生交流活动，是促进中外学子文化交流的一条值得探究的有效途径。

一、研究背景

2022 年，柳州城市职业学院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依托与东风柳汽、上汽通用五菱等地区龙头企业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多年经验，成功获批鲁班工坊中老境外办学建设项目。2023 年 9 月，学院迎来了第一批鲁班工坊老挝留学生[1]。

在首批老挝鲁班工坊学生到来之后，辅导员逐渐发现，老挝的学生平时较沉默，在上课时有时表现出想和中国学生交流的欲望，但没有交流成功[2]。中国学生也想和老挝同学交流，但在实际接触中未能实现有效沟通。

如何有效加强中老学生间的交流，特别是增进中老学生间的文化交流，帮助老挝学生更快更好地适应中国的学习和生活，这一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3]。

二、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计划采用以下方法开展：

1. 行动学习法：组建问题研究团队，运用行动学习法，针对“中老学生在沟通交流上主要存在哪些障碍？”“中老学生间有哪些因素对相互沟通有促进作用？”这两个问题开展分析讨论，探寻解决办法。

2. 实践研究法：组织中老学生开展实践活动研究，通过实践活动观察解决办法所能达到的效果，并据此提出下一步的改进方案。

3. 面对面访谈：实施实践活动后，随机抽取参与活动的学生进行面对面访谈，了解学生对活动所产生的效果的感受，以此判断活动的效果。

三、案例分析

（一）前期分析

针对出现的问题，我们组建了行动学习小组，收集学生反馈的情况并组织了专项研讨，运用行动学习法进行分析。经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学生与老挝学生间出现的问题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语言沟通问题。语言是交流最方便的工具，然而中老学生之间存在语言不通的情况，客观上造成了沟通障碍。因此，需要中老学生找到一种简单易行的沟通方式，以方便彼此之间沟通交流。

2. 民族文化差异问题。中国历史文化悠久，提倡温、良、恭、俭、让，有着丰富的民族传承、技艺和活动。而老挝国家历史相对较短，人民信仰佛教，大多还保持着自身的民俗民风。由此可见，中老间的文化有较

大差异。

3. 民族习惯差异问题。老挝学生比较习惯吃糯米，其菜样特点是酸、辣、生，喝水时喜欢加冰。老挝学生注重礼貌，见面和分别时都习惯打招呼，打招呼时一般双手合十放在胸前。老挝学生也习惯握手礼，握手一般为女生主动[4]。而中国学生则比较随意，见面问个好，分别挥挥手，喜欢随意相处，糯米、黏米、粉、面都喜欢吃，菜样更是多种多样。从民族习惯来看，中老学生间既有差异也有共通之处，不难互相适应[5]。

4. 沟通氛围问题。中老学生平时所居宿舍间有一段距离，只有上专业课时才会在一起，物理距离造成了平时沟通氛围不足，沟通机会不多。

中老学生沟通交流除了存在问题外，也存在一些促进相互沟通的因素，如帮助老挝学生适应中国环境、优化语言学习效率与效果等。通过分析，形成中老学生需要增进沟通的因素鱼骨图（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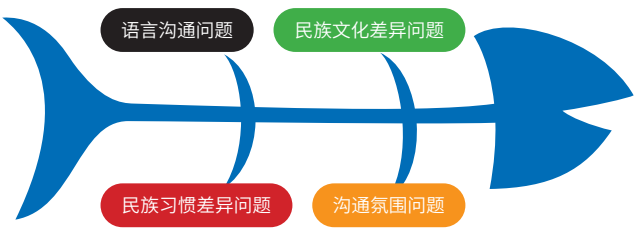


图 1 中老学生需要增进沟通的因素鱼骨图

（二）解决方案

综合前面的研究分析，我们对如何增进中老学生沟通交流的途径，继续运用行动学习法进行了研究、探讨，总结归纳出解决方案鱼骨图（见图 2）。



图 2 中老学生增进沟通交流解决方案鱼骨图

根据解决方案鱼骨图，我们归纳出增进中老学生文化交流的解决方案：

1. 语言沟通的解决方案。在语言交流中，我们推荐同学们使用“百度翻译”手机 App 的中文—老挝双语互译功能。经过老师指导，中国、老挝学生都安装了“百度翻译”App，并学会使用。

2. 民族文化差异的解决方案。挑选优秀传统民族文化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举办优秀民族文化研学体验活动，邀请老挝学生参加。在中国民族文化的体验活动中，老挝学生能够学习中国的文化和技艺，同时也欢迎他们展示老挝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增进了解[6]。

3. 民族习惯差异解决方案。通过班会课等活动，向中国学生介绍老挝生活习惯和文化习惯，同时也向老挝同学介绍中国生活习惯和文化习惯，为进一步增进交流做好准备。

4. 组织优秀民族文化研学学生党员先锋队。以学工党支部为核心，组建活动策划团队，在活动分组时，每组分配 1 名学生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带领非党员学生和留学生组队。为确保活动效果，由支部党员负责了解老挝同学兴趣需求，在活动中保障活动质量。

5. 文化研学活动的选择。为保障文化研学活动取得良好效果，拟选择简单易学且年轻人比较喜欢的美食制作方面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研学实践活动。

综合上述解决方案，我们尝试通过中老学生共同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学活动的方式，为中老学生搭建增进沟通的桥梁。经过筛选对比，决定以“恭城油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学为基础，组织中老学生开展“恭城油茶”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研学体验活动。

（三）“恭城油茶”非物质文化遗产简介

“恭城油茶”是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著名非物质文化遗产，恭城油茶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起源可追溯至唐朝，承载着千年的文化积淀。自唐代以来，广东、湖南、江西等地的瑶族民众陆续迁徙至恭城这片土地。面对当地山地潮湿、瘴气弥漫的环境，瑶族民众凭借智慧，对油茶的传统原料配方与制作工艺进行了改良，创新性地加入了生姜和大蒜，从而强化了油茶的功效。历经岁月的验证，恭城油茶被证实具有健胃消食、祛湿散寒、止泻痢以及提神醒脑等多重益处[7]。近年来，通过中医理论的深入剖析，发现恭城油茶在调养身体方面具有独特的平衡性，它既不会因寒凉而伤及阳气，也不会因温燥而损害阴津，因此，一年四季，无论男女老少，均可安心享用。此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揭示，油茶中含有丰富的茶多酚，其具有显著的抗氧化特性，可有效清除自由基，同时在辅助调节高血脂和血糖、保护肝脏、缓解疲劳、延缓衰老方面展现出显著效果，对维护身体健康有一定帮助。

（四）方案实施

活动当天，部分中国少数民族学生着民族服装，同时邀请有民族服装的老挝同学穿着民族服装出席。

活动邀请“恭城油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来到现场，教同学们制作恭城油茶，并让大家品尝恭城油茶。辅以广西民族非遗美食船上粑、肉糕粑、粽子等，每一种非遗美食都有相应的介绍并可以品尝。

中老学生混合编组，约 6 人一组。大家先观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讲解和制作油茶，再自行尝试制作油茶。随着现场炒茶、锤制茶和姜的香气四溢，以及品尝油茶的欢声笑语，研学活动逐渐进入高潮。

现场还有很多非遗美食，经过关于油茶制作的沟通后，中国学生纷纷主动给老挝学生介绍中华传统美

食，现场沟通氛围温馨、热烈、和谐。

一些有书法特长的中国学生给老挝学生展示书法，老挝学生也学着中国学生的样子使用毛笔，现场爆发出阵阵欢笑。整个研学活动变成了中老学子沟通交流的聚会，同学们拉近了距离，共享欢乐的时光。

（五）效果初探

活动结束后，我们随机抽取了 2 名中国同学和 2 名老挝同学，进行了一对一访谈，分别向他们提出 4 个问题：

1. 你觉得这个活动能让你对中国文化更感兴趣吗？

2. 你觉得这个活动能让中老学生间增进交流吗？

3. 你喜欢这样的活动吗？

4. 你希望学校多组织类似的活动吗？

我们对访谈中他们的回答进行记录，结果如下：

中国学生 1：我喜欢这个活动，这样可以认识更多不同民族的朋友。希望学校能多组织这类活动，在课余时间能参加这么有意思的活动，既可以丰富校园生活，又能结交朋友，是我喜欢的。

中国学生 2：当然喜欢，这个活动的名称和内容都非常吸引人，我喜欢这样的活动！像这样丰富多彩的民俗特色趣味活动，是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这样的文化活动，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欣赏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从而增强我们的文化素养和认同感。这种活动还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培养团队精神和领导能力，我当然非常希望学校多组织这样的活动。

老挝学生 1：这个活动让我对中国文化更感兴趣了，我觉得很有意思，还能增进我们的交流。我特别喜欢这个活动，希望学校能多组织这类活动。

老挝学生 2：这个活动能让我对中国文化更感兴趣，我觉得很有意思，能增进中老同学间的交流，我喜欢这样的活动，希望学校多组织这样的活动。

不管是中国学生热情洋溢的回答，还是老挝学生简单直白的回答，都透露出中老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喜爱。从研学活动的效果来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目的。

四、总结反思

通过中老学生中华民族文化研学实践活动的举办，达到了以下效果：

1. 强调“党建引领”，由学生党员引领活动。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研学活动坚持以学生党员群体为核心，强化了学生党员的“四个自信”，尤其是加深了他们对“文化自信”的理解。

2. 激发了中老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非遗传承研学活动的开展，既让老挝学生感受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也激发了中国学生对非遗传承的动力，有效提升了中老学生对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

3. 为今后中外学生间如何交流探索出了路径。本次开展中老学生间的交流活动，可举一反三，将这种交流模式向东南亚学生乃至世界各国的留学生推广。在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选择方面，建议以通俗易懂、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为基础，如中华传统美食制作和品尝、民族非遗传承手工制作等；在此基础上，可辅以一些欣赏性强的文化活动，如书法、国画，让有兴趣的学生参与。通过此次实践活动，我们初步探索出以优秀中华民族文化研学增进中外学生沟通交流的良好路径。

4. 通过活动实践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倡导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追求公平正义、捍卫民主自由。我们通过生动讲好中国故事、积极传播中国声音，致力于展现值得信赖、充满魅力且令人尊敬的中国形象，让世界看到一个多维、真实而立体的中国。以优秀中华民族非遗为载体，彰显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意愿。

五、研究局限

本次研学活动就效果而言较为成功，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1. 本次优秀中华文化研学活动以“恭城油茶”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基础。类似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很多种，本次恭城油茶非遗研学取得良好效果，但其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学能产生怎样的效果，以及哪种效果更好，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2. 研学活动结束后，仅抽取了 4 名同学进行了面对面访谈，虽代表了部分同学的感受，但所选取的样本数量较少。可以考虑在今后的研学活动后，采取问卷调查和面对面访谈结合的方式开展调查，可以得到更详细的活动结果反馈。

3. 一次活动所产生的效果毕竟有限，要真正提升中老学生文化交流效果，还要进一步开展优秀中华文化系列研学活动，建立长效的文化研学机制，通过常态化、体系化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增进中老学生的友谊，推动中外文明互鉴走向深入。

参考文献

[1] 申荷艳 . 跨文化交流促进中职学校茶艺专业调饮茶制作方向学生的职业能力发展 [J]. 中外食品工业 , 2024(22): 126−128.

[2] 张琨 , 汲安庆 . 论大学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J]. 海外英语 , 2023(09): 171−173.

[3] 齐轩石 . 近代中国留埃穆斯林学生与中阿文化交流 [J]. 中国穆斯林 , 2022(02): 81−85.

[4] 刘文文 . 基于汉字书写特点的对外汉字教学策略探讨——以中医药文化交流中的巴基（下转 111 页）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基层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路径探索
——以艺术学院第一师生党支部为例

赵　婷　陈冉燃

摘要：高校艺术学院作为培育艺术人才、推动艺术创新、服务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党建与业务工作的同频共振。然而，当前部分艺术院校基层党支部在实践中常陷入重业务轻党建或党建业务“两张皮”的困境，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未能充分转化为育人效能。基于此，文章以艺术学院第一师生党支部为例，分析了党建与业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基层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路径。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高校艺术学院；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硬实力支撑，更需要党建引领的思想保证与组织保障。反观当前艺术院校基层党建实践，部分第一师生党支部存在重专业创作轻思想引领、重活动形式轻内涵建设的倾向：有的将党建简单等同于开会学习，与专业课程、艺术实践脱节。在此背景下，破解党建与业务“两张皮”困局，推动二者从物理叠加向化学融合转变，既是艺术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1]。

一、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基层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意义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办学的核心使命，党中央始终将高校党建工作视为落实这一使命的关键抓手，明确要求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与政治引领作用，将党的教育方针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对于艺术院校而言，这一要求的实践尤为重要，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培根铸魂，需在技艺传授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创作实践中传递价值导向。

（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命题。艺术学院作为高校二级办学单位，其科研、教学、人才培养等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与组织保障，而第一师生党支部作为学院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既是政策落实的执行者，也是师生需求的反馈者，在学院治理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

（三）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坚持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根本政治原则，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作为这一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既明确了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又保障了校长负责制的规范运行，艺术学院党委作

（上接 110 页）斯坦零起点学生为例 [J]. 西部素质教育，2019, 5(08): 172−173.

[5] 邱明明 . 跨文化视域中的地方高校学生国际交流对策 [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17(04): 467−470.

[6] 张燕萍 . 高校学生文化生态系统中的文化传递与交流研究 [J].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0, 31(02): 7−10.

[7] 庆格乐 . 对外文化交流中艺术类院校学生英语学习现状调查报告及对策 [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6(11): 134−136.

（作者系柳州城市职业学院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副教授）

为办学治院的把舵者，需在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统筹改革发展稳定中发挥总揽全局作用，而基层党组织则是这一领导体制的执行单元与神经末梢[2]。

二、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基层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问题

（一）业务与党建失衡，制约融合发展深度

以高校艺术学院第一师生党支部为例，当前党建与业务工作中存在明显的一头重、一头轻倾向，业务工作常被置于优先位置，党建工作则不同程度被弱化，这种失衡直接拖慢了二者融合的步伐，虽然制度上明确了党政各自的职责范围，但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党建与业务往往各干各的，既阻碍学院整体发展步伐，也让党建工作的覆盖面和实际影响力大打折扣。

（二）形式与内容脱节，限制融合发展广度

目前采用的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大多依赖传统的讲座、集中学习等方式，虽然能传递理论知识，但缺乏互动性和时代感，难以激发党员干部的参与热情，尤其是随着学院各项工作的专业化、精细化程度不断提高，部分党员干部更倾向于把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等业务硬指标上，对党建工作的重视程度逐渐降低，主动参与党建活动的意识不足，创新思路也不够。

（三）当前与长远失衡，影响融合发展高度

真正高质量的党建与业务融合，应当紧密围绕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展开，通过两者的有机联动产生1+1>2的综合效益，但反观实际情况，党支部更多关注的是有没有完成融合动作，却对融合的目标导向、长远规划以及如何服务教育根本任务缺乏系统思考。例如，在制定工作计划时，往往只列明本学期要开展多少次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几次业务培训，却很少思考这些活动如何与教师的职业发展、学科建设、学院战略规划等长远目标结合[3]。

三、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基层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路径

（一）理念融合

思想是实践的先导，实现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首先要推动思想认识层面的深度同频。高校艺术学院第一师生党支部需跳出就党建抓党建的惯性思维，重新审视党建工作的本质内涵，将其与艺术教育的特殊属性、教师职业发展的现实需求紧密关联，真正做到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

其一，以党的教育方针锚定育人方向。党支部要把学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作为首要任务，尤其要深学细悟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艺术教育注脚，结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培养既有崇高品格又有卓越艺术素养的人才确立为教育与研究的核心方向。在教师发展规划中，既要强化专业能力提升，更要注重课程思政理念的渗透，从课程设计到教学模式创新，从科研课题申报到成果转化，都要植入党建引领的红色基因，确保艺术教育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行稳致远。

其二，将党建逻辑嵌入学院发展战略。党支部需打破“两张皮”思维，主动将党建工作纳入学院整体发展规划的大盘子，在制定教师个人职业发展路径时，把参与党内教育培训、党建理论研究等作为重要指标，推动党员教师在政治素养提升与专业能力成长上双向赋能。同时，鼓励党员干部将党建工作中形成的群众路线、系统观念等经验，转化为解决教学科研难题的方法论，在实践中实现党性修养与专业水平的双提升。

其三，以模式创新激活教师发展动能。针对艺术教育的实践性、创新性特点，党支部需探索更贴合教师需求的党建载体，比如，组织师生开展红色艺术采风实践，深入革命老区、文化遗址收集创作素材，在艺术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举办“党建＋艺术教育”主题沙龙，邀请行业专家、老党员艺术家分享艺术创作中的党性坚守案例，既拓宽教师学术视野，又强化政治认同，这些举措不仅能巩固党员教师的政治立场，更能增强团队凝聚力，让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意识融入日常。

（二）组织融合

组织建设是确保高校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支撑，高校艺术学院第一师生党支部要破解党建业务“两张皮”现象，关键在于推动组织体系的系统性重构与优化升级，既要完善制度机制，又要激活队伍活力，真正把党组织的组织力转化为发展推动力[4]。

第一，打造“党建＋艺术教育科研”联合学习平台。针对教师群体重业务轻理论的普遍倾向，党支部需搭建常态化学习载体，将政治理论与专业知识学习深度融合，学习内容聚焦两个维度：一是党的最新理论成果、高等教育政策导向的深度解读；二是艺术教育前沿理论、科研方法的专题研讨，例如，围绕如何在艺术课程中有机融入思政元素开展系列研讨，组织教师共同开发“红色音乐赏析”“传统工艺中的家国情怀”等教学案例，推动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从物理叠加转向化学融合。

第二，推行双优型党支部书记培育计划。支部班子是融合工作的火车头，要打破党务干部只懂党建、业务骨干不懂党务的局限，重点选拔党务工作能力强、艺术教育科研水平高的双优型骨干担任党支部书记或支委，这类双优型带头人既能精准把握党建要求，又能洞悉艺术教育规律，可通过策划“艺术教育创新大赛＋党建专题论坛党员示范课＋红色主题创作展”等品牌活动，将党建要求转化为教师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载体，在做中学、学中做，实现党务与业务的同频共振。

第三，搭建“党建＋艺术教师发展”项目平台。围绕教师专业成长、教学团队优化、艺术课程革新等重点领域，党支部可推出党建引领艺术教师成长专项计划，

例如，重点推进红色艺术资源转化项目，支持教师立足专业特长，系统梳理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兼具地域文化烙印与行业特征思政内涵的艺术课程。在项目实施中，设立党员攻坚小组，鼓励党员教师带头攻克课程开发、资源整合等难题，通过“党员示范—团队跟进—成果共享”的机制，带动整个教学团队共同进步，切实将党组织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教师发展的内生动力[5]。

（三）实践融合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对于高校艺术学院第一师生党支部而言，推动基层党建与业务工作从“两张皮”转向一股绳，关键要找到两者的黏合剂，将党建要求实实在在地嵌入具体工作场景，在实践过程中验证融合成效、深化融合层次。

首先，要让党建实践真正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助推器。艺术教育的特殊性在于教师的创作理念、教学方法往往带有鲜明的价值导向，我们不妨设计党员艺术教育创新工坊这类载体：鼓励党员教师主动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艺术教学，在公开示范课上展示如何用红色经典作品解读艺术规律，在教学技能沙龙中分享以美育人的实践心得，这种带着党员徽章上课、把思想讲进作品的做法，既能让党员教师在打磨教学本领的过程中强化身份认同，又能让党的文艺方针通过课堂传递给更多学生。

其次，要用“党建＋社会服务项目”厚植教师的责任担当。艺术院校的教师不仅是知识传授者，更应成为文化传承者与社会服务者，可以结合地方文旅发展需求，组建红色艺术轻骑兵党员服务队：深入乡村开展非遗手工艺培训，用专业知识帮助村民开发文创产品；为社区老年大学开设公益艺术课堂，让退休群众也能感受艺术魅力；参与城市公共空间艺术改造，用壁画、雕塑传递时代精神，当教师们在田间地头挥毫泼墨、在社区街道排练节目时，他们不仅是在用专业能力服务社会，更是在用实际行动诠释艺术为人民的初心。

最后，要通过党建活动激活团队协作的化学反应。艺术创作讲究灵感碰撞，教学科研也需要经验共享，不妨把组织生活开成艺术教研会：围绕新文科背景下艺术课程改革数字技术赋能传统艺术教学等实际问题，组织党员教师开展案例研讨、集体备课；在跨专业联合创作中设立党员责任区，让绘画、音乐、设计等不同专业的党员教师组队攻关，这种党建搭台、业务唱戏的模式，既能打破系部壁垒、促进资源整合，又能让教师在协作中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形成 1+1>2 的团队效能。

（四）考核融合

过去常听基层反映，党建考核与业务考核各算各的账，导致重业务轻党建现象时有发生，要破解这个难题，关键要构建党建引领、业务协同的考核体系，让两者从分别打分变为综合画像。

一方面，考核指标要体现专业特性。艺术学院的党建工作不能搞“一刀切”，需要结合不同专业的特点量身定制，比如，针对绘画专业教师，可以重点考核其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融入教学的情况；针对音乐专业教师，可以看其组织红色主题音乐会、开展基层文艺宣讲的成效；针对设计专业教师，则关注其参与乡村文化礼堂设计、传统工艺创新等实践，考核指标既要体现上级要求，又要预留自选动作空间，让各支部能结合自身特色制定更接地气的细则。

另一方面，考核机制要注重动态优化。党建工作不是静态任务，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深化的系统工程，可以建立调研、反馈、调整的闭环机制：定期收集教师对考核内容的意见建议，梳理业务发展中的新需求、新挑战，及时调整考核权重和评价方式，比如，当学院重点推进数字艺术教育时，可在考核中增加党建引领数字技术应用的相关指标；当社会服务出现新方向（如乡村美育）时，可相应提高社会实践类考核的占比，这种因时而变的考核办法，才能真正让党建工作与业务发展同频共振。

四、结论

综上所述，加强高校艺术学院第一师生党支部建设，关键是要锻造一支既政治过硬又本领高强的党员教师队伍。这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要落实到每一次课堂教学、每一场艺术创作、每一次社会服务中，只有让党员教师在实践中感受到党建的温度，在考核中看到融合的价值，才能真正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让党建成为推动学院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引擎，而这一切的关键，都在于把党员的身份意识、责任意识深度融入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让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真正落地生根。

参考文献

[1] 陈迪明 . 高校基层党建与业务融合研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 2024(15): 28−30.

[2] 刘妍 . 推进新时代高校基层党建与业务相融合 [J]. 办公室业务 , 2024(14): 181−183.

[3] 王永伟 , 郭萌萌 , 耿森 . 高校基层党建与业务融合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J]. 河南教育（高教）, 2024(07): 4−6.

[4] 苏建莹 , 张青 . 论高校党建与外语教育的融合发展 [J]. 领导科学论坛 , 2024(05): 157−160.

[5] 田晓芳 , 叶云龙 . 高校后勤基层党支部党建业务融合机制实践探索 [J]. 高校后勤研究 , 2024(02): 60−6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度党建研究项目一般项目“高质量发展视角下高校基层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路径探索——以艺术学院第一师生党支部为例”（XYZY2024DKT008）。

（作者单位：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具有体育特色的高校基层学生样板党支部的实践与思考
——以重庆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本科生党支部为例

刘庭源 周思静

摘要：如何充分发挥学生党支部在高等院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积极作用，建设高标准高质量的基层党支部，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共同关心的话题。本文通过分析重庆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本科生党支部打造市级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的建设路径，初步形成了“靶心＋靶环”的创新工作思路。“靶心”即建设“样板党支部”战斗堡垒。“靶环”分内环和外环，“内环”表示建设“四个一”工作模式，即坚持一套制度、带好一支队伍、突出一个特色、达到一个效果；“外环”表示系列工作举措。通过这个工作体系旨在构建一套基层学生党建“靶心＋靶环”党建工作模式，总结一批基层学生党建创新工作方法和典型案例经验，推出一个高质高效运行的党建工作管理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关键词：体育特色；高校基层党建；样板党支部

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重庆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本科生党支部成功申报重庆市样板党支部创建单位。支部持续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1]。本科生党支部作为思想建设先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积极开展育人活动，做到“七个有力”[2]。

自成功申报样板支部创建单位以来，党支部成员受到极大鼓舞，党支部书记带领支部党员、“王红旭班（团支部）”成员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总结，初步形成了“靶心＋靶环”的创新工作思路。“靶心”即建设“样板党支部”战斗堡垒；“靶环”分内环和外环，“内环”表示建设“四个一”工作模式，即坚持一套制度、带好一支队伍、突出一个特色、达到一个效果；“外环”表示系列工作举措（见图 1）。



图 1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样板党支部建设思路图

一、坚持一套制度

（一）落实定期学习制度，严格党内组织生活

党支部每月认真开展主题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教育广大党员学纪、知纪、明纪、守纪，使本科生党支部全体同志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努力在各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利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定期开展支部日常学习，不断提高学习效果，突出政治学习和教育，突出党性锻炼，防止表面化、形式化、娱乐化和庸俗化。

（二）严格党员发展标准，确保党员发展质量

党支部始终遵循“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坚持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把政治表现放在首位，同时强调以学习和社会实践能力为基础，严格入党积极分子、确定发展对象、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等环节的程序，坚决落实全程公示制度，确保发展党员工作的质量关[3]。

（三）落实党建工作标准，加强标杆支部建设

党支部始终将规范化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加强领导，精心谋划，严格落实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制定讲党课制度、党费收缴制度等，标准化建设取得实效。强化党支委政治、业务学习，加强教育引导、搭建锻炼平台、拓宽发展空间。党支部书记以身作则，协同并指导支委提升履职尽责能力，增强党支部凝聚力，提升党支部战斗力，党支部做到了“七个有力”[4]。

二、带好一支队伍

以本科生党支部为堡垒，党支部成员带领“王红旭班（团支部）”成员以及学院入党积极分子等，认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志愿服务及创新创业方面作出显著成绩。这支队伍在实践中筑牢了理想信念，增长了知识才干，锻炼了实践本领[5]。

（一）以主题教育为抓手，筑牢学生理想信念

通过组织生活、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培训、开办学习班等多种生动有效的学习教育形式，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院将本科生党支部作为思想建设先锋，认真学习，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三个务必”，“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积极开展育人活动。学院“向阳花”三下乡社会实践团积极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出彩体育人”先进事迹报告团持续推荐榜样。学院每年定期组织本科生党支部党员代表、“王红旭班（团支部）”成员、青马班学员代表给我校优秀校友“时代楷模”王红旭扫墓，组织“王红旭班（团支部）”开展王红旭烈士牺牲日升国旗纪念仪式，参加重庆市禁毒宣传拔河比赛、组织“中华魂”主题演讲比赛等系列主题活动，利用军训教育契机在大一新生中开展王红旭同志的先进事迹学习宣传，成立“王红旭连”发扬红旭精神展现青年担当……通过以上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思想引领举措，着力培养学生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与思想道德素质，在校内校外获得一致好评。

（二）以志愿服务活动为平台，培育学生实践能力

学生党员在学习工作社会实践等方面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本科生党支部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生党员，“学英雄、作表率”，乐于奉献，顽强拼搏，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本科生党支部带领“王红旭班（团支部）”，遴选出百名成员，指派优秀党员教师为该班导师，在全校“荧光夜跑”、寝室搬迁、学校秋季毕业生大型双选会招聘、重庆市“金色之秋”社团嘉年华、“乐跑”、校园“广场舞”等活动中展现学生志愿者风采，“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继续派出优秀学生赴乡村开展支教工作，让学生增长才干的同时，服务社会贡献社会。

（三）以“双创”驱动为导向，激发学生创新动力

本科生党支部在带领广大同学创新创业方面起到了带头参与、榜样示范作用，在本科生党支部“王红旭班（团支部）”中涌现出创新创业优秀学生典型。近一年来，学生“嵌入式气排球比赛记分仪”“时光陪伴”两个市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成功结项；“绿茵梦想”项目获得2024年重庆市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全国铜奖。本科生党支部所开展的工作始终贯穿在“坚持党建引领，围绕学生服务，找准问题，狠抓落实，推动就业工作内涵式发展”这条主线上，学院党委通过校企联动、教师党员专业咨询、学生党员朋辈互喻、“职来职往”社会服务实践团、西部计划寻访团、优秀校友寻访团等方式，本科生党支部党员带领毕业生同学加强就业竞争能力的锻炼与提升。

三、突出一个特色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本科生党支部在学院党委的领导和指导下，稳步推进和完善党建工作，促进本科生党支部党建工作与体育专业学生特点有效结合，凸显出“德技并修，以体育人”特色，取得了显著成果。

（一）专业竞赛成绩不断突破

为增强学生专业能力，提升学生专业素养，学院依托学校体育委员会平台成立校级各运动项目专业运动队，出台专门竞赛训练办法，鼓励学生党员和广大青年积极参加各类专业竞赛，提升综合素养。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本科生党支部“王红旭班（团支部）”优秀同学在各个运动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各个运动队中选派思想觉悟好、运动成绩好的党员同志或骨干担任队长，刻苦训练、团结拼搏，带动同学们参加各类专业比赛，取得了优异成绩。近年来，男女篮球、足球在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以下简称“学青会”）选拔赛中连获双冠；男女足代表重庆在首届学青会分获第六名和第八名，创造该项目历史最佳成绩；田径项目在重庆市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获得7金、6银、5铜，并获得女子团体冠军；两名运动员参加首届学青会，获得3项第四名，荣获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冠军1项；武术项目在重庆市大学生武术比赛获得5项冠军，18人次获奖；网球获得全国大学生网球锦标赛男子丙组双打冠军；健美操获得3项全国冠军、3项市级冠军；兵道项目在全国锦标赛中获得金牌，参加亚洲比赛获得洲际比赛冠军。

（二）教师团队指导精细有效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拥有市级“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一个，在学院党委领导下，教师团队成员积极参加本科生党支部教育工作和其他学生活动，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纪律性。通过学院专业教师的指导，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学生，学生通过指导教师指导获得川渝师范生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获得2023年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冠军，并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大学生沙滩排球比赛；获得亚洲大学生武术长短兵锦标赛冠军，学院武术团队教师指导的《尚武崇文，止于至善——传承中华武术精神培育时代新人》入选教育部主办的2023年高校“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教育活动“非遗学园”技艺比拼名单。

（三）协同育人优势发挥明显

本科生党支部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发挥协同育人优势。学校是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全国研究培训基地、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建设有重庆市高校党建研究咨政中心、重庆发展研究院、重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师分中心）、重庆市政协“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基地”。这些资源为本科生党支部开展活动提供了良好基础；另外，本科生党支部依托我校学生处首批“重庆市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示范中心”和校团委全国高校共青团新媒体示范工作室，积极组织各类党建宣传活动，营造良好的党建氛围，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学院党委积极对外联动，加强与体育行业的联系，与多家企事业单位签订就业实习协议，为本科生党支部带领学生发展提供帮助和支持。

四、达到一个效果

本科生党支部充分发挥堡垒作用，带领党支部成员及广大同学不断进步，学生成长发展效果显著，主要表现为学生综合素质不断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学生满意度不断提高。

（一）学生综合素质不断增强

本科生党支部学生贯彻学校“优良学风提振计划”，从学生立志教育、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等方面入手，协助学院大力加强学生学风建设。绝大部分学生学习态度端正，着力提升学习成绩，学分绩点达标。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成立了本科生党员学风督察小组，在本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本科学生课堂出勤率呈上升趋势，学习积极性不断提高，成绩提升显著。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本科生参加竞赛获奖人数逐年增加，参赛规格也越来越高，多次拿到全国竞赛奖项。学生以赛促练，在比赛中磨炼意志、提升专业技能，专业素质提升迅速。

（二）学生就业竞争力不断提升

本科生党支部始终以“坚持党建引领，围绕学生服务，找准问题，狠抓落实，推动就业工作内涵式发展”为主线，通过党支部争取教师党员的指导、学生党员朋辈互助、“职来职往”社会服务实践团、西部计划寻访团、优秀校友寻访团等方式，加强就业指导与服务，学院毕业生在工作中表现了较强的综合素质、敬业精神、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毕业生具有较为扎实的专业技能和综合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本科生毕业去向落实率稳步提高。

（三）学生满意度不断提高

在学院党委领导下，本科生党支部发挥学院与学生、教师与学生、团队与学生之间的桥梁作用，带领广大学生积极进取、奋发努力，学院重视教学质量，不断将引进的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传达给学生，同时将学生们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学院，确保学生能够接受到最优质的教育。整个学院学生团队呈现出积极肯干、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对我校2020届毕业生进行的调查显示，学生对总体教师素质能力评价满意度达93%。

本科生党支部建设达到了预期成效。支部建设更加规范，带头作用更加彰显，形成了一套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并编撰一本《样板支部建设成果汇编》，同学们对党建工作的满意度显著提升，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增强。同时，本科生党支部治理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样板支部建设效果得到学校和学院党委的认可。

参考文献

[1] 张华，李伟．新时代高校样板党支部建设的实践路径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12): 45-48.

[2] 王明．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以“样板党支部”创建为例[J]. 党建研究，2020(05): 32-35.

[3]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机制探索[J]. 中国高等教育，2022(07): 26-29.

[4]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5]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EB/OL]. (2014-5-28)[2025-4-2]. https://www.gov.cn/zhengce/2014-05/28/content_2689492.htm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年重庆师范大学校级工作思政质量工程一般项目“具有体育特色‘三型’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24szzl02）。

（作者：刘庭源，重庆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周思静，重庆市北碚区兼善中学）

德法兼修视域下“经济法”课程思政建设实践
——以大连大学经济管理专业为例

吕丹丹

摘要：“经济法”课程具有学理性、经济性、规制性、政策性和应用性较强的特点，与国家建设法治社会的发展一脉相承。“经济法”课程思政教学整体建设思路，结合经济管理专业和“经济法”课程的特点，科学系统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优化专业知识供给。在德法兼修的人才培养目标下，培育新时代的经济法治人才。彰显了德法兼修课程思政建设实践对推动经济法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德法兼修；课程思政；“经济法”课程建设实践

“经济法”课程思政以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工作布局、重点任务和重要保障四个方面为建设框架，从与专业教学相结合的角度理解德法兼修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要义，探索抽象的“思政元素”与具体的“经济法”课程教学间的融合点。本研究提出“课程思政 + 在线课程”德法兼修协同创新教学模式下，以课程思政为导向，结合“经济法”课程特点、人才培养目标和具体学生情况，多元联动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设计与教学模式改革，经过持续系统的课程建设，同时利用线上平台丰富教学资源，提升师生互动效率、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强化协作式学习模式。进一步完善教学管理体系，实现课程培养目标，使学生能够通过了解经济法发展历史与前沿知识，及时掌握经济法法律需求；树立投身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远大理想，增强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能够阐述经济法基本原理和方法，掌握经济法基础知识；能够运用经济法相关知识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复杂问题进行分析，具备经济法运用的能力，培养法律思维，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成为高素质的德法兼修的经济法律应用型人才。

一、现状分析

（一）课程思政建设与专业知识融合有待提高

从实践看，课程思政建设已经完成“全员推进、全课程推进”，解决了课程思政改革在“面”上的广度问题。随着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深度研究势在必行，即如何科学和具体地将思政元素精细化、体系化，与课程专业化进行高度融合，进行“量体裁衣”，是现阶段课程思政改革的重点问题。因此，结合经济管理专业和“经济法”课程的特点，科学系统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优化专业知识供给，就显得尤为重要。法治思想需要在逻辑和概念上有机衔接，在历史底蕴和实践创新上紧密结合，才能为“经济法”课程思政改革提供有效的政治方向指引与丰富宝贵资源[1]。

“德法兼修”核心思想中的“法”即专业能力，“德”则是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前者是专业课程的学习任务，后者是课程思政的学习任务，在培养德法兼修目标的指引下，二者必须紧密融合。教学改革实践对“经济法”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找出当前阶段影响“经济法”课程思政成效的因素，并在系统梳理德法兼修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的基础之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经济法”课程思政改革的具体路径。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是“十一个坚持”，张文显教授创造性地将之归纳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工作布局、重点任务和重要保障四个方面。此次教学改革以此为参照，试图从与专业教学相结合的角度理解“十一个坚持”的核心要义，探索出抽象的“思政元素”与具体的“经济法”课程教学间的融合点[2]。

（二）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滞后于急速变化的大时代

“大数据时代”给经济法注入新理念，更带来新问题。复杂的时代环境使得刻板的法条学习无法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因此，专业课程建设需要顶层设计和课程思政在复杂环境中的引导。如何在“经济法”课程中积极探索保障经营自由和赋权创新的新模式，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经济秩序，推进经济智能化治理的法治化迫在眉睫。以经济管理专业课程“经济法”为例，当前在课程思政视角下“经济法”课堂在教学大纲、观念、内容和手段上存在不足，且依靠单兵作战很难获得积极成效，已经落后于人才培养目标。在“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和新商科的新背景下我校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目标发生变化。“经济法”课堂教学如何与全新的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目标密切对接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首先，创新思维培养和创业自由不仅给法律规制本身带来挑战，也对通过“经济法”课堂教学树立正确法治思想提出新要求。经济管理专业学生面对当今的信息革命、数字技术等多方融合形成的以“互联网 +”和大数据管理为特点的全新职业领域，这个领域带来了“自我赋权”的光纤世界。“经济法”课堂教育必须积极应对创新思维培养、创业自由与法律规制的边界、尺度变得十分复杂的现实[3]。

其次，在教学内容与职业素养培育相结合方面存在困难。在大数据时代，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目标更倾向数据运营和管理，并从中精准预测预判并精准解决问题。但是，数字化世界精准化的背后是密集性和复杂性，风险将如影随形。于是在“经济法”课堂中，需要将正确的法治观、风险观与职业素养培育相结合，这是“经济法”课堂教育内容目前所缺乏的。

二、改革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改革目标

深刻理解德法兼修全程融入“经济法”课程思政教学的含义，分析“经济法”课程思政教学的现状，明确“经济法”课程思政的具体内容。参考教育部对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分类设置模式，本次教学改革提出采取“1+8+X”的“经济法”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其中的“ 1 ”指“法治思想指导下的德法兼修”；8 指“‘经济法’课程 8 个模块”课程；X 指“教学改革目标”。深入开展“经济法”课程思政实践研讨交流活动，进一步明确德法兼修视域下“经济法”课程思政建设内涵，探索并总结课程思政教学的策略和方法，建立适合经济管理专业“经济法”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以课题研究为引领，发挥成果辐射作用。

（二）关键问题

首先，教师作为课程思政改革的推动者，应该认识到课程思政改革会因为课程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在指导思想上具有深刻的统一性，在实施纲领上应该具有强烈的一致性。因此，不能将专业课全部上成思政课，也不能将思政元素强硬地塞进专业课课堂。需要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把握好课程思政逐步呈现专业化发展的趋势，尤其是专业课程要根据本专业的特色和教学规律，德法兼修全程融入“经济法”课程思政教学，进行“量体裁衣”式的课程思政改革。

其次，需要教师自身具备过硬的本领，具体包括思想政治理论水平、思想政治教学方法以及知行合一的能力。目前高校的思政专业课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有些高校的一部分教师存在无思想政治教学工作的经历、缺少经验、思政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不足等问题。

最后，多方位拓宽育人形式，增强教学的可接受度。根据学生的反馈情况，不少同学认为目前的德育教学工作比较枯燥，课程思政内容缺乏趣味性。“经济法”专业课程思政的进一步改革应重视学生主体的需求，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群体特点来开展思政教育。实施多元联动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通过线上教学丰富教学资源，提升师生互动效率、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强化协作式学习模式，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保证教学互动同时体现个性化教育[4]。

三、德法兼修视域下“经济法”课程思政建设实践路径

（一）以课程思政为导向进行混合式教学的课程设计

在课程设计上，德法兼修全程融入“经济法”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全过程。以体系化的课程思政为导向，具体结合专业课程不同模块，设计不同主题的思政元素，并基于主题活动导向与问题导向开展教学活动，形成以“经济法”课程思政为导向的课程设计框架。结合课程模块，初步进行以课程思政为导向的课程设计建构。其中，课程思政的经济法逻辑十分清晰，以“发展和安全”为逻辑起点，以“两个结合”为逻辑展开，以“人民利益”为逻辑归宿。

（二）多元协同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设计

在课程改革中，既要关注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能力，也要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内核，这就需要多元协同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体系中完成将思政元素的全面渗透。多元协同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是双路径的提升，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既有线下教师授课课堂，突出思维引导和及时反馈，又通过线上教学突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热情，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既保证了教学互动又体现了个性化教育。

1 . 引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入课程思政，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相关的精神内涵与知识点讲授充分结合，充分发掘知识背后的人性考量、价值关怀与制度定位，强调提高课程思政体系性和科学性，发挥课程思政铸魂育人作用。

2 . 丰富课程资源

基于人才培养目标和思政育人目标，丰富课程资源，进行课程教学方案设计。课程设计中增加专业竞赛部分，鼓励学生参与到课程实践中去，从而帮助学生在实践中调整学习策略，获得学习成就感，有效提

升学习自主性。实施“线上自主学习＋课堂＋学术训练＋实践竞赛”多元联动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设计与教学模式改革，既保证了教学互动又体现了个性化教育，符合人才培养目标。激励学有余力的学生带动“躺平”和“社恐”群体，能够将课内专业课程的学习和课外技能拓展有机衔接，实现课堂内外专业学习的无缝衔接，对于学风建设大有裨益[5]。

3. 优化课程授课设计

针对传统的理论教学方法重讲授、轻内化的问题，强化“线上线下结合、案例赋能、拓展探究”的合作探究式教学策略。以现代信息技术立体支撑，打造重探究、重应用、重创新的合作课堂。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实现学生法学素养的提升，培养创新能力，更要进行价值引领，培养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管理人才。

4. 丰富课堂教学环节

教学环节一：课前预习解析。分析展示学生课前线上预习反映的重点问题，以及案例思考题的作答情况。

教学环节二：构建本次课的逻辑框架。采取互动方式引导学生思考中国法治建设的内涵，掌握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基本矛盾、基本方法分别是什么。

教学环节三： 再次展示课前案例，通过小组讨论交流，引出专业知识，强调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

教学环节四：交流展示—教师总结。各小组交流展示，教师进行总结，之后进一步引出课程思政。

5. 健全评价标准

完善教学评价机制，将过程性评价与期末终结性评价有效结合，在教学实践中提高学生参与课程评价体系建设的热情，激发学生学习自主性和学习热情，努力实现教师作为“引导者”的角色定位，以激发其学习热情。

四、德法兼修视域下“经济法”课程思政建设实践的反馈

德法兼修视域下“经济法”课程思政建设实践，在课程思政中的潜在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它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为“经济法”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开辟新路径。“课程思政＋在线课程”协同创新教学模式的实施，教师能够更好地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相结合，使学生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接受系统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混合教学促进师生之间更有效的互动和沟通。借助网络平台和信息技术手段，教师可以灵活安排线上与线下教学活动，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线上部分，学生可以视频课程、讨论等资源自主学习，增强对知识点的理解；而在课堂上，则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实践活动，这些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线上与线下教学的有机融合，是教学手段的更新，更是教育理念的转变。对于“经济法”课程来说，德法兼修视域下“经济法”课程思政建设实践需要引入更多元化的教学资源和形式。在线视频讲座可以让学生接触到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见解，拓宽视野；在线讨论区则提供学生之间交流思想、分享观点的平台，有助于激发批判性思维。同时，利用线上工具进行课前预习测试和课后作业批改，可减轻教师的工作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计模拟演练或企业实地考察等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商业决策过程，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五、结语

在德法兼修视域下“经济法”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中，需要充分发挥线上资源丰富性和灵活性的优势，结合线下课堂教学互动性强的特点，构建一个既开放又严谨的教学环境。教师需不断探索适合课程特点的教学方法，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从中受益，提升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 刘春艳，巫沛霖，巫彤．课程思政导向下高校英语精品课程建设与人才知识创新能力培养——基于SPOC及跨校修读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设计[J]. 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24(02): 21−24.

[2] 潘佳佳．“双向融合”模式下高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以经济法基础为例[J]. 现代商贸工业，2023, 44(15): 171−173.

[3] 黄艳，潘渝棱，兰婷．应用型本科管理学专业经济法课程教改探索[J]. 成都工业学院学报，2018, 21(02): 65−68.

[4] 高路．师范类院校教育法规课程思政的路径探究[J]. 新余学院学报，2021, 26(02): 105−110.

[5] 潘斯华．经管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思政的思考与实践[J]. 梧州学院学报，2021, 31(04): 93−9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年度大连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一般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经济法》课程思政的路径研究与实践”（序号3−2−25，指南编号3−2）。

（作者系大连大学副教授）

以德润心，以法正行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研究
——以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静脉用药集中调配中心为例

陈春茗 唐 锋 柏玉冰 任卫琼 *

摘要：加强党建工作，是促进医院静脉用药集中调配中心（Pharmacy Intravenous Admixture Services，简称 PIVAS）管理业务健康发展的关键。新时代，传统的党建工作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化医院管理的需要，也无法满足 PIVAS 的发展需要。近几年来，由于 PIVAS 对党建工作进行了不懈努力，党支部工作很快地就将“融合工程”作为一个切入点，建立了“围绕业务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业务”的党建融合工作思路，并在思想上进行了开拓创新，不断地探索出了一条将党建工作与服务深入融为一体的创新方法，进而促进了 PIVAS 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党建工作；静脉用药集中调配中心；深度融合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相结合，就能够形成合力，从而实现了党建理论探讨和实际工作的双提高、双改善 [1]。事实也证明，在具体工作中，唯有将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入融合，才能真正充分发挥好党建工作的理论特色和团队效果。以某医院的 PIVAS 为例，着重调研了该中心在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包括中心党务工作干部基本都是兼职人员，他们对党务理论知识的了解还不够，对党内法规制度的了解还不够，对“三会一课”的学习习惯不能在方式上进行创新，党组织作为战斗堡垒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党员作为先锋模范的引领作用也未得到完全展现，对支部和党员的考核机制也不健全等问题 [2]。本研究还从强化理论武装、创新体制机制、深化融合载体、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提出了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对策建议，旨在通过强化理论武装，增强“四个意识”；创新体制机制，增强组织活力；加强载体设计，提升组织服务效率；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制度建设，真正地将党建工作与业务深度化融合贯穿在医院 PIVAS 建设的全过程。

一、强化理论武装，增强“四个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理论上看，把党坚持旗帜鲜明的执政思想摆在首位，突出社会政治生态，建立健全的提高党执政水平、民众政治觉悟和社会政治生态意识水平的体制机制。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基本政治目标，确保我们的党员在思想认识、政治立场及实际行动上，均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3]。静配调剂中心党支部，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理念作为主要政治任务 [4]，扎扎实实开展学习践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在学习教育中，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先后召开党小组理论学习会议 62 次，开展专题研讨 35 次，建立严格的党内组织生活制度，每位党员主动提升，轮流讲党课，创新“三会一课”学习方式。同时，还制定了举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训练班、开展党支部书记轮训等办法，以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品质。此外，还组织广大党员认真地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四史”学习教育；认真执行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党风党纪教育等活动，持续加强和提升党员干部在党性方面的锤炼与修养。坚持“五同步”原则，即党组织会议与药学例会同步召开，党员干部与岗位负责人同步配备，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步规划，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步考核，党员与中心员工绩效同步奖惩。这有助于确保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的紧密结合，形成合力。

二、创新体制机制，增强组织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5] 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坚强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深入创新相关的体制机制，以激发党员战斗力。

（一）创新机制体制

把党的建设工作和业务建设同规划、同布置、同

实施、同评价，将党的建设工作列入年终目标责任考评体系，列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工作绩效评估体系，列入书记抓好基层党的建设工作述职评价考核体系，以实现党的建设工作和业务建设“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强化党务干部专业化能力培养和梯队建设。按照“启动、推进、总结”三个步骤进行组织策划，将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坚强堡垒作用以及共产党员的先锋表率作用细化分解、量化评估到中心日常工作中，增强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提高团队战斗力

认真执行了“三会一课”制度、“主题党日”会、根本原则会、民主评议党员委员会等基本管理制度。将党建和 PIVAS 特色文化相结合，构建“四元一体，四轮驱动”的党建文化体系，围绕“慎独文化”“志愿文化”“感恩文化”“诚信文化”，以文育人，循序渐进，加强科室文化建设。以老一辈共产党员的自律约束精神为主要出发点，着重在本职工作中培育“慎独文化”；以抗击新冠疫情中的志愿精神、中医药科普志愿服务和保护湘江母亲河行动为重点培育“志愿文化”；始终把以病人为中心放在首位，倡导“感恩之心”的文化氛围；并聚焦于合理用药及守护患者输液安全的核心任务，着重培养一种涵盖“对医院忠诚、对职业敬业、对党坚定信仰、对人民群众竭诚服务”的诚信价值体系。党建与文明建设的共建激发了全体党员的文明创造力，也提升了 PIVAS 成员的自豪感，为医院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三、深化融合载体，提升服务效能

不断强化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载体建设，通过党建创新成果展示、党员志愿服务、结对共建等方式，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中心工作上水平。

（一）加强阵地建设

确保基层党员能够充分参与并有效开展“三会一课”、重大主题党日活动、组织生活会以及民主评议党员等党内组织生活。不断完善党建活动场所建设，为 PIVAS 党员干部开展活动提供了场地保障，进一步提升活动的规范化水平。加强同其他党支部的合作，建立起常态化的交流机制，促进双方在资源和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增强彼此的协作能力。联合开展了汝城乡村振兴助学行动、小小中药师科普实践活动，赴湖南党史馆和雷锋纪念馆，重温红色历史，践行初心使命。

（二）选树典型示范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选树一批爱岗敬业、勇于承担的先进典型，并利用身边的先进事迹和人物作为教育资源，对广大党员进行宣传教育，激励他们学先进、找缺点、补短板。在党务工作者中开展“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评选活动，定期对党务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三）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在日常工作中充分发挥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活动，让全体党员在联系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获得感，进而提升为民服务的品质。做好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培养工作，把好党员入口关，在党员发展工作中，必须严格把控新党员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廉洁自律及工作作风这四个关键方面，确保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实施“双培养”工程，注重为党组织发展与培养新鲜血液。

四、强化责任落实，完善党建体系

坚持并完善了党建的组织机构，认真履职，把党建工作摆上了重大议事日程，抓布置、抓指导、抓落实。广大党员干部率先树立这样一种责任意识：将“抓好党建工作视为本职工作，忽视党建工作视为失职行为，未能有效抓好党建工作则被视为不称职的表现”，把“一岗双责”的原则贯彻到具体行动中。在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工作中，建立健全党的建设各项规章制度，形成以制度管事、以制度管人的长效机制。落实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制度，确保中心书记履职尽责。建立健全目标管理责任制、工作报告制等制度，对落实不力的，严肃追究责任。坚持风险管理、全程管理的原则，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保障中心成品输液安全、有效、可及。通过实施“四个最严”原则，确保药品质量和患者安全。

最严谨的标准：制定中心 SOP 和 SMP 标准，确保行为规范、质量合格、质量可控。这些标准体现了对药品质量的严格要求，确保每一个环节都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管，涵盖人机料法环等所有要素。通过这种全面的监管，确保每个环节都符合既定的操作规范，从而保障药品的质量和安全。

最严格的处罚：对于违反操作规程和质量标准的行为，实施严格的处罚措施。写反思书并在民主生活会上讨论，还包括不同程度的经济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建立考核和问责机制，对于失职和事故责任人进行严肃追责。这包括考核谈责、失职问责、事故追责，确保责任明确，提高中心员工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

五、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制度建设

保持中国共产党对一切事业的领导，是我们党在多年改革和发展中形成的基本执政基础，也是推动党的建设和业务深入结合的重大保障。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重大事项党支部研究前置制度，将党的领导融入 PIVAS 管理的各环节。把加强党的建设与业务发展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真正把党的领导

贯穿到 PIVAS 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压实党建责任，强化顶层设计，做到“一岗双责”、齐抓共管，使全体党员知责明责、履责尽责。规定和完善党组的议事规则和重要政策制定程序，严格重大议题党组的研究审查报告制度，所有重大议程均应遵循集体领导原则，通过民主集中制，经过个别酝酿后，在全体会议上作出决定，这一流程需由党组常委会集体研究并最终裁定。突出基层党组织在党建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创新工作手段，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将党员培养和业务骨干培养相融合。坚持政治标准是选人用人首要标准的原则，切实把对党忠诚、政治坚定的党员选出来用起来。建立健全 PIVAS 党支部理论学习制度、“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三会一课”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党务公开制度、党员管理教育制度、廉洁项目建设制度、党政会签到制度、党建带团建制度。这些制度为党建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确保了党建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六、结语

促进 PIVAS 党建理论与业务的深入融合，应坚持以“围绕中心工作、强化队伍建设、服务广大群众”为核心，通过强化理论武装、创新机制、加强整合载体、提升业务效能，切实地把党的理论资源优势和业务队伍资源优势，转化为推动医院 PIVAS 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将 PIVAS 党建任务渗透到日常工作的全过程之中，把 PIVAS 党建任务引导群众作为一条红线的始终。中心积极依托全国青年文明号创新平台，狠抓“四个文化”建设，结合药学部工作实际，建立以党员为主的突击队，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秉承“用精湛技术服务患者，以无限活力绽放青春”的工作宗旨，细致审方，用心调配，为患者提供安全输液和一流药学服务，为医院合理用药、静脉用药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PIVAS 青年积极投身志愿服务和健康科普，竭诚服务患者、奉献社会，共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 46 项，获湖南科技进步奖等奖项 7 项，省级与校院级荣誉 5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120 余篇，主编或参编著作 23 部。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持续提升政治敏锐性、政治理解力与政治践行能力，切实把对党忠诚体现在对党的理想信念的坚定上，体现在对党的正确理念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上，体现在对党领导负责精神的坚定上[6]。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确保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按照严的主基调始终坚持下去。PIVAS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素养，将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通过“主题党日”“党团知识竞赛”“青年大学习”“主题征文”等丰富的教育活动载体，以思想政治引领为核心凝聚青年力量，激发青年责任感和荣誉感，切实增强团队协作效能，推动团队实现和谐共进的发展态势。相继荣获第 22 届湖南省“青年文明号”集体、全国高校“活力团支部”、湖南省第五届“雷锋杯”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全国赛铜奖、中国药学会优秀科技志愿服务队及“五四红旗团支部”“党员先锋示范岗”等荣誉。

因此，要实现党建工作和 PIVAS 工作的深度融合，就必须在上述五个方面共同努力，实现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的紧密结合；要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健全考核体系等方面，全面提升中心成员的业务水平和整体素质。党支部作用发挥好了，可以促进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新形势下，只有把党建与业务结合起来，才能促进业务的发展，才能使党建工作得以落实，从而形成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7]。

参考文献

[1] 杨佩佩 , 韩芳 . 一颗“红心”守正义 [J]. 党员之友 (新疆), 2020(12): 30-31.

[2] 高萍 , 安媛 . 新形势下加强公立医院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对策研究 [J]. 中国医院 , 2022, 26(03): 60-62.

[3] 梁沛峰 . 推动企业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思考 [J]. 中外企业文化 , 2024(09): 183-185.

[4] 郭宏彬 , 白谨豪 . 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保证 [J]. 人民论坛 , 2021(30): 90-92.

[5] 赵坤 , 李茜 , 潘泽林 . 提升社区党组织政治功能筑牢应急防控坚强堡垒 [J]. 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 , 2021, 19(05): 62-65.

[6] 李骋 . 电力企业党建与经营业务深入融合的路径分析 [J]. 中外企业文化 , 2024(09): 168-170.

[7] 孙新萍 . 新形势下加强公立医院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对策研究 [J]. 办公室业务 , 2023(04): 74-7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建和思政研究课题“基于 SOP 和 SMP 的静配中心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体系构建”（23DJKT02）；2023 年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基于 JAK2/STAT3 通路探究葛根素对高血压并发抑郁症大鼠海马损伤的保护作用”（D202313057728）。

（作者：陈春茗、唐锋、柏玉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管药师；通信作者任卫琼，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药师）

基于循证矫正的戒毒人员心理康复实践及效果评估

许亚男

摘要：毒品滥用具有广泛的地域性和普遍性，对个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等方面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戒毒者既是“受害者”又是“作案者”，面临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传统的戒毒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化生活的需要，探索新的干预方式尤为重要。循证矫正作为戒毒领域的新兴矫正工作模式，打破了传统戒毒工作“以经验为本”的弊端，为戒毒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本研究以戒毒人员王某为例，运用循证戒毒的方法，遵循“证据为本”的理念，采用 SCL-90 量表工具，对王某心理状态改善效果展开评估。结果显示，循证矫正方法能够有效改善戒毒人员的心理状况，对其社会功能的恢复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循证矫正；戒毒人员；心理康复

一、研究背景

毒品滥用具有广泛的地域性和普遍性，对个人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等方面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导致个人不良身心状况、家庭幸福指数下降及社会混乱[1]。作为毒品问题的直接承受者，戒毒者既是“受害者”又是“作案者”，不仅因为生理脱毒所承受巨大压力，而且心理上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精神障碍如自卑、焦虑、抑郁及强烈的复吸意念等问题，这些问题不断地影响戒毒康复的完成和复发率的增加，导致他们在回归社会后难以适应普通生活，被贴上“标签”而陷入社会边缘化的窘迫境地，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出现。据统计，社会复吸率达到 85%~90%，现实效果与传统的戒毒模式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急需更为系统、科学有效的戒毒服务体系。

循证矫正是戒毒领域的新兴矫正工作模式。循证矫正实践是循证社会工作者遵循循证实践程序，运用专业知识、技能、方法，面对被服务者的客观现实、个体的犯罪成因及矫正需求，通过有效检索、筛选证据，得出最佳证据，整合资源和矫正技能和方法，帮助被服务者降低现实危险性或者预防再犯的可能性的矫正工作[2]。循证矫正“以证据为本”的矫正模式，可以破除传统戒毒工作“以经验为本”的弊端，有助于提高戒毒矫正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更能全面发挥戒毒工作对戒毒人员进行心理重建、提升社会适应能力的助力作用。

二、循证矫正的核心内容

循证矫正的核心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研究人员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形成最佳实践标准、指导手册等；二是实践者以研究人员提供的最佳证据为基础，综合个人经验以及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开展科学的实践行为；三是实践行为以服务对象的真正需求为核心；四是实践过程需要在管理者精心组织筹划的安排下实施，使其成为一个由研究人员、实践者、服务对象等相关管理者以及服务机构组成的综合框架[3]。此系统强调在实务中重视应用最佳的研究证据提供服务。

三、循证矫正的实践过程

（一）个案情况

1. 基本信息

王某，女性，1989 年 5 月出生于甘肃省，小学教育程度，目前无职业。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处以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两万元。

2. 狱内改造现状

王某表现出明显的认罪悔罪倾向，严格遵守既定规章制度，对管理指令表现出完全的服从性，并积极参与到“三课”教育学习中，展现了极高的配合度，积极投身于矫正过程。

（二）风险评估（见表 1）

（三）犯因性问题分析（见图 1）

（四）搜寻矫正证据

1. 检索证据

（1）文献检索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百度文库、汇雅电子图书等相关书籍和文献资料，在检索的过程中，采用关键词

表 1 风险评估表

	情况概述	等级
家庭情况	家庭环境较好，从小受宠爱，经济条件较好，抗挫能力一般，自由恋爱，婚后夫妻感情良好，但该犯好玩，结交了很多朋友，接触不良朋友吸毒	良好
社会交往情况	朋友很多，交友不慎导致吸毒贩毒。因自己要吸，朋友们又请求帮忙，不好意思拒绝，就开始帮他人贩毒，当时没意识到会这么严重，事后后悔	良好
狱内改造现状	王某能认罪悔罪，遵规守纪，服从管理	中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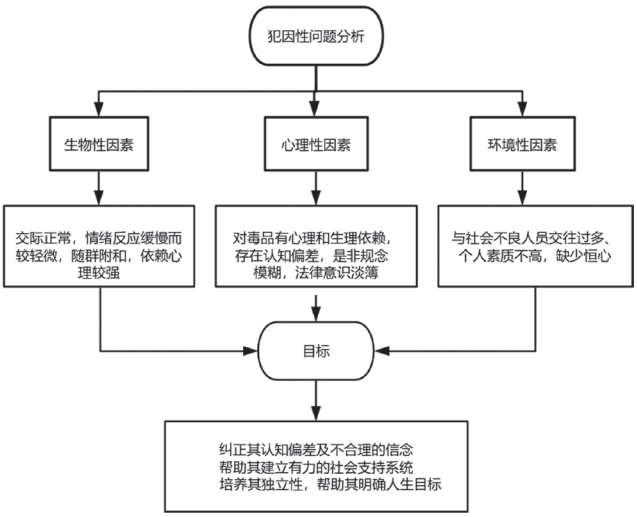


图 1 犯因性问题分析图

搜索包括“戒毒人员”“涉毒”“循证矫正”“矫正”等，进行初步筛选，寻找与本主题切合的资料[4]。

（2）筛选证据

①毒品滥用矫正措施：提高个体对毒品危害性的认知水平，分析毒品成瘾背后的潜在因素，强化个体家庭责任感，建构坚实心理防线以抵御诱惑。

②社会支持矫正网络：积极引导家庭成员发挥正向作用，通过日常关心和鼓励增强戒毒人员的信心。同时建立家庭监督机制，帮助戒毒人员纠正不良行为。

③职业技能培训机制：帮助王某评估自身能力，通过系统化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王某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消除懒惰习惯，提升生计能力，降低复吸的概率。在回归社会后，增强自身就业竞争力，从事合法合规的工作，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强化社会责任感[5]。

④社会融入帮扶方案：针对王某回归社会的实际需求，开展社会适应专项辅导。通过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梳理就业渠道，帮助王某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同时结合心理疏导，引导其调整心态，逐步适应社会生活节奏，最终实现家庭回归与社会融入的双重目标。

（3）证据评价

根据目前互联网检索结果，未发现与本研究案例直接相关的证据；戒毒康复人员循证矫正证据模块与本研究内容关联性较高，但其内容尚未经过系统的评估与验证。因此，上述证据的等级较低，但对矫正方案的制定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制定循证矫正方案

社会工作者经与王某协商，整个矫正过程分为三个矫正阶段。

1. 第一矫正阶段

矫正目标：认识毒品危害，纠正错误认知。

本研究阶段的矫正目标在于培养王某强烈的规范意识，改善其错误的认知结构，明确其社会角色定位，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增强法律意识，并提升其个人戒断毒品、摆脱毒瘾的抗逆力，帮助其能够基本抵御毒品的诱惑。

矫正方案：在本阶段过程中，主要采用集体辅导、毒品知识课堂教学、亲情辅导等方法，以纠正王某对毒品的错误认知为核心，采取三个方面的矫正措施。一是通过系统学习毒品的相关知识，包括毒品的起源、对个体和家庭的危害，以及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帮助王某从对毒品的无知、好奇、依赖状态转向对毒品的抵制与拒绝，同时，利用监狱的封闭环境，不断强化毒品危害的教育，提高其意志力，巩固心理防御机制。二是引导王某建立健康的身心观念，使其在认识毒品危害的同时，也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从而树立珍爱生命、保护身体的意识。三是让王某深刻认识涉毒行为对家庭以及社会的不利影响。要求王某写一份忏悔书，结合个人对毒品的认识，向家人进行宣读，增强懊悔程度。通过这三个方面的矫正措施，促使王某充分认识到毒品的危害性，改变错误的认知。

2. 第二矫正阶段

矫正目标：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和择友观，增强明辨能力。

本阶段的目标在于助力王某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和择友准则，增强明辨能力。涉毒行为与复杂的朋辈群体有关，王某存在对朋友的心理依恋，难以拒绝朋友的要求，导致是非能力弱化，最终发生不良行为。

矫正方案：在本阶段过程中，主要运用行为矫正技术，以解决“自主性缺失”问题为核心，通过听讲座、咨询、现身说法等方法深入推进禁毒教育，实施三个方面的矫正工作。一是王某通过自我反省，思考个人是非观和择友观的偏差，以及这些偏差与涉毒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自我思想根源产生的深层原因，全面地认识自我，为改正偏差行为奠定基础。二是自我思想观念问题清晰后，重建正确的择友观，为王某输入正确的前途观、道德观、信仰观等，使其能够理解这些观念的意义和核心内容，从而正确理解社会对个人行为的评价，激发其对自身行为可能会造成社会危害的反思，提高明辨是非能力，学会选择良师益友促进自我发展。三是通过个人生活经历和社会现状，写一篇关于良师益友的文章，进一步促进王某理解树立正

确的是非观和择友观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3. 第三矫正阶段

矫正目标：培养职业技能，回归正常生活。

本阶段的矫正目标在于帮助王某解决在回归社会后面临的就业需求和社会适应问题。在矫正过程结束后，通过实际成效评估王某职业技能的提升情况。

矫正方案：在矫正的最终阶段，社会工作者主要将心理调适和职业技能相结合，为王某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方案，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强化职业技能的培训策略，转变王某的消极工作意识，从“好逸恶劳”的趋向转为“克勤克俭”的积极态度，主动学习专业技能；另一方面采用激励机制，肯定王某的劳动成果，帮助她树立正确的劳动认知，在实践过程中培养珍惜劳动成果的意识，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观念。

（六）循证矫正实践效果评估

1.SCL-90 测试评估

通过采用 SCL-90 心理测评工具，对戒毒人员王某的心理状态进行系统性的评估[6]。主要体现在焦虑、抑郁、自卑、偏执等负面情绪方面。观察数据的变化，直观呈现王某心理问题的改善成效。

表 2 SCL-90 测试表

躯体化	强迫	抑郁	焦虑	敌对	偏执	精神病性	人际关系	恐怖	其他
1.66	1.7	1.3	1.22	1	1.45	1.2	1.33	1	1
分析评估	主观上无明显的身体不适感，不存在自我强迫的症状；精神轻松愉快，有部分焦虑，在外人面前有一点自卑，未发现有精神分裂症状，胃口欠佳，睡眠尚浅								

2. 社会功能评估

根据王某家庭成员所提供的反馈信息，王某与家庭成员之间互动次数明显增多，并且重建家庭关系纽带。王某积极主动地向家人描述戒毒过程进展情况，分享自己内心体验，家人对王某戒毒的态度也由先前的消极转变为积极的支持。此外，家人对王某新掌握的技能进行赞许，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

3. 复吸风险评估

通过对王某的毒品依赖心理进行综合分析，评估结果显示王某在复吸风险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王某深刻认识到毒品的危害，能够自觉抵制毒品，重新融入社会并保持操守。

（七）反馈证据

1. 确立主体性地位

在矫正过程中，王某始终保持着矫正的主体地位，社会工作者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引导、支持、帮助以及提供资源等辅助性功能。矫正成效取决于矫正对象王某的心理转变和自觉努力。正是因为王某的积极主动参与和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良好的矫正效果。

2. 可供借鉴案例经验较少

目前学术界关于循证戒毒的研究相对不足，可操作的标准化实践流程缺少一个权威的数据库支持。多数研究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缺乏对完整的本土化实践案例过程的记录与分析。由于戒毒人员本身的复杂情况和外部环境的不可控因素，对再犯风险的有效管理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家庭等多方面协同合作，形成长效跟踪教育体系。同时社会工作者还需进行更多的实践探索，持续推动戒毒人员心理康复工作专业化发展[7]。

四、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循证实践对戒毒人员的心理康复进行实践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社会工作者运用循证矫正实践的方法，打破了传统矫正模式过分依赖经验的局限性，以科学证据为主，结合专业判断和个人需求，改善了戒毒人员的心理状态[8]，有效提升了戒毒人员王某的心理状态和认知能力。同时表明循证戒毒方法应用于复吸率的降低、社会功能的恢复、职业技能的强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成效，有助于促进戒毒人员从社会边缘化状态向积极社会角色转变。但研究样本有限和缺乏长期的数据支持，可能会导致研究出现不可靠因素。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延续并跟进周期，进一步探索循证戒毒方法的适用性和可推广性。

参考文献

[1] 赵伟，刘明，王玮 . 吸毒人员成瘾诊断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J].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22, 31(02): 108-112.

[2] 苏政 . 循证矫正在社区矫正中的应用分析及完善路径 [J].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26(04): 77-81.

[3] 李梦 . 循证矫正理念在吸食新型毒品强戒人员心理矫治领域的运用 [J]. 中国司法，2013(02): 78-82.

[4] 吴晓凤 . 涉毒女犯循证矫正实证研究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 董贵俊，金兴会，唐磊 .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康复训练理论与实践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6] 唐磊 . 体卫融合在戒毒工作中的探索 [J]. 犯罪与改造研究，2024(04): 54-58.

[7] 董知明，陶武宁 . 循证矫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行为的应用研究 [J]. 中国司法，2013(05): 85-87.

[8] 庞岩，焦志伟 . 从循证矫正角度解析吸毒人员心理成因问题 [J]. 法制与社会，2014(17): 194-195.

（作者单位：甘肃政法大学）

隐私权保护视角下数字财产离婚分割的法律规制

杨柯莹

摘要：数字财产在现代社会已成为夫妻离婚时财产分割的重要部分。数字财产具有特殊性，包含了大量的隐私信息，在离婚分割数字财产时，必须要注重保护这些隐私信息。在当前的法律体系下，数字财产在离婚分割时面临着法律界定模糊、证据收集和价值评估困难等挑战。通过分析数字财产离婚分割中隐私权的具体体现及潜在冲突，明确在保护隐私权的视角下应当遵循的原则，包含尊重双方隐私、确保信息保密等。对此，针对隐私权保护与数字财产分割过程中的难点，笔者提出完善法律规制的一些建议，使数字时代夫妻财产分割更加公平、合理。

关键词：数字财产；隐私权保护；离婚分割；法律规制

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爆炸、万物联网和人际互通的数字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着从工业生产经济的迅猛发展到数字经济大爆炸的重大变迁。现代信息技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深刻地影响、改变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产生活的方式[1]。数字财产已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主要包括虚拟货币、社交账户、游戏道具、数字艺术作品等，其价值也日益显著。在婚姻家庭领域，数字财产在离婚财产分割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复杂议题，尤其是其中涉及的隐私权保护问题。面对新兴的数字财产形式，传统法律体系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技术层面的复杂性使得证据搜集与价值评估面临诸多挑战。同时，平台规则的限制以及技术的飞速进步，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解决难度。如何在离婚财产分割过程中，实现隐私权保护与财产权益分配之间的平衡，是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隐私权与数字财产概述

（一）隐私权内涵与外延

在隐私权的维度上，依据民法典第 1032 条，隐私权被定义为自然人所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其核心在于避免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强调了“私密性”与“自主控制权”。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隐私权的外延在持续扩展。传统意义上的“物理隐私”已拓展至“数字隐私”，涵盖了数据隐私，如个人身份信息、交易记录、行为轨迹等；社交隐私，包括社交账号中的聊天记录、朋友圈动态；虚拟身份隐私，例如游戏角色、虚拟形象等。

（二）数字财产构成及特性

数字财产，作为一种以数字化形式存在、具有特定经济价值并且能够被控制的虚拟财产，其法律属性融合了“财产性”[2]和“数据性”的双重特征。财产性主要表现为可交易、可继承、可分割等特性，例如虚拟货币、游戏装备等；而数据性则主要体现在其依托网络平台，以数据形式存储的特征，如社交账号、云盘文件等。根据其功能与属性，数字财产可大致划分为：金融类，包括比特币、以太坊等加密货币以及支付宝余额、微信零钱等电子支付工具；娱乐类，涵盖游戏账号、虚拟道具、直播打赏收益等；社交类，包括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账号及其内容；存储类，如云盘中的文件、照片、视频等数字财产；创作类，如数字艺术作品（NFT）、短视频等。

数字财产具有三重特性。第一，数字财产具有虚拟性，存在于网络空间，不具有物理形态但具有实际价值；第二，数字财产具有依附性，其存在依赖特定平台或技术，并受平台规则的限制；第三，隐私关联性，数字财产常包含大量个人隐私信息，具有价值不确定性，市场价格波动大且缺乏统一评估标准等特点，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隐私权保护视角下的离婚数字财产分割法律问题。

二、数字财产离婚分割涉及的隐私权剖析

（一）数字财产离婚分配中隐私权保护的体现

数字财产与个人隐私存在紧密联系。在离婚案件中，数字财产的分割往往不可避免地涉及个人隐私。一方面是社交类数字财产，比如微信聊天记录、微博发布内容、抖音视频，常包含夫妻双方的私人对话、

情感表达、个人生活片段等敏感信息。另一方面在存储类数字财产中，比如云盘中的私人照片、视频、日记，也蕴含大量个人隐私。这些信息对于个体而言，具有高度的私密性和个人价值。在离婚分割时，如何处理这些与个人隐私紧密相关的数字财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二）数字财产离婚分割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

1. 隐私权与财产权的冲突

民法典载明，隐私权属于基础性人权范畴，法律体系对此权利实施严格保障。在婚姻契约存续阶段，婚姻存续期共有的电子资源里，往往包含较多需保护的私密数据，此类信息直接体现个人隐私的核心价值属性，若出现数据外流或不当处理，将对隐私权造成损害，除隐私权相关外，法律将财产权纳入保护范围，若婚姻关系宣告终结，配偶双方对婚后积累的财产享有同等的分配请求权，数字资产也属此列，就数字财产的分割而言，要兼顾婚姻双方的财产权，保障财产分割的公平合理。

隐私控制权与财产处置权构成数字财产的双重权利，二者间的紧张关系正转化为制度冲突，隐私保障存在内在遮蔽需求，财产处置过程要求透明度，两方主张形成相互抵牾，既要维护个人信息的支配权不被削弱，又合理实现数字财产的价值分配，属于权利保障制度设计中的深层矛盾。

2. 平台的隐私政策限制

离婚纠纷中的数字资产分割，此类资产的分割多需借助专业平台技术手段，然而平台普遍实施严格的隐私管理规范[3]，对用户数据及个人信息的处理实施管控与约束，部分隐私政策会以条款形式限制用户进行数据转移的操作权限，涵盖离婚财产分割中的配偶。配偶间进行数字财产分割期间，将面临部分数字财产获取受限的难题，该数字资源载有隐私相关内容，难以实现直接移交，此种制约进一步抬高了数字资产分割的技术门槛，还会激化配偶间的隐私矛盾，致使隐私保障与财产划分的协调性进一步削弱。这种限制不仅增加了数字财产分割的难度，也进一步加剧夫妻双方之间的隐私冲突，导致隐私权保护与财产权分割之间的平衡更加难以实现。

3. 儿童隐私与共同监护权的冲突

当离婚涉及未成年人数字资产分割争议时，共同监护权与隐私权之间存在抵触，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数字资产涉及身份识别要素及多媒体隐私数据，此类资料牵涉未成年人隐私权的维护，在离婚财产分配阶段，配偶双方对这些电子资产均可主张合法权益，围绕共同监护的核心要求，夫妻二人皆试图保留或取得子女相关数字资源的所有权。

未成年人隐私保护存在现实需求，需要对这些电子资产实施严格的管控手段，规避未获批准的查阅及运用；实施共同监护的基本要求，共同监护制度要求父母分级共享子女数字记录，从而提升监护实施效果，为兼顾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障要求，恰当平衡配偶间的共同监护关系，形成需要周密处理的矛盾点。

4. 技术手段与隐私保护的冲突

司法机构针对虚拟财产实施价值评估，尤其是加密货币这类数字资产及 NFT 艺术品的价值评判时，运用相关技术十分关键，运用此类技术方案可明确显示财产的价值实质与产权归属，然而借助技术方法，尤其是电子资料复原手段，当呈现数字财产的价值时，存在无意识披露用户隐私内容的隐患，该信息本属法律保护范畴。技术手段虽聚焦于数字资产的价值量化，然而实践环节里，其影响维度自发延伸，关联到独立于财产分割的个人数据维度，由此构成对隐私权的实际侵犯，采用技术方法执行数字资产价值评估，技术实施需维护隐私权不受侵犯，形成显著的实施痛点。

三、隐私权保护与数字财产分割的法律规制困境

（一）法律界定模糊

法律层面未对数字财产属性作出清晰界定，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司法认定，针对游戏账号及虚拟货币等数字化资产，涉及财产属性的认定分歧，继而在离婚财产划分阶段，法律适用存在模糊地带。

隐私权在数字资产中的界定存在模糊性，法律规制存在空白，既有法律文本的条款漏洞，使现行制度在处置数字资产分配时捉襟见肘，当处理数字财产分割事宜，隐私权与财产权益的协调路径分析，现有立法尚未覆盖该领域的实施细则。

（二）证据收集困难

实施数字化财产取证期间，面临技术和认知层面的双重障碍，数字取证过程对专业资质有要求，一般民众在自主取证方面面临较大挑战，取证面临数据存储周期受限及格式不兼容等技术瓶颈，加之数字货币交易存在场外或非正规途径操作的现象，进而提升了取证的技术门槛，在收集证据阶段，隐私保护存在明显漏洞，即便采用司法手段请求证据调取，还会遇到数字资产证据与隐私信息边界模糊的挑战。

（三）价值评估难题

数字财产的价值评估尚未形成统一且权威的标准体系[4]。鉴于数字财产类型多样，其价值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当前市场上的评估方法虽多，但每种方法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对数字财产进行价值评估的过程中，评估人员必须要收集大量相关的信息，这也会引发与个人隐私信息相关的风险。

四、隐私权保护视角下数字财产离婚分割的原则

（一）利益平衡原则

在处理数字财产离婚分割的问题时，法院或当事人遵循利益平衡原则，公正谨慎地解决财产权益与隐私权的冲突。具体而言，就是既要确保夫妻双方的财

产都能够得到公平合理地分割，又要充分考虑数字财产中关于个人隐私的保护，避免在分割过程中对个人隐私造成侵犯。比如社交账号、电子邮件账户等，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实现平衡。这些措施包括对这些数字财产进行匿名化处理，以去除其中的个人识别信息，或者采用折价补偿的方式，给予不拥有这些财产的一方相应的经济补偿。通过这些方法，可以在确保隐私权得到保护的同时，也保障了财产权益的公平分配，从而实现了对夫妻双方权益的双重保护。

（二）自愿协商与隐私保护并重原则

相关规则着重申明，针对数字财产的分割事宜，配偶双方需采取自主协商方式形成合意，从而对彼此权益进行合理分配。此项原则进一步明确，在洽谈阶段，任何非必要个人隐私信息的强制披露都应被禁止，配偶间可采取协商一致的做法，由某一方维持对特定数字账号的掌控，另一方则可得到一定金额的补偿，采取这种模式可在分配数字资产时有效预防因硬性调取和公开隐私记录引发非预期争端，以此保障双方的隐私利益。

（三）最小必要原则

这一原则主张，涉及虚拟财产分割的案件中，仅涉及财产分割直接关联的必备信息才可收集使用，以实现隐私防护，减少非相关隐私扩散，针对财产分割事宜，法庭与认证评估组织仅需调阅虚拟资产对应的交易流水，以合理判定其价值，而不得涉及账户中非相关的隐私材料审查。

（四）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针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相关的虚拟财产分割问题时，必须将儿童隐私保障和身心发展置于首要位置[5]，若案件证据包含子女生活影像、在线教育账号等儿童隐私载体，涉及内容不能作为资产分割的判定重点，若这些数字资产处置失当，将对未成年个体的心理承受力与生活状态造成冲击，就这一情形而言，法院可依据实际情形，需将此类隐私数据做删除或归档处理，从而实现对儿童隐私的有效保障。为支持监护人长期履行监护职责，为保障监护质量，司法机构应核准仅保留必要核心数据。

五、完善法律规制的建议

（一）构建隐私权保护细则

需由立法部门牵头加快数字财产相关法律的更新迭代，赋予数字财产法律层面的界定，清晰界定所有权、使用权及处置权的归属范围，立法需在离婚财产分割环节作出清晰界定数字资产的分割规则与隐私保护实施细则，消除审判实务中的裁量困惑与诉争诱因，应当重点提升司法解释水平，采用标杆案例解读，为司法部门处理同类案件时给予清晰指引，巩固法律实施的连贯性与公正基础。

（二）制定证据采集与隐私保护标准

司法机构应当推进与网络运营商的深度合作，推行快速互通制度。在离婚案件中，数字财产相关证据可实现高效率、全覆盖式采集，网络企业应对司法机关的调查予以配合，进行技术配合及数据共享支持，应增强司法人员对数字证据的采集与处理水平，依托专项培训结合教育手段，夯实司法人员对数字技术的基础认识，熟悉电子证据的采集、归档及分析基础流程，以保证数字证据具备法律效力且真实可靠。部分学者主张，实施数字证据第三方存管制度属于可行手段，专业团队可进行数字证据的采集、储存及真伪判定，如此既可提高数字证据的专业水平及公信力，又可有效预防证据采集阶段的个人隐私侵犯隐患。

（三）构建数字财产价值评估体系

该体系需综合考量数字财产的稀缺性、市场需求、使用状况以及其潜在的经济价值，综合运用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等方法，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就数字财产评估的现存挑战而言，亟须构建一套客观科学的评价系统，该体系要同步评估数字财产的稀缺参数、市场匹配度、使用强度及其价值空间，采用市场法、收益法及成本法等多元化评估手段，从而保证评估结论的公正与可靠。有必要培养专门从事数字财产估价的人才，实施专业训练，深化评估人员对数字财产属性的把握，获得评估实务中的方法论支撑，夯实数字资产评估的人才基础。

构建数字产权流通交易体系，完善数字资产的流通渠道与交易环境，可促进形成由市场驱动的价值参考框架，平台需要搭建完整的交易制度及监管架构，实现交易活动的公开透明与公平有序，为数字化财产定价构建更扎实的市场数据基础。

六、结论

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数字财产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离婚分割中财产分割问题也日益复杂。隐私权保护与财产权益的平衡，直接关系到夫妻双方的切身利益，也是法律和社会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笔者通过分析数字财产离婚分割中隐私权的内涵、冲突及保护原则，明确了当前隐私权保护与数字财产分割的难点，并提出了完善法律规制的建议。

解决这一问题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立法、司法、技术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数字财产离婚分割中的隐私权保护将更加完备，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将得到更为公平合理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 . 数据的民法保护 [J]. 数字法治 , 2023(01): 43−56.

[2] 陈雪萍 . 数字资产的本质属性及其物权法定位 [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 2025, 27(01): 123（下转 129 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新时代文化建设探讨

张建成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观点是实践观，认为生活中的一切物质、文化等都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在我国现代文明建设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一直是重要的思想支撑。为此，本文首先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内涵，其次阐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观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启示，最后论述了我国文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我国文化建设路径，旨在为我国现代文化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建设启示；文化建设路径

目前，信息经济、文化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面对新时代经济发展特点，推进现有经济文化建设，加强创新经济发展研究，着力解决当前经济文化与未来经济文化产生的冲突问题，是保障中国特色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措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是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进行研究，结合我国国情制定文化建设措施[1]，更有利于推进我国和谐社会、创新经济、多元文化建设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内涵

（一）文化是实践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的核心观是实践观，认为社会中的一切产物都是由实践产生[2]。在马克思看来，在当下一定时期内当人的利益被满足，就会对上一层利益产生欲望。在这个过程中，人就会从当前时期中思考哪些因素应该延续、哪些内容需要摒弃，为了满足精神和生活双重的文明发展需求，必然会将生活文化、精神文化进行改进。也就是说，从文化形成角度来看，文化正是人将思想转化为实践的结果[3]。

（二）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象征

文化的形成经历历史长河的沉淀，遗留下的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象征，如语言、习俗、宗教信仰等。各个民族基于同样的文化意识，紧紧凝聚在一起。从文化形成角度来看，文明具有明显的民族性特点，作为一种精神支撑促使人们为了民族利益合作发展[4]。从民族利益角度而言，文化具有保持民族稳定发展的作用。世界是由多个国家组成，每个国家由多个民族组成，在国家文化发展中，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产生碰撞，取长补短，以此形成了国家文化。而国家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外在形式，成为代表民族的一种精神意识。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观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一）人本化建设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为人民谋幸福为主要发展任务。在建设中国特色文化过程中，必然要以人本化建设为基础，整合多元文化观和思想观，挖掘时代发展元素，保障人民利益[5]。人本化建设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它要求我们在文化创建中，始终将人民放在中心位置，倾听人民的声音，反映人民的愿望。通过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提升人民的文化素养，激发人民的创造活力，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化的滋养中找到归属感和幸福感。同时，人本化建设也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它像一座桥梁，连接着不同群体，增进相互理解与尊重，共同营造一

（上接 128 页）−137.

[3] 罗洁 . 网络开放平台用户隐私权的风险防范研究 [J]. 理论月刊 , 2014(11): 173−176.

[4] 曹飞扬 . 隐私权保护的数字遗产继承法律问题研究 [J]. 法制博览 , 2022(18): 53−55.

[5] 刘昶 . 离婚时共同财产分割的法律逻辑与效力体系 [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 2024, 39(06): 56−66.

（作者系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个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社会氛围，为国家的繁荣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纵观中国历史发展，从被打压中站起，从站起中发展，从发展中强大，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为主，因此，在文化创建中，必然要着力解决人民精神文化更高需求这一问题。

（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国有经济民主制是我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文化作为经济的一种表现，自然在创建文化过程中，要把握经济民主性这一特点[6]。马克思认为，经济是发展的保障，坚持当前的民主经济发展形势，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思想，就能够保持文化大众性、民族性。这种文化扎根于人民，反映着人民的智慧与情感，激发着全民族的创造活力。它如春风化雨，滋养着每一颗爱国之心，凝聚起磅礴力量，推动国家不断向前，绽放出更加璀璨的文明之光。马克思认为，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中国经济如今的发展局面，必然与人类生产思想、生产力有着直接关系。如今，我们国家经济已经度过了艰难发展时期，但只有依靠人民群众自觉性、实践力，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够更好地推进我国民主文化建设，保障我国现代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理论联系实际文化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践性观点是十分明显的。从文化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践观是理论联系生活、联系实际发展观。纵观历史长河，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明显的文化特点，如唐代政治开放、经济包容，服饰则以色调奢华为主要特点；宋代政治文化封闭，经济上注重发展内在经济，忽视外交经济，服饰相对简洁质朴。但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每个时期都在摒弃一些不适合当下发展的文化，并创建出独属这个时期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时期的文化发展，都是为了满足更高的生存欲望而对原有生活环境进行改变。也就是说，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要想推进文化发展必然要在原有文化基础上进行丰富和创新，合理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观下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一）理论研究大于实践研究

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和思想最终都体现在实践上。马克思从生活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从辩证视角分析经济与文化关系，从发展角度探究更好的发展方式，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内容。但纵观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部分学者对其研究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上，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一种精神、内在价值教育内容，具体到文化建设中，注重勾勒蓝图，却忽视了建设发展存在的实际问题。

（二）文化理念脱离大众审美

马克思主义思想追求的文化理念是一种大众审美理念，是基于生活、生产双重满足的文化发展观。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和实践观点来看，其最终指向的文化建设是可以实现的，是保障人民利益的，是满足人们期望的。另外，马克思主义思想从社会发展角度、从人们对更高一层精神和物质生活追求的角度进行辩证分析，认为人们在追求更高一层物质生活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原有不合适的内容进行舍弃，即新文化的建设以现有文化为基础。而反观实际我们可以发现，部分研究者过于注重理论研究，忽视了人民主体需求，脱离实际文化的建设，必然会阻碍人民共同利益发展的进程。

（三）价值取向忽视马克思主义思想实践价值

在中国建设发展时期，我国一直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主要指导思想，保障了我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但目前我国一些研究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若以这样的方式推进中国文化建设，不仅会显现出文化与实际的脱离，也将弱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的传播价值。马克思主义思想将文化实践作为文化创建的核心内容，从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角度，阐释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文化的关系。事实上，文化是实践的结果，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实践发展思想文化。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我国文化建设创新路径

（一）以实践观推进中国文化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反复提醒我们，在创建文化过程中要不断进行创新，要着力解决实际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时代角度找准新文化与旧文化的结合点。当前，全球经济影响，使得世界各国文化呈现出交融发展局面，如何保持我国文化自信、如何创建多元文化发展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面对内忧外患的紧迫压力，文化建设中始终要坚持守正、创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发展建设思想。

第一，坚定文化自信。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验证了社会发展规律，提出了发展观，但同时也表明了遵循原有事物发展规律的观点。从文化角度分析，马克思认为不论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其原有文化都有可借鉴性和延续性。所以，创新文化发展我们要对原有文化保持高度自信、全面审视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第二，坚持传统与时代相融合。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文化的延续不是照搬，而是依据时代特点，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特点结合起来，构造出一种新文化形态。所以，在新时代创建新文化体系，我们要在立足新时代特点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丰富和改进，使其满足新时代人们的生活、生产需求。如振兴乡村，发展集体经济，要坚持宜居宜乐的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农民利益、权利，构建绿色经济发展形式。

（二）以集体利益创建人本文化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人”是实践过程的重要保障，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始终重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才能够推进文化和谐建

设。纵观中国发展，不管是在艰难的革命时期，还是在当前的发展时期，无疑都在解决人民需求与社会矛盾之间的关系，通过精准对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有效缓和并化解潜在的社会冲突。我们以人民为中心，倾听群众呼声，将人民的期待转化为政策导向和实际行动，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更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凝聚力，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良好局面，为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为此，坚持集体利益，创建人本文化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观性，激发人民群众建设能力。中国文化建设涉及各个领域建设内容，如教育、艺术、科技等。人民群众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从人民角度考虑人民群众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人民群众需要怎样的生活环境、人民群众需要怎样的物质条件。进而通过党政渠道、媒体平台，告知人们利弊关系，得到人民群众理解和支持，激发人民主观能动性，推进中国文化建设。

第二，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思想，保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动摇，加强中国特色文化建设。在任何时期文化与经济之间都有着十分紧密联系，尤其在新时代文化与经济成为一体化经济发展新形态，但文化不是经济的附属品，不能为了利益摒弃文化价值、文化审美。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凝聚着民族的精神。我们应深刻认识到，真正的文化繁荣是建立在坚守价值底线与审美追求之上的。唯有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发展，才能创作出既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又能引领社会风尚的优秀作品，让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助力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独特光彩。为此，我们始终要坚持人民利益在前，从文化角度引导价值美、艺术美、潮流美，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保障中国文化立足世界这一建设目标实现。

（三）立足实际加强国际文化交流

着眼全程全局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着眼当今中国文化强国建设的发展态势，我们要有前瞻性、有针对性，既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脉搏，又抓住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研究全程全局下加快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路出路、方式方法，为全面深入落实文化强国战略探求实践路径。

强化文化自信自强是前提。一方面，要凝聚文化自信自强的中国合力。马克思指出：“希腊哲学家中间有一个是西徐亚人，但西徐亚人并没有因此而向希腊文化迈进一步。”恩格斯指出：“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结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文化强国建设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加快建成文化强国是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之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无论是文化领域的从业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应积极投身其中，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传承优秀文化基因；以坚定的文化自强，创新文化表现形式。让我们携手共进，汇聚起磅礴的中国合力，在文化强国建设的征程中，书写属于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让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熠熠生辉。

另一方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将自己看得一无是处，对本民族文化失去信心，认为一切都是外国的好，应该从根本上接受西方文化，抛弃民族传统文化；狭隘民族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恰恰相反，其拒绝接受西方的一切文化，作茧自缚、抱残守缺。这两种倾向都是要坚决予以反对的。其缺乏对问题的全面分析，对国家文化强国战略落实造成了某种障碍。因此，应确立应对文化全球化的正确态度，扩充文化强国建设的“正能量”。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中，我们需以开放包容之心，汲取世界文化精华，同时坚守民族文化根脉，让中华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焕发新生。确立理性客观的文化态度，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排外，而是以自信的姿态推动文化创新与发展。如此，方能汇聚起文化强国建设的磅礴力量，让中华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

五、结语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旗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丰富发展创新中国先进文化的内涵，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文化建设之路。也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参考文献

[1] 庞郁锦 .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星座文化的批判研究 [D]. 景德镇 : 景德镇陶瓷大学 , 2022.

[2] 黄丹 .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茶文化思想探究 [J]. 福建茶叶 , 2022, 44(08): 1-3.

[3] 李博 .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茶文化的两重致思逻辑 [J]. 福建茶叶 , 2021, 43(11): 3-4.

[4] 王孝明 . 马克思哲学视域下的当代中国政治美学思想问题研究 [D]. 沈阳 : 沈阳师范大学 , 2021.

[5] 周坤 . 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D]. 长春 : 东北师范大学 , 2021.

[6] 常静 .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视域下的文化自信研究 [D]. 新乡 : 河南师范大学 , 2021.

（作者单位：中共太湖县委党校）

在有条件的城乡学校开展甲骨文传承教育的实践路径探索

杨艳涛

摘要：在深入开展甲骨文教育进校园工作的过程中，着力探索城乡学校创建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的实施路径，既体现了教育公平与发展的统筹兼顾，又是在实事求是方法论指导下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具体实践，是“两个结合”在教育场域中的直观呈现。本研究主要围绕城乡学校创建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的时代价值、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的建设经验分析、城乡学校推进甲骨文传承教育的实践策略三个维度，探索教育实践中有效实现“两个结合”中“魂脉”与“根脉”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甲骨文文化；文化传承；文化创新

基于当前城乡经济发展的现状，在教育资金投入没有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推动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根本路径仍需从“外部输血”转向“内生造血”的内涵式发展，从学校内部激发原生动力，探寻促进学校、教师、学生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兼顾公平与追求卓越创新的目标引领下，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已成为众多学校建设发展的新路径，许多学校在甲骨文文化进校园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值得学习与借鉴。

一、城乡学校创建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的时代意蕴

新时代新征程，教育领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1]，是值得我们重视并认真审视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时强调：“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坚持“两个结合”在教育领域的时代意蕴启示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立场，促进教育公平；另一方面，聚焦学生的核心素养培育，以优秀传统文化强基铸魂，坚定文化自信，真正培养具有“四个自信”的青少年。[2]

（一）增强“四个自信”：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价值体现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名片，蕴含着国家的民族血脉，坚定的文化自信是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个性和底气，只有国民对自己本民族文化充满自信和尊重，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尊大，才能形成不卑不亢的文化心理态度[3]。信息化时代，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不断涌入教育领域，影响着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因此，迫切需要在传承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帮助学生领会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魅力与内在价值，从而提升学生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生态中合理的判断力和鉴别力[4]，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厚植其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

而甲骨文，作为汉字之“源”，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在增强学生文化自信方面，甲骨文具有天然的文化价值与独特魅力。甲骨文是象形文字，一个字不仅是一幅画，更蕴含着一段丰富的历史，体现着古时劳动人民的思想智慧、传统美德，这从甲骨文字的字形结构中清晰可见。

（二）坚持“求真务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魂脉”引领

如何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深刻而又直观地展现出其教育意蕴，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审视并重新思考的重要问题。本研究认为，在教育实践中，河南省积极推进甲骨文进校园建设，在创建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的背景下，努力探索城乡学校创建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的实施路径，这不仅是兼顾了教育公平与发展，更是探索文化传承与创新在实事求是方法论层面的具体实践，是“两个结合”在学校场域中探讨其方法论意义的直观呈现。

近年来，河南省积极推进甲骨文文化进校园。自2020年首批16所中小学校及幼儿园被命名为河南省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以来，至今已有三批共62所学校获此认定，其中多数学校集中于市区小学，而城乡学校在第三批认定名单中才陆续出现。因此，抓住甲骨文教育进校园的建设契机，深入挖掘城乡学校建设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的有效路径，既是促进城乡学校从资源均衡迈向优质发展的机遇，也是探索如何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以文化人的重要路径，更是教育领域深入探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学校教育发展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有效途径的具体的实践尝试。

二、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建设的关键经验：务实与创新

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的建设进程中，多数学校选择了内涵式发展的建设路径，为实现立德树人与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双重目标，真正投身于实实在在的“里子”建设工作，其关键经验就是将与时俱进的文化传承理念与求真务实的建设思路充分地结合了起来。

在对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建设经验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总结三组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建设的关键词。第一组聚焦于建设内容维度：环境、课程、活动，即在建设过程中主要围绕建设哪些方面来推进，当然，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需因“校”制宜选择建设内容；第二组围绕建设思路维度：特色理念的定位、建设的整体规划、特色融入的方案与实施，即在建设过程中要思考怎样开展建设工作，这是从定位到实施的全流程规划过程，以真正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特色；第三组侧重于提升建设的成效维度：弹性计划与互动生成、载体与线索、实效性与长期性，即建设想要取得高品质的发展实效，需要注重计划与实施的相互适应，强调弹性计划的合理设置与师生的积极参与，突出生成式的成果输出。另外，特色学校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不断适应变化而发展的阶段式成果逐渐积累的过程，应根据学校的已有特色与成果，选好载体与线索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梳理，不难发现不同学校的建设路径中均蕴含着求真务实与传承创新辩证统一的关键经验，这为城乡学校创建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城乡学校推进甲骨文传承教育的实践路径：求真与传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已有学校的关键经验是重要线索，但如何推进建设并非选择题，而是要在求真的基础上写好发展的论述题。如何让建设成果真正促进学生的发展，“两个结合”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学校应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着手，立足求真务实的建设，围绕“根”与“魂”的辩证统一，答好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建设这张试卷。

（一）环境建设：注重学生的参与，建设互动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环境，拓宽学习空间

校园环境建设作为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不断优化校园氛围，让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充分发挥“隐形的”育人功能，使得师生能够在富有学校文化特色与甲骨文文化底蕴的学习空间中学习[5]。因此，环境的建设应该既包括物质环境的建设，还应深入挖掘精神环境的育人价值。

实践中，多数学校在环境建设时侧重于物质环境建设，例如，打造具有甲骨特色的广场、走廊、墙面、宣传栏等，确实营造出特色环境氛围。但是，这种物质环境建设多为单项式的输出影响，并没有充分发挥环境背后的精神育人价值。因此，物质环境的建设应充分彰显精神文化的育人内涵，可以尝试通过注重学生参与，建设“互动式”环境，实现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的有机统一。例如，安阳北关区区直幼儿园（安阳北幼）的十二生肖甲骨特色长廊，运用蒙氏教具特点制作互动式墙面环境，通过设置操作板引导学生以猜一猜、比一比的方式与墙面上的甲骨生肖板互动。在“好玩儿”的环境特点下，既营造了浓厚的甲骨特色氛围，也充分发挥了学生参与环境创设的主动性，使学校的环境真正“活”起来。基于此，笔者建议通过以下具体路径开展实践探索。

1. 师生齐参与：共同设计学校专属的“甲骨特色”校徽

校徽是一所学校理念与文化的标识，是学校形象的标志和灵魂的表征，彰显着学校的办学理念和人文精神，具有象征和隐喻的功能[6]。校徽的象征功能离不开意象营造，更离不开具体环境和学校文化背景。设计“甲骨特色”校徽，引导学生通过创作直观理解学校的文化特色。因此，通过丰富多彩的征集活动设计校徽，可以充分发挥“师生”的主人翁意识，让学生能够真正融入学校发展，使其明白自己既是学校文化的受益者，也是学校文化的建设者。

校徽征集可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如以班级为集体开展征集活动、以学生家庭为单位开展亲子活动、以学校社团组织或者兴趣小组为单位征集，也可以向社会公开征集校徽设计方案。通过此类征集活动，既能充分发挥教师、学生、家长等各方的力量，又能真正发挥校徽凝聚力、精神激励、整合创新的功能[7]。更重要的是，学生参与设计“甲骨特色”校徽的过程，是对甲骨文化学习的过程，如学习校徽中甲骨文字的字形、字义；也是对学校文化背景和理念审视的过程，如选取的文字与图形需充分结合学校办学理念及教育特色等，最后经过构思、勾画、设计形成校徽图案。这样由师生共同参与设计的校徽，将更大程度地发挥甲骨文文化的感染力及校徽的感召力。

师生参与校徽设计，只是让甲骨文文化特色真正融入学校发展、走进学生生活的一种途径。我们还可尝试设计象征学校甲骨特色文化的“文创产品”，可创设专门的“文创产品”设计活动，也可依托学校的甲骨特色课程，如美术、音乐、书法或社团活动组织师生设计文创产品。这些产品可作为毕业生的纪念品、比赛的奖品、赠予友好学校合作交流的纪念品等，既激发了学生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同时也推广了学校甲骨教育特色理念。

2. 学生同分享：环境创设注重设计合理的游戏空间

学生的成长蕴含在生活的点滴之中。若校园环境建设未能与学生生活有机联系，环境育人效果将会打折。因此，结合小学生“爱玩儿”的天性及当下学生游戏“时空”被挤压、游戏“电子化、网络化”的现实困境，学校在环境创设中应充分注重游戏空间的建设。例如，安阳北幼的老师在学生户外活动时，及时捕捉到学生根据自己对妇好故事的理解自发组织行军打仗集体游戏的教育契机，在学校空置的小山坡创设了“妇好征战”的游戏场地，既满足了学生兴趣，充分释放了学生天性，同时将“甲骨特色文化”融入学生校园生活。

环境创设中，可结合学校校园环境特点，利用墙面、地面、花园、广场等创设合理的甲骨特色游戏空间。例如，可利用墙面和地面设计分学段的“甲骨文字”棋类游戏，可以运用校园不同空间创设具有“甲骨特色”版图拼图游戏、多米诺牌类、涂鸦游戏等。因此，实践中，应该通过用心的环境创设，尝试突破与改变以往校园环境静止、孤立、被动的弊端，让环境“活”起来，发挥环境内在育人价值，真正处理好学校求真建设与学生发展的关系，真正落实创新中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责任。

3. 学生来想象：注重环境创设中的适当“留白”

学校环境创设需适应学生发展，应该整体设计、合理规划，给学生留出适当创作空间。可利用学校走廊、亭台等空间设置学生作品展览区域，动态呈现不同活动中学生的“甲骨特色”作品、成果等。也可结合不同节日活动，给这些区域空间增添“甲骨特色”的装饰，动态呈现甲骨文文化元素。例如，安阳市甲骨文小学利用学生毕业典礼，充分运用甲骨文化元素装扮校园环境，给学生的毕业季带来浓浓甲骨特色文化气息，留给学生难忘的具有“甲骨特色”毕业回忆。因此，学校环境设置要懂得适当“留白”，并不是越满越好，动态呈现学生学习成果，也是环境创设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注重学生参与创新，共绘学校美好环境。

甲骨文教育特色环境的创设需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展开，以动态生成的方式融入甲骨文文化元素，融入学生校园生活，真正充分发挥环境育人作用。

（二）课程建设：构建灵动互通的课程体系，发挥跨学科整体育人价值

已有学校的建设经验表明，学校依托学科教学融入甲骨特色文化，开设了一系列特色课程，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实践中甲骨文特色课程多是分学科开展的，在学科间缺少有效联结与整合，未能充分发挥跨学科整体育人的功能。因此，在充分发挥特色课程作用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探索与思考如何借助甲骨文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内涵的桥梁作用，形成学科整体育人的合力效应。

1. 以“文”化人，以“美”育人，构建体系化的甲骨文特色课程

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朱永新教授曾指出：“完美的课堂是根扁担，一头挑着课程，一头挑着生命。”甲骨文特色教育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课程育人的主阵地作用，围绕学生核心素养目标、文化自信的养成，应有效地整合各学科特点，从目标、内容、实施、评价积极创新，探索甲骨文特色融入课程的新途径[8]。例如，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齐盛学校在甲骨文特色教育探索与实践中，构建了“字成体系”特色课程体系。

以“文”化人，主要是挖掘学科背后的人文价值，渗透甲骨文化的内涵，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可以挖掘数学、科学学科的学科精神与甲骨文文化的联系，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概念思维。

以“美”育人，既可以通过“书画”的形式，如甲骨书法、甲骨剪纸，甲骨印章、甲骨瓦当、甲骨灯饰的制作等，启迪和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可以利用甲骨文象形字具有流畅线条美的特色元素融入音乐课程、体育课程，培养学生的动态之美，陶冶情操、缓解学生紧张的情绪。例如，安阳中华园小学积极探索音乐教学中舞蹈与甲骨文元素的有效融合，创编甲骨文特色舞蹈教学；安阳师范学院原创的甲骨文广播体操以肢体演绎甲骨文，让枯燥的甲骨文“活”了起来，让看似“高冷”的甲骨文“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更多的学生感受甲骨文的魅力，使得甲骨文不再“高冷”，而是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9]。特色课程的开发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深入挖掘学科特点与甲骨文文化内涵的联系，建设系统化的甲骨文特色课程体系。

2. 基于核心素养目标，依据学科间“共同线索”，设计“甲骨特色”的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

跨学科主题教学是在坚持学科立场的基础上打破学科界限，以主题为媒介，通过问题导向的整体设计与实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理念与实践，是对学生生活体验的回归。[10]

甲骨文包罗万象，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设计甲骨特色的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可以以甲骨特色主题为引领，寻找不同学科之间的“共同线索”，以学生真实、感兴趣的生活问题为突破口，找出解决该问题中不同学科间的“共通点”，选择教学内容、确定主题、分析学生、设计活动、实施活动。例如，可以设置节日文化系列主题，如中秋节围绕“月”的共同线索，将各学科间联系起来，将“时间”“天体运行规律”“农历计时”“月圆与团圆”“诗与歌”“月字的演变”等学科间的共通点串联起来，整合学生经验，形成系列化的主题教学活动。

3. 挖掘甲骨文人文精神内涵，有效融入德育课程，创新德育课程实施途径

实践中，将甲骨文特色文化融入德育课程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深入挖掘甲骨文文

化背后的深刻内涵及德育价值，课程实施方式单一、乏味，采用枯燥的集体授课形式，导致学生积极性不高，出现特色文化与德育“两张皮”的现象。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应选取学生感兴趣的甲骨文文化历史，深入挖掘其蕴含的家国情怀、社会关爱、人格修养等人文精神，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礼仪教育活动、甲骨文德育小讲堂、观摩、研学与体验等特色实践活动，丰富学生的体验，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发学生对传统文化德育价值的共鸣，从而引导学生获得“实实在在”的文化认同感，增强“扎扎实实”的文化自信心。

甲骨特色文化融入德育，在激发学生对家乡文化的自豪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其社会责任感、民族自豪感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积极探索甲骨特色文化融入德育课程的有效途径，也是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及文化认同感的重要途径。

（三）活动建设：构建层次化、主体化、游戏化的甲骨特色实践活动，提升甲骨文文化的影响力

甲骨文特色活动的建设，应树立充分发挥资源与实践活动双向推动机制的思维模式，在学校甲骨文特色课程建设的基础上，学校应充分利用周边的特色文化资源，如人文景点、博物馆、甲骨文书屋、地方技艺传承人等，通过优化整合，创设丰富多彩、分层次、分主题的甲骨文特色实践活动，使其成为丰富多样特色文化资源的有效载体，让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动”起来、“活”起来，真正发挥其价值。结合已有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的建设经验，笔者认为甲骨文特色活动应该分层次、分主题、分规模地进行系统化设计，基于活动的创设，让学生的成长发展、教师的专业发展、学校的文化理念、课程设置、学校的校园环境有机地联结起来，形成一个互助互通的文化网络。

1. 创设常规化的甲骨文特色研学活动、社团活动及课后服务项目

研学活动是学生学习与认识甲骨文文化的主要途径，是学生产生好奇心、新问题的重要来源，可以将研学活动作为甲骨特色活动建设的起始点，在研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需要注意的是，想要真正发挥研学活动的催化剂作用，需要学校、教师在充分调研学生学情、研学基地特色的基础上，创设有目标、有计划、有主题、有趣味性、有成果且定期举行的研学活动，而非一次性的简单的体验活动。活动中教师应充分与学生交流互动，及时捕捉学生的问题、兴趣点，创设趣味游戏活动等，使之成为甲骨文特色课程、甲骨文主题活动的主要源泉。

活动建设中极为重要的一种实施途径是甲骨文社团活动的建设，社团活动是甲骨文特色课程的延伸，主要满足学生个性发展、兴趣爱好的需求，因此，甲骨文特色社团活动要体现其活动项目的特色与精彩，真正发挥社团的组织效能。因此，社团活动可以承办学校甲骨文特色比赛、演出、展览等项目，充分发挥社团的个性价值，培养一批具有高水平甲骨文特色文化素养的小使者。在学校推广特色文化与合作交流中发挥“形象代言人”“小小讲解员”的重要作用。

利用课后服务活动时间段，积极创设“甲骨特色”服务项目，例如，有的学校开设甲骨文书法、甲骨文书画、甲骨文诗画等特色项目，通过开设特色课后服务项目，丰富学生在课后服务中的选择，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要。

2. 捕捉教育契机，“线上 + 线下”齐发力，举办非常规化的甲骨文主题特色活动

甲骨文特色主题活动的创设，一方面，可依托上级工作部署与要求开展相应的校园比赛或选拔性活动；另一方面，可利用特殊时间节点，如传统节日、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事件、学校校庆、毕业典礼等创设甲骨文特色主题活动。例如，可举办“我为学校设计校徽、班级标识牌、学校文创产品、甲骨文陶艺茶具”等美术类活动；也可举办文体类表演活动。总之，应将常规活动与非常规活动纳入活动创设的整体规划中。

充分利用信息化线上资源讲好甲骨文故事。利用新技术增强甲骨文学习的趣味性、文化性、艺术性，让甲骨文走出实验室、走进千家万户[11]。例如，学校充分利用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腾讯合作，历经四个多月开发的“了不起的甲骨文”小程序，该程序通过故事性引入、游戏化互动、社交化分享等方式，便于我们了解甲骨文及汉字的演变，强化体验功能，为中小学等提供甲骨文研学的线上支撑，通过文字临摹、文字创造等功能，激发学生兴趣和创造性思维，唤起寻常百姓对甲骨文的“记忆”[12]。

因此，充分利用“互联网 +”技术，结合当下“学生生活电子化”的时代特点，开展丰富的线上甲骨文主题活动。可以依托世界漫画大会、甲骨文识读大会等活动，引进甲骨文趣味识字 App，甲骨文情景故事小程序、甲骨文漫画、甲骨文动画等，让甲骨文更便捷地走进学生的日常生活。其中活动创设可通过亲子阅读、亲子作业、闯关比赛等形式开展，增强学生与家长参与的积极性，推广甲骨文文化，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3. 活动建设中应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的建设原则

活动创设既要充分利用特色资源丰富活动内容，同时学校的活动成果也应走出校园，走进家庭、社区，走向社会。所以，在活动创设过程中，应该创设具有甲骨文特色的“小手拉大手”“亲子情景剧”等活动，将活动范围扩大至家庭、社区中，发挥学校甲骨文特色教育的影响力，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从学校推广至社会更广泛的角落，营造浓厚的甲骨文文化学习氛围。

甲骨文主题活动以其互动性和趣味性，成为激发学生对甲骨文文化探究的有效载体，（下转 136 页）

体育哲学之生命伦理审视

王　瑜 董艳艳 李芳丽 荆益群

摘要：体育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实践以及文化性的融合，是人类自然属性、社会实践、文化精神的有机统一。在生命伦理的宏大构架中，体育是个体自我积极展现的形式，是个体全面发展的内在实践要求，更是生命意义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从生命伦理的视角看，体育是人的生理、生物、生存、生活与存在组成的紧密结构。这一结构促使我们去寻求体育背后更深层次的哲学意义与理论路向，精准把握体育作为人的感性实践的生命活动本质。体育哲学为“人的感性实践”提供存在论基础，更成为我们洞察和探寻人的生命本质有力的工具，在对体育哲学与生命伦理的研究与思考中，我们不断深化对人类自身的理解，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超越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体育哲学；生命观；生命伦理

一、体育哲学的理论研究

哲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问题。哲学引导出的是无定论，在无定论的基础上展开对问题的思考从而得到一系列结果，是一个由“思”到“有”的过程。对于体育哲学来讲，我们首先探索的是何为体育？高强[1]对此发表了观点，体育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既是教育过程中的一部分，也涵盖了身体活动、游戏形式以及运动竞赛等多个方面。同时，体育还是一种文化活动和社会现象。在探讨体育的众多定义时，我们可以发现，对体育的理解是开放且多变的，没有固定的结论。这种无定论的特性，恰恰是哲学思考的本质所在。哲学往往探讨的就是那些没有固定答案、能够引发深入

（上接 135 页）通过体验式和情景式的活动设计，可以将冷僻的甲骨文字变得活泼有趣，使学生在参与过程中建立与传统文化的深层联结。因此，应积极捕捉学生的兴趣与好奇，通过活动的形式将甲骨文文化转化为学生的具身体验，使其成为学生生命历程中美好的印记[13]。

参考文献

[1] 林建华 . “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和教育实践价值 [J]. 人民教育 , 2023(10): 6-9.

[2] 同 [1].

[3] 岳素萍 . 幼儿趣味甲骨文课程的建构与实施——基于幼儿文化自信培养的视角 [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2022, 38(02): 81-90.

[4] 罗文娟 . 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视域刍议高职院校学生敬业精神的培育 [J].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2022, 27(06): 67-70.

[5] 尹少淳 . 美术核心素养大家谈 [M]. 长沙 : 湖南美术出版社 , 2018: 16.

[6] 郁美静 . 甲骨文在中国大学校徽中的应用 [J]. 大众文艺 , 2012(19): 74-75.

[7] 同 [6].

[8] 孙俊 . 文字感知世界美 文化奠基成长路——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齐盛学校甲骨文特色教育探索与实践 [J]. 教育家 , 2022(02): 48-49.

[9] 张晓萌 . 安阳师范学院 : 跟着节拍 , 让甲骨文“动”起 来 [EB/OL]. (2023-06-02)[2024-07-12]. https://www.aynews.net.cn/ayinfo/14735.

[10] 任学宝 . 跨学科主题教学的内涵、困境与突破 [J]. 课程・教材・教法 , 2022, 42(04): 59-64, 72.

[11] 刘云丽 , 李杉 . 加强考释研究 推动活化利用 促进交流互鉴 把安阳打造成甲骨文学科研究和文化创新高地 [N]. 安阳日报 , 2023-08-03.

[12] 张俊军 , 张佳婧 . 河南安阳 : 用科技文化成果讲好甲骨文故事 [N]. 安阳日报 , 2023-08-23.

[13] 虞玺 . 落实传统文化教育的“四个建设”——以“甲骨文小书院”项目实施为抓手 [J]. 教育研究与评论（小学教育教学）, 2021(11): 25-2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安阳市政府招标调研课题“务实求真与传承创新：城乡学校开展甲骨文传承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2024-417）。

（作者单位：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思考的问题，而体育作为一个无定论的概念，其所引发的问题正是哲学探讨的重要领域。对于无定论问题通过不断探究和思考最终成为具体知识，那么哲思起意也就随之停止。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国内外体育哲学研究对体育学的基础理论进行了不同的研究。通过对“体育哲学”文献进行整合，多数学者将体育哲学研究领域概括为三大领域，分别为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价值论。形而上学作为人类深入探索自身、自然和社会乃至整个宇宙起源与构造的核心方法，不断回溯至一切的开端。它依赖于历史与理性思考的紧密结合，来揭示事物的本质问题。这一过程离不开哲学形而上学的理论框架构建，而这些深刻的理论探索最终都会以具体、可感知的形式得以展现[2]。形而上学是关于“本质”“存在”“是”的学问。主要在于追求存在以及过去的本质。在哲学视角下，体育作为存在论来说在“动”与“静”之间的辩论，经过众多理论和实践经验后最终解释了生命的本性自由与解放，展现了人感性现实的具体形式。从哲学中思考体育，对体育的艰辛复杂且诗意的精神解读，其中的“问道”与“悟道”是值得探索和研究的。

体育认识论，作为探索和解释“体育”内在知识体系的学问，它是以实践性来作为阐释体育的起点和基石，在此基础上深度解释“体育”的知识起源，剖析其构造、明确其界限。体育认识论能够充分激发主体的创造性与能动性，为其提供最大程度的发挥空间，推动体育领域知识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与拓展。体育是一种基于人类感性参与的实践活动，它拥有独特的运作系统、行为规律及存在领域，是通过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旨在改造和提升人类自身的活动过程。在“体育”的认识范畴中，有众多知识内涵，例如具有“概念、本质、性质、特征、目的、价值、意义”等因素。同样具有“数量、地点、时间、静动”等表征，还有体育知识系统中的“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体育经济、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等内涵，以此构成体育认识论的存在。

体育价值论是在哲学的视角中去审视体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可以回答体育价值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在体育价值论中，体育价值应该建立起与人类生命存在的价值理想，在其生存与发展中是人类生命存活相关的主体需要，体育价值的主体是人参与体育就是个体生命存在的表现[3]。体育价值作为人主体活动按照“真、善、美”的价值取向进行判断。

二、生命伦理的体育本质解释

“伦理”一词来源比较复杂。在西方，英文 Ethics（伦理）可以理解为道德哲学，还可以理解为特定生活领域的行为准则。在中国，“伦理”一词早在《礼记·乐记》中就有记载：“乐者，通伦理者也。”如果将“伦理”一词分开来看，“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是指道德、秩序、规范之意，因此，伦理学是一门关于道德的学科。生命在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含义，《周易》中所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生生而有条理”[4]，是一种有秩序、有条理的生命观，把生生不息的阴阳二气交织成有节奏的生命体。生生不息是宇宙的精神核心，所表达的宇宙精神是一种“动”的精神，可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在儒家伦理中，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生”天地大道如此，通过认识生命，理解生命，知道生命是源于道的，最后又会复归于道。体育生命伦理中的“道”也是通过对其的认识与理解，从而对其进行传承与弘扬。生命伦理学所关注的问题是伴随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同时伴随着现代科学、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从而出现的各种各样与生命、健康相关联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取向。

体育从狭义的角度来说是以增强体质为主要目的，是人类为了更好地适应自然、社会的发展而进行的活动，体育的最初目的内含了对生命伦理的关怀。体育是将身体活动、艺术、精神融为一体来塑造完整的整体，那么也可以理解为体育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其本质仍然是对人生命的关怀。当把体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探讨，我们希望了解其本质意义，这种意义可以成为体育哲学的必然追求。体育的意义在于主体的客观存在，生命是个体与群体的存活的标志，人的生命伦理不仅是表现存在，同时希望挑战自我。体育作为主体的客观存在意义就在于为生命个体引导最佳的行为，使其在积极健康的基础上有超越自我的可能。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证明了人类生命的自由性，个体生命在自由运动当中获得存在感同时也体验了自然的本质属性。我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体育是生命最原始的表现和动力。在生命伦理中，体育追求着探索、求知、超越、进取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生命自由的卓越精神。我们人类生命伦理始终以要与自然和谐统一为目标，如何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们不得不了解我们自身的生存处境，生命的活跃需要建立起文化的生存空间，体育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只有遵循其文化我们个体的生命的活跃性才能得到释放。人类生物的本真属性才能在体育领域中得到保存。体育是人类最积极有利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我们人类生命个体的存在需要与消极的因素作斗争的时候，任何虚无、消亡都可能导致生命的颓废，那么体育作为一种积极向上的活动，正是肉体生存的必要活动。从生存视角看待生命伦理时，体育代表着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可以证实体育是自我肯定、证明生命力真正存在的强有力的证明。敬畏生命、善待生命这是生命伦理的底线，体育中的自我肯定包含重要意义，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生命活动，因为自我肯定是个体实现自我、得到自我、发现自我的关键因素，在体育的过程中在通过自我肯定的基础上推动生命主题认识向生命的本质靠拢，从而使自我意识得到启发与发展，真正地从思想层面转移到关注人的生命的自然状态，也就是生命伦理的自然存在与发展。通过体育可以使人们得到积极向上的生命力，让人

们在强健体魄中超越自我、实现自我、找到自我，从而使生命的主题活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有意义。

三、体育哲学之生命伦理观

生命是什么？这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知识确立的起点。我们人类生命是个体发生运动的展现形式之一。《尚书·周书》中说“惟人万物之灵”，认为人具有自然万物之灵长，具有崇高的地位。在历史长河中人对自身的探索从未停止过。马克思说“所谓彻底，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根本，人的根本就是人的本身”[5]。伯格森说的“生命的绵延与冲动”、海德格尔讲的“存在者对存在的遗忘”，都是对人本身的理论研究。体育作为人的一种健康的存在方式，是人感性实践的生命活动，是竞争经验留存的技艺表现。我们个体在体育运动中表现出的刚毅、顽强、矫健、拼搏、勇敢、沉着等特质都蕴含在作为人本身之中。可谓人之学问，体育同在。体育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它可以将生命活动保持在一种自然且恒定不变的状态，当今发展如此快速的社会生活中，体育不仅可以保障个体的生理基础，还帮助其构成自然生命中的保护屏障。从以上可以得知，体育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体育活动，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身体运动姿势、身体形态、身体运动轨迹等，而是证明生命存在的必不可缺的行为基础，是可以保证生命可以顺利向前发展的主导的方式方法。体育本身是积极向上的，热情的、阳光的，所以通过体育主导发展的行为方式也是积极的、向上的、向善的行动，是面向生命伦理自然发展的和谐的方式。从体育的主体认知的研究角度出发，可以深入了解人类主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状态，以及在生活、生理、生存、生产、生命等不同维度表现出来的体育的主体性。这对构建基于生命哲学的体育主体关怀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实践中，生命伦理对人的关怀得以充分彰显，它不仅为人们开辟了生活空间，还构建起互动结构，进而催生出体育中生命活跃的永恒动力机制。在确认人主体存在这一关键议题上，体育拥有不可替代的话语权。它能够验明存在实体，肯定存在状态，赋予存在空间，并阐释存在意义。通过这些，体育在生命伦理的范畴内，拓展出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思维空间。体育是通过人本身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活动来保持人的自然属性以实现生命活力的涌现。体育是生命积极的象征的表现，体育也是生命原欲的象征，人类完成自然探索以及社会实践都是依据生命原欲的基础因素从而得到实现的。体育不仅是个体生命的实践创造，更是个体生命意义的生成。

四、总结

在新时代体育哲学的范畴中，体育不仅是个体生命活动的主动表达方式，更是实现生命伦理自我塑造、展现生命个体本质的关键途径。体育，将生命力从原始欲望的状态，引领至富有意义的境界，是生命升华的生动注脚。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体育在感性世界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人类主体存在的基本方式，绝非简单的身体运动。从本质上讲，体育是一个不断自我认知、否定与超越的动态过程，使人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自身本质的理解。在体育哲学的视野里，对生命精神、价值及意义的不懈追寻，促使生命意义的无限可能性得到全方位拓展。体育全方位塑造了人类精神与肉体的整体特质，实现了人类从现实存在向本体层面的超越。正因如此，体育已然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成为个体维持生存、实现自我的手段，也成为群体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人类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选择，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体育的支撑。在参与体育运动、感悟体育精神的过程中，人们实现了身体的舒展、力量的积蓄、意志的锤炼、规则的遵循、勇气的汇聚、群体意识的培养以及家国情怀的升华，这些都对社会的进步产生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今时代，面对社会文明众多的生存挑战，深入探寻体育哲学和生命伦理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在现代社会，人们面临各种问题，体育发挥着多元且强大的作用，体育以其独特的价值，成为寻回人类生命本质的哲学实践，引导我们寻回人类生命伦理的本真。在此领域，我们将身体运动转移至科学世界，理解时间、活动、空间的内涵，将个体的身体意识、自由思想以及“无我”的境界进行最直接的表达。体育通过帮助人们合理宣泄生活中的不良情绪，摆脱技术操作中的束缚，打破身体静态的局限性，重新得到生命的活力。在如此高速发展的现代生活中，体育通过体育哲学、体育伦理、体育生命等对人类生命本质的重新塑造，让体育人真正成为健康人，让体育这个学科得到真正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高强 . 从“形而上学式”到“历史主义式”体育哲学 : 始于体育概念无穷性困境的思考 [J]. 体育科学 , 2018, 38(01): 63−70.

[2] 戴兆国 . 当代中国形上学建构的理论自觉——从《论道》到《道论》[J]. 哲学动态 , 2013(05): 41−46.

[3] 刘欣然 , 林雯慧 .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体育哲学的出场语境与理论路向——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阐释 [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 2024, 41(01): 52−61.

[4] 周振甫 . 周易译注 [M].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91.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12: 10.

（作者单位：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数字技术赋能职业教育改革：价值意蕴、问题剖析与路径探析

李爱媚

摘要：本文的研究目标是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如何成为推动职业教育改革的关键因素。通过详细分析数字技术在职业教育中的应用及其价值内涵，本文旨在揭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问题。在此基础上，将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策略和方法，以期为职业教育的数字化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操作的指导。这些探索和建议不仅有助于教育工作者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数字技术，而且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从而促进职业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

关键词：数字技术；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创新；人才培养

一、引言

伴随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化现已成为当今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尤其是在教育行业，数字技术的运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授课模式，也为职业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面对职业市场需求急剧变化和技术进步引发的挑战，如何有效借助数字工具对教育资源配置进行优化、提高教学质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数字技术赋能职业教育的价值意蕴

数字技术既改变了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又深刻地影响了教育领域，尤其是在职业教育中凸显出巨大的价值意义。

（一）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分配

1. 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经由构建统一的在线课程资源库，能汇聚起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优质教学内容，这些课程包括视频讲座、电子书籍、互动式教程等多样形式，涵盖多样的学科门类。

采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创建虚拟实验室，使学生可在安全且低成本的环境里开展实验操作[1]，这对某些高成本或者高风险的实验尤为关键，诸如化学反应模拟、机械装配训练等。

倡导使用开放教育资源，激发教师和学生自由获取并分享知识的积极性，这可助力打破地域的限制，让偏远地区的学校同样能获得高质量的教学资料。

2. 远程教育机会增加

诸如网络直播课的实时视频流技术，使教师可在任何地方为全球学生讲课，这种模式尤其适配那些难以亲自到学校上课的学生，比如在职的成年人、有身体残疾的人士等，通过录制的视频课程，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时间灵活安排学习时间，并可以多次观看以强化理解。

开发专门聚焦职业教育的应用程序，使学生实现随时可学、随地可学，语言学习应用能支持学生练习听力和口语，而职业技能应用则可给出实际操作的方法。

（二）实现个性化教学

1. 智能推荐系统

智能推荐系统凭借大数据学习分析技术可以实时采集多维的学习数据，涉及视频观看的时长、习题做对的比例、资源下载的次数等行为印迹。采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学习者画像，系统可以识别个体的认知风格以及知识掌握情况，借助大数据开展的学习分析可收集学生学习行为数据，诸如浏览轨迹、答题情况等，采用数据分析技术鉴定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与喜好，根据学生的兴趣与能力水平，智能系统能自动推荐最适合他们的学习材料，协助他们更有效地学习新知识。

2. 自适应学习路径

现代自适应学习系统所依托的是三层技术架构：数据采集层借助经验应用程序接口（xAPI）标准实时抓取学习行为，算法层凭借深度强化学习实施动态模型搭建，应用层提供可视化路径编辑器。

自适应学习系统可按照学生的表现及时对学习路径做出调整，针对学生掌握情况较好的知识点，降低重复练习的频次，对薄弱环节则强化巩固力度。

差别化授课策略，按照不同学生的需求采用不同的教学途径，如针对视觉型学习者，采用图表展示更适宜，而听觉型学习者或许更中意音频讲解。从差异

化策略角度看，系统会凭借 VAK 学习风格量表自动配置教学手段，为视觉型学习者生成以数控编程流程图为例的信息图式课件；给听觉型学习者配备带语音标注的工艺讲解音频；给动觉型学习者设计 AR 拆装仿真实验，这种精确匹配让不同认知特性的学生都可获得最佳学习体验。

（三）增强实践能力训练

1. 开发专业软件模拟仿真环境

开发诸多专业的技能培训软件，诸如编程实训的专门平台、会计实务的模拟仪器等，让学生在虚拟环境当中开展实操演练，借助设置真实工作场景下的问题情形，提升学生的决策水平和应急处理本领，在医疗培训中模拟急救操作，在工程培训当中模拟项目管理事宜。

2. 跨学科项目制学习

采用实际工程项目作为学习实例，让学生借由实践学习理论知识，进而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和项目管理能力，倡导学生加入跨学科项目，助力不同背景的学生彼此交流合作，开阔视野并提升综合素养。

（四）加强校企合作交流

1. 畅通信息共享渠道

搭建起云服务平台，经由云端的信息共享平台，按规定时间更新行业最新动态、就业趋势以及岗位需求等资讯，助力企业更有效地契合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引导企业与学校共同开展科研项目，推动学术成果向产业成果过渡，同时也为学生搭建参与前沿研究的平台。

2. 共建实习实训基地

校企共同搭建实训基地的同时可实现实习机会拓展，与行业先进企业合作搭建校外实训基地，为学生赋予真实的职场体验，这些基地一般会配备先进的设备及技术，从而让学生熟悉未来工作要用到的工具，可为学生供给更多高质量的实习机会，令他们在毕业前就能积累宝贵的实战经验。

三、数字技术赋能职业教育改革的问题剖析

尽管数字技术为职业教育带来了不少机遇，但在实际应用和实践中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这些问题不只限制了数字技术潜力的发挥，还可能阻滞职业教育的全面改革进程。

（一）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网络覆盖欠佳，在一些偏远处所或乡村范围，互联网接入依旧不稳定，甚至无法实现接入，这直接对在线教育的普及与质量方面产生影响[2]。设备老旧失修，众多职业学校缺少现代化的教学设施，诸如高性能电脑、智能教学黑板等，这削弱了教师借助先进技术实施教学的能力。

（二）师资队伍信息化素养不足

老一代教师对新兴技术的接纳度比较低，不愿或不懂得怎样借助数字工具优化教学方法。

培训资源短缺，虽然存在着一些针对教师的培训项目，但覆盖范围与深度往往不达标，尤其是在资源不充裕的地区。

（三）课程体系更新缓慢

教材更新的速度缓慢，有部分学科的知识点长期未更新，难以反映出最新科研成果以及行业发展趋向。伴随着科技进步以及社会发展的提速，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一直都在变化，但目前职业教育课程的设置往往跟不上市场的迅速变化，造成毕业生的知识结构与实际工作需求存在明显差距。以 IT 行业为例，特定的编程语言或开发框架大概每隔几年会出现重大更新，可教材内容要实现同步调整不易。

（四）评价体系单一

现今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过分依赖标准化考试成绩，忽视了对学生综合素养的全面考察，这种评价标准虽便于管理与比对，但却忽视了个体差异以及创新能力的培育。

（五）学生自主学习意识薄弱

主要体现为被动接受知识且没有自我驱动力，那些习惯被动接受知识灌输的学生往往不肯花额外时间自主探寻未知领域，很多学生没有明晰的学习目标与计划，欠缺自我管束和自我激励的能力。

四、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路径

为应对上述挑战，让数字技术在职业教育中充分发挥作用，需要从各个方面发力，采用综合性措施实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以下是一些具体路径：

（一）加大投入完善基础建设

在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带，可借助政府补贴或者公私合作这些途径拓展光纤和无线网络覆盖面，“宽带中国”相关战略已在我国实施，采用各种手段提升全国范围内互联网接入比例，也不妨考虑采用卫星通信等技术去解决地理限制难题[3]。对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而言，昂贵的上网费用或许是阻碍子女获取在线教育的主要原因之一，可采取多种途径减轻家庭负担，比如给予上网补助、推广廉价的移动设备，和电信运营商共同推出专门针对学生群体的优惠套餐。

（二）强化教师培训工作

提高教师队伍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应用能力是职教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筹备分层次的培训课程安排，覆盖从基础原理到高级技法的各个区间，初级课程要囊括基础的计算机操作、常用办公软件的操作使用等内容；中级课程着重讲授多媒体制作、在线协作工具应用方面的内容，开展实践引导式的研修活动，采用模拟课堂、案例研究等形式，让教师们在实际操作中学习新技术。组织教师参与到在线课程的开发项目中，从需求分析到内容制作全程跟进，以此增加他们的实践实操经验。另

外可举办微课大赛等活动，激发教师创新教学方式，同时展现优秀成果。

政府或者教育机构可设立专项基金，用于资助有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潜力的相关项目，对成功落实创新项目的个人或团队给予奖励，继而借助举办研讨会、制作出版物等形式推广其经验和成果，鼓励更多教师投入教育技术创新活动中。

（三）构建动态调整机制

为让职业教育课程与行业需求相匹配，需要组建一套灵活高效的动态调整体制，根据《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精神，需要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培养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就要求职业院校需要紧跟市场的变化，不断对课程设置进行调整，以契合企业的要求。

由来自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组成专家小组，定时举办会议探讨当下市场变化与技术进展，为学校提供改进意见。这些顾问可以是企业高管、资深工程师或行业协会代表，他们将直接参与课程大纲的设计流程，顾问委员会也能够助力学生知晓未来的职业发展走向，以便提前把准备事宜做好。

把课程划分成多个相对独立且相互关联的模块，每个模块均对应特定的知识点以及技能要求，如此操作的好处是可依据市场需求快速对单个模块作出调整，不影响整体框架，同时也便于学生依据自身状况挑选恰当的模块组合，这种灵活性令课程设置更契合实际工作需求，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实力。

（四）推行多元化评价方式

冲破传统单一评价标准的桎梏，采用更加科学合理的综合评价体系是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构建多样化的评价机制，并非只考查学生的理论知识，还需评估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4]。除期末的考试分数外，也需要看重学生的平时作业、课堂表现、小组讨论等过程性指标，这种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持续学习的习惯，同时还能更精准地反映出他们对知识的掌握水平，在一些课程中，可把课堂参与度、课外阅读报告等列入最终成绩计算范畴。

通过让学生参与真实的工程项目或者完成解决实际问题的相关任务，以考查他们的应用及创新能力，这种方式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动手实操能力，还会激发他们的兴趣以及创造力。比如机械工程专业，可安排学生设计与制造一个小规模的机械器具，并采用演示和报告的形式呈现成果。

（五）深化产教融合

深化学校跟企业的合作，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顺畅衔接，是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点。

这种模式对缓和结构性就业矛盾有作用，助力毕业生更好地贴合市场需求，有定向培训项目、1+X 项目、现代学徒制等，贴合企业特定岗位的要求，制定专门的培训课程，保证毕业生能顺利适应工作岗位。实行校内导师与企业导师相结合的双导师制度，由校内导师开展理论教学活动，企业导师进行实践操作指引，推动学生全面成长。

采用企业的生产设施及技术资源，在校内以及学校附近设立实训中心，为学生提供贴近真实工作情境的实习机会，同样可在校外设立长期合作的实习基地，让学生有机会走进一线岗位体验工作流程，比如汽车维修专业的学生可以在和汽车制造商合作的实训基地学习最新的维修技术与设备操作方式[5]。

高校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组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团队，一方面聘请具备大量实践经验的企业技术人员做兼职讲师，安排在职教师前往企业挂职锻炼，为教师定期提供进修以及培训的机会，让其专业知识与技能不断进行更新，紧跟行业发展步伐，这样既能保证教学质量，又可使教师积累专业知识。

五、结论

应用数字技术在职业教育中有巨大潜力，不但可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分布，实现个性化授课，还能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增进校企之间的合作。想要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必须解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师资队伍信息化素养缺失、课程体系更新迟缓以及学生自主学习意识薄弱等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学校和社会各界齐心协力，通过加大投入力度、深化教学培训、改进课程设置和激发学生兴趣等方式，全面促进职业教育完成数字化转型，以应对未来社会的需求和挑战。

参考文献

[1] 曾光，黎新华 . 智能技术赋能职业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的技术表征、内在机理及创新路径 [J]. 教育与职业，2023(13): 84−89.

[2] 周凤玲，徐涵 . 数字技术赋能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治理的内在逻辑、现实挑战及实践路径 [J]. 教育与职业，2024(14): 30−36.

[3] 王莎莎 . 数字赋能职业教育的逻辑、困境与路径 [J]. 教育与职业，2024(02): 59−65.

[4] 周驰亮 .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逻辑理路：何以必要、何以为忧与何以化忧 [J]. 职业技术教育，2024, 45(07): 13−19.

[5] 郑蓓，阮红芳 . 新质生产力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理路与实践模式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12): 12−21, 38.

（作者系北海职业学院副教授）

医院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伦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贾　品

摘要：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整个医疗行业不断变革，作为行业的核心载体，为实现高质量、可持续且健康发展，医院在临床诊疗实践和科学研究活动中需严格遵循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医院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伦理问题，如伦理审查机制不完善、医务人员伦理意识薄弱、对患者隐私保护意识不足、新兴技术应用伦理风险凸显等，提出了完善伦理审查机制、加强医务人员伦理教育、强化对患者的隐私保护、组建新技术伦理评审委员会等对策，从而提升医院伦理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促使医疗科技健康发展。

关键词：医学伦理；高质量发展；伦理审查

为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2021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同年 9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2021—2025 年）》，并将“实施临床科研提升行动”作为公立医院能力提升的一项重要任务，明确了医学科技创新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应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建立健全科技伦理治理机制，加强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建设。作为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科技伦理在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

一、伦理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我国高度重视伦理审查工作，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多个文件要求加强伦理管理。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科技伦理评审制度建设”。2023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印发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的通知》，要求开展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的机构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为响应国家号召，各级地方政府和科研机构也纷纷制定一系列伦理实施细则，如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健全完善伦理审查委员会备案及监管机制，做好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工作”，涉及人的科研项目必须经过伦理审查，推动了科技伦理评审工作在地方层面的落地实施。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加强了伦理管理，如复旦大学成立了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对科研项目从申请立项到结题审计开展全流程伦理审查。国内学者也对科技伦理审查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吴梦强认为，科技伦理应成为医学科技创新的有力保障[1]。蔡雨廷认为，在开展科研活动过程中，临床医务人员应严格遵守伦理规范，并做好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手续，切实维护患者权益[2]。徐嘉认为，科技伦理治理的核心在于构建以科技活动为中心，多元主体参与的全过程伦理审查机制[3]。然而，郝凯冰等的研究也揭示了伦理在医学科技发展中面临着目标完成度难以确定、主体认识不统一、对象不明晰、手段单一、模式不完善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医学科技发展[4]。

欧美等发达国家很早就意识到伦理的重要性。20 世纪 70 年代起，美国就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贝尔蒙报告》明确规定了开展研究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受试者保护原则，为后续各类伦理评审提供了指导。欧盟通过制定《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等要求研究者在开展涉及个人数据的项目时必须办理严格的伦理审批手续，规范了数据处理中的伦理评审标准。为了尽量避免新技术被滥用，德国在传统的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基础上还专门设立了安全相关研究伦理委员会、社会科学伦理委员会等新兴的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5]。为了进一步加强科研项目全过程管理，国外众多科研机构和高校还成立了专门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如哈佛大学的人体研究伦理委员会通过对项目申请、实施的全过程进行严格的伦理审批和跟踪随访，保障了项目的有效开展。

二、医院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伦理评审的重要性

当今时代，医学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着整个医疗行业的革新与进步，这就需要不断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使之与公立医院医学科技高质量发展相契合，保证科技伦理的发展跟随时代发展的步伐[6]。

（一）伦理是保障医学质量和安全的重要基石

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进步，基因编辑、干细胞治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远程医疗等前沿技术、新方法在提高临床诊疗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伦理风险[7]。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例，虽然能够治疗遗传性疾病，但也可能被用于非医学目的，如对胎儿进行基因修饰等[8]，而完善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能够有效识别并防范这些风险。因此，在推进医学科技发展的同时，不仅要考虑到技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可及性，还要将伦理道德准则贯穿于新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全过程，如此方可确保医学科技的发展不会突破道德底线，切实维护患者和公众的生命健康权益。

（二）伦理是维护医患关系和谐的关键因素

在医疗活动中，落实患者自主权、隐私保护权和知情同意权等伦理原则，有助于建立医患信任，减少医疗纠纷。良好的科技伦理治理可以明晰医疗技术应用边界、保障患者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提升医护人员临床诊疗过程中的伦理素养等，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建立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提升医院公信力，促使医疗服务从“以技术导向”向“以患者中心”转变，从而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三）伦理是推动医疗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

只有在符合伦理规范和准则的前提下开展医药器械研发、临床试验和产品应用等科学研究活动，并对科研活动的全过程进行严格、规范化管理，确保研究方案切实可行、受试者权益得到最大保护，才能保障研究结果规范可靠，推动医疗技术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良好的伦理生态环境和健全的伦理治理体系既能为医疗科技创新划定伦理边界，明晰科研人员的行为准则，也能够强化科研人员的责任感，鼓励其在既定的伦理框架内开展创新性研究。

三、医院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伦理问题

只有不断研发医疗新技术、持续产生创新性成果，医疗行业才能实现高质量、健康发展，而高效的伦理是开展该项工作的前提和保障。然而，尽管医院已经意识到伦理的重要性并纷纷采取措施，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

（一）伦理审查机制不完善

当前，部分医院伦理委员会因为受到行政体系干预，无法独立行使伦理审批权和决策权，面临审查流程混乱、评审标准不统一、审查人员质量参差不齐、监督机制缺乏等问题，使得伦理审查流于形式，无法对医疗实践和科学研究形成实质性约束，难以发挥其作为伦理“守门人”的核心作用，影响了伦理审查结果的客观公正性。在评审标准上，伦理委员会也没有制定科学、规范的评审标准，致使不同专家的评判标准不一，不同项目间的审查结果存在显著差异，难以保证审查结论的权威性与一致性。例如，不同的伦理委员会专家在评审材料时，可能因评审标准不同而对同一项目采取完全不同的评审意见，或者相似的两个项目评审结果完全不同。

（二）医务人员伦理意识薄弱

在临床诊疗和科研活动中，部分医务人员伦理意识淡薄，未能全面考虑患者的利益，如在临床工作中部分医生的治疗方案采用“大礼包”“一条龙”设计，未针对每个患者的具体病情采用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从而可能因未能对症治疗而产生医疗纠纷。在诊疗过程中，医患沟通流于表面，知情同意环节常被简化为“格式化告知”，或知情同意条款不明显，隐藏在患者需要签字的其他文件之中，有诱导签字之嫌。这些不当行为都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和不信任，影响了医生和医院的形象。

（三）对患者隐私保护意识不足

保护患者隐私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开展诊疗活动的基本责任和义务，然而部分医务人员对患者隐私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公开场合随意讨论患者病情，参加会议或发表论文时也未能隐藏患者信息，致使患者隐私泄露，不仅违背了伦理原则，还引发了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影响了治疗的顺利实施。部分医院在管理过程中也存在疏漏，未能建立严格、规范的患者信息采集、存储和使用制度并责任到人，进一步增加了患者隐私泄露的风险。

（四）新兴技术应用伦理风险凸显

随着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新兴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广泛应用，医务人员面临的伦理问题也愈加复杂。以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为例，虽然 AI 的应用极大提升了疾病诊断效率，但机器诊断和由专业医务人员凭借其丰富临床经验综合得出的诊断结果还存在一定误差，一旦 AI 出现误诊，责任究竟该由谁承担，目前已经成为医疗行业备受关注的焦点。基因编辑技术同样争议不断，不仅难以保证技术实施后的安全性，目前医疗界对哪些情形下可以采取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边界也缺乏明确认定。这些新兴技术所带来的伦理挑战已远远超出传统伦理框架的应对范围，给医院伦理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四、完善公立医院伦理治理的建议

虽然公立医院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伦理问题，但通过不断完善伦理审查机制、加强医务人员伦理教育、加强对患者的隐私保护等，仍然可以为公立医院高质量、稳定发展打好基础。

（一）完善伦理审查机制

为了提高伦理委员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医院应在调研各机构伦理委员会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定位和发展特色，设置单独的涵盖多学科专业人才的伦理委员会，并明确伦理委员会的功能定位、框架结构、职责范围、工作流程和评审标准等，对涉及伦理的项目进行严格审查和跟踪随访，及时处理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不良事件和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作为伦理材料审核的守门人，伦理委员会秘书在伦理评审流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伦理委员会秘书的专业背景和职业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伦理材料的合规性，从而影响了伦理项目审核的通过率。为保证伦理审批效率，医院应为伦理委员会配备既懂医学，又了解伦理学、法学等学科的综合性高水平管理人才。

（二）加强医务人员伦理教育

为规范医务人员行医准则和科研能力，医院还应对医务人员开展系统全面的伦理培训，提高其伦理认知水平。科研管理部门通过对新职工开展入职教育和年度常规伦理培训，强调在开展科研活动前必须递交伦理材料，并经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才能开展研究，加强医务人员对科研伦理的认识。医务部门通过对全院医护人员开展常规的医疗培训，要求其在临床诊疗活动中充分与家属沟通诊疗方案并征得其同意，加深医务人员对临床伦理的认识。同时，医院可以通过组织召开伦理专题研讨会、举办伦理知识竞赛等，激发医务人员主动参与学习伦理知识的热情。医疗行风部门还可以对违反伦理原则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临床和科研事件进行具体案例分析，加深医务人员在不同情形下可能产生的伦理风险的分析判断能力。

（三）强化对患者的隐私保护

为了避免患者隐私泄露，医院还应进一步加强对患者隐私的管理，建立完善的患者隐私保护制度，并对可能涉及的泄露患者隐私的行为采取惩罚措施。在临床诊疗活动中，医院应为医务人员设置独立诊室，并要求就诊过程中其他无关人员不得随意出入诊室，就诊结束后医务人员不得随意同他人讨论患者病情等。在患者样本管理过程中，医院应制定严格的样本采集、存储和使用制度及工作流程。例如，采集前医务人员应明确告知患者所采集样本的种类及可能的用途并征得患者同意，存储时应对患者信息进行脱敏和加密处理，使用时相关人员应履行严格的备案审批手续。医疗行风部门还应定期收集并分析泄露患者隐私的案例，并在全院通报批评，计入医务人员年终考核和职称晋升，随时提醒并警示医务人员保护患者隐私的意识。

（四）组建新技术伦理评审委员会

为有效应对医疗新技术可能产生的伦理风险和医疗纠纷，医院应组建专门的新技术伦理评审委员会，并在卫生行政部门的指导下，根据新技术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工作流程和评审标准，对医院开展的新技术进行全面、系统评估。另外，新技术伦理评审委员会成员还应积极参加国内外举办的伦理会议和行业大会，主动查阅文献了解国内外研究进展以及新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伦理风险和医疗风险，以便其在进行伦理审批时作出综合判断。

五、结语

医疗新技术应用和医学科技创新是医院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完善的伦理治理是开展这些活动的前提和保障。构建与医学科技高质量发展相契合的伦理治理机制，是顺应新时代医学科技进步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归纳总结国内外伦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医院应完善伦理审查机制、加强医务人员伦理教育、强化对患者的隐私保护、组建新技术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建议。在临床诊疗和科学研究中，医院应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严格遵守伦理准则，持续加强伦理审查能力，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梦强，李媛媛，陈小莹，等．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医学科技伦理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J]. 中国医疗管理科学，2023, 13(06): 8−13.

[2] 蔡雨廷，徐玉梅．科技伦理治理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作用研究 [J]. 中国医学伦理学，2023, 36(09): 1012−1016.

[3] 杜盼盼，徐嘉．科技伦理治理中的全过程审查机制构建 [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23(01): 47−55.

[4] 郝凯冰．基于三维框架的我国科技伦理治理政策分析 [J]. 科学学研究，2024, 42(11): 2241−2253, 2285.

[5] 王飞．德国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体系架构、工作机制及经验分析 [J]. 中国科学基金，2023, 37(03): 403−409.

[6] 吴梦强．伦理治理与医学科技高质量发展契合性分析 [J]. 现代医院，2023, 23(12): 1836−1839.

[7] 王小理．试论我国生物科技伦理治理现代化的问题和策略 [J]. 科学通报，2024, 69(13): 1681−1685.

[8] 李振良，蒋辉，李红英．医学伦理学对科技伦理治理的贡献与新作为 [J]. 中国医学伦理学，2024, 37(01): 25−31.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科研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青年文化自信路径探析

范蓉蓉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青年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本文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青年文化自信的路径，首先剖析了当前青年文化自信培育中的现存问题，包括对传统文化认知表层化、多元文化冲击下的认同紊乱、文化传播形式创新不足及主动自觉性欠缺；进而探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青年文化自信的内在联系，即前者为后者提供根基、支撑认同、滋养素养、赋予智慧；最终提出具体路径：例如融入学校教育以奠定认知基础、借助新媒体创新传播手段、构建实践平台以提升参与度、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研究旨在为强化青年文化自信、助力民族文化传承与国家文化复兴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青年；文化自信；路径

在文化多元化交织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青年是传承、创新文化的核心力量，其文化自信与构建个体精神世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联系密切。积淀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为青年文化自信奠定根基，但青年文化自信培育存在一系列现实问题，例如认知表层化、认同紊乱、文化传播形式创新不足等[1-2]。本文对青年文化自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意义及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入剖析，探究出了核心路径，为青年文化自信教育筑基、传播与发展改革、实践赋能提供借鉴，以加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进程，为民族文化复兴注入新动力。

一、青年文化自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意义

青年群体对国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不仅与个体精神世界建构存在联系，且与民族文化基因延续、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密切相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有利于青年文化自信生成，且可涵养其文化认同感。因此，深入探究两者内涵及意义，对明确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青年文化自信的有效路径具有重要意义[3]。

（一）青年文化自信的内涵及意义

青年群体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精神特质、历史特征、发展脉络、时代价值为树立青年文化自信的基础，在上述基础上青年可由衷认同民族文化，形成积极践行、信念坚定的精神状态，不仅对民族文化优越性与独特性有充足的肯定，且对待异质文化有包容心态并保持理性立场，对民族文化自觉、主动创新传承[4]。从意义层面分析，青年文化自信可协助自身树立正确“三观”，帮助其抵御复杂文化环境中的不良思潮，文化自信强弱与民族文化传承活力与创新力密切相关，坚定的文化自信可推动国家文化复兴进程，强化青年历史使命感与奋斗动力以及民族自豪感。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意义

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合诸子百家智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历史底蕴深厚且民族特色鲜明，包含文学艺术、道德伦理、哲学思想等多个领域，精神理念涵盖“天人合一”等，具象形态涵盖书画、诗词等，民族精神涵盖爱国、团结、奋斗等[5]。从意义层面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为民族生存、发展提供凝聚力，为当代社会治理提供智慧借鉴，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中国方案，同时助力个体修养提升。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环节。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青年文化自信的内在联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系着青年文化自信，其作为民族发展的精神命脉，包含的智慧、精神以及素养，可为青年文化自信奠定根基，是青年文化自信培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6]。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青年文化自信的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先秦的诸子百家思想争鸣到汉唐的文化交融，再到宋明理学的深刻探索，最终到明清的实用科技创新，历经了千年的沉淀，其间汇集了长期实践获得的政治理念、生存智慧，包括“民为

邦本”“自强不息”“中庸和谐”等，上述理念、智慧等共同组成了深厚的青年文化自信根基[7]。上述根基具体作用在青年认识自身文化身份、了解历史坐标中均有体现，可使青年在追溯文明起源、整理文化发展脉络过程中明确以下根本问题：“我是谁”，“来自何处”，使得本民族文化情感依恋与基本认同在多元价值碰撞与西方文化强势输出的浪潮中仍得到保持，避免其陷入精神迷茫当中。

（二）蕴含的民族精神提升了青年人文化认同感

爱国主义、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团结统一等作为典型的民族精神，其感召力、凝聚力均较为强大，利于提升青年人文化认同感，当青年阅读历史典籍或革命故事后可感受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以及团结奋斗的力量，当面对实际生活中勤劳、坚韧的劳动人民时可从内心深处产生情感共鸣，当上述情感共鸣不断积累便可强烈认同对团结、坚韧、勤劳等精神具有承载作用的民族文化，在对比其他文化后仍可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价值与优势。

（三）为青年个人素养提升与人格塑造提供文化滋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规范为“仁义礼智信”，理想追求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行为准则为“温良恭俭让”，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为青年塑造人格与提升个人素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滋养。在传统文化学习期间自身理念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在道德方面，懂得信守承诺；在行为方面，严于律己、谦逊有礼；在理想方面，树立远大的抱负，使得自身素养由内而外得到提升，在社会交往中具备完善人格的青年呈现了良好风貌，从而强化了因自身文化浸润而形成的自信。

（四）为青年面对现实挑战提供文化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和而不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大量处理现实问题的智慧，上述智慧不仅可帮助青年全方位地看待人生的顺境与逆境，帮助其处理人际关系，突破学业、就业困境并最终妥善解决问题，且可使青年在解决问题后明确文化智慧的价值，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随之增强。

三、青年文化自信培育的现存问题

当前青年因对文化认知存在一定偏差加之自身实践不足以及外部环境影响，在文化自信培育中易出现较多现实问题，若不及时破解，则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青年群体文化自信造成阻碍。

（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深层次认知

青年群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多停留在传统习俗、经典名句等碎片化的符号记忆层面，无法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端午吃粽子、春节贴春联等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这种表层认知导致其对贯穿于文化体系中的历史发展逻辑、精神内核并无精准把握，且对当代社会中的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价值难以理解，最终造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文化认知问题，无法从文化根源构建坚定的价值确信以及稳定的情感认同，经受不同文化浪潮冲击后易通过表象对各种文化优劣进行评估。

（二）多元文化冲击造成认同混乱

全球化过程中，社交媒体、游戏、影视等互联网载体使各类异质文化快速渗透到青年生活当中，青年群体因文化鉴别能力尚未完全成熟，在极端个人主义、过度强调的消费主义等西方流行文化影响下产生了不良思想，致使拜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网络亚文化被广泛传播，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界限逐渐模糊，最终导致外来文化新潮观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碰撞，部分青年陷入认同困境当中，不仅无法正常认识到外来文化的优劣，且无法坚定本民族文化立场，最终导致其文化认同呈现混乱状态[8]。

（三）文化传播形式缺乏吸引力与创新性

现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采用单向度信息输出与说教式灌输的形式传播，例如，中小学教材中多以文字叙述的形式呈现传统文化内容，互动设计与生动案例均较为缺乏，而高校则多通过“你讲我听”的文化讲座形式宣传传统文化，无法与青年群体互动化、场景化、视觉化等认知习惯相结合，虽然部分高校文化传播采用新媒体技术推动，但因对流量过度追捧，使得严肃的历史文化变为搞笑段子，陷入娱乐化误区，此外，VR 等新技术的生硬运用缺乏深度体验，导致文化传播后青年内心并不明显感触，难以主动了解、探究文化的深层内涵。

（四）文化主动传承自觉性不足

被动接受的文化传承过程致使青年难以自觉将获取知识转变为实际实践，例如，部分学校组织的传统文化体验与学分相挂钩，学生为获取学分而被动参与到活动当中，因此活动期间难以主动探索其乐趣[9]。多数青年在日常生活处理人际关系中，很少运用处世智慧，如“和而不同”；在学业与工作当中也很少应用工匠精神，如“精益求精”。上述文化实践的缺失不仅导致文化传承链条出现断裂，且使青年难以感知与认同自身体验到的文化价值，故无法将自身行为与文化精神相融合，最终造成文化自信丧失实践根基。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青年文化自信的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通过系统性文化路径将文化精髓变为精神力量，以此构筑青年文化自信，教育筑基、传播与发展改革、实践赋能等路径可让青年认识、体验、参与文化实践，从而深度感知文化价值，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让青年成长路上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10-11]。

（一）在学校教育体系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认知基础

学校应分层次、系统化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不同阶段的学校教育课程体系当中，中小学阶段，《孟子》《论语》等经典篇章可纳入到语文教学当中，实际教学中可配以现实案例与生动插画，以提升学生对“仁”“礼”内涵的理解深度，将历史事件、考古发现与历史课程结合，对传统节日形成、汉字演变等进行深度解析，将合理、科学的古代家训融入道德与法治课程，鼓励学生践行传统美德；在高中及大学阶段，除了传统文化通识课，还可将现代伦理与传统智慧融合，将当代艺术与传统书画结合。同时，可通过文化研修班强化教师团队对文化内涵的理解，通过文化实践课、课堂讲解等多种形式使青年系统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文化自信基础。

（二）借助新媒体创新文化传播载体与形式，增强青年文化体验

新媒体技术具备互动性强、传播高效、内容丰富等优势，因此文化传播中可充分利用该技术，例如，打造“传统文化微课堂”短视频账号；将“卧薪尝胆”“愚公移山”等典故结合适合青年语境的讲解后采用 3D 动画播放；研发具备“文化闯关”环节的互动式文化 App，青年可通过回答诗词典故、传统习俗等问题解锁关卡，同时为提升趣味性可采用 PK 答题模式；敦煌、故宫等文化遗址采用 VR 技术呈现，青年佩戴设备后可沉浸式感受到石窟建造、古代建筑的魅力与文化氛围。此外，还可邀请青年喜爱的艺人、科普博主结合流行话题等在直播中展示刺绣、剪纸等非遗技艺创作方法，使青年明确其中的文化内涵，在轻松、愉快、交互的氛围中提升青年积极性，增强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

（三）构建文化实践与传承平台，提升青年文化创造积极性

高校校园内可设立与汉服、戏曲等相关的传统文化社团。例如，汉服社团成员可结合现代审美改良传统款式并定期举行汉服设计比赛；戏曲社团成员可将现代音乐元素与昆曲、京剧等传统戏曲相融合，改编出青年喜欢的新曲目。同时，可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博物馆、社区合作，搭建文化传承平台，定期举行碑刻拓印、古籍整理等活动，帮助社区策划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节日活动，使青年在实践中深入了解文化传承的详细过程。举办包含产品研发、短视频创作、平面设计等在内的多赛道的青年传统文化创意大赛，鼓励青年将现代产品、广告创造与书法字体、龙凤纹样等传统文化相融合，展览、推广优秀作品。通过以上多种平台可将青年由被动接受文化转变为主动创造文化，自身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及传承热情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升，文化自信随之增强。

（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阐述应与现阶段青年认知特点及当代社会发展需求密切结合，例如将共同富裕的时代理念与“大同思想”结合，两者均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将生态智慧、生态文明建设与“天人合一”思想相联系，两者均可指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保留的基础上可对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创新，例如“梁祝”故事经舞蹈编排后以肢体语言形式呈现，古诗词经词曲编排后以歌曲形式呈现，使传统文化更加鲜活。将文化与设计、旅游等融合，例如当地具有显著特色的文化产品通过 3D 打印技术进行复刻，文化旅游线路中可设立互动体验、沉浸式演出等环节，使青年游客在旅游期间感知到文化魅力。以上创新手段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出强大的时代活力，青年在了解到文化的生命力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与自豪感随之增强。

参考文献

[1] 王诗涵，叶丽．新时代培育青年文化自信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路径探究 [J]. 现代商贸工业，2025(03): 173-176.

[2] 沈胜林，张心，陈中文．新时代坚定青年大学生文化自信：现实意义、基本内涵及实现路径 [J]. 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23, 43(02): 1-7.

[3] 李诚诚，夏维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青年文化自信论析——基于青年国风热现象的思考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16): 36-39.

[4] 王涵．艺术学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校传承机制与青年文化自信培育路径研究 [J]. 东方陶瓷，2024(06): 121-123.

[5] 徐哲．文化自信视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语文课程的路径研究 [J]. 现代职业教育，2024(23): 5-8.

[6] 龙波宇．青年亚文化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媒体传播策略分析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 7(31): 56-60.

[7] 张翠方．“文化自信”视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意义和策略 [J]. 西部素质教育，2023, 9(19): 49-52.

[8] 任利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互动关系的文化溯源 [J]. 理论学刊，2025(01): 162-168.

[9] 宋佳琪，陕志强，宫玮．从教育层面解读高校青年如何在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树立文化自信 [J]. 才智，2024(03): 153-156.

[10] 张珠琴．文化自信视域下初中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研究 [J]. 教师，2024(26): 42-44.

[11] 吴丹．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路径研究 [J]. 中国民族博览，2024（下转 148 页）

近七年国内公共托育服务研究综述
——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分析

蔡联华

摘要：以中国知网（CNKI）近七年相关文献为样本，借助 CiteSpace 进行计量与可视化分析，梳理国内公共托育服务研究的演进脉络与热点议题。结果显示，该领域的学术关注度持续走高，研究焦点主要围绕托育服务供给与模式、婴幼儿照护、托育机构治理与质量、生育政策衔接等主题展开。未来研究方向应关注提升公共托育服务质量与标准、明晰政府在公共托育中的角色和责任，以及应对三孩政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关键词：公共托育服务；CiteSpace；研究趋势；可视化分析

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与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时间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双重短缺使得家庭照料功能弱化趋势明显。儿童照料赤字已发展为一个全球性问题，父母无法为儿童提供所需的照料资源成为现代家庭的一个普遍现象[1]。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2019 年回顾先进国家的研究报告指出，高质量和可得的公共托育服务，尤其针对 3 岁以下儿童，对支持工作家庭实现工作—育儿平衡、促进儿童早期发展至关重要，也是推动双职工家庭作出生育选择的关键政策工具[2]。我国公共托育服务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通过单位制积极介入公共托育服务，使其一度达到较高的覆盖率，然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国家在托育服务领域的责任弱化、市场等主体参与到公共服务中来，公共托幼体系瓦解、公共托育机构持续萎缩。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0~3 岁儿童公共托育服务的议题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多部门共同参与的 0~3 岁儿童公共托育服务也逐渐得到了社会的共识[3]。基于此，通过梳理近七年国内公共托育服务的研究与实践，我们期望能够清晰地描绘出近七年来我国公共托育服务的发展历程和研究脉络，进一步捕捉到该领域的前沿热点和路径演变，为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工具和数据来源

使用 CiteSpace6.4.R1 软件（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团队开发与维护）进行可视化分析[4]。研究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来源，主题为“公共托育服务”，检索范围从 2017 年 1 月 1 日到 2023 年 9 月 18 日，共检索出 387 篇相关文献，经相关性筛选后，最终确定 332 篇文献作为研究样本，其类型主要为学术期刊和硕士论文。

二、研究结果分析

（一）文献的时间发布与发文比例

发文数量的时间变化是衡量某一研究领域发展态势的重要指标[5]。如图 1 所示，2017 至 2023 年间，中国知网数据显示“公共托育服务”主题研究论文数量逐年增加，尤其是在 2019 年之后，增长更为显著，2022 年达到 94 篇的峰值。这一趋势与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6] 以及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显示该领域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需注意 2023 年的数据尚未完全更新，初步迹象显示发文数量可能有所下降。

（上接 147 页）(02): 81−8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南通市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地位、科学内涵、实践要求研究”（2024CNT006）。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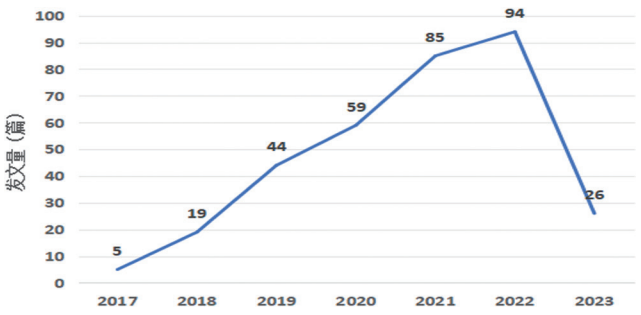


图 1 “公共托育服务”发文量年度趋势图

（二）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对一篇文献主题的高度概括与凝练，关键词频次反映了该主题在文献中的出现次数，而关键词的中心度则表示该主题在整个研究网络中的重要性和核心地位[7]。基于关键词共现图（见图 2）与高频关键词及高频中心度关键词分析（见表 1），可以较清晰地勾勒出本领域的知识结构与议题重心。从整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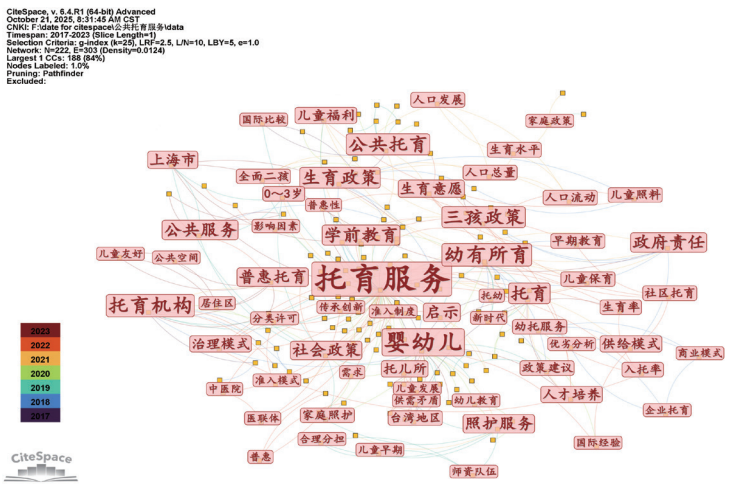


图 2 公共托育服务关键词共现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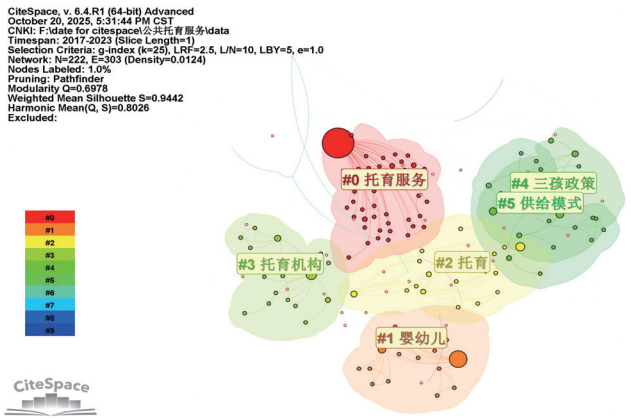


图 3 公共托育服务关键词聚类图谱

表 1 高频关键词及高频中心度关键词

高频关键词		高中心度关键词	
关键词名称	频次	关键词名称	中心度
托育服务	199	托育服务	1.1
婴幼儿	57	婴幼儿	0.35
托育机构	18	托育机构	0.18
幼有所育	12	生育政策	0.16
生育政策	11	公共托育	0.11
三孩政策	10	供给模式	0.09
照护服务	10	幼有所育	0.08
学前教育	9	三孩政策	0.07
公共托育	9	学前教育	0.07
公共服务	8	照护服务	0.06

看，“托育服务”（频次 199，中心度 1.1）既是研究的高频主题，也是连接不同议题群落的桥梁性节点。围绕核心节点，聚集出“婴幼儿”（频次 57，中心度 0.35）、“托育机构”（频次 18，中心度 0.18）、“生育政策”（频次 11，中心度 0.16）、“公共托育”（频次 9，中心度 0.11）与“供给模式”（中心度 0.09）等关键支点，构成研究热点的基本骨架。

1. 政策驱动的议题升温

“生育政策”（频次 11，中心度 0.16）、“三孩政策”（频次 10，中心度 0.07）与“政府责任”“社会政策”同处密集连线区，说明近七年研究明显受政策议程牵引，关注政策—供给—需求之间的传导链条，一方面探讨生育支持政策如何通过财政投入、准入与监管影响托位供给；另一方面检视政策对家庭照护负担、女性就业与儿童福利的实际效应。关键词“幼有所育”（频次 12，中心度 0.08）与“公共服务”（频次 8）关联紧密，反映研究已由“有没有”走向“提质量”的公共服务取向。

2. 供给体系与治理模式

“托育机构”（频次 18，中心度 0.18）与“供给模式”（中心度 0.09）构成供给侧讨论的中心。图谱中“普惠托育”“治理模式”“政府责任”相互连通，显示研究聚焦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供给格局，公办、民办与公建民营的组合；社区托育点、小规模中心与综合园的结构优化；财政补贴、税费减免、普惠价格与入托补贴等政策工具的比较效果。从中心度与连线看，“公共托育”（频次 9，中心度 0.11）在网络中承担跨群落的连接功能，提示研究正从单一机构层面上升为“政策—治理—机构—家庭”的系统性讨论。

3. 服务对象与服务内容

以“婴幼儿”（频次 57，中心度 0.35）为轴心，相关节点指向“照护服务”（频次 10，中心度 0.06）、“儿童福利”等主题，关注点从“入托率、托位数”逐步拓展至“保育质量、发展适宜性与家庭支持”。关键词“启示”“人才培养”的出现，说明研究亦在借鉴国际经验并关注托育人力的专业化建设。

（三）研究领域

基于聚类图谱（见图 3）与聚类主题词清单（见表 2），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呈现出 6 个相对清晰的板块。网络模块度 Q 接近 0.70、平均轮廓系数 S 约 0.94，聚类质量较高，可据此勾勒清晰的研究版图。

表 2 聚类主题词（LLR）

聚类	主题词
托育服务	托育服务；照护服务；婴幼儿；生育政策；0~3 岁婴幼儿
婴幼儿	婴幼儿；照护服务；供需矛盾；幼儿教育；标准规范
托育	托育；启示；政策建议；幼有所育；德国
托育机构	托育机构；普惠托育；儿童活动空间；建设压力；父母
三孩政策	三孩政策；生育意愿；人才培养；契机；专业建设
供给模式	供给模式；政府责任；幼托服务；国家角色；商业模式

聚类 #0“托育服务”，围绕“托育服务、照护服务、0~3 岁婴幼儿、生育政策”等主题词，聚焦 0~3 岁照护被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后的制度化进程。研究从公共性与政府职责入手，讨论托育与儿童福利、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的关系。

聚类 #1“婴幼儿”，围绕“婴幼儿、供需矛盾、幼儿教育、标准规范”等主题词，将目光拉回服务对象本身。研究围绕儿童早期发展展开，强调标准规范与质量评价工具的本土化。与此同时，研究用家庭视角检视供需错配，价格可负担性、空间可及性与家长偏好成为解释入托行为的关键变量，祖辈照护与正式服务之间的替代与互补关系被反复讨论。

聚类 #2“托育”，以“托育、启示、政策建议、幼有所育、国际比较（德国）”为主题词，聚焦“怎样建设一套可持续的托育制度”。学者多以德国等国家为参照，从普惠供给、质量监管到家庭支持的制度安排中提炼可借鉴之处，并结合我国财政体制、人口结构与社会治理特点提出本土化改造方案。

聚类 #3“托育机构”，围绕“托育机构、普惠托育、儿童活动空间、建设压力、父母”等主题词，切入微观层面的运行机制。研究集中在准入与监管、空间与安全标准、人员配置与职业资格、收费与补贴规则、家园协同与家长满意度等议题。

聚类 #4“三孩政策”，体现了政策驱动的鲜明色彩。研究评估三孩政策对家庭生育决策与女性就业的影响，认为可负担、可及且有质量保障的托育是“敢生、愿生、会养”的关键支点，同时延伸至托育人才培养与专业学科建设。

聚类 #5“供给模式”，围绕谁来供、怎样供展开。研究梳理公办、民办、公建民营、社区等多元格局，比较财政补贴、普惠价格、税费减免与入托补贴等政策工具的组合效果，评估社会组织与企业参与的边界与激励。

上述六大板块共同勾勒出国内公共托育服务研究的基本版图：以政策驱动为起点，围绕供给模式和机构质量展开，回到“婴幼儿—家庭”的需求侧检验，形成从制度设计到实施评价的闭环。

（四）研究趋势

结合突现词列表（见图 4）与时区图（见图 5），2017—2023 年的研究呈现出由政策倡议到制度落地、再到质量治理与社区嵌入的递进轨迹，核心议题随国家生育政策与地方治理实践同步演化。

1. 探索起步期（2017—2018）

以“托育服务—婴幼儿”为核心词簇，地方实践与政策倡议并行。时区图时间线左端出现“托育机构、商业模式、企业托育、台湾地区”等标签，说明早期关注点集中在服务形态与可行路径上；突现词“南京市”“政策建议”印证了以城市为单位的试点与政策倡导性研究较为活跃，为后续制度化奠定了实践基础。

2. 体系构建期（2019—2021）

“公共托育”“家庭照护”“全面二孩”“供给”等词在 2019—2021 年集中爆发。研究开始围绕普惠托位扩张、供给结构优化与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展开，既讨论祖辈照护与机构照护的替代 / 互补，也评估财政工具，如补贴、价格管理、税费减免的效果与边界。

3. 深化优化期（2022—2023）

时区图右侧带明显聚拢“普惠托育”“社区托育”“准入制度”“分类许可”“公共空间”“儿童友好”等词项，“三孩政策”带动研究重心从“扩量”走向“提质与治理”，准入与监管规则逐步细化，社区嵌入式与综合托育点受到关注。突显词“儿童保育”提示儿童福利视角的介入在增强。

三、展望

（一）提升公共托育服务质量与标准

随着对早期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提高，提升公共托育服务的质量和标准成为紧迫任务。质量提升需要从“人、制、评、用”四个环节同步发力。人员方面，完善岗位资质与胜任力框架，推进岗前与在岗一体化培训，强化保教合一、卫生保健与家园沟通等核心能力。制度方面，细化托位配置、师幼比、安全与环境指标，建立不同类型机构的分级标准与达标路径。评价方面，构建过程—结果并重的质量监测体系，拓展第三方评估与家长满意度反馈。应用方面，通过追踪研究检验质量提升对儿童发展与家庭福祉的长期效果，并据此优化资源投入与政策工具。



图 4 公共托育服务关键词突现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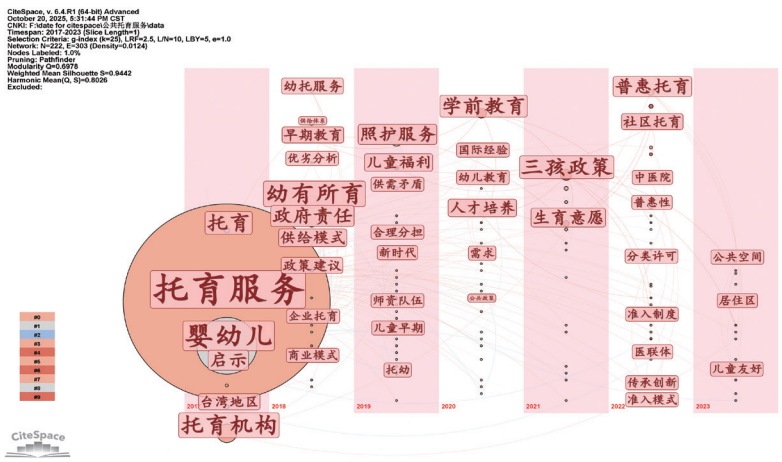


图 5 时区图

（二）明晰政府在公共托育中的角色和责任

建议从“责任边界—财政机制—协同治理”三条线推进。责任边界上，明确政府在兜底供给、标准制定、准入与监管中的职责，厘清与市场、社会组织的分工。财政机制上，完善按人头、按服务质量与绩效结果相结合的补助方式。协同治理上，健全教育、卫健、民政、住建等部门的协同规则与信息共享，鼓励政府购买服务与公办民营模式，完善问责与激励并举的监管体系，并推动托育服务纳入儿童友好城市与基层治理评价。

（三）响应三孩政策的挑战与机遇

以动态供给管理应对结构性变化。短期关注托位缺口测算、重点城区与新型社区的设施配置、人力补给与岗位吸引；中期推进普惠托位扩容与质量守底，发展弹性与时段型托育、家庭托育点与单位互助托育等多样模式；长期评估政策对女性就业、生育成本与代际公平的影响，设计差异化资助与税收优惠，完善生育—托育—就业政策协同。

参考文献

[1] 吴帆，牛劭君．儿童照料背后的逻辑与博弈：三个理论视阈的诠释 [J]. 山东社会科学，2019(10): 79-85.

[2] 应对低生育率的政策：有效性如何？ [DB/OL].(2022-11-22)[2025-10-23]. https://china.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wp1_ying_dui_di_sheng_yu_lu_de_zheng_ce_.pdf.

[3] 华怡佼．我国“二孩政策”下 0~3 岁儿童公共托育服务供给体系研究——以上海为例 [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8.

[4] 田芬，王祯怡．国际人工智能教育研究的基本图景及热点分析 [J]. 甘肃开放大学学报，2025, 35(02): 64-70.

[5] 康丹，郭炀炀，唐醇，等．近十年我国学前教育研究热点的知识图谱——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J]. 教育与教学研究，2020, 34(06): 16-24.

[6] 冯哲毓，唐超，易鑫．婴幼儿亲子课程有效教学的影响因素——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 [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21(07): 2-6.

[7] 陈悦，陈超美，胡志刚，等．引文空间分析原理与应用 (CiteSpace 实用指南)[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7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浙江开放大学“312 人才培养工程”资助；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儿童早期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 2025 年度课题“数字化时代下温州市 xx 幼儿园家园社共育模式的创新研究”；2024 年温州开放大学教学改革项目“混合式教学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中的应用与成效评估”（2024SKG05）。

（作者系温州开放大学讲师）



生态系统理论下社会工作介入孤独症青少年教育支持研究

陈一丰

摘要：本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探讨社会工作介入孤独症青少年教育支持的方式。本研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分析孤独症青少年教育支持现状与问题，从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系统和宏观系统提出具体而深刻的介入方式，为改善孤独症青少年教育支持提供有力依据，促进多系统融合的教育支持模式不断完善。

关键词：生态系统理论；社会工作；孤独症青少年；教育支持

我国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平衡，城乡、区域、学校之间教育资源差异显著，资源配置和教学模式难以满足孤独症青少年的教育需求，多系统联合的教育模式不够健全。对于这些生活处境和生长环境导致的困境儿童，应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解决其问题是一条可行的路径[1]。本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探讨社会工作介入方式，化解孤独症青少年教育的困境。

一、孤独症相关概念与生态系统理论基础

孤独症又称自闭症、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孤独症青少年指12~18岁的孤独症患者，该阶段孤独症患者面临着生长、生理、认知、社交、情绪调控等方面的问题。教育体系包括特殊教育课程、教育者、教学设施、行为干预、社交技巧等，孤独症青少年需要通过教育来学习。

社会互动是指社会上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信息的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的社会交往活动[2]。生态系统理论，将个体的发展环境划分为4个系统进行阐述。微观系统是个体直接生活的环境，如个体的家庭、学校等。中观系统是一个微观系统与另一个微观系统之间的联系。外系统是指那些不直接包含个体的环境，如政府政策。宏观系统是指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社会价值等宏观环境。社会工作实务中，该理论能促使社会工作者从多系统角度思考问题，有助于社会工作者构建孤独症青少年介入体系，有利于资源的利用，实现各系统的良性互动。

二、孤独症青少年教育支持现状调查

（一）调查设计

为保证样本代表性，本次调查共选取80名研究对象，具体包括：50名孤独症青少年及其监护人（涵盖城乡不同安置类型，且该类型下的孤独症青少年及其监护人各10名）、20名教育人员、10名社工。其中，教育人员与社工同样兼顾城乡不同安置类型关联场景，确保样本覆盖的全面性。采用问卷调查法，为不同对象设计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基本情况、教育现状、遇到的主要问题和需求等。并结合深度访谈、对青少年在教育机构的表现观察，力求多视角获取资料，保证信度和效度。

（二）调查结果分析

本调查共访问50名孤独症青少年，其中男性40人，女性10人；年龄范围12~18岁，每组25人；病情程度轻15例、中25例、重10例。教育安置情况45人暂接受正规教育；其余5人未接受正规教育。教育方法：采用行为干预和认知训练等方法，缺乏个性化的教育。对于教育资源的使用和分配而言，城乡差距明显。农村地区特殊教育学校数量仅为城市学校的1/5，80%的农村特殊教育学校没有行为干预教师。以中西部某县为例，全县只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接纳全县70名孤独症未成年人，教师与学生的比例高达1∶14，而根据国家要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与学生的比例最高为1∶3，最低为1∶6。城市普通学校中，随班就读的孤独症未成年人中，62%的学校没有资源教室，68%的教师从没接受过特殊教育方面的专业培训，这导致孤独症未成年人所在班级的课程调整能力很低。其他问题：缺乏其他教育资源、家长和学校的合作不足、社会支持不足等。缺乏其他社会资源是指只有6%的家庭曾获得社会组织的服务，服务内容多为物质支援，只有不足三成（31%）的家庭曾获得社会组织的服务，很少有组织能够提供持续性的支持。孤独症未成年人自身及其家庭的主要服务需求为配备专业教师、制定

和实施个性化的教育计划、提供心理上的辅导或治疗、增加与其他儿童交往的机会。家庭和青少年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专业师资配备、个性化教育方案制定、心理辅导服务和增加社交机会等方面。

三、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问题剖析——以晓妍为例

晓妍（化名），女，14岁，孤独症患者，家庭照顾和支持较少，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也没有受到学校方面的特别关照。

（一）微观系统问题

在微观系统层面，晓妍是孤独症患者，其父母忙于工作，对她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每天父母早出晚归，晚上回到家基本处于休息状态，很少有时间和她沟通。家庭的教养方式也十分简单粗暴，每当她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时，父母的反应也十分简单，只是简单地告诉她不许这样子或者是制止她的行为，而不会探究她为什么会这样做，以及给她适当的引导。家庭对她来说几乎没有适当的支持，也没有对她进行有效的引导。比如她遇到学习困难时，她不知道该找谁来帮忙，久而久之，她害怕学习，一提起学习就反感。

在学校方面，虽然晓妍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但是老师并没有给予她特别的关注，她的班级老师每天都要面对大量的学生，又缺乏特殊儿童的相关知识和教育经验，所以无法针对晓妍的特点，量身制定教学计划。晓妍在课堂上因为无法理解老师讲授的内容而经常处于茫然和焦虑的状态，但是老师没有时间和精力注意到她，同学也经常误解她的奇怪行为，不愿意跟她玩耍，她在学校感到孤独无助。这些都影响了她的学习以及心理健康。

（二）中观系统问题

在中观系统层面，晓妍所在学校与家庭之间几乎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渠道。晓妍所在的学校并不了解晓妍在家是怎么样的，晓妍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家庭环境对她的哪些方面有影响等。家庭也不了解学校为晓妍制定的教育计划，家庭无法予以配合和支持。比如，学校为了培养晓妍某方面的能力，组织了一些小组活动，但是因为没有及时和家长沟通，家长并不知道该怎样在家庭中配合老师开展这些小组活动，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学校也没有与社区资源建立联系，形成合作。这些社区资源可以为孤独症青少年的教育提供有效支持，比如社区内的社区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志愿者团队等。学校没有和这些社区资源建立联系、沟通合作，结果是晓妍在课外、拓展方面的活动和机会极其缺乏，社交的机会也极其缺乏，她无法在一个更大的环境中锻炼自己。

（三）外系统问题

从外系统层面分析，政府用于残疾人康复和预防工作的经费预算较少，多采取临时性的扶助和救济措施，福利保障程度低[3]。特殊教育学校缺少资金，无法购置特殊教育学校教学设备、特殊教育教材及参加特殊教育教师培训等，缺少资金是特殊教育学校目前最大的问题，导致特殊教育学校教学设施非常落后，不能够满足特殊儿童的教育需要。特殊教育师资培训项目缺少，或进行的特殊教育师资培训内容和方式不切实际，与特殊教育教学需求脱钩，导致特殊教育师资能力提升缓慢，不能满足孤独症未成年人的教育需求。相关举措不到位。尽管有许多关于特殊教育的政策措施，但是在这些政策措施实施的时候，因为没有相关部门去监督和评估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导致很多政策措施不能够惠及孤独症未成年人。有些关于让孤独症未成年人享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的政策措施，学校及相关单位对这些政策措施的理解和执行有差距，很多孤独症未成年人还面临着上学难的问题。近年来，社会工作领域也出了许多对孤独症未成年人进行介入的案例，社会工作领域的介入为孤独症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了宝贵的补充和支持[4]，但与学校、家庭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许多社会组织在开展孤独症相关的公益活动时，往往是各自为政，没有与学校和家庭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作，导致资源浪费，无法针对具体情况提供精准、有效的帮助。例如，一些社会组织为孤独症青少年捐赠了学习用品，但由于没有了解学校和家庭的实际需求，捐赠的物品可能并不适用，无法真正发挥作用。

（四）宏观系统问题

在宏观系统层面，社会大众对孤独症的认知普遍不足，存在诸多偏见和误解。人们对孤独症缺乏了解，很多人的观念比较落后，存在许多偏见和歧视。有些人认为孤独症患者是“怪人”，对他们带有歧视和排斥。这种社会偏见造成孤独症青少年在社会融合的过程中，受到很大的心理压力，以及接受教育和参与各项社会活动的阻碍。比如，在一些社会活动中，孤独症青少年可能会因为“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而不参加，这对他们心理和行为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相关法律的缺失，如对教育机构接收孤独症学生，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缺乏具体的法律规范和约束；对教育机构拒收孤独症学生，或接收后拒绝提供教育支持和服务的行为，缺乏有效的法律制约和保障；对孤独症学生因受教育权被侵犯而产生的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缺乏相应的法律救助。一些教育机构对孤独症学生存在推诿、拒收的情况，或者接收后不予教育和提供相应的服务支持的现象。还有家长在面对孤独症学生受教育权被侵犯的情况时，难以通过法律来维护孩子的权益。

四、社会工作介入的实践策略

（一）微观系统介入策略

针对晓妍的问题，社会工作者计划每周见她一次，

开展一次个案辅导，采用游戏治疗和认知行为治疗等方法。本次采用游戏治疗。社会工作者采用晓妍喜欢的游戏方式，为她提供了乐高积木搭建和角色扮演两种游戏方式。晓妍选择了搭建乐高积木。社会工作者和晓妍一起用搭建积木游戏，增强其与人互动的机会，锻炼其沟通技巧；和晓妍一起进行角色扮演游戏，模拟生活中的场景，如去超市、医院等，让晓妍在角色扮演中练习与人交流，表达自己的需求。

认知行为疗法方面，社会工作者帮助晓妍识别和改变负面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例如，当晓妍在学习遇到困难时，表现出焦虑，觉得自己“很笨”“学不会”时，社会工作者通过引导让她明白她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帮助晓妍分析她学习困难的原因，引导她找出解决的方法，一步一步地给她一些暗示，让她对自己建立信心。同时，为晓妍的父母开展家庭辅导服务，家长积极配合社会工作者介入帮助[5]。社会工作者定期上门与父母进行沟通，帮助他们了解孤独症的相关知识和晓妍的行为特点，引导他们转变教养方式。鼓励父母增加与晓妍的沟通互动频率，每天安排专门的时间与晓妍一起做游戏、聊天，增进亲子关系。

定期开展家长培训，邀请孤独症领域知名专家到中心讲授孤独症病因、症状、发展规律和教育方法，讲授家长需要掌握的科学教育方法，如行为塑造、正向强化等。由于孤独症未成年人家长在照顾孤独症未成年人的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会感到身心疲惫，因此家长培训课程中还包括讲授家长放松技巧，如深呼吸放松法、冥想放松法等。

（二）中观系统介入策略

社会工作者积极联系晓妍学校老师和家长，每月定期开展家校会议，分享晓妍在学校、在家的表现情况，包括学习、行为、情绪等方面，开展充分的信息交流，大家群策群力为晓妍制定个性化的计划。例如，针对晓妍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老师和家长经过交流讨论后，分析原因可能是任务太难或者老师采用的授课方式不吸引晓妍，经过大家集思广益，制定相应的方法来克服这个问题，如任务难度太大适当降低难度，老师采用多种形式的授课方式来吸引晓妍的注意力，如多媒体授课、演示有实物等。同时，建立家校沟通信息反馈小组，以保证制定的个性化的计划得到有效落实，定期对计划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及时对计划进行调整。积极联系社区公共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争取每周为晓妍提供 2~3 次到这些场所参与活动的机会。组织志愿者每周为晓妍提供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和社交技巧训练，如每周一开展绘画小组活动，社会工作者组织引导晓妍及其他青少年在小组活动中进行交流和互动。

（三）外系统介入策略

社会工作者联合其他社会组织，每季度向政府部门提交建议书，要求制定相关政策并增加残疾人资金投入和残疾人教育师资的培训资金，并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跟进。例如，建议政府部门出资，开展系统、针对性的残疾人教育师资培训，推动“政府—高校—机构残疾人”教育师资三方培训合作，与地方师范类院校合作开设“残疾人教育专项培训”的学分课程，要求新任特殊教育教师接受学时培训并考核，包括残疾人教育最新研究成果、最新教育干预技术、残疾人教育个性化课程计划等内容，并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跟进。例如，定期回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家长，了解资金是否到位、培训是否开展，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向政府部门提交建议并协助解决。

（四）宏观系统介入策略

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教育活动。线上，在各网络平台发布孤独症相关知识的视频或文章，每月至少 3 次；线下，每季度开展一次讲座和公益活动，如开展“走进孤独症世界”主题活动，邀请专家演讲，组织志愿者与孤独症青少年互动等，以增加大众对孤独症的了解，消除偏见。

同时，推动相关法律制度的制定。社会工作者参与相关法律的立法调研，提出修订意见，以确认相关教育机构接受孤独症学生入学和教育的职责。

五、结语

本研究存在样本数量较少、研究时间短暂、样本只涉及部分地区和人群的缺点。未来的研究应当扩大样本规模，增加样本多样性，延长跟踪时间，加强不同系统之间互动作用机制的研究，完善和优化介入策略，加强不同系统间的合作，为孤独症青少年教育支持提供更加全面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助力孤独症青少年更好地融入社会。

参考文献

[1] 王旭 . 社会工作介入困境儿童问题改善研究 [J]. 社会与公益 , 2021, 12(04): 23-26.

[2] 郑杭生 . 社会学概论新修 [M]. 3 版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22: 124.

[3] 徐辉 , 王兴 . 社会工作介入自闭症领域的必要性和理论分析 [J], 社会与公益 , 2020(02): 15-17.

[4] 封慧颖 . 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的社会工作实务案例研究 [D],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 , 2025(04).

[5] 李梦鸽 . 社会工作介入提升自闭症儿童家庭生活质量的研究 [J]. 西部皮革 , 2018(02): 42-43.

（作者单位：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不良培训贷陷阱的风险识别与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何　珂 徐　陆 莫小娇

摘要：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攀升，大学生获取职业技能提升的需求旺盛，不良培训机构以“高薪就业”“0元入学”等噱头设下不良培训贷陷阱，通过隐蔽手段诱导学生借贷，形成涉及培训机构、金融机构、催债公司的“三角骗局”，导致学生陷入退费无门、高息负债及遭暴力催收等多重困境。本文基于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预警及主流媒体报道数据，采用文献研究法梳理不良培训贷乱象现状，剖析风险成因，通过跨学科分析（融合金融素养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构建动因解释框架；最终从学生、高校、多方协同层面提出风险防范与教育引导路径，为高校金融安全教育优化及校园金融环境治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大学生；不良培训贷；风险识别；金融安全教育；协同治理

近年来，关于不良培训贷困境的报道不在少数，据不完全统计，2022—2024年，国内主流媒体对培训贷调查报道近30篇。截至2025年8月，在黑猫投诉“投诉入口”平台上搜索“培训贷”，相关投诉有3.1万条，投诉的诉求多为“申请退款”“取消贷款”“解除合同”。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2023年发布的预警指出，不良培训贷骗局呈上升态势。

一、不良培训贷陷阱的现状与危害

（一）不良培训贷的现状分析

产生于教育消费场景下的培训贷，原是指受培训者由于培训资金短缺而向金融机构申请的教育分期类型的金融产品，到期按照合同规定还本付息。其初衷是针对有深造需求的年轻人解决短期内资金不足的问题，也是金融中介风险可控的创新[1]。然而现如今培训贷却成了一些培训机构以此套路学生贷款牟利，甚至实施诈骗行为的新手段。

《法治日报》（2023年8月）报道[2]，多名大学生曾被培训机构“高薪回报”的承诺诱导，不良培训机构以虚假招聘、学成享高薪为幌子，利用大学生金融知识匮乏、风险识别能力弱的特点，通过欺诈、误导等手段，诱导他们参加技能培训。当学生无力支付高额费用时，机构便让他们向金融机构申请培训贷款。一旦拿到培训费，机构或敷衍教学，或直接卷款跑路。当学生发现“被贷款”要求退费时，机构却企图通过合同条款规避法律责任百般推诿、拒绝退款。大学生们为避免个人征信受损，只能无奈背负债务按时还贷。若无力承担高额利息停止还款，还会被催债公司以各种方式施压逼迫其还款，形成恶劣的“三角”借贷骗局[3]，如图1所示。

（二）不良培训贷的危害后果

1. 财产损失风险

不良培训贷常以“零利息”为幌子，通过手续费、担保费等隐性收费变相抬高成本，部分综合利率远超30%。《新京报》（2024年6月）报道[4]，应届毕业生小陈被培训机构以“培训后上岗、费用从工资扣除”诱导签约，其需在某平台支付超2.4万元培训费（含2289元手续费），但实际培训内容毫无实用价值，机构也无法实现对其包就业的承诺，自己每月却要面临2000元的还贷压力，而自己当前的工资仅有4000元。其正常生活与职业发展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2. 心理危机风险

受骗大学生大多被迫通过“以贷养贷”维持偿付，债务雪球越滚越大。这些在校大学生本身涉世未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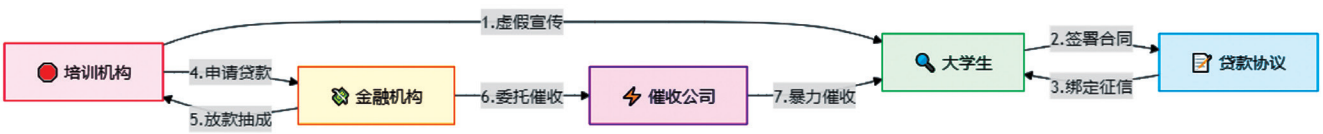


图1　不良培训贷”三角骗局“运作机制

心理承受能力有限，无法排解因受骗产生自我怀疑、焦虑抑郁等情绪，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出现轻生念头或报复社会等扭曲行为，对校园安宁与社会秩序也造成负面影响。

3. 人身安全风险

当不良培训贷款逾期后，学生会遭到债务公司催债施压，催债公司通过恐吓侮辱、骚扰学生及其亲友等方式施压，个别极端案例甚至出现肢体冲突等暴力行为，给学生的人身安全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4. 信用风险

不良培训贷的危害不仅体现在给学生带来当下的经济、心灵困扰，贷款逾期还会影响其金融信用。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不良信息将保留 5 年，这也将直接影响借款人未来购房贷款、信贷等业务的办理。这种信用污点一旦产生，对于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而言，也将成为伴随多年的隐性负担 [5]。

二、大学生陷入不良培训贷陷阱的动因分析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当前大学生频陷不良培训贷困境，既源于大学生群体经济依赖性强、风险防范意识薄弱（内因），也与不法机构通过隐蔽化套路诱导学生负债、高校教育缺位、监管存在漏洞（外因）密切相关。

（一）求职赚钱需求高与风险防范能力低是内在动因

当前高校就业竞争日趋激烈，部分经济困难家庭学生对求职就业的需求尤为旺盛。这些机构精准捕捉大学生 “渴望高薪” “快速提升竞争力” 的心理，通过虚构 “定制化岗位” “零基础速成高薪” 等虚假承诺，以 “技能培训” 为载体诱导借贷，将职业焦虑转化为诱导借贷牟利的切入点。

1. 经济能力与发展需求的错位匹配

大学生一方面普遍缺乏稳定收入来源，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临技能提升、着急参加工作赚钱的刚性需求。不良培训机构正是利用这一痛点，以 “先学习后付费” 等看似灵活的付费模式为诱饵，使大学生们在急于提升竞争力的心态下忽视潜在金融风险，而陷入被动借贷的境地。

2. 金融素养欠缺构成核心认知短板

依据金融素养理论，个体金融知识储备直接影响决策理性，而多数在校大学生的金融知识普遍缺乏，对复利计算、违约条款、征信规则等核心合同要素认知不足，既难以识别 “手续费” “担保费” 等变相高息手段，也无法察觉培训协议中嵌套的贷款陷阱，非常容易被 “零门槛贷款” 等话术误导，在未充分理解合同责任的情况下盲目签约，最终落入 “培训贷” 骗局。

（二）机构套路隐蔽性与监管教育缺位是外在动因

不良培训贷的隐蔽性套路与外部监管、教育体系的双重缺位，共同构成了大学生频繁落入不良校园贷陷阱的外在动因。

1. 培训机构套路隐蔽性加剧信息差

相较于传统互联网消费贷款，不良培训贷的诱导手段更具隐蔽性。多数学生反映不良培训机构往往以各种 “1 元体验课” “兼职招聘” 等名义引流，将借款合同嵌套于培训协议中，学生往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约。而且多数培训贷的服务暗藏隐性收费，还款项目常包含中介费、手续费、担保费等隐性成本，整体贷款利率颇高。有些机构虽规避 36% 的高利贷红线，但年利率普遍高达 30%。

2. 高校风险防范教育不足导致认知盲区

作为金融安全教育主阵地的高校，其安全教育体系不够完善。针对金融普及知识的课程设置单一、内容陈旧，学生无法通过正规教育渠道获得系统的金融风险防范知识，风险识别和应对能力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无有效的防范能力。

3. 制度监管缺位形成治理盲区

教育部等五部门早在 2021 年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虽明确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但未对 “大学生身份核验” “贷款发放途径封堵” 等关键环节作出细化规定，使部分机构得以游走于法规边缘；同时，我国尚未出台校园贷统一行业标准与操作细则，金融机构放贷尺度、审核标准参差不齐，客观上为不良培训贷提供了生存空间。

综上，机构的隐蔽套路、高校教育的薄弱与监管体系的不完善，共同构成了不良培训贷陷阱扩大的外部推手。

三、风险防范与协同治理路径

防范大学生跳入不良培训贷陷阱，应从内部和外部因素考量解决。

（一）学生层面：强化自身风险防范意识

大学生应主动强化职业规划意识，树立正确的择业观，通过官方渠道、权威网站等正规途径获取求职信息，避免投机心理，警惕 “培训后包通过、包就业” 等虚假承诺 [6]。在选择培训机构时，需全面核查其资质、口碑及投诉记录，仔细审阅合同条款，尤其是涉及分期付款、费用返还等关键内容，避免泄露个人信息。若遇 “边学边赚钱” “零利息分期” 等诱导性宣传，需保持审慎态度，结合自身经济能力与实际需求，理性评估贷款的必要性。若不慎陷入诈骗陷阱，应第一时间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通过法律诉讼、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等合法途径维权 [7]。

（二）高校层面：构建完善的金融安全教育体系

金融市场上培训贷形式多变，如何帮助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有效识别信贷风险、警惕合同陷阱，是高校教育者需重点解决的问题。

1. 分层递进式课程设计

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特点，设计由浅入深的金融法律必修选修课程。例如，对大一新生侧重基础金融知识普及，开设金融安全通识必修课，讲解信贷基础与征信常识；对大二、大三学生开设合同条款解读实训课，通过案例演练识别隐藏陷阱；针对毕业班的学生可以着重培养正确的职业观、就业观，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及求职防骗案例教学等。

2. 多维度教育融合与学生自治协同育人

高校需以“三全育人”理念为引领，打造“课程—活动—实践—服务”四位一体的金融安全教育体系。在课程主阵地建设中，教务处应联合就业指导部门等将金融安全知识纳入通识教育学分体系：思政课教师可将不良校园贷的典型特征、法律后果及真实维权案例纳入“思想道德与法治”模块，通过案例研讨强化风险认知；辅导员需在班级管理中每学期组织主题班会，采用模拟贷款纠纷情景剧、维权流程推演等互动形式深化教育渗透，引导学生建立理性、合法的职业观与消费观；保卫处联合学生处每季度开展“反诈教育周”，邀请法务部门、心理咨询中心参与案例复盘会，针对学生因培训贷产生的心理焦虑提供专项疏导，形成“思政引领 + 专业支撑”的育人闭环[8]。

为延伸教育触角，还可成立例如“金融服务知识普及社团”的学生自治组织，选拔培训具备金融基础的学生志愿者。通过学生力量协助排查校园及周边虚假广告、违规借贷宣传，建立不良培训贷问题线索台账，同时通过制作防骗短视频、组织金融知识竞赛等形式开展朋辈教育，构建学生自治巡查、同伴互助宣传的协同防范链，实现风险预警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转变。

3. 整合专业化师资力量

高校还可结合自身资源条件，逐步推进金融安全教育专业化建设。对于具备师资力量的院校，可以优先组建跨学科金融法律教师团队，系统开发信贷风险识别、法律维权等专题课程；对于师资储备暂不足的院校，可通过柔性引才方式，联合保卫处、学生处等部门，定期邀请银行从业者、民警、律师等实务专家开展专题讲座与案例研讨。

（三）社会层面：校园金融环境优化

基于唯物辩证法外因作用原理，防范大学生不良培训贷风险还需政府、金融机构、市场及高校等多方协同发力。一方面，应发挥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合力，落实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强化网络平台对培训广告的审核义务，依据《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规范广告内容真实性，斩断不法机构的引流链条[9]。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搭台、机构唱戏”的模式，以财政补贴支持官方认可的技能培训机构与院校合作开展公共技能培训，高校同步深化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就业指导课程改革，满足学生实用技能需求以净化市场。同时，正视大学生合理信贷需求，按教育部建议推动高校对接银行机构，开发手续便捷、利率合理的助学及培训类金融产品，畅通正规信贷渠道，从而做到“良币”驱逐“劣币”，净化金融市场，切实保障学生权益。

四、结语

不良培训贷陷阱的治理涉及学生权益保护与校园金融安全治理。从现状来看，不良培训机构利用大学生就业焦虑与金融认知短板，通过隐蔽借贷套路形成风险闭环，导致退费难、高息负债等问题频发，对学生身心造成多重伤害。其原因不仅在于学生自身风险防范意识薄弱、职业规划的不理性，也包括高校金融安全教育不足、监管政策执行存在漏洞等外部因素多重作用。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需凝聚多方合力，唯有通过“个体提升—校园赋能—社会共治”的协同路径，才能斩断不良培训贷的利益链条，净化技能培训市场环境，切实为大学生成长成才筑牢金融安全防线，让职业技能教育真正回归育人本质。

参考文献

[1] 赵祖斌 . 青年“培训贷”的法律风险防控研究 [J]. 当代青年研究 , 2020(05): 64-70.

[2] 赵丽 , 李丹阳 . 警惕“培训贷”套路涉世未深大学生 6 名学生讲述落入“培训贷”陷阱经历 [EB/OL]. (2023-08-01)[2025-08-19].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3-08/01/c_1129779310.htm.

[3] 林静 , 王烨捷 . 以兼职为饵“培训贷”为何盯上大学生 [N]. 中国青年报 , 2023-08-07(005).

[4] 韦博雅 , 岳彩周 .“培训贷”中的机构包装术：万元学费包上岗，“想赚大钱先贷款”[EB/OL]. (2024-06-01)[2025-08-19].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717169761129540.html.

[5] 王怀勇 , 邓若翰 . 校园网贷法律规制的路径选择 [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 2017(06): 83-91.

[6] 卞靖懿 . 校园贷风险及思政教育防范对策研究 [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 2019(05): 43-46.

[7] 王智芳 , 李娜 . 就业不成反背债！警惕求职“套路贷”[N]. 三湘都市报 , 2024-1-8(A05).

[8] 岁正阳 . 别让“月入过万的虚假培训”泛滥——“副业培训”乱象风险预警 [J]. 中国消费者 , 2024(05): 34-37.

[9] 于若男 . 我国教育培训贷法律问题探析 [J]. 西部学刊 , 2021(08): 56-5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广西医科大学 2025 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依法治校视阈下高校资助育人体系构建的法治化实践路径研究——以广西医科大学为例”（下转 158 页）

三孩政策下广东省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黎睿凡 辜　耀 张绮琪 古小敏 古炼辉 *

摘要：本文以广东省育龄人群为研究对象，通过该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现状的调查，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完善广东省生育支持政策提供参考依据。该研究于 2024 年 9 月至 12 月，采用方便抽样法对广东省 1168 名育龄人群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卡方检验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数据结果发现，广东省育龄人群生育三孩的意愿较低，年龄、现有子女数量以及配偶 / 伴侣的生育态度和意愿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建议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以提高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

关键词：三孩政策；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影响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

一、前言

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有 1.3[1]。为提升生育水平，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2021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发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政策效果受生育成本、家庭支持等因素制约，现有研究表明，生育意愿是生育行为的强预测变量（甘雪慧，2023），但针对三孩政策下广东省的实证研究仍不足。本研究在广东省选取若干社区和医院调查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剖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区域性生育支持政策提供依据。

二、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于 2024 年 9 月至 12 月对广东省 20~46 岁育龄人群进行调查。纳入标准：①符合育龄定义（20~46 岁）；②无严重躯体或精神疾病；③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已生育三孩；②经医学诊断的不孕症患者。共发放问卷 1279 份，回收有效问卷 1168 份，有效回收率为 91.32%。

（二）研究工具

研究采用自行编制的问卷作为研究工具，包含一般人口学特征、生育现状、三孩意愿及影响因素等 3 个维度。问卷设计参考了相关文献，并咨询了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以确保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问卷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内容效度指数（CVI）为 0.91。

（三）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使用 SPSS 26.0 进行数据分析。分类变量以频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逐步 Logistic 回归（$\alpha_{入}$=0.05，$\alpha_{出}$=0.10）。

三、统计分析

（一）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样本年龄分布：20~25 岁占 42.60%，26~30 岁占 20.90%，31~35 岁 占 21.00%，36~40 岁 占 10.00%，41~45 岁占 5.60%。性别方面，男性样本占比为 33.70%，女性样本占比为 66.30%。生活地区：城市样本占比为 47.30%，乡镇样本占比为 25.90%，农村样本占比为 26.80%。婚姻状态：未婚样本占比为 45.90%，已婚样本占比为 50.80%，离异样本占比为 3.30%。受教育程度：高中 / 中专 / 技校及以下占比为 11.30%，

（上接 157 页）（2025SZB19）；广西医科大学 2023 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依法治校视阈下校园网贷风险防范与教育引导路径研究”（2023B33）；广西医科大学 2023 年就业创业研究课题“新形势下关于提升大学生创业法律风险防范能力的研究”（2023JCB02）。

（作者：何珂，广西医科大学学工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干事；徐陆，广西医科大学校办产业中心干事；通信作者莫小娇，广西医科大学讲师）

表 1 赋值情况

因素	变量赋值
年龄范围	20~25 岁 =1；26~30 岁 =2；31~35 岁 =3；36~40 岁 =4；41~45 岁 =5
性别	男 =0；女 =1
地区	城市 =1；乡镇 =2；农村 =3
受教育程度	高中 / 中专 / 技校及以下 =1；大专 / 高职 =2；本科 =3；硕士及以上 =4
现有孩子数量	0=0；1=1；2=2
生育意愿	否 / 尚未决定 =0；是 =1
对国家政策的了解程度	非常了解 =1；比较了解，但不全面 =2；听说过，但不了解详情 =3；完全不了解 =4
配偶 / 伴侣的生育态度和意愿	完全支持，并积极参与规划 =1；支持，但参与度有限 =2；持中立态度，不反对也不特别支持 =3；反对，对我的决策有较大影响 =4
对生育假期制度的满意度	非常满意 =1；比较满意 =2；一般 =3；不太满意 =4；非常不满意 =5
社会支持的重要性	非常重要，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1；较为重要，但非决定性因素 =2；有一定影响，但不是主要考虑 =3；不太重要 =4

大专 / 高职占比为 42.20%，本科占比为 35.40%，硕士及以上占比为 11.00%。

（二）生育意愿单因素分析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个体生育意愿，通过问卷中的“您是否有生育计划？”这一问题来衡量。由于“尚未决定”的选项在本研究中被认为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将其归入“不愿意”类别，从而更准确地反映育龄人群的实际生育意愿。

2. 解释变量

生育意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主要考察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变量的具体处理情况详见表 1。

3. 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从年龄分布角度，26~30 岁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最高，占比 24.6%，而 41~45 岁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最低，占比 13.8%；从目前孩子数量角度，仅有一孩的育龄人群生育意愿最高，占比 23.5%，而有二孩的育龄人群生育意愿最低，占比 13.2%；从配偶 / 伴侣的生育态度和意愿角度，配偶 / 伴侣越支持且参与度越高，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也越高 [2]。

（三）生育意愿 Logistic 回归分析

本研究以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为因变量（不愿意 / 尚未决定 =0，愿意 =1），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自变量纳入模型，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有效性检验显示 P<0.05，说明模型有效。经过 HL 检验显示 P=0.262>0.05，说明模型通过 HL 检验，模型拟合优度较好，如表 3 所示。

表 2 生育意愿单因素分析 [N=1168，n（%）]

因素	项目	数目	无生育意愿	有生育意愿	χ^2 值	p 值
年龄	1	497	421(84.7)	76(15.3)	10.797	0.029
	2	244	184(75.4)	60(24.6)		
	3	245	197(80.4)	48(19.6)		
	4	117	93(79.5)	24(20.5)		
	5	65	56(86.2)	9(13.8)		
性别	0	394	309(78.4)	85(21.6)	3.525	0.06
	1	774	642(82.9)	132(17.1)		
地区	1	553	447(80.8)	106(19.2)	1.115	0.573
	2	302	252(83.4)	50(16.6)		
	3	313	252(80.5)	61(19.5)		
受教育程度	1	132	103(78)	29(22)	1.953	0.582
	2	493	407(82.6)	86(17.4)		
	3	414	339(81.9)	75(18.1)		
	4	129	102(79.1)	27(20.9)		
目前孩子数量	1	701	572(81.6)	129(18.4)	8.189	0.017
	2	255	195(76.5)	60(23.5)		
	3	212	184(86.8)	28(13.2)		
对国家政策的了解程度	1	167	131(78.4)	36(21.6)	2.109	0.55
	2	532	430(80.8)	102(19.2)		
	3	405	336(84.4)	69(17)		
	4	64	54(81.4)	10(15.6)		
配偶 / 伴侣的生育态度和意愿	1	386	279(72.3)	107(27.7)	47.493	0
	2	309	246(79.6)	63(20.4)		
	3	397	353(88.9)	44(11.1)		
	4	76	73(96.1)	3(3.9)		
对生育假期制度的满意度	1	88	69(78.4)	19(21.6)	1.731	0.785
	2	461	370(80.3)	91(19.7)		
	3	416	345(82.9)	71(17.1)		
	4	128	106(82.8)	22(17.2)		
	5	75	61(81.3)	14(18.7)		
社会支持的重要性	1	521	411(78.9)	110(21.1)	5.910	0.116
	2	453	372(82.1)	81(17.9)		
	3	151	130(86.1)	21(13.9)		
	4	43	38(88.4)	5(11.6)		

四、结果与讨论

（一）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现状

研究发现，广东省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其中愿意生育的比例为 18.6%，不愿意生育的比例高达 47.3%，另有 34.1% 的群体持观望态度，与其他地区研究具有相似性。例如，郭长萍（2024）对成都市适龄女性的调查也显示，愿意生育三孩的比例仅为 4.83%[3]。晏月平和李昀东（2024）对云南省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进行调查发现，有生育（再生）意愿的比例为 20.04%，未生育群体中有生育（再生）意愿达 44.77%，二孩育龄人群有生育（再生）意愿的比例最低，仅为 2.20%[4]。

表 3 生育意愿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B	SE	Wald χ2	P 值	OR 值	95% CI	
							下限	上限
常量		−1.066	0.161	43.623	0	0.344		
您的年龄范围是？（以“20~25”岁为参照）	26~30 岁	0.496	0.214	5.393	0.020	1.642	1.08	2.495
	31~35 岁	0.259	0.24	1.159	0.282	1.295	0.809	2.073
	36~40 岁	0.521	0.31	2.815	0.093	1.683	0.916	3.093
	41~45 岁	0.149	0.42	0.125	0.723	1.161	0.509	2.646
您目前有几个孩子？（以“0”为参照）	1	−0.015	0.213	0.005	0.943	0.985	0.649	1.495
	2	−0.779	0.267	8.491	0.004	0.459	0.272	0.775
您的配偶 / 伴侣对于生育的态度和意愿如何？（以“完全支持，并积极参与规划”为参照）	支持，但参与度有限	−0.388	0.184	4.45	0.035	0.679	0.473	0.973
	持中立态度，不反对也不特别支持	−1.127	0.201	31.499	0.00	0.324	0.219	0.48
	反对，对我的决策有较大影响	−2.239	0.602	13.832	0.00	0.107	0.033	0.347

（二）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发现，年龄、当前孩子数量和配偶 / 伴侣对于生育的态度和意愿是影响广东育龄人群生育三孩意愿的重要因素。

年龄有双向效应。本研究发现年龄增长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OR=1.642），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表现出倒 U 形趋势（晏月平和李昀东，2024）。生育黄金年龄段，女性的生育能力相对较高，生育风险较低，生育意愿相对较高。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经济状况更为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育意愿。较高年龄段的人群，生育意愿降低。

现有子女数的抑制效应。本研究发现，当前孩子数量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与前人研究一致。郭长萍（2024）发现已有孩子数量会显著影响人们对某些生育相关因素的看法，特别是对经济成本、心理压力、传宗接代以及与个人价值的冲突。一般来说，孩子数量越多，生育意愿越低 [5]。

配偶 / 伴侣对于生育的态度和意愿。本研究发现，配偶 / 伴侣对于生育的态度和意愿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夫妻双方的生育意愿一致性越高，生育的可能性越大。如果夫妻双方在生育问题上存在分歧，可能会导致生育意愿降低，甚至影响婚姻关系。

除了上述影响因素以外，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社会支持、文化背景等也可能是影响广东省育龄人群生育三孩意愿的因素。

五、结论与建议

为更好地推动广东地区三孩政策的实施，需要针对影响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对标完善生育配套支持系统。一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大对育儿家庭的经济补贴、税收优惠等支持力度，降低育儿的经济负担。二是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增加托育机构的数量，降低托育费用，为育儿家庭提供便利。三是完善产假制度，延长产假时间，提高产假期间的工资待遇，保障女性的生育权益。四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积极的生育文化，鼓励夫妻共同承担育儿责任。五是关注特殊群体，针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的群体，制定有针对性的生育支持政策。

参考文献

[1] 黄凡，段成荣 .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质量红利——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J]. 人口与发展，2022(01): 117−126.

[2] 买迪娜・阿布都斯力木 . 新生育政策下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策研究 [D]. 苏州：苏州大学，2023.

[3] 郭长萍 . 成都市适龄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 [D].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24.

[4] 晏月平，李昀东 .“三孩”政策背景下云南省育龄群体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研究 [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5): 99−111.

[5] 钟晓龙，李慧慧，王自锋 . 高就业密度是否会降低生育意愿——基于 CGSS 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J]. 统计学报，2024(01): 61−7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立项项目“‘三孩’政策背景下城乡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调查与分析”（pdjh2023b0966）。

（作者：黎睿凡、古小敏，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辜耀，华南师范大学学生；张绮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护士；通信作者古炼辉，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副处长）

基于文本分析法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首轮建设成效研究

刘竹滢

摘要：本文以 42 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建设目标及首轮建设成效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分析软件对其展开文本分析。研究发现，首批“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悉数完成了其首轮建设目标，但各高校在首轮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若干共性问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优化建议，以期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更好地开展“双一流”建设工作建言献策。

关键词：“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成效；文本分析

一、引言

教育部于 2020 年 8 月下发《关于开展 2016—2020 年“双一流”建设周期总结工作的通知》，“双一流”建设首轮验收工作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总结将作为教育部进行“双一流”高校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评价结果将作为下一轮“双一流”建设资源配置和动态调整的重要依据。本文重点探讨以下问题：我国首批“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设立了哪些“双一流”建设目标？其首轮建设成效如何？表现出哪些典型特征？

二、文献综述

21 世纪初，“世界一流大学”这一概念成为全球教育领域讨论的焦点。学者 Philip G. Altbach（2003）尝试性地概括了世界一流大学所应具备的核心特质，包括卓越的研究成果、学术自由与活力、高效的大学治理、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充足的资金支持[1]。Jamil Salmi（2009）从综合因素的角度出发，将世界一流大学定义为人才汇聚、资源丰富与管理规范的有机结合[2]。

而在国内，“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研究也已取得一定进展。在建设评价体系和评估策略的领域，崔育宝（2018）基于全球与区域性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构建了适用于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综合评价体系[3]。王靖靖（2019）将“灰靶理论”运用到大学建设成效评价的研究中，建立了大学建设成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4]。杜瑛（2020）提出了以绩效评价为工具，推动“双一流”建设的行动路径[5]。学者还通过分析、借鉴世界一流大学评价的国际经验，对我国“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周光礼等（2019）认为不能直接将世界大学排行榜作为“双一流”建设动态监测和成效评价的依据[6]。

“双一流”建设是一项新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策略，相关研究逐年增加。但是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双一流”建设的关注点并不均衡，学科发展、大学排名等方面的研究居多，对建设成效评价等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通过总结归纳“双一流”建设高校首轮建设成效，并与各高校在建设方案中设立的目标进行对比分析，为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推进提供有效参考。

三、研究设计

本文以 42 所首批“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发布在其官网的建设方案文本及其首轮建设成效的相关文本资料为研究对象，利用数据处理软件，对文本数据进行分词、词频统计的处理，进一步探索各因素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四、“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建设目标分析

本研究根据 42 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公开发表的“双一流”建设方案，对其所设定建设目标的文本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各高校制定的“双一流”建设目标存在着普遍趋同、略有差异的现象。按阶段划分：42 所高校均采用“三步走”战略，将“双一流”建设目标划分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按时间划分：第一建设周期（近期）为 2015 年至 2020 年，第二建设周期（中期）为 2020 年至 2030 年，第三建设周期（远期）为 2030 年至 2050 年。个别高校的年限设置有所差异，采用建校周年作为时间节点，如北京大学、天津大学等。

本文对 42 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目标的文本内容进行词频分析，以期从高频词汇中获取关键信

息，详见表 1。

表 1 建设目标高频词汇统计表

序号	高频词	频数	序号	高频词	频数
1	学科	1623	26	交叉	180
2	一流	1012	27	重大	178
3	建设	754	28	体系	173
4	世界	677	29	学术	171
5	发展	563	30	社会	168
6	世界一流	528	31	内涵	122
7	大学	447	32	办学	104
8	科学	389	33	现代	87
9	学校	375	34	学生	85
10	特色	342	35	治理	61
11	创新	337	36	中国特色	59
12	国际	318	37	行列	56
13	工程	308	38	知名	51
14	水平	301	39	形成	50
15	人才	268	40	综合	48
16	国家	249	41	文化	48
17	优势	244	42	模式	46
18	技术	244	43	战略	43
19	学科群	242	44	提升	39
20	培养	226	45	前列	37
21	服务	218	46	能力	37
22	研究	210	47	领先	35
23	目标	206	48	区域	34
24	基础	197	49	跻身	33
25	领域	182	50	顶尖	31

“学科”以 1623 的频数位居榜首，说明各高校对“学科”的关注程度最高，可见学科建设主导已成为 42 所高校进行“一流大学”建设的价值统领。这也印证了学科建设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和依托[7]，建设一流专业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逻辑起点[8]。“一流”“建设”“世界”“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科学”“学校”“特色”分别位列第二名至第十名，说明我国“一流大学”的建设思路主要集中于扎根中国特色文化，以学科建设为基础，培养创新型人才，全面提升我国整体办学水平和国际化综合实力。

本研究通过共词提取方法，构建了关键词矩阵，并对 42 所高校的建设目标进行高频词关联度分析，绘制出关键词网络关联图（见图 1）。图 1 显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目标的关键词在整体上呈“核心—中间—边缘”层级式分布。核心层的关键词之间具有强关联性，“学科”处于网络中心的核心节点位置，其周围圈状分布着“一流”“世界”“建设”“大学”“科学”“发展”等词。中间层涵盖了“学术”“人才”“特色”“学校”“创新”“优势”“工程”“学科群”等关键词，对高校的建设目标做进一步补充说明。“顶尖”“领先”“办学”“现代”“内涵”“治理”“师资”“国际化”等关键词向四周扩散式分布，边缘层的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较弱，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高校在制定建设目标时对不同领域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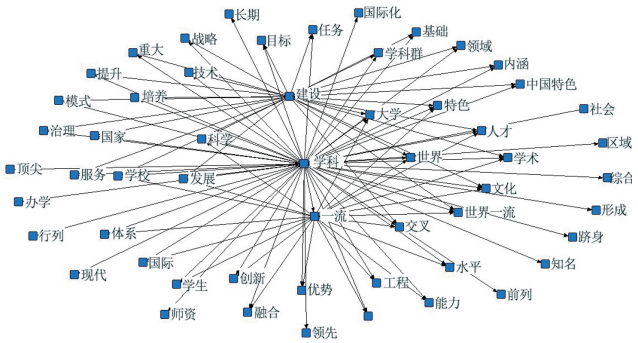


图 1 建设目标的关键词网络关联图

五、“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建设成效分析

本研究收集、归纳了我国首批“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公布的“双一流”首轮建设成效的文本资料，选

表 2 建设成效高频词汇统计表

序号	高频词	频数	序号	高频词	频数
1	一流	583	26	中国	48
2	学科	522	27	初步	35
3	建设	497	28	基础	32
4	发展	361	29	学生	31
5	世界	335	30	关键	28
6	人才	278	31	完成	27
7	创新	252	32	达成度	24
8	中国特色	227	33	符合度	24
9	教育	218	34	水平	23
10	特征	204	35	预期	21
11	领先	189	36	对照	19
12	目标	163	37	评价	13
13	学科群	152	38	改革	13
14	大学	147	39	圆满	12
15	国际	144	40	专家	12
16	战略	122	41	师资	11
17	方案	116	42	体系	11
18	优势	102	43	专业	11
19	研究	93	44	社会	10
20	进步	87	45	接近	10
21	高质量	75	46	主要	10
22	领域	69	47	全面	9
23	经验	63	48	推进	9
24	显著	54	49	实施	9
25	成效	51	50	建成	9

取已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相关报道的 31 所高校展开分析，31 所高校均通过高校自评和专家评议完成了首轮“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

根据各高校的首轮建设成效的整体情况，可将 31 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大致划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为清华大学，其在首轮建设成效评价中的表述为“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所“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高校。第二梯队为其余 30 所高校，大多使用“全面接近”“具备主要特征”等表述，其当前整体实力与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尚有一定差距（见表 2）。

本研究选取 31 所高校建设成效评价文本中排名前 50 的高频词，见表 2。“一流”以 583 的频数位居第一，是高校建设成效文本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学科”“建设”“发展”“世界”“人才”“创新”“中国特色”“教育”“特征”分别位列第二名至第十名。“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是实现“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从“世界”和“中国特色”的位次排名，可以看出此次“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充分凸显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两个特征。“人才”与“创新”在高频词表中同样名列前茅，可见创新型一流人才培养已成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涵。

在建设成效关键词网络关联图（见图 2）中可见，“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首轮建设成效的评价文本呈现出以“一流”“学科”“建设”为中心的簇状分布，以“发展”“人才”“世界”“创新”等为次中心，外围有“战略”“符合度”“体系”“评价”等高频词分散分布，相互交织成高校“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文本的关键词语义关系网络。总体上，高校首轮建设成效呈现出以对标一流为核心驱动，以学科建设为主要抓手的圈层式结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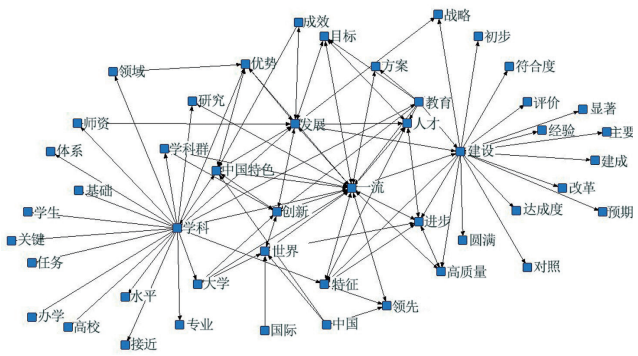


图 2 建设成效的关键词网络关联图

六、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收集、整理 42 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双一流”首轮建设目标和建设成效的文本内容，得出以下结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悉数完成“双一流”首轮建设目标，高校的各项事业均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同时，高校间的首轮建设成效存在一定的差距，仅有少数高校已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绝大部分高校则具备了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尽管如此，“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双一流”首轮建设周期中，仍普遍存在以下四个问题：

1. 建设目标定位不清晰。从建设目标文本中出现的高频词来看，高校在设立建设目标时普遍存在层次定位模糊的问题。42 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各阶段的建设目标中均提到“跻身 / 初步 /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但是何为“世界一流大学”，目前尚无固定的衡量标准和确切答案，各高校也并未对此作出具体确切的解释说明。

2. 建设成效特色不鲜明。一所知名的大学理应拥有其独特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特色，而排行榜采用世界统一或国家统一的指标体系，这不仅可能将那些富有特色的大学排除在外，而且会促使各大学追求同一种教育模式，进而产生脱离实际、高校同质化的不良后果[9]。建设成效文本中出现的高频词“人才”“培养”“教育”“文化”“国际”“服务”等均涉及大学评估标准，但是各高校在进行建设成效评价时未能做到根据自身院校的特色来寻找突破点，不易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显著建设成效。

3. 建设总体路径趋同化。高校初期建设目标大多为“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中期建设目标大多为“初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长期建设目标大多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4. 高校过于重视量化指标。在高校设立的建设目标中，部分高校将其学科建设目标与基本科学指标（以下简称 ESI）的排名挂钩，并表述为分阶段实现若干学科进入世界 ESI 排名的前 1%。有学者指出，ESI 主要以论文的被引频次为排名标准，主要侧重理工科，而人文社科类学科不占优势[10]。可见，各高校一味追求量化成绩，而未尊重学科间的差异。

最后，建议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具体而言，“双一流”建设成效的评价指标体系中既应包含主观、定性的评价指标，总体考察各建设高校在立德树人举措、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的建设成效；又应设立客观、定量的评价指标，反映各建设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的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1] PHILIP G,ALTBACH.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J].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03(33): 5-8.

[2] JAMIL SALMI. 世界一流大学：挑战与途径 [M]. 孙薇，王琪，译校.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3] 崔育宝. 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评价研究 [D].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8. （下转 164 页）

法治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策略研究

善托娅

摘要：当前，我国在民族发展进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不同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显著，民族文化在继承与发展上存在短板，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也有待加强。在法治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从四个关键方面发力。一是增强民族法治意识，提升各民族对法治的认同与遵循；二是开展民族法治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强化法治观念；三是推进民族法治实践，将法治理念融入民族事务处理；四是营造民族法治氛围，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通过这些方法及措施，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促进各民族间深入交流、深度交融，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确保祖国永盛不衰、蓬勃兴旺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法治视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地区发展不平衡；民族文化传承；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千百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它是联系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是凝聚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力量源泉，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立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大局，进入新时代后如何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保障，法治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方式和根本手段。法治既是社会秩序的守卫者，又是公民权利的守护神，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奋进的力量源泉，在民族团结方面发挥重要的规制和引领功能。为此，本文从法治理论维度出发，运用辩证思维方法，以现实国情为落脚点，根据法律依据有针对性地提出民族团结工作的方法与对策。通过对法治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内在机理及外显表现的系统阐释，提出相应的工作思路及对策措施。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

经济基础是影响共同体意识生成的深层原因，在中国多民族国家体现突出。我国地域广袤，民族地区众多，部分地区位置偏远、环境恶劣，且受历史因素影响，经济发展落后。

这种不平衡不局限于GDP、人均收入等表面数据，更体现在深层结构。各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通信不畅，阻碍了交流合作；产业结构升级困难，难以跟上现代经济发展步伐；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人

（上接163页）

[4] 王靖靖．基于灰靶理论的大学建设成效评价[D]. 成都：成都理工大学，2019.

[5] 杜瑛．我国“双一流”建设实施绩效评价面临的困境与行动路径[J]. 教育发展研究，2020, 40(03): 22-28.

[6] 周光礼，蔡三发，徐贤春，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与评价：国际经验与中国探索[J]. 中国高教研究，2019(09): 22-28, 34.

[7] 李彤．“双一流”背景下的高校学科建设：策略与反思——基于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方案的文本分析[J]. 大学（研究版），2018(Z1): 21-27, 20.

[8] 陈治亚．高水平行业高校建设一流专业的思考[J]. 中国高校科技，2016(06): 4-6.

[9] 刘苗苗，姜华，刘盛博．社会科学总论学科域映射评价及其对“双一流”建设的启示研究——基于ESI工具视角[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25(06): 97-108.

[10] 林杰．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崇拜——意蕴、危害、根由及匡正[J].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03): 71-77.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弘文书院）

才短缺，发展动力不足。同时，这些地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发展机会有限。

发展不平衡直接造成各民族物质生活水平差距大，物质差距又带来心灵隔阂，部分人心态不稳定，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降低，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难以培养和稳固。所以，缩小经济差距、推动均衡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

（二）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不足

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文化多样性，以及民族文化传承创新面临全球化的压力。在当今信息时代，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和西方文化的传播，部分传统民族文化面临着淡出和消失，年轻人不愿了解甚至不喜欢本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现象严重，致使传统文化传承也遇到一定程度上的中断问题。这使一些民族文化遗产面临失传。同时，要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个性，并把它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再为本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带来生机和新鲜血液。如果民族文化不能与时俱进，缺乏创新和发展，必定会被淘汰出世界舞台。只有把民族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并同现代文化相融合创新发展，才是坚持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实现文化多样性的正确方向。

（三）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有待加强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社会基础。但是有些地方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还有所欠缺，一些民族群众不了解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现状，存在一些思想认识上的误区。而民众的法治观念不强也是造成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效果不佳的因素之一，有的地方法治观念淡薄，且有效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民族关系的能力不足。因此要通过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在此基础上加大纠纷化解力度，建立完善纠纷调处机制，促进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繁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1]。

二、法治视野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略

（一）增强民族法治意识

建立和谐稳定的法治环境需要加强民族地区人民的法治观念，在此基础上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扩大法治宣传范围，在国家层面应多用各种方式向人民群众宣传普及法律常识，在自治区可采用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法律常识、解释法律条款、讲解案例，潜移默化地影响各个民族群众的思想行为；完善基础教育普及阶段法治教育，在校园进行法治宣传、讲授典型案例，在家庭、社区、乡村定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并且结合民族地区的地域特点有针对性地创制相应的法治宣传教育材料等；让群众自觉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牢固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观念；建立健全法治监督制度，引导群众积极参与法治实践活动，设置法律援助热线，开展“法治进万家”等形式的法治宣传教育实践活动，使广大群众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感受法治力量，提高人民群众遵守法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于是逐渐就会形成各族人民都尊法、守法，并且依法办事的良好社会氛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推动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

（二）加强民族法治教育

民族法治教育要实现加深和创新，就要实施一系列综合、具体的方法，建构一套既有时代气息又符合民族文化特点的教育体系，不仅要深化和整合内容，还要创新和丰富形式，要始终注重最终效果的评价与完善。在内容上，挖掘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法治理论资源，包括法律观念和制度实践，在此基础上将具有民族特色的内容加入当代中国的法治理论体系；吸取他国经验，按照中国国情、民族特点设立适合中国各民族使用的教育课程。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学校到社会，各民族不同人群在不同时期都可以受惠于质量高、有系统的法治教育。

从形式层面上看，要对教学的方式和方法方面进行创新，增加互动性，注重实践性。比如采用案例分析、角色扮演、模拟法庭等形式，让学生体验模拟的法律环境中的法律实践，锻炼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和法律实践能力；充分运用互联网、多媒体技术手段，建立网络化的法治教育平台，通过提供法律视频、在线测验、开设法治教育专家论坛等多种形式的学习资源，为广大民众提供随时可学的方便快捷的学习路径；同时还可以组织法治讲座、举办法律咨询、开展法治文艺演出进社区、进农村等具体的面对面宣讲、培训、咨询活动，将普法教育送到群众身边，真正地将法治教育与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

对教育效果进行评价、优化，需建立科学的评价制度。定期开展民族法治教育的效果评估，掌握了解学习者的学习状况、法律素质提升的情况等，并通过问卷调查、座谈等多种方式获取学习者、教师、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按照评估结果、反映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不断改进教育内容和形式，使民族法治教育常抓不懈、与时俱进、贴合民族需求、符合群众需要[3]。

加强和创新民族法治教育的综合措施能促使各族群众具备扎实的法律法规基本知识、科学的法治思维、良好的法治实践能力；增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长远发展筑牢根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三）深化民族法治实践

民族法治的推进，在民族法治的实践中才能深入开展。为了更好地让法治理念深入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在平时开展好各项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要不断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民族群众的实际需要，设

置更具针对性、实效性的法治实践活动，让群众在了解和掌握法律的同时，能够在实际的操作中参与法治实践活动，通过实践的过程更好地感受法治力量，增进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情感，从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结合民族地区特点和需要，在一定时期举办“法治宣传周”活动，在这一周期集中悬挂法治标语、发放法治宣传册、放映法治宣传片，营造出浓郁的法治氛围；并且可以通过请法律专家、学者、本地法律工作者走进社区、学校、乡村等基层一线，以案说法、送法入户，讲解法律常识、释疑解惑，引导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形成正确的法治观念。

除法治宣传周外，我们还可以探索其他形式的法治实践活动。如组织“法治文艺演出”，把法律知识渗透于歌舞、戏剧等艺术作品之中；开展“法治志愿服务”，鼓励大学生、律师等青年志愿者，到少数民族聚集区开展一些法律援助类服务、法律咨询服务等。针对法治实践活动要注重和民族群众的互动和沟通，可设置一些能够直接面对民族群众的法律咨询台、法律服务热线等，及时向民族群众征集法治需求，将解决好民族群众日常生活里的法律问题作为重点；同时也要发挥好民族群众自身的力量，在组织上可以组建更多的法治实践活动团队，通过类似于模拟法庭、旁听庭审等方式更好地调动起民族群众自身参与的积极性[4]。

开展法治实践活动，有利于提高民族群众的法治素养，也能在实践中激发民族群众对法治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这样也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并为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优化民族法治环境

在民族法治化建设深入推进中，打造良好的民族法治环境才能实现法治精神的有效实施，必须从各个方面不断加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要全面加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不断健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法律法规的制定或者修订工作，使符合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法律条文不仅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要求，还要尊重少数民族自身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合法的权利，特别是要广纳民意，保证立法的公开性、公正性和公信力，根据各族人民的利益需要来制定好具有民族地区特点的法律法规。

强化执法是保障。执法是实施法律的中间阶段，关乎法治环境的质量。所以要加强对民族地区执法单位的培育和管理，提升执法力度、执法效能，确保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强化制度完善和落实，建立和完善对执法活动的全面监督机制，防止权力被滥用，防止出现执法不公等问题；大力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线，审判的质量、公正、合法与否直接决定着司法能否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程度及整个社会对法律的尊重、信仰程度，所以，我们必须着力加强民族地区的司法力量建设，提高司法机关办案的质量和效率，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推敲，实现案结事了；加大司法公开工作力度，使司法过程透明化、公开化，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充分赢得群众的信任[5]。

通过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法治教育，让民族群众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在生活中自觉遵规守纪；鼓励各民族群众参与法治实践，凝聚强大合力共建和谐、安定、有序的美好家园。优化民族法治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培植法治文化等方面同时发力，着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都在法治的轨道上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三、结语

要在法治框架下，结合各民族发展的实际，筑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屏障，坚持用法治增强民族法治意识、加强民族法治教育、深化民族法治实践、优化民族法治环境，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可靠保障。

参考文献

[1] 张良，姜凤敏．智能媒体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J]. 江汉论坛，2023(04): 56−60.

[2] 李其瑞，古丽巴奴木·吾买尔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民族地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研究 [J]. 广西社会科学，2021(12): 66−71.

[3] 祖力亚提·司马义，高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J]. 贵州民族研究，2021, 42(05): 6.

[4] 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J]. 求是，2024(03): 4−8.

[5]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24−09−28(0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校级科研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保障路径研究”（2022XY001）。

（作者单位：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第三次分配：功能、实践及对策

闫何清

摘要：收入分配是重要的民生之源。第三次分配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一项改革创新之举，在促进共同富裕、社会治理、社会公平、精神文明、人的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三次分配经历了初步发展、深化发展和制度化发展等阶段，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也面临着制度机制等方面的短板弱项。立足完善我国基本收入分配制度，更好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进一步健全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优化发展生态，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注重用好新形态新动力，推进第三次分配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公益慈善；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

以公益慈善为主体的第三次分配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一项改革创新之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的重要制度成果，符合中华优秀文化的历史传统，是共享理念的具体实现形式，开创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方式、协调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新路径。

一、第三次分配的独特作用

第三次分配既是初次分配、再分配的有效补充，又有着不同于市场化分配和政策性分配的社会化、群众化特点，具有多方面的独特作用。

（一）促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不仅需要生产的发展作为物质基础，也需要完善的分配制度确保财富的合理分配。第三次分配可以有效整合和盘活社会资源力量，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它通过资源的再分配，向低收入地区与群体传递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改善资源配置，增强资源流动性，发挥资源最大效用，扩大社会消费，促进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升，释放经济发展潜力。第三次分配有助于发挥先富对后富的帮带作用，促进共同富裕。它通过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等方式，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缩小城乡区域收入差距，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它具有弥补的作用，对于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未被覆盖或者虽有覆盖，但仍无法解决其急难愁盼问题的群体，给予生产生活上的帮扶和支持，帮助他们改善生存发展条件，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二）促进社会公平

公平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而个体所处的地理位置、家庭环境、自然禀赋等都是属于非自愿性条件，这些条件的差异影响到人们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结果。第三次分配，通过经济帮扶和能力提升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的优胜劣汰竞争机制进行修正和弥补，创造更为公平的社会环境，助力解决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的结构性失衡、利益关系失衡等问题，促进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三）促进社会治理

第三次分配有利于完善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分配系统，以慈善参与激发社会自治活力，以社会互助链接群众所需，以冗余的社会财富提升社会福祉，促进社会和谐。它通过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分配，促进形成国家、社会、个体三者平衡发展的资源协调机制，使各类社会资源实现良性流动和循环，促进基层社会的平衡发展。它在资源的转移中，为社会成员达成共识、增进共情提供了舞台，为人们的情感交流和联结，营造了浓厚的信任与合作的社会氛围。它以互助互惠、共生共存的逻辑超越了资本竞争、弱肉强食逻辑，促进和谐友爱、团结奋斗、和衷共济，形成良善的治理机制，构建社会共同体。

（四）促进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的发展需要切实可行的载体，第三次分配是独特的文明实践工程。对分享者来说，其分享和奉献行为需要自愿、无偿、互助、慈善等道德精神的驱动，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获得了社会尊重、自我实现等正向激励，提升了精神境界，满足了个体精神发展需要。对困境群体等接受者来说，有助于减少社会发展中的心理失落感、利益失衡感和预期焦虑感，感受到社会关爱，培养回馈社会、友爱他人的道德精神，促进社会向善向好。对社会关系来说，第三次分配所采取的自愿分配、相互帮扶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市场逐利性和拜金主义所导致的社会关系异化，在和谐、互助、共享的社会关系中塑造人的精神世界，促进精神富裕与物质富足协同发展。对道德文化来说，第三次分配中广泛的群众性参与，有利于整合全体人民的精神力量，发挥共建

共治共享价值，涵养社会精神文明。其中一些低价或免费向社会大众提供的文化艺术资源，有助于推动文化和艺术发展，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

（五）促进人的发展

根据阿玛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判断个体是否贫困不仅要考虑其收入水平，更要考察他实现基本物质生活和自由的能力，这种能力乃是决定人真实处境的关键因素[1]。第三次分配已逐渐从“福利主义”中心拓展到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能动作用，通过提供技术、知识、技能培训等公益服务，提高受助者平等运用发展机会、实现自身发展的能力。第三次分配作为一种社会性过程，促使社会成员在社会互动中加强与他人的联系，丰富和拓展社会交往的新领域，实现社会关系的丰富和个人的发展。第三次分配作为一种互助共享关系，更加关注和贴近人的需求满足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促进财富流动中实现人的能力提升。

二、探索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逐渐演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第三次分配上升为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

（一）第三次分配的初步发展（1949—1978）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对公益慈善事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整顿历史遗留的社会救济组织，发挥它们在组织群众互助、开展社会救济、发展福利事业等方面的辅助作用。推进改组了中国红十字会等民间组织，收容社会弱势群体，协助政府救助灾区群众[2]。中国人民救济代表大会于1950年召开，会议明确了公益慈善的发展方向和工作要求。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深化了人们对集体主义的认同，提出了要充分发挥公益慈善事业社会救济功能的要求，为第三次分配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人民群众在社会各领域踊跃参与志愿性生产和服务活动。广大工人群众不计工时和报酬，积极参与各类工矿企业的抢修劳动，加快了恢复生产的步伐；大批青年组成垦荒队投身北大荒开发，使“北大荒”变成“北大仓”，铸造了勇于开拓和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工商联和民主党派组织开展“智力支边”，帮助边疆地区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和进行经济建设[3]53。1963年，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雷锋活动广泛开展，以“雷锋精神”为代表的志愿服务精神，成为激励人们助人为乐、热心公益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第三次分配的深化发展（1978—2012）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不断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理论、新路径，培育和规范社会组织发展，激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各类公益事业，形式载体和服务内容日益丰富，第三次分配在社会保障、灾难救援和公益事业等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发展环境不断优化。1994年2月，《人民日报》刊发《为慈善正名》的署名文章，强调“社会主义需要自己的慈善事业，需要自己的慈善家”[4]，对发展社会主义公益慈善事业予以肯定和鼓励。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体现出慈善事业在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培育发展第三次分配的主体。1993年，首个以“慈善”命名的社会组织——吉林省慈善总会成立。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作为第一个全国性民间慈善组织正式成立，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三是社会力量发挥积极作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益活动，在抗洪救灾、抗击非典、汶川地震等公共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扶贫济困上积极作为；众多公益项目有序开展，如帮助贫困儿童教育的“希望工程”、支持失学贫困女孩重返校园的“春蕾计划”、帮助残疾儿童的“微笑列车”、解决西部群众饮水问题的“慈善雨水工程”，等等[3]57。

（三）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化发展（2012年至今）

一是中央持续部署推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正式将第三次分配纳入收入分配的制度范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改善收入与财富分配格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上升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二是发展成效显著。据统计，2024年末我国登记基金会9801个，社会组织年捐赠收入达到1297.9亿元，慈善信托合同规模达到69.6亿元，比2023年增长31.2%；中国公益研究院《公益慈善2024年十大进展与2025年五大趋势》显示，截至2025年1月3日，我国实名注册志愿者2.38亿人，各类志愿团队达135万个，志愿项目总数1281万个[5]。三是形式内容不断创新拓展和丰富。一些地方在慈善捐赠、志愿服务、慈善信托等已有形态基础上，探索发展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公益的社会企业，这种社会企业会将盈利的一定比例锁定为社会公益用途，增强了第三次分配的内生动力和分配资源的可持续性；有的将商业化运营理念和方式引入到公益领域，开展公益创投，通过公益性投资创业，为需要支持和帮助的群体提供就业等发展机会，增强其“自我造血”功能；还有的积极探索新质生产力对第三次分配的驱动作用，创新开展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的慈善金融、捐赠人建议

基金、影响力投资、社会影响力债券等生产分配新形态，通过现代化的慈善投资增强第三次分配的深度和广度。2024 年，杭州某公司向浙江大学捐赠价值 1 亿元的算力服务，开创我国新质生产力捐赠先河。

三、对策与建议

我国第三次分配的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同时也面临一些短板弱项。例如，第三次分配的顶层设计和政策体系还有待健全，公益慈善的制度保障有待加强，税收优惠政策还需优化和落实，综合监管机制尚需健全完善；公益慈善资源数量有限，结构不够合理，专业性慈善组织数量偏少，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慈善捐赠多以企业为主、个人占比偏低，慈善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偏远地区相对稀缺；慈善文化尚需培育和弘扬；需求监测难度较大，影响第三次分配的精准性，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需要从完善我国基本收入分配制度的高度，采取有力举措，稳步推进第三次分配高质量发展。

（一）健全第三次分配的制度机制

要增强制度建设自觉，强化理论研究、实践探索、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探索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体系，着力解决第三次分配发展的结构性、关键性问题。例如，要健全资源筹集机制，推进分配资源的有效增长和可持续，充盈第三次分配的源头活水。要逐步打造专业化、规范化的分配渠道和平台，使分配资源的筹集、管理、保值增值和分配传递更加专业、透明、高效。要建立健全受益对象的识别认定机制，实现识别过程从自发性向制度化设计转变，使对象识别实现全人群覆盖和精准筛查。要创新构建持续改进的动力机制，使第三次分配获得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完善的内生动力。要探索构建第三次分配的统计评价体系，将第三次分配运行状况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报告范围，适时进行评估优化。

（二）积极优化公益慈善发展生态

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主体，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离不开一些共性要素，需要系统性构建，打造良性的慈善生态。例如，要完善慈善法律制度，为公益慈善提供完备有力的法治保障；要健全税收激励和约束机制，在鼓励公益慈善捐赠的同时，有效规避和制约慈善资源滥用等问题；要加强公益慈善组织建设，培育自我增值能力，实现总量的合理增加、单体规模适度扩大和专业化的显著提升；要建立健全多层次、综合性的监管体制，增强公益慈善透明度与公信力；要完善第三次分配奖励激励机制，加强公益慈善舆论宣传，培育共享理念，形成浓厚的慈善氛围，等等。

（三）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

要发挥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运行重大环节的统筹，推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爱社会有机统一，发挥好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协同作用[6]。要发挥公有制优势，鼓励国有企业收益在符合法律法规和财务管理规定的情况下，设立公益慈善“种子基金”，撬动社会公益基金的发展。要发挥现代化治理优势，运用困难群众监测、自然灾害监测、重大疾病专项监测等平台数据为第三次分配的对象识别提供支撑，提高分配的精准度。要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的组织优势，发展社区公益慈善，丰富第三次分配的微循环。要发挥独特的文化优势，落实“两个结合”要求，既有效激发中华民族传统慈善精神，又强化马克思主义财富理论、慈善理论的指导，在全社会形成正确财富观、现代慈善观，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

（四）注重运用新形态新动力

以促进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自觉把握和运用第三次分配的新趋势新形态。要注重分配与生产环节的衔接，创造条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创新创业，让人们更好地参与财富创造，在实践打拼和共同创造中提升参与分配的能力水平。要推进慈善信托参与主体大众化、信托财产类型多样化、应用场景多元化，向更普及、更规范、更高效的方向发展。要鼓励发展社会企业、公益创投等生产性分配形式，将社会福祉、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发展以社会福祉为目标、以市场化经营为手段的经济形式；以公益创投的企业、商业、服务项目等为载体，将分配对象的就业帮扶、技能提升、发展支持等融入生产服务中，增强其生存和发展能力。要将互联网慈善作为重要分配方式，在规范线上慈善发展的同时，引导 AI 等数智技术在现代公益慈善中的应用。探索推进新质生产力与第三次分配的互动融合，在新技术研发应用、新经济业态发展、新生职业培育中融入公益慈善要素，从先进生产力的源头上加强对第三次分配的长效化支撑。

参考文献

[1] 阿玛蒂亚·森 . 理性与自由 [M]. 李风华 , 译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3: 468.

[2] 尹淑怡 . 共同富裕进程中第三次分配作用研究 [D]. 长春 : 吉林大学 , 2023(05): 22.

[3] 周宇 . 共同富裕视域下第三次分配研究 [D]. 重庆 : 西南大学 , 2023(10): 53,57.

[4] 孙月沐 . 为慈善正名 [N]. 人民日报 , 1994−02−24(04).

[5] 中国公益研究院：公益慈善 2024 年十大进展与 2025 年五大趋势 [EB/OL]. (2025−01−08)[2025−10−16]. https://www.charityalliance.org.cn/ds/2505713d28.html.

[6] 汪钊 . 回顾与展望 : 第三次分配研究综述 [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2023(03): 88.

（作者单位：民政部办公厅）

基于关系视角的社会工作对农村生计模式变迁的调节作用研究

李振鑫 利爱娟 * 鲍旭圆

摘要：在农村传统生计模式深度转型的背景下，生态失衡、经济风险、社会关系变动及家庭功能适配不足等问题随之显现。本文基于系统理论，从“个体—环境”“个体—家庭”“家庭—家庭”三个维度，探讨农村社会工作的介入路径：在个体与环境层面，通过资源协调、技术指导与风险防控，保障生态可持续、经济安全以及激发社会动力；在个体与家庭层面，以孝道传承、角色调适与女性增能策略，推动家庭照料功能修复、核心家庭和谐关系重建及新型家庭接纳；在家庭与家庭层面，依托本土力量培育、文化共建与辐射效应，强化乡村社会联结。研究表明，农村社会工作可通过微观介入策略，衔接生计变迁的现实需求与社会关系优化的长远目标，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支持。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社会工作；生计变迁；社会关系

“生计”指个体从生存环境中谋取衣食与居所、以维持基本生存的手段和方法，泛指人类谋生的各类途径[1]。我国农村生计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发展进程不断调整。近年来，农村生计模式的转变尤为显著：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特色农业、农村电商等新兴产业兴起，大量劳动力从单一农业转向多元非农领域。这一生计变迁兼具机遇与挑战：农民收入来源拓宽、生活水平提升，但也存在职业技能与市场需求不匹配、风险应对能力不足等问题；同时人口流动加剧、农村空心化显现，传统邻里互助关系受到冲击，亟须构建新的社区凝聚力与社会支持网络；生态与生计的依存关系亦愈发凸显，“可持续生计”理念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考量。

基于此，研究农村生计变迁特点与趋势，探索社会工作的调节路径，对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及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意义重大，社会工作可立足个体与环境、个体与家庭、家庭与家庭层面发挥调节作用，助力农村和谐发展。

一、“个体—环境”维度：农村社会工作介入生态、经济与社会环境的路径及作用

（一）助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农村社会工作者以科学建议、协调资源等方式推动农村人地关系和谐发展，避免不合理的土地种植方式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在“农耕主导型”生计向“多元收益型”生计转变下，一些地区出现经济作物需水量与灌溉设施及技术不匹配的问题，农村社会工作者可通过协调资源，引导投资节水设施、发展农村精准滴灌等措施，推动农业技术水平与生产协调发展。针对土地肥力恢复能力减弱的现状，工作者可邀请相关专家分析当地土壤性质，并根据实际情况为当地村民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例如，有研究者将社会工作的科学方法运用到农村烤烟种植中，利用社会工作专业优势，针对目前烤烟种植存在的问题，从社会工作角度提供相应解决措施，降低土地污染程度，助力可持续发展。

（二）维护经济环境安全稳定运行

为有效应对市场波动和金融风险，农村社会工作者可从协调专家建议和给予法律援助两方面介入，维护乡村经济安全环境。春耕时节，农村社会工作者可联系农业技术人员入村调查并给予合理的意见，指导村民种植。在科学种植与理性分析双重保障下，减少因市场信息滞后带来的经济风险，助力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农村社会工作者发挥政策引导作用，争取相关种植政策支持，引导发展特色产业，规模化经营。社会工作者结合专业优势分析市场导向，引导村民把握市场规律，种植具有竞争力的作物，保障收入稳定。

针对个别农村地区存在的非法集资现象，农村社会工作者可倡导各社会组织协作，加强与公安机关、监管部门等合作，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提升农村非法集资犯罪行为的防控能力[2]，实现社会治理目标。拓宽农村居民投资渠道方面，社会工作者协调金融部门结合农村地方特色筛选适合农民的理财产品，并进行入户宣传，为村民增加理财收入提供实践途径[3]。采用切实可行的宣传方式，加强抵制非法集资教育，

增强村民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三）激发农村社会及环境的内外动力

在熟人社会向多元化交往转变的背景下，社会工作将激活内生动力与刺激外部需求相结合，推动社会环境适应人际交往多元性转变。在促进农业生产合理化方面，社会工作者倡导村民争取社会资源，以激活内生动力。注重发挥村庄农产品自我销售活力，通过协调各方关系和倡导成片经营，促进居民形成规模化种植，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打造当地“明星品牌”。在激发村民主体作用方面，针对部分欠发达乡村行政化管理色彩浓厚、缺乏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村民缺少参与村庄治理的机会以及对村庄的认同感降低等问题，社会工作者在介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倡导发挥村民自决权的作用，选取村民代表[4]，营造人人都是村中一分子、共同协商促发展的和谐氛围。

注重激发内部动力的同时，社会工作者还要注重引导村民依靠助农政策，扩大村庄影响力；优化村庄设施，宣传乡村特色，吸引外地人前来体验当地风土人情；发挥互联网作用，采用直播等方式拓宽销售渠道，增加外部需求，助力生计变迁与经济协调发展。

二、“个体—家庭”维度：农村社会工作的家庭功能重塑与关系调适路径

（一）重唤家庭功能，推动老有所依

传统家庭结构由紧到松，孝道文化变化所引发的农村家庭内部矛盾问题仍需以家为核心进行介入。在宗族大家庭支持功能减弱、家庭关系变化形势下，社会工作者在乡村地区积极宣传孝道文化，倡导发挥家庭传统“孝”“廉”以及家谱、家风的影响作用，推动村民将家庭道德标准不断内化于个人价值体系中[5]。农村社会工作者要加强村民孝亲敬老教育，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社会工作者面对子女照顾缺位问题，要采取宣传“二十四孝”精华内容、普及赡养老人相关法律知识的方式，推动子女正确行使权利，履行赡养义务。

农村社会工作者要倡导发挥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在道德风尚形成中的导向和引领作用，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风向标[6]。正所谓“上行下效”，发挥好农村基层干部带头行孝、作好表率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推动乡村孝道文化成为风尚。倡导在选择村民代表和村干部时将孝道及日常家风状况纳入评判标准，推动德政结合，激发村民对家庭孝道的重视，重唤家庭照顾功能，使乡村老人老有所依。

（二）适应角色变动，营造核心家庭和谐氛围

在农村生计模式变迁下，传统家庭结构松动，核心家庭生活模式成为主导，推动核心家庭内部角色平稳转变成为以家为核心的农村地区构建和谐关系的基础。农村社会工作者在面临核心家庭成员角色转换不畅、内部引发矛盾的情况时，可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通过开展家庭介入服务，观察家庭成员沟通模式，找出家庭问题产生的关键因素并进行分析，提出合理建议，推动村民在实践活动中掌握家庭内部沟通的有效技巧，营造家庭和谐氛围。农村社会工作通过倡导女性合理表达自我需求，学习非暴力沟通方式，以促进家庭包容性发展。社会工作者针对家庭主导地位弱化的男性开展小组工作，进行思想疏导，使男性意识到女性在家庭及生产活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动男性关爱女性，促进夫妻相互理解。同时，家庭角色转变使子女在决策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社会工作者倡导家庭内部形成尊重、平等的风尚，进一步助力家庭和谐发展。通过以上途径，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乡村生计模式变迁下社会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促进实现以“家”为核心的社会工作与民情伦理同向赋能[7]，使家庭成为流动性社会中家庭成员的温暖“港湾”和社会转型的“减震阀”。

（三）接纳新型家庭生活模式，推动女性再就业

推动村庄舆论接纳新型家庭生活模式，倡导中年女性再就业增强其独立生活能力。如，针对子女及村民对老人“搭伙过日子”的排斥，社会工作者可开展访谈，引导子女认识到：黄昏恋是代际关系变迁下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后的自养方式，属功能性搭伴养老，并非不道德行为。同时倡导村民转变认知，认识到新家庭模式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并具有一定正向功能——满足双方生活照料和经济支持需求，缓解子女养老压力，助力老人晚年幸福，从而在思想层面推动对新家庭结构的接纳。

部分中年群体新家庭结构的出现是因为少数女性缺乏自主生活能力、需依附男性。对此，农村社会工作者可立足增能视角，通过专业服务帮助农村女性认识自身能力，缓解就业与家庭照顾的双重焦虑，提升自我效能感。同时协调相关部门提供技术培训，助力女性掌握现代化从业技能、拥有一技之长，增强就业竞争力；倡导政府注重劳动力市场资源均等化，协调劳动社会性别关系，保障农村女性就业机会均等[8]；并提议在相关法律政策制定时进一步关注女性特殊劳动保护，实现女性劳动就业权利与福利的平等发展。

三、“家庭—家庭”维度：农村社会工作的乡村社会关系联结与协同路径

（一）发挥家庭长老作用，培植本土社会工作根基

在生计模式变迁背景下，利益互惠成为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培养乡村地区本土社会工作者，需发挥家庭长老的作用，重唤农村地区情感温度。农村本质上是以家庭为核心的外延归属地，宗族家庭中长老具有向下规范各分支家庭内在行为，向上加强各宗族家庭联系的作用。发挥宗族长老作用，推动社会工作的适宜性，打造农村地区服务可持续的帮扶路径，推动

村落内部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情感沟通，弥补农村地区因人际关系功利化造成的情感交流缺位。

生计变迁下家庭结构变化所引发的村中老人养老难、儿童照顾困难和家庭夫妻矛盾等问题，其根源在于村民被照顾需求增长与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供需矛盾。农村社会工作者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可注重培养当地家族中具有话语权、能协调宗族大家庭关系的长老，使其掌握社会工作专业基础知识和技术。推动农村长老承担本土社会工作者角色，在日后地区发展中提供持续性服务，为各个家庭之间的联系提供可能性，推动农村地区和谐交往，加快相互支持的社会关系网建立。

（二）倡导文化建设，厚植“熟人社会”根基

我国传统农村是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熟人社会，其社会交往结构相对独立[9]。生计变迁下熟人社会变为“陌生化”社会，人际关系逐渐转变为以利益互惠为核心，村民娱乐生活相对匮乏，难以满足个人精神需求。具体实践中可采取加强文化基础建设、重构熟人社会的方式应对村民群体认同感的改变。农村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的过程中，应从协调地方资源、引进企业投资、争取当地政府财政拨款等方式介入，保障基础建设投入，打造有文化、有温度的乡村氛围。通过棋牌室、运动馆、休闲麻将室等多元文化载体建设，增加村民农闲时间的交流，保留生计变迁下的乡村人与人之间的温存关系。

不同家庭之间的交往是以个体互动的形式表现的。农村社会工作服务要适时回应当地村民的需求，开展邻里互助、家庭交流活动，强化村落内群体信任感；在农闲时刻巧用腊八节、春节等传统节日组织村落文艺汇演，共享家庭美食，增进文化交流；打造村民娱乐室，推动休闲服务常规化等，这些方式都是具体工作中的有效方法。同时农村社会工作者采用社区工作方法，通过倡导居民回忆过去，整理当地的村落发展史、宗族发展史和个人生命故事，唤起集体记忆背后的文化认同，构建特有的乡村文化，强化乡村内群体归属感。

（三）以家庭带动社会，发挥辐射作用

家庭是个体存在单位、生活基本场所与社会关系出发点，以家庭为核心发挥辐射作用，是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基础性支撑。在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以家为中心的逻辑仍具重要价值。农村社会工作可推动重塑宗族血缘为基础的联系，恢复农村血缘与地缘层面的文化信任、生计信任，为村落群体搭建家庭间情感栖息地[10]，使得“个体动力→家庭和谐→社会协调”的以点带面模式，在当前生计变革与村落关系变化中更显生命力。从根本而言，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性源于以家庭为核心的民情与伦理取向内在一致[11]。在生计变迁背景下，面对村落群体互助与竞争交织的现状，激活家庭核心效能成为推动农村人际关系改善的关键。农村社会工作可通过倡导家庭核心人物引领、提供本土专业服务、完善家庭文化基础设施等方式，促成家庭内部和谐，同时以家庭为纽带向外辐射。例如，社会工作者宣传家庭间的沟通技巧，能直接改善乡村整体人际关系，助力农村适配生计模式变迁带来的家庭结构与社会关系变动。

四、结语

农村生计模式的深刻转型催生了生态、经济、社会及家庭层面的系列问题，农村社会工作通过专业介入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路径。本文立足系统理论，从“个体—环境”“个体—家庭”“家庭—家庭”三个维度，梳理了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方向：在个体与环境层面助力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安全与社会动力激发；在个体与家庭层面推动家庭功能重塑、角色调适与新型家庭接纳；在家庭与家庭层面强化本土力量培育、文化共建与社会关系协同。

需要正视的是，本文研究聚焦微观互动场景，对农村社会工作与宏观政策的衔接、不同区域生计变迁的差异化适配等探讨不足。未来可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结合区域特征构建更完善的介入框架，并通过实践验证优化路径，为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提供支撑。

参考文献

[1] 熊正贤 . 西南民族地区农民生计方式的变迁与演进——基于乌江流域穿青人的视角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3(05): 100−105.

[2] 曹帅 .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农村非法集资防控对策研究 ——以邢台为例 [D]. 北京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 2020.

[3] 李同彬 . 农户的融资需求与农村金融的有效供给 [J]. 理论探讨 , 2011(06): 78−81.

[4] 徐勇 . 县政、乡派、村治 : 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J]. 江苏社会科学 , 2002(02): 27−30.

[5] 陈书伟 , 王智新 . 农村居家养老创新发展研究——基于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背景 [J]. 石家庄学院学报 , 2021, 23(01): 87−91.

[6] 姚家春 . 中国传统孝道在现代道德建设中的价值思考 [J].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 2007(06): 35−36.

[7] 焦若水 . 家的复归与赋权 : 农村社会工作整合发展的文化基础 [J]. 甘肃社会科学 , 2021(02): 104−111.

[8] 刘晓辉 . 当代中国女性发展探析 [D]. 济南 : 山东大学 , 2010.

[9] 文军 . 农村社区建设 : 乡村结构变迁中的新治理 [J]. 探索与争鸣 , 2012(11): 11−12.

[10] 徐安琪 , 张亮 , 刘汶蓉 . 家庭 :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功能变迁和政策支持 [J]. 社会科学 , 2006(04): 31−38.

[11] 肖瑛 . “家”作为方法 : 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 [J]. 中国社会科学 , 2020(11): 172−191.

（下转 173 页）

新时代军兵种特色文化育人的原则探析

郑中伟 周建彩 天　羽

摘要：军兵种特色文化是特殊使命任务、特殊作战环境、特殊作战方式的特殊军人群体所客观存在的特殊作战精神、特殊血性品格、特殊外在风貌、特殊价值评价等的外在体现，只有坚持均衡与适切、协同与融合、守正与创新，才能充分发挥军兵种文化育人功能、提升文化育人工作成效，展现军兵种文化的独特魅力，激发官兵对军兵种文化的思想认同和情感共鸣，更好地激励官兵成长成才。

关键词：新时代；军兵种特色；文化育人；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军事院校教育随着“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三全育人”理念的推广，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变革，军兵种院校教育迈入了新征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继承了我党我军军事教育思想中注重教育训练的战略性、注重党性要求、注重军政素质提高、注重实战训练、注重校风建设等优良传统，从理论与实践上回答和解决了我国“由大向强”发展、实现强军兴军对我军军事教育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把军事教育指导思想提升到时代的高度，把人才培养质量和标准提升到世界一流的基准上，把军事人员现代化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统一起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教育思想和当代中国军事教育实践发展新境界，为军兵种院校承担新使命提供了遵循。

新时代军兵种特色文化育人必须提高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的政治自觉，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这一核心价值导向深刻影响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人民军队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相协调，其根本任务在于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进的坚强力量。兵种特色和军校属性要求各军兵种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坚持原则，遵循听党话、跟党走的方针，以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为己任，要牢牢把握政治建军要求，聚焦强军目标，在思想引领和人才培养上持续发力，重点培育政治过硬、作风扎实、勇于担当的各军兵种专业人才。文化建设的艺术性和军事发展的现代性要求军兵种文化在育人上要坚持原则，遵循艺术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着力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高素质、专业化军事人才。要完成新时代军兵种特色文化育人的历史任务，军事院校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一、均衡与适切原则

均衡与适切讲的是文化的适配与比例，好的文化总是恰如其分，增之一分则多，减之一分则少，只有保持文化的适切性，才能让文化春风化雨，沁润渗透而不自觉。军兵种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也带有明显的适切性。

（一）军味与文味的均衡适切

军兵种文化是强军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军事气息和文化需求，既要为提升战斗力和军人素养服务，又要富有文化艺术气息，增强审美趣味和艺术吸引力。在军兵种文化建设中，新时代军兵种特色文化育人要把握好军味与文味的均衡适切，要秉持“文化也是战斗力，文化催生精气神”的理念，满足官兵的

（上接 172 页）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双碳’背景下内蒙古乡村清洁供暖的长效机制研究”（2024NDB171）。

（作者：李振鑫，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省社会工作协会副秘书长；通信作者利爱娟，内蒙古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鲍旭圆，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

文化需求、审美需求、艺术需求，烹制符合新时代官兵“胃口”的文化大餐，又要不忘战斗力标准，坚持军事文化姓军为军，坚持树立为战导向，大力培育军兵种精神，让官兵在充满“军味”、饱含“战味”、富有“文味”的文化氛围中塑造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特色鲜明的兵种作风[1]。

（二）供给与吸收的均衡适切

文化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供给，什么样的文化培养什么样的人。“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对于年轻官兵而言，因为对文化缺乏一定的判断力和鉴别力，所以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提供给他们什么文化，就会生成什么文化；生成什么文化，就会吸收什么文化，认可某种文化。

新时代军兵种特色文化育人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官兵的文化吸收和接受为标准，供给再好，官兵不接受、不吸收、不内化，也达不到“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以文滋战”的文化建设目的。文化供给要走心、要接地气，阳春白雪不见得一定就比下里巴人好，要满足官兵文化需求的多样化，不要固定模式，要符合官兵知识接受水平和思想接受能力。

（三）宣传与教育的均衡适切

教育离不开宣传，教育不等于宣传。让教育普遍开展并深入人心，离不开正向的宣传，但宣传过多就会影响教育的效果，引起受众的心理不适，产生厌烦和逆反情绪，从而削弱教育的效果。新时代军兵种特色文化育人要搞宣传教育，但要减少乃至消除硬性宣传，文化育人要坚持文化的软实力，要春风化雨，而不是暴风骤雨。强硬的宣传会引来受众的反感，而恰当的文化教育则会让人如沐春风。

二、协同与融合原则

文化育人注重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素质培养，在文化的运行与教育渗透中，要注意协同，注意与其他育人方式融合发展，在协同中并行不悖，在融合中恰当自然，要反对为了文化而文化，须知文化来自自我创造与传统历史的完美融合，是在和谐的氛围中共生共长的[2]。

（一）全员参与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共同体。新时代军兵种特色文化育人需要在“三全育人”的大背景下贯彻，不能孤立执行，“全员”强调的是育人主体的全面性，在军兵种特色文化育人的实践中，育人主体主要包括军委、军兵种职能部门、军兵种院校、军兵种部队、军事职业教育平台、军兵种官兵等，主体之间的一体推进和联动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条件。各主体要丰富合作培养内容，采用多元合作方式，创建合作培养机制，建立一体化的充裕教育资源，明确主体权责，提升各培养主体的育人积极性和有效作为。

（二）一体培养

军兵种人才培养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过程，需要统一规划、贯通设计、递进培养和持续发力。人才培养层面，应当设计完善新时代军兵种特色人才的具体培养方案，需要明确军兵种人才培养不是为某些具有天赋的个人设立的，而是为大部分军兵种专业人才提供的兵种专业选择。以此为思想前提，军兵种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实施军兵种特色文化育人，需要把握军兵种人才培养的稳定性、连贯性和预见性，既要为投身于军兵种建设的个体设定一套科学合理的递进式培养方案，又要为军兵种人才的全面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为军兵种人才发展提供足够的时长和连贯稳定的路径。要充分发挥军队“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的作用，建立立体多维的培训体系和工作体系，一体化推进军兵种文化建设。

（三）全面融合

新时代军兵种特色文化育人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实践性，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强调宽口径、厚基础和强素质。军兵种人才面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综合性需求，并不意味着军兵种学科专业开设的课程越多越好，也不代表失去了学科专业的专属特色，而是要加强反映学科专业属性的课程教学和素质培养，实现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人才需求。新时代军兵种特色文化育人的育人体系不仅能塑造军兵种人才严谨的思维和科学的精神，还能提升军兵种人才的气质内涵和道德修养，将军兵种人才培养成博学多才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四）全域协同

军兵种人才培养多年来一直沿用传统模式，普遍走的是一条军事院校培养之路，这条路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遵循人才培养的多元化与综合化趋势，探索人才培养合作交流的新模式，增进合作培养的广度和深度，成为军兵种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以“立足军事院校”为前提，以“军地联合培养”为补充，以“满足人才多元化发展需求”为目标，迅速成为军兵种人才培养模式的现实方案。目前军地联合培养定向直招士官已经成为军兵种人才培养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军兵种人才培养要从人才的准入、选拔，岗位的兵种需求和特点，人才的使用反馈，再教育的深化拓展等维度，加强体系设计，共同发力，全域协同。

三、守正与创新原则

时代在发展，文化在进步。作为军兵种文化建设，不能故步自封，不能停留在故纸堆上，要紧跟时代大势，要穿新鞋走新路，要在守正中坚持原则和传统，在创新中尊重时代、尊重受众。

（一）避免机械传承

时代环境不同，人才需求不同、发展目标不同，

人才培养方式也应有所不同。新时代军兵种人才培养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顺时代所趋、借国家之力、应人才之需转换人才培养方式，摒弃缺乏军兵种特色的同质化的方式方法，推进人才培养方式从单一到五维的整体变革，构建多样态多向度的协同培养方法体系，以全员、全程、全面、全域的视角，精准促进主体协同、层次协同、学科协同，充分整合利用跨学科、跨院校、跨地域的资源优势，联结多方力量形成人才培养合力，提升人才培养效果，避免机械传承原有的育人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助力实现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军事人才的预期目标[3]。

（二）结合时代特点

进入新时代，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对军兵种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高素质军事人才，是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点工程。精神素养是新时代军兵种人才成长成才、爱国奉献、责任担当的内在要求和外显表征，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军兵种人才的思想观念、政治立场、价值取向、道德情操和行为习惯，是新时代军兵种人才更好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键要素。新时代军兵种文化育人是实施人才强军战略，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适应当下和未来激烈国际军事斗争，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顺利进行的迫切需要。

（三）突出兵种特色

军兵种特色文化育人，既要遵循传统军事文化育人的普遍规律，又要把握自身特点、彰显兵种特色，尤其要针对军兵种使命任务、历史传统和装备技术等特点，积极采取不同形式的途径，构建和培育让人耳目一新、为之一振、独具特色的军兵种文化品牌。军兵种特色文化包括四个层次（核心层、理论层、实体层、表象层）和九个要素（价值观念、伦理哲学、科学艺术、规章制度、道德规范、工作方式、行为习惯、形象艺术、语言艺术）。建设军兵种特色文化必须从这些要素的设计着手，逐步构建起一个完整而严密的逻辑体系。

（四）注重情感熏陶

情感是人类对客观事物所持态度的主观体验，反映了主客体之间的需求关系。这种心理现象具有相对稳定和持久的特征。当外部事物与个体需求产生关联时，就会引发相应的价值判断和态度反应，从而形成特定的情感体验。军兵种特色文化育人是对课堂情感教学的内容和深度的有效延伸，它以直观、形象、深刻、持久的情感体验丰富军兵种人才的兵种情怀，从而使军兵种人才产生强烈的情感体验，并自觉净化自己的心灵，在热爱军兵种文化的强烈情感中，增强文化自信，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自信担负起民族复兴的文化使命，做到了知行合一，由外而内的情感升华[4]。

（五）弘扬时代精神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源于新的实践探索，体现了社会前进方向，已成为大众广泛接受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貌。2021 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这不仅是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也是对文化建设和军兵种特色文化育人的要求，我们要牢记只有符合时代要求，反映时代心声，唱响时代旋律，弘扬时代精神的文化才能不断激发军兵种文化向军为战、向上为善的正能量，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5]。

新时代军兵种特色文化育人是军兵种在长期发展演进历程中孕育、在丰厚的军事实践中积淀的精神财富，承载着军兵种的历史底蕴、文化传统和精神特质。特色军兵种文化则是特殊使命任务、特殊作战环境、特殊作战方式的特殊军人群体所客观存在的特殊作战精神、特殊血性品格、特殊外在风貌、特殊价值评价等等，是相对稳定、固定不变的，只有坚持均衡与适切、协同与融合、守正与创新，才能充分发挥军兵种文化育人功能、提升文化育人工作成效，展现军兵种文化的独特魅力，激发官兵对军兵种文化的思想认同和情感共鸣，更好地激励官兵成长成才。

参考文献

[1] 周思轩，尚伟，黄艳雁 . 红色文化遗产的育人价值与路径分析 [J]. 安徽建筑，2025, 32(05): 110−111.

[2] 罗燕 . 走向理解的红色文化教育：意蕴与实现 [J]. 现代大学教育，2025, 41(03): 66−71.

[3] 黄欣 . 新时代伟大长征精神的育人价值研究 [J]. 水文化，2025(05): 25−28.

[4] 洪一洋，魏国卿 . “韬奋精神”与红色出版融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探索与实践 [J].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25, 33(02): 14−19.

[5] 陈士勇 . 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发挥的问题检视与优化路径 [J]. 宜春学院学报，2025, 47(02): 110−113, 119.

（作者：郑中伟，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讲师；周建彩，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副教授；天羽，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副教授）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教学的路径研究

贾秋宇

摘要：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承载着古圣先贤的政治与法律智慧，是数千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经验的结晶。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因子助力法学教育教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因子、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学教育教学的契合性、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教学的具体路径等三个方面，重点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教学的主要内容，以期促进法学教育教学的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历史依据。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法学教育；教学路径；文化传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中华法系中的重要地位，为推进“两创”转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指引。而从教育部对新文科发展“时代化”“融合化”“中国化”“国际化”这“四化”要求来看，最重要的在于如何体现与时俱进、如何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中国正在全力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其中包含的中华法系复兴和全面依法治国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复兴中华法系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高校思政课堂是高校法治教育的重要平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2]。同时，大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有助于更好地分析问题、判断是非，提升防范法律风险、利用法律手段保障合法权益的能力以及运用法治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而坚定对“守法”的认同，提升“用法”的能力[3]。因此，在当代的法学教育教学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智慧，不仅是赓续传统法律文化之需要，也是回望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展望中国法治发展方向的重要参照，更是发展当代法学教育教学体系的文化根基。

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因子

数千年传统法律文化的延续，凝练出了中国古人的法律智慧和政治智慧，集中体现在德法互补、共治的法文化，情、理、法协调统一的法文化，富民、教民、宽民的法文化这三个层面。这些有益因子为当代的法学教育教学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土壤。

（一）德法互补、共治的法文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的国家治理中，凡是盛世，必是德法互补、共治的时代。比如西周的成康之治、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这些都是历史上著名的盛世，更是德法互补、共治的代表性时期。一是成康之治。自西周而始的“明德慎罚”观，就是周公所提出的“德政”的具体体现，而根据史书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由此可见社会之安定、富足。二是文景之治，这是历史上废除肉刑的重要转折期，使墨刑、劓刑等以摧残人的身体为惩罚的法律得到了废除，更是为汉武帝霸业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贞观之治，作为唐太宗在位期间的盛世、治世，不仅为其后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是代表着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极高成就。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德法的互补与共治是治国的重要手段，更是盛世出现的重要指标。

（二）富民、教民、宽民的法文化

纵览数千年古代中国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的治理之策，无不体现着爱民思想。正如孔子所说：“仁者爱人”，而“爱人”就体现在富民、教民、宽民三个方面。一是富民。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古代中国社会，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得到百姓拥护的王朝，往往是土地制度实行得当、运行平稳的时期。比如“尽地力之教”“均田令”等，都是重要的富民之策。二是教民。正如管子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其中

“知”的关键在于“教”，因此如何“教民”便是关键。比如明朝时期将法律思想确定为“明刑弼教”，就是“以礼教治天下”的具体体现。三是宽民。王夫之提出“宽以养民”，其核心便在于重视人命，慎用刑罚。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慎用刑罚。当然这种慎重，不是不用，而是在面对违法犯罪行为时，不设“法外之刑”，不一味严惩，要区分犯罪的故意与过失等不同情节。

重视民生，历来是古代中国社会统治者稳固朝廷的关键所在。周公所提出的“德政”的观点，更是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放到了突出地位。同时，百姓拥戴与否，更是决定着王朝的治乱兴衰。纵览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凡是受到百姓拥戴的王朝，往往被称为盛世，君主被称为明君；而凡是因爆发农民起义被推翻的王朝，往往被称为乱世，君主被称为昏君。以商纣王为例，因其酒池肉林，使百姓饱受疾苦，因此被称为昏君；又如秦二世灭亡的教训深刻影响了西汉初年的统治者，这才有了汉初“黄老无为”的思想，与民休息，宽省刑罚，也才换来了“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纵观中国法律发展史，早在大禹时期，就有“五音听讼”的佳话；至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中，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民主主张；而即使到了清朝末年，康有为更是振臂一呼，高喊“国之为国，聚民而成之”的口号。由此可见，以民为本，重视民生是古代中国造就盛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三）情、理、法协调统一的法文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盛世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法致中和，囹圄常空”。因此，情、理、法协调统一的无讼文化，成为传统司法文化的核心追求。纵观数千年的司法实践，这一理念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固有特点。在小农经济的生产形态中，民众大多依附于土地，生活空间和人际交往范围有限。在这样一个熟人构成的圈层中，一旦因纠纷伤了彼此的感情，往往得不偿失。因此，追求调解便是最佳方案。比如平遥县衙中就有这么一副对联，上联写道：“莫寻仇莫负气莫听教唆到此地，费心费力费钱就胜人终累己”。又如在电影《秋菊打官司》中，典型的一幕是秋菊面对警车离去的背影怅然若失，这不仅是因为秋菊打官司本身只是想要一句道歉，更重要的是在那个乡土社会中，公事公办的做法并不一定能起到最好的效果。由此可见，即便是到了现代社会，调解息争也在体现着“天理、国法、人情”的和谐与统一。

当然，情、理、法协调统一并不是一味地在诉讼中充当“和事佬”、和稀泥，而是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中，使争讼双方互相体谅，让每个人都明辨善恶是非，最终在不影响邻里之情的前提下，使问题得到解决，实现情、理、法的相通。

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学教育教学的契合性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法学教育教学高度契合，这种契合不仅体现在思想理念上的相通相融，也体现在教学目标上的同向同频，更是体现在实践应用中的传承发展。

（一）思想理念的契合：培育德法兼修的中国法律人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强调德法互补、共治，进一步说明了德法并用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这种治理理念与当代法学教育教学的初衷不谋而合。因为当代法学教育教学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培养法律条文的搬运工，更重要的是培育具有良好道德情操的新型法律人。而唯有将良好的道德情操融入法律人才的培养中，才能使被称为“法之死物也”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真正的良法善治。

（二）教学目标的契合：贯彻以民为本的法律初衷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强调以民为本、重视民生，这不仅是古代国家治理的智慧，更是法律制定的根本目的和初衷。就法学教育教学的培养目标而言，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解决社会实际中的法律问题，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尤其是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因此从这一层面而言，以民为本的法律初衷不仅是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更是当代法学教育教学的目标，具有一脉相承性。

（三）实践应用的契合：践行无讼息争的调解机制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强调“以和为贵，调解息争”，体现着古代社会处理基层矛盾的智慧。而这种以“无讼”为核心的纠纷处理方式，恰恰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所追求的目标，更是当代法学教育教学在实践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的法学实践教学中，如何应用调解解决纠纷，如何让民众更加满意，如何实现有温度的执法，如何让司法有情，是法律人所面临的重要命题，而解题的思路恰恰就蕴含在无讼息争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因此，将无讼息争的法律智慧融入当代法学教育教学实践，不仅有助于提升法学生的实践能力，更是实现了古今法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发展。

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教学的具体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法学教育教学的具体路径，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课程。在法学教育中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课程，可以帮助法学学生系统地了解并认识传统法律的发展脉络及其特征，

明晰其当代价值和传承意义，增强文化认同。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课程具有通识性，不需要太专业的法学知识背景即可学习和掌握，因此可以尝试在全校范围内开设该门课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课程不仅可以面向法学专业学生，还可以面向非法学专业学生开设，这样一来，不仅使法学生可以了解更多的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还可以让非法学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优秀因子，增强文化自信。以笔者任教的经历为例，笔者不仅担任法学生“中国法律史”课程的主讲教师，还开设了面向全校学生的公选课“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每年选课人数在300人左右。这样一来，既可以满足法学生学习、了解传统法律文化的诉求，又实现了在全校范围内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宣传与教育，增强了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让他们明白了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问题。

二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因子有机融入现有法学课程中，增强学生的制度自信。当代法学教育教学的课程多以西方分类体系为主，很难让法学生认识到中国法学发展的历史延续性。中华法系对中国的影响绝不仅仅是过去的数千年，更重要的是当下的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蕴含的有益因子不仅是我们赓续法治文化的历史根基，更是筑牢民族自信的文化源泉。如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以亲九族，协和万邦”的天下观、“调解息争，无诉是求”的纠纷解决机制、“矜老恤幼”的刑罚观等，都对现行法律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只有从法律理念、法律制度、法律实践三个层面形成古今对照与融合阐释，才能真正实现法学教育教学在历史脉络上的古今贯通。

三是开展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关实践活动。法学教育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要服务于实践，因此只有从理论走向实践，才能让知识真正落地。以笔者的任教经历为例，在课堂上向学生们讲到“德法互补、共治”时，学生们很难联想到当下的“法安天下，德润人心”这一主旨思想，很难理解其中的古今传承性。但通过组织学生到法院参与真实的法官裁判案件，感受法官的执法温度，就会发现法律不仅仅是一条条冰冷的条文，更是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着道德伦理、体现着人文主义的关怀。法官裁判案件，不是面对一个个被告人，而是面对案件背后一个个鲜活的人生。又如，当在课堂上向学生讲到“调解息争，无讼是求”时，学生们很难联系到当下所提倡的“枫桥经验”，可以组织学生参与到法律调解的过程，真正理解古代息讼的目的和现代“枫桥经验”的异同，使学生在参与法律援助时，能真正明晰“以民为本”这句话沉甸甸的分量，明白裁判案件并不是法官办案的重点，如何解决矛盾产生的根源，实现真正的案结事了，才是案件处理的关键点。通过一次次的法律实践教学，使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学实践教育融为一体。

四、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大学生法治教育，增强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提升大学生的法治素养，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实践途径[4]。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历代圣贤在国家治理中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法律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化根基。当代法学教育教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法律文化内核的吸收与创新发展，而传统法律文化的赓续更需要一代代法律人的矢志坚守与初心不改。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促进国内法学研究以及国际法学研究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5]。因此，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智慧，促进当代法学教育教学发展，是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经之路，更是增强制度自信、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 王立民 . 复兴中华法系与全面依法治国 [J]. 理论探索 , 2025(02): 5−16.

[2] 宋伟哲 . 传统法律文化融入高校法治教育探析 [J]. 检察风云 . 2025(03): 34−35.

[3] 陈慧洁 , 王琳 .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大学生法治教育探赜 [J]. 2024(10): 133−136.

[4] 杨静 .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大学生法治教育的融合 [J]. 厦门特区党校报 , 2025(01): 75−80.

[5] 汪金英 , 王大奇 .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大学生法治教育探析 [J]. 2021(04): 47−5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年河南农业大学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三引四合五步’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以《中国法律史》课程为例”（2023XJGLX122）；2024年校级本科教学工程课程类项目“《中国法律史》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2024KC23）。

（作者单位：河南农业大学）

文化自信视域下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

孟　煜 乔亚鲁 杨尚卿

摘要：以文化自信引领构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为中国共产党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新视角。文化自信视域下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逻辑理路按照“起点—展开—归宿”展开，回答了“文化自信何以引领构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问题。建构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紧紧围绕“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对谁说—效果如何”的实践进路，进一步激发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向心力、内容支撑力、传播竞争力、受众感召力、表达感染力。

关键词：文化自信；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话语权

意识形态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为“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提供了全新思考方向。以文化自信引领构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有利于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大感召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必须从逻辑理路和实践进路层面加以把握[1]。

一、文化自信视域下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逻辑理路

明晰逻辑不仅是以文化自信引领构建具有强大生命力、现实感召力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提供了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逻辑支撑。

（一）逻辑起点：意识形态传播的底层逻辑

语言是意识形态的传播媒介。意识与语言密切相关。语言产生于人类与客观世界交互的实践活动中，能够表达出使用者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和阶级属性。作为人类交往的工具与文化的载体，语言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教化思想、凝聚共识的作用，因而成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媒介。

语言是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载体。意识形态话语权是社会意识形态工具的呈现形式，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党建设中发挥着价值引领、政治保障、社会整合和形象塑造等重要作用。“既不存在无语言载体的意识形态，也不存在无意识形态导向的空洞的语言形式”，因而统治阶级能够通过语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塑造良好社会政治生态。

民族语言直接影响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强弱。经过漫长历史时期发展形成的民族语言，是国家范围内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天然载体，这是由民族语言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认同所决定的。中华民族拥有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语言智慧。

（二）逻辑展开：文化话语叙事的合法性逻辑

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民族性为以文化自信引领构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理论逻辑。意识形态对观念材料的加工受物质利益影响，呈现阶级性特点；其加工离不开历史观念材料，而意识形态本身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呈现民族性特点。作为文化重要形态的哲学、文学、艺术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必须通过信息媒介等中间环节发生，而以历史文化传统、民族文化基因作为构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切入点，更易塑造全体人民的政治认同和民族趋同。

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面临新挑战，这一情况成为构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实动因。在阶级社会的发展演进历程中，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呈现出诸多新特点。一是智能时代催生意识形态话语权突破传统的单一话语形式，走向涵盖虚拟和现实的综合话语体系；二是国家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践不断受到其他国家有意或无意的冲击；三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在凝聚社会共识方面的重要性逐渐凸显。

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为以文化自信引领构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现实层面的合法性逻辑。在社会思潮碰撞激荡、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的今天，如何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有效维护我国文化安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同时，意识形态安全的背后是文化安全

和社会稳定。新时代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深耕文化沃土、发出主流声音、传播主流价值、讲好中国故事[2]。

（三）逻辑归宿：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发展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引领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最新指南。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特质和鲜明底色，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强调要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掌握舆论战场的主动权和主导权，为文化领域中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思想伟力[3]。

以文化自信引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从话语内容、话语表达、话语传播入手，在坚持和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中夯实意识形态根基。一要挖掘文化资源，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中国底气。这种文化主体性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源于继承革命文化、赓续红色血脉，源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引领。二要实现话语融通，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中国特色。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实现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生活话语的协调发展，既要依托文化底蕴，实现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融通，实现意识形态话语的学术化表达，又要激发文化认同，实现政治话语和生活话语的互证，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活化表达。三要讲好中国故事，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中国智慧。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既要用大众语言阐述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又要用时代语言延展意识形态话语内涵，进而增强公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影响力，本质上就是要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二、文化自信对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重要性

（一）提供坚实的文化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历经数千年传承与发展，积淀下丰富而深厚的思想智慧。像“仁爱”“礼义”“诚信”“友善”这些传统价值观，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确立了行为准则，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投身革命斗争过程中凝结的宝贵精神财富，它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也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顽强的革命意志和无私的奉献精神。革命文化中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等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要求高度契合，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筑起坚实的精神支柱。

（二）增强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文化自信能让主流意识形态更具魅力、吸引民众认同，其核心在于蕴含着对自身文化价值的高度肯定。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充满自信时，其主流意识形态自然会带着这份自信的力量，以更生动、更鲜活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体现，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沃土中。这份深厚的文化根基，赋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大的生命力与感染力，也让人们在情感层面更容易产生共鸣、形成认同[4]。

文化自信所激发的文化创造力与创新活力，也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和传播注入了新动力。在文化自信的引领下，文化工作者能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当下时代需求做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在潜移默化中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三、文化自信视域下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实践进路

话语权是信息传递过程中呈现的主动权，把握这一主动权需紧紧围绕“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对谁说——效果如何”的话语生成机制，进而巩固和强化话语权。

（一）依托文化底蕴赋能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向心力

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明确意识形态话语“谁来说”的问题，即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产者是谁的问题。在阶级社会中，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主体大多是统治阶级或其他精英集团的成员，他们肩负着传递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使命。在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体生产者无疑是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更具文化底蕴，激发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创造力和认同感。

话语主体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激发创造活力。话语主体在生产意识形态话语时，必须以维护党和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发展为根本目的，在任何时候都要强调政治标准；必须以引导公众思想认识和行动为基本原则，在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发挥启智润心、教化育人的作用；必须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推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应用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中[5]。

（二）推进文化自强赋能意识形态话语的内容支撑力

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明确意识形态话语“说什么”的问题，即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产内容是什么的

问题。一要讲清楚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自信来源。揭示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赋予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我们党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坚实文化基础。二要讲清楚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信仰底色。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孕育的先进文化，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革命立场，有助于在新时代激扬信仰力量、凝聚价值共识、淬炼思想自觉，厚植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红色底蕴。革命文化造就了中国人民文化意义上的红色基因，为中国共产党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奠定了鲜明信仰底色。三要讲清楚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时代品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创新，是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革命文化的文化创造成果，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造就了中国人民文化意义上的发展特质，为中国共产党构建意识话语权奠定了时代创新品格。

（三）用好文化载体赋能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竞争力

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明确意识形态话语“怎么说”的问题，即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传播方式。一方面要坚守传统媒介领域，警惕不良社会思潮的文化渗透。当前，一些不良社会思潮披着学术交流或文化互鉴的外衣，传播别有用心的价值观念，其目的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警惕错误社会思潮和不良价值观念的渗透和传播，采取各种举措坚守文化宣传的现实载体，筑牢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要利用网络媒体平台，创新拓展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渠道。网络时代的话语权格局迅速调整，话语主体由精英阶层向下延伸，话语表达更加凸显平民色彩。传播意识形态话语要主动适应时代发展，充分发挥网络平台优势与文化自信的引领作用。一是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果应用于媒体治理，增强媒体说服的效能；二是要实现传统文化产品的网络嬗变，打造线上线下相互融通的话语宣介模式；三是要厘清网络媒体平台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在信息化浪潮中始终确保话语权的社会主义本质。

（四）强化文化认同赋能意识形态话语的受众感召力

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明确意识形态话语“对谁说”的问题，即意识形态话语能否得到认同的问题。话语认同是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因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必须在话语生产主体与大众共融共识的过程中实现。意识形态话语受众的认同感与生产主体息息相关，认同问题本质上是检验话语生产质量是否满足传播要求的核心标准。

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受众的认同感，重点要实现人民群众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价值认同、情感认同和利益认同。一要发挥科学理论文化的引领作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激发人民群众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价值认同；二要发挥历史文化资源的引领作用，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焕发现代魅力，激发人民群众对民族话语的情感认同；三要发挥社会文化生活的引领作用，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需要，实现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层面的价值认同[6]。

（五）实现文化交流赋能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感染力

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明确意识形态话语“效果如何”的问题，即意识形态话语最终效果实现路径。一方面，要创新大众化阐释，进一步凝聚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合力。宣传思想工作的最终指向是要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在和人民群众的双向互动中凝聚全社会共同的思想基础。具体来说就是要用好文化典故、习惯表达、时代热词。另一方面，要推动国际化传播，加快构建面向国际的中国话语叙事体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国际化传播，并非强制性的话语输出和非此即彼的文化斗争，而是秉承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的观念，在与各国的交流沟通中让世界聆听中国声音、让世界感受中国魅力。

四、结语

构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执政根基的关键环节。只有在厘清以文化自信引领构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逻辑道路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实践进路——即在弄清楚“为何能做”的前提下探索“如何去做”，才是研究这一课题的科学态度。

参考文献

[1]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N]. 人民日报 , 2023-10-09(001).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09.

[3] 俞吾金 . 意识形态论 (修订版)[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4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12.

[5] 习近平 .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知 , 2023(09): 4-7.

[6] 皇甫闪 . 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 （下转 182 页）

影视数字资源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运用探究

刘晓霞

摘要：2017 年，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新课标指出影视数字资源要与高中思想政治课相互补充，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育数字化背景下，影视数字资源丰富且价值高，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教师应充分挖掘利用影视数字资源，打造“三位一体”教学模式，为课堂提质增效。基于此，本文从“紧扣教学主题，精心选取影视数字资源；善用课堂导入，巧妙呈现影视数字资源；多维启人深思，精准辨析影视数字资源”三个角度，对影视数字资源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中的相关运用进行深入探析。

关键词：影视数字资源；高中思想政治教学；教育数字化

马克思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 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教师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不仅是授业解惑的“传道人”，更是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领路人”，是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指导者”。首先，《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明确提出课程的基本理念是可以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展教育资源和教育空间[2]。在实际的高中思想政治教学课程中，引入影视数字资源能够帮助教师达成教学目标，教师应该将影视数字资源中的红色精神内涵与课程教学内容要点进行充分融合，同时应当充分发挥影视数字资源的精神引领作用，使学生不仅能够深刻理解课本相关知识要义，还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自觉抵制不良思想侵蚀，筑牢坚定的思想政治观念。

一、紧扣教学主题，精心选取影视数字资源

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理论教学中，教学素材的选取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既要紧密贴合学生的实际生活，又要呈现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影视数字资源作为教学素材的一部分，不仅要链接学生的实际需求，更要紧扣教学的主题，教师需紧密围绕教学目标展开课堂教学，以此确保影视数字资源的育人价值得以实现[3]。因此，在选取影视数字资源之前，思政课教师应该深入学习教材中的相关知识内容，充分整合教材中的知识体系，理清知识逻辑，梳理每一堂课的重点与难点内容，从多角度评估学生的认知水平，询问学生的困惑点，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的实际问题，从而达成教学目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此同时，影视数字资源是现代数字媒体发展的产物，而人工智能则进一步重构了现代数字教育资源体系，通过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人工智能被赋予强大的叙事能力，这使得作为客体的“技术人造物”升格成了“教育主体”[4]。思政课教师应充分利用现代数字媒体平台，筛选适切的影视数字资源，融入高中思想政治课堂，为课堂提质增效。

以统编版《思想政治·必修 3》第十课第一框“正确行使诉讼权利”的教学为例，教师可以选取展现我国司法改革的最新成果的法治题材电视剧《底线》的精彩片段，以真实的庭审过程来普及相关法律知识，截取剧中“雷星宇故意伤害案”，此案件由榕城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宋雨霏负责，庭审当日在中国庭审公开网进行了案件直播，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课之前，教师要督促学生做好相关课本预习，建立学生对于本堂课内容的知识框架，从而提升课堂教学

（上接 181 页）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四重维度 [J]. 学术探索 , 2022(02): 20−26.

（作者：孟煜、乔亚鲁，聊城大学硕士研究生；杨尚卿，济南市市中区舜华学校一级教师）

效果。在学生观看视频之前，教师可以介绍当时的案件背景，从而避免一些学生因未看过影片不了解具体事件脉络，同时视频可以经过适当的剪辑从而紧扣教学的主题，在观看视频之前，需要设置议题问题，引发学生思考，让学生带着问题观看视频，从而思考答案，设置的议题需要与教学的主题相联系，同时能够链接本框题的知识点。议学任务设置层层递进的三个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议学问题一：诉讼分为哪三种类型？此案件属于哪种？有人说雷星宇杀人了，不能行使诉讼权利，你怎么看？议学问题二：图片中诉讼代理人是受雷星宇的委托吗？简述理由。议学问题三：在开庭审理中，雷星宇的母亲为何要请辩护人为其辩护？说说你的看法。通过影视剧中的片段，教师需要结合课本知识点和片段中涉及的概念，以深入分析的方式，使学生了解案件的类型以及公民依法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的具体概念，即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在了解诉讼权利的相关概念之后，引入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的角色，从而引导学生理解当事人有委托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的权利。

二、善用课堂导入，巧妙呈现影视数字资源

影视数字资源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极具教育价值，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将影视数字资源中合理精彩的片段以灵活多样的呈现方式展示给学生，同时设置合理有效的议学任务，启发学生思考，其中在课程开展之前，情景导入环节是展开课堂教学的起始环节，课堂导入情况与整堂课的教学效果息息相关，比起枯燥的文字，动态的影视片段更能引人入胜，充分引起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感觉器官，从而引发学生深入思考。因此，教师应该利用影视数字资源形式多样、内容各异、动态有趣的特点，进而灵活将其运用到课堂导入环节中，创设符合教育教学目标和教育教学主题的学习情境，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5]。胡田庚教授认为课堂导入具有集中注意力、激发兴趣、明确目标、联结知识和沟通情感的功能[6]。其次，通过呈现影视数字资源的途径，让学生明白素材来源于生活，从而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教材相关知识。杜威提出，“引导学生做中学，要在发展中求民主。”[7]生活就是发展，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发展是在生活中不断得以发展，生活的过程本身就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对于教学课堂中影视数字资源的开发与运用，也需要教师的主动挖掘和发展，以保障影视数字资源内容的正确性与科学性。呈现影视数字资源的形式因教学主题而异，因教学课程而异，因教学方法而异，内容的选取与形式的呈现应根据灵活多变的教学场景而灵活切换。

以统编版《思想政治·必修 1》第二课第一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教学为例。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放映《觉醒年代》片段，作为本框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情景导入。

该剧全部“诗化”的镜头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莫过于 1919 年 12 月陈独秀为其赴法求学的子女陈延年和陈乔年送行的场景。原本以为是普通感伤告别戏，《觉醒年代》却设计了一个令观众措手不及、泪奔不止的镜头。两位年轻人昂首前行，脚链声响起，剧中用蒙太奇并行剪辑了 1927 年 7 月、1928 年 6 月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镜头，在挨了一拳后，陈延年和陈乔年戴上手铐脚链向前走，两人迈着相同步伐，却奔赴截然不同的结局，仅仅三四分钟的影视片段，却让学生深刻感受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到 1927 年北伐战争时混乱时局的翻天覆地变化，感受革命烈士长期浴血奋战、顽强奋斗的精神，使学生燃起浓浓的爱国之情，理解近代中国寻求复兴的征途是一段何等悲壮且充满挑战的历史，其间，无数英勇的先驱们坚持不懈、勇往直前，展开了无数感人至深的抗争。唯有如此，学生们方能深切体会到，1921 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中国工人运动相互融合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多么鼓舞人心！接下来，沿着时间的轨迹，回顾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各族人民，历经了长达 28 年的浴血奋战与不懈奋斗。这一过程可划分为四个关键阶段：大革命的风起云涌、土地革命战争的烽火连天、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解放战争的胜利凯歌。在这四个阶段的洗礼下，中国共产党终于在 1949 年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斗争史，更是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壮丽篇章。这样，学生对于本框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深刻清晰的体会，从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珍惜美好时光，努力谱写新时代美好篇章。

三、多维启人深思，精准辨析影视数字资源

在实际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呈现影视数字资源后，教师需要组织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多维度多角度启发学生思考，学会辩证看待影视数字资源，以此来加深巩固学生对于影视数字资源和课本内容的理解。高质量的影视资源具有丰富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增强思想政治课实际效果的价值[8]。赫尔巴特根据学生的心理发展特征，主张教学活动应遵循标准化的教学模式，并划分了教学过程的四大核心阶段：首先是“明了”阶段，作为教学的起始环节，它强调教师在授课时需精心规划教学任务，确保教学内容条理清晰、易于理解，旨在激活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紧接着是“联合”阶段；然后是“系统”阶段，对所学知识进行整合；最后是“方法”阶段，侧重于知识的应用与实践。在这一框架中，“明了”阶段尤为关键，它要求教师以科学的方式展现教学内容，为学生搭建

起新旧知识之间的桥梁[9]。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起于思，思源于疑。首先教师应该教会学生思考问题，同时教会学生辩证分析问题，此学习过程能不断提高学生思考探究能力，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索求知欲望，帮助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其次，教师要引导学生开放性思考问题，支持多种结论，不能框定在单一固定的课堂内容中，从而形成单一的刻板结论，最后，以小组为单位深入讨论议题，让学生以合作小组为单位思考探究影片所体现的思想价值，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锻炼学生之间的合作交流能力，另一方面通过集思广益的方式，多角度思考，从而使影视数字资源的育人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基于此，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人，教师作为课堂的引领者，要善于激发学生的问题探究意识，引导学生透过现象剖析问题本质，明晰问题现象，探析问题缘由，紧抓问题核心，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不仅仅得益于人类的主体地位。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0]因此，教师应该帮助学生树立主体意识，引导学生主动探索问题根源、发掘影视数字资源，进而辅助学习过程。

以统编版《思想政治·必修3》第十课第二框“严格遵守诉讼程序”的教学为例，教师可以选取热映的电影《第二十条》的片段，从而引出教学主题，影片中，康村王永强为保护遭到多次强暴的哑巴妻子，捅伤村霸刘文经，刘文经的家人纠集村匪恶霸到检察院上访闹事，要求判处王永强死刑。另一方面，韩明的儿子为制止校园霸凌见义勇为，将学校张主任的儿子打伤，关于是否应该向伤者道歉，双方展开了拉锯战。比如：什么是诉讼代理人？诉讼受理机构有哪些？刘文经的家人为什么会向法院提起诉讼？什么是起诉和应诉？在学生思考完这些问题后，可以进一步组织模拟法庭的活动，让学生切身感受审判人员、原告、被告这些角色，深刻了解法庭审判的真正法律意义，再从剧中王永强案主办方检察官吕玲玲在与韩明争论案件时发出的质问“你觉得这些都对吗？这些行为都指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从而引发学生思考，明白法律彰显社会公平正义，法不能向不法低头的深刻含义。

四、结语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11]影视数字资源在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中的运用并不是数字技术和资源的简单叠加，反而是一项系统的多因素作用的程序。首先，必须坚持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教育初心，同时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加以创新应用。其次，必须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养成正确的数字责任价值观，自觉抵制数字时代的错误思潮，同时坚持“资源理性”与“人本关怀”相结合，正确处理影视数字资源与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人”的问题，使发展过程协调一致，充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影视数字资源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运用效益最大化。影视数字资源给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带来了巨大的创新动力和创新空间，身为思政课教师，应该抓牢时代机遇，促进影视数字资源与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课堂的紧密结合，充分利用影视数字资源，通过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赋能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践。最后，应当辩证看待影视数字资源，影视数字资源是有工具使用属性的，应当直面影视数字资源带来的现实挑战，辩证筛选影视数字资源，紧扣教学主题，以此启发学生辩证思考，以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大力开发影视数字资源，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版2020年修订)[S].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3] 方雯灿，刘越男. 面向多元场景的红色档案资源利用需求分析 [J]. 山西档案，2024(01): 57−63.

[4] 张刚要，梁青青. 人工智能的教育哲学思考 [J]. 中国电化教育，2020(06): 1−6, 64.

[5] 吴恒仲，张桂华. 数字技术驱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探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10): 74−76.

[6] 胡田庚. 新理念思想政治(品德)教学技能训练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7] 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8] 于安龙. 优质影视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析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8(09): 70−72.

[9] 赫尔巴特. 教育学讲授纲要 [M]. 李其龙，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2.

[11] 王爱祥，古静. 数字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逻辑与实践遵循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09): 75−78.

（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山西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研究

张艳丽

摘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体系，是践行时代新人培育战略的必然要求，体现铸魂育人、立德树人的时代责任和使命担当。本文主要从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山西高校思政教育的意义、主要内容、路径研究展开论述，力求突破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瓶颈，用党的理论筑牢大学生信仰之基。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山西高校；思政教育

党的二十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开创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和新境界。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非常必要，因此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努力探索和创新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途径，有利于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助力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一、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山西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高校教师要用自己的职业情怀和宏大格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刻认识教育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坚持“三全育人”和“五育并举”，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为高校教师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引导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等，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目标、增强民族自信，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1]。

（二）有利于丰富和深化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

党的二十大报告是党和人民集体思想和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可以用党最新的理论成果武装大学生的头脑，有利于增强思政教育的时效性和增强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高校思政教师要研究好、阐释好、传播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尽快进课堂、进头脑、出成效。

（三）有利于提升高校思政教育质量

当前全球各种文化之间交流碰撞增加，地区冲突时有发生，不稳定因素增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体现的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以及形成的一系列理论成果都蕴含了丰富的思政元素和思政价值。深刻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中国形象、中国智慧、中国模式、中国力量等内容，并将其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有利于为思政教育注入新鲜的血液，提升思政教育的整体质量和效果[2]。山西省是能源大省，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山西省高校思政教育整体较为传统和落后，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山西高校实际相结合，有利于实现对人才的全面培养，从而服务于全省高质量转型发展。

（四）有利于增强思政教育的联动效应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可以增强联动效应，有利于打破思政教育各环节、各主体的壁垒，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合力。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核心论断，如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与思政课教材章节精准对接，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章节中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发展”的解读，让理论知识形成闭环。挖掘专业课中的思政元素，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与专业领域结合，如工科专业可以聚焦“科技自立自强”，使思政教育从“思政课独担”变为“所有课程共建”，避免内容碎片化。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教育中可以有效改变目前思政课单方发力的局面，推动各方力量联动发挥作用。

二、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山西高校思政教育的主要内容

（一）讲好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自党的十八大后的十多年来，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要讲清楚新时代十年我们国家各领域发生的变化和面对的形势，讲清楚新时代十年我们经历三件大事，讲清楚过去十年我们采取的举措变革。感知这些伟大变革可以让大学生全方位认识国家的政策变化，从而产生认同感，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民族复兴的信心，增强使命感和危机意识，能主动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

（二）讲好中国式现代化

要讲透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要求，讲清楚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出的路径。引导大学生自觉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主动将个人理想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大学生思政教育要将党和国家各行业的大政方针融入其中，以指导各专业学生进行职业定位和行业选择。结合山西实际情况，要对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乡村振兴等做重点解读。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思政元素，其中包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等，引导大学生树立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能够经受重大考验。

（三）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伟大的时代催生了伟大的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了时代之问，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要讲清楚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其中蕴含的方法论，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这一思想的重要意义，引导学生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高度，整体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争当新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四）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学校专业特点相结合

要根据各专业、各课程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融入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例如在经济学类课程中重点融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内容；针对采矿工程专业学生，要融入“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等内容，努力找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各专业课程的思政结合点，能促进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融入思政教育中。

三、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山西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研究

（一）建立思政育人的长效机制

深入挖掘党的二十大精神内容，健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校园入思政课堂的制度机制，提高思政教育中相关内容占比，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师资教育队伍建设，以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在校园蔚然成风。

一方面，高校要重视思政队伍的建设，打造一支“专职为主、专兼结合”的思政教学队伍，构建各学科教师、校外各行业先进模范、优秀工作者等组成的“大思政”育人共同体。培养一支立场坚定、教学专业的思政课程教师队伍，是加强高校思政课程理论教学的前提[3]。发挥思政课教师“主力军”和大思政队伍“协同军”的作用，把优秀师资请进来，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合力提升育人实效。要经常组织专兼职教师集体备课，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研究探讨，紧密结合当代大学生的成长需求，将山西发展现状和发展规划融入相关课程讲授中，引导学生主动将个人职业规划与地区发展结合起来，投身新时代山西建设之中。

另一方面，高校要加强组织建设，完善考核评价体系。高校要组织干部、党员、思政课教师集中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要从上到下制定专题学习计划，并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加入干部党员日常理论学习中，利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党支部书记讲党课”“开学第一课”等形式形成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良好氛围，加强组织管理和考核评价，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列入党总支、党支部年度考核内容。

（二）发挥好思政课堂的主导作用

结合高校思政教育的实际情况，要发挥好思政课堂的主导作用，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课堂，通过课堂系统讲授学习，使大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二十大精神。

一方面，要丰富教学手段和方式，通过多种方式来提升课堂效果。高校教师要借助新媒体工具来辅助上课，通过新媒体工具更好地进行图片、视频的展示，将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加形象、数据化地展示给学生。在课程讲授中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教学、互动探讨等方式融入党的二十大精神，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课堂教学中增加主题实践汇报等创新内容，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使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人心。例如，可以利用 VR 技术，让学生沉浸式体验学习，通过情景再现，学生参与感增强，可以让学生带着情感感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数字化体验可以弥补传统教学的局限性，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和体验感，给学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要优化思政课的教学思路，构建大思政课教学体系。高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开设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课程或者选修课程，在课程中全面讲授党的二十大精神[4]。同时要深入挖掘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将党的二十大精神相关内容融会贯通到专业课程中，在课堂教学中从不同视角强化大学生思维，

做好课程思政育人工作，构建大思政体系，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传递到每一位师生身边，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三）丰富校园文化活动

结合学校办学特色，设置融入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人文景观，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实现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校园活动“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宣传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对学生的思想引领，高校要实施文化推广活动，打破一切学习的壁垒，为广大师生营造“时时学、处处学”的文化氛围，完善校园文化软环境。举办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教育，引导青年学生立志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民族复兴大业挺膺担当，贡献青春力量。丰富主题教育形式，可以采用短视频、板报、主题讲诵、征文比赛等方式，发挥好活动的思政育人作用；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纳入每月思政教育内容和主题团日活动内容，通过组织各班开展主题班会、主题宣讲、微课、微视频、演讲、观赏电影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完成；在学校官网设立学习专栏方便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同时在学校的文化广场、学生活动中心、操场等地将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教育活动、比赛等成果进行展示；借助学校的红色文化资源，如红色教育基地、红色书屋等举办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活动，发挥红色场馆的育人作用，打造红色文化新高地。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校园网络文化已经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学校要充分利用各种官方微信账号、微博、学校官方网站、短视频账号、抖音快手账号等推送和宣传党的二十大相关的学习资料，建设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使线上与线下文化相结合，共同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四）强化网络教育功能，发挥社会“协同育人”作用

搭建新媒体育人平台，拓展宣传影响力，构建“报、网、端、微、屏”多元传播载体，建设党的二十大精神网络平台和红色主题论坛等，利用学生乐于接受的传播方式展示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提升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效果，要注重引入网络平台、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教师可以在官方网站下载相关的思政影视作品和宣讲视频在课堂播放或者在学习终端进行推送等[5]。同时，还可以借助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终端向同学推送相关内容，实现线上和线下同步发力，便于学生随时随地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教师＋学生＋社会”多方协同，实现力量联动。强化教师队伍联动，组织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共同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教学”集体备课，邀请党政干部、行业专家进校园作专题报告，利用教研室活动、党支部活动等形式打破教师间的学科壁垒，形成育人共识。激发学生主体联动，鼓励学生成立“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社团”，通过朋辈宣讲、主题辩论赛、文艺创作及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等形式，让学生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传播”，同时联动家庭、社区资源，开展“家校社共学”活动，延伸思政教育的辐射范围。

与有关企事业单位合作，共同承担社会教育职责，发挥“协同育人”作用。构建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家长、学校联合育人模式，创建更多的学生“第二课堂”，吸引更多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心加入，邀请更多的专家、讲解员、社会各界人士进入课堂，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推动“思政课堂”的“社会化”。

综上所述，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本文立足山西高校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将党的二十大精神有效融入山西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方法，值得借鉴。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持续加大学习力度，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发展状况，努力使师生把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山西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全面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过程中，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为建设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郑锦龙 .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研究 [J]. 世纪桥 , 2023(05): 79−81.

[2] 钱玺娇 , 储志新 , 王卫卿 .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路径探析 [J]. 高校后勤研究 , 2024(06): 69−71.

[3] 秦海雷 .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程路径探究——评《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 2023, 43(11): 239.

[4] 刘於清 .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原则与路径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 2023(27): 23−26.

[5] 杨媚 .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意蕴及路径选择 [J]. 中国军转民 , 2024(12): 170−17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度山西能源学院思政专项课题“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山西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研究”（SZ−2023003）；2024 年山西能源学院辅导员名师工作室“慧生德润”党建引领辅导员工作室（FDYGZS2402）。

（作者单位：山西能源学院）

思政目标与专业目标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

谭志娇 钱军旗

摘要：课程思政是教书育人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因此，课程思政不能只关注课程和课堂，而是要立体多元地做好相关工作，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到绩效考核等所有环节，都要融入课程思政的元素，有利于课程思政的实施。人才培养方案必须将课程思政要求融入其中，要根据专业属性及特点，明确提出培养的思政目标，包括融入素质目标中的思政素质、融入知识目标中的思政知识、融入能力目标中的思政能力等；并根据其课程体系的特点，融入课程思政的内容，做到思政目标与专业目标融合。

关键词：思政目标；专业目标；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是规范教学活动的执行文件，是教学活动的总体设计。人才培养方案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对于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关系重大，直接影响到教书育人的质量，影响到为党和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实效。因此，实施课程思政必须将课程思政要求和相关思政内容融入其中，要根据专业属性及特点，明确且具体地提出培养的思政目标，包括融入素质目标中的思政素质、融入知识目标中的思政知识、融入能力目标中的思政能力等；并根据其课程体系的特点，融入课程思政的内容，做到思政目标与专业目标融合[1]。在此基础上，制定思政目标与专业目标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

一、思政目标融入人才培养方案是高等职业教育的要求

高职教育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其目标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过程需要德技并修。人才培养方案作为教学活动的总体设计，一定要体现高职教育的特点，满足高职教育的要求，实现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因此，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要将思政目标纳入其中，科学合理地将思政目标与专业目标融合。

（一）思政目标融入人才培养方案是深入开展课程思政的需要

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的高等教育中，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是两条平行线。教学中分工不同：思政课担负着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专业课担负着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的任务。其结果是：政治课的教学结合专业实际不够，专业课的教学缺乏价值引领，人才培养质量欠佳。2014 年，上海市部分高校进行了有益探索，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起来，取得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出现了课程思政概念，激起了其他高校的兴趣，引起了教育部的关注，自此，课程思政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按学科（专业）大类分别提出了课程思政要求。为贯彻落实《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文件精神，必须处理好课程与专业的关系，每个专业都有其特有的课程体系，这一体系由众多课程构成，每门课程都是服务于专业人才培养需要而开设的，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也要服从服务于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由此可见，要实施课程思政，思政目标必须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实现思政目标与专业目标融合。

（二）思政目标融入人才培养方案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需要

高职教育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任，要为党和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可靠的接班人和合格的建设者。这就决定了高职教师不仅要教书，而且要育人，要将教书与育人有机地结合起来。而要实现教书与育人的统一，必须实施课程思政。

从高职教育的现实情况看，各高职院校都在推行课程思政，要求教师结合专业课程教学实施课程思政。但从整体上看，其效果不太令人满意，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一是教师认识不足，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二是教师能力不足，没有掌握科学有效的课程思政方法[2]；三是教育目标不明确，缺乏系统思考和整体设计，而其最为重要的就

是顶层设计。

课程思政的顶层设计，首先要做好专业教学标准的设计，将思政标准融入专业教学标准，使思政标准与专业标准在专业教学标准中科学融合。在此基础上，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是重要的教学文件，是组织教育教学的根本依据。因此，人才培养方案的科学性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要培养德技并修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其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必须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从整体上融入思政目标，包括思政素质目标、思政知识目标和思政能力目标，并保证其科学完整，且与专业目标科学融合，形成具有专业特色的培养目标体系；二是开设能够有效达成专业培养目标的课程体系；三是将专业培养目标落实到每门课程，形成专业培养目标与课程教学目标的对应关系，即课程教学目标是专业培养目标的细分，专业培养目标是课程教学目标的集成。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教师教书育人，保证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三）思政目标融入人才培养方案是适应国际人才竞争的需要

当今世界，科技人才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宝贵资源。由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培养和使用科技人才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在国际激烈竞争的环境下，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面临严峻的挑战，需要各级各类教育工作者深入思考。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如果只注重专业文化知识的教育，而放松思想政治教育，很难培养出德技并修的科技人才；如果过分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而放松专业教育，也难培养出德技并修的科技人才。此外，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教育分科施教，则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缺乏专业之基，专业教育缺乏思政之魂，同样培养不出德技并修的科技人才。唯有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教育，才有利于培养德技并修的专业人才。因此，高职教育应高度重视课程思政，结合不同专业特点，通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分析不同专业人才所需要具备的素质（思政素质、专业素质）、知识（思政知识、专业知识）、能力（思政能力、专业能力），确定人才培养的思政目标和专业目标，并将两者有效地融合，形成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打赢国际人才竞争战，才能培养出素质高、能力强、留得住、肯奉献的德技并修的专业人才。

二、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中存在的问题剖析

人才培养方案作为学校重要的教学文件，各高职院校都非常重视其修订工作。为实现培养德技并修的高技能人才的教育目标，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必须满足课程思政的要求。由于课程思政还处于深度探索阶段，因此，各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思政目标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做得不够好，融入不够充分、准确[3]。主要表现在专业素质未充分列入素质目标、与专业课程相关的思政知识未列入知识目标、与专业课程相关的思政能力未列入能力目标等几个方面。

（一）素质目标缺乏专业素质特点

在现行的国家高职教育专业教学标准中，对不同专业的素质目标提出的都是相同的要求，缺乏体现专业特性的素质要求。各高职院校在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都会受到高职教育专业教学标准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专业素质要求不明确、不充分的问题。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盲目“对标”制定人才培养方案，造成素质目标雷同；二是认识不到位，没有意识到专业素质应列入素质目标；三是没有经过调查分析，对专业素质缺乏研究，没有搞清楚素质目标的完整内容。

为解决专业素质未列入素质目标的问题，各高职院校应从顶层设计着手，首先制定本校的专业教学标准，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搞清楚不同专业的素质要求，科学合理地将专业素质列入素质目标，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专业教学标准，为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提供重要依据。其次，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要研究素质目标与课程体系的关系，保证所开设课程能够支持素质目标的实现。最后，要研究素质目标与相关教学资源的关系，保证学校的教学资源能够支持素质目标的实现。

（二）知识目标缺乏专业相关思政知识

现行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中，其培养规格中的“知识”，只列出了思政课程所涉及的相关知识和专业知识，没有列出与专业有密切联系的思政知识，如学前教育专业教学标准，没有根据学前教育的特点，列出其应有的为祖国培养幼儿的相关思政知识；又如会计信息管理专业教学标准，未能列出其应有的诚实守信、不做假账、透过现象看本质、事物之间广泛联系等相关知识。各高职院校在组织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往往“对标”确定“知识目标”，与专业密切联系的思政知识缺失，难以较好地实施课程思政。因此，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一定要融入符合专业属性的思政知识。

（三）能力目标缺乏专业相关思政能力

现行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中，其培养规格中的“能力”，只列出了相关的专业能力，没有列出与专业相关的思政能力，如会计信息管理专业如何培养学生依据财经法纪检查其财务工作中是否存在违法乱纪的现象，以及正确处理的能力；又如市场营销专业如何培养学生依法维权以及正确处理违反法纪的经济事项的能力等。不同专业都会出现相关思政能力培养的问题，但各高职院校在组织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往往“对标”确定能力目标，与专业相关的思政能力缺失，难以满足课程思政的要求，不利于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专业人才[4]。因此，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一定要融入符合专业属性的思政能力。

三、思政目标融入人才培养方案的实现路径

思政目标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实现思政目标与专业目标融合，需要通过调查研究、专家论证等，具体做好三个融合的工作：一是做好思政素质与专业素质融合的工作，二是做好思政知识与专业知识融合的工作，三是思政能力与专业能力融合的工作。

（一）思政素质进人才培养方案，实现思政素质与专业素质融合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为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学校要以立德树人为目标，教师要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5]。因此，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要将思政素质与专业素质有机融合，确立科学的素质目标。

在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不同的专业，其素质目标应有所不同。要针对专业特点和社会需要来确定专业人才培养的素质目标。其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向教育专家、行业专家、毕业生代表征求意见，收集信息。采集信息可以采用会议形式（线上会议或线下会议均可），也可以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无论采用哪种形式，所收集的信息一定要充分。其中，如采用会议形式采集信息，一定要让所有参会人员充分发表意见，与他人持不同意见者也要让其发表，做到尽其所言。如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采集信息，则要科学合理地设计好问卷调查表，问卷调查表中要充分列出所要调查的问题（指定问题），也要让被调查者任意发表意见（任意问题），从而保证所收集到的信息应有尽有。

其次，将收集到的意见进行汇总、归类，形成有条理的信息。

再次，对归类信息进行整理、加工，去除交叉重复的内容。

最后，请教育专家和专业负责人根据教育教学规律、专业特点、人才培养要求，对整理加工过的信息进行逻辑重构，巧妙地将思政素质融入人才培养方案，从而实现思政目标与专业目标融合。

（二）思政知识进人才培养方案，实现思政知识与专业知识融合

思政素质与专业素质融合，满足了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对高素质的要求，而要满足人才培养对高技术的要求，必须将思政知识与专业知识融合，形成科学的知识目标。在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不同的专业，其知识目标应有所不同。要针对专业特点和社会需要来确定专业人才培养的知识目标。其具体做法与素质目标的做法相同，只是所针对的内容有所不同。通过头脑风暴法或调查问卷法收集意见、汇总归类、整理加工，最后由教育专家确定思政知识与专业知识融合的知识目标。

（三）思政能力进人才培养方案，实现思政能力与专业能力融合

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培养的人才必须具有高技能，这种高技能包括较高的思政能力和专业能力。因此，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还必须确定思政能力与专业能力融合的能力目标。其具体做法还是与素质目标的做法相同，只是针对的内容有所不同。通过头脑风暴法或调查问卷法收集意见、汇总归类、整理加工，最后由教育专家确定思政能力与专业能力融合的能力目标。

四、结语

人才培养方案是十分重要的规范教学活动的文件，实施课程思政，必须将思政目标融入人才培养方案，使其从源头做好课程思政工作。思政目标融入人才培养方案是高等职业教育的要求，是为国家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需要，是科技发展和人才激烈竞争的需要。在高职教学实践中，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要解决好素质目标缺乏专业素质、知识目标缺乏专业相关思政知识、能力目标缺乏专业相关思政能力等问题。要研究和探索如何将思政目标融入人才培养方案，根据其专业特点深度挖掘思政元素，切实做好思政素质与专业素质、思政知识与专业知识、思政能力与专业能力三个方面的融合工作，从顶层设计好人才培养方案，保证课程思政顺利实施，扎实推进，卓有成效。

参考文献

[1] 谭志娇 . 高等职业教育“七进七融”课程思政研究 [J]. 吉林教育 , 2024(23): 56-58.

[2] 余静 . 实施课程思政教师必须具备的素质 [J].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3, 25(04): 48-51.

[3] 颜晓峰 . 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关键在提高教师能力素质 [J]. 理论与评论 , 2024(02): 5-9.

[4] 余浩 . 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融合是实施课程思政的保障分析 [J]. 文存阅刊 , 2020(38): 103-104.

[5] 王凌云 , 龙虎 . 模态理论下影视剪辑技法与应用课程思政路径探索 [J]. 传播与版权 , 2025(01): 100-10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重点项目“大思政视域下‘七进七融’课程思政模式研究”（2024GA114）。

（作者单位：黄冈科技职业学院）

“三全育人”理念下医学院校大创项目投入产出效率提升路径分析

廖春玲

摘要：文章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项目质量方面分析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以下简称“大创项目”）效率评价的必要性，通过对前人关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大创项目效率评价的研究进行分析总结，认为目前医学院校大创项目投入产出不均衡。对此，基于“三全育人”理念提出全员联动、全过程、全方位管理大创项目等路径，以提升大创项目效率。

关键词：“三全育人”；医学院校；大创项目；投入产出；效率提升

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到 2030 年，建成更高水平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医学科研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服务卫生健康事业的能力显著增强。因此，培养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精神是当今医学教育的重点[1]。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以下简称“大创项目”）由教育部于 2012 年正式启动，面向全国高校在校本科生，旨在培养创新精神和科研素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遵循“兴趣驱动、自主实践、重在过程”原则，通过引导大学生参加项目训练，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2]。显然，大创项目已成为医学本科生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近年来，随着大创项目不断推进，各医学院校的立项数量、参与人数、经费投入呈现逐年增长趋势，然而在公共财政强调绩效的背景下，大创项目投入和产出的效率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

一、大创项目效率评价的必要性

大创项目的效率是指产出与投入之比。根据医学院校大创项目的立项数据分析，其投入指标主要包括物力投入、经费投入、指导教师人数、参与学生人数等；产出指标一般包括论文发表、竞赛获奖、专利、项目成果实物、调查研究报告等。如何合理评价与提高大创项目效率是提高大创项目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对其效率进行研究尤为重要。

（一）提高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

医学院校对大创项目效率进行评价可以帮助识别和改进管理流程中的资源配置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具体来说，校级管理部门通过对大创项目进行效率分析，可对项目进展和成本进行监督，确保资助的经费能有效用于项目，发现投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例如，通过对经费投入和产出的分析，了解各学院具体项目的经费支出和产出情况，从而对下一年的经费投入和支出进行优化调整，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减少资源的浪费，改善医学本科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环境。

（二）优化流程管理，提升项目质量

研究者指出，医学院校学生参与大创项目时，重申报、轻实践、与指导教师缺乏沟通，时间投入不足，按期结题率低[3]。同时，笔者在大创项目管理工作中发现，医学生申报项目时缺乏指导教师和项目信息的获取渠道，项目全过程管理有待加强。项目申报书的撰写质量直接影响到项目的后续发展，通过效率评价，可提高项目申报书的质量，增加立项的成功率。此外，大创项目效率评价有助于监督项目的进度和成果，确保项目按时完成并达到预期的目标，提高结题质量。

二、大创项目效率现状综述

（一）关于创新创业效率评价的研究

近年来，关于大创项目的研究逐渐增多，从文献看，其研究热点大多集中在项目实例分析、对学生的影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等方面。大创项目是医学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知网以“高校创新创业效率评价”为主题检索，发现此类研究呈上升的趋势。较早的有李阿利等人（2018）利用 DEA 模型对湖南 15 所本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效率进行评价，提示其效率呈现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仍不高[4]。同时，林美美运用 EDA 对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整体效率进行测量，发现存在较大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认为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需注重资源投入规模和结构，增强创新创业效率意识[5]。此外，宋晓丹（2022）、甘娅銮等人（2023）也运用 DEA 模型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进行效率评价，揭示其资源配置未达到最优状态，不同院校之间效率差异较大[6–7]。

目前，针对“大创项目”效率评价的研究较少，且多集中于定性评价指标的建立。例如，韩康榕等人（2020）通过构建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评价指标的具体权重值，并将体系试用于某工科特色高校大创项目管理平台，用数据验证该指标体系的有效性[8]。此研究为高等院校开展大创项目定量质量评价提供借鉴。包函岐等人（2019）根据大创项目的特点，构建 ER–DEA 模型，并以山东某高校为例进行实证，认为提升大创项目效率，在产出方面，需加强过程指导，对过程进行监控、及时反馈，在后续管理的过程中建立健全跟踪评价机制[9]。该文的效率评价方法和数据分析过程、全过程管理理念，为本研究奠定基础。此外，高超锋等人（2024）以 21 个省份的大创项目为研究对象，利用三阶段 DEA 模型对大创项目的成果转化进行效率评价，指出其效率受多个主体的协同影响，需平衡各方的利益，构建多元协同机制，找到多元主体的利益契合点[10]。通过文献分析发现，运用定量方法对大创项目效率评价研究仍存在欠缺，大都停留在对大创项目投入与产出效率的测量上，较少涉及影响效率因素及效率提升对策的研究方面。

（二）“三全育人”理念为大创项目效率提升提供新方向

2017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11]。目前，大创项目体现“三全育人”研究的理论较少。研究者指出：从项目的宣传、申报、评审、实施、结题均可融入“三全育人”的理念[12]。同时，王雅丽等人（2020）借鉴“三全育人”理念，创新大创项目管理模式，提出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六化”管理模式，实现“三全育人”的发展目标[13]。此外，曹石等（2023）根据“三全育人”理念提出要深化全员创新和责任担当意识、完善项目全过程管理、利用项目打造全方位创新育人阵地[14]。

综上所述，大创项目的实施是一个多投入、多产出的过程，虽然目前高校也在注重创新创业项目的效率评价，但大创项目投入与产出效率不均衡。“三全育人”理念在不断实践研究中验证在多个领域应用的可能性，其运用于创新创业教育是行之有效的，为医学院校大创项目的效率提升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三、“三全育人”视角下大创项目效率提升路径

要提高大创项目效率，医学院校项目管理部门需发现其投入和产出的问题，及时优化投入模式，激励创新产出。通过结合“三全育人”理念，总结效率提升对策，以期为医学院校创新创业投入产出策略提供依据。

（一）加强队伍建设，全员凝聚大创项目效率提升意识

大创项目作为医学本科生创新能力提升的助推器，根据“三全育人”理念，需要全员凝聚效率提升的意识，全员合力稳步推进其效率提升。首先，项目管理部门注重顶层设计，制定清晰的项目管理目标与分工，确保立项投入均衡。立项前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给予的立项限额和经费划拨情况、往年结题情况、学院教师和学生人数等拟定当年的立项数量，避免立项数量过多或过少，下拨经费做到因院制宜。其次，指导教师需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全程参与项目的指导。由于难度合适的大创项目，产出更好，选题太难，将导致其产出不足，导师需了解学生团队的兴趣和特长，鼓励其自主选题，严格把控选题的难度，为项目实施树立自信心。再次，学生是大创项目产出成果的主体，要提高效率，校级层面就要广泛宣传大创项目，给学生开展针对性的培训，从而调动学生参与大创项目的积极性，鼓励其投入更多时间专心进行成果的产出。最后，由于医学院校大部分项目为实验类的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项目占比甚小，学院需提供完善的实验场地和设备，财务处需告知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及报账注意事项，科技处和招生就业处等需告知成果转化、成立公司的途径等。因此，二级学院、辅导员、财务处、团委、招生就业处、科技处等均需要凝聚大创项目效率提升意识，按照任务分工原则为项目实施提供保障。项目管理部门应协调好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的各方面人员，统筹全员参与大创项目，为学生提供帮助。

（二）优化信息管理平台，促进师生全程参与大创项目

全过程育人要求重视大创项目的全过程管理，但目前医学院校的大创项目以验收成果为主，忽略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具体管理。优化信息平台是提升大创项目效率的加速器，因此，医学院校应充分利用计算机系统，构建并完善校级的大创项目信息管理平台。医学院校通过使大创项目系统作为项目管理部门工作的枢纽，实现大创项目的申报、立项、项目中期进展跟踪、结题汇总、项目维护、经费管理、项目统计分析等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和全过程的留痕。通过信息化平台，更快捷收集、整理和分析投入和产出的数据，减少人工操作的误差，提高大创项目效率。首先，大创项目的投入需向产出最大化倾斜，在申报阶段，项目管理部门进行申报宣讲会，以学院上一年结题的产出成果为参考依据，产出良好的学院，在立项数量、经费等优先支持并在平台公布，激励其他学院更好产出。其次，项目立项后，定期组织指导教师交流活动、师生互动会等，以便发现项目问题，及时解决。再次，项目实施中期，学生在信息系统提交中期进展报告，项目管理部门及时了解教师的指导细节、互动情况、项目进展情况，对无法正常实施或进展效果甚微的项目及时终止研究，并回收相应的经费，对产出效果好的项目给予更多的经费和政策支持。最后，医学院校

的大创项目从投入产出的过程较漫长，尤其是基础研究，周期较长，实施阶段的投入产出分析可能不准确，因此，在结题后，项目管理部门对已结题的项目进行信息化追踪，收集项目的最终产出成果。

（三）“课、赛、践、管”一体化全方位提高大创项目效率

全方位育人是指以各种教育手段和方法为载体，将教育融入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空间和场合[11]。医学院校可通过课堂、竞赛、实践、管理一体化全方位、多角度提升大创项目实施的效率。首先，教师有意识地将大创项目知识融入专业课堂教学，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指导学生将专业知识运用到大创项目实践中，提高项目申报质量。其次，项目管理部门推荐产出效果较好的项目团队参加各类大学生创新大赛，通过比赛为项目成果落地和投资融资争取机会，利于大创项目成果转化，增加产出量。再次，多途径搭建大创项目实践平台，推进学生主动参与大创项目。通过设立大学生创业园，为学生提供创新实践的场地，加强校企合作，引入创业导师团队，使学生在实体公司运营过程中增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最后，优化大创项目管理制度，完善激励机制。202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要把学生创新创业、竞赛等计入教师工作量，因此医学院校需根据国家政策和大创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及时修订项目管理制度，对于按期结题项目，纳入指导教师当年的教学工作量，产出成果较好的项目给予指导教师更高层次的奖励，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对于优秀的结题项目进行成果展示，纳入学生毕业论文成果。

四、结语

大创项目作为医学院校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培育了诸多创新创业生力军，但目前仍面临有效投入不足、成果产出相差悬殊的问题。由此，大创项目效率的提升至关重要，“三全育人”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理念可优化其管理流程。医学院校可借助“三全育人”理念，积极探索适合其效率提升的管理模式，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从而提高项目实施的效率，增强医学生的创新能力，助推创新创业教育的改革。

参考文献

[1] 江维，赵阳，韦巍，等 . 基于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提升教学医院医学生科研能力的探索 [J]. 基础医学教育，2024, 26(09): 816−819.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教育部关于印发《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的通知 [EB/OL]. (2019−07−15)[2025−07−1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5672/201907/t20190724_392132.html.

[3] 张静，徐明，郭栋 . 医学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水平提升路径探索 [J]. 卫生职业教育，2023, 41(12): 42−45.

[4] 李阿利，邓小波，胡扬名 . 中西部本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效率研究——基于湖南 15 所高校的调查数据 [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19(03): 92−96.

[5] 林美美 . 基于超效率 DEA 的福建省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效率评价 [J].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21, 34(05): 97−100, 109.

[6] 宋晓丹 .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评价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J]. 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22, 28(06): 10−15, 31.

[7] 甘娅銮，陈昆湖，汪红梅 .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效率评价研究——基于陕西省 16 所高校的样本 [J]. 科技创业月刊，2023, 36(08): 162−168.

[8] 韩康榕，康亚京，钱荣荣，等 .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2(05): 107−116.

[9] 包函岐，类鸣，赵昊，等 . 基于 ER−DEA 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效率评价 [J]. 时代经贸，2019, 488(27): 91−94.

[10] 高超锋，刘峥，胡斌，等 .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成果转化效率评价方法及转化效率提升路径 [J]. 科技管理研究，2024, 44(14): 107−115.

[1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17−02−28(01).

[12] 农冬梅，欧阳思铭，隆金桥 . “三全育人”理念下的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育人模式分析——以百色学院为例 [J]. 科教导刊 (上旬刊), 2019, 385(25): 179−180,192.

[13] 王雅丽，乐家华，王方方，等 . 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20, 3(22): 191−193.

[14] 曹石，袁小平，汤天培 . “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大创”项目现状与转型路径研究——以南通大学交通与土木工程学院为例 [J]. 大学，2023, 586(04): 10−1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基于 PDCA 循环的地方医学院校‘大创项目’管理探索与实践”（2022ZJY2878）；2023 年度广西医科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创项目’效率评价研究”（2023B06）。

（作者单位：广西医科大学教务处）

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大学生家国情怀培养与就业指导融合模式探讨

潘雯婷 张 宁* 杨孝芳 帅 乾 杨东莹

摘要：在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教育要求下，将家国情怀的培育与大学生就业指导相结合，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关键议题。本文立足于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分析了高校现阶段开展家国情怀教育与职业生涯指导等方面所存在的现实困境，并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双向融合”的教育模式——以家国情怀教育带动就业指导，二者结合、互通有无、互融共进。该模式通过整合思政教育和职业发展教育，引导学生在择业过程中科学权衡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需求，实现价值取向与职业选择的协调统一。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系统性提出并构建了该融合路径的理论框架，为高校育人实践提供了可行参考，也为相关政策的优化提供了思路支撑，有助于推动高校毕业生形成更具时代担当精神的就业观和价值观。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家国情怀；就业指导；融合教育模式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国内社会经济的转型，新时代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大学生的价值观念、职业选择日益多元化，而以往传统的就业指导方式已不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1]；除此之外，大学生就业的压力随着世界就业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不断增大，让高校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就业观，强化大学生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成为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2]。现阶段大多数高校开展的就业指导课程偏重技能训练和面试技巧培训等方面，并没有对学生的思政素质及家国情怀给予足够重视，缺乏对学生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使部分学生在就业时难以将个人发展和国家需要结合在一起[3]；而家国情怀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意义是引领我们自觉承担起个人责任与担当，也是大学生形成正确就业观的思想基础[4]，因此有必要将家国情怀培养渗透到大学生就业指导过程中，从而增强学生们的民族感情和社会责任感。

一、家国情怀与就业指导的研究现状及理论基础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家国情怀、思想政治教育和就业指导进行了广泛研究。国内主要探讨的是如何把家国情怀落实到思政课程中，培养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文化认同感等[5]。许多研究强调，家国情怀不仅是大学生道德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涵之一，能够在大学生的价值观塑造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6]。在就业指导领域，国内学者也对其重要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强调家国情怀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7]。但是目前较少有文献涉及如何将家国情怀渗透于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中去，使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等方面问题的深入挖掘。

国外许多研究学者将二者紧密结合，如美国的教育研究较多地立足于对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以及学生对于本国的态度。通过设定相关课程，使学生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职业伦理道德；日本更多的是开展“国民教育”，使得青少年群体产生强烈的祖国情感，并肩共担重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上两种研究模式能给二者在当代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思政教育中提供有效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需要承认，现有的几种主要研究范式更多还是停留在研究层面，针对学生的情怀教育培养和就业指导教育两者相辅相成这种特有的互动性关系还未得到充分展示，这仍是国内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缺陷。

本研究从教育学、社会心理学、职业教育等角度探讨了家国情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和职业生涯指导中的功能定位以及内在机理。教育学认为，育人根本是“立德树人”，即不但要“立德树人”，更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并使学生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其育人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及世界观。而将家国情怀作为新时代思政教育的内容之一，是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一个重要方式。它可以

对学生形成民族自尊、自爱的意识，强化其社会责任感。除了对思想和理念的浸润外，这种家国情怀还能够在学生的实际生涯发展中发挥作用，在其工作选择、工作发展等方面都起着深层的价值导向作用。与此同时，也提供着精神的支持与方向上的指引。

二、家国情怀教育对大学生就业观的影响路径与实践探索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之一，家国情怀教育以价值引领为主导、以责任意识提升为重点、以使命担当锻造为主线，在大学生就业观的养成方面发挥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高校通常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题活动开展、社会调研实施、志愿服务活动开展等方式使青年学子产生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价值观念与人生追求，并在此过程中使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和社会归属感不断增强，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不断增强。这种情感与价值的引导，有助于促使青年人才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的整体格局之中。

不少学校已经开始积极尝试，在就业指导工作中把家国情怀教育渗透进去，并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效果和积极作用，比如北京大学在职业发展教育中加入家国情怀的模块，在学校的职业发展系列选修课中增设家国情怀专题，开展家国情怀相关主题活动，请优秀的校友回到母校给学生做讲座，并且邀请名校毕业生来讲自己的工作历程，在其中体现国家的发展和变化；让学生参与到重点项目的实习当中去，培养学生为国为民意识，让学生的实际能力得到锻炼，在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过程中拥有奉献祖国的感受，对于后续的职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同样复旦大学还设置了“家国情怀与职业规划”的专题模块，将基于现实问题去思考国家使命与个人定位关系的方式作为专题的重要构成内容；利用不同案例开展教学活动；采取分组讨论、角色模拟等方式开展教学，在教学的过程中，将不同的国家精神融入学生的头脑当中，强化学生的危机意识；通过校企合作平台，借助多所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情况开展相关教学活动，立足于学生的理论学习实践，促进学校发展。

上述实践证明，把家国情怀教育和就业指导融为一体不仅可以帮助大学生形成面向社会、面向国家的职业价值观念，而且可以通过科学的设计和可操作的方案将教学与实践相衔接，让学生在择业的过程中践行公共精神和责任意识，从而发挥家国情怀在新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就业指导创新上的引领性作用。

三、基于贵州高校的家国情怀教育与就业指导融合路径的实证分析

在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下，将家国情怀教育与就业指导相结合，并实现两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目标，成为新时代高校思政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对区域性高校而言，在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同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探索实施具有地方特色的融合模式更是有着较强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本文选取贵州省部分高校为对象，采取实证的方式对其在实践中如何实现二者融合的相关情况及机制进行探讨分析，揭示其对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就业观产生的积极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设计

本研究以贵州省四所具有代表性的本科院校——贵州中医药大学、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及贵州民族大学为研究样本，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力求全面掌握各高校在推动家国情怀与就业指导融合方面的实际做法与实施成效。共计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345份，有效率为89.7%。同时，研究团队对来自上述高校的30位就业指导教师及50名在校学生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进一步获取对融合模式实施情况的主观感受与真实反馈。　在数据处理方面，本研究应用了描述性统计、因子提取与多元回归等量化分析方法，重点考察家国情怀教育变量在大学生职业选择、价值倾向等方面的影响程度，力求揭示其对青年群体就业观的形成与转变所发挥的实际作用。

（二）数据分析与结果探讨

研究数据显示，把家国情怀教育引入职业指导课程后，对大学生就业理念的影响显著，调查显示大约有80%的同学接受过有关家国情怀的教育；有72%以上的同学认为这种教育对提升自己社会责任感以及认同国家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经回归分析得到家国情怀教育对于学生的职业取向具有统计学意义，当他们选择工作时更会注意工作的岗位对社会的意义以及是否具有服务作用，不会单单只看重自己的薪资待遇和升职空间，这些都是关于家国情怀的内容给予大学生的一种正确的引导。

以贵州中医药大学为例，校方联合地方卫生系统开展“服务基层，守护健康”专项实践项目，学校动员全体学生踊跃投身到乡镇医疗一线提供服务，在参加这一专项实践项目的学生中，65%以上的同学反映通过这样的经历能够进一步提高自身服务基层工作的意识，使自己更具有建设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信心；与此同时，贵州大学依托“校友职场分享计划”与“公益志愿服务平台”，助推学生提前考虑如何达成自我发展目标与满足国家需求之间的有机融合，并推动大学生明确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基于此，75%的受访学生认为这类活动能够让他们意识到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发展的和谐统一关系。

（三）样本构成与研究局限分析

根据样本的分布来看，本研究选取了涵盖医药类、综合类、师范类和民族类的学校，具有一定代表性，基本可以反映出贵州省不同类型高校家国情怀与就业指导融合的实践经验，但由于样本均来自贵州本地，

所以所获得的研究结论带有较大的局限性，后续还需向全国其他省市以及各类不同发展程度的学校推广。

（四）实证研究的现实启示与融合路径的优化建议

基于贵州省多家高校的相关调查和个案实证研究，对家国情怀教育与就业指导相融合的方式方法等进行梳理总结，归纳出一些切实可行、易于落地执行并具有一定操作性和示范作用的具体举措。

1. 对课程体系进行创新。将“家国情怀与职业路径选择”专题融入已有的职业发展课程教学中，运用专题式教学，引导学生在确立自身发展的同时，回应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实际需求，真正做到学生全面而自由地发展。

2. 打造协同育人平台。联合政府、高校和企业，合力打造“区域就业引导项目”平台，把家国情怀贯穿到学生的实习就业环节中去，做到社会实践和理论学习融为一体。

3. 发挥优秀校友的引领示范作用。常态化开展专题讲座、实务沙龙和职业访谈，借助鲜活真实的案例让在校生切实领会通过参加实际工作、服务社会将爱国奉献情怀融入实际工作中去，涵育他们家国情怀的职业底色和本质内涵。

通过对相关实证数据和代表性事例的调研可以看出，把家国情怀教育融入就业指导之中，可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使学生在选择职业的过程中能够履行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并促使学生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敬业意识；面向未来，高校应当结合自身的地域性特征和育人特色，充分利用课程资源，完善家国情怀教育与就业指导的相关政策协同，不断深化两者的融合，在培养方案、实践平台和引导渠道等方面实现融合，并加快培育出更多具有家国情怀、服务人民并具备专业素养的人才。

四、研究总结与政策建议

本文立足高校育人群体开展育人实践，对家国情怀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学及职业发展指导的价值进行了思考。结果表明，家国情怀是引领大学生价值判断、培养大学生社会担当的精神核心，对学生的职业选择具有引导和调节作用，促使大学生更加注重职业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以及与国家发展方向的契合度。将家国情怀渗透到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中，有助于促进学生民族认同和集体意识的培养，使学生由过去的“为我谋职”变为现在的“为国择业”。以价值引领为基础，在育人过程中实现思政与就业指导的深度融合，有利于突破传统高校育人中思政与就业“两张皮”的窘境，并有效保障新时代育人工作目标的达成。

五、家国情怀教育与就业指导融合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展望

围绕高校家国情怀教育与就业指导的有机结合展开论述，并结合新时代背景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指导工作开辟全新途径提供了新思路、新理论支撑。其次，丰富了高校思政教育的研究内涵，对于高校思政教育这一课题开拓新视野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文章还从教育学、社会心理学、职业生涯发展角度尝试提出把家国情怀教育融入就业指导全过程的新颖思路，填补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

从实践层面来看，该研究对高校人才培养工作者的工作开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一方面可以加强学生们的国家认同和公共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能促使青年人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他们的就业意向和职业选择，能够更好地助力爱国奉献。经实践检验，把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与学生的个体职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有效调动青年人服务社会的使命感，在日后的实际工作中还能获得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效统一。这是个可行的面向未来的育人新路径，或将为下一步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思想引领作用向更大范围拓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动力源泉，从而促进学生的高质量就业。

参考文献

[1] 王晓辉 .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家国情怀培养研究 [J]. 思想教育研究 , 2021(04): 15−19.

[2] 刘敏 . 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指导的挑战与策略 [J]. 高等教育研究 , 2022(06): 22−28.

[3] 李正芳 . 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角色和作用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 2023(03): 5−12.

[4] 张丽萍 , 王新春 . 大学生就业指导的现状与改进策略 [J]. 教育学报 , 2021(08): 28−34.

[5] 陈文莉 . 家国情怀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研究 [J]. 思想理论教育 , 2020(06): 22−30.

[6] 王晓辉 . 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J]. 思想教育研究 , 2022(05): 15−19.

[7] 张丽萍 , 李建辉 . 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家国情怀教育探索 [J]. 教育学报 , 2021(08): 28−3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贵州省学位办 2024 年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教育教学教改项目基于国际传播能力的中医硕士培养体系建设——以‘针艾黔行’对外交流教育项目研究为例（2024YJSJGXM084）；贵州中医药大学 2023 年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学业综合素质提升教育研究及实践类项目“培育时代新人家国情怀，引导高校学生就业观念”（贵中医教学工程（2023）55 号）。

（作者：潘雯婷，贵州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党政办主任；杨孝芳，贵州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党委书记；帅乾，贵州中医药大学监察专员办公室综合室副主任；杨东莹，贵州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团委副书记；通讯作者张宁，贵州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科教科副主任）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路径研究

羌杨洋　李冬倩　陈　琳

摘要：积极落实“双高计划”，优化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路径对于全面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立足于此，本文总结了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路径建设可提升思政育人工作实效性、提升学生归属感与幸福感；分析了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建设存在的现实困境，提出了构建“互联网 +”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工作体系、完善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工作管理制度、加强一站式学生社区文化建设、强化一站式学生社区安全管理与建设专业育人团队的路径设计，希冀为全面落实“双高计划”提供理论参鉴。

关键词：“双高计划”；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

2019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为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并提出要加强党对职业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推进职业教育领域“三全育人”综合试点工作，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思政育人不仅是职业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具备独特的育人功能与价值，它对促进学生知识技能水平的提升以及人生价值的全面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有效的思政育人能够强化学生的社会主义信念，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这在“双高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对于达成高质量的人才培养目标具有深远意义。

一站式学生社区作为高职院校的服务平台，可以在思政育人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构建一个创新性的社区育人文化系统，将思政教育自然地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可以提升思政育人的效果，也能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加和谐、积极的成长环境[1]。鉴于此，探索如何利用一站式学生社区来加强思政育人路径建设，已经成为政府和教育部门关注的重点课题之一。

一、“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路径建设的重要性

（一）提升思政育人工作实效性

一站式学生社区通过开展文化建设活动，能够为高职学生营造浓厚的社区文化氛围，提升学生对社区的兴趣，显著增强思政育人工作的实效性。同时，高职院校在开展活动时，能够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为学生提供更多锻炼自我、展现青春风采的机会，在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同时助力学生以阳光的心态面对生活，提升思政育人工作实效性。高职院校通过一站式学生社区育人功能，能够有效促进管理服务、教育培训、生活服务等各项功能相互融合与渗透，从学生生活细节、心理需求以及学习需求等层面给予学生满足感，不断提高思政育人工作实效性[2]。

（二）增强学生归属感与幸福感

一站式学生社区从满足学生心理需求角度出发，通过打造集管理、服务、教育、生活于一体的一站式学生社区，营造出温馨和谐、积极向上、充满生活气息的社区氛围。同时，一站式学生社区注重党建文化、宿舍文化以及班级文化等层面的文化建设，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高品质的校园生活，大幅度增强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与幸福感[3]。一站式学生社区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具有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积极向上、健康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建设现存困境

（一）思政教育与一站式学生社区融合不足

当前，出生于 2000 年至 2010 年间的高职院校学生呈现出一系列明显的特征，包括但不限于好奇心旺盛、思维活跃、对社会热点问题关注度高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表明，这部分群体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网络依赖倾向，表现为过度使用网络平台搜索学习资料，甚至沉迷于网络游戏，从中获得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情感满足和成就感[4]。这种偏好不仅使他们对实时热点新闻保持高度敏感，同时也揭示了一站式学生社区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局限

性——未能充分结合时事动态、娱乐休闲、在线教育及体育竞技等多维度内容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和支持。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00后”高职生的需求，有必要探索更加适应其特性的教育资源整合方式，以促进其全面发展。

（二）育人工作缺乏实效性

多数高职院校在进行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工作时，呈现出思政工作创新思路不足、思政活动缺少吸引力等特征，难以调动学生的参与兴趣。细言之，多数高职院校并未针对该工作构建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与激励机制，导致参与此工作的工作人员缺乏创新动力，并未专心投入思政育人工作，引致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缺乏实效性。此外，多数高职院校工作人员习惯选用传统思政教育方法，且教育途径较为单一。以社区文化建设为例，多数高职院校在进行思政教育建设时，忽视对党建文化、班级文化、宿舍文化等校园文化体系的挖掘与宣传，这导致学生难以提升对思政课程的兴趣，致使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工作缺乏实效性[5]。

（三）育人队伍整合不足

若想深入落实“双高计划”，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需设立完善的育人队伍 。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缺少有效的协同机制，育人队伍各部门之间缺乏协同配合，难以形成育人合力，阻碍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建设进程[6]。其一，高职院校学生社区缺少完整且独立的办事机构。多数高职院校并未设立单独的思政育人机构，缺少专职人员，这直接降低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工作效率。其二，高职院校并未组织充足工作人员进行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建设工作，导致学生社区辅导员与社区管理员配备不足、宿舍管理人员资质缺乏、思政教师下沉学生一站式社区频率较低。其三，社区辅导员、社区管理员、学生党员、干部以及宿舍管理人员之间沟通较少，尚未形成协同统一的育人团队，阻滞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建设进程[7]。

三、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路径设计

（一）构建“互联网 +”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工作体系

高职院校应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数字技术手段，构建集管理、服务、教育、生活于一体的一站式学生思政育人社区，推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发展。其一，高职院校应建立“互联网 +”模式，利用该技术的强大渗透性，实现教育管理服务全流程覆盖，以“互联网 +”思维贯穿服务体系，构建管理服务、教育培训、生活服务“三位一体”的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工作体系，将一站式学生社区打造成综合性平台[8]。其二，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应连接校园网络、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平台，构建具有鲜明特色的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工作体系，并由专业育人队伍进行事件分析与讲解，最大化满足高职院校学生心理需求，确保高职学生心理健康。借此，实现热点信息的及时传送以及信息共享和实时互动，推动思政教育工作与学生生活的无缝衔接。其三，高职院校应建立一站式学生社区网上心理健康咨询平台，开展网络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以及时解决大学生的思想困惑和心理问题，推动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建设工作高质量运行。

（二）完善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工作管理制度

高职院校应打造完善的学生社区思政工作管理制度，从以下几个层面构建。其一，构建长效考核机制与激励机制。高职院校应针对专业育人队伍构建长效考核机制与激励机制，并与其薪资系统挂钩，确保有奖有罚，以此激发专业育人队伍工作热情，提升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建设工作质量。其二，完善一站式学生社区管理制度。高职院校应按照学生社区“十大体系”建设要求，制定《一站式学生社区实施办法》，健全一站式学生社区管理制度，加强对一站式学生社区的指导和监督。其三，以“互联网 +”贯穿社区平台，实现对一站式学生社区的信息化管理和服务，建设完善一站式学生社区信息管理系统[9]。高职院校应通过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对一站式学生社区的服务、评价、反馈等工作的全过程监督和管理，以此监督专业育人团队工作是否具有实效性，促使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建设工作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一站式学生社区文化建设

高职院校应加强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党建文化、班级文化、宿舍文化等文化建设，打造特色思政品牌，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不断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其一，高职院校应整合学生社区资源，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激发学生对思政教育课程的兴趣，并逐步形成思政品牌活动，提升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建设工作质量。其二，高职院校应注重宣传引导，充分利用抖音号、校园网络等宣传平台和媒介，对一站式学生社区的思政育人服务内容、管理制度等进行大力宣传，促使学生了解社区、认可社区、融入社区[10]。其三，高职院校应注重思政教育活动的开展和落实，在一站式学生社区内开展红色革命教育、红色文化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活动，充分利用各种载体和平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打造特色思政品牌，促使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建设工作高质量推进。

（四）强化一站式学生社区安全管理

高职院校应构建一站式学生社区安全管理机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职能部门组织协调、各部门密切配合、师生共同参与”的安全管理工作格局。其一，高职院校应在一站式学生社区中构建网格化管理，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及时为学生疏解

压力，避免学生由于心理障碍所导致的极端事件发生。其二，高职院校应在社区内建立工作责任制，将安全工作细化到每一位社区辅导员、社区管理员、学生党员、干部以及宿舍管理人员身上，形成全员参与的安全教育长效机制[11]。其三，高职院校应在一站式学生社区中开展“社区安全教育月”“安全教育日”“安全宣传月”等活动，不断增强师生的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其四，高职院校应在一站式学生社区中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成立学生社区应急处理领导小组，组织开展应急演练，以此实现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建设工作可持续推进。

（五）建设专业育人团队

由于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团队是由多个部门、组织和人员组成的，涉及后勤、保卫、学工等多个部门，高职院校需要在管理服务、教育培训和生活服务中加强沟通合作，采用数字技术，形成育人合力，提高思政工作效率。具体来说，高职院校需建设一站式学生社区信息管理系统，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将一站式学生社区中所有信息进行整合，并实现信息共享与有序流动，从而实现学校各部门、组织和人员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同运作，进而提高学校管理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12]。同时，高职院校应联动政府以及各市场主体，整合最新关于就业、社会热点以及考试政策等信息录入一站式学生社区，以此及时满足学生对最新资源的需求。高职院校通过一站式学生社区信息管理系统，应将校园内与学生相关所有机构和组织的个人信息纳入统一的工作平台，并实现信息的随时调取，以此加强部门之间、组织之间、人员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推动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建设工作高质量推进。

四、结语

基于“双高计划”战略，探寻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的创新路径对于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意蕴。伴随一站式学生社区逐步成为协同育人新载体，能够通过社区形式促使思政教育进入学生学习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打破学生学习与生活、学校与社会之间的界限，提升思政教育工作效能。有鉴于此，本文总结出推动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的新路径，分别是构建“互联网 +”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工作体系、完善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工作管理制度、加强一站式学生社区文化建设、强化一站式学生社区安全管理与建设专业育人团队，希冀为全面落实“双高计划”提供一定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 袁铭，唐传星，姜楠．伟大建党精神融入一站式学生社区：育人价值·基本原则·实践机制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3(16): 31-34.

[2] 姜庆华，吴玉剑，姜佳奇．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运行机制研究 [J]. 教育与职业，2023(20): 73-77.

[3] 严明，潘志娟，蒋闰蕾．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育人研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02): 61-63.

[4] 同 [1].

[5] 同 [2].

[6] 姜庆华，张晨晓，马伟娜．高职院校网络育人的现实挑战与增效路径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02): 69-71.

[7] 周远，张振，岳娅萍．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内涵生成、结构要素和现实意义 [J]. 中国高等教育，2022(19): 53-55.

[8] 刘宏达，张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的精准化及其实现策略 [J]. 思想教育研究，2023(12): 126-131.

[9] 姜宇国．以大学生社区为载体开展公民教育 [J]. 中国高等教育，2014(01): 54-57.

[10] 张亦佳．高校开展“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及实践路径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05): 136-141.

[11] 白晓东，孟祥栋．新时代学生社区空间育人的内在逻辑、现实问题与优化路径 [J]. 思想理论教育，2022(06): 105-109.

[12] 陆小凡．系统思维视域下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优化路径研究 [J]. 思想教育研究，2024(02): 131-13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江苏高校哲学社科课题“‘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思政育人场域化体系构建研究”（2024SJSZ0759）。

（作者单位：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初中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的路径探究

周　雪

摘要：新时代初中思政教育场域中，将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已成为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议题。这一教育模式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坚实理论根基，更承载着铸魂育人的时代使命与深远的育人价值。当前思政教育面临组织管理与评价导向的实践牵制、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张力失衡、情景预设与真实议题的共振弱化等多重实践困境。本文立足核心素养培育视域，提出多维联动解决方案——建构知识价值双维共生体系、打造专全互补型师资矩阵、搭建虚实融合教育新生态，为构建知行合一的思政教育创新范式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向。

关键词：思政小课堂；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

新时代的思政教育不仅承担着传授理论知识的任务，更需要通过现场教学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责任感和实践能力。初中阶段是孩子思想逐渐成熟的重要阶段，是良好特性品质、正确思维方式和优秀行为习惯的可塑期，在整个学习生涯中思政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1]如何在初中阶段的思政教育中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成为新时代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

一、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的理论机理

探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的理论机理的首要任务是厘清“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概念。“思政小课堂”主要指学校内部的思政教学活动，包括课堂理论讲授、讨论互动、案例分析等环节。“社会大课堂”是指校外的实践教育平台，包括红色教育基地、社区服务活动、企事业单位实践等场所。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各具优势，但单一形式难以全面满足思政教育的目标需求。只有通过有机结合，小课堂提供理论支撑，社会大课堂则通过实践检验和深化理论理解，即实现传统的课堂教学与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有机结合，最终达到“知行合一”的教育目标。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的思想基础

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思政小课堂中的理论知识只有通过社会大课堂中的实践活动，才能被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同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提倡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体力、智力、道德品质等多方面的发展。在社会大课堂中，学生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和事，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等，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由此，将思政小课堂的理论教育与社会大课堂的实践教学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内在要求。

（二）中国共产党实践育人思想是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的精神基石

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其实践育人思想扎根于百年教育实践的历史土壤。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强调学习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3]，推动实践教育向生产建设一线延伸。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论述既延续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又开创了“情境化育人”“项目化实践”“协同化发展”的新型教育形态，为两个课堂的深度融通奠定了价值坐标与实践范式。

（三）现代教育理念是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的动力源泉

现代教育不同于传统教育之处在于提出培养现代人，即要让人得到各方面的发展，而且把这种理念真正落实到了行动当中[4]。现代教育的理念运用到新时代初中教育的环境中时，格外强调以学生为主导，强调学生实现多方面的发展。社会大课堂可以让学生在真实的社会情形下开展学习以及体验活动，为他们提供诸多实践

的机会，进而让他们对思政理论的理解更加透彻，应用起来也更为得心应手。学生身处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相互融合的情境之中，能够依据自身的需求以及兴趣来挑选学习的内容以及实践的方式，以此来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创造力。伴随现代教育科技持续向前发展，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紧密结合这一教育模式，将会有力推动达成铸魂育人这个时代的使命，同时也会彰显出极为深远的育人价值。

二、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的价值意蕴

初中阶段的思政教育在培育青少年的理想信念以及塑造其精神品质方面，称得上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把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相互结合起来，学生一方面能够较为牢固地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也能够较为透彻地了解社会的实际状况，进而为社会的发展以及个人的成长筑牢稳固的基础。

（一）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5] 立德树人是教育所肩负的根本使命所在。思政小课堂会系统地传授诸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相关理论内容，进而构建起学生精神世界里的“四梁八柱”。社会大课堂则借助红色基地研学以及志愿服务等一系列实践活动，使得学生能够在革命旧址开展的沉浸式教学当中赓续红色基因，并且在科技企业设立的创新工场里去体会工匠精神……如此这般理论与实践相互交织形成的双向互动，切实有效地破解了以往课堂教育里存在的“知行脱节”这一问题，助力学生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更好地培育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适应与时俱进的教育需求

当前我们已然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智能技术已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对于以知识为中心的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高质量的内涵式教育变得愈加重要[6]。学习方式随着学习资源的数字化发生了改变，学习理念也实现了从教师主导向学生主导的转变。传统思政课堂着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其教学方法的单一性限制了学习效果的展现。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的有机结合，可拓展教与学的空间视野，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强化学生的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团队协作能力等综合素质，以适应新时代的社会需求。

（三）促进青年学生的全面发展

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各有优势，但也存在局限性。小课堂虽然便于管理，但容易陷入说教模式，缺乏实践性和趣味性；大课堂虽然内容丰富，但组织难度较大，难以保证每个学生的参与度。因此，将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取长补短，是提高思政教育实效性的有效途径，这种结合能够有利于实现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统一。社会大课堂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小课堂则可以为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使实践更有深度和针对性，可以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7]。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有机结合，可以更好地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的统一，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的现实困境

要使新时代初中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实现学生对所学课程形成强烈的参与感、代入感和获得感，现实教学过程中还 面临一些问题。

（一）组织管理与评价导向的实践牵制

当前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一些地区资源匮乏，难以有效地开展社会大课堂活动。即使一些地区可能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能够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实践机会，而校内教务部门、学工系统与社会实践基地之间缺乏统筹协调，导致实践教学环节存在多头管理、资源分散的现象[8]。当前的评价往往侧重于考试成绩，对学生在社会大课堂中的表现和综合素质的评价不够全面和科学，无法有效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在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有些资源丰富的学校可能把虚拟情境（如 VR 教学、在线互动平台、模拟场景）作为思政教育的重要工具，但其与真实体验的衔接仍面临显著障碍。VR 红色教育基地、历史场景模拟等能快速激发学生情感共鸣，但缺乏后续行为引导机制，学生难以将情感共鸣转化为现实行动。组织管理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评价导向无法兼顾实践能力的有效性，导致当前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受到牵制。

（二）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张力失衡

当前思政教育多以考试成绩、升学率等量化指标来评价学校、教师和学生，导致学校和教师将主要精力放在知识传授以提高成绩上，忽视价值引领。导致部分学校及教师过于注重知识的灌输，强调学生对大量学科知识的记忆和解题技巧的掌握，而价值引领被边缘化，道德教育、情感教育等沦为形式。有些教师进行价值引领时脱离知识内容和生活实际，只是空洞地宣扬一些道德规范和价值观，缺乏与具体知识的有机结合，学生难以产生共鸣和理解。社会实践需要时间、资源和机会，为便利“大课堂”而设置的虚拟情境使学生更倾向于“线上体验”，导致真实实践参与率下降。学生在虚拟场景中习得的价值观（如团队合作、社会责任），因缺乏真实情境的复杂变量（如利益冲突、人际压力），难以迁移到现实行为中。

（三）情景预设与真实议题的共振弱化

当前思政教育中的情景预设多基于教材内容或教师经验构建，存在“理想化过滤”倾向。例如在“基层民主协商”主题教学中，教师常通过模拟社区议事会的形式组织活动，但预设的议题多集中于垃圾分类、宠物管理等低争议性内容，回避拆迁安置、业委会选举等真实存在的治理难题。社会大课堂的真实议题往往具有跨学科性、复杂性和时效性特征。2023 年某校组织学生调研“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民生工程时，预设的“邻里互助”主题在实践中遭遇产权纠纷、资金分摊等具体矛盾，学生既缺乏民法典相关条款的知识储备，又未掌握基层协商调解技巧，最终使实践活动演变为矛盾观察记录。这种情景预设与真实议题的错位，暴露出思政教育中“问题意识培养”与“解决方案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四、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的路径选择

要想破解当下所面临的诸多实际困境，探寻出恰当的实践途径就显得格外重要。唯有让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有机的整体，才能够切实提升思政教育所具有的实效性。

（一）教学内容方面，构建“知识—价值”共生体系

强化书本知识的传授，深入挖掘教材的价值内涵，让学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清醒头脑和正确方向，在潜移默化的教学中培养其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法治意识和公民素养[9]。结合社会热点和现实问题，引入相关案例分析讨论，并适时安排实践操练，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受到价值观熏陶。如此构建“知识—价值”双维共生体系，既能增强课程时效性和针对性，又能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理解领悟价值观的重要性。

（二）教学力量方面，构建“专—全”互动矩阵

首先，强化专职思政教师的核心引领作用。通过定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修、社会实践调研及跨学科教学研讨，提升其理论素养与社会实践指导能力，培育既精通课堂教学又熟悉社会动态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其次，激活学科教师的协同育人功能，在历史、语文、艺术等有关课程中建立思政元素挖掘机制，通过集体备课、案例共享等方式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同频共振。最后，整合社会优质教育资源，聘请党政干部、社区工作者、行业楷模担任“校外思政导师”，构建“学校—家庭—社区—企业”四位一体的实践育人网络。

（三）教学形式方面，构建“虚—实”融合生态

通过项目化学习，组织学生以小组合作形式开展社会调查、策划方案、模拟实践，将理论学习与实际问题解决相结合。通过现场讲解与互动体验，学生不仅能够理解革命精神的深刻内涵，还能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增强爱国主义情怀。同时，借助数字技术，结合慕课、虚拟现实（VR）等开展线上教学。只有以真实问题为锚点，以虚拟技术为桥梁，以行为转化为标尺，构建虚实互嵌、知行合一的新型教育生态，方能使数字时代的思政教育既具“科技感”，更有“生命力”。

将初中思政小课堂与广阔的社会大课堂进行有机整合，是新时代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品质的关键途径。展望未来，应进一步深化创新性的整合方法，优化教育体系，为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 .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N]. 人民日报 , 2019−03−19(001).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58: 366.

[3] 邓小平 . 邓小平文选 : 第 3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3: 35.

[4] 孔德英 , 张大俭 , 姜国俊 , 等 . 教师必备的教育教学理论 [M]. 保定 : 河北大学出版社 , 2015: 3.

[5] 李海泳 . 高校思政课理论与实践融合模式探究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 2024(43): 38.

[6] 习近平 .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N]. 人民日报 , 2018−09−11(01).

[7] 李艳飞 , 康超 . 数智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前瞻——第七届“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学术论坛述要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 2025(02): 95.

[8] 王碧波 . 高校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的内在逻辑及实现路径 [J]. 高校辅导员 , 2020(01): 65−68.

[9] 张彦青 .“大思政课”视域下“社会大课堂”的规范化建设 [J]. 思想理论教育 , 2025 (02): 72−7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第二届湖南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时代初中思政课‘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研究”（Y2024958）；2024 年第二届湖南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以研学旅行创新初中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研究”（Y2024959）。

（作者单位：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内涵与实践路径

任洪皓

摘要：正确认识青年群体的历史贡献及在新时代的政治地位是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前提，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是共青团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引领要明确为何引领、谁来引领、引领谁以及如何引领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做到夯实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理论基础、强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政治要求、把握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现实需要以及以数字技术助力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提质增效。

关键词：新时代；共青团；青年；思想政治引领

青年群体是祖国的未来、国家的栋梁和民族的希望，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离不开青年群体为之输送的源源不断的活水。为党汇聚青年、团结青年、引领青年，始终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把握青年群体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是共青团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的重要使命和责任。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机遇，将广大青年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凝聚青春力量，是新时代青年群体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共青团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必须回答且必须回答好的课题。因此，深入分析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内涵，并进一步研究探索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内涵

新时代的青年要做到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只有这样才能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才能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汗水为祖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引领，一直以来都是共青团性质定位的内在要求，更是党赋予团的重要使命。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首先要清楚思想政治引领的内涵，“引领”具有“带领、指引”之意；要深入地理解思想政治引领的内涵，必须从思想政治引领的目的、思想政治引领的主体和客体、思想政治引领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方法等方面来把握。因此，要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一）为何引领

共青团由党孕育、由党领导，是党的忠实助手和可靠后备军，党加强和实现对青年工作领导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共青团对青年群体进行思想政治引领。新时代，青年群体思想政治引领工作需不断加强，在开展青年工作时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巩固和扩大党在青年群体中的执政基础，教育和引导青年群体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增强青年群体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以及努力成为党新鲜血液、中坚力量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一是从历史角度看，历史的使命需要青年群体来担负。一百多年来，党的队伍中始终活跃着青年人的身影，我们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都凝聚了青年人的青春、热血和汗水，如果新时代的青年不能坚定理想信念，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接好前辈们的接力棒，就会使革命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成就付诸东流。因此，不负先辈遗志、不忘先辈嘱托，必然要求对青年群体的思想政治引领。二是从未来角度看，光明而美好的未来需要青年群体开创。新时代呼唤新青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国际国内环境日益复杂，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坚持和巩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青年群体勇敢地做出回答。

（二）谁来引领与引领谁

谁来引领与引领谁回答的是思想政治引领的主体与客体的问题。思想政治引领的主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中国共产党，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引领青年群体。共青团的特质和优势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共青团的政治生命亦是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将青年群体团结起来，共青团才能引领青年群体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成为堪当重任的新时代青年。

二是各级团组织，中国共青团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其思想政治引领的角色，团是党联系青年群体最广泛、最充分的工作基础与工作优势，也决定了其思想政治引领的组织力量和政治基础。思想政治引领的客体就是广大青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都离不开青年群体贡献自己的力量，青年人才作为国家人才队伍的源头活水，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支撑。青年强则国家强，因此，必须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

（三）如何引领

如何引领回答的是思想政治引领的方式、方法问题。一方面是思想引领，青年群体在思想上务必做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共青团在教育引导广大青年时，要充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党的先进思想和理论成果。另一方面是政治引领，就是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党绝对忠诚。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站得高、看得远，青年思想政治引领重点在于引导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胸怀“国之大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二是要讲得深、说得透，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既要遵循政治逻辑，又要遵循理论逻辑，即青年群体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高自身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也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真正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三是要贴得近、干得实，要结合青年群体的特点，以更贴近青年人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与此同时，还要将思想政治引领同实际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落地落实。

二、新时代进一步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实践路径

青年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受到高度重视，而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其前途命运与青年群体的思想动向始终紧紧相连。新时代，中国要全面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引领，不仅是因为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更是在“两个大局”的关键时刻，引领青年群体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勇挑时代重担。当前，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对当代青年思想意识产生了愈加深刻的影响[1]。因此，在新时代需进一步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确保青年群体能够坚定理想信念、实现自我价值，沿着正确的方向奋勇前进，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

（一）夯实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理论基础

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重视理论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青年只有不断夯实理论基础才能达到思想政治上的成熟。因此，要加强青年思想政治引领，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强对青年群体的理论武装。一是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不断提升自身理论素养，要做到往深里学、往实处落、往心中走，结合自身实际、工作实际、岗位职责，努力探索并掌握科学的工作思维和工作方法。二是要进一步完善青年理论武装体系。青年理论武装要从整体上统筹，既不能简单化、只用一套方案，也不能各自为营，缺乏理论教育的连贯性和进阶性[2]，要结合青年群体各成长阶段的特点以及所从事的各行业的特点来系统、细致地制定理论学习内容，精准、有效地提升青年群体的理论知识水平。三是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努力成长。要教育引导青年群体勇担时代重任，鼓励他们到基层一线、艰苦地区经风雨、壮筋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反思自身理论的不足之处，自觉成为党的科学理论的忠实信仰者和实践者。

（二）强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政治要求

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将自己的人生目标与理想追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全局，必须深深融入党和国家的事业。一是要不断加强青年群体的理想信念教育。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一刻也不能松懈，因此，国家、社会、高校等务必多措并举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可采用“主题党日”“主题团日”的方式，让青年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接受精神的洗礼，也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宣传教育，使青年群体能够不断夯实理论知识，传承红色基因。二是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约束青年群体思想、引导青年群体行为，结合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和国家纪念日等开展一系列主题鲜明的特色活动，激发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使命担当意识，不断增强青年群体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站稳政治立场，明确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三是以党建带团建，凝聚青年力量。在青年思想政治引领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处在核心地位、领导位置，因此要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必须走在前列、学在前面，以身作则带动青年群体。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在开展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时，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高度，开展青年工作要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从而真正提升青年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做广大青年合格的引路人。

（三）把握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现实需要

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并不是拿着原著原文、文

件课本去照本宣科，这样往往难以激发青年群体的情感共鸣，更难得到青年群体的价值认同。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必须紧密结合青年群体的实际情况，在关注青年群体精神需求，引导其形成正确思想观念的同时，还要关注青年群体物质需要，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和帮助。因此，思想政治引领要让青年群体感受到“温度”，要结合青年群体的思维方式、情感需求、现实需要等把握青年群体的成长规律以及成长过程中的共同点和差异性，深入了解青年群体，分析其所思所想，根据青年群体的性别、年龄、成长环境、职业类别等因素进行分类引领，切实提高引领成效。一是要因人而异制定引领方式及内容。例如，在高校开展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时，对于新生主要引领其顺利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尽快适应集体生活；对于高年级学生可以多开展心理辅导、情感疏导以及就业指导等，引导其毕业后创新创业，鼓励其毕业后多投身到基层一线以及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二是要引领青年走出课堂多参与实践调研。青年思想政治引领仅仅依靠课堂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要多组织青年群体到乡村基层一线、红色革命教育基地等参观学习、开展调研，在这一过程中，青年群体能够深入基层，切实了解基层中的急难愁盼问题，同时，身处基层之中更加有利于青年群体责任意识、担当意识的培养，不断增加对党的领导的政治认同。三是要积极回应青年群体关切。在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同时也要做到服务青年群体，保证思想政治引领的时效性，因此，对于青年群体思想动向要做到准确把握，对于社会敏感问题要做到第一时间进行答疑解惑，对于社会热点问题要做到及时精准发声，这些都是确保青年群体在成长路上不迷茫的重要保证。同时，对于青年群体在学习、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也要及时提供有效的帮助，让青年群体时刻感受到党组织、团组织永远是其奋斗路上最坚强的后盾。

（四）以数字技术助力青年思想政治引领提质增效

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引领，是指运用不断升级的数字化技术，使思想政治引领全面升级到数字空间维度，解决传统社会环境下长期存在、无法有效解决的矛盾和问题[4]。如今，互联网在青年群体学习、工作、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青少年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成长空间、‘第六感官’”[5]。在青年群体成长过程中，互联网已成为其认识世界、观察世界的重要途径。因此，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引领要做到“青年在哪里工作就要做到哪里”。一是要通过数字技术获取信息。详细了解、科学分析青年群体在虚拟世界里的喜好、需求，制定相应引领内容，围绕新时代青年群体的行为特点、感兴趣的社会热点话题，不断优化引领内容、提高引领水平，通过青年的方式表达青年的想法，能够增加对青年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党组织、团组织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二是通过数字技术与青年群体实现高效互动。可利用数字技术搭建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网络平台，筑牢网络思想政治引领阵地，做到全时段与青年群体对话，这样可以随时随地开展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加速党组织、团组织与青年群体的沟通交流和情感传递，为青年群体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三是运用数字技术把握青年群体的思想动态。可建立数字化网络信息监督平台，随时监测青年群体的思想动态，并设置预警机制，以防错误思潮对青年群体产生不良影响。与此同时，还要鼓励青年群体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以数字技术赋能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引领青年群体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筑牢青年群体思想政治安全网。

三、结语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要教育引导青年群体认清当前国内国际局势，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大势，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参考文献

[1] 贺军科 . 书写新时代共青团的壮丽青春篇章 [J]. 中国共青团 , 2022(10): 13−16.

[2] 韩喜平 . 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 [J]. 红旗文稿 , 2023(02): 36−39.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09: 286.

[4] 王莎 . 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 [J]. 思想理论教育 , 2023(04): 92−98.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22: 7.

（作者单位：长春工程学院）

高校美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的方法与途径

田 浩

摘要：高校作为立德树人的主阵地，肩负着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筑牢意识形态根基、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的神圣使命。对于高校美术系而言，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紧盯美术类人才培养目标，更需以美育为桥、思政为魂，将党的教育方针深植艺术人才培养全过程。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通过持续加强思想引领、夯实课程思政建设、拓展实践育人方式、创新工作方法引导，开展自我教育及评价，加强思政队伍建设等方法途径，才能不断提升美术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关键词：高校；美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方法与途径

一、高校美术类大学生的身心特点

（一）文化基础相对薄弱

对于高校美术类专业大学生而言，由于高中阶段所学绘画属于个人专业特长，专业课训练时间较长，故文化课基础相对薄弱，跨学科知识掌握得不够全面。进入大学后，他们在各类课程学习中存在兴趣偏好的现象，尤其体现在对待公共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态度上，对专业课投入精力多，对公共课学习投入精力少，从而呈现出综合知识面不广、跨学科知识了解不多、人文综合素养不高的状态。

（二）创造思维倾向鲜明

高校美术类专业大学生因其学科专业实践操作性强的特点，在绘画、设计学科专业教学以及创新实践中，课程达成目标大多为呈现具体可视、可感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效果的实物，故美术类大学生思维相对其他学科专业大学生来说，对数理性、逻辑性等抽象的概念存在碎片化、理解不深不透的问题。但他们的思维对具象化图式较为敏感，对艺术表现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尤其在专业学习实践中，对创作设计有浓厚的兴趣，能够基于独有的专注力和艺术灵感，把具象性的图形融入大胆的创意中，从而形成美术类大学生独特的思维特点。

（三）个性特征相对突出

高校美术类专业大学生都有个人的理想与信念，追求自尊和自由，有渴望独立的自我意识，性格普遍存在好胜心强、敢于创新、行为较为随意的特点，加之高中阶段专业课学习占用时间长，参加各类文体活动较少，故而组织纪律观念和集体主义观念不强。同时，他们对艺术真、善、美的理解以及对艺术个性的追求迁移到个人思想及行为中，普遍呈现既有艺术个性张扬，又有追求完美的特点。

二、影响提升高校美术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因素

（一）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倾向

价值观最为直接地表明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指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程度，在于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变化。尤其作为社会中最为活跃和富有潜力的群体，当代大学生所处环境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他们更倾向于自主化追求和多元文化收纳，这样的多元背景不断促成大学生多元化价值观的形成。高校美术类大学生具有浓厚的艺术气质，但由于他们社会阅历少，辨别事物真伪的能力参差不齐，同时受到西方现当代不良艺术观念及各类艺术思潮的影响，他们的审美价值观易产生模糊、紊乱，审美感觉易出现偏差，加之受到社会非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负面影响，容易被表面现象所吸引，其价值观呈现出多样化的认知和体验特征。

（二）创新教育针对性不强

当前，高校开展美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以学校教育为主，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有其统一性特点，具体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主要以思政课堂、课程思政知识的讲授为主。从教学模式的角度来看，传统课堂教育占主导地位，而大学生根据个人成长实际选择个性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机会不多，这也使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需求和精细化管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从美术类大学生整体发展来说，新时代对高素

质美术人才需求日益迫切，尤其是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锻炼越来越显得重要，传统教育的针对性则略显滞后。

（三）思政队伍水平有待提升

在高校美术类院系中，党政负责人是贯彻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求、把握正确方向的直接负责人，然而由于日常行政事务多，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不够全面，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宏观性、统一性要求多，“点对点、面对面”开展思政教育较少。专业课教师对本专业领域内的教学、科学研究较多，而对深层次挖掘美术专业课程思政育人内涵、跨学科思政育人相关理论的研究相对薄弱。班主任是思政队伍的一支重要力量，熟悉每位学生的心理状况和学业发展，但还需承担相关教学、科研工作，所以对本班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和差异性教育引导效果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1]。对辅导员来说，工作中忙于学生日常管理的具体事务，虽然年轻化是他们最大的优势，但工作阅历与经验不足、精力过于分散，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相对薄弱，易出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精准性和时效性不足的问题。

（四）教育引导方法途径不多

一是思维创新还不够开阔。教师还不能有效结合美术类大学生的专业特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如在开展红色文化教育中，教师注重对各类图片、美术作品的赏析，而对引导学生立足红色文化精神与美术创作实践深度融合，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革命精神与学生成才成长的联系还不够紧密。二是思政教育载体的应用还不够充分。如校园文化活动的有效开展、校内外各类教育资源的引入、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建设、第二课堂素质拓展、社会实践与服务、朋辈引领带动、家校协同、心理咨询、文明宿舍创建等方面，其育人的桥梁纽带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

三、加强和提升高校美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方法与途径

（一）巩固党团组织建设，持续加强思想引领

党团建设和思想引领“是高校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工作”[2]，是持续巩固新时代广大青年跟党走、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和远大理想志向，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政治保障。高校美术类院系要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以思想引领为龙头，以党建带团建为重要抓手，深入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时代精神中汲取营养，感受奋进的力量，在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挖掘资源，把时代精神作为塑造一代新人的核心内容，贯穿教育全过程，渗透到教育的方方面面”[3]。尤其对于美术类大学生来说，学习理解并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与他们制定人生规划、加强专业发展、丰富实践应用、弘扬正能量深度契合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夯实课程思政建设

一是要深入挖掘育人元素。如教师可根据具体课程目标和内容，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从中梳理提炼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典型形象，并将这些育人元素有效应用在课堂训练、课后实践中，使学生实践能力得到提升的同时思想也得到升华，从而凸显思政教育与美育融合的特点。二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课堂是教书育人的第一阵地，要不断深化美术类教育教学改革，紧扣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完善培养方案、科学设置美术类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优化教材建设和课程思政内容，不断丰富课堂教学方式与教学手段，才能够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三是不断丰富课程思政载体，增强育人效果。围绕国家重大经济、文化发展战略，举办学科专业展览竞赛，开展主题性创作设计、社会实践服务等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课程思政才能取得实效。

（三）拓展实践育人方式，凸显美育教育特点

高校美术类大学生，因其自身具有一定的专业特长，而且绝大多数对美术专业具有浓厚的兴趣爱好，他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与理解是从具体客观的形象、从具体的创作设计实践过程中不断得到深化的。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展以美育为主题的跨学科教育教学和课外校外实践活动”[4]。因此，有针对性地组织美术类大学生运用自己的特长、兴趣爱好、智力、知识、技能参加校园文化建设、社会服务等实践活动，如开展美术设计展览、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跨学科竞赛比赛、文创研发转化等实践，才能有效提升美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更加凸显美育的特点。

（四）注重创新工作方法，细化思政育人方式

一是结合美术类大学生发展特点开展针对性教育。对于低年级学生应着重开展专业职业生涯规划、专业基础能力教育，实践基础能力教育；对于高年级大学生应着重开展创新创业能力、专业创作能力、实习实践操作技能提升，才能更好地对接社会对美术专业人才的需求。二是持续加强和完善协同育人机制。通过学校与家长的沟通交流，使家长深入了解学生在校情况，并能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给予学生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使学生的思想在良好的家校氛围中不断提升。在实习实训环节中，校外导师一般都是本行业、企业专业精深的知名人士，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专业学识，更重要的是有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他们能够帮助学生开阔专业视野，了解行业动态，明确未来职业发展方向，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爱岗敬业、遵守职业规范等良好职业素养。三是完善育人评价机制。教师

评价学生应重视综合素质，强调“五育并举”。评价不应单纯聚焦学习成绩与实践技能，而是要将德育评价放在首要位置，要结合大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来评价其是否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否端正，是否积极参加各级各类理论学习、实践活动等，都需纳入思想政治考核范围。而不是因为美术类大学生存在个别不良行为，就放松了思想政治的考核。只有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和机制，才能够激励和引导美术类大学生不断规范自己，向先进看齐，向榜样看齐。

（五）引导开展自我教育，鼓励进行自我评价

在提升高校美术类大学生思政教育质量过程中，不仅充分发挥学校教师、党团组织的教育引导作用，还要“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他们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从而实现自我发展”[5]。自我教育是新时代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这一点对于美术类大学生来说尤为重要。就是通过自学自修、自我反思与评价的方式不断提高和完善自我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一是引导开展自学自修。一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积极关心关注国家大政方针，通过现代媒体等方式自学掌握新时代先进的文化思想和文艺理论，如阅读时政要闻、文艺动态等，不断提升自身政治理论素养和思想觉悟，促进自我发展。另一方面，大学生要增加学识，通过阅读文学名著、中国历代美术名家自传、艺术职业成功案例，甚至是感兴趣的跨学科知识，同时，也可通过参观地方博物馆、红色纪念馆、美术馆，或进行有目的性的社会调查等，较为深入地了解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不断增强自身人文修养。二是鼓励进行自我评价。自我评价是“大学生通过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以及对自己的思想行为的一种体验，自己作出肯定和否定的判断”。就美术类大学生而言，则需要通过党团组织生活会、班主任谈心谈话、主题班会以及表彰先进等方式，对自己的日常行为进行自我对照、反思、剖析，客观理性查找出自我存在的问题与差距，认真分析主观因素所导致问题的原因，从而积极寻找加强和改善自我修养和行为的对策与措施。

（六）加强思政队伍建设，保障思政教育质量

一是提升思政队伍素质。加强教育管理者对党的最新理论、政策的学习与培训，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动权，针对性地制定符合学生发展实际的教育策略。二是优化引进和选聘机制，配齐配强辅导员队伍。高校对新引进的青年教师，鼓励从事辅导员工作，只有熟悉和掌握了美术类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才能更好地投入到思政教育中去。三是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要配备对工作认真负责、有扎实学识和仁爱之心的教师。才能真正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心理、职业规划起到引领作用。

四、结语

总之，高校美术类院系要深入了解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思想动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紧盯美术类人才培养目标，通过持续加强思想引领、夯实课程思政建设、拓展实践育人方式、创新工作方法引导，开展自我教育及评价，加强思政队伍建设等方法途径，才能不断提升美术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培养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 黄琳 . 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M]. 北京 : 中国财富出版社 , 2022: 10−11.

[2] 戴敏 . 增强新时代大学生志气、骨气、底气的实践探究——以高校理论宣讲团建设和发展为视角 [J].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3, 21(01): 6−9.

[3] 刘淋淋 , 刘名学 , 段华琼 .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与创新 [M]. 延吉 : 延边大学出版社 , 2022: 8−9.

[4] 苏凤 . 艺术类中职学校研学旅行基地建设探析 [J]. 广西教育 , 2021(18): 17−18, 44.

[5] 韩文瑜 . 以学生为本提高学生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J]. 中国高等教育 , 2010(08): 15−1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甘肃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音乐、体育、美术、劳动教育、心理健康”一般专项课题项目“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美术教育教学中的实施途径研究——以甘肃红色文化资源为例”（GS〔2023〕GHBZX1073）。

（作者单位：天水师范大学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基础医学教育阶段课程思政实施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李　辉 李泓漾

摘要：基础医学教育作为医学教育的基石和核心，是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和关键，直接关系到医学教育的总体质量。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重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凝练红色育人精神，发掘育人元素，在基础医学课程教学中有机融入思政元素，注重课内课外衔接与延伸，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与第一课堂形成合力，建立全过程、多维度、融合式课程思政新体系，实现知识导向和价值引领相结合的协同育人目标，推动医学教育创新发展，培养仁心仁术的医学人才。

关键词：立德树人；基础医学；课程思政

一、研究背景

2016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提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直接决定了人才培养质量，强调立德树人的重要性，思想政治工作需要贯穿教育的全过程，实行全过程和全方位人格塑造，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迈向新阶段 [1]。2019 年 9 月，教育部颁布《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课程思政建设是践行立德树人核心使命的关键路径，强调将知识的传授与价值观念的引导紧密融合，达成显性教学与隐性教育的协调统一，深度发掘各类课程及教学法中所潜藏的育人资源 [2]。2020 年 4 月，教育部联合七个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意见》指出，从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法治意识和道德修养五个方面着手，全面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整体水平，并将思政元素融入各学科课程教学中 [3]。同年 5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医学类专业课程的思政建设进程中，着重在课程教学中融入医德医风教育，致力于培育学生“尊重生命、勇于救治、乐于奉献、广博仁爱”的医学职业精神，深化医者仁心的培育，着力培育学生秉承“尊崇生命、勇于担当、无私奉献、博爱无垠”的崇高医者精神 [4]。同年 9 月，国务院发布的《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同时强调，要培养仁慈之心与精湛医术兼具的医学人才，强化对医学生的职业道德与伦理规范的培育，深化科研诚信教育的实施，有效利用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元素，全力塑造医学生勇担救死扶伤重任的品质 [5]。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实施有效的课程思政，对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发挥着重要作用。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重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在基础医学课程教学中有机融入思政元素，建立全过程、多维度、融合式课程思政新体系，实现知识导向和价值引领相结合的协同育人目标，推动医学教育创新发展，培养具有仁心仁术的医学人才。

二、基础医学教育阶段课程思政实施路径探索

（一）建立课程思政长效机制

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立足医学教育特点，实施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德树人，以服务国家需求，提高质量为发展主线，以深化改革为动力，深入研讨，系统构建了“党委统领、党政协同、部门联动”的课程思政工作体系，形成了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长效机制。学院完善顶层设计，将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纳入学院“十四五”发展规划重点任务，明确年度工作要点，建立常态化推进机制。通过强化组织领导、优化制度保障、细化责任分工，确保课程思政工作落地见效。学院强化师资建设，实施“双培双促”计划：一方面加强教师思政能力培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另一方面将思政育人成效纳入教师考核评价体系，促进教学与思政深度融合。

学院构建“以党政统筹为保障，以部门协同为抓手，以学校教育为纽带”的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模式。在党政统筹方面，学院建立了“双组长制”领导机制，由党委书记和院长共同担任课程思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学院制定《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

将思政工作要求纳入学院年度工作计划和绩效考核体系，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在部门协同方面，学院打破部门壁垒，建立了教学、科研、学工、行政等多部门联动机制。教务办公室负责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学生工作办公室组织第二课堂活动，科研办公室推动思政元素融入科研项目，形成全员育人的工作合力。在学校教育方面，学院重点打造“三个课堂”：第一课堂深化专业课程思政改革，第二和第三课堂开展“重走白求恩路”“基础医学之光”“人工智能创新实践工作坊”等主题实践活动。

（二）强化教师思政能力，构建育人新格局

教育引导教师就课程思政的理念形成广泛共识，帮助教师深刻认识课程思政的核心理念，明确其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所承担的主体责任和育人使命。着力强化教师的育人意识，精准把握育人切入点，持续提升育人能力，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教师。同时，充分发挥教师在教育实践中的育人优势，为培养具有仁心仁术的医学人才提供坚实保障。学院以“坚持立德树人、实现三全育人”为教学活动主线，进一步开展新时代教育思想大讨论，多次召开主任会、教学研讨会、专题报告会、交流会，研讨新形势下课程建设与医学教学改革趋势，强化“大思政”理念，扎实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形成教师投身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新风气，全力塑造一支高素养教师队伍，鼓励教师们秉持教书与育人并重、言传与身教相融、潜心学术探究与社会责任担当相结合、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协调的原则，全方位推动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入发展。引导各学系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率先打造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学院现获批吉林大学课程思政“学科育人示范课程”项目 17 项、吉林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4 门。

（三）构建全过程、多维度、融合式课程思政体系

由于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在制定课程教学大纲时，做到每门课程、每个章节都能体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厚植科学思维与钻研精神，持续强化医德医风教育，着力培育学生秉承“尊崇生命、勇于担当、无私奉献、博爱无垠”的崇高医者精神。同时，深入加强医者仁爱之心的培养，培养医学生守护生命健康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 2023 年吉林省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典范案例和优秀案例评选中，学院开设的“病理学”被评为课程思政教学优秀案例，“医学免疫学”被评为课程思政教学典范案例。

基础医学各学科之间相互关联、层层交叠，学院从生命观、科学观、医学观三个视角，构建全方位、多维度的课程思政新体系。医学生最先学习的医学课程有系统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理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这些课程成为培养学生生命观的基础，使学生逐渐树立起尊重生命、珍视健康的崇高理念。医学生科学观的养成更依赖于免疫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主题课程的学习。这些课程帮助学生构建系统完整的科学思维体系，使学生学会批判性地思考问题，勇于接受创新和挑战。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作为桥梁课程内容，对培养学生医学观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些课程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验基本操作技能与临床思维方式，更致力于塑造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百折不挠的品质以及不辞辛劳的精神。

（四）凝练红色育人精神，发掘育人元素

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有着敦厚丰富的精神底蕴和人文内涵，有着八十余载辉煌历史。基础医学院的红色精神源自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蕴含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诞生的“白求恩精神”，通过几代基础医学院人接续奋斗，逐渐形成、发展和凝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渝的信念、人民至上的根本宗旨以及优良作风和革命精神，更蕴含着历代基础医学院人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矢志不渝服务国家的决心和顾全大局的崇高品格，这是学院发展的精神命脉和灵魂所在。

近年来，学院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卓越医学人才为办学宗旨，坚持价值引领，构建思政育人体系。总结凝练学院红色精神：出版《基础医学院院史》和口述史《记忆·见证·传承》，拍摄《红色前辈 时代榜样》等 5 部纪录片 、23 个短视频。学院坚持红色基因传承，以“向时代楷模黄大年学习，做爱生重教的合格教师，做新时代白求恩精神践行者”系列活动为主线，弘扬高尚师德，坚定理想信念，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通过《红色前辈 时代榜样》《砥砺奋斗——与白求恩同行》《先贤之光》等系列弘扬红色精神纪录片的制作，为学院教师开拓医学教育创新发展注入精神力量。教师传承红色基因，充分发掘育人元素，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的各个环节，切实达到育人成效。通过师生共同参与，融入人生选择和价值目标的引导，发挥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启发与引导学生对于真理的探索与思考。

（五）注重课内课外衔接与延伸，创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为响应新时代医教协同政策以及健康中国战略对医学教育改革的迫切需求，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致力于为国家新医科建设培育高质量后备人才，重视医学基础研究，以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为目标。学院巧妙地将课程思政融入学生创新能力与岗位胜任力的培养之中，通过实施阶段式孵育模式，实现了从课内到课外的无缝衔接，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学院开设机能实验学、科学思维与创新、形态学研究方法等自主设计实验课程，在课内为学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学生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开放性创新实验等课外实践项目中，拓宽了实践视野，

增强了实验操作能力。同时，学生参与基础医学科研训练、本科生科研训练等实践环节以及学科竞赛，课内所学的实践技能得到延伸与补充，学生的科学创新思维和实践动手能力得到提升，为学生未来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学院以国家级科研课题为引领，以基础医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孵化平台，通过阶段式孵育模式，将科学思维与实践技能的培养贯穿于整个基础医学教育阶段，注重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同时使他们树立成为医学科学家的崇高理想。

（六）“三个课堂”形成合力，拓展课程思政育人空间

学院通过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开展课程思政实践教学，打破了第一课堂在空间、时间上的局限，形成多维度、多场所教学体系。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与第一课堂形成合力，拓展课程思政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

学院精心打造“重走白求恩路”社会实践品牌项目，让学生亲身体验红色之旅，深入了解革命历史，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学生们在红色历史和精神传承中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此外，学院积极开展“基础医学之光”志愿服务活动，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得到传播和发展。学生们在活动中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强化了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同时筑牢了学生们的理想信念。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学生们在奉献中得到成长，在服务中不断锤炼，成为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医学人才。通过打造白求恩精神内涵品牌，为推动学院高质量发展释放了新动能、增添了新活力，获评吉林大学“一融双高”基层党建品牌建设重点项目（10个），“生命之约 大爱传递”医学劳动教育实践获批学校首批劳动教育实践示范课程（14门），“八秩芳华，寻梦启航”新民校区实践团获批学校2024年暑期社会实践A类优秀案例（9个）。

三、结语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办学的核心使命与根本任务，更是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本质要求。作为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与健康中国战略的关键交汇点，医学教育具有特殊重要性。医学院校承担着培养高素质医学专门人才的重任，更肩负着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神圣使命。深入探索新时代医学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践路径与长效机制，对于深化医学教育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迫切需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矢志不渝地秉持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宗旨，深切认识到课堂教学作为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主阵地的重要性。学院致力于深度挖掘基础医学课程体系中潜藏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巧妙地将这些思政元素与基础医学专业知识交织融合，课内课外衔接与延伸，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与第一课堂形成合力，构筑起一个贯穿全程、多元视角、深度融合的课程思政新生态。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12月7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EB/OL]. (2016-12-08)[2025-03-11]. http://www.gov.cn/xinwen/2016-12/08/content_5145253.htm#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EB/OL]. (2019-09-29)[2025-03-1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910/t20191011_402759.html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EB/OL]. (2020-04-22)[2025-03-11].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15/content_5511831.htm.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 (2020-05-28)[2025-03-1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6/06/content_5517606.htm.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 (2020-09-17)[2025-03-1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9/23/content_5546373.htm.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



课程思政背景下就业指导课程建设路径探索

孙鑫俐 赵 芬* 孙大成 刘 娴

摘要：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关键阵地，持续为社会输送人才，就业则是衡量高校人才培养成效的关键指标，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本文深度剖析就业指导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存在的难点，从理念革新、内容整合、方法创新、师资建设以及机制完善等多个维度剖析两者间的关系，积极探索融合路径，力求全面提升高校就业指导课程质量，培育出既契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又具备专业技能与高尚道德素质的专业人才，为国家的高速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关键词：就业指导；课程思政；课程建设；教学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立德树人确立为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充分挖掘和运用各学科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1]。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发现，高校课程思政改革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紧迫任务。

近年来，高等教育在服务国家战略中的作用持续增强，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化，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现代化服务等领域迎来发展窗口期，对复合型人才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背景下，将家国情怀、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融入职业指导课程，能够有效引导学生建立“大格局”职业观，将个人专长发展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这种培养模式既满足市场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又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一、就业指导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的意义

（一）助力学生自身全面发展

就业指导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是高校教育体系有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思政教育不仅能有效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让其认识到就业除了可以解决自身生存问题，通过就业还可以实现个人价值、回馈社会、报效祖国[2]。就业指导课程融入课程思政，引导学生在就业时放弃追求短期的物质利益，而去选择与自身价值与社会追求相统一的岗位。通过思政学习，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操守，以便在求职时展现更强的竞争力，为后期的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助力高校课程体系改革

高校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就业指导课程作为高校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课程思政意义深远。一方面，有助于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切实落实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理念；另一方面，就业指导课程涉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融入思政元素能够促进多学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为高校课程体系改革开辟新路径。通过这种融合，就业指导课程的内涵和外延得以不断拓展，从单纯的职业技能培训转变为综合职业素质的提升，从而全面提高高校的育人质量，增强学校的综合竞争力。

（三）助力行业可持续发展

课程思政主要为社会培养具有正确价值观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才，而就业指导课程若融入思政课程，则能为我国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等人才。高校所培育学生的综合素质、思想道德水平等会成为影响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若学生具有良好的素养，将使我国各个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3]。

二、就业指导课程的现状

（一）课程内容针对性不足

目前，多数高校的就业指导课程普遍使用通用教材，课程内容设置碎片化，各教学内容之间缺乏紧密的逻辑联系，难以帮助学生构建起从职业认知、职业规划、求职技巧到职业发展的系统性知识架构。内容上未能充分挖掘专业的特色与需求。例如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没有结合具体就业情况和职业发展路径进行深入讲解，导致对学生的指导缺乏精准性。当下新的技术、业态和岗位不断涌现，但是课程内容对

跨境电商、养老服务等新领域的覆盖却明显不足，故学生所学知识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

（二）师资队伍力量薄弱

部分高校就业指导课程的教师多为思想政治教育或学生管理背景，缺乏相关专业知识或企业工作经历，甚至有些教师从高校毕业后就直接任教，对行业的发展趋势、企业的人才需求标准了解不够深入，这就导致对学生求职的专业指导缺乏实用性。同时，学校对就业指导课程教师的专业培训投入不足，教师很少有机会参加行业培训、学术交流以及与企业沟通，知识和信息更新不及时，难以满足学生在就业方面多元化、多样化的需求。此外，随着大学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学生人数屡创新高，但就业指导课程教师队伍的人数却相对稳定，师生比例不合理，教师难以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就业指导，严重影响了课程质量和效果。

（三）教学方式单一

高校就业指导课程的教学形式单一，以教师讲授为主，缺少案例研讨、小组讨论、模拟招聘、企业参观等多样化教学方式，使得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不高，难以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就业指导课程实践环节较少，学生缺乏在实际工作场景中锻炼求职技能的机会，导致在面对真实职场时缺乏必要的职场技能和经验。除此之外，任课教师对信息化教学手段的运用不足，未能充分借助新媒体、VR 等技术，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提升课堂的参与度和活跃度。

（四）课程重视程度不高

部分高校对就业指导课程的重视程度不高，甚至将其视为边缘课程，在课程设置、师资配置以及教学资源投入等方面力度欠缺，极大地削弱了课程的教学效果。此外，学生对就业指导课程也存在认知误区，不少学生认为该课程理论性强但实用性不足，从而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逃课等不良现象。

三、就业指导课程融入课程思政的痛点

（一）理念与认知有偏差

长期以来，就业指导课程侧重于实用性技巧的传授，教师和学生都已习惯固定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期待。部分师生将课程目标单纯聚焦于学生能否找到满意工作，把课程思政简单等同于政治理论或道德说教，忽视了对学生职业价值观、职业道德等的培养。此外，当前教师队伍的思政素养和教学能力参差不齐，相关培训体系也不完善，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入思政元素困难重重。

（二）内容融合有难度

就业指导课程内容丰富，涉及职业认知、求职技巧、职业发展等多个领域，从中精准挖掘并提炼出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契合的元素并非易事。例如，在讲授简历制作和面试技巧时，如何巧妙融入诚信、责任等思政元素，对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思政敏感度要求颇高。而且，该课程有其独特的知识体系和逻辑结构，将思政内容有机融入其中，形成一个系统连贯的整体是一大难点。若融入不当，容易出现思政内容与课程主体脱节、碎片化的现象，严重影响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体验。

（三）评价与反馈机制缺失

专业知识和教育的考核主要靠将知识点量化来考核，但思政课程的效果是潜移默化的，无法通过量化来实现，故而如何通过科学、合理、易操作的评价体系，衡量学生的职业道德、精神等方面，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截至目前，未能有效构建统一、完善的量化指标体系来有效评估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4]。思政元素融入就业指导课程时，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导致任课教师无法及时掌握学生对思政内容的接受程度、学习效果等信息，难以根据教学情况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从而削弱了教学效果，也阻碍了课程的持续改进和优化。

四、就业指导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解决路径

（一）理念融合：树立协同育人理念

高校管理者需认识到就业指导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的重要性，摒弃传统观念，从而推动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机统一，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学校综合影响力。一是明确育人目标。摒弃仅以学生就业为唯一目标的思维，将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等相关内容纳入培养目标。引导学生在就业时，需关注职业的方方面面，而非单一追求个人利益和物质回报。二是树立全程思政观。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和需求，科学规划教学内容，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就业指导。大一时，通过职业生涯规划课引导学生了解自我，初步确立职业目标；大二、大三时，结合专业课程的学习、实习、实践等，强化专业技能培养和思政教育；大四时，开展就业政策解读、求职技巧培训及心理辅导等，助力学生高质量就业。三是教师转变教育理念。教师作为教育的实施者，要将思政元素融入就业指导的各个环节，避免只重求职技巧而轻思政，确保学生在掌握求职技能的同时，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二）内容融合：构建一体化教学体系

构建一体化教学体系对于就业指导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迫在眉睫。首先，需要全面整合教学内容。结合学生接受度、企业诉求、国家战略等，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并将其与教学融合。其次，充分挖掘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根据专业特点和行业需求，制定课程内容，满足学生个性化就业需求。高校可结合行业发展趋势，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最后，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因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导致就业市场产生不同变化，所以课程内容需紧跟职业发展趋势，教师需及时了解新兴职业，如森林康养师、林业碳汇计量监测员等，从而更好地指导学生就业。

（三）方法融合：创新教学方法

目前，就业指导课以讲授法为主，教学方式单一，教学效果差，为进一步提升课程的实效性和吸引力，急需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来加以改善。案例教学法，教师根据学生专业选择对应的典型（含失败）案例讲述相关内容，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理解讲述内容，如通过行业标兵事迹，激发学生对行业的热爱；实践教学法，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给学生提供实习岗位，通过实习让学生培养团队合作、吃苦耐劳等精神，同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引导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更好确立自身价值；线上教学法，通过网络平台，开展线上讨论、参观、教学等工作，打破时空限制，提升授课效率；情景教学法，通过模拟招聘，让学生体验不同职业角色，提升求职技巧。基于社会和行业发展现状，结合学校师资和学生特点，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融合的教学模式可提高就业指导课程教学实效。

（四）师资融合：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教学活动依靠教师完成，“双师型”教师队伍的打造有助于提升就业指导并保障教学效果。关于如何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笔者建议：一是加强教师队伍培训，如邀请行业专家对教师开展思政和就业指导内容的培训；二是加强交流合作，对内通过备课、教学研讨等加强思维碰撞，对外加强与兄弟院校合作与交流，相互借鉴成功经验，并鼓励有条件的教师暑假深入企业调研，了解企业需求，以便更好地指导学生；三是开展教学研究与实践探索，学校或上级单位设立相关课题，鼓励教师积极围绕实际问题开展研究，也可通过举办教学比赛、教学成果展示等方式来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五）机制融合：建立健全协同育人机制

高校作为育人主阵地，需整合内部资源，拓展外部合作，完善课程评价反馈体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同育人新格局。一是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整合资源，打破信息壁垒。高校要加强就业指导中心、思政教学部门和各学院之间的沟通协作，明确职责，形成工作合力。就业指导中心统筹协调融合工作，制定计划和方案；思政教学部门提供理论基础和教学资源；各学院反馈学生思想动态和就业情况，为针对性教学提供依据。二是拓展校企合作机制，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高校与优质企业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使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相契合。企业结合自身发展规划和人才缺口，可向高校定制相关技术人才；高校选聘企业优秀人才担任职业讲师，通过自身经验来指导学生。三是构建科学的评价与反馈机制，持续改进教学水平，提升教学能力[5]。评价机制需多元化，并非简单的课堂打分，可采用问卷调查、调研、报告撰写等手段实现，并邀请相关企业参与反馈，进一步了解企业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的诉求。反馈机制方面，除了课堂反馈外，还需预留时间让学生及时完成反馈[6]。通过回访学生就业企业、毕业生问卷调查等手段，收集企业对教学效果的反馈。教师及时分析处理相关反馈，根据反馈对教学方法、手段、方式等作出调整，从而提升教学质量[7]。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J]. 社会主义论坛，2017(03): 4-5.

[2] 廖丁瑶，王丹倪. 思政教育对提升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价值 [J]. 秦智，2023(09): 52-54.

[3] 杨招云. “课程思政”融入中职会计专业课程探析 [J]. 成才之路，2023(34): 85-88.

[4] 刘称意，张林飞，胡勇. “三全育人”理念下高职汽车类专业课程思政实施研究 [J]. 汽车测试报告，2024(13): 8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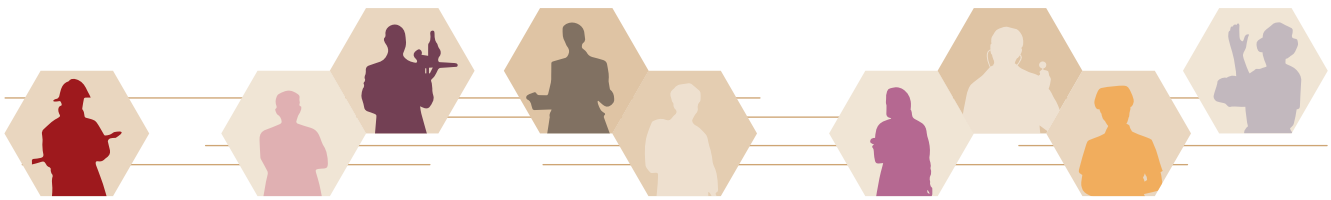
[5] 王岳喜. 论高校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构建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10): 126.

[6] 刘建军，梁祯婕. 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问题意识 [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01): 106.

[7] 杨小凤. 大学新兴智慧教学模式探索 [J]. 科技与创新，2024(05):59-6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西南林业大学 2024 年课程思政建设教学研究项目“就业指导与课程思政教育融合发展的研究”。

（作者：孙鑫俐，西南林业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湿地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通信作者赵芬，西南林业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湿地学院）党委副书记；孙大成，西南林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党委副书记、助理研究员；刘娴，云南工商学院专职辅导员）



协同育人视域下红色文化与思政课实践教学融合研究

李佳璐

摘要：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学生们日益频繁地面临价值观方面的挑战，这使得思政课的内容和形式要作出改变。目前思政课实践教学仍然存在形式单一、参与度不高、育人实效性欠佳等问题，亟须注入鲜活元素。红色文化，承载革命精神，蕴含丰富的育人价值，与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契合度极高。在协同育人视域下，应充分整合红色文化资源，打造沉浸式思政实践平台，让课堂内外融会贯通；践行红色文化理念，深化课程内容，使其更具思想引领力和情感共鸣；凝聚多方力量，构建多元协同育人体系，打破单一主体局限；创新教学方法，借助数字化、体验式手段，让红色文化真正“活”起来，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关键词：红色文化；协同育人；思政教学；教学实践

红色文化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典型代表，其蕴含着诸多道德价值以及历史智慧，如今已然成为思政教育改革的关键资源。借助探寻红色文化背后的故事可使同学们体会过去那段充满激情的历史，获取做人做事的智慧与力量。在协同育人的情形下，将红色文化与思政课实践教学相结合，可促使教育多方面展开协作，凝聚形成合力，这种结合有助于整体教育效果的提升，还可以让学生拥有更强的参与感，认同感也更为强烈，推动他们的思维在深度以及广度上的拓展。借助持续深入研究红色文化的内在含义，使教育内容和形式得以丰富，理论与实践之间也可实现更好地衔接，如此可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支持。红色文化作为文化自信的源泉，为思政教育创新发展注入了动力，这条探索之路将会面临更多的可能性。

一、当前思政课实践教学现状

当前思政课实践教学在具体实施中呈现出多维矛盾，难以真正触及学生的思想深处。①形式单一，缺乏吸引力：实践教学理应丰富多元，但现实中，多停留在简单的参观、讲座、座谈等传统模式，缺乏互动性和沉浸感，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部分学校组织红色基地参观，却局限于“走马观花”，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探讨；社会实践往往流于表面，缺乏系统设计，变成了机械化的任务完成。加之部分教师对实践教学重视不足，课程安排松散，导致学生难以产生深刻体验，甚至将其视为负担，效果大打折扣。②参与度不高，影响教学效果：实践教学本该是“动起来”的课堂，但不少学生仍是“被动参与”，甚至是“旁观者”。一是在一些实践活动的设置上没有考虑学生兴趣点，学生参与感不足，导致大家不怎么愿意主动参加。二是评价方式主要还是书面考试，实践内容经常被当成附加项目，所以学生认真对待的程度就比较低。虽然有的学校也在搞微课制作、情景剧表演这些新形式，但因为缺少配套保障措施，没有办法持续开展，最后变成个别同学在表现，大部分同学还是当观众[1]。③育人效果不够理想，触及不到思想深处：思政课最重要的就是要塑造价值观，但现在实际效果还没完全发挥出来。有些活动设计得比较表面，就是参观、听报告这种形式，不能让学生从内心产生认同。比如开展志愿活动时，没有与课程主题结合进行引导，同学们做完任务就结束了，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效果持续性不强。另外，课堂教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结合得不够紧密，学生学完不知道怎么将其运用到实际中，因此思政课的说服力和吸引力肯定会打折扣。

二、红色文化的内涵功能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其核心内涵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价值体系、以民族复兴为指向的实践智慧、以人民立场为本位的伦理准则。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框架下，红色文化既是理论生成的土壤，又是思想传播的载体，呈现出三重辩证统一特征：历史原真性与时代创新性的交融，意识形态引领性与社会实践指导性的协同，集体记忆建构与个体价值形塑的互动。

从精神内核解析，红色文化包含三个层次的结构

性要素。基础层是物态化的革命遗存，如延安窑洞、西柏坡旧址等空间载体，通过具象场景唤醒历史记忆；中间层是制度化的行为规范，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民主集中制等组织原则，塑造着集体行动的伦理框架；核心层则是符号化的价值信仰，体现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精神谱系，构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基石。这种分层结构使红色文化兼具历史证物、实践指南和精神图腾的多重属性[2]。

在育人作用方面，红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教育有四个维度的作用。第一是在历史解释方面。通过分析比如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调查方法，还有《论持久战》里提出的战略思想，带领同学们了解毛泽东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比如将农村包围城市这个理论和井冈山的革命实践互相印证，说明理论和实践是互相影响的。第二是价值观教育方面。用“半条被子”的故事讲解帮助别人的精神，用张思德的事迹说明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帮助学生在现代社会里明白集体主义和个人利益怎么平衡。第三是政治认同方面。通过比较延安时期的“三三制”民主和现在民主协商制度的联系，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根源，让年轻人更理解现在政治制度的历史原因。第四是实践指导作用。把红旗渠精神放进创新创业课程里，用“两弹一星”研发的例子说明科技自主的重要性，让学生能把红色精神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中去。

三、协同育人视域下红色文化与思政课实践教学融合策略

（一）整合红色文化资源，搭建思政实践平台

红色文化里蕴含着大量的历史与精神价值，能给思政教育提供生动的教学案例以及实践素材，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能让课程内容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和感情，提升教育的吸引力与有效性。把经典的红色文化教材、文献、影视作品等汇集在一起，结合地方红色历史与文化背景，能让学生在学习时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又体验到身边文化的鲜活。这种做法能帮助学生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还可以借助身边的故事引导他们思考现实中的责任与担当，搭建实践平台，可让学生“从书本走向社会”，在真实环境中体验和感受红色文化。在校外组织红色主题参观活动，例如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等，亲身感受历史氛围，实现学习与实践的有机结合[3]。此外还可运用互动形式比如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使学生们在课堂上模拟历史情境，让红色文化的精神借由实践得以生动呈现。为使红色文化在思政实践教学中产生实际效果，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例如建立红色文化数据库，提供丰富的音视频资源，便于学生随时随地开展学习与探讨，也可创建线上学习平台，鼓励学生在网络环境中分享自身的学习体会以及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形成班级间的良性互动。例如我校开发了“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项目，学生在虚拟场景中参与1942年整风会议，借助角色扮演还原“反对主观主义”讨论现场，课后要结合《改造我们的学习》撰写反思报告。

（二）践行红色文化理念，完善思政育人内容

思政课不仅要讲述红色故事，更要将其理念深植于教学内容，使之真正成为铸魂育人的精神养分。因此，需要从内容体系、表达方式、实践路径等多个维度入手，让红色文化理念成为思政课堂的“灵魂”，推动课程内容的全面优化。一要强化理论与现实的联结，提升课程的思想引领力。在教学中，不仅要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要结合红色文化中的实践智慧，展现其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二要创新教学表达方式，让红色文化理念更具感染力。改变单一的讲授模式，采用故事化叙述、互动式讨论、案例分析等方式，使抽象理论更易于接受。例如，在讲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时，可借助影视作品、红色微课、情境演绎等方式，让学生通过沉浸式体验理解革命信仰的伟大力量[4]。三要构建动态更新的教学内容体系，使红色文化理念始终保持时代鲜活度。结合国家重大战略、社会发展需求，不断补充新案例、新素材，如抗疫精神、航天精神、科技创新等，让红色文化的内涵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比如，在讲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时，可同步引入《寻乌调查》原始文本研读，要求学生运用毛泽东的调研方法完成校园社会观察；在讲解“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时，将红旗渠工程与当代乡村振兴工程进行技术伦理比较，凸显红色基因的演进逻辑。

（三）凝聚红色文化力量，构建协同育人体系

红色文化力量的凝聚需要突破单一主体局限，构建“多元联动—资源共享—效能叠加”的协同育人生态系统。一要深化校内协同，构建全员育人格局。思政课不仅仅是思政教师的责任，更应成为所有教育者共同参与的事业。各学科可结合自身特点，将红色文化理念融入课程之中，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相互渗透。例如，历史课程可以深化对革命史的研究，文学课程可引导学生阅读红色经典，工科课程可以结合“两弹一星”精神，探讨科技创新的爱国情怀。通过学科联动，让红色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的思想成长。二要推动校外资源共享，构建社会协同育人平台。联合地方政府、红色文化场馆、企事业单位，共建红色文化教育实践基地，让学生在真实社会情境中体验革命精神。利用专家讲座、社会调研、志愿服务等形式，使红色文化成为思政课的“第二课堂”，让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同频共振。三要强化家庭教育支持，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合力。鼓励家长与学生共同学习红色文化，开展红色经典阅读、红色影视鉴赏等活动，使家庭成为红色文化传承的重要场域[5]。比如，南京多所高校与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共建“信仰之路”协同项目。学生在学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时，同

步参与馆藏烈士书信数字化整理，结合《论人民民主专政》文本分析历史人物的政治选择。项目联合社区开展“红色精神进网格”活动，学生需运用群众路线方法论设计基层宣讲方案。

（四）创新思政教学方法，整合红色文化资源

用好丰富的红色资源，不但可以让课程更有意思，还能帮助同学们更容易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政课的教学方法要创新，必须先改变过去教师单方面讲课的方式，应该形成“数字技术帮助—互动交流—价值观融入”这种多维度联动的模式。第一要多用各种教学方式，让课堂变得生动有趣。上课时可以播放短视频、动画这些新媒体内容，讲红色故事，让课程变得好玩又直观，同学在观看的时候就能感受令人热血沸腾的革命年代。第二要组织小组学习活动，让大家都参与其中。分小组讨论经典红色主题，比如“为什么要有理想信念”，让同学们互相交流自己的想法。在这种互动中不仅能活跃学生思维，还能通过大家一起讨论更好明白红色文化的重要价值。另外可以让学生自己选择感兴趣的红色主题做研究，最后展示自己的成果，这样能培养创新能力和比赛意识[6]。第三要用好信息技术，建设红色文化的网上学习平台，方便同学学习讨论。平台上可以放入各种红色资料，比如经典图书、纪录片和研究论文，激发学生课外主动学习的积极性。还可以开设讨论区，让大家在网上分享观点，加深对红色文化的认识。比如我校用动作捕捉技术做了 VR 版《论持久战》的打仗模拟，通过实际操作战略部署来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此外还建立了区块链记录系统，完整保存学生参加红色调研、设计方案的过程，这样就能清楚见证思想教育的成果。

四、结语

红色文化与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深度融合，不是简单的资源叠加，而是理念、方法、路径的系统创新。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搭建实践教学平台，使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才能让思政课堂真正焕发生命力。教学内容的优化、教学方式的革新、育人体系的完善，共同构筑起协同育人的新格局，让思政课不仅是理论传授的阵地，更是价值塑造的舞台。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不止于课堂，而应在社会实践、家庭教育、科技赋能等多维度展开，使其成为青年成长的重要精神支柱。协同育人的关键在于凝聚合力，打破单一育人模式，让红色精神在多主体互动中不断升华。未来，思政教育需紧跟时代步伐，挖掘红色文化的现代意义，让思政课真正成为塑造信仰、锤炼品格、激发使命感的精神沃土，使红色基因在新时代青年群体中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1] 申秀秀 . 高职院校思政课“1+4+4”实践育人模式探究——以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J]. 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 , 2024, 26(08): 3−7.

[2] 周蕾 . 基于“三能力全过程四维度”评价体系构建对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力的探索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 2024, 37(15): 102−104.

[3] 张杰 .2005−2022 年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的可视化分析与未来展望 [J]. 未来与发展 , 2023, 47(11): 27−35.

[4] 吐孙阿依·图尔荪 .“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思政课实践育人模式的路径探析 [J].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 , 2022(09): 59−61.

[5] 旭日 . 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的现状及优化路径 [J]. 西部素质教育 , 2022, 8(17): 40−43.

[6] 陈文波 . 新时代高校“四个自信”融入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 [J]. 沈阳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15(03): 224−22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西北政法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数字化背景下‘陕公’红色故事融入概论课实践教学研究”（XJYB202413）。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对学生心理素质的影响

章舒腾

摘要：本文围绕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对学生心理素质的影响展开探讨，尤其关注大中教育阶段高职中职之间的对接。借助剖析各阶段思政教育的特性，表明其在提升学生心理韧性、强化情绪管理能力、构建积极价值观等方面的意义。基于改进课程体系、强化师资建设、创新教育方法、营造宜人环境四个策略维度，探寻推动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进而提升学生心理素质的有效途径，为培育拥有良好心理素质的新时代人才提供理论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心理素质；高职中职对接；教育策略

在教育改革不断推进的当下，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成为培育全面发展的学生的关键工作。学生心理素质状态深刻影响到他们的学业成就、身心健康及未来职业发展。大中小学各阶段学生身心发展的特性各异，思政教育内容及方法也需按照情况调整。高职中职作为教育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对学生心理素质塑造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思政教育面临学段衔接不佳、教育方式无针对性等问题，阻滞了对学生心理素质的正向指引。细致探究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对学生心理素质的影响程度，进而提出优化策略，对增进思政教育成效、促进学生心理素质的健康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一、大中小学思政教育阶段特点与高职中职对接

（一）小学阶段思政教育特点及对心理素质的启蒙

小学思政教育内容与日常情境紧密契合，采用简易的方法传授基础生活规则，帮助学生初步构建秩序感及规则意识。教学方案具有趣味及直观的属性，借助活泼有趣的教具以及有序轻松的课堂互动，把抽象道德概念转化成容易学会的知识，助力学生领会。学校借助开办各类集体活动，带动学生主动投身其中，促使他们树立集体荣誉感及增强自我约束能力。在课堂互动阶段中，教师引领学生讲出心底真实的想法，训练他们表达及参加社交活动的本领，提振自信心，使学生勇于在集体环境里展现自我风采[1]。

（二）中职阶段思政教育特点及对心理素质发展的促进

中职思政教育内容系统且深度明显，涉及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法律板块凭借讲解法规相关常识，教导学生辨清行为边界，扩大法治认知范畴，一旦有问题出现，可借助法律守护权益，优化心理层面的安全感水平。政治范畴内开展针对国家制度等方面的授课，扩大学生的视野，培养政治上的认同及国家意识，让他们思考社会现象时具备理性深度，助力逻辑及批判性思维的拓展。中职思政教育采用多种不同的教学形式，涉及诸如社会实践、主题研讨、小组探讨等。

（三）高职中职思政教育特点

职业导向成为高职中职思政教育的关键核心，聚焦培育学生职业素养及职业道德。就课程设置而言，顺应需求开办职业礼仪、职场沟通等专业课程，从言行态势、交流技能等方面规范职业表现，催生敬业精神、团队合作能力及职业忠诚感。教学进程深度贴合企业需求与行业动态，采用举办企业专家讲座、推进实习实训等途径，指导学生提早融入职场环境，掌握职场的规则及文化内涵，提高心理抗压力与问题处置本领，达成从校园到职场平稳的心理状态过渡。在与中职衔接的这一时间段内，搭建中职思政基础壁垒，促进职业启蒙相关事宜开展，带领学生凭借既有的知识，深入思考职业和社会的关联，把握职业发展走向。

二、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对学生心理素质的积极影响

（一）增强心理韧性

采用直白易懂的手段引导学生直面日常遭遇的小挫折，引导他们初步知晓挫折属于生活的一部分，造就乐观面对的心境。思政教育进一步把系统处理挫折的方法进行传授，从合理查找挫折源头到拟定应对办法，提升学生坦然面对困难的能力。思政教育促使学生在挫折中深入反思自我，把挫折认定为成长与自我

能力增进的契机，培育其勇往直前的意志素养。这种综合式教育模式，让学生在不同成长阶段持续不断接受挫折教育，持续增进心理抗压本领[2]。他们刚开始仅对挫折存在浅显的认知，随后慢慢了解应对途径，直至可以把挫折变为前行的动力源头，学生心理韧性实现了综合性的强化。

（二）提升情绪管理能力

依靠趣味性的课堂活动与互动，带领学生辨认常见情绪，帮助他们对自身情绪有初步的认识，为后续情绪管理学习做好铺垫。中职思政教育以这个基础为依托，深度剖析情绪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教授给学生诸如深呼吸、情绪转移之类的基本情绪调节法，让学生开始主动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高职思政教育着重培养学生在复杂情境中的情绪管理能力，采用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形式，引导学生洞悉情绪背后的深层心理需求，学会凭借理性思维控制情绪，从而实现情绪的合理表达及有效管控。依托一体化教育，学生自最初的情绪觉察，逐步过渡到能熟练运用多种方法管理情绪，情绪稳定性显著提升。

（三）塑造积极价值观

以培养学生基础道德品性为切入点，通过简单故事与日常行为引导，引导学生在潜移默化当中接受正面价值观的教育，初步形成对是非善恶的价值评判标准。中职思政教育进一步拓展深化，系统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把社会热点事件与历史文化知识相结合，帮学生理解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关键意义，引导学生把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相结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3]。高职思政教育聚焦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担当意识，引导学生从更高角度思考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以社会实践、学术研究等活动为途径，引导学生把积极价值观内化成为自身行为准则，积极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三、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促进学生心理素质提升的策略

（一）完善课程体系衔接

搭建一体化思政课程标准，需精准设置各学段目标。小学阶段的任务为开启道德认知、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借此为学生心理素质筑牢基础，此阶段借助日常行为开展引导，如教导学生不抄袭作业、不说谎，助力他们初步形成基本道德理念。中职阶段以小学基础为依托，加强价值观塑造并提升学生思维本领。比如把诚信教育从基础行为拓展到社会交往时需要遵循的诚信原则，让学生在遇到复杂人际关系及社会现象时，可以借助正确价值观实施分析判断，培养其独立思考与辩证剖析的能力。高职阶段强化对理论深度的挖掘，全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批判性思维特质，在伦理范畴探究诚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价值，引导学生从宏观视角去审视问题，养成对社会现象的理性批判习惯。借助连贯、有梯度的课程体系，学生逐步增强对思政知识的领悟力，心理素质也是从基础品德养成，过渡至具备成熟的职业心理及社会担当精神。

某中职院校在课程体系衔接事宜上成效显著。在中职进行的“职业道德与法治”课程中，专门开辟“诚信小卫士”章节，通过播放趣味动画短片和组织课堂小活动，诸如“诚信知识问答串联”，引导学生初步理解诚信的内涵。身处中职高年级阶段，实施“商业活动中诚信应用”主题的项目式学习，学生以小组形式对本地商业案例展开调研，分析诚信对企业发展起到的作用效果，促进对诚信的深度把握。该校会计专业开设了“会计职业道德”相关课程，特别强调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及保密性，采用模拟企业财务工作场景，引领学生在实操中奉行诚信原则。旅游服务专业在其“导游业务”课程里面，纳入针对游客的诚信服务内容，要求学生规划诚信旅游路线并进行讲解演示。借助该系统且循序渐进的课程规划模式，该校学生在推进思政学习之际，心理稳定性不断增强，为未来进入职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4]。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应着力提高大中小学思政教师的心理素质和教育本领，按时期组织专业培训，邀请心理学专家来传授基础心理学理论、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及心理辅导实用技巧，使教师能精准把握思政教学要点，又能敏锐捕捉学生心理动态，迅速给予恰当疏导。搭建跨学段教师交流合作平台不可或缺，各学段教师定时分享典型案例、交流教学经验，一起探究思政教育与心理素质培养的融合路径，尤其聚焦高职与中职的对接，中职教师和高职教师开展沟通交流，可明晰怎样为学生职业心理开展前期铺垫。

某高职十分看重师资队伍的建设工作。每学期学校会邀约知名心理学教授为思政教师开展成体系的培训，内容包括青少年心理发展阶段的特质、常见心理问题识别及应对手段等。思政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愈发得心应手。在“职业规划与心理健康”课程的教学阶段，教师能敏锐捕捉学生在规划职业过程中的迷茫与焦虑情绪。一位讲授电商专业思政课程的教师，在探知部分学生对电商行业竞争压力存有恐惧心理后，专门开展小组座谈会，分享电商领域成功者的奋斗事迹，还借助所学的心理辅导方面的技巧，引导学生合理看待压力现象，制定完善的职业发展规划。该校还设立了校内思政教师交流论坛，按计划开展教学研讨活动，分享教学时怎样将思政教育与心理素质培养有机结合的经验。依靠这些行动，教师团队的整体教学水平明显上升，为提升学生心理素质提供了有力支撑[5]。

（三）创新教育方法

采用多样化教学方式，案例教学采用契合学生生活及社会热点的案例，引领学生思索，增强逻辑思维及问题处置能力。情境教学打造逼真场面，让学生沉

浸式领悟思政内涵，促进情感协同共振。小组讨论促进学生互换意见，培育批判性思维及团队合作素养。贴合高职中职属性，提升实践教学与案例教学的水平，把企业真实项目用作承载载体物，指引学生在实际操作中了解思政知识在职业上的运用，提升职业心理素养。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打造线上线下互动式教学模式，筹备思政教育 App、在线课程等素材，契合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为高职与中职学生职前、职中学习营造便利环境。

某高职院校在思政教学中积极实施创新。“职业沟通技巧”课程采用案例教学手段，引入企业商务谈判失败的案例，引导学生分组分析困境，学生在讨论中掌握沟通方法与职业规范。学校推进实践教学实施，旅游专业学生迈入景区导游服务实践行列，在服务游客阶段改善职业素养及沟通能力。学校借助线上学习平台开展思政微课程，课程凭借专业特色进行设计，比如电子商务专业微课程嵌入电商行业职业道德相关实例。开展课程实施互动环节布置，学生可借助线上通道交流学习感悟。采用这些创新途径，学生学习思政的积极性大幅提升，职业心理素质实现显著提升，毕业后可迅速进入职场状态，证实创新教育方法在高职中职思政教育以及学生心理素质培养上成效显著。

（四）营造良好教育环境

学校应构建积极蓬勃的校园文化环境，举行诸如思政文化节、职业素养周等活动，把思政教育与心理素质培养融入此项活动。在家庭中家长当以身作则，构建和谐的家庭空间，与学校建立深度交流，携手帮助学生成长。社会应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以媒体为渠道宣扬正能量事迹、开展公益活动，为学生树立榜样楷模。就高职中职对接工作而言，尤其要带动企业深度投入，创建浓厚的职业文化空间，邀请企业专家到学校做讲座及实践指导，让学生领悟企业文化，塑造正确的职业理念。

某高职院校积极营造良好的教育空间，学校按年度举办“职业思政文化节”，活动包含职业技能展示、思政主题演讲、企业文化体验等多个板块。在学生进行技能展示的阶段，学生展现专业技能时，剖析其中蕴含的职业道德与工匠素养；在开展演讲竞赛活动时，学生聚焦思政主题进行拓展，结合自我职业理想互相交流体会。学校还可以和多家知名企业达成合作共识，邀请企业资深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按期到校举办讲座，分享行业发展历史与职场经验。从事机械制造的专家在讲座中，既讲授了领先的制造技巧，还强调安全生产、团队协作等职业素养的重要意义绝不能被忽视。学校搭建起家长学校沟通平台，按期落实家长培训事宜，劝导家长在家着重培养孩子的职业意识与良好品行，借助三方齐心协力，该校学生心理素质实现综合提升，对未来职业发展信心十足，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学习热情与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为未来顺利进入职场夯实了牢固的心理根基。

四、总结

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对学生心理素质培养的作用不容小觑，借助完善课程体系的衔接，使思政教育内容逐层递进、有机整合；切实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把思政教育和心理素质培养相贯通的能力；采用创新教育方法，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与参与的积极性；营造良好教育环境，凝聚各方育人的力量，能从各方面全方位促进学生心理素质提升。要不断深化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的研究与实践探索，持续革新教育策略，为学生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筑牢坚实根基，协助其成长为适应社会发展、拥有良好心理素质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 蒲炜 . 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认同”[J]. 新丝路 : 中旬 , 2023(04): 143−145.

[2] 周丽臻 , 徐春梅 , 黄晓昆 . 知“情”理“绪”, 开启积极人生——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案例研究 [J]. 科研成果与传播 , 2024(01): 28−32.

[3] 秦彦梅 .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效融合思路 [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 2023(13): 13−14.

[4] 陈雁鹏 . 善用“大思政课”推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策略 [J]. 中国防痨杂志 , 2024, 46(10): 1294−1295.

[5] 千瑜璐 . 课程思政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改革研究 [J].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4, 20(01): 43−47.

（作者单位：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



基于思政课主渠道提升高职学生法治素养的对策浅析

李佳青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也是普及法治教育的主阵地。思政教师需切实发挥思政课法治教育主渠道作用，进一步引导学生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认同与道路自信。本文论述提升高职学生法治素养的必要性，分析高职学生法治素养教育现状，提出提升高职学生法治素养的有效对策，以取得高职学生法治教育的更大实效。

关键词：思政课；法治素养；高职学生

法治教育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思政课这一主渠道有效推进法治素养教育，不仅是新时代建设法治中国的迫切需求，也是深入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必要举措。高职院校思政教师充分利用思政课这个主渠道，有助于提升高职学生法治素养，培养其成为具有法治观念的公民。从而推动法治中国建设，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提升高职学生法治素养的必要性

（一）提升高职学生法治素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的要求，将其作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法治建设作为独立章节写入报告中，进行专门论述和部署，并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到 2035 年我国要“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2021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在法治实践中持续提升公民法治素养”。高职院校学生作为社会公民的一部分，是未来国家建设需要的技能型人才。他们接受现代高等教育，参与法治建设的意识、开展法治实践的能力较强，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未来力量，提升其法治素养意义十分重大。只有持续提升高职院校学生法治素养，使其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知识、健全的法治意识、严谨的法治思维以及维护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自觉，法治力量才能深入其心，从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实现强国目标。

（二）提升高职学生法治素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核心使命，其深远意义在于培育具备德智体美劳全面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关于“立德树人”中的“德”的含义，学术界有广泛的讨论，通常将其定义为道德品质，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准则。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2]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3] 由此可见，立德树人的“德”，应该是“大德、公德、私德”的总称。德为法之魂、法为德之器。立德树人的“德”不仅包括道德品质的培养，还应包括法治素养的提升[4]。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充分发挥德治教育与法治教育各自的教育功能与价值，促进二者的有机融合、统一协调，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学生的道德意识和法治精神，明确自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三）提升高职学生法治素养是学生个人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

法治素养，不仅是学生在校期间日常学习、生活和社交不可或缺的核心素养，更是其未来步入社会必须具备的核心能力和基础技能。伴随信息技术的快速

发展，面对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学生如何保持理智清醒的判断力和分析力尤为重要。法律法规通过明确哪些行为是必需的或禁止的，设定了判断是非、善恶及对错的标准与界限，为个人的行为提供了标准化的范式。学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做到知法、懂法、守法，有助于其做好明辨是非这门功课，区分是非对错、善恶美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的立场和矢志不渝的信念。与此同时，高职学生学习过程有其特殊性，顶岗实习是教学中的一部分，部分学校有校企合作，都需要学生进入企业，在实际工作中学习专业技能，以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工作岗位的需求。学生在此过程中也需要掌握与学习、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来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因此，对高职学生进行法治素养教育，有助于学生提升综合素养，以适应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

二、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现状

（一）从教学主体看，思政教师法学专业素养有待提高

第一，思政教师法学专业素养不足。从事思政教学的教师大多数是哲学、教育学、政治学专业出身，具有法学专业学习和研究经历的较少。由于专业限制，对于思政课法律章节的讲解往往是粗浅讲授，弱化了法律教育的专业性。第二，思政教师缺乏系统学习。法学本身是一门专业性较强的学科，倘若教师自身没有一定的法学专业基础，难以将法律知识进行系统讲解，将法律精神传递给学生。但就目前来看，思政教师大多是非法学专业出身，能提供给高职院校思政教师系统的法律知识培训渠道较少，再加上繁重的教学、科研以及日常教学管理任务，导致教师很难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致使教师在授课中难以将教材内容有效转化为自己的教学体系，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二）从教学对象看，学生法治素养有待提高

第一，法律知识碎片化。对于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没有经过系统专业的法学教学培养，法律知识仅仅停留在最浅显的层面，没有系统性、整体性的认识。在日常学习中，学生对于宪法、民法典等在课程中提到频率较高的部门法比较了解，但对于诸如劳动法、知识产权法等这些专业性较强的部门法了解较少，而这些法律恰恰与其现阶段学习和今后就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也导致了学生会出现违法而不自知等诸多问题。

第二，运用法律的能力有待提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当代大学生从小就在具有法治精神的社会氛围下成长，他们普遍具有尊法守法的意识，对法律的权威性普遍认同，具有平等、公正、正义观，但运用法律的能力有待提高，主要表现在：在日常生活中，学生的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但遇到侵权行为时，如何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益，学生往往无所适从[5]。

第三，主观重视程度不够。虽然在思政课程中开设了“思想道德与法治”等相关课程，但学生相较于专业课，仍把法律知识的学习当成“副课”，主观上不够重视。同时高职院校的学生对理论课学习兴趣较弱，也导致学习效果相较于专业课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从教学实践看，法律素养培育模式有待完善

第一，教学内容有待增加。目前高职院校主要的思政课程中关于法治教育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思想道德与法治”第六章“学习法治思想 提升法治素养”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第九章“全面依法治国”这两大部分。以笔者所在学校的教学计划为例，“思想道德与法治”第六章的课时安排是 8 课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第九章的课时安排是 4 课时。课时就课程整体来说，安排合理，但就实现提升法治素养目标来看，课时显得很有限。第二，教学方式有待创新。就目前思政课法治教育部分的情况来看，多以理论教学为主，在理论教学中教师通常融入法治案例和视频的方式来讲授。但在授课中，多数教师没有将法律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创设生活化的法律情境，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学习效果难以达到预期。导致学生在面对侵权行为以及“校园贷”“电信诈骗”等不良引导时，不知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也难以真正将法治信仰融入内心。

三、提升高职学生法治素养的对策

（一）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思政课堂，强化法治教育思想引领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思政课堂要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积极遵法、认真学法、自觉守法、主动用法。第一，利用集体备课，加强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读，掌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核心要义以及科学方法。同时深耕教材，找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教材的契合点，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第二，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社会热点对习近平法治思想进行讲解。可以通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案例，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制定并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为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了有效保障。再如，讲解“法治社会”时，可以引用“枫桥经验”等案例，便于学生理解吸收，从而进一步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

（二）三课堂联动，提升法治课堂教学效果

打造答疑解惑的理论课堂，在“讲”与“学”的互动中增加学生法律知识。第一，结合高职院校学生

特点，深入分析思政课程中法律知识点、社会热点案件与学生实际生活中易发生案件的关联点，运用案例分析、情景分析、分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打造解疑释惑的理论课堂。例如，在讲授“思想道德与法治”第六章第四节“提高用法能力”这个知识点时可以“采用引用实际案例 + 实践操作”的方法进行分析。为学生播放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校园贷”案例视频，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禁止高利率贷款”的内容，帮助学生预防陷入“裸贷、套路贷”等金融信贷多重陷阱。掌握相关知识后，教师为学生提供一个借款的场景，让学生自拟一份借款合同，教师再对借款合同应当包含的主要条款进行分析讲解，从而提高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互动教学，学生不再是被动地听老师在课程中讲解案例，而是通过自主学习，加深了对法律的认知和理解，增强了学生遵法、守法的意识，提升了自我保护的能力。第二，通过开设选修课、专题讲座等方式拓宽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途径。思政课更多地注重增强学生法治意识、培养学生法治思维，就法律知识的内容涉及较少，而法律知识的碎片化也导致学生对诸多法律问题产生误解，无法真正形成对法律的信仰。通过邀请校内法学专业教师开设选修课，分专题讲授部门法的方式可以弥补学生法律知识学习缺乏系统性的不足。同时邀请专业法官、律师等专业法律人员走进校园，讲解分析学生日常易发生的具体案件，可以从更专业的角度为学生解读法律的精神内核。

打造知行合一的实践课堂，在“知”与“行”的结合中增强学生法律意识。培育学生良好法治素养，首先要打牢法学基础知识，同时要强化法学实践教学。提升学生法治素养不仅要守住思政课堂教学主渠道，还要运用好社会大课堂。探索建设“行走的思政课”“馆课融合”等特色思政课堂，让学生走出校园，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组建宣讲团，教师与学生共同走进其他学校、企业、社区等单位开展普法活动，让学生成为法律的宣传者。举办“让青春与法治同行”等不同形式的主题实践课，学生通过音诗画、诗朗诵以及歌伴舞等形式，自导自演法治实践课，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确立学生内心对法律的信仰。利用新时代实践活动契机，组织学生团队开展“法律就在我身边”等形式的新时代法治学习宣传活动。通过实践教学，学生更能深刻地体会到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要努力提升法律素养，理解法律、尊重法律，让法治成为内心信仰。

打造守正创新的网络课堂，在“学”与“信”的融合中确立学生法律信仰。结合当前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将法治教育拓展至线上。运用中国法院博物馆开设的网络展馆，在课程中为学生进行情景式教学，使学生身临其境了解我国法治进程和发展，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治意识。依托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定期发布“图说新时代法治建设成就”“不断推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行稳致远”“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等学习内容，使学生了解我国法治建设成就、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等知识。组织学生开展“青听心声 诵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良法善治互动互助”系列诵读活动，使学生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建设法治中国目标有更深刻的认识。通过微信公众号展示学生“思想道德与法治”第六章的实践学习成果，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主题学习、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使法治教育润物无声，深层次地服务学生成长成才需求。

（三）提升教师法学专业素养，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第一，拓宽培训渠道。针对思政教师法学基础知识欠缺的问题，进一步拓宽思政教师的培训渠道，搭建“线上 + 线下”法学专业培训平台，对思政课教师进行专业的法律知识培训，解决思政教师的专业难题。第二，拓宽实践渠道。与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法律机构加强合作，开辟思政教师到专业法律机构学习、调研、实践的渠道，将专业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引进课堂。第三，做好法治教育的基础保障。构建和完善有利于思政课教师法学专业素养发展的相关机制，提供培训和课题等经费支持，为思政课教师的法学专业素养提升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参考文献

[1] 求是网 .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 (2022−10−25)[2025−07−15].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2−10/25/c_1129079926.htm.

[2] 习近平 .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18.

[3] 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 励志勤学刻苦磨炼促进青年成长进步 [N]. 中国青年报 , 2017−05−04(01).

[4] 王树荫 . 厘清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德”的含义 [N]. 光明日报 , 2019−12−04(16).

[5] 袁静，刘珊珊 . 法治素养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路径研究 [J]. 大学，2020(09):138−13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度天津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大思政’理念下大中小法治教育一体化教学路径研究”（自筹）（HEE220188）。

（作者单位：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互联网 +”视域下高职语文应用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研究

杜晓飞

摘要：“互联网 +”的发展为我国教育改革提供了新契机、指明了新方向。信息化的教学工具在教学模式创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线上与线下的混合教学并非简单整合线上与线下活动，而是通过线上与线下的深度融合，实现教学流程的重构与优化，为学生连贯化学习、学科素养培育提供支撑。基于此，本研究立足 SPOC“线上 + 线下”融合的优势，从前端设计、教学资源开发、教学活动设计及教学评价体系四个方面，构建高职语文混合式教学模式，并对其应用效果进行反思。研究旨在为“互联网 +”背景下的高职语文教师提供可借鉴的教学范式，助力高校语文教学工作的创新发展与学生语文学科素养的提升。

关键词：“互联网 +”；SPOC；“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高职语文

“互联网 + 教育”是一次全方位的变革，它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也推动了智能教育的发展。2012 年，《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提出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提高教学质量，提高人才素质，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与共享。2018 年，《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明确指出，要加强对“互联网 + 教育”的管理，提升“互联网 + 教育”的服务方式和能力，推进“教育大资源共享”工程，对在线教学空间的建设和应用进行标准化，确保所有师生都拥有学习空间。在推进“互联网 + 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对线上教学的经验进行总结，对应用信息技术的教学理念进行更新，转变教学方式，应对新时代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加速建设一个开放、灵活、优质的教育系统，从而实现高质量的教育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在高校教育中的应用以培训机构、校园线上课程的辅助性使用为主，但是，随着线上课程的普及，其持续性发展趋势日益显著。所以，将“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应用于高职语文教育中可以有效地提高在线教育的效果，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所以，将“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与基于信息技术的 SPOC 相结合可以使学习的时间得到充分的整合，并保证了学生在学校的学习与毕业后的社交学习的连贯性与完整性 [1]。SPOC 的兴起为传统的教学提供了新的契机，而如何将语文教学与混合式教学结合起来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一、“互联网 +”“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高职语文教学中的适用性

SPOC 是近年来我国在借鉴国外教育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教学模式，相对于传统的网上教学，SPOC 可以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例如 MOOC 的在线人数达到了数百人，甚至数千人，而此时教师所要面对的人数实在太多，因此很难精确地掌握教学的质量，无法做到因材施教。而教师要想满足更多人的学习需求就要降低教学内容的难度，这样的教学方式让一些学生无法融入学习过程中，也就丧失了与教师沟通的机会。然而，由于 SPOC 课程中参与学习的学生人数有限，教师可以在上课时与线上各学生互动，并根据每位学生的总体水平设定教学难度。因此，SPOC 课程教学模式可以将学生分成不同的组别，并针对各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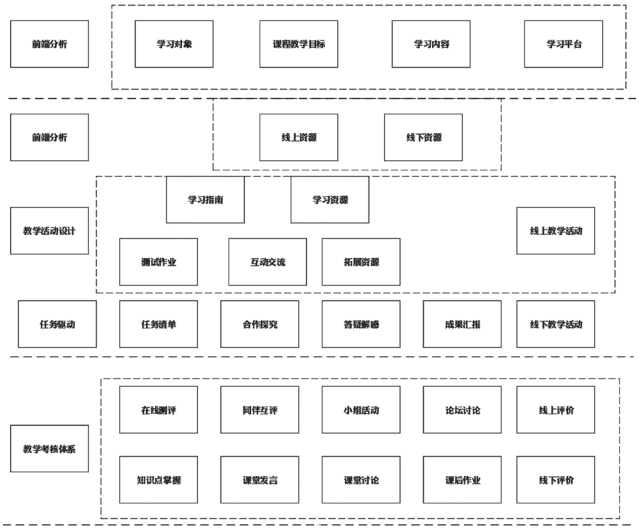


图 1 SPOC“线上 + 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学习表现、学习程度等情况分别对其进行分类。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可以确保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升，而且可以实现因材施教（见图 1）。除此之外，SPOC 课程在教学应用中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教师可结合综合课程要为学生制定多样化的课程模块，学生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相应的课程，这一优势是一些智慧课程难以达到的。学生在完成一门课程后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复习和二次巩固，当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时就可以将自己在学习中碰到的问题进行归纳，在 SPOC 课程中与老师进行沟通。由于高职学校的语文教学需要更多的基础知识，所以 SPOC 课程可以说是一种支撑，是一种把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内容内化为对知识点的掌握的方式[2]。总之，SPOC 课程的开展充分发挥了在线智能教学的优势，将“线上”与“线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高职学校语文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互联网 +”视域下高职语文应用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

（一）混合式教学前端设计

在混合式教学前端设计中，我们将从学习的目标、课程目标、学习内容、学习平台等几个方面来进行研究。首先，SPOC 课程能够综合教师的教学内容对教学目标进行重新优化，实际使用过程中能够对学习者的基本学习情况、学习特点、学习方式等进行细化分析。其次，SPOC 课程可以将教材中的教学目标、内容、方法等进行综合设计，呈现出不同教育模块的教学目标，并直观地呈现在学习者面前，满足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以及教学者的教学目标。学习者和教学者能够熟悉并应用这一平台开展对应的学习作业，满足教师的实际教学目标。

（二）混合式语文教学资源设计

1. 课程资源体系的构建原则

职业学校的语文课程作为一门公共基础学科，其核心在于培育学生的语言能力，展现了该课程的基础性、实用性、文化内涵以及职业导向等多重特性。因此，凸显生活性，并将其与专业课程相结合实现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层次性的要求，促进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3]。此外，基于 SPOC 混合教学的实践需求以及工作岗位持续发展的需求，也要求课程资源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改进，使其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优化状态。在教学过程中要选择有利于学习者进行碎片化、自主学习的知识，并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后台数据对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以及工作需要的变化进行动态的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可扩展的学习材料将会视教学内容而定，是否以线上或离线方式提供给学生。通过持续的开设、实践和运作使语文课程资源逐渐走向完善。

2. 课程资源的设计与开发

“互联网 +”视域下高职语文应用混合式教学模式需结合高职院校不同专业的特点，重新构建高职院校的课程资源。围绕“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方式，把语文课程的内容和职业要求紧密地结合起来，准确地确定课程的教学目标。以 SPOC 为基础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其课程资源丰富、形式多样，基于课程特征、学习者的学习特征和现实工作岗位的需求，设计在线课程资源。它们被制成了细小的微粒上传到对应的在线教学平台，使学生可以利用碎片时间来学习。针对高职学院的具体特色及学生提升语文综合素养的需求，我们在开发线下课程资源时，采用了任务驱动法进行优化布局与规划。我们精心设计了与在线课程资源相辅相成的研讨互动环节和任务列表，即教案，以确保两者的有效衔接。同时，课程标准的制定、设计以及资源的拓展与丰富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综上所述，这一系列立体且多元化的课程资源设计，极大地增强了教学流程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实际需求，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三）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践

第一，基于 SPOC 建立“线上 + 线下”的教育模式。每一个学习单元的设计都是以混合的方式进行的。它融合了网上教育与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建立了“线上 + 线下”的教学模式。在设计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原则，把概念性的知识提前，通过课前的预习录像，使学生能够更快地掌握基本的知识，或者是对本节课的内容感兴趣。同时，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状况对视频进行重复回放。在课堂上，还可以利用混合式学习活动让学生将自己的学习结果表达出来，可以进行实践性的教学让学生们对问题进行探讨，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在课堂上完成任务，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思辨能力。

第二，积极采用多样化教学方式。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学中采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教育质量。例如，SPOC 的线上系统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展和学习成效等各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评估。通过登录教学管理平台，老师可以对学生的学习频率、时间跨度、学习成效等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从而采用网上教学和教师的人为干预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学生可以通过查阅资料、分析文献、撰写研究报告等方法对研究项目进行深度挖掘，既能提高学生的文学素质，又能加强团队合作，培养探究和批判思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起着引导作用，通过提问、指导、讨论等方法让学生产生探索的积极性，完善对语文知识体系的构建，从而提升学生独立学习、终身学习的能力[4]。

（四）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

高职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都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使用传统的评估方式，根据一个统一的标准对学生进行分级，必然会导致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下降，这与职业教育的宗旨背道而驰。“互联网 +”视域下高职语文 SPOC 混合式教学模式强调价值评估，关注学生的自我参照水平，而不关注学生之间的优劣[5]。为此，本研究编制了一份以“命题说话”为基础的高职学校语文教学中交流表述内容增值评估表，设计命题包括：“与上一次的口语练习比较，这一次的内容有没有加入我自己的看法；和上一次的口语练习比较，这次的表述是否更流畅，逻辑更合理。”教师可以根据课堂标准（见表 1）对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是否提高科学素养、提高创新能力及思辨能力进行综合评判。老师可以将学生的期末成绩的 5% 到 10% 的加权作为增值评价的鼓励性加分，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注意自身的进展，找到学习中的优点和缺点，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另外，也可以将课堂教学、作业、测试、实习等多种方法结合起来，注意过程性与终结性评估的有机结合，从而获得更加全面和精确的评估信息。

表 1 语文课程评价标准

考核标准	备课		课前	课中			课后
	课程计划	教学设计	课前活动	参与度	学生收获率评价	课程目标达成度	课后活动
采集	有 / 无	有 / 无	有 / 无	（%）	（%）	（%）	有 / 无
权重（分）	2	2	10	20	5	5	10

三、教学效果及反思

大学语文是高等职业学校的一门传统学科，近几年来，它的教学现状不容乐观，而在“互联网 +”视域的时代背景下，通过 SPOC“线上 + 线下”混合教学方式它的教学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师生间的互动性。采用融合线上与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法，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在大学语文课程中的学习动力，精准地满足了他们个性化学习的需求。这种方法不仅帮助学生识别并强化自身的知识短板，还通过结合线上互动与线下面对面交流，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壁垒。师生间既能在线上平台即时沟通，又能在实体课堂中深入交流，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与主动性，增强了教学互动性。第二，该教学模式还促进了教学过程的优化与评价体系的完善。通过 SPOC 平台实施的“线上 + 线下”混合教学策略，实现了从“教师主导”到“学生中心”的教学理念转变。这一过程涉及对教学资源的重新整合与教学流程的创新，深化了教师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并成功推动了教学流程的革新。这种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包括学生自主评价、生生互评和教师评价，它能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更好的记录，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更全面的评估，同时，老师还能对反馈信息进行监测，对教学过程进行调整，从而使教学效率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化。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 +”视域下，SPOC 作为信息技术在高职学校语文教学中的一种应用具有重要的潜力和影响力。基于信息技术的 SPOC“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可较好地改善传统教学模式中存在的不足，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对于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也有较好的作用，可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秦丽 . SPOC 模式下大学语文线上线下互动机制研究 [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 2023, 6(04): 153-155.

[2] 顾思晨 . “互联网 +”视域下高职院校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究 [J]. 现代商贸工业 , 2023, 44(05): 200-202.

[3] 蔡军强 . 高职大学语文课程“互联网 +”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究 [J].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2, 21(01): 81-95.

[4] 董春华 . 新时代线上与线下融合式教学实践与探索——以《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为例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 2024, 23(12): 173-175.

[5] 李静梅 , 秦云芳 . 基于质量标准的高职语文课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初探 [J]. 教育观察 , 2020, 9(14): 37-39.

[6] 郭珊珊 , 巴特 , 谢丽古力·哈斯木 . 高校预科语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效果浅析 [J]. 科教文汇 , 2022(15): 51-54.

（作者单位：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五育融合”视域下“1+N”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构建研究

肖聪阁

摘要：当前，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快速发展背景下学生心理健康的需求。“五育融合”作为新时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方向，蕴含丰富的心理育人价值，具备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有效路径。构建“五育融合”视域下的“1+N”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应遵循转变观念、营造环境、全员参与、自然融入的原则，在保持现有心理健康教育方式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德智体美劳“五育”及第二课堂等各类活动中，以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

关键词：五育融合；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构建

一、问题提出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学生成长环境不断变化，信息资源日益多元化，受学业、生活、就业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愈发凸显。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人才培育具有深远意义。当前仅仅依赖心理健康教育部门和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效力有限，难以满足现实需求。这就导致了学生心理健康需要与当前心理健康教育现状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育中蕴含丰富的育人资源，也是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载体。另一方面，从学生需求来看，学生的心理问题多表现为适应问题、学业问题、自我认识、情感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等。影响这些问题的因素多样，分布于德、智、体、美、劳培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必须从多维度予以预防和解决。然而，受传统的教育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教育者对此尚未形成深刻认识。

党中央始终关注学生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问题。国家多部门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积极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与时俱进、统筹决策。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将心理健康工作置于更加突出位置，致力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明确提出“五育并举促进心理健康”为主要任务，要以德育心、以智慧心、以体强心、以美润心、以劳健心。

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育都是按照教育规律，共同作用于人的心理层面，促进由道德、认知、情感、意志等组成的内在系统的发展、维持和修复[1]。同时，影响学生心理问题的因素多样，贯穿德、智、体、美、劳培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可以说，心理健康教育与德智体美劳“五育”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育是开展学生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主渠道。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不能脱离这些教育主渠道。由此可见，“五育”承载着心理健康教育的天然优势。

当前，“五育融合”的育人方式已经成为新时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要求，多学科都在进行“五育融合”教育教学改革。例如，有学者整体设计、系统规划，构建面向中小学的“五育并举”学校课程体系[2–3]。有研究者探索“五育融合”视域下的劳动教育，认为未来的劳动教育应该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育美[4]。李响等[5]提出以体养德、以体启智、以体塑美、以体促劳，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大学生体育核心素养，推动体育综合育人高质量发展。申亮等[6]探索建设“五育融合”的中华特色体育课程。医学院校深入挖掘医学教育“五育”的内涵，强调培养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强健的身心、医学艺术审美力、实践能力与医者责任担当[7]。

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的教育格局为心理育人工作提供了新思路，心理健康教育的“五育融合”亟待探索与实践。本文尝试设计在德、智、体、美、劳以及培训、文体活动、社会实践等教学及活动过程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构建“1+N”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1”是指当下的心理健康教育，“N”代表在德、智、体、美、劳以及培训、文体活动、社会实践、家校合作等教育教学活动和环节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

二、“五育融合”视域下“1+N”心理健康教育的原则

挖掘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育及其他教育教学过程中蕴含的丰富的育人价值，积极探索在“五育融合”视域下构建“1+N”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创新实践，也是构建新时代大格局教育的需要，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转变观念

教育是面向人的教育，旨在促进人的身心健康以及全面发展。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关乎育人成效，心理健康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基石，因此要营造全体教育工作者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良好氛围。

人具有社会属性，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学生在由各类教育者构成的环境中成长，各种因素都会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因此，所有教育工作者、所有课程都应承担起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职责。

要将显性心理健康教育与隐性心理健康教育结合。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和国家要求开设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及各类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预防心理问题、促进学生人格健康成长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如同父母或教师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对孩子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育会取得良好效果一样，心理健康教育也需要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之外，开展隐性、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育。

（二）营造环境

在“五育”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体制机制、资源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才能确保其长期有效开展。

相关领导应高度重视，出台相关政策制度。政策制度具有导向作用，及时、科学制定在“五育”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政策，将对此项工作的开展起到引导、支持和推动作用。

开展宣传活动。通过网络媒体和各类会议积极宣传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育人中的重要意义，突出“五育”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推广优秀案例和典型做法。

（三）全员参与

加强全员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认识。心理健康教育不仅仅是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职责，只有全体教师都重视并参与心理健康教育，才能更有效地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在“五育”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是一种创新的教育尝试，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意识到此项工作对于育人的重要意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心理健康教育是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都应认识到自己在这项工作中的角色和重要职责。

提升全员参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积极性。在“五育”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创新性工作，既没有现成的案例可供学习，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这完全依赖于教师的自觉意识以及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育人的责任感、使命感。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自己在学生心理健康和人格塑造中的角色定位，主动学习心理健康知识，创造性地在工作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

（四）自然融入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通过资料学习、与学生沟通交流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中的困惑等，以便有针对性地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

梳理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入点。对各门课程的知识点和各个教学教育管理环节进行梳理，科学精巧地设计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式。

搜集心理健康素材。在教育中自然融入心理健康教育，一方面在于创新性的教学设计，另一方面在于心理健康教育素材的贴切性。恰当的素材和精妙的设计，就可以避免刻意的、说教式的教育，实现与教育过程的有机融合。

积极创新，充分挖掘在课堂教学、课外活动、教学管理、社会实践、家校合作等环节中蕴含的心理健康教育契机和隐性心理健康教育资源，通过点滴渗透、润物无声的方式达成育人效果。

三、“五育融合”视域下“1+N”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构建

本研究致力于构建“五育融合”视域下心理健康教育的“1+N”模式。首要任务是处理好“1”和“N”的关系。

当下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属于显性教育。在当前阶段，要始终坚持显性心理健康教育的主体地位，从上至下重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实施和发展，重视日常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积极且创造性地开展“525”等心理健康相关宣传活动，充分发挥显性心理健康教育主渠道作用。

在教育教学的各个层面和环节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是隐性教育。挖掘其他课程内容、教学方式、课外活动以及学生管理等教育方面和环节中蕴含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共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及培训、课外活动、社会实践、家校沟通等教学活动和环节，从时间和空间上对学生形成长久浸润、立体包裹，若能将心理健康教育自然且有机地融入其中，将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和“N”的关系本质上就是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关系，只有将显性心理健康教育和隐性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统一，才能解决当前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困境，满足学生需求。

（一）坚持传统心理健康教育方式的主体地位

30 多年来，国家颁布了多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专门性文件和涉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政策性文件，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以制度保障该项工作的全面落实，彰显出国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各高校均开设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心理咨询中心为学生提供日常心理咨询服务，开展各类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和实践活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已经成为高校教学和学生管理的日常化工作。多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在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健全学生人格、普及心理健康知识、预防心理问题产生等方面成效显著，同时也在社会上营造了关注心理健康的良好氛围。未来要继续从制定政策制度、保障人员经费、开展培训学习、科研专项支持等方面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水平。

（二）积极实践在“五育”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要从“五育并举”向“五育融合”的方向发展，各育在完成相应教育任务的同时，适当融入其他教育内容。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五育”天然蕴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素材和途径，这种隐性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具有显性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积极探索在各育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

以德育心。在学校教育中，德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心理健康教育是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二者目标一致，都关注学生健康成长。德育中的世界观、价值观、理想、信念等也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8]。德育所培养的良好道德品质、法治意识和良好行为习惯，能够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提升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为学生的心理健康奠定坚实的基础。儒家道德教育思想中的“仁爱”“爱人”体现了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强调，孟子提出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内涵与心理健康教育中培养顽强意志、心理弹性、挫折耐受力的观点是一致的[9]。可见，德育与心育的融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必然性[10]。

以智慧心。智育活动过程中培养的学生分析思维能力、独立思考意识和创新进取精神等，本身就属于心理活动范畴。而且学科教学是学校工作的核心，课时多，学校教师投入精力大，学科教学存在着不可替代的人员和时空优势，学科课程与教学中蕴含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是可行的[11-12]。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科教育融合，教师在专业课、公共课等课程教学过程中，润物无声地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教师针对适当的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积极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学科教学，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同时，维护和增进学生的心理健康，承担起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职责。可以看出，智育过程促进了学生心理的成长发展，智育活动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天然途径。

以体育心。法国教育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指出：“体育运动不仅锻炼一个人的体魄，它同心理学的关系和其他生理学一样，能够影响人的悟性、性格和良心，因而它是服务社会的道德改良剂。”[13]人是身心统一的整体，一方面的变化和发展就会引起另一方面的变化和发展。体育锻炼能促进神经递质的分泌，缓解心理压力，调整心态，消除负面情绪。体育活动、体育训练和体育竞技比赛，既能提升个体的运动技能，增强体质，也能培养心理承受能力，塑造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增强人际交往能力。例如，大学体育课“太极拳”所蕴含的内外和谐、中庸之道等哲学思想，会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平和、理性、包容的健康理念。体能训练课中，让学生在困难中坚持，可使其获得坚毅的品质。

以美润心。对美的追求是人的精神需求，满足对美的需要会使人产生美感，在此过程中情绪得以表达，使人身心放松，心情愉悦。美育对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具有其他教育形式无法取代的作用。美育有利于完善人格心理结构，有利于爱心培养，有利于加强心理调适能力，有利于激发自我实现的欲望。积极系统地开展美育，可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14-15]，促进人的心理发展[16]。在舞蹈练习中，老师从心理学视角进行指导，多鼓励、表扬学生，增加其自信，引导成员相互协调与合作，对矫正心理健康问题能收到良好效果[17]。其他的艺术审美课程需要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可尝试在美育中融入育心的内容。

以劳健心。劳动教育蕴含丰富的心理育人价值，是实现心理育人的有效途径之一，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积极作用[18]。劳动精神可以帮助人们建立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情感状态，激发个体的内在动力和创造力，增强个体的自信心和自我实现能力[19]。劳动教育还能推动学生情商、逆境商等方面的发展[20]。通过实施耕种、手工、技能操作等“心劳互通”心理劳动教育，既可调节学生的身心，同时促进学生个人成长[21]。可见，劳动在人的心理发展和心理健康方面影响重大。

挖掘“五育”中的心理健康元素，构建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五育”的路径，“五育”也可以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

（三）探索第二课堂和其他活动中的心理健康教育

第二课堂和其他校园活动也是育人的重要载体，其形式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空间广泛，对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引导学生适应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社会实践可以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增强自信心，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树立团队精神，积极融入社会环境，从而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22]。各级各类学校都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但在这些活动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和实践还相对较少。实践活动、训练活动、社团活动、党团活动、志愿活动、校园文化活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家校合作等学

校各种活动中都可以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比如，在宿舍建设活动中引导学生学会与人相处、学会与人合作、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在志愿服务活动中融入关心、关怀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再如，校训体现了学校的治学精神和价值追求，在学生心目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视角对校训内容进行阐释，在校训的学习教育中塑造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

构建“1+N”心理健康教育新模式，坚持当下心理健康教育的主体地位，创造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在“五育”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借助“五育”丰富心理健康教育的形式，为心理健康寻找更多着力点，满足学生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心理健康需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适应社会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俞国良，靳娟娟 . 心理健康教育与“五育”关系探析 [J]. 教育研究，2022, 43(01): 136−145.

[2] 屈玲，冯永刚 . “五育并举”学校课程体系的构建及保障 [J]. 中国电化教育，2023(12): 41−47.

[3] 杨清 . 五育并举视野下普通高中课程体系的构建 [J]. 中国教育学刊，2021(06): 45−50.

[4] 孙会平，宁本涛 . 五育融合视野下劳动教育的中国经验与未来展望 [J]. 教育科学，2020, 36(01): 29−34.

[5] 李响，郭修金 . “五育融合”视角下高校体育综合育人的时代价值、内在逻辑及实现路径 [J]. 体育学研究，2023, 37(01): 95−101.

[6] 申亮，张波，陈祥伟 . “五育融合”视域下中华特色体育课程的现实意蕴、学理阐释与实践路径——以“射艺”为例 [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 47(12): 21−31.

[7] 殷子寓，吴他凡，李建华，等 . 医学教育“五育融合”有效路径探索 [J]. 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22, 30(02): 137−140.

[8] 韩媛媛，陈家麟 . 浅析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整合 [J]. 教育科学研究，2005(04): 51−54.

[9] 俞国良，陈雨濛 . 德育论对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 [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 39(04): 132−136.

[10] 曾万里，易希平 . 德育与心育融合的逻辑基点、精神意蕴及实践路径——基于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J]. 当代教育论坛，2022(05): 88−95.

[11] 刘野，许丽芬 . 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优势与方法 [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37(06): 135−137.

[12] 叶一舵 . 学科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问题 [J]. 中国教育学刊，2004(03): 20−23.

[13] 张江南 . 电视与奥林匹克传播 [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4] 叶太平 . 以美育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05): 81−87.

[15] 沈致隆 . 美育：非关小事，而是成“人”之道 [J]. 人民教育，2018(18): 23−26.

[16] 王芳 . 在音乐审美教育中发展大学生的健康心理 [J]. 中国成人教育，2008(14): 135−136.

[17] 陆竞文 . 传统舞蹈在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尝试运用——以傣族舞蹈为例 [J]. 艺术百家，2013, 29(02): 223−225.

[18] 丁闽江 . 劳动教育：高校心理育人的实践途径 [J]. 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 22(03): 31−35, 88.

[19] 贾淑珍 . 劳动精神在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价值研究 [J]. 中国学校卫生，2024, 45(03): 461−462.

[20] 吴昌福 . 学校劳动教育育人价值的缺失与复归 [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 9(34): 12−15.

[21] 郑正 . “心劳互通”——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劳动教育相结合的育人模式探索 [EB/OL]. (2024−10−25) [2024−12−03]. http://ahkjb.joyhua.cn/ahkjb/20241025/html/content_20241025016001.htm.

[22] 李彦红 . 社会实践对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作用思考 [J]. 中国校外教育，2019(09): 69, 7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陕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24 年度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五育融合’视域下‘1+N’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构建研究”（2024SZX391）；2024 年陕西警察学院辅导员工作室项目“‘警语心愿’辅导员工作室”（F2024001）。

（作者系陕西警察学院副教授）

汇聚 N 方力量 守护 1 颗初心

基于产教融合的开放大学“双师型”教师培养路径的探索

丛冰玉 张燕杰

摘要：教育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形成的产教融合，是培养适应国家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需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随着产教融合的持续深入，“双师型”教师已成为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力量。在以促进终身学习为使命的开放大学中，其重要性愈发凸显。为适应这一需求，开放大学应通过加强校企合作，培育符合“双师型”要求的教师人才，积极推进教师队伍建设。本文从“双师型”教师的内涵入手，探讨开放大学“双师型”教师培养现状，并提出优化教师培养路径、深化校企合作等对策，以期为提升教师综合素质与教学质量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

关键词：产教融合；开放大学；“双师型”教师；校企合作

随着社会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教育体系改革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开放大学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教育力量，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的办学模式下，如何有效培养“双师型”教师成为其发展的关键问题。“双师型”教师不仅应具备扎实的学术背景，还需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适应多种教育形式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校企合作成为推动“双师型”教师培养的有效途径，既可提高开放大学教师队伍的实践能力，也能促进教师队伍“教学 + 实践 + 科研”多元深层内涵发展。因此，在产教融合发展背景下，如何建设开放大学“双师型”教师队伍，已成为开放大学推进数智化教育教学转型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产教融合背景下“双师型”教师的内涵与特征

（一）“双师型”教师的内涵

“双师型”教师指的是既具备学术理论基础又拥有实践经验的教师。与传统学术型教师不同，“双师型”教师不仅具备学科知识，还能根据行业背景将实际问题与理论教学紧密对接。在开放大学的教学模式下，“双师型”教师需要深度融合企业的技术创新需求、高校的科研力量与教育资源，能够同时承担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课程教学任务，不断丰富开放大学教师队伍的多元化发展路径，推动开放大学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双师型”教师的核心特征

“双师型”教师的核心特征体现在学术性与实践性的有机融合。教师不仅要具备深厚的学科理论知识，还需具有行业背景，能够通过实践经验辅助教学。他们能够将学术理论与现实问题相结合，为学生提供更具实用性的知识[1]。此外，“双师型”教师还具备跨领域的能力，能够灵活适应不同的教育形式，包括传统课堂教学、企业实训等。

（三）产教融合的关键要素

“双师型”教师的发展以产教融合为基础，其关键要素在于教育与产业深度对接、建立教师双向流动机制以及教学内容持续更新。学校和企业需紧密合作，共同确定教学内容与培养目标，通过“引进”将一线产业实践经验融入课堂，借助“走入”使教师深度参与企业发展和产教融合科研项目的研发，从而实现教育与行业需求的紧密衔接。而且，教师参与企业实践，既能提升自身的行业技能，还能把经验反馈到课堂教学，推动教育内容的创新。

二、开放大学“双师型”教师培养的现状

（一）“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现状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方案》等政策文件的出台，明确提出建立“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为开放大学“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发展方向。目前，部分开放大学联合产业学院、校企合作单位共同建设双师培养基地，但在实践中仍存在“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重学历教育轻非学历教育”等问题。以甘肃开放大学为例，在编在岗教师有 188 人，其中有正高级职称者 11 人、有副高级职称者 65 人。学校下设一所普通高职学院（兰州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在岗教职工 97 人，其中“双师型”教师 36 人。从甘肃开放大学教师队伍整体建设情况来看，高级职称教师占比约 40%，只有高职学院拥有“双师型”教师，

且主要从事的是学历教育教学工作。据统计，甘肃开放大学在职教师参与本校非学历教育教学工作的比例不到教师总人数的 10%。

（二）开放大学与企业合作办学现状

开放大学与企业的合作模式在“双师型”教师培养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目前，校企合作主要聚焦于短期项目合作，合作的深度和持续性均有待提升。企业的参与主要体现在课程设计、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但教师在企业的参与深度不足，未能完全融合行业经验与教学内容[2]。尽管校企合作为教师提供了实践平台，但大多数合作仍局限于短期项目，缺乏系统性和长期性。企业对教师的支持主要体现在阶段性项目和“定制化”人才培养等方面，而教师参与产业发展技术研发以及技术课程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因此，如何深化校企合作，推动教师的双向流动，提升教师的行业实践能力，成为当前开放大学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现状

开放大学目前的办学现状是，教师队伍大多源于学术领域，行业经验相对缺乏，导致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不强。而且，“双师型”教师培养体系尚未完全成熟，激励机制也不完善，教师行业经验与学术研究能力的结合缺乏系统的支撑，当前，教师多依赖行业兼职或者参与短期项目获取实践经验，这种模式对教师的全面长效发展存在一定的限制。通过建立标准化培养路径和积累实践经验来打造符合“双师型”标准的教师队伍，仍是开放大学当下面临的重要任务。

三、基于产教融合的开放大学“双师型”教师培养路径的探索

（一）提升教师实践能力，增强教学实效性

“双师型”教师的核心优势在于能够在课堂教学中兼顾理论讲授与实践指导。由于开放大学的教学对象多样且职业化特征明显，教师须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才能提供贴合岗位需求的教学内容。这需要靠学校和企业的深度协作机制，为教师提供长期稳定的实践平台，让教师深入企业一线，直接参与技术研发、设备调试、运营管理等环节，在真实工作环境中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3]。基于岗位的实践锻炼有助于教师理解企业运作规律，提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从而使课堂教学更加贴近实际，避免“纸上谈兵”。

在学历教育层面，应由学校联合企业共同制定系统化的教师实践培养计划，定期安排教师到企业参与项目合作，让教师通过技术攻关、质量控制、数据分析等多维度工作积累经验。而且，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掌握的“行业解决方案”可转化为典型教学案例使课堂内容更加生动、具体。案例教学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应用技巧，还能提升学生理解行业运作的系统思维能力。在非学历教育方面，教师应持续参与行业协会、企业内部培训、技术讲座等活动，关注新工艺、新流程、新模式的实践应用，并结合不同培训对象的需求，探索差异化教学策略，如模块化教学、任务驱动教学等方式，从而提高教学适配性。教师只有不断拓宽视野，才能以更开放的思路、更新的知识回应各行业人员的继续教育需求，使课程内容更具专业性和实用性。

（二）优化“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构建终身学习体系

“双师型”教师的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优化培养模式。教师职业发展周期长，需要靠不同阶段的学习与实践不断提升[4]。开放大学定期为教师提供行业前沿技术、管理技能培训和跨学科学习机会，使其能跟上行业与学术界发展的步伐。教师应紧密联系学术研究和行业应用，学术研究既要关注学科前沿，又要关注行业最新需求。在开放大学非学历教育中，要把学术和实践经验与学生实际需求相结合。完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激励保障机制，按照教学资历、成果、荣誉奖励等划分“双师型”教师队伍层级，细致规划各层级教师薪资待遇，对在校企协同育人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教师给予表彰奖励。增加校企合作成果、企业实践经历、非学历教育教学经验等考核指标，激发更多开放大学教师参与“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内在动力。此外，教师还需参与教学法培训，以提高学历与非学历教育教学能力，不能仅做学术内容的传播者，而要成为学生职业发展的引导者。

（三）深化校企合作，促进“双师型”教师流动

校企深化合作，推动教师与企业、学校间的双向流动，对提升教师实践能力、更新教学内容具有显著作用。学校与企业凭借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可共同设计贴合行业需求的课程体系，确保教师直接参与企业项目实际工作。在此过程中，教师既要充当“学术指导”，又要具备“行业实践导师”的身份[5]。教师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市场调研、产品设计等核心工作，能够掌握行业发展动态，并把最新技术与行业趋势带入课堂。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需定期到学校参与课程设计和授课以弥补教师实践经验的不足。教师与企业人员双向流动，可使教师在行业中始终处于学习状态，为学校提供最前沿的行业信息，促使教育内容与行业发展同步。

校企合作要建立长效发展机制，不能只看重短期项目输出，而应注重长期合作质量。企业和学校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规划，合作需贯穿教师整个职业生涯，而非只局限于某一阶段。在产教融合背景下，校企要建立“双师型”教师长期发展计划，如定期技术培训、行业交流、科研合作等，让教师在不断变化的行业环境中持续提升实践能力，实现教育内容和产业需求的深度融合。

四、案例分析

（一）案例背景

某知名 IT 企业和某开放大学开展深入合作，旨在通过校企协同推动学校数智化办学转型，培养“双师型”教师，并提升教师行业实践能力与教学质量。学校可借助企业提供的实际项目和技术平台，使教师通过参与企业研发、技术创新积累行业经验，并将其应用于教学，使学生的技能与行业需求实现有效对接。这种合作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教育与产业的紧密结合，实现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的双重目标。

（二）实施过程

在该校企合作案例的实施过程中，逐步展开具体步骤与方法，以保证教师能够深入行业工作，并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教学资源。

首先，将教师引入企业，强化产学研一体化的教学建设。企业和开放大学共同制定详细合作计划，明确教师在企业项目中的角色与职责。教师不仅要参与项目，更要成为技术方案的提出者与问题解决者。教师参与企业技术研发、项目管理和市场调研等工作，涵盖从技术研发到产品上市的全流程。教师通过参与企业产品设计、技术实施和项目管理，直接了解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流程的实际应用，再把这些经验带到课堂，把企业技术引入科研项目，与合作企业共同攻克科研难题。

其次，对开放大学课程体系进行创新，以满足校企多元化的发展需求。校企合作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构建“通用类 + 理论类 + 应用类”多元化组合且更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教学课程体系，不断丰富课程学习和人才培养路径，为开放大学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发展打基础。

最后，建立“双向流动”的教师培养模式。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会传授学术理论，还将项目案例、技术细节以及管理经验带进课堂，让学生接触并解决行业中的实际问题，从而使教师的教学方法逐渐向案例分析与项目指导转变，以增强学生的实操能力与创新思维。开放大学可通过“企业挂职”模式，为教师提供周期性行业轮岗机会，进一步增强教师的实践能力，让教师在企业中积累经验，了解企业运作，提升教学效果。这一系列措施能让校企合作从理论到实践实现无缝对接，提升“双师型”教师的实践教学经验和技能，使课堂内容和教学方式更加多样化。

（三）预期成效分析

合作启动后，教师在行业项目中的参与度显著提升，积极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和项目实施，使教学内容的实践性、实用性与前瞻性明显增强。校企合作的“双师型”教师培养计划使学生就业率较合作前有所提高，其中 IT 和工程技术类岗位的就业率提高尤为明显。企业与教师合作推动多个技术创新项目，使成果转化率提高，企业技术和市场需求持续匹配的能力不断提升。

五、总结

本研究探讨了开放大学在产教融合背景下，通过校企合作提升“双师型”教师的培养路径。教师实践能力的提升、培养模式的优化及校企合作的深化是“双师型”教师成功培养的关键。然而，实际操作中仍面临诸如教师实践经验不足、培养模式单一等挑战。深化校企合作、推动教师双向流动以及建立持续的实践平台，将有助于促进教师的多维度发展，提升其行业适应性和教学实效性。此外，如何通过有效的校企合作促进教师与行业需求的精准对接，确保教育内容的前沿性和时效性，仍是当前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米力，王瑾，谢建平．“双师型”教师队伍实践探索 [J]. 公关世界，2024(22): 157−159.

[2] 周巧．产教融合赋能开放大学职业人才培养研究 [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4(05): 19−21.

[3] 韦婷．基于产教融合的“双师型”教师培养途径研究 [J]. 现代交际，2021(23): 209−211.

[4] 刘月圆．产教融合背景下开放大学“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J]. 天津电大学报，2023, 27(03): 56−59.

[5] 王菲，李霞，施梦昕．开放大学“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探索——以山东广播电视大学为例 [J].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04): 23−2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甘肃开放大学 2023 年度立项课题“校企合作下开放大学开展继续教育的探索与实践”（2023−YB−12）。

（作者：丛冰玉，甘肃开放大学副教授；张燕杰，甘肃开放大学讲师）



基于大概念的初中“道德与法治”大单元教学设计研究

陈　凤

摘要：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大单元教学设计中，大概念的应用策略是研究焦点，先阐释大概念内涵和在学科教学中的统摄作用，指出其能帮助学生构建整体知识网络、揭示学科本质逻辑，接着剖析大单元教学特性与目标，认为整合教材内容、设计综合性学习任务可避免知识碎片化、增强学生迁移能力，文章还从明确大概念、营造大情境、分阶段组织学习活动、设计综合问题、施行多元评价等方面给出具体教学设计策略，这些策略以现实生活真实问题为切入点，让学生在实践中理解运用大概念，逐步达成知识结构化和核心素养培育。研究表明，大概念引领的大单元教学整体性和实践性更优，为提高道德与法治教学效果提供新路径。

关键词：大概念；初中“道德与法治”；大单元教学设计；教学策略；教学评价

在教育改革不断推进之时，研究者察觉到传统分课时教学模式存在知识碎片化情况，并且这种割裂的教学安排已被证明不利于学生认知结构的深度整合。大单元设计采用主题统整策略，依靠重组与联结教材内容构建跨课时的认知图式，这种教学模式不但重新构建了学科知识体系还融入社会情感学习理论，为公民意识的培养提供合适路径，在强调社会责任养成的德育课程里尤其如此，系统性教学框架能有效促使规则认知向行为转化形成完整闭环。研究以 UbD 理论框架为基础，聚焦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课程设计，试图构建包含目标设定、评估嵌入、活动序列化三个维度的实施模型，以便为“道德与法治”课程改革提供可操作的实践范例。

一、基于大概念的大单元教学内涵与意义

（一）大概念的内涵与作用

在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大概念作为结构性要素呈现出显著的统摄特征、抽象属性及迁移潜能。这一桥梁作用的实现往往通过知识网络的系统化构建达成，具体表现为微观知识单元与宏观认知框架的有效衔接。值得注意的是，大概念的框架性特征使其能够突破碎片化知识的局限，以层级化认知模型揭示学科内在的逻辑关联。从教育实践视角观察，该认知工具通过双维度作用机制——既促进跨知识点联结的形成，又引导学生把握学科核心原理——实现了知识建构的深度整合。相较于离散的信息点，这种整体性认知视角的建立，本质上源于对学科本质规律的结构化诠释和有助于引入大概念，提升学生对学科知识的整体理解和应用能力。

“道德与法治”课程体系中的核心概念群（如“公共生活与规范体系”“公民角色认知模型”）承载着学科育人价值，锚定社会现象探究方向。以“公共生活与规范体系”概念框架为例，其教学实施需引导学生解构社会契约理论视域下的秩序生成机制，同时解析个体行为边界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辩证关系。教学实践中，结构化知识框架的搭建不仅促进认知图式的形成，更能培育学生对具体社会情境的迁移性素养。这种认知图式的构建过程既包含对规范文本的具象化解读，也涉及对公民角色认知的渐进式深化，不仅夯实了学科基础认知维度，更为跨情境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奠定实践根基[1]。

（二）大单元教学的特点与目标

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依据教材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着眼于学科知识体系的结构化构建，用系统性整合策略来设计层级化教学序列，旨在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与深度。而传统单课时教学模式与之不同，这一范式强调突破单课时限制，构建主题式学习模块，把分散的教学要素重新组合成有延展性的认知单元，从而建立起跨课时的知识联结网络，有效促进了知识的连贯性与系统性，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教学里知识割裂、认知断层的常见问题。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里，整合性学习框架一旦构建，大单元教学模式就有了依托，且真实情境创设能推动学生对社会生活形成立体化认知。就拿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来说，教师把“公共生活与规则”“社会责任与公民意识”等模块整合起来，以真实的社会议题为

切入点构建出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并设计多层次的实践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仅理解基础概念是不够的，还要通过案例解析和实践活动让批判性思维和系统性认知能力协同发展。按照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这种模式以培养知识应用能力为目标，使学生能从学科理论跨领域迁移到现实情境中。这种教学架构的好处是学习过程衔接有机且能提高实践效度，有效支撑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在培养社会参与意识和问题解决能力方面展现出独特价值。

二、基于大概念的初中“道德与法治”大单元教学设计策略

（一）明确大概念，构建教学框架

学科大概念始终是大单元教学设计核心架构的展开依据，这种统摄性概念体系对教学目标的导向以及知识结构的系统化起着决定性作用。规划课程框架时，教师要依据教材的知识图谱进行解构并用概念层级分析法提取出具有学科本质属性的核心概念。这些核心概念不仅是教学设计的基石，也是学生认知发展的关键。以“公共生活与规则”概念模型来说，其内涵不仅统摄社会规则的表层形态与功能属性，还深入揭示社会秩序构建的内在机理，如规则体系与社会契约意识的潜在作用机制。这一多维度知识架构给学生提供了立体化的认知图式，有助于他们更全面地理解和应用学科知识体系。

教师要以核心概念为锚点，深度整合教材知识图谱，构建多维度联结的教学模块集群。以“社会规则体系建构”为例，依据课程模块化设计原理，将“规则生成逻辑”“公共场域规则运行机制”“权责对应关系认知”三个维度有机统整，形成“概念解析—场景应用—价值内化”的三阶递进架构。可以在这个架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跨学科知识，如心理学、社会学等，以丰富教学内容。如此遵循认知发展规律编排课程，既能助力学生从获取离散知识跨越到建立系统思维模型，也能让学生在情境化学习中深化对社会契约精神的理解，形成针对现实问题的规则意识迁移能力[2]。

（二）创设大情境，设定学习任务

大单元教学设计里情境建构需着眼于搭建知识迁移的实践场域并构建具有现实映射功能的学习生态，这需要教育者着力去做，就拿“公共生活与规范”教学模块来说，可以创设三维立体化的社区治理模拟系统，并用角色分工机制引导学生组建实践共同体，具体来讲，学生能承担社区议事代表、自治组织成员、公共事务观察员等不同身份，在虚拟社区空间参与停车资源分配方案研讨、垃圾分类督导流程设计等沉浸式体验，要注意这种情境任务的底层架构需融入双重维度设计，保持现实问题的仿真度以强化代入体验，预留足够的决策弹性空间来激发批判性思维，这种教学策略走具身认知路径，能让学生深刻理解规则形成机理，把抽象的社会治理原理转化成可操作的实践智慧。

情境化的协作学习任务要求学生系统探究规则制定的多维标准并对其执行效能加以评估，还要提出动态调整方案，这种多维度的认知建构过程使学生从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入手，深刻理解规范体系的社会价值与实践中的伸缩性。拿社区治理项目来说，教学实践表明参与者得结合情境认知理论，用文献分析法梳理政策法规的发展变化、通过案例对比法评估规则执行的效果，最终构建起包含多方利益平衡的跨部门协同机制，这种基于真实问题情境的教学设计不但让学生对核心概念的具体理解得到强化，而且借助实践性知识的整合推动了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复杂场景中的知识迁移与创新应用水平明显提高[3]。

（三）分阶段组织学习活动，促进知识结构化

大单元教学范式强调学生不能只做到准确识记学科基础要素，还得具备系统建构跨模块知识网络的认知能力，且现代教育心理学研究显示深度理解的形成要经历从知识结构化到思维模式化的渐进过程，教师组织教学活动需要进行阶段性规划，依托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理论设计符合认知发展规律的系统化学习路径，以促使大概念在真实情境里迁移运用。

概念导入阶段，教师能凭借典型事例分析加上情境化教学策略，让学生慢慢构建起核心概念的初步认知框架。教师可以拿某社区垃圾分类管理实况影像作为教学素材，通过具象化的方式展示公共空间行为规范的实际运作机制。这种方法可以更加生动有趣，还能够加深学生对社会公约的理解，引导他们直观体会社会公约的实践价值及其重要性。

实践环节的第二阶段，教师能组织协作式研讨活动，从类型划分、特征对比、适用性反思这三个维度引导学生多维审视既有规范，而在这个过程里，学生可凭借教材文本分析、典型社会实务案例分析和群体决策机制慢慢构建对社会运行机制的结构性认知，并且这种认知建构要结合具体情境中的规则实践参照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来深化认知维度。

综合实践环节，学生要把跨学科知识整合应用起来，可按认知迁移理论框架设计 PBL 教学模式，如开设模拟社区治理的情景式问题解决工作坊，或指导学生团队合作制定班级公约优化草案。这样的教学设计不但能系统评估学生对核心概念的掌握深度，更关键的是在真实情境里认知重构时能推动知识向实践场域迁移转化，在此过程中学生要用元认知策略对既有知识体系解构重组，这种建构主义理论下的实践路径可有效强化概念网络的拓扑关联性。

（四）设计综合问题，巩固学习成效

在大单元教学框架下进行跨学科问题设计能让学生的认知结构有效地优化升级，在“公共生活与规则”

主题单元里，教师可以构建社区成员依靠协商民主机制形成公共空间管理规范这样一个实践模型，该模型把重点放在社会契约理论视角下的规则生成机制上，像以模拟社区议事会的形式引导学生去探讨不同利益主体在制定噪声管控标准时可能遭遇的博弈困境。这样从现实情境出发设置问题，既能加深思维深度，又有助于培养知识迁移能力。这种跨学科的教学方式还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帮助他们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能够提出更多新颖且可行的解决方案。

学生面对此类跨学科情境命题，要运用多维度分析框架，先辨识像声源类型与传播路径这样的环境干扰因素并统筹多元利益相关者不同的需求；从社会认知角度看，参与者要系统评估政策设计可行的边界以及执行成本的阈值，且把公共政策制定原理和社会治理理论框架有机整合起来；按照建构主义学习范式，这种训练模式通过模拟现实情境让学生建立“理论—实践”转化机制，在解决矛盾冲突时同步提高知识迁移能力和系统思维水平，宏观上能加深学生对公共治理核心概念的理解，微观上能构建起解决问题的系统思维框架，给学生未来应对现实挑战提供方法论支持[4]。

（五）实施多元评价，促进核心素养达成

要有效保障大单元教学质量就需要系统构建多元评价体系，教学评估不能只着眼于衡量知识水平而要扩展到追踪分析认知发展轨迹，教师既要观测概念理解程度还要系统考察思维模式演进和关键能力形成过程，具体实施时要建立包含过程性评价维度的动态评估策略、系统观察课堂参与活跃度和思维深度、综合研判实践任务达成度和复杂情境问题解决效能、持续记录学习内驱力、团队协作效能和创新性思维品质以形成立体化教学反馈机制。

多元路径可用于实现教育评估，像用动态观察量表量化追踪课堂讨论参与情况、靠任务完成质量评估量表开展学习成果的多维分析、引入同伴互评机制捕捉学生对知识内化程度的反思轨迹都可以，且评估维度要拓展到认知发展脉络。教育心理学研究显示，社区规则制定的实践任务中能让学生系统梳理执行时遇到的认知冲突，基于情境化问题解决框架提出优化方案，在项目式学习场景下引导学生从元认知层面构建有迭代特征的改进策略。

这种多维度的动态化评价机制既能让教师精准诊断学习成效，又能促使学生依据元认知理论周期性复盘学习轨迹，双向互动模式有效弥补了传统评估的局限性，且使学生得以在持续改进中构建自主探究的知识框架与迁移应用能力。建构主义教育理念下的系统化评估工具让教学策略的迭代优化有了数据支撑，并推动学生在螺旋式进阶中构建素养结构，过程性反馈和阶段性诊断相结合的评价范式给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

三、结语

在探索“道德与法治”课程的革新路径时，大单元教学策略凭借概念框架的整合优势开拓出了新的实践方向，这一模式聚焦于凝练核心概念，通过构建真实情境场域、设计层次化任务并运用动态评估机制，使学生掌握基础理论的认知迁移能力和应对复杂情境的水平显著提高。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导下的教学实践显示，尤其在培养价值认同方面这种整合式教学模式有着独特的优势，需注意后续研究可把智能教育平台和学习行为追踪技术融合起来，利用认知科学领域的最新成果构建更具适应性的教学评估模型，这种基于证据改进的路径为系统培育学科关键能力奠定了可持续优化的实践基础[5]。

参考文献

[1] 郑小龙 . 聚焦“大概念”落实“大单元”——大概念视域下初中道德与法治单元整体教学策略 [J]. 天津教育 , 2024(22): 183−185.

[2] 肖娜 , 蒲一萍 . 知意能三位一体 : 初中道德与法治大单元教学 [J]. 教育科学论坛 , 2025(05): 13−17.

[3] 钟煜 . 大概念教学理念下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大单元教学设计与实施 [J]. 教育信息化论坛 , 2024(02): 117−119.

[4] 李栋武 . 核心素养本位下初中道德与法治大单元教学策略研究 [J]. 名师在线 , 2024(27): 61−63.

[5] 洪春花 . 深度学习下初中道德与法治大单元主题教学策略探析 [C]//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2023 年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活教育学术座谈会论文集（三）. 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实验中学 , 2024: 115−117.

（作者单位：武汉光谷科创实验中学）



高校法治建设背景下辅导员法治素养提升路径研究

闻　竹

摘要：文章以高校法治建设为背景，以高校辅导员法治素养为研究对象，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高校辅导员法治素养的提升在推进依法治校，培育大学生的法治精神、法治素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分析高校辅导员法治素养的现状及成因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提出了提升高校辅导员法治素养的路径。

关键词：依法治校；高校；辅导员；法治素养

全面依法治国，高校也在倡导依法治校，而辅导员的法治素养教育是一个重要且紧迫的课题，也是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更是依法治校的发展要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为实现国家富强，高校辅导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要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方面的正确教育。而全面依法治国就是指在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中，都要以法律为依据来治理、运作，强调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正、公平，这就要求辅导员在实际工作中，不管是处理学生问题还是学生心理问题，都要以法律为依据，以法治为导向，将所有的工作立足于法律基础上。

一、提升高校辅导员法治素养实效性的意义

（一）法治素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需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规则意识，而法治素养正是规则意识在法治社会中的集中体现，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其法治素养的提升对于推进依法治校、培养学生法治精神具有重要意义[1]。因此，法治素养实效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即是对大学生进行普法和法治宣传教育，使大学生的法律知识不断更新，法律知识结构得以完善。

（二）严谨的法治思维是新时代辅导员必备的思维能力

新时代高校学生事务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特征，学生维权意识增强、网络舆情传播迅速等新情况，对辅导员的问题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法治思维是现代国家治理应当确立的基本思维模式，对于辅导员而言，具备法治思维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处理学生事务，维护学生权益，同时也能够在工作中遵循法律法规，确保工作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三）高校辅导员的法治素养还需考虑职业特点和工作职责

辅导员既是教师又是行政管理干部，具有双重身份，其工作涉及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管理、就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危机干预等多个方面[2]。因此，在研究中需要充分考虑辅导员的工作实际，结合其工作特点和职责要求，探索提升辅导员法治素养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二、高校辅导员应具备的法治素养

（一）平等、公正的法治素养

平等和公正是法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辅导员在开展工作时应坚持平等原则，应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不论性别、年龄、种族、信仰均应一视同仁[3]。辅导员在处理学生问题时，必须秉持公正的原则，包括在权利保障上的对等——学生既有遵守校规校纪的义务，也有获得公正对待、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偏袒任何人，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在平等原则下得到公正对待。公正素养是法治的生命线，辅导员应持公正之心，公正素养还要求辅导员在事实认定与责任划分中保持中立。在学生冲突事件处理中，需全面收集双方陈述、证人证言、监控录像等证据，避免先入为主；在违纪处分中，要依据错误性质、情节轻重与校规条款“对号入座”，确保“同错同罚、异错异罚”，客观全面地掌握问题，做到在事实范围内、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出公正的判断。辅导员在处理学生纠纷时应保持公正原则，保障学生的权益不受侵害，避免任何形式的歧视。

（二）规范程序的法治素养

规范程序的法治素养是指遵守法律、遵守法律程序的行为素质和美德，缺乏规范程序的处理结果，即使“结果正确”也可能因合法性缺陷而失效，规范程

序的法治素养要求高校辅导员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正确理解和运用相关法律的能力，熟知学生事务处理的法定流程与校内规定，开展各项工作时做到每项工作都严格遵守法律程序，有严格的程序意识、认识到法律程序的重要性，在处理学生各项事务时严格遵守法律程序，不随意删减程序、更改程序，既是尊重学生权利，又是尊重法律权威。

（三）讲究证据、保护隐私的法治素养

讲究证据的法治意识，以事实为依据，以证据为证据[4]。辅导员在处理学生事务时，需养成“证据先行”的习惯：对学生的口头陈述进行书面记录并由本人确认；对涉及违纪的物品、聊天记录等进行封存保管；对关键证人的证言进行同步录音（经对方同意）。在处理、教育学生过程中，教育对象以有理有据为依据，理性认识问题，尊重和搜集证据，使学生的决定及行动建立在有理有据的基础上，使学生树立用法律、证据保护自己的权利意识，明确只有在法治社会里，证据才能保护自身权利、才能解决问题。学生的个人信息、家庭信息、学生成绩等都属于隐私的范畴，辅导员在搜集、使用这些信息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避免学生的隐私被泄露、被滥用，对学生要加强隐私保护教育，使学生有正确的隐私保护意识，防止个人信息被非法搜集、利用。

（四）维护学生利益的法治素养

维护学生利益的法治素养对于高校辅导员至关重要，是辅导员法治素养的终极指向，要求辅导员既做“规则的执行者”，也做“权利的守护者”。作为高校辅导员，应当熟悉掌握与学生利益有关的法律，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时刻保持敏感性，发现可能伤害学生利益的行为，第一时间介入，如欺凌、诈骗、隐私泄露等，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学生利益，避免事态恶化。辅导员应当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让学生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高校辅导员日常工作中法治素养应用现状

（一）辅导员法治素养呈良好态势

1.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高度认同

高校辅导员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我国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权益的有力保障[5]。高校辅导员要坚信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社会进步、国家安定有序的基本保障。因此，在工作中，辅导员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依法办事。

2. 尊重宪法和相关法律体系

辅导员自觉学习宪法及其他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对学生工作事项遵守法律程序，保障学生权益，教育学生遵守法律，在学生工作中自觉遵守宪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辅导员积极引导学生，培养其遵守法律的意识，引导学生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辅导员参与校园法治文化建设，配合学校有关方面，规范学校规章制度、校园法治管理。

3. 以法治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

高校辅导员的法治思维不断成熟，使其在日常工作中，针对大学生之间发生的纠纷和违纪问题，能够依法处理，公正合理，不带有任何主观臆断与随意性，让大学生的权益依法得到保证。高校辅导员注意将法治思维与具体问题相结合，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在学生中开展法治教育、模拟法庭等，让学生们参与法治实践，提高学生的法治实践能力。并且主动配合校方工作，与学校各个部门一起推行依法治校工作，为学校依法治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辅导员法治素养存在的问题

1. 高校辅导员事务管理工作中存在法治水平不均衡现象

高校辅导员事务管理法治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是由辅导员个人法治水平、法治知识掌握、法治实践经历等差异造成的。有些辅导员法治水平高、法治知识掌握得多、处理事务的法律思维能力强；有些辅导员则可能法治水平比较弱，处理事务可能会受主观因素影响 (如个人实践经验、个人情感因素等)，造成法治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有些辅导员可能偏重个人实践经验而忽视法定规则；有些辅导员可能偏重法定规则而过分审慎处理；有些高校重视辅导员法治教育，有些高校则不重视。

2. 高校辅导员学法自觉性有待提高

部分辅导员的学法自觉性不强，对法律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主动学习、钻研法律的积极性和动力，可能导致处理学生事件时法律素养和法治思维不足，不能正确有效地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

3. 高校辅导员自身法治素养提升缺少顶层设计

首先，缺乏明确的法治教育目标和规划。高校缺乏明确的辅导员培养和发展规划，特别是缺乏明确的法治教育目标和对未来的规划，导致高校辅导员法治素养提升缺少了一个明确的指向标和目标。其次，缺乏统筹协调机制。辅导员法治素养提升所牵涉的部门众多，需要学校内外部各个方面的共同合作。缺乏一个统筹协调、形成合力的机制推动辅导员法治素养提升。最后，缺乏科学的评估和反馈机制。辅导员法治素养提升的效果缺乏科学的评估和反馈机制，不能及时地掌握辅导员的法治素养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缺乏有针对性地改进优化法治素养提升工作。

四、提升辅导员法治思维的路径

（一）完善顶层设计，制定辅导员法治教育目标和规划

科学、合理的法治教育目标和规划对高校辅导员

法治素养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高校辅导员履行职权、维护高校法治环境的需要，也是为学生树立法治典范、培养学生法治意识的必然要求。首先，高校应结合自身实际，认真分析、研究高校辅导员法治素养的现状与需求，制定高校辅导员法治教育目标和规划，高校辅导员法治教育目标和规划应明确法治教育内容，如宪法法律知识、法治观念意识、法治实践技能等；应明确法治教育方式，如课堂教学、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法治实践等，确保法治教育的多样化、有效性；应明确法治教育时间及要求，为高校辅导员明确学习路线和学习时间表，确保高校辅导员能够有规律、有逻辑地接受法治教育。其次，要切实做好高校辅导员法治素养提升工作，高校应当建立统筹协调机制，组建高校辅导员法治素养提升工作机构或者成立工作组，统筹安排各项工作，有效整合各类资源。高校应善于做好高校内部不同部门、不同学院、校外相关部门等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统筹制定实施法治教育计划，形成工作合力，通过定期会商、沟通、交流、研讨等方式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做好辅导员法治素养提升工作。建立评估反馈机制。高校要定期组织对辅导员法治素养进行评估，了解情况，做好学习成果的转化和运用。评估的方式应当多元化，如考试、案例分析、实践操作等，确保评估的全面客观。此外，根据评估情况要对辅导员进行及时的反馈，指出其法治素养方面的短板和不足，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和改进意见。这有助于辅导员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有针对性地提升自己的法治素养。

（二）加强法律理论知识的学习，培养辅导员的法治信仰

一是开展法治教育培训。高校应定期组织法治教育培训活动，帮助辅导员深化法治认识，学习法律知识，掌握法律思维方法，以案例教学、模拟法庭等教育载体，引导、督促辅导员学法用法，提高辅导员队伍学法、懂法、用法的意识与能力。二是建立激励机制。高校可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对班干部中学法先进分子进行表彰和奖励，激发他们的学法、研究法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将学法成果纳入辅导员队伍考核评优评先范围内，激发辅导员队伍学法自觉性。三是加强辅导员之间的交流。高校可通过创建辅导员队伍的交流平台，使他们互相交流学法心得，交流法律问题，通过相互借鉴，互相交流，共同提高，提升辅导员队伍学法自觉性。四是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高校要加大法治文化的宣讲力度和普及力度，让法治深入人心，通过法治讲堂、法治实践等加强师生对法治的认同和敬畏，为辅导员增强学法自觉创造良好的氛围。

（三）养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的意识

辅导员应树立法律至上意识，认识到法律的作用和功能，在处理学生事务时，优先考虑到法律因素，做到依法决策，依法办事。辅导员应主动学习了解法律知识。辅导员可通过法律培训、阅读法文、法律实践等方式学习提高法律素养和法律技能。只有具备足够的法律知识，才能更好地运用法律解决问题。辅导员还应该注重自身的法律思维能力，在处理学生事务时，善于用法律思维去判断问题与事件，运用法律逻辑去推理；还要注重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使用法律知识去分析问题。辅导员应探索与尝试将法律知识运用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敢于尝试运用法律知识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不断积累法律知识和解决问题的经验与教训，在摸索中加深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提升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的水平与能力。学校应制定完善学生管理的规定与程序，指引辅导员工作的方向；建立法律咨询与援助机制，为辅导员提供及时的法律咨询与援助；加强对学生工作的检查与考核，做到辅导员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五、结语

本文的研究对于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提升大学生法治素质具有重要意义，提升辅导员法治素质、实践能力和水平，要在加强大学生法治培训、参与法治实践、完善法治保障机制、获取社会支持与资源等方面发力，为更好地服务学生，推进高校法治建设进程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全国“八五”普法学习读本编写组 . 大学生法治教育读本 [M]. 北京 : 法律出版社 , 2022.

[2] 王红梅 . 高校法治教育实效性研究 [M].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21.

[3] 陈金钊 , 杨铜铜 . 法治思维、法治能力的考察需要法律方法 [J]. 扬州大学学报 , 2017, 21(02): 5−19.

[4] 林衍盛 .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大学生思政工作的逻辑理路、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J]. 武夷学院学报 , 2022, 41(11): 23−34.

[5] 杨振华 . 高校辅导员队伍法治素养的现状与提升策略 [J]. 高校辅导员学刊 , 2020, 12(01): 76−8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3 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与发展课题“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高校辅导员法治思维养成研究”（23FD0224）。

（作者系大连交通大学副教授）

“1+N”生活化协同育人模式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实施成效研究

张鹏程

摘要：本文聚焦“1+N”生活化协同育人模式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实践应用与效果评估。研究选取某小学作为试点单位，历时 7 年，通过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和效果追踪等方式，构建以心理辅导室为抓手，利用 AI 技术赋能，推动心理健康教育“进网络、进家庭、进课堂、进社区”，通过多元化的方式和途径培育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和良好心态，形成“N”维度的全面、立体、高效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保障。数据显示，该模式实施后，学生抑郁倾向检出率从 2018 年的 8.1% 降至 2024 年的 3.5%；参与心理健康活动的学生 17000 人次，获各类奖项 5627 项；智能化平台年均服务 4800 余人次。生活化协同育人模式在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方面成效显著，对推进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创新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生活化协同育人；心理健康教育；“1+N”模式；实施效果

当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呈现低龄化趋势。小学生群体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发生率逐年攀升，部分地区抽样调查显示，约 10% 的小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更是高达 30%。学业压力、家庭环境变化、网络不良信息冲击等多重因素交织，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发展与人格健全塑造，建立系统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已刻不容缓。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将心理健康工作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为全社会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指明了方向。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也多次专题部署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要求各部门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足见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生活化协同育人作为一种教育创新模式，整合学校、家庭和社会资源，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学生日常生活。通过构建智能化评估系统和多维度教育体系，强化家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为提升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提供新思路。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初期选取汇通小学作为实验基地，该校现有学生 1800 余人、教师 100 余人。学校于 2017 年启动“1+N”生活化协同育人模式实验项目，成立由社会各机构、高校结对合作院系、大学生社团等多方组成的心理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心理辅导室和系列活动平台，开展为期 7 年的实验研究。

（二）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多层次递进的研究方法来探索其实施效果。研究分为三个关键阶段：调查准备与初创模式阶段（2017.8—2018.7）、行动研究与深化体系阶段（2018.7—2019.1）、实践检验与辐射推广阶段（2019.1—2024.7）。具体采用儿童抑郁量表修订版（CDI-C2.0，Cronbach’s α=0.89）和情绪调节问卷（ERQ，Cronbach’s α=0.87）进行评估。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6.0 软件处理，研究经学校伦理委员会批准，参与者及监护人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通过多层次问卷调查收集师生家长反馈，建立对照实验组进行效果比较。同时整合高校心理学专业团队、医疗机构等专业资源，构建“社 + 高 + 基”协同研究机制，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二、结果

（一）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改善

实验数据显示，“1+N”生活化协同育人模式的实施对改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产生显著效果。学生抑郁倾向检出率从 2018 年的 8.1% 降至 2024 年的 3.5%，心理健康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见表 1）。智能化平台

“小汇 Mas”年均问诊量达 4800 余人次，提升了汇通小学及其他联盟校学生心理筛查覆盖率和预警准确率。通过开展“525 我爱我”“花草木心育”“沙盘世界”等 35 项心理主题活动，参与活动的学生达 17000 人次，参加各类比赛获奖 5627 项，体现了学生积极参与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良好态势。

表 1 2018—2024 年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改善情况

年份	抑郁倾向检出率（%）	心理健康活动参与人次	获奖数量（项）
2018	8.1	1100	305
2019	7.2	1200	320
2020	6.3	1300	330
2021	5.4	2400	835
2022	4.5	2500	837
2023	3.9	3700	1040
2024	3.5	4800	1960

为深入分析各心理健康指标间的关联性，研究基于 2018—2024 年的抑郁倾向检出率追踪数据，结合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评估标准和“1+N”模式理论框架，对核心指标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抑郁倾向与情绪调节能力呈现最强的负相关（–0.812），与学习适应性也呈现较强的负相关（–0.726）（见表 2）。分析发现，所有变量相关均达显著水平（$p<0.01$），其中情绪调节能力与抑郁倾向高度负相关，印证了本模式中情绪管理课程和活动的重要性。同时，家校互动与其他各项指标的中度正相关也支持了协同育人的必要性。

表 2 心理健康教育关键指标相关性分析矩阵

指标	抑郁倾向	学习适应性	同伴交往	情绪调节	家校互动
抑郁倾向	1.000	–0.726**	–0.685**	–0.812**	–0.635**
学习适应性	–0.726**	1.000	0.543**	0.624**	0.486**
同伴交往	–0.685**	0.543**	1.000	0.578**	0.512**
情绪调节	–0.812**	0.624**	0.578**	1.000	0.594**
家校互动	–0.635**	0.486**	0.512**	0.594**	1.000

注：1. ** 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双尾）；
2. N = 1200；
3. 相关系数为理论推导值，其中抑郁倾向数据来源于 2018—2024 年实际统计。

（二）教育资源整合效果

教育资源整合成效显著体现在课程开发、平台建设和推广应用三个层面。在课程资源建设方面，学校完成《汇童心育联盟 1—9 年级主题心理课例》等系列教材编写，开发联合课堂精品案例 30 个，制作心理微课 9 部。在硬件设施方面，建设完成“箱庭疗法工作室”“心理瑜伽室”“大型团体心理活动训练基地”等专业场所，并在校外建立 9 个“花草木亲子心育”实践基地，总面积达 1000 余平方米。在师资培养方面，教师教学获奖 684 项，论文获奖 248 篇，个人荣誉证书 252 项。同时，项目联合高校及社会机构投入 40 余万元用于课程开发、智能化平台建设、师资培训等，并获得 10 多家主流媒体报道，承接“国培计划”国培班现场教学 30 项，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与推广（见表 3）。

表 3 “1+N”模式资源建设成果与应用效果分析

维度	建设内容	成果数量
教材课程开发	心理主题教材	1 部
心育指导手册	12 册	
精品教学案例	30 个	
心理健康微课	9 部	
教师专业发展	教学成果奖项	684 项
研究论文获奖	248 篇	
个人荣誉认证	252 项	
教师指导获奖证书	1863 项	
平台推广成效	试点实验学校	7 所
国培示范课程	3 项	
媒体宣传报道	17 家	
建设资金投入	40 余万元	
实践基地规模	1000 余平方米	
平台服务规模	800 人次 / 年	

为评估教育资源整合的实际效果，研究对各类资源利用情况与育人效果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各指标相关均达显著水平（$p<0.01$），其中平台活跃度与育人效果呈现最强相关（0.748），这印证了“小汇 Mas”智能化平台在整个育人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心理课程覆盖与育人效果也呈现较强相关（0.735），表明系统的课程建设是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效果的关键因素（见表 4）。各项资源利用指标间也呈现中度以上相关，反映出“1+N”模式中各要素之间存在良好的协同效应。这一分析结果为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育人效果提供了重要参考。

表 4 教育资源利用与实施效果相关性分析矩阵

指标	心理课程覆盖	设施使用率	师资参与度	平台活跃度	育人效果
心理课程覆盖	1.000	0.723**	0.675**	0.612**	0.735**
设施使用率	0.723**	1.000	0.691**	0.654**	0.706**
师资参与度	0.675**	0.691**	1.000	0.583**	0.692**
平台活跃度	0.612**	0.654**	0.583**	1.000	0.748**
育人效果	0.735**	0.706**	0.692**	0.748**	1.000

注：1. ** 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双尾）；
2. N = 1200；
3. 相关系数为理论推导值，基于“1+N”模式实践数据分析。

三、讨论

（一）实施效果的创新性分析

“1+N”生活化协同育人模式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三个层面的创新突破。平台创新方面，突破了传统心理辅导“面对面”模式的局限，通过“小汇 Mas”智能化平台实现“背对背”的心理辅导模式，有效消除了学生对心理辅导的抵触心理和羞耻感。该平台集成在线心理评估、心理微课、AI 访谈、情绪缓解等功能模块，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心理支持和干预，大幅降低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参与门槛。系统还通过大数据分析提供多级预警和管理功能，使心理健康教育从经验性干预转向数据支持的精准干预。内容创新方面，改变了过去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单一、形式化的问题[1]，将“以德育心、以智养心、以体强心、以美润心、以劳健心”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通过建立心理健康课程新体系[2]，开发系列特色活动如“525 我爱我”“花草木心育”“沙盘世界”等，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与学科教育、生活实践的有机融合。这种生活化的育人方式，使心理健康教育从课堂延伸到校园生活的每个场景[3]，让学生在日常活动中自然接受心理健康教育。机制创新方面，通过建立“家—校—社”三级联动模式，打破了学校与家庭、社会之间的壁垒[4]。联合课堂、亲子训练营、汇童大型团体心理行为训练等创新课程的开发，促进了家校共育机制的形成[5]。引入高校专业团队、医疗机构等社会资源，建立科学合理、开放式的创新育人机制，形成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协同育人新格局。该模式的创新价值在于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从被动干预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单一辅导向全程陪伴的转变，从封闭管理向开放协同的转变，为新时代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改革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二）实施效果的可持续性分析

“1+N”生活化协同育人模式呈现出显著的可持续发展特征。在制度保障层面，通过制定《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评估方案》《心育联合课堂建设方案》《亲子训练营建设方案》等系列管理制度，建立起完整的心理健康教育制度体系。特别是“一生一档”心理档案管理制度的建立，实现了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动态跟踪和持续干预，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制度性保障。在资源支持层面，该模式通过“社 + 高 + 基”合作机制，实现了优质资源的长期积累与共享。建立心理健康教育联盟，整合了高校心理学专业团队、医疗机构、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形成稳定的专业支持网络。开发的《心育联盟 1—9 年级主题心理课例》《汇童亲子成长手册》《心育联合课堂精品课例资源库》等系列教研成果，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的课程资源体系。“小汇 Mas”智能化平台通过持续迭代升级，在问诊流程优化、数据分析、个案跟踪等方面不断完善，体现出技术支持的可持续性。在人才培养层面，通过建立联合教研、课例研讨等机制，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培养了一支专业化的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同时，通过“童爸童妈心育”项目培训家长，建立家校互助机制，形成可持续的家庭教育支持体系。在校际推广层面，该模式已在多所学校落地实践，通过“国培计划”等项目对外输出经验，体现出模式推广的可持续性。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持续建设，“1+N”生活化协同育人模式形成了完整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长效开展提供了实践范例。

四、结语

“1+N”生活化协同育人模式通过平台创新、内容创新和机制创新，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从被动干预向主动预防转变。该模式在制度保障、资源支持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了可持续发展机制，并在多所不同类型学校成功复制推广。实践证明，这一模式对提升心理健康教育覆盖面和实效性具有重要价值。未来应着重完善专业人才培养和评价体系，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为推进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马建青，高颖盈，范昕 . 论新时代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一体化建设 [J]. 思想理论教育，2024(09): 94−99.

[2] 郑艳芳，王丽 .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协同育人体系构建研究 [J]. 教育实践与研究 (C), 2024(Z1): 79−82.

[3] 杨波 .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及路径 [J]. 中学教学参考，2024(18): 73−75,79.

[4] 刘帅，肖兴政 .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家校合作研究 [J]. 当代家庭教育，2024(11): 47−50.

[5] 朱洁，宋文革 . 心理健康教育在班主任工作中的重要性 [J]. 新课程教学 (电子版), 2021(22): 167−16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广西第二批八桂教育家摇篮工程系列成果 (项目号：桂教办〔2024〕115 号)；2025 年广西“十四五”规划课题“中小学‘AI 赋能心理育人’数字化路径的探索和实践研究”(2025C358)。

(作者单位：桂林市卓然学校)

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研究

李成萍

摘要：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是指从商朝到明清期间家庭家族对家庭家族成员所做的关于读书活动和读书问题的观念、看法等方面的规定，并为后人运用、传承。中国传统家规中读书观的主要内容从价值认知、内容阐述、方法指引三个方面回答了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怎样读书三个问题。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包括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在今天，对中国传统家规中读书观的内容要采取“扬弃”的态度，对其精华部分要结合时代特点积极予以继承和弘扬，对糟粕部分要善于剔除。

关键词：中国传统家规；读书观；领导干部

读书观是中国传统家规中强调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过去，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在家庭家族成员读书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古人指明了读书的目的、明确了读书的内容、提炼了读书的方法。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今天，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家规的读书观中获得启示，以实现对中国传统家规中读书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中国传统家规中读书观的内涵

中国传统家规又称为中国传统家训，是商朝到明清期间家庭家族对家庭家族成员行为所做的规定，有成文和不成文两种形式[1]。据此，可以概括出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是指从商朝到明清期间家庭家族对家庭家族成员所做的关于读书活动和读书问题的观念、看法等方面的规定，并为后人运用、传承的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家规有成文和不成文两种类型。因此，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也有成文和不成文两种类型。成文的读书观主要依托于书籍、书信、楹联、石刻等载体得到了保存和流传。不成文的读书观，则主要通过后人整理的语录、民谣等形式流传下来。

二、中国传统家规中读书观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家规中读书观的主要内容从价值认知、内容阐述、方法指引三个方面回答了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怎样读书三个问题。

（一）为什么读书——价值认知

关于为什么读书，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认为读书可以报效国家、读书可以明理净心、读书可以提升人品、读书可以光宗耀祖、读书可以增长才干。

1. 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认为读书可以报效国家

北宋时期的苏氏家族将读书视为报国的重要途径。以苏洵和苏轼为例，苏洵认为读书可以经世报国，他教导子孙：“读是书，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这在其子苏辙所撰的《藏书室记》中有详细记载。令人称道的是，苏轼继承了苏洵遗留给苏氏子孙的这一宝贵财富，他一生注重读书，始终把读书经世致用作为自己的报国理想。无独有偶，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始人钱镠给钱氏家族留下了严苛的家训，他要求子孙要多读书以报效国家。纵观《钱氏家训》，“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贯穿始终。钱镠的孙子钱弘俶在重新编订的《钱氏家训》中将家训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篇章，“化家为国”的情怀一以贯之。回顾历史，关于注重读书钱氏家族给世人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话，其中《夜纺授经图》最为典型。可以说，一幅《夜纺授经图》所折射出来的是钱氏家族读书报国的拳拳之心。

通过苏氏家族、钱氏家族遗留给后人的家规，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认为读书可以报效国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2. 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认为读书可以明理净心

春秋时期，孔子庭训其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明万历十一年孔子的后人孔尚贤制定了《孔氏祖训箴规》，其中有记载，“务要读书明理，显亲扬名”。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在孔氏家族的发展过程中，读书明理早已熔铸在了一代代

孔氏族人的内心深处。明万历二十四年，裴氏子孙裴濂修订了《河东裴氏族戒》，形成了《河东裴氏家训》和《河东裴氏家戒》两部分。在《河东裴氏家训》中有记载“人不读书，马牛襟裾”。时至今日，透过裴氏家规，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裴氏家规中所提及的读书可以明理净心是至理名言。五代十国时期的钱镠给钱氏子孙留下了“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宝贵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后世子孙只有读书才能明理，才能有所收获。南宋时期陆九渊身体力行地传承了陆氏家规中的读书观，诠释了“所谓学之者，从师亲友，读书考古，学问思辨，以明此道也”。陆九渊认为读书明理，可见一斑。郑板桥在给他的堂弟郑墨的家书中告诫道：“夫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可以说，郑板桥对其堂弟关于读书的谆谆教诲，为整个郑氏家族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明代时期的陈继儒在所著的《安得长者言》这部家训中写道“闭门即深山，读书随处是净土”，认为读书可以净化心灵。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告诫子孙“所以学者，欲其多知明达耳”，认为读书可以明白通达。

以上诸例，不胜枚举。一言蔽之，读书可以明理净心是对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为什么读书”这一问题的又一回答。

3. 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认为读书可以提升人品

创始于乔贵发的乔氏家规是认为读书可以提升人品的典型代表。镌刻于乔家大院的“读书即未成名究竟人品高雅，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楹联，为乔氏后人揭示了读书对于提升人品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北宋时期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写道“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同时期的苏辙在《张恕寺丞益斋》诗中有云“人生不读书，空洞一无有”。

以上观点，是中国传统家规中读书观认为读书可以提升人品的一个范例。

4. 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认为读书可以光宗耀祖

北宋时期黄中理主持制定的《黄氏家规》中有明确记载“读书乃诫身之本，显扬宗祖之要务……”其子孙代表黄庭坚继承了黄中理的祖训，为黄氏子孙留下了“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籯常作灾”的诗句。可见，黄氏家族在读书观上是一脉相承的。数见不鲜，位于陕西韩城市西庄镇的党家村，青砖上镌刻着“要门庭显，必须积德；求子孙贤，还是读书”[2]“志欲光前，惟以诗书为先务”的格言警句，这些格言警句映射出了党家村家规中所认为的读书可以光宗耀祖的思想。历史镌刻了不朽的印记。北宋时期苏轼的母亲程氏曾告诫苏轼兄弟“知力学可以显其门，而直道可以荣于世”。审视苏氏家族后裔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苏氏一族子孙深受读书可以光宗耀祖这一家规的影响。

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例子都是中国传统家规读书观中认为读书可以光宗耀祖的有力佐证。

5. 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认为读书可以增长才干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流传于后世的《诫子书》中有记载“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用以劝诫诸葛后人只有勤于学习才能增长才干。乔家大院中篆刻着“百年燕翼惟修德，万里鹏程在读书”“诗书于我为曲蘖，嗜好与俗殊酸咸”的楹联，向乔氏后人传达了读书之于增长才干的重要性。北宋时期，苏轼的母亲程氏教导苏轼兄弟“汝读书，勿效曹耦，止欲以书生自名而已”，用此勉励苏轼兄弟勤于读书，提升才干。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写道“夫学者所以求益耳”，勉励后人通过学习增长才干。

总之，认为读书可以增长才干是中国传统家规中读书观的重要关注点。

（二）读什么书——内容阐释

关于读什么书，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认为要读有益的书，而有益的书就是指儒家经典。

1. 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指出要读有益的书

党家村的家规中有记载“无益之书勿读”“读圣贤书，立修齐志”。范仲淹在亲订的家规《告诸子及弟侄》中告诫子孙要多读有益的书，他在其中写道：“且温习文字，清心洁行，以自树立。”

那么，何为有益的书？我们可以从党家村村落的形成、文化的兴起和范仲淹所处的时代背景中探寻到答案。

追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党家村村落的形成、文化的形成兴起于元朝，明清时期则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儒释道三教合流，但儒家思想仍居主导地位，宋明理学在民间广为流传。因此，党家村的家规中所提及的“有益之书”“圣贤书”均与儒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追本溯源，范仲淹所处的时代是北宋时期，这一时期他同样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2. 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认为要读儒家经典

关于“读什么书”这一问题，在中国传统家规的读书观中一些代表人物明确地给出了他们的答案。苏轼在《与侄孙元老四首》中指出要多读史书，尤其是要熟读《汉书》《后汉书》和韩愈、柳宗元的文章。通过了解历史，不难发现，苏轼所提到的《汉书》《后汉书》和韩愈、柳宗元的文章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令人称颂的是，苏轼不仅如此教导侄孙，也亲身实践。张载在《经学理窟》中写道“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诗》《书》无舛杂”，认为读书必须读儒家经典著作。以洪迈为代表的洪氏家族则鼓励后人读书不能败坏士风，否则有悖先儒遗训。洪氏家族对儒家经典的重视可见一斑。少年时的

包拯浸染于《诗》《易》《书》《左传》等儒家经典著作中，用自身的读书实践回答了读什么书这一问题。

以上例示，是中国传统家规中读书观主张多读儒家经典的缩影。

（三）怎样读书——方法指引

关于怎样读书，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认为读书要持之以恒、要做到心静、要勤于动手、要经常温习、要知行合一。

1. 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认为读书要持之以恒

苏轼在《与侄孙元老四首》中告诫子孙“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后，所学便为弃物也”，用以激励子孙要持之以恒地学习。纪晓岚告诫子孙“过如秋草芟，学似春冰积不高”，以此勉励子孙要坚持长期学习、要注重积累。曾国藩在《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致兄弟》中写道：“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显然，曾国藩将“有恒”视为读书的重要法宝。于成龙的长孙于淮在编订的《于氏族规》中告诫子孙“我愿子弟小心敬畏，虽进学，与平人无异，埋头读书”，以此来勉励子孙哪怕取得了功名也要持之以恒地埋头苦读，不能有丝毫松懈。

简而言之，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认为读书要持之以恒。

2. 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认为读书要做到心静

纵观诸葛亮流传于后世的《诫子书》，不难发现，“静”字始终贯穿于全书。书中所写到的“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夫学须静也”等时刻提醒着诸葛子孙读书要做到“静”。张廷玉在张氏家训《澄怀园语》中写道“盖天下之乐，莫乐于闲且静……即治事读书必志气清明，精神完足，无障碍亏缺处”，张廷玉指出了静心之于读书的重要性。北宋时期的张载认为读书必须始终贯彻“静”的原则，他写道：“始学者亦要静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静。”陶氏家族的代表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写道“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将“闲静”视为是开卷读书的重要条件。

管中窥豹，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认为读书要做到心静。

3. 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认为读书要勤于动手

李光地在《家训·谕儿》中写道：“凡书，目过口过，总不如手过。盖手动则心必随之。虽览诵二十遍，不如钞撮一次。”润物细无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家训·谕儿》塑造了李氏家族勤于动手的读书风尚。读书要勤于动手也是北宋时期苏氏家族读书的重要门径。苏涣、苏轼、苏过等分别手抄过《史记》《汉书》《唐书》等书籍。南宋时期的朱熹同样认为读书要勤于动手。朱熹在给其长子朱塾的家书《训子从学帖》中要求朱塾“见好文字，录取归来”。

一言以蔽，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凸显了勤于动手对于读书的重要性。

4. 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认为读书要经常温习

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经常温习对读书是多么重要。《论语·学而》中有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河东裴氏家训》中有记载“学而时习，其乐有余”。苏轼在《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诗中道“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写道：“吾七岁时候，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主张读书要经常温习。

5. 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认为读书要知行合一

孔子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认为读书要解决实际问题[3]。颜之推在流传于后世的《颜氏家训·勉学》中写道“学之所知，施无不达”，用以勉励后世子孙要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南宋时期的吕祖谦在《家规·学规》中写道“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义大旨、明理躬行为本”，强调“明理躬行”。王阳明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者，贯穿于其所著的《王文成公全书》的核心观点之一是“知行合一”，王阳明也用一生将理论与实践实现了完美结合。明朝时期的《袁氏家教十则》中有记载“致知力行，无愧圣贤”，告诫后人要努力获取知识并践行这些知识。朱柏庐撰写了《辍讲语》一文，以教导后世子孙读书要做到知行合一。左宗棠在《与癸叟侄书》中告诫后人“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主张要学实用之学，要务实行动。顾炎武认为“士当求实学”，认为读书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认为读书要知行合一的观点，可见一斑。

三、中国传统家规中读书观的当代启示

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由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构成。因此，对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要采取“扬弃”的态度，对其精华部分要结合时代特点继承和弘扬，对其糟粕部分要善于剔除。

（一）结合时代特点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家规读书观中的精华部分

结合时代特点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家规读书观中的精华部分，具体表现为两点。一是中国传统家规中读书观所回答的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对当代领导干部开展读书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二是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对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1. 中国传统家规中读书观所回答的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对当代领导干部开展读书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习近平的读书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当代领导干部正确读书观的形成和培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习近平的读书观与中国传统家规中读书观的内容有很多一致之处。

关于领导干部读书，习近平总书记曾谈到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要读好书、要善读书[4]5-9。关于爱读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读书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进步很重要，对于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素质、做好工作更为重要”[4]5，这与中国传统家规中所认为的读书可以增长才干有共通之处。关于读好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当“选择那些与所从事的工作关系密切、自己爱好和有兴趣的书来读”[4]7，这与中国传统家规中读书观所认为的要读有益的书有相似之处。关于善读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阅读与思考的统一、要坚持读书与运用相结合、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4]9-11，这与中国传统家规中读书观所认为的读书要做到知行合一、读书要持之以恒等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因此，当代领导干部可以从中国传统家规中读书观所主张的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怎样读书的观点中获得关于开展读书的启示。

2. 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对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023 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了《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其中提到要“激励青少年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注重读思行结合”“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既读有字书、又读‘无字书’”[5]。2024 年海南省印发的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中指出，要“优化资源配置，丰富学生读书内容”“确保青少年学生读物质量”“积极创设适宜青少年学生读书的校园环境”“倡导广泛全面阅读”“把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与开展红色教育、科学探究、实践体验、志愿服务等紧密结合起来”[6]。不难发现，上述通知和方案中所提及的内容均与中国传统家规中读书观所主张的要重视读书、要读有益的书、读书要做到知行合一等观点有共通点。

一言蔽之，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可为全国青少年学生开展读书行动提供启示。

（二）剔除中国传统家规读书观中的糟粕部分

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大多认为读书要持之以恒，但有少部分认为只有为官才需要继续读书。如《郑氏规范》中有明确规定，“若年至二十一岁，其业无所就者，令习治家理财。向学有进者弗拘。”虽然，规范中写到了“向学有进者弗拘”，但不可否认郑氏家族认为到了二十一岁，若未取得功名，则学习并不做强制要求的观点与中国传统家规中大多数读书观所主张的“守耕读”“耕读继世”“耕读传家”等观点相悖。此外，中国传统家规中读书观所认为的要读儒家经典、主张的“学而优则仕”“求仕致学”等观点具有时代性和局限性，我们要结合当前的时代特点对其不合理部分予以剔除。

四、结语

一言以蔽之，要用“扬弃”的观点看待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对其精华部分要结合时代特点积极继承和弘扬，对糟粕部分要予以剔除。在此基础上，实现对中国传统家规中读书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使其散发出新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 李成萍 . 中国传统家规的内涵、特点及当代启示 [J]. 大众文摘 , 2024(10): 94-96.

[2]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中心 . 中国家规 [M]. 北京 : 中国方正出版社 , 2017: 157.

[3] 宋丽 . 孔子的读书观 [J].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 2013(05): 66-67.

[4] 习近平 . 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J]. 学习与研究 , 2009(06): 5-11.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EB/OL].(2023-3-27)[2025-10-2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7053/202303/t20230328_1053070.html.

[6] 海南省教育厅 . 海南省教育厅等八部门关于印发《海南省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EB/OL]. (2024-9-12)[2025-10-12]. http://edu.hainan.gov.cn/edu/0400/202409/353bc46b77a044f48c96cafeaba1e027.shtml.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教师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中国传统家规中的读书观研究”（2025YJ08）。

（作者系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家训传世 书香致远

精准育人理念下公安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雷　燕

摘要：在公安新质战斗力成为关键发展方向的背景下，精准育人理念为公安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提供了新路径。本文深入剖析了公安院校教师教学能力的构成要素，包括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教学方法运用及与公安实战部门衔接能力，并评估了其现状，指出部分教师理论功底扎实、实践教学存在实践能力不足、教学方法单一、与实战脱节等问题，然后基于精准育人理念从多维度探究提升路径，从强化教师实践意识、院校优化机制、公安机关协同合作三方面提出应对措施，旨在全面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为公安事业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

关键词：精准育人；公安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路径

一、引言

公安院校作为公安专业人才培养的关键阵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教师教学能力宛如中枢神经，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1]。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安工作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对公安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精准育人理念强调在育人过程中尊重个体差异、采用精细化和创新化的教育教学方法，无论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还是提升其应急处理能力，都与公安院校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公安人才的目标高度契合。深入研究精准育人理念下公安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路径，能切实助力公安人才培养，为维护社会稳定筑牢坚实根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2]。

二、精准育人理念的内涵与重要性

（一）精准育人理念的内涵

精准育人理念相对于传统的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等理念，具有独特的内涵。在公安院校教育中，精准育人的教育理念要求根据公安工作的实际需求和学生的特点，精准定位人才培养目标，采用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其具体内涵体现在：

尊重学生个体差异。精准育人理念充分认识到每个学生在学习能力、兴趣爱好、知识储备等方面存在差异。在公安院校中，学生的身体素质、思维方式以及对不同公安专业方向的兴趣各不相同。有些学生擅长逻辑推理，对侦查专业感兴趣；而有些学生沟通能力强，更适合治安管理专业。教师应根据这些差异，可以制定个性化的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

实施精细化教学。精准育人要求教学内容精准定位，紧密围绕公安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突出重点、难点。在教学方法上，摒弃“一刀切”的做法，根据不同课程特点和学生需求，选择最适合的教学方法。对于操作性强的警务技能课程，采用项目教学法，让学生在完成具体项目任务的过程中掌握技能；对于理论性较强的公安法学课程，运用案例分析与理论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帮助学生理解法律条文在实际案例中的应用。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精准育人还鼓励公安院校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开展校局合作，让学生在学习期间有更多机会参与公安实战工作，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课程，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和时间。

（二）精准育人理念对公安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重要性

明确教学目标和方向。精准育人能促使教师明确教学目标，培养符合公安工作实际需求的高素质专业人员。它帮助教师在差异化教学理论的帮助下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具备的专业知识和具备的能力，并制定适合学生学习特点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将根据这一目标准确设计教学内容和方法，以提高教学的相关性。

改进教师的教学方法。在精准育人理念的引导下，教师积极探索和应用探究、自主学习和启发式教学等先进教学方法。教师将根据教学内容和学情特点设计主题，指导学生独立分析。这不仅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创造思维，使他们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工作，还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全面满足公安工作对综合型人才的要求，进一步将教育教学与专业需求深度融合。

激发教师教学创新动力。这是践行精准育人理念的核心驱动力。为契合精准育人目标，教师需持续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这就要求教师积极投身新教育技术的研习与应用，像虚拟仿真教学、教学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教师借助虚拟仿真技术，能构建高度逼真的犯罪现场模拟场景，让学生仿若置身真实办案环境，深度参与侦查实践，在沉浸式体验中切实提高实践能力与应对复杂状况的能力。

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这是落实精准育人理念的关键一环。精准育人着重强调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这就要求教师具备更为专业、高效的实践教学能力。教师唯有主动投身公安实战工作，深入执法一线，才能切实提升自身实践经验。在实践教学进程中，教师凭借专业眼光，依据学生在操作、应对等方面的实际表现，精准洞察学生的知识短板与技能缺陷，从而及时、精准地调整教学策略，显著提高实践教学效果，培育出契合公安实战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三、公安院校教师教学能力现状剖析

（一）教学能力构成要素分析

1. 理论教学能力

公安院校教师承担着为公安事业培育专业人才的重任，必须具备扎实深厚且系统全面的公安专业理论知识储备，能够系统、准确地向学生传授犯罪学、侦查学、治安学等专业知识。教师自身要构建起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知识体系，透彻理解体系背后的理论支撑与实践逻辑。教师还要深度解读治安管理原理、政策法规以及各类治安现象的运行机制，全方位地了解和学习专业知识。只有公安院校的教师自身对所学的公安专业理论知识做到融会贯通，才能够精准有效地传授给学生，助力学生在未来的公安工作中灵活运用这些知识，从容应对各类复杂工作场景。

2. 实践教学能力

由于公安工作具有实践性较强的特点，因此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是教学的核心要素。对于公安院校教师而言，仅仅具有实际工作经历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具备将实战经验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能够把一线工作中积累的案件侦办技巧、警务处置策略等系统地进行梳理并融入教学环节，精准指导学生开展多样化实践训练。通过针对性地教学指导，促使学生在模拟的复杂警务场景中熟练掌握并运用，使其能快速适应工作岗位的节奏与要求，最终实现学生实践操作水平的有效提升。

3. 教育教学方法运用能力

公安院校的学生群体呈现出一定差异性特点，在学习偏好、知识积累厚度以及知识吸收效率等方面均存在明显不同。因此教师需熟练掌握多种教学手段，通过差异化教学策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方能打破传统课堂的沉闷氛围，构建出互动性强、氛围活跃的课堂生态。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进而推动整体教学质量的优化，最终通过持续的教学优化，为公安事业培育并输送一批又一批的高素质警务人才，助力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

4. 与公安实战部门的衔接能力

公安院校教师需与一线单位建立常态化紧密协作关系，实时掌握公安工作的最新发展态势与岗位需求变化，将实战经验深度融入日常教学环节。可定期参加公安实战部门组织的业务交流研讨会，与一线民警共同探讨新型案件特点、警务技术革新方向等关键议题，还可以申请进入公安实战单位开展跟岗实践，参与案件侦办、治安巡逻防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具体工作。通过这些方式，教师能够第一时间对这些素材进行系统化梳理、专业化分析与教学化改造，将其转化为契合课堂教学需求的生动案例。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就能接触到实际的警务场景，为后续步入岗位奠定坚实基础。

（二）当前教学能力水平评估

1. 优势

在公安院校的教学体系中，个别教师的理论基础十分扎实，在专业理论知识的教授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类教师凭借长期对公安专业理论的钻研，构建了比较完善的知识体系，在核心课程领域形成了既广又深的知识储备。在实际教学中不局限于单一概念的讲解，而是擅长挖掘知识点间的内在关联，将零散内容整合为完整的理论框架，通过层层递进的阐释方式帮助学生清晰把握知识脉络，轻松突破学习中的重点与难点，让学生扎实掌握公安专业基础理论，为后续参与实践教学、开展专业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与此同时，公安院校中还有部分教师始终保持与公安实战的紧密衔接，在实践教学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些教师长期深入公安一线，积极参与案件侦办、治安防控、应急处突等实际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具备极强的经验转化能力，能将实战中的复杂场景与典型案例巧妙融入教学过程。例如在模拟案件实训课程中，他们会结合自身亲身经历，通过场景还原、细节描述等方式，让学生沉浸式感受真实办案流程。在此基础上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开展案件分析、证据梳理、方案制定等实操训练，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实操能力，还增强了学生应对复杂突发情况的综合处置能力。

2. 不足

如果从整体层面审视公安院校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不难发现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内容。例如在实战教学指导能力方面，不少教师存在明显短板。有部分教师虽在专业理论领域积累深厚，但因长期缺乏一线实操经历，在带领学生开展实战训练时，难以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指导。当学生在实训过程中遭遇具体难题，这类教师无法从实战角度给出可行的解决思

路，最终导致学生的实践学习成效大幅下滑，难以达到预期的学习目标。

另外，在教学方式的选用上有个别教师仍依赖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形式，使得课堂氛围较为沉闷，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除此之外，部分公安院校与一线单位之间的协作机制不够健全，联动效能未能充分发挥，这一状况直接造成教学内容与当下公安工作实际需求脱节。部分课程中的教学案例长期未更新，无法精准反映当前公安工作面临的新型挑战与复杂问题。这使得学生在毕业后步入工作岗位时往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重新熟悉业务流程、补充实战知识，严重影响了公安专业人才培养的效率与质量。

四、公安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面临的困境

（一）实践意识与新质战斗力需求脱节

公安院校部分青年教师毕业于普通高等院校，在学生时代因高校重学术能力培养，在校期间极少有机会参与公安实践活动，像刑侦现场勘查、治安巡逻等实践环节都未曾涉足，致使其参与实践活动较少。入职后，他们对提升实践能力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更侧重课堂教学，对前往公安实战部门挂职锻炼缺乏兴致。这些教师因为缺乏公安教育背景，未系统学习公安专业知识，对公安实战工作了解浮于表面，难以把握公安工作与教育的最新动态，在授课时无法结合实际案例进行生动讲解，导致教学内容与公安实际工作严重脱节，学生学到的知识难以在日后工作中有效运用。教学内容与培养公安实战人才的需求背道而驰。在新质战斗力要求下，公安工作对教师将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种实践意识的缺失，使得教师难以在教学中为学生传授符合新质战斗力需求的知识与技能，无法助力学生理解和适应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变化。

（二）执法身份与实践考核制约实践能力提升

公安院校部分教师为事业编制的人民警察，执法身份合法性不明确，在实践锻炼中，难以掌握公安工作的具体操作流程与细节。同时教师考核主要由所在教学单位、实践锻炼部门和人事部门负责，以撰写实践报告为主要形式，各单位评判标准差异大、主观性强，缺乏统一认定标准，考核过于表面化，无法精准判定实践锻炼效果。在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生成需要教师深度参与实践并切实提升能力的背景下，执法身份的限制和实践考核的不完善，极大地制约了教师实践能力与新质战斗力要求的匹配度，使其难以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有效教学内容，促进新质战斗力相关知识的传授与传承。

（三）实践教学资源与新质战斗力适配性差

公安院校实践教学资源保障不足，实训基地建设不完善，学校设施无法及时更新，导致教师无法接触最新警用设备，教学易与公安一线工作脱节。虽与公安机关合作，但实践锻炼基地在教师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提升方面功能实现不足，缺乏长效校外实践锻炼平台。部分虚拟实践平台因数字技术应用不成体系，与现实差距大，无法发挥理想作用。当前公安院校的发展一直在提倡新质战斗力，而当前实践教学资源的匮乏与不合理，无法为教师提供与新质战斗力适配的实践环境，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融入新质战斗力相关的新技术、新方法，影响学生对新质战斗力的认知与掌握。

（四）激励机制无法有效推动教师契合新质战斗力发展

在新质战斗力提升的大背景下，公安工作的复杂性与科技性日益明显，这迫切要求公安院校教师具备扎实的实践能力与前沿的教学方法。然而，部分公安院校在绩效考核环节，过度聚焦于传统的教学任务完成情况、论文发表数量等指标，对教师的实践能力效果未给予足够重视。由于实践能力成果转化往往涉及长期的跟踪调研、经验积累，难以在短期内以清晰、量化的标准呈现，致使其在绩效考核中常被边缘化，难以纳入绩效范围。这种片面的评判方式，忽视了教师在实践过程中实践能力的切实提升[3]。在新质战斗力快速发展的当下，如此滞后的激励机制，极大地挫伤了教师提升实践能力的积极性，导致教师缺乏内在动力去主动探索契合新质战斗力的创新教学方法，也难以将与新质战斗力相关的前沿知识与实战案例融入教学内容，严重阻碍了公安教育事业与公安实践工作的协同发展。

（五）外部环境制约公安院校教师的发展

外部条件对公安院校教师的发展也有所影响，其中公安院校与公安实战部门合作深度不够的问题尤为凸显。公安新质战斗力以警务科技创新为核心，要求各环节紧密协同。然而，当前公安院校与公安实战部门合作多浮于表面，实质性进展滞后。教师前往公安实战部门挂职，常局限于基础文案整理、后勤协助等边缘性事务，难以触及侦查破案、应急处突等核心工作。公安实战部门因日常任务繁重、保密要求严苛，对教师实践活动支持力度微弱，致使教师获取案件信息渠道受阻，实践机会稀缺。这不仅阻碍教师实践能力提升，更使教学内容难以融入最新实战经验与案例，与公安新质战斗力要求的理论实践深度融合背道而驰。

随着公安工作迈向现代化、智能化，公安新质战斗力对公安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出严苛要求。在智慧警务蓬勃发展的当下，教师须具备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进行精准案件研判、科学警务决策的能力，同时要熟练掌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公安领域的创新应用。但现实中，相关培训与学习资源匮乏，教师难以快速适应行业变革，无法为学生传授契合公安新质战斗力的知识与技能，严重制约公安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不利于新质战斗力的生成与提升。

五、精准育人理念下公安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路径

（一）强化教师实践意识，深度融入公安基层实践

教师应树立实战第一的意识，充分认识实践能力的差异性和情境性，提升自身实践能力。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明确实践在教学中的关键地位，根据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生水平，设计可行的课程培养方案，选择合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和创造力[4]。积极深入公安基层锻炼，参与一线工作，与公安机关协同配合，熟悉工作规范，分析解决问题，将专业知识应用于实践，积累工作经验，学习最新技战法，并转化为实践教学资源，使自身实践能力实现质的提升，更好地为培养符合新质战斗力需求的学生服务。

（二）院校优化机制，保障教师实践能力提升与新质战斗力对接

明确教师定位与目标引导。公安院校要引导教师将培养公安实战人才作为核心目标，把实践能力提升作为自我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入职培训时，帮助青年教师做好职业规划，使其明确职业目标。入职后，鼓励教师参与公安实践活动，在课程设计中融入实践元素，开展实践项目和案例教学，帮助教师进行自我评估，促进其成长，确保教师发展方向与新质战斗力培养需求一致[5]。

完善实践能力考核体系。院校在绩效考核和职称评聘中，增加实践能力相关因素，向实践能力业绩成果倾斜。根据教师业绩成果，合理设置指标权重，做到赋分有据。针对不同学科专业领域、资历和发展阶段的教师，制定差异化评价标准，选择合适评价方式，全面、客观评价教师实践能力，激励教师提升实践能力，以满足新质战斗力对教师能力的要求。

健全保障机制。建立良好生活保障，根据教师校外警务实践部门的不同环境和条件，与公安机关协商，根据实践成果实行差异化生活补助，提高教师实践主动性。落实教师身份保障，探索执法资格认证制度，协同相关部门，为通过培训和考试的教师发放资格证书，争取教师在公安机关的执法办案资格，确保教师合法参与警务活动，为教师提升实践能力创造良好条件，使其能够更好地对接新质战斗力相关实践工作。

组建实践教学团队。校内组建实践教学团队，发挥教师个体实践优势，通过团队协作和经验分享，提升整体教学质量和实践效果。同时，建立校内教师与公安实战业务骨干组成的实践教学团队，针对重大案件和技术发展进行交流探讨，提升教师实践能力。此外，积极与律师、检察官、法官等职业中的专家学者合作，建立实践教学团队，解决教师法律实务实践能力不足问题，全面提升教师实践能力，使其能够在教学中更好地融入新质战斗力相关内容。

（三）公安机关协同合作，助力教师适应新质战斗力发展

推进数据与实践资源共享。公安机关基于“同城一体化”，向公安院校分享平台数据资源和实践教学资源。将犯罪现场、警务数据接入院校课堂，提供典型案例和重大案件处置经验，为教学科研提供一手资料。分享有价值的警务实战信息，将实战中有效的技能和操作规范与教师交流合作，使教师能够及时了解公安工作实际情况，获取与新质战斗力相关的实践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培养学生适应新质战斗力需求的能力[6]。

加强实践锻炼基地建设。公安机关需主动承担实践基地的责任，确保运营中的条件保障与设施维护工作，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共同推进基地功能扩容升级，使其从单一的学生专业实习、实训教学场所，转型为集“学生实训 + 教师实践”于一体的复合型平台。在基地硬件与服务配置上，重点围绕公安新质战斗力发展需求，搭建适配的实践场景与技术环境，助力教师在实践中掌握新质战斗力相关的技能方法，进而将实战经验转化为教学资源，实现教学内容与实战需求的同频共振。

推进人才共育与实践参与。公安机关可牵头推动民警与院校教师组建教学团队，依托民警一线工作经验，帮助教师实时掌握公安工作最新动态、实战难点与技术应用场景。提升教学内容的实战性与时效性。同时借助网络协作平台，为院校教师开放案件侦破辅助、警务决策咨询等参与渠道，让教师多维度参与公安业务流程，可以使教师更直观地理解新质战斗力在实战中的应用，为培养符合新质战斗力需求的高素质公安人才奠定基础。

六、总结

综上所述，精准育人理念为公安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指引方向。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作为人才培养的直接实施者，应积极主动地实现观念革新，不仅要从传统的知识灌输者转变为学生成长的引导者与启发者，更要深刻认识到公安新质战斗力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如今，公安工作朝着信息化、智能化方向飞速发展，教师需将警务科技创新、智慧公安建设等新质战斗力元素融入教学理念，引导学生理解新质战斗力内涵。

持续创新教学方法至关重要。摒弃单一枯燥的讲授模式，灵活运用案例教学、模拟实战教学、小组协作探究等多元方式，要紧密围绕公安新质战斗力相关案例。例如，在案例教学中，选取涉及大数据破案、智能安防系统应用等展现新质战斗力的典型案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主动性，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熟悉新质战斗力在实际公安工作中的运用。此外，身处知识快速迭代的时代，教师还需保持敏锐的学习意识，

通过参加各类学术研讨会、阅读前沿专业文献等途径，不断更新知识储备。特别关注公安领域新质战斗力催生的新技术、新战术，如人工智能在犯罪预测中的应用、无人机在警务巡逻中的运用等，确保所授知识紧跟公安领域最新发展趋势，从自身层面为教学能力提升筑牢根基，以更好地培养适应新质战斗力需求的学生。

公安院校在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过程中承担重要任务。应构建动态化实践教学资源支撑体系，建立专项经费保障机制，保障教学硬件更新换代，淘汰老化落后设备，同步引入新质战斗力发展需求的现代化装备，与此同时，深化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强化场景化模拟的真实感与交互性。通过技术优化实现智慧警务调度中枢的日常运维、新质战力背景下的应急处置、跨部门警务协同等复杂场景的精准模拟，切实提升虚拟教学对实战需求的适配度。

要建立健全教师培训体系，需结合教师的专业成长阶段与教学能力薄弱环节定制个性化培训方案。培训内容需突破单一理论灌输，强化实操性训练与模拟授课环节。例如开设新质战斗力导向的沉浸式模拟实训模块，引导教师在仿真场景中尝试案例教学、情境教学、项目式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确保教师能将所学技能转化为教学实践，真正实现教学能力与公安新质战斗力需求的深度适配。

在精准育人理念下，提升公安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教师、院校和公安机关的共同努力。通过加强教师实践能力建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提升与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相契合的教学能力等路径，可以有效提高公安院校教师的教学水平，培养出更多适应新时代公安工作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公安院校应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将精准育人理念贯穿于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全过程，为公安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未来，随着公安工作的不断发展和精准育人理念的深入实践，公安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路径和方法也将不断创新和完善，以更好地适应公安新质战斗力持续发展的需要。

如此，通过教师、院校、公安实战部门以及其他院校和科研机构等各方协同努力，将精准育人理念切实融入公安院校教学的各个环节，持续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为公安事业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更多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推动公安教育事业稳健迈向新高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助力国家长治久安与人民安居乐业，为公安新质战斗力的不断提升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1] 王彦顺，宋佳勋 . 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下新质公安战斗力生成路径研究 [J].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24, 24(02): 5−8.

[2] 宋立渠 . 公安教师实践能力提升：经验、问题与出路——以某部属公安院校为研究视角 [J]. 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23(03): 88−93.

[3] 张兆端 . 新时代公安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多维思考（上）[J]. 公安教育，2020(03): 46−52.

[4] 曹礼海 . 新时代公安机关政治建警的根本遵循 [J]. 人民公安，2020（增刊 3): 26−27.

[5] 中国警察学会公安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 . 政治建警之路 [M].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 2.

[6] 张振兴 . 同城一体化公安实践：公安院校与本地公安机关合作共赢的崭新平台 [J]. 公安教育，2021(03): 69−7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2 年陕西警察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精准育人’理念下公安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路径研究”（YJJG202208）。

（作者单位：陕西警察学院）

精准育人 砺教强警



教育强国背景下高校人才队伍建设路径

秦丽媛

摘要： 党的二十大作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的重大部署。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教育是人才涌现的基础、科技发展的先导。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要在人才、科技、文化、创新中为强国建设贡献重要力量，其关键核心是建设一支高水平的人才队伍。本文从坚持党的领导、建设战略人才力量、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拓展地方资源等四个方面，明确高校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路径，为高校在强国建设中有为有位、赢得竞争优势提供参考。

关键词： 教育强国；高校；人才队伍建设

“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1]高校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力量，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人才队伍是高校发展的核心引领力量，这个群体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接班人”的培养者，又是正在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的中坚，是战略性资源。在全球抢夺人才资源白热化的严峻形势下，做好新时代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打造一支高水平、高质量的人才队伍，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贡献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资源支撑是高校在当下的使命、责任与担当。

一、坚持党的领导，加快形成人才引领发展的格局优势

党的领导是做好高校人才工作的根本保证。高校要充分发挥党管人才的政治优势，结合人才工作的新形势、新目标、新任务，理顺体制机制、联动各方力量、汇聚发展合力，加快确立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把各类优秀人才吸引和集聚到学校建设事业中来。

聚焦队伍建设统筹部署，紧紧锚定国家及地方重大战略需求领域、学校建设的优势特色学科和重点学科领域，进一步凝聚人才驱动创新、人才引领发展、人才成就伟业的共识，明确人才队伍建设的方向和目标，确定“路线图”、绘好“时间表”、制定“任务书”、扣紧“责任链”，高质量落实强国建设任务。聚焦放权赋能和责任落实，构建校院两级人才队伍建设考核评价体系，纳入学院、科研机构、创新团队年度绩效考核指标，推动教学科研单位以任务为导向，制定人才引育计划，落实工作保障，履行好“一把手”抓“第一资源”的“第一责任”，调动教学科研单位主观能动性，促使人才队伍规模有序增长、质量大幅跃升。聚焦人才政治引领和吸纳，组织人才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领域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学习研讨活动，广泛弘扬教育家精神、科学家精神，选树典型榜样积极宣传，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实地开展红色教育专题培训，引导广大人才胸怀“国之大者”，爱岗敬业、为国奉献。

二、紧盯“四个面向”，全力攻坚形成战略人才力量比较优势

“战略人才站在国际科技前沿、引领科技自主创新、承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是支撑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要把建设战略人才力量作为重中之重来抓。”[2]11 高校要根据国家建设战略人才力量的新理念、新要求、新方向，构建新型战略人才引育机制，设立“顶尖—领军—青年—后备”梯次合理、衔接有序的岗位体系，制定与国家战略、产业发展相契合的遴选条件、支持举措、考核标准、退出要求等，构建人才队伍阶梯式成长通道。

（一）全力打造一支领衔大兵团作战的战略科学家队伍

“战略科学家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中的‘关键少数’[2]12，在立德树人示范、科研团队组织、重大课题攻关等方面有充分的话语权、强大的凝聚力，是引领高校建设的关键力量。当前，战略科学家、顶尖人才匮乏仍然是大部分高校面临的严峻问题。

高校下大力气引育顶尖领军人才，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首先要有清晰的引才方向，精准聚焦国家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战略需求，围绕重点布局建设一流学科领域和重大创新平台，统筹资源投放，支持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成长，不断强化尖端人才引进、培育、供给能力。要建立“揭榜挂帅”全球引才机制，以一流的事业和平台为目标吸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相当层次国际知名专家等。强化以才引才，发挥好院士、高级专家、知名校友的引才荐才作用，多方挖掘、发现、推荐顶尖领军人才及大中型科研团队。拓宽人才选聘渠道，与地方政府、人才发展集团、第三方机构等加强合作，精准定位与学校发展目标契合的高潜力目标人选，定向引进。打造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建立顶尖人才“一人一议”“一事一议”的引才快速评估机制和高效决策机制。

（二）全力培育一批协同攻坚的融合创新团队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指出，推动高校“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化结构布局上先行先试”[3]。创新团队以加强科学前沿探索、推动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实现重大科学技术创新为目标，是践行这一要求的主体力量。高校要坚持第一线、主战场、大兵团、大成果，围绕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分类、分层、分批优选一批科研攻关和交叉团队，以团队为单元进行资源投放，以重大成果产出进行考核评价，实现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集团作战、协同攻坚，推动有组织科研。

赋予战略科学家自主权，建立校内外人才统筹调配使用机制，支持战略科学家组建由专任教师、专职科研人员、实验技术人员、研究生等组成的科研团队，相关指标不受单位进人计划限制，同时利用兼职人才、校内教师双聘等渠道，打造多学科、多领域交叉、融合、创新的人才汇聚新模式。对于团队共同承担的重大项目、取得的重要成果，由首席专家认定团队成员贡献，在职称评聘、绩效分配、导师遴选等工作中予以认可，对成果丰硕的大团队单独制定标准，单列人才、职称、研究生指标等。实行团队整体考核评价，团队考核等次直接作为团队首席专家个人聘期考核等次，团队成员的考核，由团队首席专家负责制定标准并组织实施，考核等次作为个人聘期考核结果。根据团队建设目标达成度和考核情况，对团队支持政策进行动态调整，坚持需求牵引与技术推动双向发力，促进标志性成果产出、打造新的学科增长极。

（三）全力储备一支具有潜质的战略青年人才队伍

青年科技人才处于创新创造力的高峰期，“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源头活水”[2]12。国家有关部门相继为青年人才减负、加强青年人才培养使用等出台相关措施，将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具有发展潜质的青年科技人才上，大胆使用、锻炼提高。

高校要把握政策机遇，强化青年人才的系统培养。加大入门支持力度，对于新引进的优秀青年教师，设立专项培育基金，确保青年科技人才成长起步的“第一桶金”。鼓励青年人才加入或组建科研团队和交叉团队，支持围绕国际前沿和新兴交叉领域，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崭露头角。实施分类考核评价，对于新引进青年人才，强化代表性成果评价，重点评估引进后的发展潜力，弱化科研指标的数量门槛。对基础研究领域青年人才减少考核频次，实行聘期考核等中长周期考核评价。在晋升发展过程中，增加破格成长机会，让在学校事业发展中担纲重要任务、崭露头角的青年人才尽快成长成才。提升青年人才服务温度，定期召开青年人才座谈会，主动关心、了解青年科研人员在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和需求，用好地方支持青年人才政策，解决好青年人才经费、办公空间、子女入学、看病就医等现实困难。积极设立科研助理岗位，提供专业化辅助服务，将青年科研人员从不必要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

三、深化改革创新，进一步提升高质量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优势

体制顺、机制活，则人才聚、事业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更应突出破立并举、先立后破”[4]。当前是高校人才队伍建设攻坚跃升的关键期，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要不断向改革要动力，用改革增活力，构建科学规范、激励与约束并举、运行高效的考核评价和薪酬分配制度，解放和增强人才活力，促进人才作用发挥。

（一）用好教师评价指挥棒释放人才活力

深入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精神，加快实现由“破五唯”向“立新标”转变，建立支撑一流学科建设的一流学术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为引领人才自主培养、科技自立自强创造良好学术生态。要完善教师分类评价，制定更加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教师招聘条件、职务申报条件、岗位目标任务、聘期考核指标。要突出教书育人主职主业，严格制定本科教学工作量和育人效果考核标准，突出高质量教育教学评价权重，把参与教研活动、编写教材案例等计入教学业绩，丰富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要健全以创新水平和研究价值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提升原创性、开创性重大科研成果的评价权重。要在职称评审和人才项目遴选中，对一线教学、专职科研、应用技术开发、学科交叉及创新团队等重点人才予以倾斜。要创新评价机制，改进国内同行评价，合理使用国际同行评价，对于应用型成果引入市场评价和社会评价。

（二）用好考核指挥棒挖掘人才潜力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规定》，构建“年度考核—预聘期考核—聘期考核”统筹谋划、一体推进的考核管理机制，推动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优化年度考核，以定量考核为基础，以质量考核为核心，定好年度考核“标尺”，发挥其总结工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问诊台”作用。改革聘期考核，以科学规范评价为指引，完善岗位职责和聘期目标任务，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多元设计人员进退留转通道，健全“人员能进能出、岗位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动态考核管理机制，发挥教师对于高校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作用，切实推动人才队伍建设提质增效。

（三）用好薪酬分配指挥棒增强人才动力

“要把推动高校教师、科研人员薪酬分配制度改革作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5]高校要加快改革分配制度，人才为本、创新优先，提升人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树立贡献导向，强化优绩优酬，将薪酬分配同绩效紧密挂钩，向深耕教学科研一线、躬身基础前沿研究、揭榜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勇于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取得重大创新成果的教师倾斜，将绩效工资分配与岗位职责考核结果紧密挂钩。对于行业、产业急需的专业人才，要考虑提高薪酬水平，保持市场竞争力，以便吸引和留住人才。对于实施年薪制、项目工资制的人才，将薪酬发放、调整与年度任务或项目进展情况密切挂钩。突出目标导向，根据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构建学院绩效工资奖励体系，根据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国际化、服务社会等贡献赋予不同奖励权重，由有关职能部门牵头制定考核评价标准、确定考核评价等级，核算奖励金额后打包拨付给学院。突出创新导向，可设置突出成果奖进行单独奖励，凸显标志性和引领性。建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益分配机制，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力。

四、推进地方共育，聚力夯实多方资源叠加的竞争优势

高校与地方是紧密联系、共生共荣的。高校的人才资源是城市现代化建设最直接、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地方的支持是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后盾。

高校要主动融入地方人才集聚雁阵格局建设，与地方共同推进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将地方编制、经费、人才公寓、税收优惠等为我所用，形成学校人才队伍建设与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协同共进共强优势。抢抓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大科学装置建设、国家实验室基地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孵化等战略机遇，加强校地协同、校企联动，为学校人才争取国际一流的创新平台，为人才干事创业搭建舞台，打通学校与社会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建立柔性引才引资机制，加强与各方社会力量的“结网”共建，成立人才基金，设立校企联聘岗位，通过服务地方反哺人才培育，在与社会力量的合作共建中形成引才强大合力，实现双赢。探索构建一批培育创新人才的新型研发机构，形成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团队，引入地方编制资源和社会资金资源，形成由高校、企业、政府三方共同支持发展的一流创新载体布局，打造创新主体最协同、创新资源最集聚、创新转化最有效、创新体制最灵活、创新环境最优良的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具有自主造血能力的创新基地，吸引、造就更多优秀人才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 [J]. 求是 , 2023(18).

[2] 习近平 .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J]. 求是 , 2021(24).

[3] 怀进鹏 . 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N]. 人民日报 , 2023-08-31(009).

[4] 习近平 .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J]. 求是 , 2025(02).

[5]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 [EB/OL]. (2023-07-11)[2025-10-11]. https://news.cctv.com/2023/07/11/ARTIQAJmbdpWMQhJIF76acld230711.shtml.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学生就业困境与突围策略探析

罗梦婷 路俊俊 雷 顺 陈 娜 黄 巾

摘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对劳动者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影响高职毕业生顺利就业。高职院校承担着为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业人才的重要使命，面对高职学生就业困境，可通过政行企校联动、加强就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数智素养的方式，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要求的技能人才，促进高职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高职学生；就业

2024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中指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不断调整，激发了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紧迫需求。高职院校要主动对接新技术、适应新要求，科学研判人力资源发展新趋势，着力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促进高职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一、新质生产力对就业市场的影响趋势

（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就业结构

1. 智改数转传统产业，拓展就业空间

麦克思研究院发布的《2024 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相较于 2019 届高职毕业生，2023 届高职毕业生在机械设备制造业就业比例提升了 0.8%，在农、林、牧、渔业就业比例提升了 0.5%，在纺织、服装、皮革制造业就业比例提升了 0.2%，在食品、烟草、加工业就业比例提升了 0.1%[1]。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高职毕业生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2.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催生就业岗位

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医药等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大幅增加，智联招聘发布的《2025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人才热点快报》显示：2025 年 2 月，机器人调试工程师、无人机组装测试岗、算法工程师招聘需求同比分别增长 57.5%、64.5%、46.8%。《报告》显示装备制造业及其上游领域对创新型数字技能人才的需求稳步提升，在装备制造业（与工业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等相关的职业）就业的高职毕业生比例从 2019 届的 3.1% 上升至 2023 届的 3.7%。

3. 压缩或取代传统就业岗位

高职毕业生大多进入劳动密集型、服务型产业就业，工作岗位所需的技术含量较低，随着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应用，可能会进一步挤压低技能、重复性工作的机会，比如流水线岗位由自动化设备取代、无人驾驶、无人配送等，对高职学生就业带来巨大冲击。

（二）对高职学生职业素养提出更高要求

1. 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专业素养提出新要求

一是紧跟新技术迭代速度，拓展跨学科专业知识[2]。新质生产力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已在各行各业广泛运用，掌握跨学科专业知识，才能在就业市场寻得立足之地。二是提高新技术应用水平，全方位加强专业实践。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焕发新机注入强劲动能，农业智慧化、工业智能化、服务业数智化，对高职学生的专业实践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2. 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数智素养提出新要求

一是正确认识数智素养的基本内容。学者李惠娜提出由数智知识、数智能力和数智伦理三个主体构成的数智素养[3]。张裕晨等从数智伦理、数智思维、数智知识、数智胜任力四个维度构建数智素养评价指标体系[4]。数智素养涵盖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图文处理等技术点的掌握和运用，是高职学生融入职场必不可少的职业素养。二是提高数智技术运用能力。巧用数智化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创新思维、数字素养、跨界融合能力、AI 渗透技能等就业能力已成为高职学生高质量就业的核心能力诉求[5]。

3. 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综合素养提出新要求

新质生产力要求学生具备较高的综合素养和职业核心素养[6]。一是具备创新精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新技术、新工艺的引入，推动企业生产线、管理线、产品线快速迭代。高职学生作为新时代的劳动者，理应具备创新思维。二是过硬的心理素质。在技术快速更迭带来的巨大压力下，高职学生要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找准就业方向，扛住压力才能收获成长。三是自主学习能力。新质生产力涉及众多新技术和新理念，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这些领域知识更新迅速，高职学生应主动追踪行业前沿知识，快速掌握新技术、新理论，在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二、近三年高职学生就业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就业现状

当前高职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一是毕业去向落实率有待提升。《报告》显示：2021 届、2022 届和 2023 届高职生毕业半年后的毕业去向落实率分别为 90.6%、87.8% 和 88.9%，2023 届未就业的高职毕业生中有 38% 处于求职状态，高职毕业生就业落实率仍有提升空间。二是专业对口就业率不高。从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来看，《报告》显示：2023 届高职毕业生从事专业相关工作的比例（61%）低于 2021 届（63%）和 2022 届（63%）。从 2023 届高职毕业生选择与专业无关的工作的原因来看，“迫于现实先就业再择业”的学生占比 30%，“达不到专业相关工作的要求”的学生占比 13%，这说明就业压力大，高职学生就业竞争力较弱。三是毕业生心理素质和学习能力满足度仍待提高。《报告》显示：2023 届毕业生因工作要求高、压力大而选择离职的比例达 29%，较 2022 届（25%）上升了 4 个百分点，揭示了心理健康对毕业生职场稳定性的影响。2020 届高职毕业生毕业三年后终身学习能力的满足度（91%）也低于平均水平（93.8%）。四是毕业生数字素养与技能有待提升。《报告》显示：2023 届高职毕业生的电脑编程能力满足度仅为 80%，低于各项基本能力的平均值（89%），2023 届高职毕业生在校期间“数字素养”提升比例不超过 65%。当前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数字技能人才对此具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在这一背景下，对于高职生数字素养和技能的培养仍有待进一步强化。

（二）问题分析

一是专业建设与市场需求脱节。高职院校应借助新质生产力，深化产业供需对接，探寻就业高质量发展路径[7]。但当前职业教育存在教师缺乏产业实践经历、实践教学环节不足、课程设置滞后等问题，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标准没有被及时引入课堂、教材，导致高职毕业生专业素养欠缺，跟不上产业发展速度，缺乏就业竞争力。二是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政府部门组织的人才招聘会往往针对一线的生产、建设、服务岗位工人，工作性质、环境和待遇偏离大学生期望值，且针对高职学生就业的小微企业到场较少，缺乏联结中小微企业与人才的常态化、规范化招聘平台。人才供需平台建设乏力，智能化程度不高，供需信息不对称、不精准，学生临时盲目地投递简历，成功率低。三是高职院校就业教育乏力。2023 年 12 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 2024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强化大学生生涯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建设，将课程建设作为强化就业指导服务的重要内容。部分高职院校就业教育、职业指导等相关课程教学内容、方法陈旧，致使就业教育流于形式，缺少实质成效。四是高职学生数字素养和技能薄弱。随着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数字素养和技能已成为高职学生就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尽管当前高职学生是在数字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从小使用手机电脑，但是编程、办公应用、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能仍不太熟练，学校又缺乏针对性的数字技能训练课程或教学平台，致使高职学生在校期间数字素养和技能提升效果并不明显。

三、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学生充分就业突围策略建议

高职院校作为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技术突破的“前沿地”，要结合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大背景，着力培养具有高专业素养、高数智素养、高综合素养的懂技术、会创新、能成事的新质人才，促进高职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一）政行企校联动，做强就业服务平台

大学生就业是项系统性工程，政行企校四方应协同发力，综合施策，通过法律法规、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职业技能培训等途径，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8]。一是搭建大学生招聘服务平台。建立政府主导、行业协同，服务于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利用短信、微信公众号向高职毕业生及时推送招聘信息，解决企业招工难题，助力高职毕业生充分就业。二是大力实施职业技能培训。人社部门或行业协会可定期邀请行业专家、企业工程师、技能大师等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技能培训机会，提升其职业能力，实现未就业高职学生“能就业”的目标。三是用 AI 赋能就业服务工作[9]。将 AI 创新融入简历优化、模拟面试、职业探索等就业服务工作，利用大数据技术，全面精准掌握学生兴趣特长、性格特点、学习习惯等信息，为学生精准画像，有针对性地推送就业招聘信息，提高就业服务工作效率。

（二）加强就业教育，树立积极就业观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于2025年4月向社会公布，《意见》指出：“把就业教育作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重要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深度融合。”一是加强就业心理健康教育，培养积极就业心理。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就业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容易让学生产生不适感，甚至出现“怕就业”的情况。高职院校应着力提高学生心理韧性，通过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心理健康讲座、心理团队辅导等形式，缓解大学生就业心理焦虑。二是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就业观。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使得未来职场充满挑战，高职院校要引导学生摆脱“混日子”的消极思想，树立积极就业观念，勇于拥抱新兴技术，积极应对就业挑战，主动识变应变求变，跟上时代前进步伐。

（三）深化产教融合，提高学生首岗就业质量

优化专业结构与市场需求对接、激励中小企业与高校协同育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10]。一是以市场为导向，校企共育订单式新质人才。高职院校应积极挖掘有用人需求的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组建订单教学班，邀请企业的工程师到校授课，校企联合高标准实施人才培养计划，助力高职学生更好就业。二是以项目为依托，增强学生在校企联培岗位上的实践能力。借助高职院校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契机，让学生参与到企业的真实项目中，既能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化解难题，又丰富了高职学生的项目经历，增强其岗位实践能力。三是以人才培育为目标，校企联建实习实践教育基地。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已成为高职院校促进学生理论应用与实践素养提升的重要手段，由学校和企业视情况投入管理团队、经费、师资、场地、教学设备、技术等建立“校中厂”“厂中校”，培养学生专业能力，以适应岗位要求。

（四）培养数智素养，拓展就业创业机会

一是探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工具贯穿课程教学全过程。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迅速，带动人工智能、计算机素养等知识被纳入高职学生基础性课程和必修课程，为课程教学中学生能够熟练运用AIGC工具进行资料收集、文档编写、数据处理、图像制作、内容创作等奠定坚实基础，让学生逐步学会并使用AIGC工具。二是推动数智教学平台建设[11]。利用雨课堂、超星学习通、智慧树等教学平台充分实现课程资源线上共享，提高学生数智软件使用能力。推动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建设，模拟真实工作场景，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实践教学，既能提高教学参与度，又能检验学生职业技能能否胜任工作岗位需要。三是优化课程体系，增设数智技术课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开设与专业相关的数智课程，比如轨道智能运维、财务大数据分析、智慧物流等，使学生了解数智技术在本专业领域的具体应用，提升职场适应力，为学生高质量就业奠定坚实基础。

四、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职业院校毕业生成为我国产业大军的主要来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高职生的学历、能力、知识储备、发展后劲都逊于本科生，在就业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高职院校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综合施策，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全力促进高职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参考文献

[1] 麦可思研究院 . 2024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 [M].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24.

[2] 贾丽民 , 郭潞蓉 . 论新质生产力劳动者要素的动力源作用 [J]. 湖南社会科学 , 2024(06): 10-19.

[3] 李惠娜 . 图书馆员数智素养及其培育路径研究 [J]. 图书馆 , 2023(09): 47-52.

[4] 张裕晨 , 王林漪 , 邱均平 .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信息资源管理专业学生数智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J]. 2025(03): 13.

[5] 崔秀艳 , 张佳伟 , 石彦芳 .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学生高质量就业的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 [J]. 职业技术 , 2025(02): 1-6, 18.

[6] 赵蒙成 . 面向新质生产力 : 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兼论新质生产力需要什么样的职业教育 [J]. 教育与职业 , 2024(20): 23-30.

[7] 胡莜萌 , 高瑞来 . 新质生产力助推高职院校就业工作高质量发展 : 逻辑理路、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J].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 , 2024(04): 86-91.

[8] 许远 . 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就业政策和技能策略——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解决之道 [J]. 教育与职业 , 2024(10): 5-14.

[9] 朱凌云 , 陈迪明 , 詹清华 , 等 . 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报告 [J]. 中国大学生就业 , 2025(01): 38-45.

[10] 陈潇 . 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J]. 就业与保障 , 2024(07): 43-45.

[11] 吕爽 . 加强“新质人才”培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蓄力赋能 [J]. 中国就业 , 2024(09): 77-7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年四川省教育厅、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西南交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高校辅导员专项）“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职学生就业能力提升路径研究”（CJSFZ24-68）的研究成果。

（作者：罗梦婷，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路俊俊，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雷顺，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陈娜，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黄巾，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社交软件的即时通信功能对大学生课堂专注力的影响探究

唐　榕

摘要：在社交媒体时代，大学生在学习、生活、娱乐、社交等方面都会通过社交软件来实现。手机时时刻刻都被放在了触手可及的地方，以方便能第一时间通过社交软件参与互动，课堂上也不例外。随机选取 45 名学生，通过社交软件腾讯 QQ 发送即时消息，以及向 365 位学生发放以大学生课堂手机社交软件使用行为及其对专注力的影响为核心的调查问卷，通过实验和调查问卷分析高职院校学生在课堂上使用社交软件的情况，探索社交软件对学生课堂专注力的影响，提出干预措施，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关键词：社交软件；高职院校；课堂专注力；即时通信

社交软件是指通过互联网技术，为用户提供社交互动服务的应用平台，主要具有沟通交流、社会关系管理、内容分享等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社交软件凭借便携性、随时可获得性、即时传输性三大优势成为大学生生活、学习、沟通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1]。在大学课堂上，常常需要利用线上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社交软件给教育和学习带来了诸多有利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也伴随着问题的产生。一方面，通过利用线上资源和信息化课堂管理能更加高效地组织教学、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课堂上被允许使用手机的合理化，使社交软件干扰课堂和干扰学生注意力的事实愈演愈烈，各类社交软件的信息无时无刻不在分散和吸引着学生的课堂注意力[2]。

在大学课堂上，学生是可以自由带手机进入课堂的（由于教学和管理的需要，可能还会被要求带手机），课堂上手机除了完成必要的教学需要外，社交软件也会对学生的注意力产生吸引和分散，每一次吸引和分散又需要学生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自觉性再次回归到课堂学习中去，导致对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率产生影响[3]。本研究通过实验法和调查法，以高职院校学生课堂手机社交软件使用行为及其对专注力的影响为核心进行分析，探究课堂使用社交软件对高职院校学生专注力的影响，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和意见，提高学生课堂专注力，提升课堂教学效果，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一、研究方法

（一）实验法

在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选取 3 位辅导员老师所带的 9 个班级，在每个班级中通过学号随机选择 5 名同学作为被测试对象，共 45 名研究对象。设置 1 名老师和 1 名同学为信息请求人，在被测试者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课堂进行的第 15 分钟通过腾讯 QQ 向被测试对象发起信息请求，记录被测试对象对信息请求所作出的处理和得到信息反馈所用时间。

（二）问卷调查法

本调查以大学生课堂手机社交软件使用行为及其对专注力的影响为核心制作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发出 365 份，收回 365 份，其中包括实验法中被抽取的 45 名同学。被调查对象涵盖性别（男 78.9%，女 21.1%）、年级（大一 63.56%）、专业（工科 53.42%）等基本信息，对手机使用习惯、课堂行为与专注力进行自评[4]。

二、研究数据分析

（一）基础数据分析

在测试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课堂进行 15 分钟后向被测试的 45 位同学通过腾讯 QQ 发送即时消息，结果显示：45 位同学中，1 分钟内回复消息的有 11 人，2 分钟内回复消息的有 13 人，3 分钟内回复消息的有 4 人，4 分钟内回复消息的有 6 人，5 分钟内回复消息的有 3 人，5 分钟后回复消息的有 2 人，课堂进行中未回复消息的有 6 人。

通过问卷星平台将问卷中“您是否会在课堂上使用社交软件”设为自变量，“您认为社交软件对课堂专注力的实际影响程度”设为因变量进行交叉分析，结果总结如下：一是关于社交软件使用类型的分析[5]。社交软件使用类型以微信、腾讯 QQ 为主导，且在各

类课堂使用场景中占比均超过 83%。抖音、快手使用率紧随其后（77.53%），在“几乎全程使用”课堂场景中占比高达 83.33%；二是关于日常使用手机时长与课堂使用社交软件频率的分析。日常手机使用时长越长的同学，课堂使用社交软件进行交流越频繁且专注力影响感知越强，手机使用时长越长的同学在课堂使用社交软件频率越高，在每天使用手机超过 4 小时的群体中，偶尔和经常使用课堂社交软件的比例显著增加 [6]。其中每天使用 4~6 小时者 38.33% 会偶尔使用，每天使用时间超 6 小时者 60% 会经常使用课堂社交软件。三是关于课堂使用社交软件时长对专注力感知程度的分析。随着使用时长增加，感知中度、严重影响的比例明显上升。每天使用时间超 6 小时的群体中，40% 认为有中度影响，38.46% 认为有严重影响，而该群体在无影响类别中仅占 32.58%。

（二）实验法与问卷法数据对比分析

通过实验法中被抽取的 45 位同学的调查问卷得到的主观认知数据，与测试者实际在课堂上通过社交软件回复消息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存在以下三方面差异。一是学生普遍低估课堂手机使用频率及社交软件的实际干扰，主观认知与客观行为存在显著差异。问卷数据显示：78.63% 的学生表示“偶尔”在课堂上使用手机，仅 9.59% 的学生承认“经常使用”，但实验数据中显示在发送 QQ 消息后，53.3% 的学生（24/45）在 2 分钟内回复，表明实际使用频率远高于自我报告。由此可见学生对课堂手机使用的频率存在明显低估，实际行为更为频繁 [7]。二是社交软件对专注力的实际影响存在差异。问卷数据显示：46.03%（完全同意 + 基本同意）的学生认为消息提醒会导致分心，仅 29.86% 的学生认为社交软件导致“中度依赖”或“重度依赖”，但实验数据显示 60% 的学生（27/45）在 3 分钟内回复消息，显示即时响应行为普遍，实际干扰程度较高。由此可见学生主观认知的“轻微影响”与实验中高频回复行为矛盾，实际专注力分散更严重。三是学生在社交软件对课堂专注力自我控制能力方面存在差异。问卷数据显示：41.64% 的学生尝试减少手机使用但效果有限，仅 30.14% 的学生成功养成习惯。但实验数据显示 24.4% 的学生（11/45）在 1 分钟内回复消息，反映即时消息难以抗拒。由此可见学生对自我控制能力的评估过于乐观，实际行为受社交软件即时性驱动显著 [8]。

三、研究结果讨论

社交软件中的即时通信功能在课堂上对学生自我注意力的影响，在主观上弱化或严重弱化了其实际影响作用。信息化时代，社交软件的即时通信功能几乎完全融入人们日常沟通、学习、生活中。但人们在主观认知上，常常弱化甚至严重弱化其对自我注意力的实际影响。

从主观层面看，多数学生都觉得能自如掌控使用即时通信功能的时间和注意力，认为自己只是利用碎片化时间查看消息、回复信息，不会让它过多干扰课堂质量。调研中 74.79% 的学生觉得查看手机后能较快恢复课堂注意力，但实际结果仅有 18.9% 的学生尝试控制课堂上控制社交软件的使用并有效果。这种对自身自控力的过度自信，导致主观上严重低估了即时通信功能对注意力的影响。

实际上，即时通信功能对注意力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频繁的消息提示音和弹窗，如同一个个“注意力窃贼”。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人的注意力在被打断后，平均需要 15~20 分钟才能重新回到之前的专注状态。每次回复即时消息，注意力就被打断一次，原本连贯的思考进程被破坏。长期处于这种状态，大脑会逐渐适应这种碎片化的信息接收模式，难以长时间聚焦于深度阅读、对复杂问题的思考。长此以往，注意力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下降，学生愈发难以沉浸在需要高度专注的课堂学习中。

即时通信和线上讨论是课堂使用社交软件的主要场景。根据调查数据，72.6% 的学生在课堂讨论或小组活动时使用手机社交软件，60.27% 的学生表示参与线上讨论或群聊是主要原因，而 76.44% 的学生会即时回复消息（如微信、QQ）。这些数据表明，即时通信和线上讨论已成为高职院校学生课堂使用社交软件的核心场景，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课堂互动需求驱动社交软件使用。在传统课堂上，教师通常采用提问、小组讨论等方式促进学生互动，而高职院校学生更倾向于通过社交软件群聊进行即时交流。调查显示：超过 60% 的学生会在课堂讨论时使用社交软件参与线上讨论，部分原因是线下表达受限或更习惯数字化沟通。此外，许多课程采用“线上 + 线下”混合模式，如通过 QQ 群发布任务、微信提交作业，进一步强化了社交软件在课堂上的必要性。二是即时通信的高频响应行为影响课堂专注力。实验数据表明，53.3% 的学生在收到 QQ 消息后 2 分钟内回复。这种即时回复行为与问卷中 78.63% 的学生自称“偶尔”使用手机形成鲜明对比，说明学生对社交软件的依赖程度被严重低估。消息提醒的即时性，学生频繁切换注意力，导致课堂内容吸收效率下降。调查中，46.03% 的学生承认消息提醒会让他们分心，而实验数据进一步证实，即使不查看手机，仍有 29.86% 的学生因担心错过消息而焦虑。

四、建议

根据以上调查结果，结合高职院校学生课堂开展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干预措施，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一是强化自律引导而非单纯管控。在信息时代，手机已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一部分，全面禁止手机

进课堂并不现实。因此，强化课堂使用手机的自律引导，让手机从学习的干扰项转变为助力工具，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可通过主题班会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交软件对课堂的学习的“双刃剑效应”，分析实验法和调查问卷法的结果对比，让学生知晓社交软件中的即时通信功能在课堂上对自我注意力的影响，在主观上弱化或严重弱化了其实际影响作用，鼓励学生在上课期间无需使用手机的情况下把手机设置为关机、静音、关闭网络或者免打扰模式。借助学生辩论、案例分析、学生亲身经历分享等形式，引导学生既要认识到社交软件作为信息获取、学习助手以及人际交流工具的便利性，也要警惕过度使用可能带来的时间浪费、注意力分散以及对学业的影响。

二是使用互动式教学工具替代社交软件。调查显示：72.6% 的学生在课堂讨论或小组活动时使用手机社交软件，60.27% 的学生表示参与线上讨论或群聊是主要原因。针对这样的情况，在课堂教学实施方面，教师课前应依据课程特性与教学目标审慎选择课堂教学工具，像理工科的复杂公式推导，可用虚拟仿真软件，让抽象知识具象化；文科类的历史脉络梳理，则借助在线思维导图工具，激发学生构建知识体系。课上，借助工具创设互动环节，以小组竞赛形式利用答题软件，促使学生为团队荣誉专注知识运用；或开展案例研讨，通过实时投屏分享各小组方案，让学生沉浸于思维碰撞，无暇顾及社交软件。课后，利用工具内置的数据分析，精准掌握学生学习轨迹，针对薄弱点推送个性化任务，维持学习热度。学校方面，学校要为课堂教学工具使用落地赋能。组织教师进行深度培训，涵盖操作技巧、教学融合策略，甚至设立“工具应用创新奖”，激励教师挖掘工具潜能；完善校园网络基建，保障流畅运行，避免网络卡顿引发学生抵触情绪。再者，引导学生认识课堂学习工具的价值，将工具使用纳入学习规范，逐步改变学生课堂依赖社交软件的习惯，让互动式教学工具成为高职课堂知识飞扬、专注力满溢的新引擎。

三是探索开发课堂管理工具。高职院校可以借助实训项目研发类似于“课堂一键管”的课堂管理工具，在对学生进行情况说明的前提下，教师可以通过“教师管理”的功能一键将设定范围内的学生的微信、腾讯 QQ、抖音、快手等社交工具进行限时锁定，课堂结束再进行解锁。

四是构建系统的网络素养培育体系，增强学生的网络素养。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是技术创新与信息共享的平台，是每个个体成长与生活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学校要培养学生更好地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和特点，助力自身发展。从学校层面，可以开设网络素养通识课，剖析社交软件多元功能与潜在风险，如讲解“信息茧房”形成机制，让学生警觉沉迷社交软件导致视野狭隘；传授网络社交礼仪，使其明白课堂不当使用社交软件是对他人不尊重。从校园文化层面，可以结合第二课堂，开展“校园网络文明周”，设置网络知识竞赛，以趣味比拼促使学生深入了解网络利弊；开展主题演讲，分享自律上网、借助网络提升自我的心得。引导学生社团发挥作用，成立网络互助社，学长学姐帮扶低年级同学制定 “课堂断网计划”，监督执行并交流抗干扰技巧。从协同育人层面，辅导员要充分发挥思政育人作用，开展“网络素养之专注力养成”系列班会，巧用案例视频，分享因专注力缺失导致学业受阻、职业机遇错失的真实场景，触动学生心灵；继而详细拆解“番茄工作法”，现场模拟学习时段，带领学生亲身体验 25 分钟高效专注、5 分钟短暂休憩的节奏韵律，分享时段内排除社交软件干扰的实操诀窍。

参考文献

[1] 钱淑雁 . 基于社交软件创新开展班级管理 [J]. 人民教育 , 2023(07): 79.

[2] 周丽 , 张博雅 . 大学生手机使用特点及对学业、心理健康的影响 [J]. 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4, 36(04): 42−46.

[3] 赵新红 . 互联网对高校辅导员思政教育的影响及优化策略 [J]. 中国新通信 , 2024, 26(09): 89−91, 112.

[4] 刘珂彤 , 张士臣 , 李靖 . 错失恐惧对大学生社交网络成瘾倾向的影响 [C]// 中国心理学会 . 第二十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分组展贴报告 . 西安体育学院研究生部 ; 西安体育学院运动与健康科学学院 , 2023: 150−151.

[5] 富浩 , 李蒨 . 高职学生“双面”社交失衡的危害及化解对策 [J].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2022, 24(06): 56−60.

[6] 谢彩丽 . 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管理研究 [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 2022, 38(11): 130−132.

[7] 常贞 . 高职院校线上教学课堂专注度的分析与思考 [J]. 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20, 32(04): 91−94.

[8] 韩立梅 . 社交网络时代大学生媒介素养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探索——以传统服装文化为例 [J]. 化纤与纺织技术 , 2023, 52(09): 22−2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课题“基于互联网环境下社交软件对大学生课堂专注力影响的探究”（2024C12）。

（作者单位：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探析

卢梦歌

摘要：在现代教育体系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的重要教育内容，在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促进大学生自我调节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其综合心理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发展。而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其生活、学习甚至情感方面都受到一定的影响，给心理健康教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教育工作者需要充分意识到新媒体环境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正视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挑战，进而积极探索有效的应对策略。基于此，文章根据新媒体环境特点，剖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实意义，分析新环境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进一步探索并提出有效的教育路径，以期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新媒体；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新媒体逐渐成为大学生社交互动、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其具有独特的互动性、即时性、包容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难度。心理健康教育是学校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落实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举措，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和渠道更加丰富，但同时也因新媒体信息过载、学生过度依赖线上虚拟社交等现象，引发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在此背景下，以往心理健康教育模式逐渐无法适应大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心理发展需求。因此，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需要积极应对新媒体带来的一系列挑战，结合新媒体特点进行教育创新，以不断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成效。

一、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实意义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通过新媒体获取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来源较广、良莠不齐，而大学生往往可能由于经验不足而无法正确辨别信息，受到不良信息的诱导，影响其正确的价值观念的塑造与形成，不利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而高校积极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通过不同的教育方式和方法，引导学生增强自我认知，发展自我约束与管理能力，提升信息素养，以更好地面对新媒体平台的海量信息，并进行有效的过滤，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辨别能力[1]。因此，新媒体环境下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能够提升大学生信息辨别能力，以更好地运用新媒体进行学习与生活，促进自身成长与发展。

新媒体环境下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能够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落实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能够促进大学生心理素质的提升，实现全面成长与发展，引导大学生形成更加乐观、积极的心理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当前对于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不断提升，高校在培养大学生过程中，需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其形成并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有助于为大学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础，使他们能够解决生活学习中的问题与困难，获得个体的长远发展[2]。

除此之外，新媒体也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带来契机，在新媒体环境下，心理健康教育的空间得到拓宽，有助于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成效。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当前新媒体逐渐拓展至教育教学领域，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新媒体支持下构建线上课堂，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更加丰富的知识，课堂教学借助图片、视频等形式，将一些抽象的理论知识以更加具象生动的方式呈现，便于学生理解，有助于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成效。心理健康教育还可以借助新媒体平台开展线上心理咨询服务，使心理健康教育更具针对性，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增强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

二、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心理压力增加

新媒体环境下，学生能够通过网络获取海量的信

息，而信息过载也容易使大学生面临选择困境，学生无法有效吸收信息，无法应对信息过载，从而导致其心理压力增加。学生在新媒体平台上获取信息，常常面临过量信息涌入的情况，对其辨别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而大学生往往无法有效辨别信息的真实性，这些过量信息容易阻碍决策，干扰正常活动与学术研究探讨，影响学习与生活。部分学生通过新媒体平台丰富了对外界的了解，不断相互比较，从而增加心理压力与负担。在新媒体发展带来的信息爆炸背景下，大学生可能出现信息焦虑情况，担忧自己落后于时代发展趋势、遗漏关键信息，影响个体情绪稳定性，从而降低个体自信心，对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与威胁[3]。不合理地应用新媒体，容易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学生面对新媒体上丰富的信息与资源，耗费很长时间进行浏览了解，容易出现无法平衡学习与实际生活的情况，也会增加其压力。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心理压力与负担容易增加，增加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难度。

（二）学生自我认知出现偏差

学生面对复杂的新媒体环境，容易对自我认知产生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对心理健康教育产生影响。大学生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人际交往，在虚拟环境下形成的社交关系缺乏真实性，容易导致学生过度依赖线上交流，缺乏线下面对面沟通的技巧，不利于大学生的实际社交能力发展[4]。另外，学生在新媒体平台展示自身，倾向于通过他人看法来定义自身价值，通过外部评价进行自我判断，容易产生自我怀疑、自我迷失，导致学生出现自我认知偏差，不利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而且，新媒体信息传播十分高效且具有多样化特点，学生容易受到信息误导，认知与价值观可能出现偏差，影响其正常生活与人际互动。可见，新媒体环境容易导致大学生产生自我认知偏差，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从而增加冲突与问题，降低心理健康教育成效。

（三）心理健康管理机制不完善

新媒体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即时性等特点与优势，信息传播速度较快，为学生提供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需要有效的监管机制以减少负面和虚假的信息，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与教育环境。然而从目前来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缺乏有效且完善的管理机制，导致一些不良信息广泛传播，学生浏览后容易被影响认知与判断能力发展，引发负面情绪或心理问题，从而给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落实带来较大的阻碍。高校尚未建立完善的心理问题预防处理机制，导致心理教育流于表面，影响心理健康教育成效的提升，需要引起重视。

三、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路径

（一）创新心理健康教育方式

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式方法得以丰富，为此，应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结合新媒体特点创新教育方式。以课堂教学为主体拓宽心理健康教育渠道，利用自媒体优势建立心理网站、开设微信公众号等，整合并推送心理健康教育资源，为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源，在线上构筑虚拟的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活动空间，以实现多渠道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借助线上社交平台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互动，拓展心理健康教育范围，弥补课堂教学不足，以落实全方位的大学生健康教育工作。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融入新媒体素养、网络行为习惯教育，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网络行为习惯，积极应用新媒体进行学习与交往，鼓励学生形成心理健康自我教育意识，提升自我教育能力[5]。在校园内构建心理健康教育环境，借助宣传片、海报以及校园网等宣传心理健康知识，组织举办心理健康活动，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方式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内容。采取多种教育方式方法，提升学生心理适应能力，引导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理状态，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二）积极建立心理咨询平台

高校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建立心理咨询平台，能够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健康问题，指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心理状态，以确保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可以以新媒体技术为依托建立咨询平台，由心理教师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更好地适应学校和社会环境，满足学生心理健康发展需求。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建立心理咨询平台，鼓励学生在线上平台进行心理问题咨询，学习自我心理防护与保健知识。鼓励学生应用校园论坛、微信群等进行课后互动，借助社交软件为学生提供一对一心理咨询服务，保护学生个人隐私的同时，为学生提供宣泄情绪、倾诉内心的空间，了解学生的心理问题，分析问题实质，从而为其提供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指导。借助线上咨询平台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知识与技能，引导和帮助大学生解决心理行为问题，以更好地实现身心健康成长。除此之外，积极开发线上心理测试系统，借助新媒体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和分析，总结心理发展状态和趋势，以便及时发现学生心理问题，掌握问题的具体类型，有助于采取针对性的教育措施[6]。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教师借助新媒体技术为学生建立电子心理健康档案，跟踪记录学生心理健康情况，增强心理健康全面性，以更有效地引导学生提升自身心理素质，促进心理健康教育有效性的提升。

（三）完善心理健康教育机制

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心理健康教育机制不完善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落实。为此，要求不断完善相关教育机制，增强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和规范性。高校应加大相关投入力度，注重新媒体与心理

健康教育的融合，积极建立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网站，构建心理健康咨询平台，引导学生积极应对心理健康问题，强化心理健康教育成效。高校加强与相关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的合作，共同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与实践服务，利用新媒体加强各方主体之间的联系，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实践以及校外拓展的机会，调动学生学习心理健康知识的积极性，不断在新媒体环境下创设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环境[7]。校内建立心理咨询中心与学生管理部门、信息技术部门等相关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心理咨询中心收集并发布学生心理动态相关数据信息，由学生管理部门根据数据进行分析与管理，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活动。信息技术部门为新媒体环境下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技术支持，追踪学生新媒体使用行为，设置心理危机预警，以便及时干预学生心理问题，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总而言之，不断完善心理健康教育机制，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提供可靠支持，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四）注重学生新媒体素养的提升

新媒体环境下对学生信息辨别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应根据新媒体特点，注重大学生新媒体素养的培养与提升。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将新媒体渗透于教育的全过程，并引导学生理性认识新媒体技术，了解新媒体的功能与应用方法，设置专题讨论，鼓励学生对新媒体进行批判性分析，开展新媒体信息评估，学习辨识筛选信息的方法，提升信息辨别能力[8]。借助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教学方法，加强学生在新媒体平台的互动与交流，不断提升学生面对海量信息的筛选辨别能力，使其逐渐适应新媒体环境，提升自我辨别与防范意识，进而避免因信息过载或不良信息而引发心理健康问题。培养学生新媒体素养，符合新媒体环境下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需求，大学生能够更好地应对新媒体环境带来的挑战，全面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五）有机融合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也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引导学生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念，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其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有所契合，通过思政教育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能够应对心理问题，培养良好的心态。因此，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有机融合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学生思想道德素养。高校可借助网络平台，通过校园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融合思政教育元素，为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例如，针对学生存在的对就业产生焦虑、迷茫等问题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应用心理干预方法进行教育的同时，可融入职业道德素养等教育内容，使学生意识到自身职业的价值和重要性，引导其树立正确的认知，以更好地进行未来规划，在减轻学生不良心理情绪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感。将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结合，发挥两者协同作用，同时深化心理健康教育内涵与价值。

四、结语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着诸多挑战，学生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要求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结合新媒体发展特点，不断创新教育思路，提升教育实效性。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可通过创新教育方式、建立咨询平台、完善教育机制和提升学生新媒体素养等路径，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效果。

参考文献

[1] 李成，温金梅，夏运梅．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创新策略探讨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3, 36(15): 16-18.

[2] 李彬．新媒体时代高职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策略分析 [J]. 现代职业教育，2023(22): 121-124.

[3] 郑璐．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探析 [J]. 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22(05): 74-76.

[4] 李秋云，贾恩礼．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平台的构建路径探析 [J]. 新闻研究导刊，2023, 14(04): 170-172.

[5] 田梦瑶．新媒体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 21(17): 147-148.

[6] 胡小媛．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研究 [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 37(04): 114-117.

[7] 李晓丽．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路径探究——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 [J]. 高教学刊，2021, 7(21): 58-61.

[8] 韩芳，田飞，丁可，等．新媒体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疏导机制的构建策略研究 [J]. 新闻研究导刊，2024, 15(05): 42-44.

（作者单位：郑州财经学院）

大学生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及安全教育提升策略研究

乔雅洁 刘佳洁 姬明明 白 茹 刘少华

摘要：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做好大学生反诈安全教育是维护校园安全的重要抓手。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对当前大学生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大学生受到个体特征、认知、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具有高易感性，且在对电信诈骗认知、防骗经历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可能引发多重风险。建议大学生加强自身防范意识，借助多种工具提升防范应对能力，主动了解和学习相关知识；高校应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宣传，优化教育方式；同时，构建“校—政—企”多主体动态化反诈教育共同体，强化受害者支持与社会融入干预，筑牢大学生以及社会公民防范电信诈骗的防线，避免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关键词：电信诈骗；高校；网络安全；易感性；安全教育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电信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话、短信、互联网等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虚构事实、设置骗局，向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骗取公私财物的犯罪行为。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信息交汇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法治思维，注重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社会宣传教育防范，“坚决管控利用网络进行欺诈活动的言行”，是创建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重要内容。

高校是“驱动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的关键力量，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龙头作用越来越重要”。于高校而言，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校园安全，学生利益就得不到保障[1]。随着5G时代的到来，作为网络“原住民”的高校学生，其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已高度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大学生在享受网络技术为生活、学习和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更高的电信诈骗风险。近年来，针对高校学生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日益增多，无论涉案金额大小均对家庭、学校和社会带来了严重影响和危害，必须从根源上进行防范并建立长效防控机制。

做好大学生反诈安全教育，既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的客观要求，也是维护校园安全的重要抓手。深入开展大学生网络安全和电信网络诈骗的认知及易感性研究，对增强大学生的电信网络安全意识、维护校园稳定、发挥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龙头作用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电信网络防骗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多维诱因导致大学生成为易感群体

电信诈骗易感性受经验经历、能力水平、心理因素、个体特征等多重因素影响[2]。这个年龄段的受骗者普遍具有直觉的思维方式、冲动的决策风格、一般信任水平高和情绪控制力弱等特征，这正是电信诈骗多发于大学生群体的关键诱因。从心理特质和认知角度来看，大量研究证实心理特质（如风险知觉、信任倾向）通过线索加工（线索注意、异常识别、怀疑）间接影响诈骗易感性，其中低风险知觉和高信任倾向显著提升受骗概率。从人格特质和情境互动维度分析，情境因素（如个人信息泄露、权威身份伪装）与个体特征（信任倾向、情绪状态）共同作用形成诈骗结果，诈骗者往往通过虚构需求满足或危机情境激发受害者启发式决策[3]。值得注意的是，经验经历和能力水平也是大学生易感性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防骗经历与易感性呈负相关，反诈知识储备可通过提升线索加工能力有效降低易感风险。此外，网络使用习惯（如高频次网购）与诈骗易感性存在直接正相关。在校大学生普遍存在对电信诈骗手段和方法认识不到位、反诈意识有所欠缺等问题。从社会与法律环境视角看，通过法律课程普及和案例解析提升风险识别能力和法律意识，可有效提高大学生反诈能力。

（二）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影响校园安全和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对校园安全的影响深远，涉及

学生的财产安全、心理健康、校园环境和社会责任等多个方面。首先，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生，会导致学生财产损失，部分受骗学生可能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其次，学生还可能遭受心理创伤，甚至产生负面情绪等不良后果。另外，受害学生可能对社会和他人的信任度下降，进而影响其正常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能力。诈骗案件还可能导致学生无法集中精力学习，影响学业成绩，进而影响职业发展前景。除了学生的个人损失外，诈骗案件还会给家庭带来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负担，特别是贫困生遭遇诈骗后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心理负面效应。可见，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高发不仅影响学生的个人安全，还破坏了校园的和谐氛围，给高校校园教育和管理带来挑战[4]。

（三）电信网络诈骗的多元化和隐蔽性增加了防范难度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电信网络诈骗从传统的电话诈骗逐步演变为网络诈骗。随着通信网络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诈骗技术手段越来越多样化，诈骗手法不断翻新，伪装性越来越强。此外，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普及，使得诈骗的隐蔽性和精准性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兴起，犯罪分子利用境外服务器开设诈骗网站，增加了防范难度，同时也提高了公安机关的打击难度。

二、大学生脆弱性认知及高校电信网络防骗教育现状

为准确掌握当前大学生应对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的现状，防患于未然，避免电信网络诈骗给受骗学生所带来的多重影响，本研究借助“问卷星”对目前在校大学生个体特征、对电信网络诈骗的认知水平、主观态度、相关防骗培训经历等方面开展调查，以识别目前校园网络安全管理方面的薄弱点，进而更加明确下一步防范教育工作的重点和关键。

（一）大学生的个体特征和认知水平导致其具有更高的易感风险

从个体特征来看，通常女性对于网络防骗调查的积极性大于男性。大学生普遍涉世未深，加之受“刻板效应”的影响，基于对“熟人”“客服”等一些身份以往的认知，更容易产生较高信任度，降低了对风险的感知，使自身陷入不利境地。大量的事实也证明，电信诈骗案件中，个人信息泄露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对电信诈骗辨别能力的主观评价看，被调查的大学生普遍都对电信诈骗的主观认知比较乐观，认为自己“了解”，并且辨别能力“强”。这种高“自信”的认知与这个阶段学生的个性特征具有高相关性。大部分学生所了解的被骗方式为“冒充亲友或其他人员诈骗”“网络刷单”“虚假的中奖信息”等，这是最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形式。因此大部分大学生在遇到上述情况时，会选择“果断拒绝”或通过“详细询问”“自助查证”等方式辨别信息真伪。然而，电信网络诈骗具有极高的隐蔽性，形式变化多端，大学生对于未接触或未了解到的一些新型诈骗形式，可能就会“有所相信”。与此同时，大部分学生学习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或知识的积极性并不算特别高，经常主动了解的仅占 13%。电信网络诈骗作为一种新型的犯罪方式，与普通诈骗相比具有隐蔽性更强、渗透性更高、危害范围更广的特征，这也导致很多人无法感知或错误感知身边可能存在的电信诈骗风险。

（二）高校安全教育是大学生获取防骗知识的主要途径

当代大学生能够了解到反诈的途径比较多，他们会借助各类媒体平台了解相关反诈知识，包括公安机关、学校、新闻媒体等的安全宣传教育，父母朋友的提醒和警示，主动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登录线上反诈平台，或通过运营商的电话和短信提醒等。其中，公安机关、学校、新闻媒体等官方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及安全宣传教育是大学生接触最多的渠道，获取电信防骗相关知识最主要的途径是学校的安全教育。有效防范大学生遭遇电信诈骗，高校的反诈教育宣传显得尤为重要。

（三）加强防骗教育已成为师生共识

调查还发现一个重要的信息，虽然被调查者中遭遇电信诈骗的人仅占 30%，但是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高中阶段被骗，这个阶段的学生，接触或了解电信防骗知识的主动性较弱，其个性特点和个人对相关事件主观认知的高度“乐观”，很容易成为“易感”人群。同时，大部分的大学生都认为应高度重视网络防骗，并建议大学校园应该增加对反诈教育案例以及诈骗危害的宣传，增加学生的相关法律知识强化法律意识，通过案例分析来提高学生的警惕性。此外，大学生还希望学校能够将安全教育相关活动结合起来，以达到更好的反诈知识宣传效果。从主观意识来看，大部分大学生能够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所带来的危害，也有参与相关知识学习和警示教育的意愿。

三、加强大学生电信网络防骗教育的具体策略

随着时代的发展，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持续高发，很多人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识以及自我保护能力。电信网络诈骗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诈骗分子与受害者建立信任是诈骗得以实施的关键。

（一）增强自身防范认知与防范意识

大学生应当提升自我保护意识，保持警惕，善用网络信息资源，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核实；要主动了解网络诈骗相关法律法规，增强自身法律意识，在发现问题时，能够积极合理寻求支持与帮助。一方面，全校师生要努力增强识别意识和识破诈骗的能力，积极主动学习

相关防范知识和警示案例；另一方面，需要与朋友、家长和老师及时沟通，多方面考证，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更需要多方面考证信息来源与质量，提升防范意识。此外，通过积极参与心理健康教育，保持积极乐观的心理状态，提高对电信诈骗的心理防范能力，也是预防电信诈骗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借助多种工具提升防范应对能力

如何解决电信网络防骗教育在信息链、技术链、人员链、资金链遇到的困境，实现全链条防治，是当前预防和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重点与关键。有效地利用数据是大数据时代的核心，要化被动为主动[5]。个人信息泄露是电信网络诈骗发生的基础原因。要从个人信息保护的角度入手，针对性提出防范对策，如主动安装反诈 App 等，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还可通过技术赋能，进行大数据追踪与行为建模，预测个体受骗风险等级，向高风险学生定向推送反诈教育内容。在设备层面，强化物联网设备的安全协议，在设备中嵌入强加密算法和多重身份验证机制，提升设备之间的通信安全，尤其是家庭智能终端的安全防护，减少诈骗者通过侵入物联网设备窃取隐私或伪装身份的可能性。此外，可探索与全国性大学生受骗案例数据库建立协同治理模式，进一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实施细则，明确平台责任。监管部门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识别社交平台中的诱导性话术。

（三）构建多主体动态化反诈教育共同体

大学生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主动接触较少，了解来源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宣传方面的了解有限。要进一步强化家庭、学校与社会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加强三方协同合作，形成合力，构建动态化反诈教育共同体。高校可利用新媒体、案例分析、互动式教学、竞赛讲座等方式，提高教育的吸引力和实效性，使学生个人能主动了解电信网络诈骗相关典型案例，积极学习一些防范的方法，具备较强的敏锐度、防范意识和应对处理一般问题的能力。充分利用网络及各类新媒体多渠道进行教育宣传，营造全民反诈的氛围。教育方式要进行迭代，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设计差异化课程（如对理工科学生侧重技术反诈，对文科生侧重心理防御），推行跨学科间的交流活动，提升防范能力。通过技术赋能，开发虚拟现实（VR）反诈实训课程，模拟高沉浸场景，提高辨识能力。此外，健全校园心理健康教育的全过程管理和精细化管理，开展纵向追踪研究，对比教育干预前后学生的风险行为变化，进一步创新反诈教育方法与手段，培养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对高风险预警群体，可借助数智化平台进行数据收集、识别与分析，进而实现精准的知识推送，精细化过程管理同时还能提高干预反馈的效率和效果。还可探索建立相关学分制，将教育成效纳入第二课堂教育框架体系中。2023 年 11 月，公安部发布《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对因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进行惩戒，试图从电信网络诈骗的前端或后端进行相应的治理，也体现了电信网络诈骗的“链条化”防范趋势。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让学生了解诈骗行为的法律后果，增强法治观念，提高防范意识。全社会不断健全和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及相关立法的出台，也是防范电信诈骗的重要措施之一。另外，强化受害者支持与社会融入干预，如设计“同伴支持小组”，增强法律援助，推动高校与属地公安机关建立“一键报案”绿色通道，探索设立“大学生反诈救助基金”等。司法机关在办理相关案件过程中，通过积极的心理干预，加强分析和矫治，从源头减少相关事件发生。

参考文献

[1] 程子良，翁添富．大学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基于 746 名高校大学生的实证分析 [J]. 高校后勤研究，2022(05): 58−62.

[2] 陈振兴，董瀚蔚，郝卿，等．电信诈骗易感性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与分析 [J]. 西安科技大学学报，2022, 42(02): 389−396.

[3] 赵雷，陈红敏．电信诈骗中青年受骗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研究 [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 41(03): 102−112.

[4] 肖燕，潘文锋．大学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对策的实证研究——以深圳市三所高校为例 [J].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 21(05):22−27.

[5] 刘慧．大数据时代电信诈骗犯罪防治研究 [D]. 大连：大连海洋大学，202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陕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电信网络诈骗易感性分析及防范策略研究”（S202311397024）；2023 年安康学院校级教改项目“大思政格局下生态文明教育与课程思政融合的路径与实践”（JG202309）。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两路”精神融入交通类高职院校育人模式研究

蔡平娟

摘要：交通类高职院校是向交通运输行业输送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其育人模式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与行业发展的匹配度。基于此，本文在把握“两路”精神内涵的基础上，阐述了将其融入交通类高职院校育人模式的重要意义，并结合实践教学经验，提出了优化课程内容、融入精神内涵，创新教学方法、深化精神理解，组织实践活动、践行精神品质等策略，旨在为该领域的人才培养提供创新思路，助力交通类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两路”精神；交通类高职院校；育人模式

当前，交通类高职院校在育人模式上已积累了一定的成果，在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实践教学环节深化等方面不断探索推进[1]。然而，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部分院校在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方面存在不足，导致学生在职业精神培育、价值观塑造等方面存在欠缺；在实际教学实践中，与行业实际需求的对接不够紧密，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2]。在此背景下，探索优化育人模式的有效途径显得尤为重要。“两路”精神作为交通领域的宝贵文化资源，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

一、“两路”精神概述

“两路”精神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是在川藏、青藏公路建设与养护过程中孕育形成的伟大精神[3]。20世纪50年代，为加强祖国西南边疆的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党中央作出了修建川藏、青藏公路的重大决策。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环境下，数万名筑路军民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历经数年艰辛，成功建设了这两条被世人誉为“天路”的伟大工程。

“两路”精神的内涵丰富而深刻。其核心要义包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畏精神，筑路大军在面对高寒缺氧、高山峡谷纵横、地质条件复杂等艰难险阻时，毫不退缩，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开辟出通途；“顽强拼搏、甘当路石”的奉献精神，他们长期坚守在艰苦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为了交通事业的发展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团结精神，在公路建设过程中，军民之间紧密合作，各民族之间相互支持、协同奋进，共同铸就了这一伟大工程[4]。

二、“两路”精神融入交通类高职院校育人模式的价值

（一）筑牢职业精神根基

交通行业工作环境充满变数，常面临恶劣自然条件与艰巨任务挑战。“两路”精神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的品质，与交通职业要求高度契合[5]。对于交通类高职院校学生而言，在学习铁道工程技术、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等专业课程时，实践操作环节常需面对艰苦环境。“两路”精神能够帮助学生深入理解交通职业的责任担当，在未来投身交通建设一线时，面对偏远地区的工程项目、复杂的施工难题，可以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于奉献的精神，专注执着地完成各项任务，从而为交通事业发展筑牢职业精神的根基。

（二）强化思政教育实效

“两路”精神作为宝贵的思政教育资源，可以为思政教学注入强大动力。在思政课堂中引入“两路”建设的相关事迹，通过讲述建设者克服重重困难的故事，能将抽象的思政理论具象化[6]。学生在感受先辈们爱国情怀与奉献精神的过程中，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种以真实案例为依托的思政教育，相较于单纯的理论灌输，更具感染力与说服力。它不仅能有效增强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引导学生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担当的新时代交通人才，还能让学生在情感上与行业历史使命产生深度联结，使“两路”精神真正内化为学生内心坚守的价值准则。

（三）提升实践育人成效

交通类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离不开实践教学。像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等专业，学生需要在实训车间、施工现场等真实场景中提升操作技能。“两路”精神所蕴含的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实干态度，能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摒弃浮躁心态、专注于钻研技术。例如，在桥梁模型制作、车辆故障排查等实训环节中，学生可能会遇到反复调试仍不达标、户外作业受天气影响等情况，“两路”精神中不畏艰难、追求卓越的坚定信念，会促使他们沉下心来分析问题、不断进行尝试，在解决实际难题的过程中积累经验、磨砺技术。这种将精神力量融入实践过程的培养方式，能让学生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养成严谨细致、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

三、“两路”精神融入交通类高职院校育人模式的策略

（一）优化课程内容，融入精神内涵

在交通类高职院校育人模式中，课程内容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将“两路”精神融入其中，需对课程体系进行系统性优化，深度挖掘各课程与“两路”精神的契合点，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

对于交通类专业课程而言，应紧密结合专业特点，巧妙嵌入“两路”精神元素。以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为例，在“道路勘测设计”课程中，教师可以介绍“两路”建设时期，面对复杂地形地貌，建设者们如何凭借无畏的探索精神和顽强的意志完成线路规划。在讲解“桥梁工程”课程时，教师可以讲述“两路”建设中桥梁建造者克服技术难题、恶劣环境的事迹，让学生明白在专业技术学习中，不仅要掌握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更要传承先辈们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精神。通过这种方式，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深刻领悟“两路”精神对于交通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激发他们对专业学习的热情和对未来职业的责任感。

思政课程作为育人的关键依托，更应将“两路”精神作为核心内容深度整合，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教师可将“两路”精神中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价值观与课程知识点紧密结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法治意识。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教师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两路”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密切联系，使学生明白“两路”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承与演进，以及它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通过思政课程的系统教学，引导学生从理论高度把握“两路”精神，让其成为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塑造美好品格的强大精神动力。

通过对专业课程和思政课程内容的优化，可以将“两路”精神全方位、深层次地融入交通类高职院校的课程体系，为培养具有扎实专业素养和崇高精神品质的交通类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二）创新教学方法，深化精神领悟

1. 问题导向教学法

问题导向教学法以问题作为核心驱动力，强调学生围绕精心设计的问题开展自主学习、探究与思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提升思维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师应深度挖掘“两路”精神与交通专业知识的结合点，设计一系列层次分明、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以引导学生深化对“两路”精神的理解与认同。例如，在讲解交通建设项目管理课程时，教师可提出问题：“在‘两路’建设时，面对复杂地质和多变气候，如何有效开展项目进度管理与风险管理，保障工程顺利推进？”这类问题与专业知识相关联，又紧密结合“两路”建设面临的实际困境，引导学生思索在艰难环境中交通建设者体现出的智慧、勇气与坚韧精神。

之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小组形式开展问题探究活动。在小组讨论中，学生各抒己见，分享观点和想法。教师要适时介入，引导讨论方向，确保学生围绕问题核心进行深入探讨。比如，当学生在讨论“两路”建设中如何克服物资运输难题时，教师可以提示学生从当时的交通条件、运输工具以及建设者们的创新举措等方面进行思考。通过小组合作探究，学生不仅能更全面地理解问题，还能在交流中碰撞出思维火花，加深对“两路”精神中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等品质的理解。

最后，教师要注重对学生问题探究过程的评价与反馈。及时肯定学生在探究过程中的积极表现和创新思维，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例如，对于学生在分析“两路”建设中技术创新对工程推进的作用时提出的新颖观点，教师要给予鼓励；对于学生在问题理解上的偏差，教师要耐心引导，帮助学生纠正，使学生在不断改进中深化对“两路”精神的领悟，提升学习效果。

2. 项目式教学法

项目式教学法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要求教师将课程内容分解为具体的项目任务，引导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自主探究、协作学习，从而实现知识的掌握与能力的提升。在“两路”精神融入交通类高职院校教学的过程中，项目式教学法能够为学生提供沉浸式的学习体验，进而让学生深刻领悟“两路”精神的内涵。为此，教师应结合“两路”精神和交通专业课程内容，精心设计项目主题。例如，教师设计“模拟‘两路’某段工程的建设项目”，要求学生从项目规划、设计、施工到运营维护进行全流程模拟。在项目设计阶段，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两路”建设者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环境约束下，是如何进行线路规划和工程设计的，融入“两路”精神中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理念。通过这样的项目设计，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深

入理解“两路”建设的复杂性和建设者们的伟大精神。

当学生进行项目实践时，教师应根据学生个体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特点，采用个性化的指导方式。对于理论基础扎实的学生，教师可带领其深入探索“两路”建设中材料应用的技术原理，鼓励其从专业理论的角度提出创新性材料改进方案；而针对实践动手能力突出的学生，可引导他们进行简易的材料模拟实验，开展不同材料的组合及应用尝试，在实践中摸索应对实际问题的途径。这种个性化指导能使每位学生在项目中实现自我价值，并在探索过程中更好地领会“两路”精神中勇于尝试、百折不挠的精髓。

对于项目评价阶段，教师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项目成果评价体系。评价不仅要关注项目的最终成果，更要重视学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表现，包括团队协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等方面。对于在项目中展现出对“两路”精神深刻理解和运用的小组或个人，教师要给予充分肯定和表扬。例如，某个小组在项目中创新性地解决了模拟工程中的技术难题，体现了“两路”精神中的创新精神，教师要及时给予鼓励，激发学生进一步探索和学习的热情，从而深化学生对“两路”精神的领悟。

（三）开展实践活动，践行精神品质

开展实践活动的目的在于让学生走出课堂，通过实际操作和体验，将所学知识与精神理念付诸实践，从而在实践过程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锤炼自身的品质和能力。对于“两路”精神融入交通类高职院校育人而言，就是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和践行“两路”精神中不怕困难、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等品质。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与校外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践项目。比如，联系当地的道路桥梁建设工地，让学生参与到实际的施工环节中。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能会面临高温、高强度工作等挑战，如同“两路”建设者们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一样。教师要引导学生在面对这些困难时，学习“两路”建设者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轻易放弃，坚持完成任务。同时，在与施工团队的协作中，体会团队合作的重要性，理解“两路”精神中团结一心的力量。

教师也需积极推动校内实践活动与“两路”精神相融合。在校内开展交通模型制作大赛，要求学生围绕“两路”主题进行相关创作。在模型制作阶段，学生要运用专业知识，处理诸如结构设计、材料选定等系列问题，这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还能让他们在碰到困境时，如同“两路”建设者那般勇于革新、大胆探索。当学生为了完成一个精巧的模型而不断试验、逐步改进时，他们也在践行“两路”精神里精耕细作、追求优越的品质。依靠这些实践活动，使学生在亲身参与中，把“两路”精神融入自己的行为准则，切实达成从理论把握到实践践行的转变。

四、结语

“两路”精神融入交通类高职院校育人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与现实价值。通过对其内涵的细致剖析，清晰界定了“两路”精神在筑牢学生职业精神根基、强化思政教育实效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在育人策略上，从课程内容优化、教学方法创新到实践活动开展，为“两路”精神的融入搭建了多元路径。这一融合举措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交通类高职院校育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更能够培养出兼具扎实专业素养与崇高精神品质的交通人才。

参考文献

[1] 李青，巫群珍．“两路”精神融入交通类高职院校思政育人模式的路径探究 [J]. 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24(10): 201-204.

[2] 喻文翠，巫群珍，罗庆．“两路”精神融入交通类高职院校“四维一体”思政育人模式研究 [J]. 大学，2024(24): 153-156.

[3] 项露林，郭浪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路”精神当代价值再阐释 [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23(01): 10-16.

[4] 叶勇，樊信友，宋波．新时代推进“两路”精神大众化的实现路径 [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23(01): 17-24.

[5] 王德英．基于“两路精神”的桥梁工程课程在现代学徒制中的思政探索与实践 [J]. 现代职业教育，2023(03): 41-44.

[6] 彭文英，何依阳．“两路”精神：爱国主义的赓续与传承 [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24(06): 27-3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度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教学类校级重点课题“‘两路精神’融入交通类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的路径研究”（HYJY/2023A07）。

（作者单位：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大学生急救技能培养与普及体系的构建和实践

任 冬

摘要：当前在高校大学生急救技能培养与普及的过程中，已经开始重视相关体系的建设，但是由于实际工作中存在问题，不能保证大学生急救技能的良好普及，难以满足其发展需求。基于此，本文分析高校大学生急救技能培养与普及的问题，提出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措施，强调在体系构建过程中，做好培训前的准备工作，采用线上与线下的培训方式，完善培训的实践操作模式，改善大学生对急救技能的掌握效果，提升急救技能的普及水平，为促使大学生的急救技能发展提供助力。

关键词：高校大学生；急救技能；培养与普及体系

2017 年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将心肺复苏、创伤救护等院前急救技能作为大学生健康教育重要内容，明确规定要提高大学生自救与互救能力。2023 年教育部颁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实施青少年急救教育行动计划，开展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工作。为贯彻落实国家的健康教育、急救教育的政策方针，提升全民急救技能普及水平，高校需重点构建大学生急救技能的培养与普及体系，完善相关体系的内容，提升体系的实践水平，达到预期的目的。

一、高校大学生急救技能培养与普及的必要性

现代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福祉始终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提出的“四个面向”要求，其中“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刻体现国家对于民生问题的深切关怀。尤其是在医疗健康领域，面对心血管疾病等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的公共卫生问题，需正视急救技能培养与普及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高校大学生关键群体中需提升急救技能普及效果。通过《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23》可发现，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在我国仍高居榜首，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22 概要》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心脏性猝死人数高达 54.4 万，平均每 1 分钟就有 1 人因心脏性猝死而失去生命。同时我国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的普及率较低，不足 1%，院外救治成功率也同样不容乐观，加剧心血管疾病等突发状况对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胁。近年来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频发，进一步凸显急救技能普及的紧迫性，如果能及时有效进行急救，可降低伤残率与死亡率，为生命赢得宝贵的救援时间。高校大学生作为社会的未来，生命安全十分重要，但是当前大学生群体对急救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较差，超过 40% 的大学生不会正确进行心肺复苏，而非常了解急救知识的大学生仅占 21.46%，此情况下在大学生教育工作中普及急救技能，能提升自我保护意识与自救能力，使其成为促进社会急救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构建高校大学生急救技能培养与普及体系十分必要，需要高校将急救技能纳入必修课程，重视师资培训，完善教学设施，加大对急救技能的宣传力度，提高大学生对急救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大学生的素质素养，促使其急救技能的提升 [1]。

二、高校大学生急救技能培养与普及体系构建和实践措施

（一）构建大学生急救技能培养与普及体系

1. 培训前准备

培训前准备阶段需全面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急救知识与技能培训方案，结合大学生的实际情况与急救技能的实际需求，提升培训内容的针对性，明确培训的时间、地点、目标等关键要素。提前购买急救包、模拟人等急救培训用物，设置急救培训场地，为学生提供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且培训内容的设计需兼顾线上和线下两部分，满足不同学员的学习需求，线上内容是急救理论知识的讲解、急救案例的分析等，线下内容则侧重于急救技能的实际操作与演练。例如：院前急危重症护理止血、包扎、固定等基本技能，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术、淹溺急救等技能，巩固所学知识，制定急救操作考核标准，评估大学生的技能水平 [2]。

2. 线下培训

线下培训是急救技能培养的核心部分，需利用专业的急救培训基地，邀请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现场授课，培训过程中教师利用视频、3D 动画、微课等信息化技术，将复杂的急救技能操作流程进行拆解演示，使大学生深入理解掌握急救技能。需采用教师示教、仿真实训练习、标准化病人练习等形式，在模拟的真实场景中进行急救技能的实操演练，使大学生熟悉急救流程，提升应急反应能力，改善团队协作能力。同时为检验大学生的学习成果，需采用情景化考核的方式，设定特定的急救场景，要求学生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急救操作，全面评估急救技能水平与应变能力 [3]。

3. 线上培训

线上培训作为线下培训的补充延伸，具有灵活便捷等特点，高校可借助省级精品在线课程与虚拟实训平台，为大学生提供丰富的线上学习资源，学生按照自身的时间进度安排，自主选择课程进行学习。且在线上课程中需设置技能操作虚拟练习模式，大学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急救技能的模拟操作，熟悉操作流程，提升操作熟练度，改善操作的准确性 [4]。

（二）多元化渠道进行急救知识与技能的宣传

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未来与民族的希望，健康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为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大学生健康教育的政策导向，结合大学生的身心特点，需利用多元化渠道对大学生进行急救知识与技能的深入宣传，提升其急救素养，增强其社会责任感，例如：利用学校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发挥其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的优势，为大学生广泛传播急救知识与技能，发布急救知识小贴士、急救案例解析、急救技能演示视频等内容，增强大学生的急救意识，提升其学习急救技能的热情，增强其社会使命感，使其认识到掌握急救技能对于自身与社会的重要性。高校需与红十字会等专业机构深度合作，拓展普及急救知识与技能的有效途径，每学期对一定数量的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急救技能培训，将“人道、博爱、奉献”的急救教育精神与高校的育人理念结合，切实加强急救教育的宣传普及，培训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的专业人员为大学生传授急救技能，培养其敢于施救和善于施救的意识和能力。同时开展大学生应急救护技能竞赛活动，设定急救绷带包扎、心肺复苏术等常考项目吸引大学生积极参与，在竞赛中利用实践巩固所学知识，激发学习热情，提高学习效率。另外，在世界和全国急救日等特殊时期应加大对急救知识与技能的宣传力度，组织急救军演、急救知识竞赛等活动营造浓厚的急救文化氛围，使大学生在参与中感受急救的重要性，提升急救意识。或是建设急救车团，利用学校每年举行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等机会，社团成员深入基层、走进群众，为当地群众宣讲应急救援的重要性，普及急救知识，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等急救方法，提高群众的急救技能水平，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高实践能力 [5]。

（三）分模块与人群整合培训内容

由于目前在急救知识普及过程中，存在多难记忆、技能操作复杂规范要求高的问题，此情况下为使学生更容易掌握急救知识技能，需要将培训内容整合为心搏骤停救护、创伤与灾害救护、意外伤害救护三个学习模块，在模块化学习中分成人、儿童、婴儿、孕妇人群开展教学，使大学生快速掌握急救知识和技能，如表 1 所示。

表 1 分模块与人群整合培训内容

培训模块	培训主题	培训内容
A 急救概念	A1：急救的重要性和意义	A1：充分认识急救的重要性和意义
B 心搏骤停救护	B1：急救的基本原则与步骤 B2：心肺复苏术 +AED	B1：掌握急救的基本原则与步骤 B2：掌握成人徒手心肺复苏操作方法，掌握婴幼儿和儿童心肺复苏操作方法，掌握 AED 的操作方法
C 创伤与灾害救护	C1：止血术 C2：包扎术 C3：骨折固定术 C4：搬运	C1：掌握布条止血、止血带止血、按压止血、气囊止血带的操作方法 C2：掌握绷带包扎、三角巾包扎不同部位的包扎方法 C3：掌握前臂骨折、上臂骨折、小腿骨折、大腿骨折的临时固定方法 C4：掌握常用搬运方法，掌握脊椎损伤、颈椎损伤的搬运方法
D 意外伤害救护	D1：气道异物梗阻急救 D2：触电急救 D3：溺水急救 D4：中暑急救	D1：掌握成人海姆立克的施救方法，掌握婴儿和儿童海姆立克的施救方法，掌握孕妇海姆立克的施救方法 D2：掌握触电的判断、现场抢救方法 D3：掌握溺水的现场急救方法 D4：掌握中暑的判断、现场急救方法

（四）构建高效应急救护培训管理制度

在高校应急救护培训体系中构建科学合理的培训管理制度，能保证培训质量，提升培训效率，因此相关部门需针对高校专业急救培训教师资源有限、培训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创新培训管理制度，实现培训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使每位大学生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急救知识与技能培训 [6–8]。

例如：在大学生急救技能培训期间设立专门的培训管理团队，负责培训计划的制定、培训资源的调配、培训进度的监控、培训质量的评估，由具有丰富急救培训经验的专业教师组成，负责培训内容的更新优化。为提升培训质量，需邀请具有丰富急救实践经验的专家与教师作为培训师资，具备扎实的急救理论知识，在培训中融入实际案例增强培训的实用性，提升培训水平。同时为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和团队协作能力，需制定学生负责人制度，在每期培训中选拔一名学生作为负责人协助培训教师管理培训班级，组织课堂讨论、监督学习进度、收集学生反馈等，减轻培训教师

的负担，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另外，为解决培训资源有限的问题，需采用分期分组培训的策略，每学期计划进行 8 期培训，每期培训 200 名大学生，共计 1600 名大学生，利用网上报名形式随机将每期培训的学生分为 5 个小组，每组 40 人，每个小组由两位专项培训教师、一名学生负责人共同管理，促使培训工作有序执行 [9-10]。

（五）建立全面效果评价与反馈机制

完成高校大学生急救技能培训与普及工作后，需利用线上学习平台、急救虚拟实训平台对学生的急救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评价，利用在线测试与虚拟实训操作准确分析学生对急救流程与注意事项的掌握程度，评价其对常见急救情况的判断能力。这期间除线上考核外需设置模拟急救场景的实践操作考核模式，由专业急救人员按照学生的操作准确性、规范性、熟练程度进行打分，直观反映学生的急救技能水平，为培训质量的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且培训结束后需发放调查问卷，收集学生对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师资等方面的评价，按照学生的学习情况调整教学方法，对于学生在某些急救技能方面的薄弱之处，增加相关内容的讲解和练习时间，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定期召开教师座谈会，要求培训教师之间交流教学经验，分享成功案例，探讨问题，教师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提升整体培训质量。另外，为更全面评估培训效果，需收集社会公众对大学生在紧急情况下表现的反馈，研究学生在实际应用中的表现不足，对收集的反馈信息进行整理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改进措施，例如：对于培训内容过于理论化的问题，增加实践操作环节和案例分析，对于培训方式单一的问题，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和互动方式等，改进优化培训内容，不断提升急救培训的效果 [11-14]。

三、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大学生急救技能培养与普及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定必要性，全面维护大学生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增强其社会责任感，改善当前的大学生急救技能培养与普及现状。因此，在新时期的环境下，亟须按照高校大学生急救技能培养与普及的情况，科学合理构建相应的急救技能培养普及体系，做好培训前的准备工作，完善线下与线上的培训模式，采用不同渠道进行急救知识与技能的宣传，分模块与人群整合培训内容，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健全反馈机制，达到预期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丁美红，周涛，王春燕．推进校园急救试点教育的探究——以泰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J].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 24(04): 55-58.

[2] 张煜晗．大学生心脏健康管理与急救技能 [J]. 青春期健康，2024, 22(03): 46-47.

[3] 文琴．非医学类高校学生急救知识及技能知晓率调查研究——以铜陵学院为例 [J]. 铜陵学院学报，2024, 23(01): 121-124.

[4] 付亮，耿彧．高校学生健康素养水平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J]. 锦州医科大学学报，2023, 44(04): 106-112.

[5] 王毯，尹菲菲，王静，等．新疆某高校大学生心肺复苏急救技术认知需求现状调查 [J]. 农垦医学，2020, 42(05): 434-437.

[6] 梁丽芬，陈忻，余春沐，等．大学生心肺复苏急救知识认知现状及培训需求分析 [J]. 岭南急诊医学杂志，2019, 24(06): 568-570.

[7] 汪鹏宇，杨汐月，范生根．医学院校大学生 AED 知信行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J]. 智慧健康，2023, 9(20): 216-221.

[8] 李莹．论高校大学生急救技能普及的必要性及对策研究 [J]. 汽车博览，2023, 5(04): 194-196.

[9] 李涛，韦雅光，师家豪，等．地方高校大学生急救知识技能掌握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J]. 卫生职业教育，2023, 41(20): 111-113.

[10] 储紫梦，邓莉莹，祝冬香，等．健康中国视域下非医学专业大学生急救知信行现状的调查研究 [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文摘版）社会科学，2024, 11(08): 218-222.

[11] 张敏，聂雷霞，蒋萍，等．非医学类本科生心肺复苏知识认知与需求分析及培训模式探讨 [J]. 护理学报，2011, 18(14): 67-69.

[12] 张海钰，刘思羽，张继香，等．以医学生为主体的团队线下线上急救培训普及模式的构建 [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23, 21(03): 159-162.

[13] 刘容，邱艳，曹学，等．基于遗忘曲线的大学生心肺复苏普及模式构建及效果 [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24, 40(27): 2089-2096.

[14] 张学斌，王长安，王世杰，等．“导师—大学生急救团队—学员”逐级科普培训模式路径分析 [J]. 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24, 32(05): 573-57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河南省科学技术厅软科学研究项目“高校大学生急救技能培养与普及体系的构建和实践”（252400410712）。

（作者系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基于“一站式”学生社区构建“九思”对话育人模式的实践探索

王　颖

摘要：本研究致力于全面提升现阶段高职学生综合素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针对目前高职教育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力图以发挥“一站式”学生社区实践平台为基础，深度融入“九思”对话模式，在与时俱进中打造出一种全新的对话育人模式。在“九思”对话育人理念的指引下，每一名教育工作者都必须深度挖掘其对现阶段高职学生教育的重要价值，结合“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功能集成性、空间开放性以及管理协同性等优势，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引导策略。研究结果显示，该模式不仅能够在高职校园内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还能够在资源整合中，借助坚实的制度保障以及对话理念强化对各种育人理念的落实，指导更多学生都可以在品德修养、职业素养以及心理健康等多个维度上获得明显进步，为高职教育全面发展和人才培养战略提供更加广阔的路径。

关键词：“一站式”学生社区构建；“九思”对话育人模式；实践研究与探索

新时代背景下的高职思政教育，一定要紧跟社会发展节奏以及各类资讯的传播速度，在关注“一站式”学生社区体系建设的同时，对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情况以及意识认知进行引导，为打造创新型育人模式提供坚实的教育平台。此外，在面对一系列宝贵资源的时候，一线教育工作者必须从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入手，不断挖掘其内在潜力，将“九思”等育人理念渗透到现代高职院校的教学活动中，让这一包含文化价值的育人模式可以在全新的发展空间中再次绽放光彩。“九思”文化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新时期学生品德修养、职业素养以及心理健康提升的重要源泉，教育工作者必须从自身做起，将“九思”文化教育理念迁移到“一站式”学生社区的育人实践中，在二者的有机融合下关注高职学生发展规律，为其全面发展和成长就业奠定基础。

一、“九思”对话融入“一站式”学生社区的优势

“九思”文化源于《论语》，在数千年的传承与发扬中，这种经典的文化理论中所孕育的古老智慧，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光芒。其中所孕育的道德理念与人生智慧更是为高职学生的成长提供了滋养，也为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辟了全新的思路。而将“九思”对话融入“一站式”学生社区，更是为其发展提供了全新的魅力。一方面，这种深度融合能够最大程度上丰富社区文化内涵，作为学生日常生活、学习与交流的重要平台，“一站式”学生社区的文化氛围营造将会对学生的成长、成才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将“九思”文化融入社区则可以让现有的社区环境变得更加温馨、和谐，还可以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学生都可以感受到来自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二者的有机融合，学生能够感受到全面的育人支持，在“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的理念指导下，将其与个人成长、未来就业进行紧密结合，通过平等的对话实现个人提升[1]。

二、打造“九思”对话育人模式的原则

（一）尊重个体差异，关注个性化发展

在进行“九思”对话背景下的育人模式过程中，教师要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必须充分认识到每一名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无论其成绩如何都拥有独特的成长背景和鲜明的性格特点，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其多样化学习诉求，教师要结合“九思”理念、站在“一站式”学生社区构建的角度，从深入了解学生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性格特点以及兴趣爱好等角度，对学生的思想动态、潜在优势进行“把脉”，并结合其实际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贴心帮扶。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及能动性，鼓励其在社区生活中更好地认识自己，早日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2]。

（二）关注文化引领，推动内涵式发展

文化引领是打造“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关键点，教师要结合“九思”对话内容，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渗透，全面激发学生的内在综合素养以及道德品质，让其能够在螺旋式成长中感受到道德品质的重要性[3]。为此，教师在开展相关工作的时候，一定要高度重视

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结合实际需要设计有针对性的课程内容以及各类文化体验活动，鼓励学生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从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此外，还要强调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性，坚持以提高学生的内在素质为突破口，为其全面进步提供更多支持。

（三）加强协同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在“一站式”学生社区构建“九思”对话育人模式的思考中，还要关注各部门的协同，从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的角度共同为学生提供各类优质服务。不仅要充分调动教务处、学生处、团委等部门的沟通优势打造畅通的交流机制，还要联合各个专业教师团队共同研究制定育人计划。在这种互通有无的整合中，避免出现资源重复建设以及资源浪费等现象，还要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与社会各界的交流中，让“九思”理念成为积极引进外部优质力量的法宝，为学生带来更加多元化的发展空间。

三、“一站式”学生社区背景下的“九思”对话育人模式实践探索

（一）环境浸润式“九思”对话育人模式

“一站式”学生社区背景下的“九思”对话育人体系构建，要从打造多元化文化氛围入手，为学生们提供一种沉浸式的认知体验，坚持从学生心理诉求角度出发，发挥走廊、活动室等公共区域优势，将与“九思”相关的警句名言悬挂在醒目处，打造视觉、听觉、触觉、情感多位一体的文化认知模块。学生们则会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感受到“九思”文化，并且从有针对性的师生对话中让学生感受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力量。当学生遇到困惑的时候，一线教育工作者要承担起“九思”对话育人的责任，将“谦恭有礼，温润如玉；言行必忠，敬业无欺”等理念融入日常的教学引导中，并且以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向学生传递各种处世理念，在发挥“一站式”学生社区成员共同语言体系与行为准则的同时，将这种经典理论渗透到每一名学生的成长中，为打造环境育人向文化铸魂的迁移作出贡献。此外，为了能够将“一站式”学生社区环境打造成为“九思”对话育人实践的重要平台，教育工作者还要坚持以儒家的修身齐家理论为基础，通过观察、反思、实践的动态机制，更好地形成社区资源整合生态环境，让各种优秀的品德内化，通过日常教学、生活交际对话实现文化基因的转译[4]。

例如，高职院校在“一站式”学生社区的环境构建中，就可以通过设立九思文化长廊等方式，通过时间轴的具象化形式展示“九思”理念从古至今的演变过程，并且通过图文并茂的影像交互体验，展现历代先贤在践行“九思”过程中的典范故事。当学生与室友发生矛盾的时候，辅导员就可以通过陪伴学生参观主题长廊的方式，让情绪低落的学生能够在与“色思温”等相关书法作品中，学会如何与人相处的哲学，并且在辅导员的帮助下，积极、主动地化解双方矛盾。此外，“一站式”学生社区还应该定期结合学生成长需要，举办“九思”主题摄影展，鼓励学生通过视频、照片等方式用镜头去捕捉生活中的瞬间，在作品展示的过程中学生记录下了食堂工作人员“色思温”的温和态度，有的作品还展示了专业教师的“事思敬”理念，在无声的图像语言中激发学生自主反思，并且在师生互动中完成“九思”文化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应用的转化。

（二）在课程中渗透“九思”对话育人模式

在课程渗透理念下的“九思”对话育人模式影响下，教育工作者还要从“一站式”学生社区的角度，在专业教育中进行深度融合，实现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的同频共振，在知识、能力、素养三位一体培养中打造全新的思政理念。无论是在日常的专业教学中还是各类公共课程的学习中，教师都要结合相关教学内容设置有针对性的“九思”案例讨论模块，将“见得思义”“言思忠”“色思温”等理念进行互动讨论，感受技术应用的道德边界，还要发挥课程论文、角色扮演等多元化教学手段，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将“九思”进行活学活用，结合学生的认知情况以及专业发展特点打造线上“九思”课程资源共享库，将一些新颖的讨论结果、互动过程进行记录，为后续的育人模式推广提供参考和范本[5]。这种渗透模式将会确保各个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同频共振，实现“九思”对话育人背景下的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双重提升，将“九思”对话育人智慧转化为学生的行动准绳，同时要更好地将“九思”理念融入破解各种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秉承知行合一的理念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够在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下获得丰富的专业素养提升，为日后拥有更好的职业竞争力提供支持。

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一站式”学生社区教学优势，在“‘九思’与工匠精神”的课程设计中，相关教育工作者结合学生实际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平台。学校通过社区优势，积极与省内智能制造产业园签订协同育人协议，带领学生走进精密的加工车间开展高质量实训。学生们在工业 4.0 体验中心中，感受着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所带来的智能体验，教师则在讲解专业问题的同时，适时引入“事思敬”理念在质量管理中的具象化应用，并通过对话引导的方式，引导学生来到报废车间，观察一些因 0.01 毫米误差最终导致整批产品报废的案例现场。学生们各抒己见，与教师开展了一系列深度对话。学生们不仅可以从数控编程的经验入手，指出传感器校准偏差是主因，还从“九思”质量链的构想设计中建议对现有动态监测机制进行改革。应该将“事思敬”理念分解为事前预检、事中关注、事后检查等环节。通过这种沉浸式的对话教育渗透，学生的专业水平得到全面提升，并且在工匠精神

的内化转型中实现理论与实践融合的育人闭环管理，让更多学生都可以感受到“一站式”学生社区“九思”对话育人模式带来的育人红利，这种深度产教融合的育人理念也将会使“九思”智慧转化为学生职业发展的重要核心素养。

（三）平台互动下的“九思”对话育人模式

平台互动式育人模式下的“一站式”学生社区信息化系统，还可以结合学生的成长、就业需要，设计出各种有针对性的线上线下联动式“九思”文化传播网络平台，将一些抽象的理论与学生的成长需要进行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在拓展现有文化传播时空优势中，强化学生的互动体验，并且以有效的人机对话、师生对话体验完成既定的“九思”育人目标。在实践中教师要深度研读“九思”内涵，结合高职院校的学生特点，设计有针对性、有特色的文化网络学习平台，在海量的课程视频与典型案例库资源的支持下，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诉求。还要结合实际情况，开设各种主题的网络论坛互动板块，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分享“九思”故事，以此来完成学习、实践、反思的育人闭环。对于广大教育工作者而言，则是要借助这种平台互动体系，对同学们的诉求以及思想进行点拨，在引导、反馈与提升的对话育人机制中，精准把控学生在各个阶段的不同思想动态，还要充分发挥运用 AI 技术特点，打造沉浸式的“九思”对话场景，帮助学生在“一站式”学生社区体验中拥有个性化的学习档案，早日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深度结合。

例如，学生们可以通过在“一站式”学生社区平台论坛中发布个人“九思”学习感悟日志，其他学生及教师也可以给予点评、反馈，并通过积极参与社交媒体平台举办的“九思”主题文化挑战竞赛、微电影制作活动实现文化传播的裂变，突破传统教育时间与空间的壁垒，为“九思”对话育人模式赋予全新的数字生命，带动更多的师生都能积极参与互动探索，遇见更好的自我。随后，学校管理团队还可以结合广大师生的反馈，在“一站式”学生社区网络平台上发布“九思微社区”程序，设置每日一思、对话九思文化等活动，学生们在教师的引导下积极参与互动交流，在“事思敬”中完成实验室 5S 管理的相关方案建立，在教师的支持与带动下全班同学积极参与讨论交流，在不断创新中形成思考向实践的育人思想落地。在“言思忠”的模块中，学生则是结合教师所提出的题目完成相关商业案例的公益广告设计，师生们在“一站式”学生社区微平台中征集更多的意见，最终在讨论和打磨中完成了作品创作。

四、总结

本文通过对“一站式”学生社区背景下“九思”对话育人模式的深入探索，系统总结了“九思”文化在融入高职教育中的价值体现，还从文化理念、资源整合以及评价体系建设等方面关注学生的工匠精神培育，希望在未来的发展中会有更多优秀教育工作者能够积极参与到这项课题的创新研究中，在对“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实践探索中早日实现“三全育人”目标的落实。

参考文献

[1] 马发生 . 高校校外学生公寓社区管理模式应提高“管物”与“育人”相结合管理的实效性 [J]. 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 2023, 9(02): 3.

[2] 陈少雄 , 蔡汇民 , 关磊 . 高校社区“三级四全”典型育人模式构建研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 2021(06): 2.

[3] 杨智勇 . 新时代高校学生社区育人模式的改革创新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 2023(07): 145−150.

[4] 韩景新 . 高校与社区文化融合育人模式探索 [J]. 改革与开放 , 2023(05): 1.

[5] 陈丽爽 .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育人模式发展困境与实践探索 [J]. 教育观察 , 2024, 13(28): 78−8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山东省教育教学研究课题一般项目“微文化融入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育人路径研究”(2024JXY462)；2024 年度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校级科研课题（辅导员专项）重点课题“高职院校辅导员与学生谈心谈话效果评估机制研究”（2024LGF01）；2025 年度济宁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合作专项“孔子‘君子九思’融入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的创新路径研究”（25JSGX070）。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以就业为导向提升高职药学类大学生专业技能探析

邓　琳 晁雪明 王晓阳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影响高职药学类大学生就业的因素有很多，如学生个人因素、学校教育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等，在此形势下，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多方面技能，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对提升学生就业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以及促进专业可持续发展有积极影响。本文从优化课程体系、注重实践教学、培养创新思维、加强职业素养教育和完善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等方面入手，提出了培养大学生专业技能和提升就业能力的路径，以期为高职药学专业教学革新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就业导向；高职药学类大学生；专业技能；就业能力；职业素养

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从多方面入手提升大学生专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方能满足新时代医药行业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在培养人才时，要以就业为导向，建立课程目标、重构课程体系、完善教学模式，结合市场环境和产业结构变化，动态调整课程内容，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并通过实习实训，强化实践技能，提高学生的岗位胜任力和职业素养，这对高职药学类大学生快速适应就业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影响高职药学类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因素

在医药行业快速发展、人才需求多元化背景下，高职药学类大学生仍存在就业困难的问题，其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多个方面。首先，个人因素。社会环境持续变化，在就业指导、就业教育方面投入力度不足，无法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1]。随着就业竞争力增加，部分大学生就业心态不端正，缺乏科学的职业规划，没有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念，对当前就业形势了解不深入，未在短时间内找到心仪的工作，严重打击了学生自信心。其次，学校因素。部分高职院校教育教学质量有限，专业课程重理论轻实践，未深度挖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同时，部分高职院校药学类专业课程内容设置与市场发展脱节，无法满足市场发展需求，在培养人才时，缺乏针对性，且师资力量、基础设备不足，严重影响了人才培养效果。另外，部分高职院校缺乏有效的高职药学专业教学人才和设施。最后，社会因素。当前毕业生数量持续增加，人才市场处于相对饱和状态，再加上高职学历竞争力不足，导致学生就业难度大。

二、以就业为导向培养提高高职药学类大学生专业技能的必要性

（一）适应社会需求，提升就业竞争力

在医药行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对药学人才的需求发生了明显改变，不仅要求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还要求有较强的职业素质和综合素养。以就业为导向培养高职药学类大学生的专业技能，提升其就业能力，不仅延伸、拓展了教学知识，还能帮助学生快速适应社会发展和岗位环境，使学生具有较强的就业竞争力。以就业为导向科学设计专业课程和教学内容，可有针对性地培养社会需求的人才，优化、完善学生的药学知识技术体系，强化其实践能力。而且还能促使学生了解行业动态和社会形势，提前做好职业规划，有利于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和发展。

（二）推动行业发展，服务社会健康事业

人才是各行各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稳定、持续地输入专业人才是行业稳步、创新发展的关键。高职药学类大学生专业技能培养效果与其就业发展息息相关，以就业为导向培养、提升学生的知识技能，有利于提升医药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医药行业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主要以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为宗旨，基于就业导向开展教育教学及技能培养，能提升学生专业技能和就业素质，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医疗事业。随着医药行业新领域的不断涌现，对专业技能强的药学人才需求量逐渐增加，以就业为导向培养技能型人才，可满足不同领域的人才需求，持续精准输送人才，助力医药行业转型发展。

（三）促进高职院校药学专业可持续发展

以就业为导向提升学生专业技能，是高职院校药学专业自我革新的关键路径。部分高职院校医药学专

业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相脱节，导致毕业生就业率低。以就业为导向优化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使专业教学内容符合市场发展规律，满足岗位需求，可提升医药学专业的社会认可度。而通过与企业加强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课程共建，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加强“双师型”队伍建设，为提升药学专业教学质量奠定了基础。另外，基于就业导向的教学改革，也能及时更新课程内容，融入行业新技术与新理念，始终保持专业活力，促进高职院校药学专业可持续发展。

三、以就业为导向提升高职医学类大学生专业技能的路径

（一）优化课程体系，对接行业需求

1. 关注行业新动态，更新学科知识

新时代背景下，医药行业出现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理念，在高职药学类专业教学中，要积极做好市场调研，关注行业新动态，并以此为依据优化课程体系，更新学科内容，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专业技能，提高就业素质[2]。要了解行业发展现状和技术趋势，通过加强与医药行业企业、专家深入交流，分析传统药学知识体系中的不足，融入多学科领域知识，确保能够快速响应行业发展变化，从教育内容上与行业有效对接，使课程体系内容更加有效、可靠。

2. 注重跨学科融合，完善课程内容

医药行业发展中对复合型人才需求日趋多元，因此在高职药学专业教学中，为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更好地满足医药行业发展需求，要注重跨学科融合，促进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完善药学专业课程内容，促使学生形成全面认知体系，提高学生运用多种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如，引入基因工程类课程，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了解行业最前沿的技术；增设药物化学课程，帮助学生掌握各类药物的分子组成，了解具体的合成原理，以此丰富、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便于后续药品研发。

3. 引入行业案例，增强市场敏锐感知

在高职药学专业教学中，可引入行业案例作为课程教学素材，创设教学情境，加深学生对行业发展和工作内容的认识。比如，在药物分析课程教学时，引入药品质量控制案例，让学生了解、掌握药品从生产到销售各环节的质量控制要点及流程标准，帮助学生认识到把控药品质量的复杂性和严谨性，快速、全面地掌握具体要点和注意事项，便于今后更好地工作、服务社会。总之，通过引入行业案例，不仅能提高学生对市场的洞察力和感知力，还能增强其实操技能。

4. 加强校企合作，共建新型课程体系

高职药学类大学生专业技能培养中，要基于就业导向优化课程体系，加强校企合作，共建符合当前市场发展、行业需求的新型药学类专业课程体系。要将行业前沿知识、技术、研究成果、产业趋势和企业生产中的各类问题等融入新课程体系，并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与课程教学内容相结合，创新课程知识体系，促使学生掌握更多领域的知识技能[3]。人工智能为个性化药学服务提供了有力支持，这是药学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因此需注重培养高职药学类大学生应用新兴科技的能力。

（二）加强实践教学，提升实操能力

1. 加强实训基地建设

药学类专业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行业对人才的实践能力要求较高，基于就业导向培养专业人才时，要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实操能力。因此高职院校要明确药学类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方向，加强实训基地建设，保证经费充足，完善设施设备，为学生提供功能齐全的实训基地，便于开展多样化的药学试验，模拟真实的药学工作环境，以此整体提升学生的实操能力，为其毕业后快速适应工作岗位和行业发展环境奠定坚实的基础。

2. 开展实验教学

根据药学类专业课程的具体内容，积极开展实验教学活动，以此锻炼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教师要基于教材内容，紧密联系行业实际情况，设计针对性强的实验项目，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基本技能的理解和运用，并掌握正确的方式方法；在实验教学时，要密切理论知识与实验内容的联系，为学生提供深层次了解所学知识的机会；在实验过程中，学生要发散思维，深入探究各类问题，提高创新创造力。

3. 组织实习活动

在高职药学类专业教学中，高职院校要从提高学生就业率的角度出发，精心组织实习活动，为学生提供接触药学工作的机会，使其通过实习实践充分了解行业发展现状，并与行业企业加强合作，让学生到企业中顶岗实习，帮助学生学习更多的职业技能和工作技巧，从而达到提升学生实操能力的目的。

（三）培养创新思维，激发创造力

1. 课程设置中融入新思维

医药行业的创新发展需要具有较强创新思维、创造能力的专业人才，这与学生的职业竞争力有着密切联系。为提升药学类大学生的专业技能，帮助其更好地就业，需在课程设置环节融入新思维，注重锻炼、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通过营造实践探究类学习环境，引导学生深入研究，鼓励学生敢质疑、敢挑战、敢创新。与此同时，还应增设培养学生创造力和创新思维方面的课程，加强思维训练，丰富知识内容，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从新角度探究问题的能力。

2. 课外活动创造新途径

在增设创新创造相关课程内容的同时，要通过组织开展多样化课外活动的方式，锻炼、培养药学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比如，举办科技创新竞赛和创业比赛，让学生拥有展现自身能力和锻炼自己的舞台，以此提

高实操能力，并在激烈角逐中运用发散思维，高效思考，快速找到解决各类问题的能力。另外，高职院校可聘请行业专家、学者来校开展讲座，分享最新科研成果和创新经验，促使学生把握创新方向，产生创新灵感[4]。高职院校还要建立、实施激励机制，根据学生在科研创新中的表现，给予多种形式的奖励，以此激励、鼓励学生主动创新。

（四）加强职业素养教育，塑造良好职业形象

1. 培养学生职业道德

职业素养关系到学生今后的发展，职业素养的高低直接体现在工作态度、职业形象和职业道德等方面。以就业为导向提升高职药学类大学生专业技能，需将培养学生职业素养放在首要位置，使其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在今后的职业岗位中做到认真负责。由于药学工作与患者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培养药学专业人才时，教师要做好教育引导工作，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今后工作中爱岗敬业，认真负责，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2. 培养学生职业礼仪

要想塑造良好职业形象，高职院校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礼仪，明确其在学生职业素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开设专门的培训课程，强化学生职业素养教育效果，通过模拟职业场景，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教导学生职业礼仪，也可在实习实训过程中，让学生亲身体验、学习专业人员的职业礼仪，掌握相关要点，学习具体技巧，以此提高学生在就业中从容应对、处理各类问题的能力。

3. 注重压力管理训练

由于医药行业工作压力较大，因此需要从业人员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较强的承压能力，才能始终端正职业心态，做好本职工作。高职药学类大学生专业技能培养阶段，要注重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压力管理训练，促使学生在面对各种情况时都能沉着冷静应对。合理的压力管理训练，不仅能让学生自我调节情绪，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在学习、工作中保持乐观心态，树立正确的职业意识，还能有效提高学生应对、处理各类挫折和压力的能力。高职院校还可邀请优秀从业者，向学生传递经验、分享心得，帮助学生掌握职业技巧。

（五）调整教学方法，完善教学质量

1. 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技能培养，需要教师改变传统教学方式，将课本知识与医药行业真实工作场景、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吸引学生深入探究行业情况，调动学生的主动性[5]。对不同的课程内容，教师要采用多样化教学方法，如情境创设、案例教学等，通过与学生有效互动，活跃课堂教学氛围，使教学内容生动有趣，便于学生理解、掌握药学知识。在学生实践实习环节，要培养、提高学生岗位胜任力，提升其职业素质和能力，以便今后就业。

2. 建立完善的教学质量保证体系

为了提高药学专业教学质量，要以就业为导向，在优化调整课程内容和方法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确定具体的教学目标，做好全过程教学评价工作，并根据评价结果了解当前药学专业教学中的不足，找准优化调整的具体方向。此外，还要建立监督机制，安排专业人员监督药学类专业教学工作，全面收集各阶段的数据信息，综合分析教学质量和水平，并联系医药行业的动态变化，优化调整教学目标和质量标准，确保方式方法合理，教学模式完善，以此提升专业教学质量。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以就业为导向提升高职药学类大学生专业技能，可培养出符合用人单位标准要求的技能型人才，帮助学生毕业后快速就业，不仅提高了药学类专业的教学效果，还提升了学生就业能力。高职院校药学类专业教学中，需结合市场环境变化和产业发展需求，动态调整教学内容、方法和模式，使专业课程体系与市场需求保持一致，从而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就业素质，以便向社会稳定输送药学类专业人才，推动医药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许扬名，宋建飞，姚文兵．“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药学专业人才培养路径探索 [J]. 四川劳动保障，2025(05): 120−121.

[2] 王一宏．基于校医企合作的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J]. 才智，2025(06): 161−164.

[3] 李三望，吴绮平，程泽能，等．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产教融合培养模式研究 [J]. 药学教育，2025, 41(01): 29−33.

[4] 康琪，孟祥国．应用型药学人才培养中药物化学创新教育实践路径探索 [J]. 药学教育，2025, 41(01): 94−97.

[5] 王清清，刘芳，朱美林，等．实验室开放项目对药学类学生专业技能培养的促进作用 [J]. 蚌埠医学院学报，2021, 46(09): 1323−1325.

（作者单位：菏泽职业学院）

表达性艺术团体辅导对改善高职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实证研究

陈晓燕 张梦元 罗春红 赵鑫飞 朱 琳

摘要：目的：为探究表达性艺术治疗形式的团体心理辅导方法对当代高职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干预效果，推动高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高效开展。**方法：**采用混合实验设计，使用抑郁自评量表 SDS 量表分别对实验组及对照组进行前后测试实验。**结果：**表达性艺术治疗形式的团体心理辅导对改善高职大学生抑郁情绪效果显著。**结论：**表达性艺术团辅可以被应用于高职大学生的抑郁情绪的缓解，融入表达性艺术的干预方式相较于常规心理干预更契合高职大学生的特点，呈现效果良好。

关键词：表达性艺术团体辅导；抑郁情绪；高职大学生

抑郁情绪是消极情感体验的一种，表现为持续的心境低落，兴趣和快感缺失，精力减退和自我评价低等[1]。与抑郁障碍问题相比，高职大学生抑郁情绪问题更加普遍。2023 年 4 月 20 日，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强调要发挥美育丰富精神、温润心灵的作用。而表达性艺术治疗形式的团体心理辅导将艺术与心理融合，可以借助非语言的媒介为学生提供心理帮扶，相较于传统的干预技术，它以积极心理学的视角面向一般大学生，使受众更广泛。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文章通过在某高职院校微信公众号平台以及微信群、QQ 群发布线上团体活动介绍以及招募团体成员的通知，以线上问卷的形式对报名的高职学生抑郁情绪水平进行调查，并对筛选出的高低得分者进行访谈。筛选得到符合条件的高职大学生共计 50 名，所选取研究对象 SDS 分数介于 53~72 数值之间。在与 50 名符合条件的高职大学生一一联系之后，基于自愿与允许的前置条件，得到 24 名可供研究对象。采取实验对照组前后测试实验，将 24 人划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成员 12 人。研究符合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

（二）研究工具

文章研究工具包含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该量表包括 20 个项目，采用 4 点计分[2]；陈灿锐等人出版的标准结构式曼陀罗涂色绘本，潜意识投射卡等，采用 SPSS22.0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三）基于表达性艺术治疗形式的高职大学生团体心理辅导方案设计

1. 团体心理辅导活动设计

非言语表达性艺术治疗非常适合处于开放与闭锁矛盾的青少年群体[3]。基于此次心理辅导活动的周期性将整个活动划分为 6 个单元，每单元 90 分钟，在 6 个单元结束后，对实验组及对照组研究对象开展心理测试（量表化），团体性质是支持性、教育性、结构性、同质性、封闭式发展团体。团体带领者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接受过系统式治疗流派连续培训与团体辅导相关理论学习。通过对实验组与对照组测试前后的数据对比，来得出表达性艺术心理团辅对高职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干预效果。

2. 表达性艺术心理团辅应用于高职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干预程序

以表达性艺术治疗的理论为依据，采用写意曼陀罗、OH 卡牌探索、食物塑形、漆扇制作、诗歌创作等方式进行干预。每次活动一个主题：与君初相识（团体建立）、情绪的味道、太阳照常升起、“凑数”的日子也很好、聚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团体结束），从建立团体到团体告别，层层递进。团辅过程中，通过心理卡牌探索“生命之花”梳理自己当下的生命状态，伴随冥想音乐进入写意曼陀罗，通过色彩表达、纸片拼接创作使团体专注于内心的宁静与平和，相较于隐喻着线性时间观的直线绘制轨迹，隐喻着循环时间观的圆圈绘制轨迹更有利于改善青少年的抑郁情绪[4]，故采用了圆圈绘制轨迹。通过漆扇制作感受情绪的流动；选择不同口味不同颜色的酸奶粉代表自己情绪状态，使用牛奶进行调配，调配好后使用炒酸奶机进行颜色画面创造、塑形制作，透过非语言媒介，使被语

言文字所压抑的情感经验得以表达与释放，促进个体自我觉察与情绪成长，最终达到改善抑郁情绪的效果。

二、研究结果及干预效果分析

在 6 个周期团体心理辅导结束后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分别开展问卷与抑郁自评量表 SDS 的测试，并对数据进行分析评估。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活动前测 SDS 总分差异性检验结果

标准分	组别	N	平均数值	标准差值	t
SDS	实验组	12	58.574	5.163	0.369
	对照组	12	58.764	5.178	

在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开展前，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分别进行了独立样本 t 的检验，通过表 1 中数据可知，样本数值在活动展开前的差异不显著。

表 2 实验组活动前后检测结果

标准分	组别	N	平均数值	标准差值	t
SDS	实验组前测	12	58.574	5.163	4.978**
	实验组后测	12	46.099	6.570	

（注：*p<0.05，**p<0.01）。

对实验组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通过表 2 数据可知，实验前后差异显著。实验组成员在经过表达性艺术团体心理辅导后抑郁情绪缓解明显。

表 3 对照组活动前后检测结果

标准分	组别	N	平均数值	标准差值	t
SDS	对照组前测	12	58.751	5.187	0.597
	对照组后测	12	56.916	5.360	

结合表 3 中数据可知，对照组在活动前与活动后其配对样本 t 检验差异性不显著。

表 4 实验组与对照组活动后测 SDS 总分差异性检验结果

标准分	组别	N	平均数值	标准差值	t
SDS	实验组	12	46.099	6.570	−2.651*
	对照组	12	56.916	5.360	

（注：*p<0.05，**p<0.01）。

结合表 4 中呈现数据可知，分别对实验组与对照组立足表达性艺术团体心理治疗、常规性工作周期结束后，以其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经由表达性艺术团体心理辅导的实验组成员抑郁情绪缓解效果显著。

基于表达性艺术团体心理辅导的实验组成员，在对个人开展主观评估时，其各项数值均自 0 值起始，而数值的变化直观呈现出正向的改变。因此，可以将实验组成员在表达性艺术团体心理辅导后的自我评估数值变化纳入整体研究的统计分析之中，具备评估价值和意义（见表 5）。

表 5 基于表达性艺术团体心理辅导后实验组成员自我评估

评估项目	x±s	t
了解自我	2.44 ± 0.68	10.75**
理解他人	1.74 ± 0.73	7.26**
与人沟通	1.28 ± 0.75	5.41**
情绪控制	2.98 ± 0.67	11.77**
分享欲望	1.74 ± 0.74	7.67**
关爱他人	1.80 ± 0.75	8.88**
责任感	1.72 ± 0.98	4.51*
个人自信心	2.34 ± 0.69	10.71**
交友态度	2.17 ± 0.77	9.53**
自我接纳	2.99 ± 0.60	15.48**

（注：*p<0.05，**p<0.01）。

综上所述，立足活动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同质判断基础上，并结合实验组在表达性艺术团体心理辅导前后的样本 t 检验显著差异，提出实验组成员在经过表达性艺术团体心理辅导后抑郁情绪缓解明显观点。由此，文章研究认为将表达性艺术团体心理辅导应用于高职大学生的抑郁情绪改善很有必要性以及成效性。

三、表达性艺术团辅对高职大学生抑郁情绪干预可行性分析

表达性艺术团体治疗注重激发个体的自发性和创造性，促使个体以新的视角看待自己、他人和社会[5]。曼陀罗绘画作为表达性艺术团辅中可以应用的一种方法，具有缓解情绪、整合内心冲突，探索自我、培养积极资源品质的疗愈功能[6]。它简单、低成本、容易实施并且非常有效，这些特点使得曼陀罗绘画疗法非常适合在学校这样的场所推广和实施[7]。表达性艺术团体心理辅导相较于常规性心理辅导方式更加便捷和顺利，以创作者的作品直观得知其情绪问题，继而针对性开展相对应的引导与沟通，呈现出较好的干预成效。

（一）实验组成员活动前后呈现

C 成员作为实验组的一员，其在围绕“人—树—家”创作主题的作品创作时，在纸上展示的家呈现出结构不稳定问题，而家的结构不稳定在心理方面的解释则是代表创作者在创作画作时情绪压抑，具体表现在家庭中，则为家庭内部压力太大，令创作者难以承受。家中的房屋在装饰方面，有一扇较大的落地玻璃窗，代表着画作创作者的交友待人态度处于保守状态，给自己留有的个人空间过多。而对树的绘画呈现，则是枝干细小却结有小而密的果实，意味着创作者内心

太过压抑，被太多的心事所困扰。在关于人的绘画创作方面，C 成员创作出一个肢体语言匮乏，表情失落，朝左上空看望头顶航行离去飞机的人物，展现了其情绪低落、沉湎过去与恐惧未来，想要逃离当前环境的消极态度。

通过表达性艺术团体心理辅导，C 成员在围绕同样的“人—树—家”主题创作绘画作品时，其对于主题创作的感受则改变显著。首先是关于家的创作，此时的家已经展现出稳定的结构性，同时也更加立体，代表着该成员不再过度关注自身，而是积极与家人沟通交流，因此，他在创作之时便认为家是安全且可靠的存在。其次，C 成员对于树的创作，画中树的枝干更有生命力，且枝干所结果实只有一种，表明该成员已经有勇气面对困境。最后，便是 C 成员关于人物的理解创作，画中的人物呈现出奔跑状态，且位于画作的右侧，虽然人物的身体涂黑部分仍然存在，但人物的肢体语言与位置已经表明其愿意去探索未知的意愿，不再沉湎过去不愿面对未来。经过 6 个周期的表达性艺术团体心理辅导，C 成员在最后一个周期内同样围绕“人—树—家”主题进行绘画创作，其作品呈现情绪、感受则趋向良性，意味着该成员的抑郁情绪得到显著缓解。

（二）实验组成员代表活动前后整体评估

6 期团辅结束后，同学们共创圆形位置坐标。实验组 A 成员坐标位置较团辅前更靠近中心，并写下“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成员 B 坐标位置与团辅前相比，与其他成员更近，并写下“向阳而生，逐光而行”，团体成员在团体结束时留下的感受还有“留下迷茫、悲伤，带走温暖、快乐与方向”等。结合文中选择的实验组代表成员绘画作品解读，得知该成员情绪的转变在于同一主题画作在实验前后的不同呈现，且画作中的不同呈现较为显著。首先，是绘画作品中创作者对于线条的运用。实验前的画作，在线条的运用展示方面，有着凌乱、反复涂抹、断断续续明显问题。而在实验后，绘画作品中对于线条的运用展示则清晰、干脆、流畅。其次，是绘画作品构图的变化。实验前的画作，结构不仅单一，且人、树、家之间的比例失调，缺乏生命力的展现。而实验后的画作，结构合理、丰富，人物生动充满活力，树也昂扬生长。实验后的人物由静变动，树有被风吹动的表现，家有色彩、风铃、房檐等细节补充。绘画特征、画面呈现的转变，可以表明，经过 6 个周期的表达性艺术团体心理辅导，实验组成员抑郁情绪缓解明显。

四、结论

传统抑郁干预手段在面对抑郁程度较深的个体时，常受语言表达的制约，而表达性艺术团辅兼具趣味性、灵活性与可操作性，为来访者提供了非语言表达的途径，高职学生更易接受。团体成员在干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一定的“安全距离”，阻抗小，情绪得以缓和。本研究采用的认知行为疗法（CBT）核心理论指出，认知偏差与适应不良行为在心理疾病的发生发展进程中具有关键影响。研究通过融合艺术媒介的干预形式，促使团体成员在创作实践中深化对自身认知模式的觉察，习得转换问题视角的思维策略。在舞动、音乐表达等具身实践中，引导个体聚焦身体感知体验的干预模式，能够优化大脑神经功能、缓解抑郁状态并深化自我认知。此外，这类系统性干预可帮助团体成员识别不良行为模式，逐步实现向健康行为模式的转变，在情绪调节技能的培养方面亦体现出显著效用。表达性艺术团体辅导通过艺术载体触及潜意识层面，使个体在艺术活动中经体验、反思、梳理与宣泄等过程，对被言语压抑的情感体验进行觉察、重构与释放，进而缓解情绪困扰、疗愈心理创伤、激活潜意识层面的创造力，最终通过自我整合达到改善高职大学生抑郁状态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MUSTAFFA S, AZIZ R, MAHMOOD M N, et al.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 116(01): 4205-4208.

[2] 张明园 . 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 [M]. 长沙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98.

[3] 彭阳 , 周文 , 李卓 , 等 . 曼陀罗绘画对初中生自我意识及情绪的影响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4, 32(06): 1411-1416.

[4] 鲁艳桦 , 李政青 . 曼陀罗绘画轨迹对改善青少年抑郁情绪的效果研究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 2022(05): 1235-1239.

[5] 梁黛婧 . 表达性艺术团体治疗对大学新生自我和谐的影响研究 [J]. 心理月刊 , 2022(12): 42-44.

[6] 王丽彬 . 曼陀罗绘画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创新研究 [J]. 艺术教育 , 2024(09): 35-38.

[7] 陈梓萱 , 梁永春 , 陈嘉樾 , 等 . 曼陀罗绘画疗法在心理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J]. 百科知识 , 2024(33): 65-6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后疫情背景下表达性艺术团辅对改善高职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实证研究”（MA2023398）。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中职学校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

史瑞盟 金筛成

摘要：本文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阐明了中职学校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强调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并立足于中职学校，根据教育教学规律，尝试从学生的认知、情感、行为等整体视野进行系统研究，以课程教学育人、校园环境育人、网络媒体育人、文体活动育人、实践服务育人等方面进行路径探索，从微观层面探寻具体化的实施路径。为更好地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营造积极向上、和谐稳定的校园氛围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职学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生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分布上，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不同民族人员的流动愈加频繁，多民族交互杂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所以在各级各类学校中，不同民族的学生一起学习和生活已是常态。

中职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由动荡期逐渐向成熟稳重期过渡的重要阶段，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思想活泼、追求个性、情绪不稳定、认知能力较低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新时代，一些中职学生存在理想信念模糊、政治觉悟不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淡薄的问题。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民族共同体。它建立在共同历史条件、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物质基础、共同身份认同和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1]。具体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强调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和团结，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中华民族共同体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倡导文化多样性与包容性，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共同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民族在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2]以及对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责任担当。这种意识涵盖了对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民族精神的认同和传承，同时也包含了对中华民族共同的利益、目标、命运的认知和追求。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3]的客观存在和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这种意识和理念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职学生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与重要性

学校尤其是中职学校，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场所，肩负着培育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使命，其中，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为了有效推进这一工作，学校应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并以此为指导，全面深化民族团结教育，促进各民族学生的交往交流交融。“四个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基础[4]，“四个与共”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纽带[5]，“五个认同”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6]。在深化民族团结教育的同时，中职学校还应加强各民族学生的交往交流交融。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中职学生正处在“拔节孕穗期”的关键阶段，需要进行精心引导和栽培，此时“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才能在以后的人生发展中走得更好更远。在中职学生中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促进个体更好发展；有助于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构建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传承发扬中华文化，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有利于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三、新时代中职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实践路径

根据教育教学规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该以“正确认知—情感认同—行为践行”的步骤进行培育。正确认知是前提，情感认同是核心，行为践行是强化[7]，使学生逐步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充分融合课堂教育教学，提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程度

1. 历史教学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师通过历史课堂的教育教学，教育学生要用唯物史观的视角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发展趋势。要用好中国古代历史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这条主线，注重梳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演进过程，讲清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情况。使学生能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我国的具体国情，了解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是如何形成、发展和巩固的，理解长期政权分裂局面又是如何顺应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的哲学规律。

2. 思政课程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用好思政课堂的教育教学，要做好价值引领。中职学校的思政教师要利用课堂教学讲清、讲透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内涵和意义。引导有宗教信仰的学生正确理解国家的宗教政策，杜绝参加非法、极端、犯罪的宗教活动。通过思政课堂强化政治方向的思想价值引领，结合中职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与社会现实，积极弘扬主旋律，引导学生思想积极向上，不断增进各族学生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

3. 学科教学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的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全体任课教师要树立全程育人、全面育人的大思政格局，根据学科和专业课的内容和特点，挖掘各学科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和德育资源，将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等渗透到课堂教学之中，使学科教学与思政理论课同向而行，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工作中“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二）积极创设校园育人环境，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情感

1. 构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校园环境

校园环境能启迪心智、陶冶情操，还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道德品行。通过校园广播，进行感官环境创设。在课间或者放学后，通过校园广播播放与民族团结和热爱祖国相关的歌曲，如播放爱国歌曲《我的祖国》，并对其创作背景、歌曲鉴赏等内容进行介绍。如播放民族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之后，再介绍这是一首富有新疆民歌特色的歌曲，内容表达了各族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2. 构建促进民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的管理方式

班级是学校的基本单位，是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基本组织，在学生入学时进行混合编班[8]，构建多民族学生同班学习的环境，促进不同民族学生间的交流交往。教师要引导少数民族学生积极参加班级的各项活动，鼓励少数民族学生竞选学生干部参与班级管理，增强主人翁意识，培养集体荣誉感，实现民族团结。

宿舍是学生生活交往的场所，安排不同民族学生混合住宿，创建共居、共学、共事的环境和条件，加强各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还可以开展宿舍内务评比活动、“红石榴”主题宿舍文化节活动，举办学生喜欢的互动协作游戏，鼓励民汉学生一起参加，构建各族学生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一起成长的良好氛围，消除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心理壁垒。

（三）善于利用网络媒体平台，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向情感

1. 利用网络教育资源，实现多元培育方式

在信息大爆炸时代，网络教育平台和学习资源愈发丰富。网络媒体平台将文本、图画、声音、视频集成于一体，传播内容更多元，并以强大的辐射力影响着学生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理想信念。

教师要善于使用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积累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资源，在教学时进行情景创设，以便激发学生兴趣、化解教学难点、调动学生积极性，实现快节奏的课堂教学活动。教师要借助网络媒体平台，将教学视频、PPT 等资料上传，让学生课前预习或者课后拓展学习，给学生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学习途径。教师还可以利用网络媒体向学生播放有教育意义的电影、电视、新闻、纪录片等辅助课堂教学，更容易引发学生情感上的共鸣。

2. 建设网络媒体平台，拓展育人阵地空间

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络空间建设，拓宽教育渠道和宣传阵地。中职学校可以利用学校的官网、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开设“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页面，运用简明扼要的方式发布一些每日必读的时政动态，主要解读党的民族政策、理论、重大会议精神等内容，运用更为生动活泼的形式发布一些热点话题、经典案例、民族活动、新闻时政等吸引学生的有效关注，传播好促进民族团结的声音。借助学生喜欢的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推送介绍少数民族节日习俗和传统文化知识的相关视频、学校开展的体现“各民族一家亲”活动的相关视频、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视频等供学生交流学习，充分营造各民族一家亲的良好网络氛围。

（四）持续创新校园文化活动，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行为

1. 借助传统节日，开展主题活动

一方面要重视少数民族节日与特色活动。每个节日的背后都有其内涵和意义，教师可组织座谈会、讲座、主题班会等活动，让少数民族学生讲解展示自己的民族的节日文化，促进学生对不同民族习俗的了解，加深各族学生间的情感交流。

另一方面依托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和纪念日开展主题活动。重大节日一般具有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是产生情感共鸣的重要时间节点。以节日、纪念日为契机，举办演讲、朗诵、征文、合唱、书法、绘画、手抄报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推动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2. 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交流认同

紧扣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将民族文化展示活动打造成校园文化活动的品牌项目。中职学校要为学生搭建展示民族文化的舞台，通过组织文艺表演、民族服装展、民族美食节、“美丽家乡”摄影展等活动，将民族文化传播出去，让学生在校园内体验多样的民族文化，促进各族学生交流沟通，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效。

中职学生由于年龄尚小，自行编排节目、组织活动时经验不足，需要教师的悉心指导。尤其是在组织文艺节目时，要以教师为幕后编导、各族学生为幕前演员，深入挖掘民族文化中的人物故事、民族精神，以情景剧、歌舞表演、诗歌朗诵等形式宣传民族文化。同时鼓励少数民族学生深入挖掘中华文化，注重提高节目的质量，增强活动吸引力，让不同民族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自觉做民族文化传播者和民族团结的倡导者。

3. 组织体育活动，联结民族情感

中职学校可通过组织校园体育活动为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交往交流创造机会，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如组织团体对抗比赛赛事时，将不同民族的学生分到同一队，比赛时各族学生为着同一目标相互配合共同努力，从而增强彼此之间的认同，培养了集体意识，也有利于民族团结。还可组织学生观看国际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使不同民族的学生产生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身份认同，激发学生情感共鸣，构建共同记忆，形成团结意识。通过体育活动打破不同民族学生的心理隔阂，帮助他们摆脱孤独感，是产生情感聚合的有效方式，也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五）认真策划组织社会实践，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自觉

1. 开展参观研学实践活动

走进社会大课堂，开展参观研学活动，是将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有效方式。中职学校可以组织不同主题的参观研学活动，增强学生体验感，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以民族复兴梦为主题的研学活动、以民族文化学习为主题的研学活动、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研学活动、以非遗传承为主题的研学活动等等。中职学校在组织主题参观研学实践活动时，可让学生在实践中领悟这些精神的真谛，从而增强民族团结与“中华一体”的价值共识。

2. 开展志愿服务实践活动

中职学校可以组织“三下乡”社会实践，开展不同内容的志愿服务活动。如果能结合学生所学的专业开展相应的实践服务，就能更好地发挥学生专长，志愿服务实践活动的效果将更好。中职学校通过开展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加深学生对民族政策的理解，进一步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总结

民族大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时代赋予各级各类学校的重要任务。中职学校作为我国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培育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分别从课程教学育人、校园环境育人、网络媒体育人、文体活动育人、实践服务育人等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对应提出五条培育路径，使学生逐步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此助力中职学校更好地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工作，落实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重任。

参考文献

[1] 李雨 .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及路径分析 [J]. 中国军转民 , 2024, 24(03): 84-85.

[2] 高承海 .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内涵、意义与铸牢策略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9, 40(12): 24-30.

[3] 同 [2].

[4] 伍蓉 . 高校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路径研究 [D]. 成都 : 西华大学 , 2023.

[5] 同 [4].

[6] 同 [4].

[7] 杨君睿 . 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高校培育研究 [D]. 徐州 : 中国矿业大学 , 2023.

[8] 王多娜 . 浅谈中职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途径 [J]. 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 , 2022, 24(04): 65-68,7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镇江市党校联盟（镇江市情研究中心）课题“新时代中职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ZJDX2024121）。

（作者：史瑞盟，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助理研究员；金筛成，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研究实习员）



胡力民，1959年8月生于河北文安县，又名立民，字文安，号太阳村人。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楷书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河北书法院副院长等职。

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楷书委员会副秘书长，河北省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等职。曾担任全国第五届正体书法作品展、2019全国楷书作品展等国展评委。教育部《翰墨薪传》书法教育首批专家。2009年被中国美术馆评为『中国首批国家投资收藏作品的56位书法名家』之一，2013年9月应邀为各国驻华使节讲授书法。

胡力民习书师承高鸿源、旭宇先生。主攻魏碑、二王行草，其作品曾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展，全国第七、八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全国正书展、行草展、楹联展等相关展览共17次。其作品荣获全国第三届正书展最高奖，全国『翁同龢』杯书法大展提名奖。已公开出版《楷书章法与创作》《中国书法大典·胡立民书法集》《当代楷书名家作品集·胡立民》等多种。他倾心于书法教育事业，辅导的学生中有35人在全国第11届、第12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览中入展、获奖。

三春有雨 艺通于道

——读胡力民书法作品有感

旭宇

有一年，冬季无雪的北国名城石家庄，随着春节将至，尽管寒光千里的华北大平原还未闻到春天的气息，但已有了“一冬无雪天藏玉、三春有雨地生金”的期盼。其实我们的书法也同大自然一样，在长期艰难蕴育后，预示着某一天将有成果的降临。我希望自己是这样，更希望我的学生们也是这样。这一天，我的学生胡力民来我家里看望我，并拿出准备出书的作品让我提意见，当我看到学生的新作时，真的产生了一种“三春有雨地生金”的惊喜。

在我与力民交往的十几年中，知道他是一个忠诚于艺术并有思想的人。他对书法创作的一些理解和想法，开始是体现在他的言谈中，后来便反映在他的作品里。二者的统一揭示着一个深刻的道理：艺术通于道。任何一门艺术，尤其书法艺术，是经过长期的孕育结出的硕果。

看了力民的作品后，就像读到他的文章和诗一样，无论是楷书、行书、草书，都是表现出道的和合与抒发情感的载体，所以感动了我。

书法创作最重要的是要写出自己的性情。历史上的大家都是这样，书由情而作，颜真卿的行书《祭侄文稿》之所以感染人，就是写出了情，写出了思想；书法通于道，才有永久的艺术魅力，这个作品是高尚的。它能给人以鼓舞、教育和启发，得到美的享受，这是书法最高的艺术境界。力民的作品也在追求真情，那种旷达、开张、浑厚、高远的境界，如同让你站在高山、草原，看到天边的飞虹掠过而浮想联翩；或是站在大海边，望着东方的日出而激情满怀。他楷书的雄强、典雅，行书线条的流美，草书线条的激荡，都能让你体会到生活中的美好，这是书法艺术真正的魅力。力民在这方面不断地挖掘、深化，才使他的楷书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平，他有自己的规律和追求，也有自己的面貌和才情，更有对艺术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创造了既属于书法传统，又有自己风格的新面貌。为艺如做人。力民的质朴厚重是为同仁们所称道的，他把自己骨子里的品格融入了自己的作

品中，使大家感到，其作品如同力民本人。这是一种修为，也是一种境界。

人生要有境界，要不俗，艺术也要做到不俗。魏晋时，人们崇尚玄学思想，追求士大夫高雅的情趣，如历史上的竹林七贤、建安七子、陶渊明、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等人，他们的作品不俗而高雅。力民的作品从魏晋入手，一路走来，临二王，学魏碑，经历了学习、研究、实践、提炼、升华的过程，并形成了他作品不俗的格调。从他前些年的作品来看，基本上属于学习研究阶段；而他近几年的书法实践，逐渐多了一些对艺术的理解，人生阅历，再加上视野的开阔，使他的书法艺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表现出了当代人的审美，反映了当代人对书法艺术的呼唤。力民的作品是传统的，是有源之水，有根之木，所以，他的作品能流得更远，气象显得更大，但又是创新的，因为，他作品中所彰显的精神是与当代人书法审美共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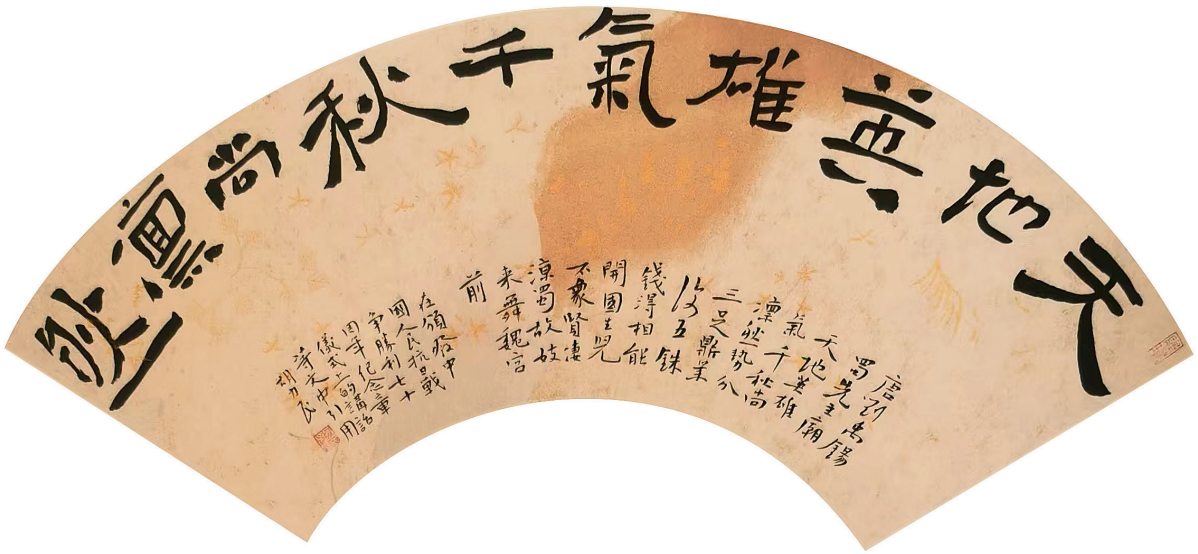
如果说传统是水，是一望无际的海洋，那我们书家是鱼，在大海中可以游到任何地方，潜得越深，游得越远越好，但不能跳到岸上，岸上不是书法的传统，那里没有规律和法则可循。力民懂得了这一点。用自己的才情和智慧在书法的大海中遨游。他以楷书为基点，把唐楷化魏碑，又以魏碑化行书、行草，现在又尝试化草书，书路越来越宽，从他的这本书法集来看，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力民与他同辈们相比，是一个出道较晚的书家。他从 11 岁开始写字，到 35 岁才上国展。应该经历了“一冬无雪”的长期磨砺，作为他的老师，我期望他能“天藏玉”，更希望他“三春有雨地生金”，如今力民已成为当今有创作实力的书家，因为他扎根在传统的土地上，思想前瞻，这一点，从他的行草书中可以证明。他深入二王，但他的笔势又与二王的秀劲飘逸不同，他把魏碑的用笔运用到草书后，产生了一种力量的飘逸之感，让我们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古人的书法实践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任何艺术都是在不停顿中给人们带来希望，在不断创新中保持着独有的生命力，无论对个人还是艺术群体都是这样。艺术是春天的事业，春天的事业是朝气蓬勃的事业，是前途无量的事业，是万紫千红的事业，是不断升华的事业。期望力民在这个美好的春天里，不断生出属于他自己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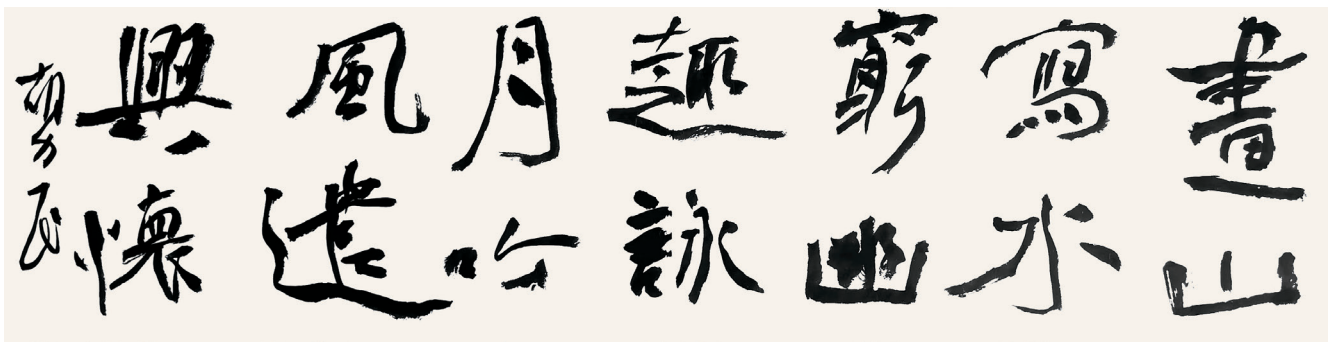
力民在从事书法创作和书法教育工作的同时，身体力行地奉献于公益事业，并取得突出成绩。自 2012 年起至今，他先后组织团队在云南曲靖、甘肃陇南、山东青岛、宁夏吴忠、河北秦皇岛等地举办全国公益书法培训班 6 次（每次 4 天），900 余人受益。他在担任清华美院书法高研班导师期间，分别在陕西西安、铜川，广东佛山、揭阳，浙江乐清，湖北黄石，河北文安、顺平、丰宁三县，山西大同，江苏泰兴，福建三明，安徽绩溪县，河南项城、淇县，山东泰安、东营，四川剑阁县等地做公益讲座 21 次。特别是近年来，他积极向中华慈善总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等单位组织的全国赈灾活动捐款，据不完全统计，他以个人名义为四川地震、南方水灾等赈灾活动捐款近 20 万元，为各项活动捐赠书法作品近 200 幅。2020 年 3 月，在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主办、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承办的“美善不息·全国书画名家抗击疫情主题创作慈善拍卖”活动中，他创作的四尺整纸楷书《钱起诗》作品拍出 2.7 万元，无偿捐赠给中华慈善总会，支援一线医疗工作。2024 年 9 月，在河北文安县举办的“笔墨同心·丹青绘爱”书画公益活动中，打包捐赠书法作品 52 幅，被某企业以 40 万元购藏，所得善款设立河北文安文化发展奖励基金，为支持文安文化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本文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河北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胡力民书法作品选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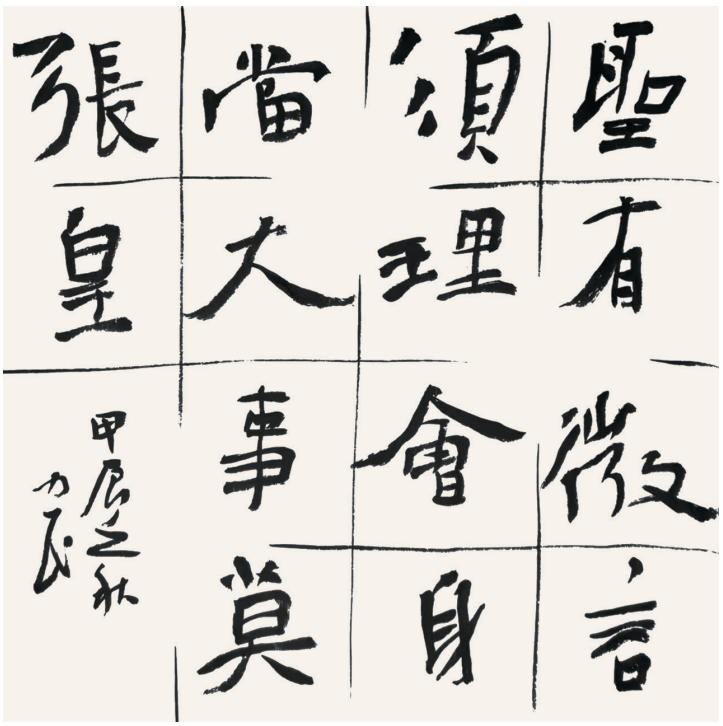
△ 胡力民 魏碑扇面“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68cm×33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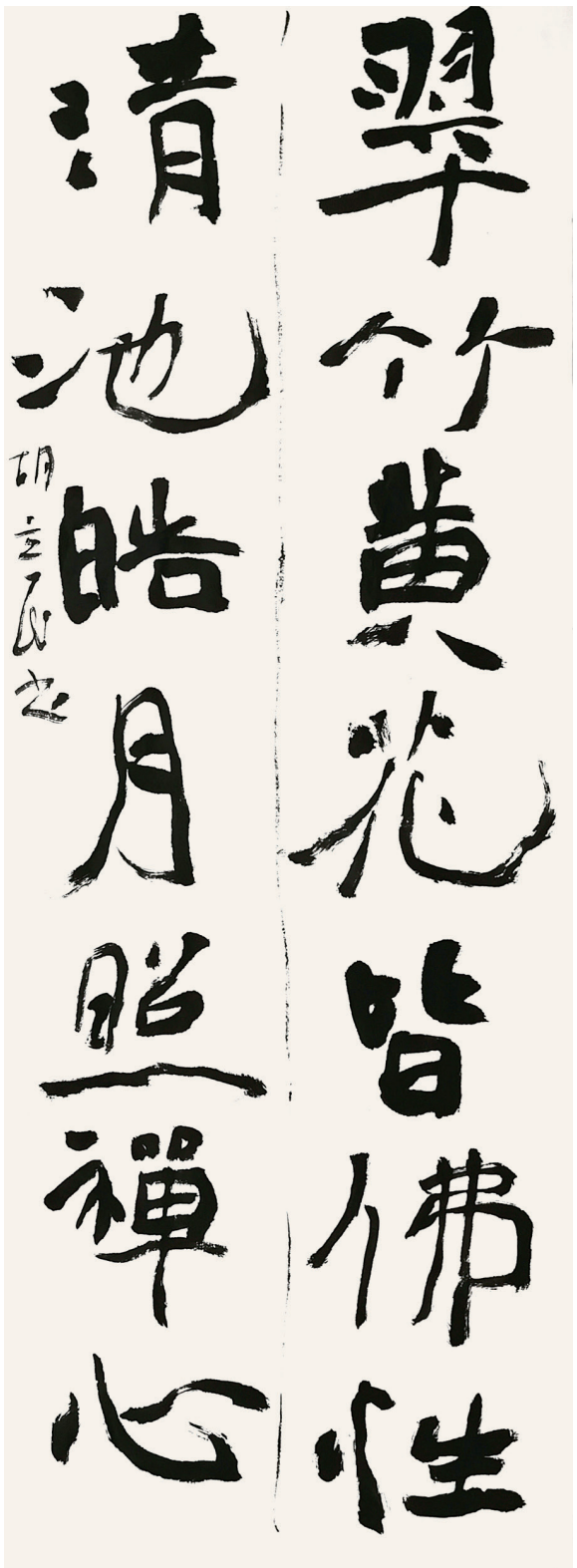
△ 胡力民 魏碑七言联“画山写水穷幽趣；咏月吟风遣兴怀。” 136cm×34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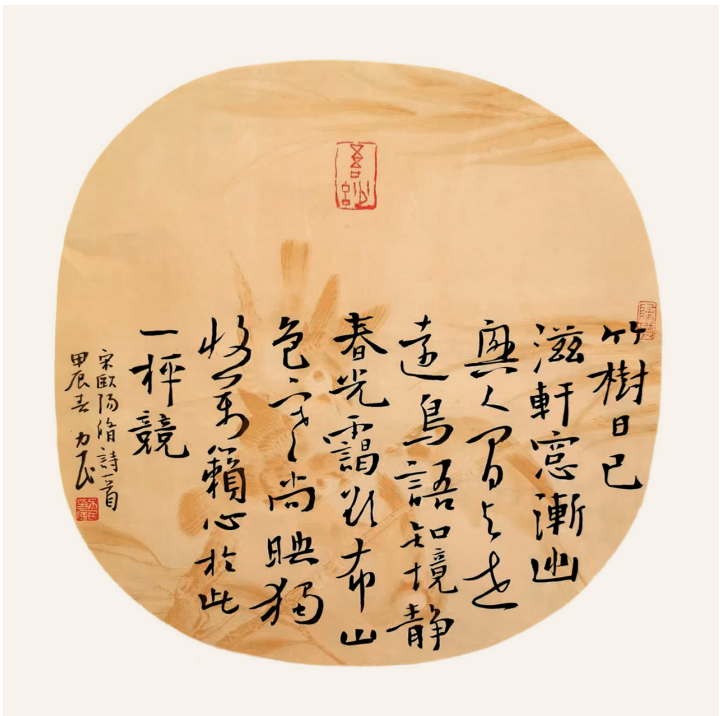
▷ 胡力民 魏碑横幅 唐李白诗 136cm×70cm



△ 胡力民 魏碑斗方“圣有微言须理会；身当大事莫张皇。” 68cm×68cm



△ 胡力民 行书七言联“翠竹黄花皆佛性；清池皓月照禅心。” 136cm×28cm



△ 胡力民 行书团扇 宋欧阳修诗 33cm×33cm



写心灵境 述精神魂

——记当代没骨人物画家苏国强

彭一超

没骨画，是中国画的一种冷僻的画法。关于“没骨画”，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辞海》（见中卷第2351页）中有“没骨”辞条记载：“中国画技法名。不用墨线为骨，直接以彩色描绘物象。五代后蜀黄筌画花勾勒较细，着色后几乎不见笔迹，因有‘没骨花枝’之称。北宋徐崇嗣效学黄筌，所作花卉只用彩色画成，名‘没骨图’，后人称这种画法为‘没骨法’”。

通过援引上述《辞海》对“没骨”的诠释，“没骨画”就不难理解了。中国画自古以来，讲究书写性，即骨法用笔。而没骨画则“不用墨线为骨，直接以彩色描绘物象”，画者不用勾轮廓，不能打底稿，更不放底稿拓描，根据自己的布局构思，胸有成竹，大胆落笔，一气呵成，便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没骨画。因没骨画对画者绘画技法本身有较高的要求，故画坛鲜有人涉足，能取得成就者更是凤毛麟角。在北京从事编辑出版以及大学教学工作的湖南籍学院派画家苏国强，自2013年开始涉足没骨花鸟画创作，继而推进到没骨人物画的探索；十多年来，他潜心执着于没骨人物画和花鸟画的探研，创作了不少代表性没骨画作品，其作品多次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等国家学术机构主办的各类重要中国画展，并被收藏。特别是2024年，由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主办的“没骨寄情——苏国强中国画展”，对他近十年来的没骨画进行学术总结与梳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受到业界诸多名家的赞誉。

国强是学者型画家，他比较注重创作与理论上兼修，且成果丰硕，近年来，已陆续公开出版《师古与师造化·恽寿平没骨花鸟画研究》《中国历代绘画品类理法研究》《中国历代经典绘画粹编·清代恽寿平》《中国宣纸材料与新媒介视觉艺术研究》《中国当代水墨名家个案研究·苏国强水墨艺术》《中国历代经典绘画粹编》《中国历代经典绘画解析》等专著。

国强的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吴山明（1941—2021）说：“他的艺术，试图在传统与当代中找到平衡点，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画的传统精神，在这种传统精神中又透出很强的自觉的当代意识。这些年，他的创作，经过反复实验，坚持自己的方向，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及风格，作为一名青年艺术家实属难得。虽然这种语言还处于探索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积淀，但他的潜质与潜力，使我们

苏国强，1978年6月生于湖南省冷水江市。现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研修班导师。现居北京。

2001至2005年，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专业。2016至2019年，就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师从吴山明先生。2005年至2019年，就职于湖北美术出版社。2019年至2020年，就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2020年至今，就职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近年来，其中国画作品多次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机构主办的各类全国性美展。

已看到他的发展前景。”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鸣说：“苏国强的人物写生，其传神之境，有着与当下人物画不同的语境。他的笔法似乎在脱离传统中所遵循的目识心记的写生之法，似乎又有着背离当下人物写生中所流行的笔墨状态。然而他又没有刻意去回避这两种状态的体现。他以一颗平静之心，在古与今、中与外中逍遥自在地寻找着属于自身语言特征的表现。表达着自身与他人之间的精神与心灵的沟通，传递出内心深处的人文精神。所以在形与神的处理上更强调了神韵的再现。这一点也许更趋向于中国人写生的文化特质，画为心声。写心灵之境，述精神之魂。”

中国画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田黎明说：“国强没骨人物画以扎实的基本功追寻造型意象，体味笔墨的生发与色彩的清雅……这使国强的没骨画浸透着浑厚沉郁之美，人物形态与整体感生发出山峦般的沉厚与光芒，国强把这种笔墨感知已将没骨方式转化为清旷而净澈纯厚而劲健的画面语言，开拓出国强没骨画的新画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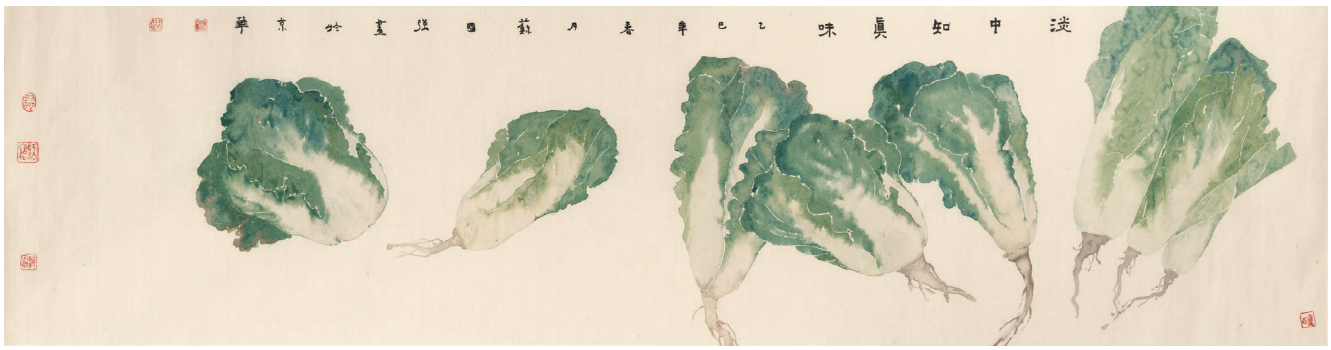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名誉院长潘鲁生说“苏国强的没骨画不跟风，有主见，在题材拓展的同时，捕捉和表达万物皆有的神韵与独特之处……苏国强的没骨画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和理路，不仅是大道至简的哲学精神，还有艺术之美感创生的路径。”

国强对没骨画的创作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悟，他认为：“绘画是艺术家的心灵痕迹，是表达情感的语言方式。当我一拿起毛笔，面对宣纸的时候，绘画让我静下心来，追寻内心世界，记录我的每一天，日复一日。我画平常生活中的瓜果、蔬菜，花卉与畜兽，画甘南朴实的藏民，画身边的山山水水。我喜欢这种状态，一种真实的状态。”

中国绘画创作自古注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唐代画家张璪语）。从五代两宋的黄筌、徐熙、徐崇嗣等，到清代的恽寿平等历代没骨画大家，他们都是在写生状态下完成的作品。国强的没骨画创作亦如此。他认为，这不仅体现出历代没骨画大家对自然的亲近与关照，更体现了写生对历代没骨画家的重要意义。尤其在 2020 年至 2022 年疫情期间，国强经常利用去逛菜市场的机会，挑选买回一些外形独特、色彩鲜艳的新鲜蔬菜、瓜果等食材，他每天用没骨法水墨技法记录这些时蔬，日积月累完成了一组组蔬果长卷，如《蔬果写生》《丰收》《笋》等，没骨人物画《草原牧女》《牧歌》等等，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无不彰显了国强近年来没骨画艺术创作实力和成果。

多年来，国强的中国画创作一直伴随着社会公益同行。2021 年捐赠水墨作品，参加“关爱留守儿童，撑起希望蓝天”——中国当代艺术名家公益邀请展暨慈善拍卖会项目。同年 7 月 7 日向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图书馆捐赠《中国历代经典绘画萃编》图书共 40 册。2023 年 11 月 8 日，参加由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漓江画派学院主办的“艺术语言与情感表达——关于没骨画艺术中的几点思考”公益讲座。2024 年 7 月 24 日，应邀参加由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国国家画院、国家文物局机关服务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北京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中国画 画文物，守望相助 和美同心”活动深入内蒙古锡林郭勒、呼和浩特、赤峰等地，开展为期一周的采风创作活动。2025 年 6 月 12 日，参加中国国家画院组织的“中流砥柱——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赴山东枣庄创作、采风写生活动。同年 6 月 17 日，参加中国国家画院组织的“中流砥柱——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在河北保定的创作、采风写生活动。国强表示，作为一名艺术家，只要社会需要，他将努力践行社会公益精神，用自己的作品奉献社会和人民，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苏国强没骨画作品选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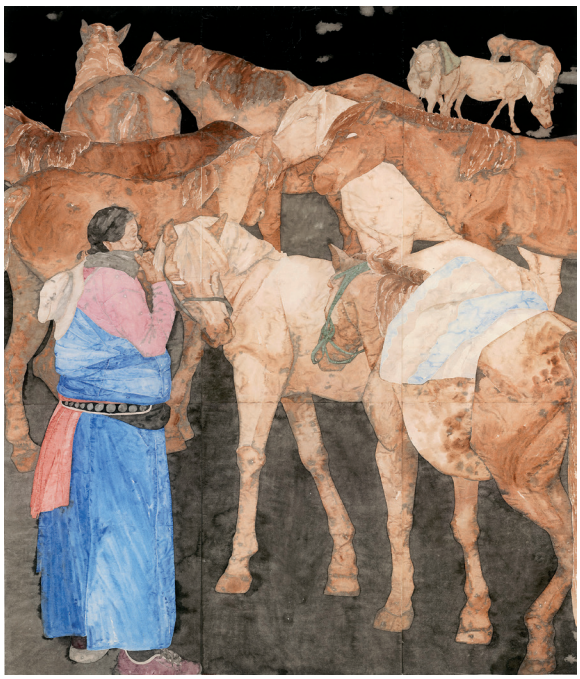
△ 苏国强 《淡中知真味》 136cm×33cm 纸本设色 2024 年



△ 苏国强 《满园花开》 136cm×68cm
纸本 2023 年



△ 苏国强 《祥石玉兰》 136cm×68cm
纸本设色 2025 年



△ 苏国强 《牧歌》 210cm×180cm
纸本设色 2022 年



△ 苏国强 《草原牧女》 195cm×196cm
纸本设色 2022 年



▽ 苏国强 《草原情》 200cm×200cm 纸本 2023 年

社会与公益
Society & Public Welfare
www.spw.org.cn

2026 征订

40.00元/期

《社会与公益》杂志由民政部主管，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主办，《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杂志于 2010 年正式创刊，海内外发行，国内统一刊号 CN：11-5944/C，国际刊号：1674-9758，邮发代号：82-579，半月刊，中文版，纸媒 + 新媒体。《社会与公益》杂志，聚焦社会建设，助力社会工作及公益事业。

新媒体账号：**社会与公益**（人民号 / 微信 / 抖音 / 微博 / 头条号等）

联 系 人：崔老师　　投稿邮箱：shegongren@163.com
电　　话：010-68300355/0356/0357/0361，13520733451
户　　名：《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金融大街支行
账　　号：11020101040007959

扫码填写订单



欢迎征订《社会与公益》杂志 2026 年综合版（上半月刊），40 元 / 期，全年定价 480 元（综合版，上半月刊）。

广告

社工人
有困难 找社工
社工人数字化平台

有困难 找社工

聚焦急难愁盼
助力基层治理
共享美好生活

ISSN 1674-9758
9 771674 975253 19>

公益广告

邮发代号：82-579　定价：40.00 元

社会与公益
Society & Public Welfare
2025年10月 上 总第183期
聚焦社会建设·助力公益事业